寻找英雄孙永勤

下卷

詹文宏 主编
翟丽芳 编著

在万里长城东段
调查
抗日救国军
悲壮抗战始末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寻找英雄孙永勤

下卷

詹文宏 主编
翟丽芳 编著

在万里长城东段
调查
抗日救国军
悲壮抗战始末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一、本卷是抗日英雄孙永勤的资料汇编。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原始口述材料”部分和“图书、报刊文章”部分。前者收录自1958年10月起至2010年5月31日止，我能搜集、采访到的所有有价值的关于孙永勤的回忆文章。其中约一半的内容由河北省兴隆县史志办公室热情提供，部分由冀东烈士纪念馆、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热诚提供，其余由我近年采访或请当事人执笔写作得来。后者收录自1933年起至2010年5月止，我能看到的所有公开发表、公开出版的关于孙永勤抗日的报道、文章。这些报道、文章的一部分由知道名字和未留下名字的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当年辛苦地从辽宁省图书馆等地复印抄写而来，一部分由兴隆县史志办、遵化市委党史办、遵化市政协、玉田县政协，包括一些学者个人提供，其他由我近年搜集和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抄写而来。

二、本卷最初未想出版，只是为自己编写孙永勤传记提供一些阅读上的方便。因为绝大部分的孙永勤资料，特别是口述资料，都是以原始笔录的方式存在着，每个调查者又都有自己的书写风格，除部分材料外，多数材料阅读、检索起来非常困难。我是在将它们一一打印出来后，突然意识到如果能将这些材料公开出版，将为希望了解孙永勤英雄事迹的人和热河抗战、冀东抗战的研究者提供很大的便利，不仅可以让他们容易地阅读孙永勤的资料，而且能够使他们免去奔波之苦。我将此想法向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作了汇报，得到参事室领导的积极肯定，于是才有了又补充一些材料，将此卷正式出版的机会。今天和以后的读者在阅读本卷时，希望能铭记这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为社会所作的贡献。

三、本卷要请读者原谅的是，不论原始口述材料部分，还是图书、报刊文章部分，除极个别文章作了一些注释外，绝大多数文章都未作整理和注释。图书、报刊文章编者未便删改，原始口述材料部分只作技术性改动，使之既便于阅读，又符合出版要求。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出于尽可能保持原貌，给读者提供原始、真实的文本这一考虑外，也和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1. 一部分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已经去世，任何他们之外的人对他们采访记录的

整理都可能会不符合他们采访时的原意。2. 大部分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虽健在，但均年事已高，不忍再劳动他们花费过大精力对旧稿进行整理。再者，他们作的调查最近的距今天也有二十年了，很多采访内容的片断纵然还能回忆，但要准确地复原被采访者的用词和话语真意，恐怕也是很困难的了。不如保持当年笔录的原始面貌，对了解历史真实更为有益。3. 我个人采访部分之所以未作整理注释，是由于以下两点：（1）我曾尝试对我的采访笔记作整理，但我发现，要全部整理完毕，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我的工作性质已不容许我再专门抽出一整段时间去做这个工作。（2）即使我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我仍然要面对不得不以己意来删改被采访对象原话的问题，对此，我目前尚未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四、本卷得以出版，除要感谢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外，还要感谢1998年以来，为我进行孙永勤事迹调查提供热诚、积极帮助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位热心人士。没有这些单位和人士的支持，要想比较圆满地完成孙永勤英雄事迹的调查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支持我的单位和人员名单，我附在了上卷后面，本卷中不再重复收录。

五、本卷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搜集到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支那驻屯军）及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在“围剿”孙永勤一事上的秘密文件、日记及照片。最近几年，我虽努力创造机会去日本，并不懈地与美国、台湾方面当事人家属的后代、学者联系，希望能发现一些新的资料，以补充孙永勤抗日过程中一些环节的缺失，破解他在抗战过程中，特别是被“围剿”之时的一些谜团，然而一直未能如愿。期待以后能有机会使这方面的愿望得以实现，更希望有志之士能最大限度地补足这方面欠缺的资料，在此，我先致谢意！

翟丽芳

2011年9月10日

编著说明

一、为读者查找、核对原稿方便，本卷编选的资料尽量使用了原标题。极少数因原标题字数太多或原标题中人名、地名出现讹误、不统一情况而使用了新标题者，均在书中新标题下以“文件原名”方式注出原标题。

二、为保持资料原貌，本卷绝大部分文章未做删节。极少数出于特殊原因删节者，均以（略）或（部分内容略）等字样示之。原文有删节者，一仍其旧。

三、为便于读者阅读，对某些资料加了按语或注释。注释文字少者，用［　］加在相应文字后；文字多者，以脚注方式标注于页面下方。资料中的原注，一仍其旧。

四、编者为资料增补的脱字，置于〈　〉之内；讹误字，于原文字后在〔　〕内加以更正；原件模糊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附带说明，正文中的（　），均为原有，非编者所加。

五、由于各种原因，本卷涉及的一些人名、地名存在着讹误及写法极不统一的情况。为对历史负责，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者尽可能亲自作了考证，或请当事人亲属、事发地的朋友们帮助进行了核实。对大部分已调查清楚的名字，本卷采取了在原文字后，将准确写法标注于〔　〕中的处理方式；对少数暂时无法核查或已无查清可能的名字，采取暂按一种写法统一，将这种写法同样标注于〔　〕中，置于原文字后的处理方式。

经过核实、统一后的人名、地名如下：

1.人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C

柴启瑞。传为今河北省承德县上谷乡郭杖子人，但据郭杖子村支部书记郭书均帮助调查，村中不但没有曾叫过“柴启瑞”之人，且没有柴姓，因此准确籍贯还需查考。他是孙永勤军师之一。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柴启瑞”、“柴起瑞”、“柴积瑞”。准确名字由于现阶段无法核实，暂按“柴启瑞”写法统一。

F

樊凌玺。今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东草厂人，中共地下党员。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樊凌玺”、“樊凌喜”。现根据其传记作者陈述的写法，统一为“樊凌玺”。

G

高作忠。今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人，地主。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

字存在着六种写法："高作忠"、"高子忠"、"高自忠"、"高佐忠"、"高作中"、"高德忠"。经向其孙高印萱核实，统一为"高作忠"。

关元有。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王宝石人，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八种写法："关元有"、"关元友"、"关原有"、"关源有"、"宫有元"、"有元"、"朝治源"、"韩有源"。因其妻子1944年被日军枪杀，儿子在其妻子遇难前一年（1943年）牺牲于遵化，女儿在日伪统治时期移民黑龙江，名字目前无法准确核实。暂根据兴隆县委党史办佟靖功先生1986年到王宝石采访时所作笔记及我2005年对王宝石村关元奎老人的采访、日伪及民国报纸对"有"字的写法，统一为"关元有"。

H

郝敬义。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人，孙永勤军师之一。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六种写法："郝敬义"、"郝敬意"、"郝静一"、"郝玉祥"、"郝世祥"、"郝进秀"。经向其孙郝连坤求证，确认"郝敬义"为正确写法。

郝士财。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人，郝敬义长子。本卷编选材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郝士财"、"郝世财"、"郝世才"。"郝士财"为其子郝连坤确认的写法。"如启文成永，云敬士连召"，郝连坤曾向我介绍《郝氏家谱》上记载的起名顺序和文字写法，据此，本卷涉及的所有郝家营村的"世"字辈的郝姓人名都改为"郝士×"。

何育民。传为今河北省迁西县三屯营人，彭杖子地主岳荫臣的大经理。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何育民"、"何玉明"。准确写法现阶段无法核实。暂根据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徐文礼老人回忆，统一为"何育民"。

L

雷常玉。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河南大峪老房子人，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五种写法："雷常玉"、"雷长玉"、"雷成玉"、"雷廷玉"、"雷庭玉"。根据其外孙朱金城意见，统一为"雷常玉"。

李桂攀。今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灰窑峪人，孙永勤读私塾时的老师。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李桂攀"、"李桂潘"。经向其孙李思伶、李思尧、李思迁及其学生杨玉良求证，确认"李桂攀"为准确写法。

刘秀存。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粳子峪人。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刘秀存"、"刘秀村"。根据2002年7月向其本人了解，确认"刘秀存"为准确写法。

绺子。土匪的别称。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土匪，共有"绺子"、"柳子"、"溜子"、"流子"、"缕子"五种写法。参考解放后国内出版的多种图书，统一为"绺子"。

卢仪卿。今河北省兴隆县兴隆镇人，伪"满洲国"热河省承德县兴隆办事处财政局（一说为财务局）局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四种写法："卢仪卿"、"卢仪清"、"卢义卿"、"卢义清"。根据佟靖功先生所写《孙永勤传》及兴隆县历史编

写委员会办公室编《兴隆县历史（第一卷）》中写法，统一为“卢仪卿”。

骆凤庭。今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任中共遵化县委书记。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骆凤庭”、“骆凤亭”。根据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写回忆文章上的署名，统一为“骆凤庭”。

骆凤鸣。今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人，骆凤庭弟弟，中共地下党员。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骆凤鸣”、“骆凤明”。根据骆凤庭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写回忆文章中的写法，统一为“骆凤鸣”。

M

马保德。今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人，抗日救国军副军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马保德”、“马宝德”。经东双城村支部书记马柱向其侄辈亲属核实，确认“马保德”为准确写法。

S

孙永香。今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罗圈沟人，民国时期兴隆县北五保总保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五种写法：“孙永香”、“孙永祥”、“孙进香”、“孙一香”、“孙义香”。经向其孙孙守礼求证，确认“孙永香”为准确写法。

孙文阁。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人，抗日救国军战士。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孙文阁”、“孙文革”。经向其亲属求证，确认“孙文阁”为正确写法。

孙文伶。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人，孙永勤长子。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孙文伶”、“孙文邻”、“孙文令”。他名字的准确写法目前难下定论，经与孙永勤亲属商量，决定暂以可能性最大的“孙文伶”写法统一。

商佩璋。籍贯不详，传为抗日救国军中的投敌叛变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商佩璋”、“商佩章”。准确写法尚需查证，暂按“商佩璋”统一。

W

王承祖。名继宗，字承祖，今河北省玉田县杨家套乡后黄坨人，鸦鸿桥民团司令，中共地下党员。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字存在着三种写法：“王承祖”、“王承组”、“玉承组”。根据张世昌所写人物小传《王承祖》，统一为“王承祖”。

王平陆。今河北省迁西县罗家屯镇上梨树峪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任中共京东特委委员、中共迁安县委书记、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王平陆”、“王平路”。根据中共迁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所写《王平陆和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以“王平陆”进行统一。

汪海澂。传为辽宁盖平人，即今辽宁省营口市盖县人，曾留学日本，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任伪“满洲国”热河省承德县兴隆办事处处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四种写法：“汪海征”、“汪海徵”、“汪海澂”、“王海澄”。由于目前无法

看到他的档案，暂依原兴隆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佟靖功先生及本书特约校对王笠晖先生的建议，统一为“汪海澂”。“澂”意为“水清”，“海澂”即“像海一样清”，有可能最符合其取名原意。

Z

赵邦海。籍贯不知，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队副，一说为中队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赵邦海”、“赵帮海”。准确名字目前无法调查。暂按照王笠晖先生建议，统一为“赵邦海”，缘“邦海”可能更贴近取名初衷。

赵廷普。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人，抗日救国军战士。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赵廷普”、“赵廷朴”、“赵庭普”。经路通沟村副村长刘胜新帮助调查，确认“廷”字为其名字中间字的正确写法。至于其名字当中最后一个字如何写作，目前已较难核实，本卷决定暂以“赵廷普”为准，进行统一。

赵廷山。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人，抗日救国军战士。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赵廷山”、“赵庭山”。根据路通沟村副村长刘胜新对其名字中间字进行调查的结果，以“赵廷山”写法统一。

赵有。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人，抗日救国军军法处处长，一说为卫队队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赵有”、“赵友”。经路通沟村副村长刘胜新帮助调查，确认“赵有”为准确写法。

张海鹏。今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沙岭镇热河台村人，奉系军阀，“九·一八事变”后叛国投敌，1933年5月至1934年11月间任伪“满洲国”热河省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省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张海鹏”、“张海朋”。现根据解放后各种出版物中的写法，以“张海鹏”统一。

张含明。籍贯不详，曾任河北省特警队第一总队第一区队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张含明”、“张翰明”、“张耀明”。根据张庆余所写《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及张炳如所写《冀东保安队琐闻》，以“张含明”统一。

张如兰。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人，地主。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张如兰”、“张儒兰”。“张如兰”是在张杖子向多位村民请教后确认的写法。与他的情况相同，本卷中凡是被写为“张儒×”的张杖子张姓名字，均统一改为“张如×”。

张如增。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人，地主。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张如增”、“张儒增”、“张禄增”。经向张杖子多位村民了解，确认“张如增”为正确写法。

张文弟。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人，张如增儿子。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张文弟”、“张文第”。“张文弟”是经向张杖子多位村民请教后确认的写法。

赵林。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人，“黄花川农民抗日大暴动”发起

者之一。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赵林"、"赵令"。"赵林"为正确写法。

周毓英。传为山东省诸城人，曾任河北省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长。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周毓英"、"周毓瑛"、"周敏英"。经查阅资料，确认"周毓英"为正确写法。

2.地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B

八卦岭。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八卦岭"、"八挂岭"两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八卦岭"。

般若院。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苏家洼镇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般若院"、"般岩院"两种写法。"般若院"为正确写法，"般岩院"应为排版错误。

瀑河口。地在今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瀑河口"、"暴河口"两种写法。今根据宽城满族自治县199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瀑河口"。

北鄻。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北鄻"、"北川"两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北鄻"。

C

柴户场。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柴户场"、"柴户厂"、"柴火场"、"柴禾场"、"柴禾厂"五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柴户场"。

常峪沟。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柳树底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常峪沟"、"长峪沟"两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常峪沟"。

E

二十里铺。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境内，分"东二十里铺"、"西二十里铺"两个村庄。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二十里铺"、"廿里铺"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二十里铺"。

F

房家峪。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房家峪"、"方家峪"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房家峪"。

G

甘查峪。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侯家寨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甘查峪"、"干家峪"、"干楂峪"三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甘查峪"。

官台子。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官台子"、"关台子"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小厂乡信访科员吴艳民先生帮助核实的结果，统

一为“官台子”。

H

化鱼沟。地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化鱼沟”、“化于沟”、“华鱼沟”、“化榆沟”、“桦榆沟”五种写法。今根据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化鱼沟”。

皇阁村。地在今迁西县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皇阁村”、“皇开”两种写法。今根据1935年5月大部分民国报纸写法，统一为“皇阁村”。

洪山口。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洪山口”、“红山口”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洪山口”。

J

尖山屯。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尖山屯”、“线山屯”两种写法。“尖山屯”为正确写法，“线山屯”应为排版错误。

L

老梁。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老梁”、“老崀”、“老㟓”三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老梁”。

廖高庄。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建明镇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廖高庄”、“略各庄”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廖高庄”。

罗降梁。地在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大杖子乡交界处。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罗降梁”、“罗将梁”两种写法。准确写法尚需考证，今暂统一为“罗降梁”。

路通沟。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路通沟”、“路筒沟”、“路同沟”、“陆同沟”、“鹿通沟”、“鹿同沟”、“鹿洞沟”、“鹿筒沟”八种写法。今依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路通沟”（介绍“鹿通沟”名字由来时除外）。

M

毛山。地在今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毛山”、“茅山”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毛山”。

毛山沟。地在今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毛山沟”、“茅山沟”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毛山沟”。

糜子地。地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水泉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糜子地”、“米子地”两种写法。今根据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糜子地”。

N

暖儿河。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暖儿

河”、“暖河”、“南河”、“安河”四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暖儿河”。

Q

清河。地在今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清河”、“青河”两种写法。今根据宽城满族自治县199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清河”。

清河口。地在今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清河口”、“青河口”两种写法。今根据宽城满族自治县199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清河口”。

秋花峪。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秋花峪”、“楸花峪”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秋花峪”。

秋科峪。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侯家寨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秋科峪”、“楸科峪”、“秋克峪”三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秋科峪”。

S

澈河。滦河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今河北省兴隆县境内，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汇入滦河。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澈河”、“撒河”、“洒河”三种写法。今根据这条河历史上的准确写法及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澈河”。

澈河桥。地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澈河桥”、“洒河桥”、“沙河桥”、“撒河桥”、“撒河沟”五种写法，今根据这条河历史上的准确写法及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澈河桥”。

三里店。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三里店”、“三家店”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三里店”。

三屯营。地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三屯营”、“三头营”两种写法。今根据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核定的地名，统一为“三屯营”。

松挠沟。传在今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具体位置尚需查证。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松挠沟”、“松闹沟”、“松闹子沟”三种写法。因不知其准确地点在哪里，无法对名字进行核实，今暂统一为“松挠沟”。

舍身台。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侯家寨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舍身台”、“设身台”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舍身台”。

T

塌山。地在今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塌山”、

“塔山”两种写法。今根据宽城满族自治县199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塌山”（介绍“塌山”原名时除外）。

X

小于沟。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小于沟”、“小于家沟”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小于沟”。

邢杖子。地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邢杖子”、“刑杖子”两种写法。今根据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邢杖子”。

Y

鸦鸿桥。地在今河北省玉田县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鸦鸿桥”、“鸦洪桥”、“鸦虹桥”、“鸦虹树”四种写法，今根据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核定的地名，统一为“鸦鸿桥”。

永合堂。地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境内。本卷编选的资料中，此地名有“永合堂”、“永河堂”、“永和堂”三种写法。今根据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永合堂”。

目　录（下卷） Contents

一、原始口述材料

二、图书、报刊文章

一、原始口述材料



郝席庵亲笔供词（节选）

作　　者：郝席庵

写作时间：1958年10月~1959年

文件原名：《郝席庵亲笔供词》

复制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说明：郝席庵，遵化县马兰峪镇人。1951年10月16日在北京被捕，1954年被判无期徒刑。1957年2月经河北省高级法院减为有期徒刑15年，送承德劳改第五大队（新生铁厂）劳改。1958年10月送兴隆县看守所编写“满洲国”兴隆县历史，1959年病故。

第一卷

（伪“满洲国”简史）

1983年1月

复制

4. 农民武装孙永勤的起义

1933年春季，伪满政权——热河省公署及热河省各县旗公署先后建立完毕。首任热河省长张海朋〔张海鹏〕、承德县长赵养愚等对地方执行统治政策，各主要乡镇成立警察署，各村成立警察分驻所及警察派出所，对地方农民极力统治与镇压。于是引起了以孙永勤为首的承德、兴隆、青龙三县农民武装起义，打起反满抗日旗帜，与日满军警讨伐队相持半年之久，大小战斗数十次，给以日伪军警讨伐队极大的打击。

孙永勤是承德县属黄花川人，成分富农，起义的时候，约40多岁。在中国汤玉麟任热河省主席时，家中即有私购自卫大小枪数支。伪满“建国”后，在车河口成立警察署，黄花川成立警察分驻所。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伪满在承德县执行武器登记后，随即实行“铳器回收”政策，孙永勤家中的枪支，多半被警察署收去。后来警察仍就向孙永勤及黄花川一带农民索要枪支，农民们百般地维持警察，但警察仍是勒索敲诈，对地方农民们打骂交加，并抓捕黄花川一带农民多人，在车河口警察署刑讯监押。这时孙永勤鉴于〈在〉伪满统治〈下〉无法生存下

去，乃同其胞弟子侄等及黄花川一带的亲友十余人，携带武器，将车河口警察署及黄花川警察分驻所包围。将警察武器缴收，房屋家具捣毁，公开地打起反满抗日旗帜，在车河口一带起义了。

1935年（伪满康德2年）1月间，孙永勤在承德县属车河口、黄花川起义后，不到三周的时间，附近农民因不堪伪满的统治压迫，纷纷携带武器，参加起义的人，约有三四百人。孙永勤率领起义农民，占据了车河口附近几个乡村，随时去各村警察分驻所突袭，缴俘武器甚多。伪满驻承德一带的日满军警讨伐队前往车河口讨伐，与起义农民作战数次，均被起义农民击回。这时孙永勤率领起义农民约七八百人，由车河口一带，沿青龙兴隆境，边战边走，于1935年2月中旬到达兴隆县半壁山、蓝旗营一带。在孙永勤来半壁山后，青龙兴隆各村农民参加武装起义的颇多。在3月间，孙永勤起义农民在半壁山附近各村中约有2000之多。

1935年4月间，孙永勤领导起义农民，占据在半壁山附近乡村山中，震撼了伪满热河省各机关，尤其是兴隆办事处惊惶失措，兴隆街上警戒吃紧。这时兴隆办事处长高胜山、警务科长池尾、参事官增田进、半壁山分处长蒙品臣等，急电热河省军警机关告急，请求派队“围剿”。在4月中旬，伪满军队约两个步兵团，承德、兴隆、青龙三县组织的警察讨伐队约1000余人，并由〔有〕承德及兴隆驻在的日本关东军约数百人，分三路进军，将半壁山包围。并由承德来飞机一架，在半壁山一带盘飞助战。这时孙永勤率起义农民在半壁山附近乡村山中与伪满军警交战多次，双方互有伤亡，但起义农民的战斗精神，并不衰减。

1935年5月间，日伪军警讨伐队大批增援，在半壁山一带与农民作战，后因寡众悬殊，兼之起义农民给养弹药缺乏，由孙永勤率领进入罗文峪、洪山口、龙井关，到达遵化县东部与迁安县接壤地区。孙永勤率领起义农民进驻遵化迁安等县，希望冀东的中国政府能够同情接援，但结果相反，卖国的冀东地方政府不但不接济起义的农民，反而派队与日满军警会同，来与起义农民作战。

1935年6月间，孙永勤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约2000余人，在遵化县东新城子一带乡村，与日满军警及伪冀东保安队并遵化迁安驻在的日本军交战多次。后因给养弹药缺乏，伤亡甚多，于是以孙永勤为首的起义农民武装被日满军警包围，全部被俘击灭了。当战斗激烈时，有部分农民武装突围而去，不知下落。据闻孙永勤当时率少数农民突围而出，向北京方向走了，后来亦不知其结果如何。

以孙永勤为首的武装农民起义，公开打起抗日旗帜，这是中国农民传统革命精神，是正义的行动。但这次农民起义为时只6个月即冰消瓦解了，其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孙永勤等的起义都是农民阶级，内中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在组织纪律上是比较差的。尤其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及口号，因此不能坚持长久，斗争下次〈去〉。其次卖国的中国政府不但不给以支持，反而与日满合流，消灭起义农民，故孙永勤等终致失败了。



访韩东征同志记录

讲 述 者：韩东征
讲述时间：1959年6月
采 访 者：周廷琦、陈礼
抄件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一、迁安党组织建立

二、党领导下的民众会的建立

三、“长城抗战”和抗日活动

四、1933年冬的暴动

五、其他

⑥孙永勤曾派代表和我们联系过。代表是刘俊岳，现在还在迁西东营（离团汀不远）。具体时间和经过都记不清了。

访刘俊岳关于孙永勤抗战中党的工作问题

讲 述 者：刘俊岳

讲述时间：1961年8月9日

采 访 者：许家保

采访地点：迁西县东营村

抄件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刘俊岳，现于迁安〔迁西〕县东营公社东营村务农，党员。1934年3月参加孙永勤部队，后于三总队任中队长。

一、关于部队中党组织及党的工作情况

1. 由于部队发展过速，存在时间较短，所以党员数少，工作薄弱。党没有有组织地派进部队和党员，只是在部队组织起来以后，知道底细的同志之介绍或在串联中间，“有关系没有？”这样把党员组织起来。在部队发展到3000人左右时，有党员20人左右，发展到5000人时，才有党员二十五六人。党内负责人是何子桥同志。党内有指导员刘玉堂同志。党员虽少，但一般都是相当于排级以上干部，负一定的责任。由于部队人员发展快，仍有很多干部都是非党员。

该部队中党组织没有建立系统的党组织，而是还是以秘密形式下存在的。都是秘密状态下开会研究工作，一般在研究工作以后，通过公开职务的身份进行贯彻党内会议精神。非党员做领导工作的中在［原文如此］，有时也就有意识的合起来开会。

2. 我于1934年4月初（农历）接受刘玉堂同志的分配，从口外关（兰？）家峪、赵韩庄一带找韩东征同志，汇报了部队中党的工作情况，同时研究了□个问题。县委书记韩东征指示了一些工作：

（1）关于党的发展问题。发展问题，韩东征没有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从具体情况看，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2）对保守党的秘密问题进行了指示。

（3）对开展斗争前充分做好准备工作进行了指示。

（4）对部队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贯彻。记得有以下几条：不拿群众东西；不打人不骂人；不得奸淫妇女；不携军火，不逃军等（其他记不清了）。

二、关于几次战斗的回忆

1. 于1934年3月15日左右，我们沿迁安县滦河沿、贾家安附近，在险要地带，居高临下，袭击了日本的面粉三船，打死日寇20余人。

2. 1934年3月20日夜袭击潘家口，得枪十余支，毙日寇六七人。袭燕子峪，得两船皮袄和毛毯等物。

3. 1934年4月.初袭洪玉口（？），砸了警察局，得枪十余支。

三、关于孙永勤的身分和当时群众心情

孙系富农，当时并没有伙会组织，所以说他是伙会头子应考虑，自卫团之提法尚有可能。据我所了解，主要是打土匪，保护治安为目的，但那个组织也主要是保护有钱人利益为目的的。日本进关以后，群众抗日的心情还是浓厚的。

日本进关，汤二虎撤退，很多汤部战士仓惶逃跑，只要给他们换上一身便服，就把衣服和枪都放下了，所以这样群众手下就保存了一部分枪支。听说孙永勤暴动想打日本，人们也就自动投奔孙，有枪的不愿拿出枪来也就跟着人去，所以只要是打日本，群众是拥护的。

四、关于失败原因

刘俊岳同志认为，孙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不应全部集中于黑河川老岷〔老梁〕山地区，那次损失是很大的。集中茅山〔毛山〕作战也有错误。另外军需供应和子弹也均感不足，队伍生活非常困难。茅山〔毛山〕一仗死亡近2000人（被俘在内），冲出去的战士也各奔家乡了。

1961年8月9日许家保访问于迁西东营村

注：1. 关于部队中上层党的工作不了解。

王平陆去没有召集过党员开会。

2. 不能提供任何线索。

联合孙永勤抗日

作　　者：李子华

出版时间：1961年9月

抄件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1935年热南来了孙永勤，领导着农民同日本鬼子打起仗来。孙〈永勤〉是热南的一个有名大地主，手下有六七百支枪，很有势力。听说因为鬼子军官要占他的妹妹，孙永勤不愿意，鬼子要逼他，两下就打起了。这时我们还没想到同□[1]哥取得联系，上级党委就要批评我们说："群众都起来了，你们还没有行〈动〉？冀东区党委派来了老陈、刘玉林（听说是刘志丹的侄子）等三个同志来我们村组织游击队，并要我们首先联络上孙永勤。特务王平路〔王平陆〕也就在这时深入进去，同孙〈永勤〉取上了联系。

摘自李子华《革命回忆录》第19~20页

1961年9月

[1] 此字似"马"又似"子"，因无法找到李子华《革命回忆录（1961年9月版）》进行核实，只能以□代之。

访问何子桥记录

讲 述 者：何子桥

讲述时间：1961年11月15日

采 访 者：王桂荣

文件原名：《访问何子桥（何广森）记录》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是1936年9月由东北回家（遵化崔家庄，下港大队），此时孙永勤已被打败，同时我是1940年入党，故对孙抗战及党对孙所做的工作不了解，也没直接参加孙的部队，但我哥哥何广永和孙磕头并一起参加组织“民众军”抗日，他向我讲了一些情况：

孙是孙杖子村人，出身富农，曾当保卫团总，但也是一个中正人，有威信。因他与本村地主有矛盾（何矛盾不清），就不再给地主当团总了。日寇占东北后，他非常愤怒，并组织民众抗日。

何广永在家做买卖皮货的生意，与孙永勤、马保德、李连贵、年焕兴等都认识，也比较熟，他们七个人磕头拜把兄弟。他们为了抗日，还宣过誓：不打人，不抢人，坚持抗日等。他们通过这方式组织了一个团体，在1935年七八月间砸了半壁山的保卫团（可能孙有枪），得了三十多支枪，组织了一部分人。到8月又打下了板城，又组织了一部分人，孙声望大振。可能这时他们才回到黄花川一带联络与组织“民众军”，地主保卫团才去“围剿”他们，被迫孙等才拉起来抗日。孙很有组织能力，很有力气，也很勇敢。听说，一次他们在舍身台被日本包围，孙说：“把手枪集合起来，冲出去。”所以集中了二十多支手枪，由孙带头冲出去了。

以后在口外收编了土匪张福义军队。刘贵堂〔刘桂堂〕暴动后，拉到曲河打了保卫团，拉向张家口。永贵堂［疑即“刘桂堂”］底下的康永贵带了一百多人投孙。这样，孙队伍有很多人了，组织了八个大队。这八个大队的大队长有：第七大队何广永，第八大队康永贵，还有李连贵、张福义（具体哪个大队不详了）。他们在口外抗击了敌伪几个月的“围剿”，越打人越多，一直发展到三千多人。

在发展过程中有一很生动的事：住在口外罗明峪〔罗文峪〕的一个日本什么司令，叫田野，一天带两个鬼子骑马出来探消息。何广永也带人去探鬼子消息。两方相遇，鬼子跳下马来就打一梭子。何虽有准备，但他的破撸子打不响。就在鬼子压子弹时，何跑上把鬼子按住，两人打在一起。另两个鬼子吓坏了，也不敢动手。何带的人从山腰下来活捉了这个司令。此后鬼

子托人赎司令，条件是要多少钱给多少，要地盘也行。孙提出要武器，不要钱，不要地盘。日本人不给，孙就押着鬼子做人质。茅山［毛山］被围后，才把这鬼子打死了。

孙失败，主要是被骗。孙在口外活动，日人“围剿”多次无效。遵化县伪何县长就给孙去了一封信，说叫孙到遵化来，给他多少东西，协助抗战。孙虽知道这是欺骗，但也想用先把东西拿到手然后再说的方法对付他，所以就〈把部队〉拉到遵化茅山〔毛山〕。但当时不知用游击战方法对付敌人，怕敌人集中兵力〈把〉自己吃了，孙也集中兵力准备硬打。

拉到茅山〔毛山〕后，日寇就集中了日本鬼子、满洲军、保卫团、汉奸等一万多人，并开去很多汽车把山围住。但民众军非常英勇，而且大部分人枪法很好，激战一天，打死打伤一千多敌人，民众军牺牲一百五十人左右。尤其是孙腿部挂花后，用人抬着还指挥冲杀。但终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被打散了，孙也牺牲了。

失败后，日伪就通缉孙部下的主要领导人。因双城子马建池（曾支援过孙，给买过子弹。孙败后，怕受累，就献出了马保德、何广永）向日本报告，因此，马保德被捕后抓到马兰峪日本大队部枪决。何广永也在龙宫被捕，〈押〉解到通县殷汝耕伪自治政府，在狱押了几个月，因“通州事变”跑出来。1937年何去赵各庄做工。1937年秋，何又组织了一些人，与康永贵合起共二十多人。到1938年6月，在徐南野（党员）掌握下，组成一个总队四个大队。总队长甄明阁，副总队长何子桥（何广森），第一大队长李建庭，第二大队长何广永，第三大队长翟玉润，第四大队李保华（1934年投敌）。暴动起来后，何广永被运昌委任地方除奸大队长，在遵化大寨子徐店子北沟被郑千和一个姓于的刺死。何广永听说外边有郑、于求见，一问是熟人，就让进去了。郑、于一见何有枪有戒指，就将何刺死了。

孙永勤失败后，我哥哥被押，我为给兄长复仇，1936年阴历正月在我家乡组织了二十多人。把他们先送到边墙外黑锅顶山上，结果被洒河〔滦河〕石门子的团总谢显宗捕去了。解到战区保安队，上刑，供出我，我也被捕。上刑，我供说是马建池给的枪和子弹，把马也抓来。……我出来后，就到了丰润。

何子桥，原名何广森，系遵化县崔家庄公社下港村人，现在河南省平顶山市西市场人民公社任社长，52岁，1940年入党。

王桂荣

1961年11月15日



冀东烈士纪念馆存孙永勤资料（部分）

资料征集时间：1964年6月2日~1965年6月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唐山市陵园路2号冀东烈士纪念馆

烈士资料卷

姓名：孙永勤

自__年__月__日起

至__年__月__日止

1. 孙永勤烈士登记表
2. 王克（志）群　介绍一般印象
3. 李一夫　介绍一段抗日情况
4. 王紫峰　提供烈士家乡
5. 李子华　介绍初次联系一段（村史）
6. 闵时夫　孙永勤烈士传
7. 史焕然记　黄花川农民暴动情况
8. 刘俊岳　介绍曾参加了孙部
9. 史焕然记　民族英雄——孙永勤
10. 介绍烈士事迹

烈士登记表

<table>
<tr><td>原　名</td><td>孙永勤</td><td>性　别</td><td></td><td>籍　贯</td><td colspan="2"></td></tr>
<tr><td>别　名</td><td colspan="2"></td><td>出生年月</td><td></td><td>属　相</td><td></td></tr>
<tr><td>参加革命时间</td><td colspan="3"></td><td>牺牲年月日</td><td colspan="2"></td></tr>
<tr><td>入陵园提名人</td><td colspan="3"></td><td>牺牲地点</td><td colspan="2"></td></tr>
<tr><td>埋葬地点</td><td colspan="3"></td><td>牺牲时职务</td><td colspan="2"></td></tr>
<tr><td colspan="7">了解烈士线索</td></tr>
<tr><td>姓　名</td><td>与烈士关系</td><td colspan="2">现工作地点及职务</td><td colspan="2">了解时间及主要情况</td><td>备注</td></tr>
<tr><td>王志群</td><td>同志</td><td colspan="2">石油部主任</td><td colspan="2">一般印象</td><td></td></tr>
<tr><td>李一夫</td><td></td><td colspan="2">河北省委</td><td colspan="2">介绍一段抗日情况</td><td></td></tr>
<tr><td>王紫峰</td><td>有关</td><td colspan="2">玉田亮甲店于庄子
玉田师范</td><td colspan="2">1964年6月谈一二印象，提出烈士家乡在黄花川</td><td></td></tr>
<tr><td>李子华</td><td>同志</td><td colspan="2">遵化孟家铺</td><td colspan="2">1964年6月村史中介绍初次联系一段</td><td></td></tr>
<tr><td>刘俊岳</td><td>同志</td><td colspan="2">迁西东营社员</td><td colspan="2">介绍曾参加过孙部</td><td></td></tr>
<tr><td></td><td></td><td colspan="2"></td><td colspan="2"></td><td></td></tr>
<tr><td></td><td></td><td colspan="2"></td><td colspan="2"></td><td></td></tr>
<tr><td></td><td></td><td colspan="2"></td><td colspan="2"></td><td></td></tr>
<tr><td></td><td></td><td colspan="2"></td><td colspan="2"></td><td></td></tr>
<tr><td>备　考</td><td colspan="6">1. 事绩很突出，东北抗日烈士传有专文，看来可作烈士。
2. 出身历史、牺牲尚需进一步到兴隆查明。
3. 是否已接受了改编尚需查打〔对〕线索（据李子华介绍实际上未接受，据兴隆县志载是接受，看打孤山子税局一段也像接受了）。
以上查清后再编传略。</td></tr>
</table>

1965.6

孙永勤：“九·一八事变”后，民国22年，他从鸡鸣林一代〔带〕过来的。这个事情有一个人知道详细，此人现在玉田县师范工作，叫王紫峰，暴动后脱党。在1932年我记得王就是党员，他曾印过宣传品。孙永勤我记得在毛山一带被什么保卫团（不是日本人）把他消灭了。他死后，当地老百姓传说，他是什么星星下界，对他印象很好。这个人是什么政治面貌弄不清，他抗日是肯定的，他过来推动力很大。

石油工业部王志群主任谈

孙永勤：原来参加“察哈尔事变”，事变失败后，来到冀东宁河一带活动。后来王成祖〔王承祖〕派人与孙联系在一起，与王成祖〔王承祖〕的民团编在一处。当时孙永勤从口外带过二百多人。孙永勤很能打，曾与玉田的敌人打过几次战〔仗〕。后来他们队伍扩充到一千多人。声势浩大。玉田的于学忠［应为“周毓英”，下同］和日本人会谈，双方派兵围攻他们。



于学忠为围剿他们曾派了一个师的兵力，日本人也派了若干人。把孙、王包围在玉田县鸦洪桥〔鸦鸿桥〕镇。在此次战斗中，孙永勤带他们原二百多人的武装就冲出包围，而王成祖〔王承祖〕除他本人逃出外，就全军战亡。

经过此次战斗后，孙永勤就不听王成祖〔王承祖〕的话了，他带着原二百多人就又回口外。因当时孙没有和当地党的组织发生关系，不知他是何样一个人，只知他在察哈尔抗过日。

关于孙永勤是否能算烈士？（李部长未能肯定下来）

中共河北省委财贸部李一夫部长谈

冀东烈士陵园负责同志：

来函读悉。

有关孙永勤烈士的情况，恕我知道的太少，也不符合你们的需要。

在烈士革命活动的初期，我在遵化县教学，闻知一二。人民抗日英雄孙永勤组织的抗日武装在古长城沿线一带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颇具声势。俟〔以〕后，因我失掉自由，“铁窗风味”者二年（1935~1937年），烈士的活动情况，因风向相背，就闻不到了。

为了表彰先烈，砥砺后人，得到烈士的真实材料，教育后人，永不忘本，我建议：陵园负责同志可不辞劳累地到烈士家乡——黄花川和他生前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去调查搜集，方为可靠。我和孙烈士生前既无联系，材料是苦〔恐〕难供给的，当［疑为“尚”］蒙谅解。

一个历经艰险的人，活在幸福的年代里，景仰烈士，遥望陵园，不禁神往！仅此专复，聊表歉意。致以

革命敬礼！

王紫峰

1964年6月28日

玉田县亮甲店于庄子

孙永勤：1935年春天，热南的孙永勤领导着农民同日本鬼子打起来了。孙永勤是热南的大地主，手下有六七百条枪，很有势力。听说一个日本军官要占他妹妹，孙不愿意，鬼子□□［两个字不清，一份抄件为“逼”字］他，于是他就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冀东区党委派来老陈、刘玉林（听说是刘志丹的侄子）等三个同志来孟家铺村组织游击队，首先联系上孙永勤。特委王平路〔王平陆〕也就在这时深入进去，同孙永勤取得了联系。孙对我们的要求是：一要委任，二要枪和子弹。

老陈他们要回去请示有关孙永勤的一些问题。临走时，先告诉孟家铺的游击队，你们能把他们调进长城以内，再发给他们东西。4月间，游击队和孙永勤进一步取得了联系，孙永勤的两千左右军队也调到遵化城东一带住下了，可是老陈向上级请示还没有回来。游击队实在等不下去了，李子华就同孟寿田二人雕了个公章，做了一张委任状，委任孙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军长，由王平陆任政委。他接到委任后很高兴，可是枪和子弹就没法解决。在这一段当中，他们也很大意，常常大白天骑着马进城，不久被日本兵发觉了。敌人调来了丰润、迁安、兴隆等县兵力，围攻孙永勤的部队。事败后，孙永勤带着几百个人跑到绥远去了。

这次联系孙永勤的军队进行抗日没有成功，但也给在这一带的日本军队以很大的震动。

1964年6月2日

摘自《孟家铺村史》李子华供稿

张作臣　记

访刘俊岳同志口述（迁西东营公社东营村社员）[1]

1930年入党，现年52岁

在1935年旧历四月初八，上营公社混沌峪有庙会。在会上，我见到口外燕子峪人李胜祥（过去认识），他和我谈过：在下板城一带，孙永勤带队起来暴动，组织抗日。从前韩东征等同志也曾和我讲过抗日道理，这时又听他说孙永勤组织抗日，而引起我抗日心情，就找孙永勤队伍去。一直到口外长河峪，见一家大院门前插着三角大旗，上面有圆的红月亮，旗周围写着“抗日救国义勇军”大红字。我想这一定是大队部。门口有站岗的，我叫他们传招[2]一下，说我要当兵。

雷廷玉〔雷常玉〕是大队长，赵邦海是大队副，见面说我是日本探子，就要绑上打我，来吓唬我。但我是稳重，面不改色，镇静如常，才把我收下了。四五天后，发给我大枪和子弹。

这支抗日义勇军，军长是孙永勤，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是何子桥，共有4000多人。

在我还未参加前，听说队伍打过潘家口、禁烟局，打死七个日本鬼子[3]，得了廿支枪。后在暖河塘劫住日本船三只，得衣服350件，面粉大米3000余斤。我入伍后，打过下板城附近的一个五龙吉（乌龙矶）大集镇，是在五月节后初八九，当时孙永勤队伍有300人。

[1] 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亦保存着一份此文件抄件。根据佟靖功先生寄给我的校对稿，得知此文件原件保存在迁西县档案馆资料17卷内，文件的采访者为王玉璋，采访时间是1961年。

[2] 佟靖功先生帮助校对的兴隆党史办抄件为“传报”。

[3] 兴隆县党史办抄件亦为“七个日本鬼子”，但冀东烈士馆另一份抄件为“七十个日本鬼子”。



后又在龙井关外付友来村[1]，约有一百余户，有个大税局，在五月廿八日夜，三四点钟，派去两个大队（第一、三队）去打这个税局。这一税局住在一个大院里，有70左右人（鬼子20余人，警备队50左右人）。打了有半个钟头，打死日本鬼子16人、警备队3人，其余逃跑了。共缴获大枪50支，王八盒子三把，子弹十一二箱。

以后又打遵化城北约30里山楂峪的日本鬼子税局子，有〔由〕第二、三大队在六月初五的夜间打的。这次师部命令很坚决，打不下这个税局，不许回来。这税局子有50多人，其中鬼子9人。战斗结束，鬼子跑了三四个，其余全俘。得大枪卅余支，子弹十余箱。

这时孙永勤队伍约有5000人的兵力，每人都有一支枪，子弹200余粒。

我们在油善口[2]有个三道沟村（包司令岳父家），我们知道了敌人要以最大兵力包围我们，我们就转移去遵化东北毛山，命令集中到毛山。在六月廿一二日就被鬼子包围了。围了六天头上，同志〈们〉向外突击，我们第一大队只冲出廿余人。这次战斗，敌集中了迁安、遵化、蓟县、滦平、兴隆五个县的鬼子约六七千人，警备队约万余。

我们二十几个人冲出后，到兴隆的黄台子就分手了。在家躲二年多后，参加一九三八〈年〉大暴动。（略）

1964年7月30日　抄于迁西县委

有人会提出疑难问题来，为什么孙永勤家庭是富农成分，过着富农生活，会站起来掀起农民大暴动呢？道理很简单，是因为：①自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邓中夏、李运昌、王平陆、李子光等地下党员同志就在冀东各地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道理。尤其是日寇占领兴隆以后，就派地下工作人员李子光同志、王平陆同志等自滦出关，向广大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了贫苦人民反对日寇的决心。②日寇进攻兴隆后，一些中小地主阶级和富农在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内受〉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的排挤，感觉特别痛苦，就要求参加革命，加上长城线上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志士自动奋战，使其赞成并参加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③在地主组织的自卫团——伙会的兵士中，除少数头领为上层分子外，其他人均为受苦受罪的工人、农民，这些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封建势力，要求不受剥削和压迫的。由于上述几点原因，就促进孙永勤掀起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的农民大暴动。

抄自《兴隆县志》

[1] 佟靖功先生将“付有来村”注释为“佛爷来村”。

[2] “油善口”，佟靖功先生校对稿注释为“红山口”，“红山口”根据遵化核定的标准地名，当写作“洪山口”。

冀东烈士纪念馆存其他相关资料

资料起止时间：1947年7月21日~1982年12月10日

原件保存于冀东烈士纪念馆

抄件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摘抄时间：1983年

以下为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的抄件

李征夫给越之、陈平同志的信：

越之、陈平同志：

寄承德地区地图2张、伪满热河省地图2张，供参考，需要什么请来信。

祝冀东革命史早日刊行。

礼！

征夫

1981年12月3日

关于孙永勤事迹，据我考证有三：

一、受我党影响的农民抗日救国军，没有与冀党接上头，但有党员参加。

二、时间：1934年至1935年阳历5月初。□□□，最多时近千人，在茅山〔毛山〕牺牲，主力○○○○○部队一部突围，后年焕兴、何子桥［原文如此］，待我进一步考证，再写成文字寄你们参考。

……

关于长城抗战、孙永勤事迹，一直留心查资料，但所作有［原文如此］。这次我顺便去平顶山查了一下何子桥的档案，偏偏关于他参加孙永勤那段没资料……好在只找到一句，他参加了孙部抗日，但他又把年代写成1935年。他大儿子也不清楚。

李征夫



《王平陆战斗一生》

……

1934年春，王平陆同志受党组织派遣，曾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协助孙永勤组建抗日部队。这支“民众军”自黄花川起义之后在长城内外抗击日寇，到5月已达五千余众。王建议孙将“民众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进行整编。此后王便返回口里。整编后，孙部战斗力更强，到1934年底，共袭击日伪据点一百多座次，毙日伪一万五千余人，生擒佐藤。

迁西征办

1982年12月10日

毁家纾难 忠烈千秋——魏春波

1937年底，王平陆牺牲，游击队军心低落，魏挺身而出……在他的指导下，游击队打下兴隆药王庙据点，袭击了倒流水海关税局。……

关于宋时轮同志的决定

宋时轮同志在冀东的行动中，不但未能完成任务，而且不执行上级命令，擅自率队西退，使冀东抗日起义与游击队受到最严重的损失；加之宋时轮同志对干部采取了不可允许的错误的打击政策，对于党、对于上级采取不尊重的态度，因此党务委员会特决定给宋时轮同志以严重的最后的警告，并将此决定在党内公布。只有在宋时轮同志彻底纠正其错误之后，才能经过党的组织取消其警告处分。

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

1940年8月17日

（此材料摘自《共产党人》第10期）

冀东十五地委宣传部长——冀光

冀光，原名孟兆泰，字寿田，河北遵化县孟家铺人。1927年春参加遵化农民暴动，夏入党。1933年在本村发展了十几名党员……领导群众进行反对日寇的收枪斗争，并全力支援孙永勤抗日暴动。……

赵淑勤（冀东烈士陵园）

曾任迁遵兴联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等职。

《唐山时报》1982年4月

关于冀东党史的一些材料摘记

1934年，热河抗日志士黄花川人孙永勤组织数千人起义，转战承德、兴隆、青龙之间，中共冀东特委王平陆同志前往指导。

打印，无年代

访宋诚记录

长城抗战时，党派樊凌喜［樊凌玺］（党员）去口外做孙永勤工作（匪队头子），抗到长城里即垮了。

访李运昌

（未经本人审阅）　　1960年 9月15日

三、孙永勤抗战失败和冀东变为日寇殖民地

孙永勤在热南抗战坚持了一年多，到1935年春坚持不住了，开进口里。当时于学忠保安队张砚田部队驻遵化，国民党反动政府命令协同日寇把孙永勤消灭在遵化东北的茅山〔毛山〕一带。（据说当时张的部队有意识地给孙部让了一条路，暗示叫他们撤，结果可能是孙部把路走错，因而被歼。（略）

冀东烈士陵园冀光卷
孟兆泰烈士传略

1935年曾被捕，后营救被释……仍做小学教员工作，一面全力支援革命，一面秘密参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成立游击队，并领导了孙永勤的抗日暴动和群众反对日寇收枪斗争。

五总队长李德胜口述

——经李春光审阅

1935年春领导孙永勤的抗日暴动

原载冀热辽《群众日报》425期

（民国36年7月21日《遇难烈士简历》）

抄自1947年7月21日《群众日报》

1933年日寇进关后，他首先发展了贫农党员李子华、马子敬等十几人。

冀光1935年组织了遵化县委，他任县委组织工作。1935年联系孙永勤，他是热河人，地主成分，领导着保卫团。开始和日本人很好，以后日本人要他的妹妹，他恼了，起来抗日。组织抗日大暴动的准备工作，有〔由〕李子华买的模造纸，冀光做的委任状，给〔任命〕孙永勤为华北第一军长（作印人赵芳、李子华，印刷作样是冀光）……

——简历和斗争史

冀光传略

1933年底，孙永勤发起抗日救国军时，曾得到冀光同志的协助，曾为其印刷宣传品、印制委任状，建立过一定联系。

李越之整理

马子敬烈士传略

——摘抄于冀东烈士陵园

（摘抄）

马占全，字子敬，生于1900年，于1947年旧历二月二十四日被捕，在遵化城内被敌人杀害。

子敬同志原籍丰润县钱庄子村人。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家中兄弟三人，大哥马占清，三弟马占和。家庭生活很苦，家中原有的三间旧草房被债户逼迫顶了债，全家无住处，更不能生活下去。于1915年迁移到遵化县，只用挑子挑着随身用的物品，在北山瓦房沟居住。

1933年孟寿田（孟寿田化名冀光，是一革命者）来到我村教书，在我村结识了一些朋友，当时发展李子华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过了数日，李子华同志又介绍了马子敬、李希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孟家铺的支部就正式成立了。马子敬任支书，李子华任宣传委员，李希如任武装委员。当那时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游击队，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并在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普遍建立起村支部。三个月时间，王家甫、堡子店、王各庄、赵庄子等村先后建立起支部，发展了许多党员，单孟家铺一个村就发展了六十名党员。同年又

在孟家铺一带建立了区委会，马子敬任区委书记，范子明、李子华任区委委员。在发展组织的同时，还做抗日的宣传工作，散布印刷的抗日传单等。当时党费很少，每个月一个钢〔铜〕子，还全部上缴做更大的用处。

1934年春，骆凤亭〔骆凤庭〕担任遵迁丰三县特委，遵化县委委员共五人，马子敬为县委书记，樊凌喜〔樊凌玺〕任副书记，孟寿田、李子华任组宣委员，栾小川〔兰小川〕这时上级给任务是，在长城线内包括热河南部发展党的组织。随着抗日力量的发展，日本的统治也越来越加紧了。在长城线上建立起海关税卡，把长城变成国防线。出口要有出口证，才准通行。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难，［原文如此，未完］



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藏
孙永勤烈士资料
（部 分）

资料征集、整理时间：1974年12月25日~1975年7月31日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承德市翠桥路西9号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

抗日民族英雄
孙永勤烈士[1]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全境后，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滦河、车河两川大地主兼资本家“大成兴”商号张、岳两家趁机勾结土匪，到处绑票劫财，奸杀抢夺［佟靖功先生1989年抄件为“奸淫抢掠”］，致使人民苦不堪言，民不聊生。为了抵御土匪，兴隆县黄花川地主组织“伙会”，孙永勤同志任副会长，带领伙会抗击土匪［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票匪”］。由于张、岳两家供应土匪［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票匪”］枪支弹药，经常对黄花川一带侵扰［佟靖功先生抄件在此处有“所以”二字］，孙永勤带领伙会砸了大成兴商号，其余枪支弹药收归伙会［佟靖功先生1989年抄件为“将其枪支子弹没收归伙会”］，将其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群众。张、岳两家被砸后对孙永勤和黄花川的群众更加怀恨，凶相败［佟靖功先生抄件记作“毕”］露，密谋勾结警察署，妄图没收伙会的枪支，并到处抓捕孙永勤同志，解散伙会［佟靖功先生抄件为“解散伙会，并到处抓捕孙永勤同志”］。孙永勤同志对此义愤填胸，他毅然决然地到下板城路□[2]沟［佟靖功先生抄件为“路通沟”］和赵林弟兄两人［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六人”］商议［佟靖功先生抄件为“计议”］暴动，组织“民众军”，打击日寇和伪满政府。

1933年12月12日，孙永勤带领暴动队伍返回黄花川张杖子村，将大地主张禄增〔张如增〕的枪支收归民众军所有。当天带领民众军四十多人黑夜［佟靖功先生抄件为“星夜”］赶到车河口，砸了车河口警察署，警察丢下枪支武器狼狈逃跑，民众军大获全胜，回师黄花川。

民众军迅速扩大，很快就发展到一百多人。就在这年冬天，孙永勤带领民众军从黄花川

[1] 本文依据的底本为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近年的打印件，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存有佟靖功先生1989年3月24日的抄录件，两者出入之处，已在文中做了标注。

[2] 打印件此字空缺。

出发，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亮之前赶到半壁山，包围了警察署。他巍然地站在警察署门口高声喊道：“你们出来，我枪毙了你们。”敌人凭着［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凭借”］高墙深宅从院内不停地向外打枪，企图负隅顽抗。孙永勤同志急中生智，夹着［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点着”］一捆秫秸扔到房上，把警察署给点着了。敌人无路可逃，全部投降。缴获大枪十多支，子弹上千发。孙永勤同志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带领民众军从半壁山直奔遵化县舍身台。当即被日寇几百人包围，战斗了一整天，打死打伤了几十个日本兵［佟靖功先生抄件在此处尚有“由于敌众我寡，久战对我不利，晚上他带领部队冲出包围，从舍身台撤到洒河〔澈河〕二堂”］并把二堂村地主高子忠〔高作忠〕的枪支收缴。晚上民众军又被满洲军和土匪［佟靖功先生抄件为“晚上民众军又被满洲军和票匪团团”］包围在高子忠〔高作忠〕的院内，孙永勤同志机智地将行李从后院［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后墙”］扔出，敌人以为民众军从后墙突围［佟靖功先生抄件为“愚蠢的敌人误认为民众军要从后墙突围”］，一窝蜂似地跑到［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簇拥到”］后墙外。这时孙永勤打开大门，怒视群匪，厉声喝到［佟靖功先生抄件为“道”］：“是中国人，闪开道。”土匪［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票匪”］一见孙永勤目□[1]口呆［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目瞪口呆”］，战〈战〉兢兢地向后退。孙永勤同志带领民众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出大门，走奔［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直奔”］南山。当敌人醒〈悟〉过来时，民众军已上了山。

民众军从二堂又回到了黄花川，一边休整，一边发展壮大队伍，这时部队已扩大为六百多人。1934年3月，孙永勤同志带领民众军从花黄川［佟靖功先生抄件为“黄花川”］出发，二次奔车河口，把张、岳两家大成兴商号给抄了，将其全部财产分给当地群众。民众军从车河口直奔黑河〔澈河〕，半壁山警察署闻风丧胆，望风而逃。民众军从黑河〔澈河〕返回到黄花川，这时部队已发展到八百多人。孙永勤同志带领部队到暴河口〔瀑河口〕，把五大堂［佟靖功先生抄件为“‘五大堂’（大资本家）”］包围。战斗十分激烈，打了整整一天，缴获枪支十多支，把五大堂的看家狗满州军赶跑了，收缴了大批财物。民众军从黑河口［佟靖功先生抄件为“暴河口〔瀑河口〕”又奔潘家口，计划收拾警察署。部队到潘家口后，兵分三路，很快地冲进了城门，用干草把炮楼给点着了，把日本海关税所干掉了，缴获了四支手枪，打死一个翻译和一个日本兵。敌人来了大批援兵，民众军迅速撤离了潘家口，到澈河罗文峪，抓住了两个日本鬼子和一个翻译。

民众军越战越勇，队伍不断扩大，敌人闻风丧胆，纷纷逃跑［佟靖功先生抄件为“逃窜”］。长城内外广大人民扬眉吐气，积极支援民众军。部队从罗文峪北上直奔下板城，下板

[1] 打印件此字空缺。



城警察署听说民众军北上，抱头鼠窜。部队在下板城老□[1]［佟靖功先生抄件为“老梁”］驻防半月，进行了休整和改编，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全军分四个纵队，孙永勤同志任军长。部队在老□[2]［佟靖功先生抄件为“老梁”］和日本军打了一仗，打死三个日本人。抗日救国军从下板城返回，要奔宽城，宽城的满洲军和商务会吓得胆战心惊［佟靖功先生抄件为“闻风吓得胆战心惊”］，急忙给孙永勤写信，答应给让出半条街，并答应到遵化给抗日救国军换军装。当时由于孙永勤同志警惕性不高，没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军赶奔［佟靖功先生抄件为“改奔”］遵化。部队行至茅山〔毛山〕，被早已埋伏好的并多于我军几倍的满洲军和日本军、土匪包围［佟靖功先生抄件为“日本军和满洲军、票匪包围”］。经过两天奋战［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经过两天的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我抗日救国军的大部分将士为祖国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孙永勤同志和抗日救国军的几个重要［佟靖功先生抄件为“主要”］领导人光荣献身。

孙永勤同志为人正直，见义勇为［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好义勇为”］。在历次战斗中，他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无所畏惧。他常戴的帽子［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礼帽”］上有弹孔几十处［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弹孔也有几十处”］。只要他还有两粒［佟靖功先生抄件为“棵”］子弹，也要和敌人坚持［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继续”］战斗下去。有一次，民众军在五风楼［佟靖功先生抄件为“五凤楼”］驻防时，兴隆讨伐队一百多人包围了五风楼［佟靖功先生抄件为“五凤楼”］，士兵通知他我们被包围了［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士兵通知他：‘我们被包围了’］，他毫无惧色，仍然沉着地坐在地上［佟靖功先生抄件为“炕上”］考虑对敌作战计划。敌人的两颗［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发”］炮弹在他住所的屋顶上爆炸了，他才下炕，站在［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巍然的〔地〕站在”］大门楼上怒骂敌人：“你下来，我毙了你。”敌人的机枪雨点似的向他扫射，他用短枪向敌人还击，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注：据赵文义（孙永勤的勤务员）［佟靖功先生抄件为“（孙永勤的勤务兵）”］介绍整理。

1975年3月10日

[1] 打印件此字空缺。

[2] 打印件此字空缺。

孙永勤烈士的有关情况

一、部队旗帜

“抗日救国军”

旗面白布，中间楷书红字，边为红边。

[抗日救国军军旗图略]

二、士兵服装

当时孙永勤的部队服装没有统一军服，都是农民打扮。

1. 衣服：多数人穿月白色上衣及裤子（土染法的颜色），有少数穿青的，个别〈穿〉蓝的。绝大多数人腿上扎腿带。上衣，有对大襟的，也有带大襟的。

2. 鞋：有穿带脸鞋的（单脸或双脸），有穿闷帮的，青色或月白色。

3. 帽：多数头戴毡帽，少数戴瓜皮帽。

三、武器

士兵使用“七九”、“三八”、“湖北造”等，军官用盒子枪。

四、发式

有留小辫的，有光头的，有剃一圈留一刷背头的，有剃一圈留一小辫子的。

五、孙永勤的相貌

1. 高个。
2. 长巴脸，色黑，脸凹一些。
3. 光头。
4. 胡须不轻不重，落腮须。
5. 牺牲时36岁。
6. 穿对襟上衣。
7. 所穿的鞋是单脸鞋，戴毡帽头。
8. 说话、动作稳，长相憨厚。



六、地理环境

孙永勤的活动地区是山区，有的地方是悬崖、峭壁，如同古时国画中的高山流水的画面。山上林草丛生，夏季郁郁葱葱，冬季山峰积雪不化。

干涸的山谷中，尽是水冲的卵石，并多有大石，大者如床，小者如桌的石块。黑河、柳河、滦河、横河、潵河，河东〔床〕亦多巨石，水为黑绿色，石头〈为〉黑色或白色。山路陡险、狭窄，为崎岖山区。

七、山村面貌

房子为卵石砌成，或石土相混，或房子下用石砌，上用土坯。有瓦顶，有草顶，前面全是窗。有卵石猪栏，短墙。山村坐落无规则，随山势河势而变。人家很少，山村都不大。大村有不过五六十户，少者三五户或一二户。

耕地皆有石栏、土坝，自河岸上沿至山腰，一二层或五六层，高四五尺，低的二三尺。高低不等的梯田。

孙文令〔孙文伶〕（孙永勤烈士的大儿子）介绍

在我十二岁那年，我们孙杖子来了个卖胶鞋的。晚上住了我家，他和我父亲俩人扯了一宿。我只听他们说："组织"、"革命"、"共产"，当时我对这些词一点也不懂。那时我父亲经常看《英雄泪》，边看边哭，并常对我们讲："中国人要当亡国奴！"从那以后，他开始组织"伙会"，当会长，收集枪支，打土匪。后来因为大成兴商号张、岳两家大地主经常勾结警察署到处抓捕我父亲，所以他到下板城鹿筒沟〔路通沟〕和赵令〔赵林〕、赵来一起商议起义。他们返到黄花川，组织了黄花川农民大暴动，收缴了一部份伙会的枪支，开始和日本军打仗。

头一仗是攻打岳老亮，南河〔暖儿河〕大彭杖子；第二仗攻打塔山〔塌山〕大地主杨秀山；第三仗攻打瀑河口大地主老任家；第四仗攻打半壁山警察署；第五仗攻打二堂大地主高自忠〔高作忠〕；第六仗攻打寿王坟大地主孙永祥〔孙永香〕。经过这几次战斗，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武装了民众军。

我在十四岁那年跟随部队二个多月。这期间，民众军和日本军、伪满洲队打了三四十仗，消灭了很多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发展壮大了民众军。民众军的声誉威震长城内外，敌人闻风丧胆，不敢蠢蠢出动。

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后，全军分四个纵队，下分34个大队，并设参谋处（处长赵四

川）、军法处（处长赵友〔赵有〕）、保管处（处长赵刚）、供给处（处长张如祥）。我父亲对日寇仇恨满腔，他经常对我说："不要当亡国奴，拿枪要给革命拿，不要给反动派拿枪。"

我父亲在家时，我们家有六间海青房，一头马，一头驴，七亩半地。我父亲组织农民暴动，房子全被日寇烧光，全家人在外流浪乞讨好几年。

1974年12月25日

雷翠花（孙永勤同志的爱人）同志介绍[1]

我今年73岁。在我32岁那年，孙永勤最后一次从家走的，也就是那年他牺牲的。当时我大儿子14岁，二儿子11岁，三儿子刚生下来一两个月。当时在我家门口，他骑上马临走时，我大姑娘问他："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回答她。他转向我说："把几个孩子好好精〔经〕养着，别让他们当亡国奴。他们要是当了亡国奴，我回来杀了你。"

1974年12月25日

农民大暴动的策源地——赵家庄

赵家庄坐落在下板城南路通沟里深山峡谷之中。它的东南濒临松柏成林、郁郁〔葱葱〕、高大威严的老岭〔老梁〕山；南北两面前山后山相映相□[2]，绿树成荫；西面是一条十余里长的弯弯曲曲的狭长沟道，出沟就是滦河，顺流而下，直达兴隆的车河、柳河口、黄花川。确是一个既美丽富饶，又便于出击防守的小山村。

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灾难降临山村。这年冬天，北风呼啸，寒风凛冽，我们的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同志风尘仆仆来到这个十几户人家的山村，点燃了这个小村抗日的熊熊烈火。他串连赵林、赵来等七个怀有强烈民族感的贫下中农，他们昼夜集会，计议暴动，研究如何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抗日斗争，并对暴动后的作战部署，枪支弹药和粮食的补给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就在这年旧历腊月初九的晚上，孙永勤同志带领赵家庄的十几个贫下中农，离开了山村，直奔黄花川，掀起了农民大暴动。

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

1933年至1935年，在热南的长城脚下活动着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日队伍，到处打击日伪

[1] 孙永勤爱人名字为雷永兰，雷翠花有可能为其小名，实际情况已难调查。

[2] 此字无法辨认。

军，屡建辉煌战功，深受群众欢迎。这就是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

孙永勤是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人，生于1891年，自幼习武，好抱打不平，富有正义感。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热河，进占了承德，生灵涂炭，百姓遭殃，日寇和汉奸勾结在一起，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永勤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于是便组织本乡自卫团——伙会，领导伙会进行自卫。1933年5月，伪兴隆县办事处刚成立，即下令要收缴地方自卫团伙会的枪支，企图使广大人民失去武装，不能公开武装抗日。令下以后，上板城警察署一个马署长和车河堡警卫队的东队长等勾结一起，决定在11月里接收黄花川孙永勤领导的伙会枪支弹药。这个消息传到孙永勤耳朵以后，他非常气愤地向他领导的17名伙会成员宣传日寇的罪恶活动，表明他立志坚决抗日，决不当亡国奴，并说“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的决心。便到下板城鹿筒沟〔路通沟〕和赵林弟兄等六人计议暴动，组织“民众军”抗击日寇和伪满政府。经一个来月的筹备，于1933年12月12日，举行了赫赫有名的黄花川农民抗日大暴动，建立了“民众军”，打起了“天下第一军、杀富济贫”的旗帜。孙永勤任“民众军”的团长。

“民众军”在孙永勤领导下，连续攻打了车河口警察署、半壁山警察署，消灭了敌人，武装了自己。沿途斗争了黄花川张杖子的张禄增〔张如增〕、二堂村的高子忠〔高作忠〕等大地主，收缴枪支弹药，将他们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车河口张、岳两家大地主开办的大成兴商号，一听孙永勤起了“民众”，杀富济贫，进行抗日，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向其汉奸主子马署长、东队长求救，并狼狈为奸出谋划策，妄图消灭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他们一面向日寇求援，一面收买马拐子、大五龙、小白龙等土匪。孙永勤听到这个消息后，更增加了他对日伪汉奸的仇恨。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他就把整个黑河川的孙杖子、梓木林、王宝石、莫石峪〔蘑菇峪〕、宽甸、三道岴等地所有自卫团枪支弹药收为民众军所有。很多农民纷纷参加民众军，队伍扩大到500多人。

孙永勤带民众军从黄花川北上，越过山岭把车河口商户大成兴商号团团围住。不到半小时，就把商户的看门狗警察们消灭了，把粮食布匹分给了贫苦农民。人人欢欣鼓舞，都称孙永勤是“《水浒传》宋江的化身”。

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委员王平陆同志来到黑河与孙永勤联系，向他阐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在党的领导下，孙永勤提高了认识，扩大了眼界。他们提出了“有人者出人，有钱者出钱，打倒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战胜敌人的决心。

“民众军”沿黄花川北上，势如破竹。二次攻打了大成兴商号，将全部财产又分给贫民，并袭击了乌龙矶据点，使敌人闻风丧胆。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纷纷响应，部队人数剧增。承德八挂岭〔八卦岭〕的张福义、兴隆蓝旗营的年焕兴、苇子峪的李连贵也在孙永勤的影响下，举

行了农民抗日大暴动，并率其所属队伍与孙永勤会师。不久，这支农民抗日队伍扩大到两千多人。这时中共冀东特委为进一步加强“民众军”的政治领导力量，又派了大批共产党员到部队里去。到1934年5月，“民众军”很快发展到五千人。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孙永勤在王平陆同志的帮助下，把“民众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并整编成四个纵队。孙永勤任军长，赵四川任参谋长，张福义、年焕兴、何子桥、关原有〔关元有〕］、李连贵任一、二、三、四总队长。在黑河、车河、潵河、滦河等地到处打击敌人。3月25日，孙永勤、张福义又围攻了半壁山佛爷来警察署，不到一小时即攻克了，击毙警察数人，活捉一人，火烧了警察署。年焕兴、李连贵活动在罗文峪一带，一举攻克日寇孤山子税关总局，活捉了日本兴隆税关总局长佐藤和日本兵一名。在鞍子岭遇到日寇骑兵连，敌兵一见抗日救国军即抱头逃窜，在追击中击毙70名敌军，缴大枪30支，子弹上万发。

孙永勤在他率部南移，最后离家时，向他爱人说：“你要好好精弄〔经养〕着几个孩子。拿枪要拿革命的枪，别让他们当亡国奴。要是他们当了亡国奴，我回来杀了你。”虽话不多，但充分说明孙永勤对日寇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不但自己坚决抗日，还要子子孙孙抗日到底。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由于孙永勤对日寇怀着满腔仇恨，对敌作战非常勇敢，打仗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戴的礼帽和穿的衣服不知有多少枪眼。他的警卫员说：“他只要还有两发子弹，也要射向敌人。”所以敌人听到孙永勤的名字就吓得魂不附体，胆战心惊，还阴谋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设毒计消灭抗日救国军。

1935年2月间，孙永勤率部队南移，准备和冀东抗日军会合。当时抗日救国军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军中储备不多，只靠临时分地主些粮食吃。不但粮食困难，而且数千名战士的春装亦无法解决。队伍行至遵化时，遵化民族败类国民党县长一面假意欢迎抗日救国军，并以请求抗日救国军“剿灭”遵化境内的土匪为条件，答应帮助解决战士更换春装；另一方面却把抗日救国军的情况和行动路线密告给日寇。由于孙永勤等抗日将领急于解决战士们的春装问题，而放松了对敌人的政治警惕，结果中了国民党县长的诡计。1935年2月29日，孙永勤率部队三千多人在遵化县东茅山〔毛山〕、吴家沟一带，被日伪军一万多人团团包围。日寇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扫射，数十门重炮猛轰茅山〔毛山〕，使整个茅山〔毛山〕浓烟弥漫，火光冲天。大敌当前，身患重病的孙永勤镇定自若，奋勇指挥全军浴血苦战，击退敌人多次冲锋，给敌人以很大杀伤，茅山〔毛山〕之下敌尸遍野，我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的鲜血也染红了山头。经两昼夜的激战，终因敌众我寡，除一千四百多名将士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2月30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在战火中为国捐躯！终年44岁。赵四川、关原有〔关元有〕等抗日将领也为民族的解放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

孙永勤虽然牺牲了，但人民化悲愤为力量，牢记阶级仇，民族恨，抗日的烽火更旺了。在茅山



〔毛山〕大战中突围出去的李连贵、张福义、年焕兴等将士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在兴隆山区进行抗日斗争。

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烈士永垂不朽！

此材料根据河北省党史、兴隆党史资料和本馆调查材料综合整理。

1975年7月31日

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

作　　者：朱呈云

写作时间：1982年8月28日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

朱呈云　整理

孙永勤，1890年生，河北省兴隆县黄花川村人。他自幼喜文爱武，秉性刚直，为人正义豪爽，在故乡颇有威望，担任自卫团总。1933年3月，日寇铁蹄踏向热河南部长城沿线，大肆屠杀我国的无辜同胞，孙永勤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凭借着这里东隔滔滔的滦河水与宽城县相连，南跨万里长城与迁西、遵化等县相通，西靠森林茂密的五指山下，北走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与承德县相接的深山偏僻、交通闭塞的地理环境，于1933年12月11日，高举抗日的革命红旗，组织贫苦农民拿起武器，在黄花川掀起农民大暴动。从此，他率领队伍组成民众军、抗日救国军，转战兴隆、宽城、承德、平泉、遵化和迁西等县，攻克敌人据点一百多座，击毙敌军五千多人，到处撒下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种子，唤起燕山人民抗击日寇的决心。不幸的是，在1935年3月31日遵化县茅山〔毛山〕战斗中，孙永勤突遭日寇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几次突围未成，光荣牺牲。因此，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的《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里，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里[1]，孙永勤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

[1]　《八一宣言》全称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起草，在1935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提交大会，同年10月1日发表于法国巴黎《救国报》，非发表于长征路上。

这里记述的就是孙永勤组织农民掀起武装暴动，抗击日寇的英雄业绩。

一、掀起农民暴动

1933年3月3日，日寇进攻承德，伪热河督军汤玉麟（又名汤二虎），在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下，带领军队从滦平方面撤退进关，日寇以一百八十人的兵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承德。3月10日，日寇又以承德为跳板，派岛村为司令进犯兴隆。当时，国民党的县长窦宗汉闻日寇侵犯，吓得屁滚尿流，携带大批财物奔往遵化，日寇一弹未发侵占了兴隆县城。

日寇侵占兴隆以后，委任汉奸王海澄〔汪海溦〕为办事处长，声称兴隆位于长城以北，不属中国管辖，已划归“满洲”的势力范围。日寇害怕中国人不服，由王海澄〔汪海溦〕出面，召集全县地主豪绅开会，封“三十六友”头子张全五、史焕章、卢仪卿等大地主分任内务、实业、财政局长，封中小地主为村长、甲长，加强反动统治，笼络人心，并决定没收全县农民手里的枪支弹药，梦想借此扑灭农民对日寇的反抗。但是，鬼子的美梦是不会得逞的，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民，坚决不向日寇低头，拒不缴出自己所有的枪支弹药。

黄花川村孙永勤担任自卫团总，有枪五十多支。伪上板城警察署韩署长、车河堡伪警察队车队长[1]，按照鬼子的旨意，几次派人找孙永勤缴枪，都遭到拒绝。车河口商户大成兴股东张如增、岳荫臣亲自找到孙永勤，动员他把枪支缴出。孙永勤严正指出：“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当汉奸，跪倒在日本人面前，只能是妄想！”张、岳二人碰了一鼻子灰，扫兴地回去了。

正当鬼子收缴农民枪支的时候，中共京东特委王平路〔王平陆〕同志从迁安县出发，穿过万里长城，深入到黄花川一带活动，并以卖水鞋为名，住在孙永勤家，领导农民抗捐抗税，动员农民不向日寇缴枪，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孙永勤越听越爱听，当他听到迁安县农民组织起来反海关税、反路捐税，两次赶跑上营统税局，遵化、兴隆一带农民组织齐心会，站岗放哨捉汉奸，抗缴路捐，开滦等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等消息，在这暗无天日的茫茫黑夜里，中国共产党给走投无路的爱国志士指出了方向，点燃了孙永勤心中的抗日怒火，更加坚定了孙永勤抗日救国的决心。1933年秋天，车河口商户大成兴股东张如增派人到黄花川收租索债，孙永勤领导农民拒而不交。气得张如增暴跳如雷，说：“你们再不缴租还债，等到日本人来了，叫你们拿双份！”孙永勤闻听哼的一声说：“别吓唬人！鬼子来了咱抗战，就是不缴捐税钱，看你能把咱姓孙的怎样了！”地主张如增无可奈何地走了。

伪兴隆县办事处长王海澄〔汪海溦〕听到地主、商户们报告孙永勤拒不缴枪归顺，又听黄花川农民抗捐抗税，大为恼火，于1933年12月上旬，派出日伪走狗李海山率领伪军二百多人，

[1] 一说为“东队长”。

“扫荡”黄花川。并命令伪军不根除孙永勤，不把枪支收缴上来，不准返回县城。李海山秉承主子的旨意，带领伪军进犯黄花川，奸淫烧杀，抢掠民财，无恶不作。大成兴股东张如增也随军狐假虎威地来到黄花川，大声嚎叫着：限穷人三天之内把租债缴清，否则要穷人的脑袋！并当众叫嚣说：“孙永勤如继续执迷不悟，反抗日本，将被碎尸万段！”整个黄花川被敌人搅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人心不安。

正当敌人威逼的紧张关头，满怀抗日激情的孙永勤于1935年12月10日来到承德县群山环绕的路同沟〔路通沟〕村赵家庄，串通了赵林、赵来、赵友〔赵有〕、马宝德〔马保德〕等五人，趁黑夜砸了大地主高成的家[1]，弄了五支枪。12月11日，即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孙永勤率领赵家庄农民五人回到黄花川，同自卫团丁共十七人聚集在自卫团团部的院子里，遥望着燕山顶上苍松翠柏，注视着黄花川的茂密森林，控诉日伪军“扫荡”黄花川的野蛮罪行。孙永勤大声疾呼道：“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侵占了热河，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不能当亡国奴，我们要拿起武器，和日寇血战！”十多名武装农民愤怒地说：“日伪军杀人放火，收枪收税，这是官逼民反，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孙永勤你领着我们干！”共产党员王殿臣气愤地说：“有枪就有命，有命不缴枪。大敌当前，我们要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坚持抗战！”孙永勤听到日伪屠杀中国无辜同胞，又见大家抗日怒火胸中燃烧，压抑不住自己的仇恨，紧握手中枪，咬牙切齿地发出誓言说：“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宁为抗日死，不当亡国奴。我要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不回头！”就这样，他们决心抗日，把队伍命名为民众军，推举孙永勤任团长，举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旗上写着“关外第一军，杀富又济贫”十个醒目大字，揭竿而起，掀起了抗日民族大暴动。从此，他们拿起武器转入深山，在燕山脚下打响了农民抗日的第一枪，势如波涛汹涌的春潮，席卷长城内外的崇山峻岭，与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抗击日寇

孙永勤组织农民掀起抗日武装暴动以后，附近村庄穷苦农民二百多人，拿着刀枪、斧头，奔往深山找到了孙永勤，参加了抗击日寇的革命队伍，力量越来越大。

伪军李海山听到孙永勤带领民众军活动在深山的消息，恐慌万状，乃派兵驻守在大成兴股东张如增的家乡张杖子村，扬言要在一个月内消灭民众军，活捉孙永勤。孙永勤听说伪军反动气焰如此嚣张，几乎要气炸了肺，下定决心要锄掉这股敌人。在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经过周密的侦察部署，孙永勤乘敌不备，率领二百多名民众军，突然袭入敌巢，冲进伪军的据点内。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众伪军闻到杀喊声，从梦中惊醒，有的抱头鼠窜，有的当了俘虏。只一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击毙与俘虏敌人一百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一百多件，子弹五千多发，

[1] 一说为“高程”。

首战告捷。李海山损兵折将，见大势不好，率领残部连夜溃逃，免于一死。这一仗大长了民众军的志气，大灭了日伪军的威风，人人笑开了颜。

张杖子伪军被击败以后，贫苦农民纷纷起来控诉地主张如增勾结日寇迫害农民的罪行。孙永勤支持贫苦农民的要求，把张如增的粮仓打开，分给贫苦农民，并把张如增处以死刑。贫苦农民眼见民众军抗击日寇，杀富济贫，处处为穷人打算，于是积极参加民众军，孙永勤领导的民众队伍愈加壮大起来。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伪军李海山在张杖子村侥幸逃跑以后，又纠集土匪小五龙、马拐子部伪军一百多人，妄图在大彭杖子一带设卡消灭民众军。这时民众军关元有（兴隆县王宝石人）率队一百多人正在大彭杖子南山一带活动，敌人见到民众军便进行围攻，关元有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对李海山等伪军展开猛击。顿时枪弹齐发，山鸣谷应，民众军怀着对日伪军的深仇大恨，越战越强，越杀越勇，歼灭敌人五十多人，胜利捷报在贫苦农民中广为传颂。

民众军经过速战速捷，队伍猛增至五百多人，1934年1月进行了整编。孙永勤担任民众军军长，关元有、王殿臣、赵四川（黄花川人）担任队长，每队一百五十多人，继续战斗在黄花川深山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

李海山率领的伪军遭到连续打击，溃不成军。无奈逃到车河口据点里，积极收买土匪小五龙武装二百多人，请求上板城警察署、车河堡警察队增派伪军五百多人，驻扎在车河口、柳河口据点内，梦想与农民武装决战，消灭民众军。这时，大成兴商户股东岳荫臣、经理任凤阁（瀑河地主）瞧见大批伪军驻守车河口，人多枪多，势力“雄厚”，就连续派人交与孙永勤三封促降信。信中威吓说：“你们不要偏听共产党的宣传抗日救国，进行骚乱”、“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早归顺有官做”、“如执迷不悟，继续胡行，小心灭门九族，死无葬身之地”等等。孙永勤越看越气，把三封促降信撕得粉碎，愤怒地骂道：“这群不知羞耻的汉奸，竟和日本鬼子穿起连裆裤，迟早我会收拾你们！”

2月初的一天夜晚，孙永勤接到情报说：“车河口伪军去上板城一带扫荡，只留下五十多人固守在大成兴商户院内。”孙永勤便亲自率领二百多名民众军，从孙杖子村出发，冒着塞外的寒风，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翻过猴山梁，在深更半夜里急行军三十华里，棉衣被汗水浸透，口中又干又燥，谁也不肯落后一步。到夜里12点钟，民众军将车河口团团围住，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了敌人。孙永勤等进入据点，走进大成兴商户院内，命令民众军打开仓库，把堆积如山的粮食、布匹和大批其他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把成堆的账目搜出烧毁，并把岳荫臣、任凤阁召到民众军跟前痛斥道：“如果你们继续助纣为虐，仗势欺人当汉奸，小心脑袋搬家！”岳荫臣、任凤阁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打颤，跪倒在地，起誓发愿地说：“我们再也不给日本人办事了，如果再办，叫我们汉奸，严加惩办！”



民众军攻占车河口，分了大成兴商户的财物，随后便沿着滦河北上，转战于承德县乌龙矶一带，收缴地主枪支一百多件。这时，柳河南岸八卦岭村贫苦农民张福义，在民众军抗击日伪、连续获胜的影响下，组织了一百多农民，收缴了柳河沿岸的枪支，赶到乌龙矶与孙永勤民众军会合。中共京东特委为了支援孙永勤打日寇、打土豪，在遵化、迁西等县征集了大批财物运往关外。并派出刘玉堂、刘俊岳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参加民众军，充当骨干力量。孙永勤见到共产党派人送来的物资，非常高兴地说："大敌当前，国民党军队逃之夭夭一溜烟，地主豪绅当了汉奸，只有共产党不怕艰险，领导燕山人民打日本，坚持抗战！"从而更坚定了孙永勤抗日到底的决心。

1934年3月，伪上板城警察署长马扒皮、伪军李海山、大五龙、小五龙和马拐子等带领一千多汉奸喽啰，继续驻扎在车河口，扬言："要与孙永勤决一死战！"大成兴商户岳荫臣、任凤阁见伪军卷土重来，死灰复燃，说什么："孙永勤抢了我家粮，烧了我家账，捉到孙永勤，我要开膛破肚把心尝！"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经常向黄花川一带"扫荡"，闹得硝烟滚滚，民不聊生。这时，民众军隐伏在山里，敌人来得多，民众军围山转，敌人来得少，民众军把敌歼，打得敌人叫苦连天。

一天，马扒皮活像一条疯狗，带领三百多名伪军用重武器猛击黄花川。整整炮击了一天，黄花川的山山水水都落下了炮弹，可是进犯到村里却是一座空城。原来，孙永勤探明情况后，采取诱敌深入、瓮中捉鳖的战术，把队伍化整为零，埋伏在黄花川周围。马扒皮率队进到黄花川是一片空，如同久梦初醒，知道上了钩，中了计，连声叫嚷："不好！不好！这是空城计！"赶紧率兵撤退。谁知道进犯容易撤退难，民众军埋伏在燕山顶上的森林里，早就摆好了口袋阵，见马扒皮走进了口袋，突然枪声撼山岳，杀声震九霄，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枪弹在敌人身上穿过，顿时伪军死伤遍野，一片哀鸣。马扒皮见大势已去，拼命突围，共产党员王殿臣对准他的胸膛，"砰"的一枪，把作恶多端的汉奸马扒皮打倒在地。伪军见当官的送了命，立即打起了白旗表示投降。这一仗，毙俘敌人三百多名，取得了一个伏击战的胜利。

伪军吃了大败仗，吓破了胆。马拐子、小五龙、大五龙、李海山借口去承德、遵化、平泉一带"扫荡"，率兵五百多人撤出车河口据点。这样，据点里只留下少数伪军把守了。孙永勤听到据点空虚的消息，乃于3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继续北上，将伪据点包围。仅两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伪警察队车队长以下官兵一百多人，活捉岳荫臣、任凤阁两个汉奸。孙永勤把两个汉奸捆绑至全军面前，严加痛斥说："你们原说不为鬼子办事，为什么出尔反尔，死心塌地当汉奸？"

岳、任两人面色蜡黄，浑身筛糠，苦苦哀求道："奴才不识时务，这次望孙团总宽大为怀，小人再也不敢了！"

这时，民众军里的共产党员王殿臣、刘玉堂、刘俊岳等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严惩汉奸！”孙永勤听到战士们的呼声，放开宏亮的嗓门怒喝道：“咱民众军专门打鬼子、杀汉奸，岳、任二人为虎作伥，屡教不改，甘心与人民为敌，今日定斩不赦！”说罢，命令战士将岳、任二个地头蛇枪决，人人拍手称快！

民众军把汉奸镇压以后，他们又高举抗日红旗，连夜向承德县境内的铁路沿线进军，一举攻破敌上谷车站，全歼伪军三十多人，拆毁了铁路，炸毁了桥梁，破坏了敌人的铁路运输。天拂晓时，队伍迎着东方的曙光，唱着胜利的战歌，返回黄花川一带深山抗日根据地。民众军每到一处，人民都争先恐后献茶送水，称颂他们是为民除害的“梁山英雄好汉”。

三、五指山下

孙永勤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抗击日寇，打土豪汉奸，振奋着长城内外穷苦人民的斗志，他们纷纷起来抗击敌顽。苇子峪村自卫团总李连贵，在1934年2月组织贫苦农民十八人，收缴了附近各村五十多条大枪，袭击了白旗营敌军据点，转至北山坚持抗战。3月，蓝旗营村年焕兴提出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打倒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组织三十多名贫苦农民掀起抗日暴动，转至北山与李连贵会合，围攻佛爷来警察署，奔往黄花川。

日寇在兴隆县境内连续遭到武装农民的打击，损兵折将，拖住了兵力，伪热河省军管区则认为汉奸汪海澄〔汪海澂〕工作不力，于1934年3月撤了他的伪办事处长的职务，委派吕俊福为其效力。吕俊福当上伪县办事处长以后，为了效忠日寇，做出“成绩”，亲自率领喽啰兵五百多人，于4月下旬东犯，驻守在寿王坟、罗圈沟一带。又命令上板城警察署伪军孙荣圃率领五百多人，驻守在车河口一带，妄图通过东西合击，把民众军消灭在深山之中。

这时，民众军正在五指山休整。汉奸吕俊福率领伪军爬过五凤楼山，气喘汗流，疲倦不堪。共产党员王殿臣见到敌人的狼狈相，率领三百多名民众军进行阻击，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毙伤伪军二百多人。吕俊福见喽啰兵伤亡近半，战斗不利，连忙下令撤退，仓皇逃窜。可是刚逃走不远，又遭到李连贵、年焕兴等农民武装的迎头痛击。伪军犹如丧家之犬，又丢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回寿王坟，不敢轻举妄动了。

西山枪声响，伪军孙荣圃为使“合击”成功，拼命向五凤楼山猛冲猛撞。民众军孙永勤率领三百多人埋伏在山头，等到伪军冲进沟底，两山枪弹齐发，来个关门打狗，打得敌人死尸遍地，赶紧收拾残兵，缩回据点，结果“合击”彻底失败。

5月1日，是伟大的国际劳动节。这天清早，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民众军领导者孙永勤、王殿臣、关元有、赵四川、张福义和苇子峪村李连贵、蓝旗营村年焕兴等二十多人，来到五指山下双堂子村开会，共同讨论抗击日寇的问题。中共京东特委王平路〔王平陆〕同志根据我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也从关内赶到五指山下，和民众军领导人一起，



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共商抗日大事。

会上，大家汇报了各地抗击日寇、消灭汉奸等情况，并根据王平路〔王平陆〕同志的提议，把民众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把“关外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军旗，改为“抗日救国”的大旗。提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地主，严惩汉奸，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行动纲领。同时，又将近五千人的民众军队伍进行了整编。孙永勤任军长，赵四川任副军长，王殿臣任参谋长。下设四个总队，每队八百至一千二百人。张福义、赵来（承德县路同沟〔路通沟〕人）任第一总队长，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关元有任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总队下设营、连、排、班。从此，健全了队伍的建制，以队为作战单位，活动在兴隆、承德、宽城、平泉、迁西和遵化等县的深山地区，不断扩大抗日队伍，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不久，孙永勤、张福义率领第一总队攻打了兴隆县佛爷来警察署。敌人凭借墙高院深，不停地往外打枪，妄图顽抗。孙永勤急中生智，点着秫秸捆往房上扔，火烧了据点，毙俘伪军五十多人。将伪军仓库打开，把粮食、布匹、衣物分给贫苦农民，群众称抗日救国军为仁义之师。年焕兴、李连贵率领二、四总队活动在长城内外，一举攻克了罗文峪、孤山子敌人据点，活捉日本税关总长佐藤，击毙与活捉伪军七十多人。接着，又在鞍子岭村与日寇骑兵队相遇，激战一小时，击毙日寇七十人，打死军马六十多匹。王殿臣、关元有率领第三总队活动在遵化县洪山口一带，一举攻克了洪山口、龙井关、二堂等敌人据点，并根据当地贫苦农民的要求，火烧了汉奸地主高佐忠〔高作忠〕的房产。然后率兵东去，袭击了关门岭、潘家口之敌，到迁西、宽城一带继续抗战。

伪兴隆县办事处长吕俊福整天龟缩在县城里，一会儿听到某据点被抗日救国军攻克，一会儿又听到某据点被农民武装占领，急得抓耳挠腮，团团打转。最后想出了个鬼花招，一是请求伪热河省公署对孙永勤等人进行招降；二是要求伪热河省增派重兵，“围剿”抗日的农民武装，妄图借此扑灭农民武装对日寇的反抗。

1934年8月间，伪热河省公署派两名亲信窜到黄花川。这两个汉奸自称是“下书”之人，口口声声说是要见到孙永勤将军，有机密需要面谈，妄图用软的方法拉拢孙永勤。可是，抗日救国军战士不听其胡言乱语，对他们进行全身搜查，结果搜出几张委任状。战士们将两个汉奸押起来，并把委任状上转军部领导人。孙永勤见到了委任状，日本鬼子委任他为热河省警察讨伐大队长，委任赵四川、关元有、张福义等为警察队长，并且还附热河省公署的一封恐吓信。信中说：“日满亲善，团结得像磐石一般。你们如识时务，速率全军投降，皇军既往不咎，封官加赏。如执迷不悟，继续顽抗，小心全家被杀，灭门九族！”孙永勤看后气得面额青筋胀起，把伪热河省公署的委任状和信件撕得粉碎，破口大骂说：“中国人不缺鬼子的官做，不叫我抗日，那是妄想！”

日寇听说孙永勤心如石坚，坚决抗战，便抽调兵力，进行“围剿”。9月间，日寇以一千兵力，在瀑河旁的九虎山与第三总队关元有部相遇。双方接火后，日寇用掷弹筒炮击抗日救国军阵地，但是战士们不畏强暴，依据有利地形，在山头与敌人周旋了一天的时间。敌人被打死打伤过半，军心大乱，向平泉县溃散逃去。10月，赵四川、王殿臣等率领一千多名农民武装，包围了宽城镇，经过一夜的激战，消灭敌军三百多，敌军弃城向青龙方面逃窜。

四、茅山［毛山］被围

日寇屡遭打击之后，更加恼羞成怒，像发疯似的从热河附近各县抽调上万名日伪军，1935年2月起开赴兴隆县黄花川一带，“围剿”抗日救国军。一天，孙永勤、张福义等率领第一总队正在承德县老梁一带山区活动，突遭日伪军两千多人的围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永勤等领导人本应有计划地组织突围，但是他们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较深，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由于接连打了几次大的胜仗，骄傲情绪不断增长，决心和敌人打阵地战、速决战，主张硬打硬拼。结果双方激战一天，虽然打死打伤敌人近千人，然而抗日救国军也死伤六百多人。在战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孙永勤才率领战士突围，转移到黄花川一带深山中去。

孙永勤率队突围转移到黄花川以后，敌人拼命尾追，妄图把抗日救国军扑灭在山里。这时，参谋长王殿臣等人提出了“要集中全军兵力与日寇决战，胜利一定会早日实现”的主张，孙永勤对此非常赞同。他说：“在山地与日寇打大仗，吃粮、穿衣、军需供应都有困难。如果奔赴平原，吃穿住用容易解决。我们决战胜利后，同工人、农民一齐起来攻下大城市，革命肯定会早日成功，鬼子肯定会早日滚蛋！”于是他命令全军四千多人放弃山区根据地，越过了长城，向遵化县转移，错误地想在平原地区与日寇对阵，搞大兵团决战。

3月，抗日救国军开赴遵化县茅山〔毛山〕一带。这时，暗藏在队伍内部的汉奸商佩璋早把军队行动情况密告给兴隆、遵化县的日伪机关。遵化县伪县长在日寇授意下，一方面用“帮助”、“合作”等手段，亲自到茅山〔毛山〕找到孙永勤，伪装自己赞同抗日，要求帮助他消灭马拐子匪患，欺骗抗日救国军；另一方面给唐山伪国民党、保安队拍密电，加紧密谋，设下一条毒计，请求尽速派兵扑灭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孙永勤在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革命警惕性不高，只听伪县长口头抗日，没识破他内心卖国的反动实质；只知道马拐子是土匪汉奸，没识破伪县长和日寇早已同流合污，于是便答应了伪县长的请求，在茅山〔毛山〕一带与马拐子作战。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日伪合谋派重兵“围剿”就在眼前，结果上了大当，吃了大亏，遭到苦难。

3月30日凌晨，乌云笼罩了大地，茅山〔毛山〕一片昏暗。日寇从喜峰口、潘家口、遵



化、兴隆、承德抽调五千多人，布置在茅山〔毛山〕四周。唐山国民党所属伪保安队张云楼、赵雷等汉奸军队一万人也围在茅山〔毛山〕四周。马拐子土匪部队近五百人，经过和孙永勤几天的战斗，虽然死伤了三百多人，这次也投奔日本鬼子身旁，配合作战。天亮以后，日伪军在吴家沟、四十里铺、茅山〔毛山〕等地向孙永勤部队发起猛攻。顿时枪弹齐发，大炮齐鸣，山上的土石被炸得浓烟四起，地下的柴草、树木火光冲天，被烧得枯焦一片。这时，孙永勤才察觉到自己中了伪县长的诡计，便命令全体官兵突围，甩开敌人，返回黄花川根据地。

可是，由于敌人兵力众多，经过一天多的浴血奋战，突围未成。当时孙永勤正身患重病，当他眼望着战友们在血泊中相继倒下，心如刀绞，情难自持，在这最艰苦的时刻，仍镇定指挥全军作战。3月31日中午，孙永勤召开营以上干部开会，他说："国民党、保安队、伪县长、地主都和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都是汉奸。我们这次遭到敌人的包围，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绝不当降兵，最后剩下一个人，也要和敌人血战到底！"接着孙永勤继续说："共产党打土豪，捉汉奸，打鬼子，始终坚持斗争。我们突围出去的人一定要跟共产党走，打日寇，除汉奸，坚持抗战，直到胜利！"会后，全队官兵作战更加勇猛。连长张生腹部中弹，在停止呼吸前的一刹那，双目瞪着敌人，枪口对准敌人。二总队排长阎海彬（兴隆县东阎杖子人）带领全排战士向敌人猛打猛冲，击毙敌人五十多人，最后壮烈牺牲。

下午四点钟，在孙永勤等掩护下，有一千四百多名指战员突围冲杀出去。而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不幸中弹，英勇牺牲，长眠在茅山〔毛山〕山巅。抗日救国军领导人赵四川、关元有、赵来等人在突围中不幸身亡。共产党员王殿臣等同志，身先士卒，突围在前，为党、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武装暴动，转战兴隆、宽城、承德、平泉、迁西和遵化六县，袭击敌人据点一百多座，毙伤敌人五千多名，撒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坚定了燕山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为抗日而死，死得光荣。他们的名字将永垂青史，他们的事迹将像燕山顶上的苍松翠柏一样万古长青。他们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他们永远受到人民的崇敬。

孙永勤等抗日救国军领导人虽然光荣牺牲了，但是张福义、李连贵、年焕兴、刘俊岳、刘玉堂等人埋葬了自己的战友以后，擦干了眼泪，终于从北面山上突围出去，重返黄花川一带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踏着烈士们的足迹，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抗击日寇，直至抗战胜利。

1982年8月28日

回忆我的丈夫——孙永勤

讲 述 者：雷永兰

讲述时间：1982年10月11日

采 访 者：佚名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今年已经八十岁了，想起和我丈夫那时一起战斗的艰苦岁月，今天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是十七岁与孙永勤结婚的。在这之前他已有过一个妻子，但结婚几年后就因病而死，留下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我忠心陪伴了丈夫十几年，对他一生的身世非常了解。

永勤生于1805年〔1893年〕，青年时在家念了几年书。他从小就喜文爱武，晚上在家经常玩枪练棒。他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十八九岁时，已练得了一身好武艺。他为人正直，性格刚烈，好打抱不平，非常讲义气。他还抓紧时间看书报，了解时事。1933年，日本鬼子进攻热河，他在报上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有枪有人却不予还击，一退千里，向南逃窜，中华民族的土地让异族侵略者任意践踏。日本鬼子如狼似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更可恨的是当地的地主土匪武装与鬼子相勾结，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欺压百姓，危害良民。永勤看到这一切，整日饭吃不好，觉睡不安，心里也就打起主意。他耐心劝我婆婆，动员我，他要带领百姓打鬼子去。那时他已经三十八了，家里有三个孩子。我恨透了鬼子汉奸，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也就暗暗地支持他。可是当时家是老哥五个，我们分家分了七亩半地，自己盖的房，那时十三口人，被小日本摧残得只剩五口人了。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我长子十二岁，次子二岁，小的一岁，一个女儿四岁。在七大老小生活困难的困苦下，他当兵的决心定了。

在一个卖水鞋的地下党人引导下，他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抗日的信心更加坚定。起初他联络了五个人，砸了一家地主，弄到了枪支。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广泛收兵，发展力量。提出了“敌不灭，怒不息，头可断，志不屈”的口号，竖起“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大旗，举行抗日暴动，建立民众军。他担任军长，还有副军长、大队长、参谋长、军师等相助。从那以后，他就带领民众军打土豪，分田地，为民除害，几乎没睡过一次安稳觉，白天行军打仗，晚上开会研究作战方案。他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身体渐渐消瘦。我作为一个妻子，从心眼里疼他。跟随他力尽艰辛，转战三年多，经常陪伴他到深夜。在他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渐开



明，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我想，丈夫为抗日救国呕心沥血，历尽千辛万苦，我尽量帮助他料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务，减轻他的负担，这也是为抗日救国出一把力吧。

永勤有智有谋，出生入死，身先士卒。为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将自己生命置之度外。在多次战斗中，他都冲锋在最前面，和敌人拼搏。民众军节节胜利，士气越打越旺，敌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恨不得立刻拔掉这根“钉子”。他们散布告，贴黄榜，说什么谁抓住孙永勤有重赏，还到处抓捕家属，这样我们孩子大人的处境更加危险。但是，我已懂得，我们的奋斗是为了迎来千千万万人民的好日子，我一个妇道人家为抗日做点事又有何不该呢？于是，我就使出自己的全部力气，帮助炊事员烧火、做饭等等，做些后方工作

1935年阴历的一天［原文如此］，永勤集合全部官兵，说要拉到遵化去战斗，然后找红军。部队这次是二道方向，我不能去。临出发时，永勤几次嘱咐我：“你放心吧！不要惦记我，好好照看孩子，让他们快长大成人，好打鬼子。”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失声哭了起来。队伍出发时，我站在村口恋恋不舍地望啊，望啊，直到队伍看不见了，我还在默默地望着。

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是最后分手。在茅山〔毛山〕遇敌战斗中牺牲的消息，犹如晴天一声霹雷，震得我头晕眼花，悲痛欲绝。我哭得死去活来，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二年多。

永勤为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英勇地牺牲了，我曾为家里这三个孩子发愁，但是一想到丈夫那刚直不阿的革命精神，心就横下来：我要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继承他父亲的事业，把鬼子打出中国去。

敌人到处抓我们，我带着孩子躲进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四处流浪。那时的苦日子，真不堪回想。

今天，新中国已建立三十多年了，我为自己有过这样一个丈夫而感到自豪。现在虽然生活比较差，但亦无怨言，我只觉自己岁数大了，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家。

以上只是永勤生平故事括〔大〕概，详情请见文艺丛刊《燕山》1981年第二期，其中有《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一文，望参考。

雷永兰

1982年10月11日

孙永勤和民众军

讲 述 者：廖金柱

整理时间：1982年12月7日

采 访 者：佚名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民国23年（1934年）春，在遵化郭家沟石虎来（民众军）的引荐下，我参加了孙永勤的民众军。到茅山〔毛山〕战斗时，我已是民众军四大队一排三班的班长。因在孙永勤的指挥下与日本鬼子战斗了六个上下月，所以我知道一些关于孙永勤和民众军的情况。不过因年代久远，有些已记忆不清了。

孙永勤家住在兴隆车河口大杖子，是有名的大财主。为看家护院，他家还有几棵手枪和大枪。民国22年（1933年），日本鬼子进了关，孙永勤家大杖子边设了鬼子的据点。据点里的鬼子整天里抢掠奸淫，无恶不作。一天，两个日本兵闯入他家，强行奸污了他心爱的两个闺女。孙永勤对日本鬼子仇恨至极，他捅〔浇〕上煤油，烧毁了自家的房屋，拿上枪，联络了三十多人，便拉起了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就是“民众军”。

起初，民众军无多大战斗力，更没有作战经验。只是凭着“民众”们的勇敢，才旗开得胜，打下了鬼子的车河口据点。在荞麦岭还打败了鬼子的马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主要是步枪，机枪和小炮因不会使用，都没有收敛）。

以后，在越来越多的战斗中，民众军的战斗力提高，队伍也扩大。初起“民众”时，只有三十多人，到荞麦岭战斗时，已有二百多人。到柳河口战斗时，有一千四百多人。到茅山〔毛山〕战斗前夕，民众军已是拥有二千多人的抗日武装。

民国24年春季栽白薯时，遵化县保安队贾义要投降民众军，他请孔县长［应为“何县长”，下同］帮助跟孙永勤联系。孔县长一面同日本人部署“空城计”，一面与孙永勤联系在遵化县城接受贾义投降。一天，孙永勤带领队伍从大寨来到遵化县城，但却中了孔县长的“空城计”。日本鬼子、伪军把他们团团包围。孙永勤带领队伍浴血奋战，突出重围。此后向东北攀上茅山〔毛山〕，在茅山〔毛山〕顶又与敌人激战了大半天。最后因弹尽粮绝，大都壮烈牺牲。我们四大队的一百四十多人，只有六人被我从帽子山山坡带回到我的家中（遵化洪山口三道沟盆楼峪），得幸免，其余全部牺牲。



孙永勤是好样儿的，民众军也是有骨气的。

（根据廖金柱回忆整理）

注：廖金柱，现年69岁，参加过“民众军”，家住遵化县洪山口公社三道沟大队盆楼峪村。

1982年12月7日整理

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刘青林

采 访 者：李永春

整 理 者：佚名

整理时间：1982年12月8日

文件原名：《茅山〔毛山〕战斗》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茅山〔毛山〕战斗发生时，我正好在茅山〔毛山〕脚下放羊，我目睹了日本鬼子的凶残和孙永勤民众军的勇敢。

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四日凌晨，孙永勤率领部分民众军在遵化镇突出重围，攀上了茅山〔毛山〕，拟在甩掉敌人之后，西去马兰峪，然后撤至兴隆马鞍道一带。不料他们已被敌人死死咬住，攀上茅山〔毛山〕立脚未稳，敌人便从四面将他们包围。太阳红沿时，民众军对敌人的一场英勇悲壮的战斗便开始了。

嗡嗡嗡，敌人的两架飞机在民众军的头上直打转转。民众们气红了眼，他们架起了机枪，瞄准了敌机，哒哒哒，一阵猛扫，一架敌机饮弹负伤，歪歪扭扭地栽落到洒河〔澈河〕那边，另一架敌机见势不妙，也掉转屁股狼狈逃窜了。

敌人的飞机被打跑后，四面山下的敌人端着枪呀呀呀地冲了上来。孙永勤部署好兵力，民众们有的伏在石头后面，有的爬在橡树棵子下面，各自为战大量地杀伤着敌人。李连贵一人在橡树棵子下面就打死鬼子三人。不一会儿，敌人大片地倒下了。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紧接着，敌人一次更比一次猛烈地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敌人的数次冲锋又被打退了。直到大晌午时分，民众军的子弹打光了，一切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用光了，再也无法

抵挡敌人的冲锋了，民众们大多壮烈牺牲，敌人上了山头。以后敌人又凶狂地搜山，敌人搜捕去了未牺牲但也未及逃脱的民众军，也搜捕去负伤的孙永勤的近人，这些被捕的人也被敌人穿上锁甲骨，拉到山下，残酷地杀害了。

茅山〔毛山〕战斗结束后，我曾带人去茅山〔毛山〕顶上认领、掩埋烈士的尸体。见那里至少有二百具尸体，孙永勤的头颅也被敌人割去了。日本鬼子在茅山〔毛山〕制造的惨景真是令人不忍目睹啊！

（根据遵化县党征办李永春同志的采访情况介绍整理）

注：刘青林，现年62岁，中共党员，家住遵化县茅山沟〔毛山沟〕。

1982年12月8日

关于民众军

讲 述 者：单忠英

讲述时间：1982年12月8日

采 访 者：李永春

抄件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是孙永勤民众军第八分队队长。1934年2月，我在铁路上联络二十多人，收拾了一个日本人，夺得一个大枪。以后我们拿着这颗枪，找到孙永勤民众军。当时，民众军已有九个分队，每队人数三五十人、百八十人不等。我参加后，孙永勤又拨七八个人，加原来的二十多人，共三十来人组成一个分队，我任分队长。

对于民众军，我能具体回忆的是，在队伍里时行拜把子。我还记着几个人名，老大叫黎殿安，老四曹万林，张守礼是哥儿十八，还有张福义，排行第几我忘了，我是哥儿十三。

（根据遵化县委党史办李永春同志采访情况介绍整理）

1982年12月8日

西街道北医院下面，五金公司，单忠英

孙永勤抗战

讲 述 者：张守礼

讲述时间：1983年

采 访 者：李永春

整 理 者：佚名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勤，兴隆黄花川人，出身大地主。日本鬼子侵占兴隆后，他拉起了队伍，进行抗日活动。他的队伍开始叫“民众”，成员戴红袖章，袖章上写“仁义救国护民军”七个字。“民众”一共十二个队，每队一百多人。

起初，由于人员少，装备差，“民众”时常被打散，到后来才扎根在老梁山。“民众”在老梁山一带抗战时，敌人曾多次威逼利诱。一次，日本子二百余人企图爬南坡袭击“民众”，“民众”发现后，迅速歼灭了敌人。还有一次，喜峰口据点的日军头目写信给孙永勤，说是如果他放弃抗日，便给他枪支、地盘，孙永勤不入敌人的圈套，他回复敌人说：“别来糊弄老爷，老爷坚决抗日！”

孙永勤坚决抗战激怒了敌人。敌人从“新京”调来大队人马，把老梁山团团围住了，并不远修筑一座炮台，准备用大炮炸平老梁山，轰垮“民众”。“民众”抗战越来越艰苦了，为保存力量，坚持抗战，孙永勤把除二大队张福义部二百余人以外的两千多“民众”全部带入关内。（二大队张福义部二百余人，在冀东党派去的王平路〔王平陆〕争取下，在关外参加了八路军。）

在关内，“民众”缴民团的枪，准备搞暴动，轰轰烈烈干了一阵子。一场茅山〔毛山〕战斗，“民众”被扼杀了，孙永勤壮烈牺牲了。

（根据遵化县党征办李永春同志的采访情况介绍整理）

注：张守礼，当年在“民众”十二队，是“民众”的第十八弟兄。现家住遵化东下院寺，〈属〉团瓢庄公社。

路通沟大队赵廷江、赵廷山回忆孙永勤

讲 述 者：赵廷江、赵廷山

讲述时间：1983年

采 访 者：栾福忠

文件原名：《路同沟〔路通沟〕大队赵庭江〔赵廷江〕、赵庭山〔赵廷山〕回忆孙永勤》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车河口，〈是孙永勤〉活动的大门，根据地。

车河口孙永勤活动情况。下板城警察署〈署长名叫〉陈敢干陈混蛋，武厂村公所村长〈名叫〉王岐山，〈还〉有一个村丁杨小峰。陈敢干领着王岐山、杨小峰等人去打孙永勤。陈和杨小峰骑着马〈与赵来〉走了对面，杨小峰把赵来打死。孙永勤为报仇，经常来抓王岐山、杨小峰和陈署长。孙永勤派人把陈署长家包围，把王岐山、杨小峰的家包围，都没有抓到。

种地轧滚的时候，孙永勤打着大旗来承德县一带活动，经常和下板城警察署交战。在车河口讨伐，敌人吃了亏。孙永勤浑身衣服〈上子弹穿的孔〉像筛子眼那么多，身先士卒，敌人多次讨伐都是有来无回。敌人一次派飞机来，刚落地就被击毁。打承德［应指1933年3月4日，日军进攻热河省会承德］，就没有打孙永勤付出的损失大。

我看见孙永勤在下板城打了一些胜仗。

路同沟〔路通沟〕大队会计赵来之子赵庭江〔赵廷江〕：

赵来是我的父亲，赵林是我的伯父，赵友〔赵有〕是我的叔叔。

赵林是我伯父，家中比较富裕，中农，种地主土地。

我的父亲家中比较穷，受地主压迫，交租。成立组织主要打日本，不抢穷人。家中非常支持父亲。父亲在果子铺〔首饰铺〕给人家当店员，家中无法维持生活，我父亲找到我的叔叔等。父亲上过几年学，有点文化，读过四五年私塾。家中有一间半房，给下板城庆元亨种地，三亩多，四六分成。

听说，〈在〉乌龙矶公社老梁上大队，当时孙永勤抓到两个日本人。放了回去，要大炮、子弹、枪支。结果日本鬼子派飞机轰炸，损失不少。

传说孙永勤马褂枪眼不少。

赵林之子赵庭朴〔赵廷普〕参加了队伍，牺牲了。

袭击下板城警察署车河口分驻所，消灭敌人二十多人，我父亲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老梁上一次战斗，敌人出动飞机一架，200多人包围老梁上。孙永勤当时有200多人。

孙永勤来去落脚赵林家。后来赵林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因为〉窝藏孙永勤。

我父亲参加孙永勤队伍，主要原因：旧社会母亲、爷爷、妹子、父亲和我共五人，种地主三亩地，只有一间半草房。父亲在车河手饰铺〔首饰铺〕当店员，受苦受累，学徒工白干。父亲若活着，今年79。当时29岁。

富农高成贤。

地主辛增歧〔辛增祺〕（辛家庄，乌龙矶公社）给孙永勤提供武器，被日本人杀害。

赵林之子赵庭山〔赵廷山〕：（62岁）

种大烟要税。我家有个住房的，〈将我家种大烟之事〉报告日本人来勒索敲诈。当时日本人火烟税［原文如此，即“日本人要大烟税”］，要粮要草，见人就抓，穷人实在受不了。当时给日本人修路的。

上谷公社柴起瑞〔柴启瑞〕、赵庭玉〔赵廷玉〕、赵林等七人。马保德卖羊羔皮。

袭击车河口据点，消灭20多人。陈混蛋〈是〉下板城警察署长，赵来同志之弟赵福当差给陈混蛋，让赵福说服赵来回来。

孙永勤在老梁上有九个分队。

孙永勤抓了两个日本人和一个翻译官。放走一个翻译官。

老梁上孙永勤任军长，赵四川〈任〉副军长。

当时因弹药缺乏，给两挺机枪、子弹，就放走一个翻译官。翻译官放走后，带来不少日本人队伍，袭击老梁山。敌人派三架飞机狂轰滥炸。打死两个日本人撤退。老梁上山高林密地方，便于活动。当时五六百人。

孙永勤长脸、大个子，戴毡帽头，受到群众拥护，枪法好，有文化。

车河口彭杖子老岳家大地主，孙永勤同他家作仇，岳家抓他。

孙永勤是伙会头目。打柳子〔绺子〕，柳子〔绺子〕即土匪。

日军进中原，柳子〔绺子〕小白龙［即“闹绺子，其中一只叫小白龙”］。

赵庭山〔赵廷山〕：

孙文炳了解孙永勤。

孙永勤在老梁上驻扎，准备袭击下板城警察署。老梁上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敌人守住了下山的要道小后福，飞机狂轰滥炸。孙永勤奋勇还击，敌人也没有子弹了，被孙永勤击退。返回

黄花川沟门，前面突击出去的部队渡河摆渡，被日本和满洲队打死三船之多（每船二十多人）。

拜把子弟兄：同生死共患难。

马保德，遵化东双城子人。

老梁山被围是在早上。〈上来〉16个日本兵，〈孙永勤部队〉哨兵抽大烟，漏岗，被敌人占领了要道。打飞机时死了一个人，是飞机炸死的。

孙永勤找共产党是没有枪支、弹药。

辛增歧〔辛增祺〕，乌龙矶公社辛庄大队。辛增歧〔辛增祺〕〈是〉小地主，受日本人的气，支持孙永勤枪支弹药。

关于孙永勤情况[1]

赵庭江〔赵廷江〕：

赵来是我的父亲，赵林是我的伯父，赵友〔赵有〕是我的叔叔。

赵林我伯父家中比较富裕，中农，种地主部分土地。

我父亲家中比较穷，受地主压迫，交租。父亲在车河口给首饰铺，给人家当店员。家中无法维持生活，我父亲找到我的叔叔等。父亲有点文化，读过私塾四五年。家中有一间半房屋。给下板城庆元亨种地，三亩多，四六分成。

我听说，孙永勤抓到两个日本人，带到乌龙矶公社老梁上。放回一个翻译，〈让他告诉日军，〉答应送来枪支、子弹，就放两个日本人。结果日本人派飞机轰炸，包围。孙永勤损失不少。

听传说，孙永勤马褂上枪眼不少。

我伯父赵林之子赵庭朴〔赵廷普〕参加队伍牺牲了。

我父亲在打下板城车河口警察分驻所时牺牲，那次说消灭敌人二十多人。

老梁上一次战斗，敌人出动飞机一架，200多人包围老梁上。孙永勤当时200多人被围。

孙永勤常来赵林家落脚。赵林参加孙永勤队伍后，家中房屋财产，全被烧光。

父亲参加孙永勤队伍的主要原因：旧社会，母亲、爷爷、妹子和我共五口人，种地主三亩地，只有一间半草房。父亲在车河首饰铺当店员，受苦受累，三年学徒工白干，穷得没有法活，父亲被孙永勤联络起义了。

---

[1] 此为栾福忠先生采访赵廷江的整理稿。

关于孙永勤情况[1]

赵庭山〔赵廷山〕:

（鹿同沟〔路通沟〕大队赵家庄赵林之子）

孙永勤起义的时候，我正在下板城给日本人修铁路。那时候，日本人处处征税，什么都要税，要粮要草，见人就抓，穷人实在受不了。孙永勤来这联络赵庭玉〔赵廷玉〕、赵林等七人去孙杖子。当时马保德是遵化县人，卖羊羔皮，是个做买卖的。我是孙永勤到老梁上前去的。孙永勤在老梁上已有九个分队，孙永勤是军长，赵四川是副军长。在老梁山带着抓到的两个日本人，放走了翻译官，说是拿枪炮子弹换两个日本人。回去后，没有送枪来，带着日本人队伍袭击老梁上。敌人派飞机盘旋五次轰炸，我们隐蔽在密林里，山崖下，敌人打不着，而后突围出去了。孙永勤部队当时有五六百人。

孙永勤驻扎在老梁上，准备在那儿建立根据地，而后先袭击下板城警察署。当时认为老梁上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敌人不易进攻，但离下板城驻地较远。许多人不同意在那儿建根据地，粮食供应困难，人家少，没有富户，交通不便。孙永勤不听。这次被围损失不大，有的民众弟兄逃走回家。敌人守住了一条通往山下的小道。是在敌人弹药已尽时，我们才冲出去的，后返回黄花川。

马保德，遵化东双城子人。老梁上被围是在早上。哨兵抽大烟，漏哨，被敌人占领了要道。打飞机时，一个弟兄暴露隐蔽目标，被炸死。

孙永勤要找共产党，是要子弹、枪支。

小地主辛增歧〔辛增祺〕是乌龙矶公社辛庄大队人。受日本人的气，支持孙永勤一些枪支弹药，后被日本人杀害了。

[1] 此为栾福忠先生采访赵廷山的整理稿。

关于孙永勤的情况

讲 述 者：孙文炳
讲述时间：1983年
采 访 者：栾福忠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文炳同志：

孙永勤为人公平，捧穷人。有啥吃不上的人，送几斤粮食就不要了。

张如增是大财主。

孙永勤三个闺女，已死两个，三个儿子（一个梦生）。

孙永勤父亲是傻子，母亲是“二奶奶”，会给小孩扎风，富农（土改定富农）。家（村附近）有土地三四亩，房子六间，一马一驴，有一个掌柜的一人。收地租，雇人打柴禾。让其姑父代耕代收。

孙文顺（孙永勤次子）在唐山市工作。

孙文顺是父亲拉柳子〔绺子〕的时候寄托在东沟生的。

孙永勤一家过着打把式日子。

大杖子罗将梁〔罗降梁〕，土匪起团会，口里起团会，（还乡团）。孙永宗会长，孙永勤副会长。（伙会）还乡团[1]。土匪打伙会，追击伙会车河口。车河口大成兴被伙会抄了，局子下了警察局人员抓孙永勤，孙永勤有水连珠手枪。抓不到。怎么办？孙永勤说我在家待不了，就找到路同沟〔路通沟〕赵林、赵友〔赵有〕等七人磕头，拉柳子〔绺子〕，打日本。腊月从路同沟〔路通沟〕过来，到孙杖子找我们哥五个，问我去不去。“打日本我们去，孙文炳还没有结婚。”我是老三，孙永勤让我这个三小子去。

我们到半壁山砸局子，把枪、钱都抄了。缴获敌人十多支枪（敌人把枪扔到井里）。敌人都跑了，一个没有打死。谁抢到钱谁要，抢得多的就分给别人一点（钱估计不上来）。当时共有20多人。

青河〔清河〕松闹沟〔松挠沟〕抓到一个大胡子，一个叫小木，一个是翻译。一个老百姓给我们送信，报告我们松闹子沟〔松挠沟〕有三个日本人活动，骑着三个大马。我们包围了三个敌人。我们开枪，他们开枪，〈他们的〉撸子卡了壳，抛掉后，我们冲上去，捉住了敌人。我们赏给了报信老百姓一百多元钱。捉到日本翻译，说只要放他们，要啥给啥。当时写信，要

[1] 原文如此，准确含义请参见栾福忠先生整理稿。



〈日军〉给100支枪，一门炮，两挺机枪。敌人回信说给，去遵化拿去。我们在遵化洪山口，派三个村子吃饭，我们派200多人带足弹药去拿。敌人把守遵化县城，架好机枪，敌人说没有枪。我们回到鸡鸣村，开会，副军长王宝石人〈说〉到蓟州，我说回五指山，马保德、赵四川说到盘山（蓟州）找八路去，最后依马保德、赵四川意见打旗子西进。鸡鸣村敌人卡住不让过，又回来了。黑夜我们进茅山沟〔毛山沟〕，派饭吃饭，找地主要小米。第二天早四点，敌人把炮和机枪开了火，把我们把追至茅山〔毛山〕。我建议北撤，孙永勤说不怕，打。敌人机枪、钢炮铺天盖地，敌人抢占了战壕，我们在三个梁头上。

我们三个在梁山〔上〕顶不住，败下阵来。在半山腰负了伤，跑不了（〈那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二）。我藏在河沟渠中，用草盖上。

茅山〔毛山〕被围，进洪山口有一千多人。

半壁山警察局先后打两次。

下板城打一次，没有打下。

宽城打一个局子。

潘家口局子，打了日本警察署两人和一个翻译。准备烧毁，结果敌救兵来了。

车河口警察署没有打下。

孙永勤〈要求部下：〉不许动老百姓一个手指，一把草秸，不许动老百姓一件东西。一个战士和一个老百姓换了一双鞋，孙永勤让找军法处处理。大地主家的东西可以动，坏人可以抄家。

孙永勤有勇无谋，没有好的纪律。

孙永勤队伍主要是吃地主家饭，送粮送米。

孙永勤经常开会。

吃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要记账，和地主要来再还给穷人。

孙军军法处，赵友〔赵有〕任处长，队长孙文炳。

见地主就要枪，就收。

洒河〔澈河〕二堂地主高作忠压出四五支枪。

宽城暴河口〔瀑河口〕大财主跑宽城，抓到地主小孩，送来了五支枪。

暴河口〔瀑河口〕打了两天。大财主有三十多人护院，有炮楼。打进后，缴获五支枪。当家的不在。

孙永勤在家读七八年书，私塾。

领导抗日二年。

全家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全家东跑西颠，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

孙永勤就是敢干，干不过就跑，没有计划。

老梁只有两条路，老百姓让撤，他不撤。两条路堵了就不中了，没有粮草。被围之后从一个木板桥而过，山崖有十来丈高，一个一个地过去。老梁被围五百多人。敌人有炮轰我们，烟雾腾腾。打死两个敌人。敌人出动两架飞机盘旋。

茅山〔毛山〕有十多架飞机，没有机枪，也没扔炸弹。

关于孙永勤的情况[1]

孙文炳（孙杖子大队人）：

孙永勤为人公平，捧穷人。有啥吃不上饭的穷人，借给几斤粮食，还不起就不要了。

孙永勤原来家有三个闺女，已死了两个。母亲是“二奶奶”，过日子是把好手，会给小孩扎风病，谁请都去，没有阔家主的架子。

孙永勤的父亲是个老实庄稼人，土改时他家定为富农。一百多亩土地，房屋六间，一马一驴，家中有一个掌柜的，负责管账，催收地租等。家中雇人耕地打柴等。

孙永勤次子在唐山市工作，叫孙文顺。孙文顺是他父亲打溜子〔绺子〕时候寄托在东沟出生的。

孙永勤拉队伍，是在大杖子罗将梁〔罗降梁〕一带〈闹〉土匪，起团会，孙永勤是伙会头头。土匪常打伙会，孙永勤恨土匪。车河口大成兴支持土匪，孙永勤就把大成兴抄了。岳家报告了局子，局子就抓孙永勤。孙永勤有“水连珠”手枪，局子抓不到，孙永勤也不得安宁。局子抓他，怎么办？孙永勤说，我在家待不了，就找到路同沟〔路通沟〕赵林、赵友〔赵有〕等七人磕头，拉柳子〔绺子〕，打日本。腊月从路同沟〔路通沟〕过来，到孙杖子找我们哥儿五个。孙永勤先把我绑去了，跟他打日本。

我们到半壁山砸局子，把钱都抄出来了，得了十多棵枪。敌人把枪都扔到水井里，都吓跑了，一个没有打死。那时谁抢到钱谁要，抢的多分给抢不到的一点。那次我们打半壁山，敌人有20多个伪警察。

我们在宽城县松挠沟抓到一个日本大胡子，一个叫小木，一个是翻译。那是当地一个老百姓报告我们，送信来，说松挠沟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翻译在活动。我们包围他们时，他们骑着三匹大马。我们先开一枪，敌人开枪的卡了壳，扔掉了手枪，趁机扑上去，捉住了敌人。这次我们赏给报信的老百姓一百块大洋。捉到的翻译说，只要放他们，要啥给啥。我们说送给一百支枪、一门炮、两挺机枪，就放回去。谁知先放走翻译去拿枪，敌人变卦了，早晨带着队伍包围了我们。

[1] 此为栾福忠先生采访孙文炳的整理稿。



遵化是说给我们枪支弹药，我们到了遵化，人家不给。回到遵化的鸡鸣村，开会，副军长王宝石人关元有说我们回黄花川、五指山，马保德、赵四川说到盘山找八路军，最后依马保德、赵四川意见打旗子西进。鸡鸣村的敌人卡住不让过，又回来了。黑夜我们进茅山沟〔毛山沟〕，派饭吃，找地主要小米。第二天早上四点钟，敌人把炮、机枪架上了，开了火。把我们追至茅山沟〔毛山沟〕。我建议北撤，孙永勤说不怕，和他们打。敌人机枪、钢炮铺天盖地，占领了要道、路口，我们分据在三个山头上抗击敌人。我们三个人在山梁上顶不住，败下阵来。在半山腰我负了伤，跑不了（〈那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我躺在河沟中，用草盖上身子。

我记得茅山〔毛山〕被围，进洪山口有一千多人。

半壁山局子先后打两次。

下板城打一次，没有打下。

宽城打局子。

潘家口局子，打了日本警察署两人和一个翻译。准备烧毁，结果敌救兵来了，没有打下来。

孙永勤说，好百姓的东西一个草秸都不能动。一个战士鞋子坏了，找老百姓要了一双鞋子，孙永勤让军法处处理。大地主的东西可以要，不给不行。坏人可以抄家，不用事先报告。

孙永勤有勇无谋，就是胆子大，没有好的纪律。

军法处长赵友〔赵有〕，队长孙文炳。

孙永勤只要知道地主有枪就收，不给不中。先去绑人，给枪就放，不给枪就打死。

洒河〔撒河〕二堂地主高作忠我们压出过四五支枪。

瀑河口大财主，抓到一个孩子，压出了五支枪。

瀑河口打了两天，财主家有三十多人护院，打进后缴获五支枪。

孙永勤在家读书六七年，私塾。

领导伙会二三年。

孙永勤拉队伍，全家房屋财产均被烧光。家里人东跑西颠，这住几天，那住几天。

孙永勤就是敢干，干不过就跑，没有军事计划性。

老梁只有一条路通往山外。被围时，从石崖搭一根木头桥挤过去的。山崖有十米高，一个一个地过去。老梁被围五百多人。敌人出动两架飞机盘旋，烟雾腾腾。共打死两个敌人。敌人出动两架飞机盘旋，没有轰炸。

忆孙永勤

讲 述 者：孙永忠

讲述时间：1983年

采 访 者：栾福忠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忠：

80上下岁［原文如此，有可能说孙永勤如活着的年龄］。

孙永勤是一个庄稼汉子。

孙永勤起义是伙会抄了局子，敌人抓他，没有办法，到乌龙矶赵家庄。

压张如增家中的武器。

孙永勤家有山洼地一百多亩。孙永勤父亲一辈哥三个。

孙永勤弟兄五人，孙永勤老三。

忙的时候五至十人，孙永勤本人参加劳动。

孙永勤哥哥对穷人看不在眼里，家中有势力。

孙永勤在蘑菇峪一带读书五年。

孙永勤三个儿子，一个姑娘。

孙永忠（孙杖子公社孙杖子村人）[1]：

我说孙永勤是一个庄稼汉子。孙永勤起义，我听说是他们伙会抄了局子，敌人抓他。没有办法，没处躲，没处藏，跑到乌龙矶赵家庄联合几个穷弟兄和伙会的人，闹起来了。他们先压张如增的武器。张如增不敢不给，给二十多条枪。张如增吓得够呛。

孙永勤家有一百多亩地。孙永勤父亲辈哥三个。孙永勤父亲是个老实人，母亲孙二奶是爽快人，三里五乡有名，会扎风。孙永勤一辈弟兄五人，他是老三，从小参加劳动，爱干活。他家中有一个长工，忙时有五至十人帮工。土地大部分租给佃户。

孙永勤在蘑菇峪读书五六年。孙永勤〈哥哥〉平时不大爱理穷人，有势力。孙永勤三个儿子、一个姑娘。

[1] 此为栾福忠先生采访孙永忠的整理稿。



访民众军八分队长单忠英

讲述者：单忠英

讲述时间：1983年4月17日

采 访 者：栾福忠、邢连义

文件原名：《访民众军八分队长单忠英：关于孙永勤的情况》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单忠英：遵化西街，年事已高，记忆力不太好）

我原是孙永勤民众军第八分队队长。我是东北人，原在铁路上工作。我们受不了日本兵的欺压，于1932年2月，打死了一个日本兵，工友拿着两支枪，共二十几人，跑了出来。跑到滦河汊，踩冰过河，受到了孙永勤的接应。孙永勤当时给我又拨七八个人，加上原来我带的二十几人，共计三十来人，组成分队。当时我记得有九个分队。孙永勤讲话我听了很入耳："我们民众军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吃老百姓，喝老百姓，老百姓反我们，我们就没处待，待不下去。"当时没有共产党、八路军那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让我们不许动百姓的东西。孙永勤说："谁动老百姓的东西谁犯错误，谁抢东西谁是要开小差。不许奸淫妇女。"这些话我记得清楚，别的我忘了。孙永勤常向我们讲："中国是国，中国人要装中国人的心，不要装土匪的心，汉奸的心。日本人收枪是让我们空手无权。北京、天津我没有去过，但我听说穷人吃豆饼，没法活。我们一心伙［当地方言，一心、齐心之意］打日本。不怕苦。我家有吃有喝，我不愿把枪交给日本人，当亡国奴。中国人和中国人一条心。"

我们拜把子的事，当时在山坡上，大伙发誓：谁要投降日本人，挨枪子，挨雷击，不得好死。说啥都有，就是抗日的意思。

单忠英同志谈话：

我在铁路上工作，给日本人修铁路。我们在一起商量抗日，联络二十多人。（下板城）修滦河大桥，一台机器烧坏。两个日本兵发现后："什么的干活！"两个日本人到屋里看病号，当时走了一个。我们说，去叫兵去了。我们在一块避风地方烤火，日本兵也跟着烤火，听我们的谈话。我们把他收拾了推到山涧下，枪也没有拿，就跑了。我们在滦河汊，日本人在下板城，有兵把守，我们踩冰过河，受到孙永勤部队的接应。当时我们两个人把枪拿来了，跟上了我们。孙永勤讲了话："不动老百姓的东西。动老百姓的东西，反我们，我们没有处待。"给我们编了队。

孙永勤是伙会头，他有个册子，谁家有枪他都知道。大盖、套筒，二十多人发给我们十多支枪，其他人徒手。待有十多天，3月份，日本翻译官，在罗文峪、古北口点上，抓住了二个日本人和一个翻译官。〈把翻译官〉放回去，给多少支枪，四个日本鬼子。

在老梁山，驻防，根据地。日本人飞机抛炸弹，5点钟。

茅山〔毛山〕失败也不知道多少人。

黑河川。

伙会头，日本人收枪，火气来了，收枪让我们手无寸铁。

火气来了，起义，抗日。

孙永勤一家子，干哥弟兄在下板城被杀害。

第八队：开始二十多人，后来三十多人。

老道跟孙永勤，只见一次。

孙永勤没有说过共产党，听说延安有毛泽东拉起大旗。

杨副官说："日本人和人［当地方言，对人亲和之意］，打包票，上不了当。"

跟他到关里，没有子弹，给换军装。

二十八个弟兄：记不准，本地人没有真名。

日本人占奉天，我在纺纱厂当工人，受不了日本人的欺压。〈跑到〉北票，到煤矿当工人，学习打洋铁壶。

日本人〈从〉大东峪方向开来四五辆汽车，堵住我们的去路，并打伤我们十几个。小青年给我们送水，中了埋伏。枪声嘟嘟，子弹像雨点，敌人换子弹时我们跑一阵，奔到了双庙子村。

孙永勤在黄水川〔黄花川〕挂了花，用四个人抬着，指挥战斗。

有两下子，不细致，没有八路军那样的纪律。

国民党杨副官讲话没有理论。

剩下一百多人，孙永勤队伍二百多人。

总队不够一千人，没有在一起开过会。

咱们中国是国，不要装土匪的心，要装中国的心。我们有吃有喝。日本人收枪，让我们空手。救国一心伙，不怕艰苦，打日本人。北京、天津的穷人吃豆饼。有活咱们帮老百姓干活，吃老百姓，喝老百姓。谁要犯错误处分，抢东西是开小差，〈不许〉奸淫妇女。

单忠英同志：

孙永勤是黄花川的人，比我入伍早两年，参加孙永勤队伍。

孙永勤队伍：



八队长：单忠英，30来人。每队不过100人。

九个队。

到茅山〔毛山〕不过5个队。

车河口：煤矿城。

（遵化县孔县长［应为“何县长”，下同］）当时没有子弹了，要求遵化县接济。

孔县长给我们开会，〈我们〉说，茅山〔毛山〕剿匪，子弹没有，怎么打？他说，河北省给我们送来，三两天就到。结果没有，赤手空拳，老是口上说有子弹，但总没有。

战区保安队。

〈我们〉身上围着秫秸秆子弹。

挂花来不及抢救。

我们在车河经常同日本人拼刺刀。

艰苦情形：经常吃不上饭。

带队走在前头，打围的出身，枪法个顶个。

茅山〔毛山〕南面三里店，我们明白了谁是汉奸。

张志全是稽查长。

茅山〔毛山〕东西，保安队围上我们，到处炮轰我们，跑不了就打，打不了就跑。

张守礼我们托人把枪藏了起来。藏到老乡家里，躲过日本的搜查。

孙永勤在茅山〔毛山〕自杀。听说自杀。

拜把子弟兄28人：谁要投降日本人，滚山，挨枪子，不得好死。

孙永勤尸首拉到遵化街头，放了三四天。

关于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

讲 述 者：单志华

讲述时间：1983年4月19日

采 访 者：栾福忠、邢连义

文件原名：《关于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访民众军八分队长单忠英之子单志华同志》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单志华同志说：

孙永勤在八沟一带是个财主，可能哥俩。日本进〈东〉三省时，1930年［原文如此］，孙永勤把全村人组织起来，变卖家产，买了枪支弹药。拿下第一个炮楼时，孙永勤第一个抱炸药冲上去。为人积善，要饭的可以记他的账，年底他算账。他的家当投入抗战里面。由于在东北的影响[1]，家属受牵连。他在板城、老梁山、辽宁北票一带，七队集中在老梁山为根据地。据说有上千人，军火靠劫日本人汽车。东北打了一些仗。

我父亲在沈阳（奉天）纺纱厂学徒，跟沧州一位老兄学武术，把兄弟不少。带着我叔要饭去东北的。兵工厂一个兵头太坏，让我父亲打了。以后就跑了，到了北票一个税务所当勤杂工。东北占了，北票也占了，板城修铁路，日本人抓了我父亲当劳工。日本人到年底不开工钱。我父亲没爹没母，二十四五岁，看到日本人就眼红。中国人受日本人欺侮不服气，宁折不弯。起义之前，孙永勤派一个姓洪的联络员到板城扩大队伍。我父亲好交朋好友，当过小工头，和姓洪的拉上了，跟父亲结合在一块，商量好了，领导铁路工人暴动。父亲挣的钱给哥们弟兄，有威信，都听他的。当时一位工友开汽油机，烧伤，在猪头山北沟养伤。都以看工友为名到猪头山北沟。人多，为日本人怀疑。一看事坏了，敌人怀疑，不早动手，就糟了。两个日本人烧火，我父亲用铁镐打死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人推到山涧之中。谁愿跟我走，不走，在这也活不了。不跟我走，可以回家去，再也不能给日本人干了。这一乱子出了，同志们不当亡国奴。从此以后，就往老梁山跑，日本人发现了，就追了上来。孙永勤听到枪声，就派张守礼来接应，上老梁山。我父亲枪法好，会武术，把他带的人编为八队，父亲任队长。一个叫张志全的是军参谋长，是共产党员，冀东区党组宣传部长，丰玉遵抗联主席（抗战时期）。茅山〔毛山〕以后，三个人除奸组领导人之一，以后牺牲，在沙流河为他树碑。张志全是弟兄拜把，冀东派出的党员。

东北辽宁一带，孙永勤打了仗，受到当地老百姓支援。

张守礼在茅山〔毛山〕受伤，〈住〉在老百姓家里。

---

[1] 单志华此处所说的东北，非指辽吉黑三省，而指的是关外热河省。



孙永勤七个队先进关，孙永勤让我父亲年轻的八队打阻击。孙永勤到洪山口摸了据点，日本校官四人被捕。进关之前开了军事会议：冀东县长是爱国，孙永勤到冀东可以支援枪支弹药，抗日。孙认为到关内可以发展势力。敌人四个师团围攻茅山〔毛山〕。我父亲后续部队追上后，前段打七八次遭遇战，挂彩，在大梁山［2010年7月，单志华更正为“大寨南山”］会师，后转吴家沟茅山沟〔毛山沟〕，被日军〈驻〉山海关、丰玉遵的四个师团围上来，当时孙部已弹尽粮绝。李运昌当时在冀东有活动，孙部站住脚，可以援冀东。战斗开始，敌炮向扎鞋底一样炮击。我父亲在另一个山头。孙永勤看到大势已去，把四个日本俘虏打死，自己也把自己打死。我父亲几个弟兄握大枪磕头，发誓突围出去，〈谁〉也不准当汉奸，谁当汉奸谁遭车轧。我父亲突围，冀东特区保安队有个吕大队长有民族气节，把我父亲捉住，给了一条活路：“从我们防区爬山走”。我父亲把枪藏起来。杜山，东北人。曹万林（北二里），不在了。我父亲到了北二里村，姥爷是保长，穷秀才，两面政权，为共产党办事，把我父亲藏在地窖里养伤。四人，曹万林穷得一贫如洗。

张维利，兴城人（迁西人）[1]。

父亲无家可归，待在曹万林家里。不行，没有生计，到城里打铁壶。成家以后，〈有人〉告发我父亲是民众军，把我父亲带到县政府。当时说他有武术，不能硬捆，骗至府院，捆了起来。问他是不是民众，受刑坚不承认。曹万林受刑不住，承认了民众。我父亲坚不承认，〈只说〉是民众让我们扛枪。敌人知道我父亲是民众。我父亲〈后来〉承认了是八队长，有枪支弹药。当时审问的是一个私卖军火的，我父亲抓到此事，翻译官不敢报日本人。后来我姥爷把曹万林保出，翻译官无奈，出了小价把父亲保了出来。我姥爷怕他走了再出事，结了婚，有了家，在城里租了房子，打铁壶。张志全参谋长来城里，发现了我父亲，回忆了茅山〔毛山〕战斗。张志全的余部有二十多人好小伙子，被伙会骗了，捉住，交给了日本人。被日本人全部开腹，没有一个投降，宁死不屈，在刘备寨河套。茅山〔毛山〕战斗，大部牺牲了。没有到茅山〔毛山〕的，活了下来。

我父亲起义是1933年。

张志全当时活了下来。父亲家被当做联络点，地下党张志全、张守礼和父亲是一个除奸组。

张志全当时说发展我父亲为党员。

“抗日先驱”。石崖都没树。传记都没有［指无人为牺牲者立传］。

“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谁愿投降日本，雷劈死，车轧死，天打五雷轰。

我父亲参加一次谈判。逮到日本人高级官员，拿弹药换回去，没有谈成。

张守礼受伤后，爬到石崖底下，一个胳膊负伤，用一支手把日本人开枪打死，爬到家里。

骗局时情形：抗日的，一切粮食军需负责，这面敌人空虚。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要是落空了怎么办？”

[1] 逃出的人之一，另外三个为单忠英、杜山、曹万林。

回答冀热辽分会有关孙永勤的几个具体问题

作　　者：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写作时间：1983年5月19日

文件原名：《回答冀热辽分会有关孙永勤的几个具体问题——有关孙永勤的资料》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冀热辽分会正史编写组：

你处写给承德地委党史办关于了解孙永勤情况的来信，地委党史办已转给我办。有关“热河烈士纪念馆”关于孙永勤的原始材料及资料目录我们不了解，请你们直接与“热河烈士纪念馆”联系。几个具体问题根据我们掌握情况提供如下：

一、孙永勤起义时间：根据我县党史资料、县志及采访“民众军”幸存战士的回忆，孙永勤起义时间是1933年12月11日。

二、1933年《塘沽协定》之后热河的统治情况。

根据我办掌握资料，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后，整个热河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我县1933年5月成立伪兴隆办事处。1933年4月在长城抗战激烈的时候，蒋介石下令所有沿长城各关口的中国军队，自动撤退到冀东各县，不准抵抗，如有言抗日者，以违军令治罪。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中国军队由茅山〔毛山〕、黄崖关退至通县河西。兴隆由日本人岛村英次郎（日本第八师团三十一联队队长）召集地方汉奸成立伪兴隆县办事处，执行伪满政府“国务院总务厅”所制定的“国境省县划分”政策、鸦片政策、土地政策、“铳器回收”政策、经济统治政策、国势调查政策、征兵政策、“治安肃正”政策（集家、扫荡、检举、下山自首等）等，镇压和统治兴隆人民。“铳器回收”政策的执行是靠伪兴隆办事处、伪警察机构和地方爪牙收缴民枪的。

三、孙永勤起义后，既捣毁警察署，也打击日寇。

即1934年3月在迁安滦河沿、贾家安、暖河塘附近，截击日本的面粉三船，打死日军20余人，缴获大米白面3000余斤、衣服350件。

1934年3月20日袭击潘家口日本禁烟局，击毙日本人7人，得枪十余支。

1934年5月以前还袭击了车河口、半壁山、佛爷来、罗文峪、洪山口等警察署和警察据



点。还有在承德县的上谷车站全歼日伪军30余人。1933年3月在青龙县鞍子岭，孙永勤部与日寇骑兵激战，击毙日军70余人。

四、赵四川是黄花川人，是孙永勤的同乡。张福义是兴隆县八卦岭村农民，于1934年2月于本村组织100余人起义，收缴本村地主枪支，奔车河口与孙永勤会合。李连贵是兴隆县苇子峪村农民，是本村自卫团团总，于1934年2月组织18人在苇子峪村起义，收缴杨树林村地主枪支50余支，袭击白旗营敌军据点后，转至北山坚持抗战。年焕兴是兴隆县蓝旗营北山人，农民，1934年3月组织20余名农民在蓝旗营村起义，转至北山与李连贵部会合，围攻佛爷来警察据点后，奔往黄花川与孙永勤会合。关元有是兴隆县王宝石村人，与孙永勤邻村。

五、1. 1934年5月，冀东区党委成员王平路〔王平陆〕曾派人与孙永勤联系。1935年3月，王平路〔王平陆〕同志在兴隆与遵化交界的长城一带与孙永勤亲自会过面。

2. 根据李子华同志提供材料看，冀东区党委曾派老陈（不知姓名）、刘玉林等三同志在1935年春到孟家铺组织游击队时，与孙永勤取得联系。孙永勤对我们提出要求：一是要委任，二是要枪和子弹。老陈同志、刘玉林同志回冀东区党委汇报请示此事，还没有回音，1935年4月，孟家铺游击队又与孙永勤联系，孙永勤率队进入口里，5月即牺牲。

3. 1934年4月，刘玉堂派共产党员刘俊岳到口外赵韩庄一带找迁安县委负责人韩东征同志，汇报孙永勤部队情况。韩东征同志对保守党的机密，斗争前做好准备工作，对部队的纪律问题——不许打骂人、不拿群众东西、不得奸淫妇女、不携军火、不逃军等作了指示。

4. 根据原迁遵兴联合县委书记宋诚同志提供，1934年吃青棒子的时候（约在8、9月份），京东特委派大张（山东人）、小李（山西人）来遵化县，委派共产党员樊凌喜〔樊凌玺〕去黄花川与孙永勤联系。樊凌喜〔樊凌玺〕同志从孙永勤处返回后说：孙的部队没法做工作。樊同志回来时在路上饿得啃青棒子。

5. 据刘俊岳同志1961年8月9日回忆，由于部队（指孙永勤义勇军）发展迅速，存在时间较短，所以党员数少，工作薄弱。党没有有组织地派进部队和党员，只是在部队组织起来以后，知道底细的同志之介绍或在串联中间，“有关系没有”（指是否党员），这样把党员组织起来。在部队发展到3000人左右时，有党员20人左右。发展到5000人时，才有党员25~26人。党内有指导员刘玉堂同志。党员虽少，但一般却相当于排级以上干部，负一定责任。该部队中党组织没有建立系统的党组织，而且还是秘密形式下存在的，都是秘密状态下开会研究工作……

6. 对刘玉堂同志的身世、经历和进入部队的情况，无处了解。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我党组织与孙永勤有过联系，有一定影响，但还是没能经常深入到其部队核心中工作，没有在该部队核心中进行领导。因此还不能说这支队伍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队伍。

六、孙永勤牺牲地点及余部情况。

根据我们的资料和敌方情报确认是在遵化茅山〔毛山〕。孙永勤余部一部分突出重围回兴隆，如李连贵、年焕兴、张福义领导队伍继续在兴隆抗日。后来李连贵、张福义在战斗中牺牲。年焕兴参加了冀东大暴动。茅山〔毛山〕战斗时还有一部分战士家是遵化茅山〔毛山〕附近的，就回家了。

以上提供的情况，不一定完全准确，仅供参考。

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3年5月19日

抄送：承德地委党史办

孙文孝谈父亲孙永勤

讲 述 者：孙文孝

讲述时间：1983年5月31日

采 访 者：朱素清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勤今年91岁，起义时是42岁。我爷爷他们弟兄四个，我爷排老二，叫孙静昆，是傻子，我奶奶当家，大家都叫她孙二奶奶。我父亲他们也是弟兄四个，我父排老三，大大爷叫孙永彬，二大爷叫孙永连，四叔叫孙永山。他们弟兄四个都念七年书。我父是在洒河〔潵河〕二堂胡椒峪念书，老师叫李桂潘〔李桂攀〕，受老师一些影响。当时老师抽大烟，别人谁也劝不了，我父说服了李老师不再抽大烟。我父从小喜文爱武，好练武术动〔刀〕枪。18岁时就拿事，孙杖子村谁家有个大小事，置房子置地都爱找他。

那时我家有22亩地，后来分家，我父分得7.5亩地。

1931年就开始活动，到1933年才拉起队伍来。起义时有鹿同沟〔路通沟〕的赵来、赵林、赵友〔赵有〕、马保德，还有赵四川、关原有〔关元有〕等共七人。接上队伍的有年焕兴、李连贵，他们从柳河口得枪6000余支。以前有5000余人，到二堂就有6000余人。第一次围剿大成兴，后来大成兴要围剿我父亲，有亲戚告诉了我父。我父又第二次剿了岳家大地主，剿的有武



器、大烟等。第三劁的是杨二合，是他山〔塌山〕公社（宽城）。他们开始时叫伙会，后来叫民众军。

雷永兰说："孙永勤走时说：，□妻子、□父母、□儿子、□闺女，先治国，后治家，不当亡国奴。"［原文如此，当为雷永兰不记得原话了］

我父走后，我母带着孩子在家根本也待不下去，到处流浪。先到毛文峪改姓陈，第二次到黄瓜峪〔黄花峪〕改姓王，第三次跑到河玉桥改姓任，最后又到遵化左家务〔左家坞〕改姓张，整天改名换姓，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我父走后，我二舅管我们全家。二舅叫雷永和，现住宋杖子大队北大地。黄瓜峪〔黄花峪〕的史玉华〔史耀华〕知道孙永勤的情况。

有一次，在三道河公社透眼山〔透骨山〕，日本鬼子去包围孙永勤，叫把枪都集中起来，要收走。日本队长也知道我父厉害，就说，你孙永勤有本事把我大拇指打中，我就不收你的枪了。结果我父真地把他大拇指打掉一节。这事莫俊荣知道，他支援过孙永勤。

老梁山（色树梁）在大杖子石坟进沟，打过几次仗。在黑锅顶打过仗，那次叫年焕兴抓过一个日本头子，半路不走叫年焕兴给毙了，后来又抓了个佐藤。

高作忠去告孙永勤的状到马拐子那里。马拐子来孙永勤家住七天，说投降孙永勤，叫孙永勤去遵化。我父信迷信，叫小老道给算卦（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能不能去遵化？小老道说，得去遵化。小老道跟孙永勤一年多了，结果小老道给告密了，他走到齐河岭就跑了，离开了孙永勤。

孙永勤去遵化前腿部挂花，肿得大老粗。他是阴历四月间牺牲的。

根据其子孙文孝的回忆整理

朱素清

1983年5月31日

孙文阁谈孙永勤的情况

讲 述 者：孙文阁

讲述时间：1983年6月1日

采 访 者：栾福忠、邢连义

文件原名：《孙文阁谈孙永勤的情况》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勤，1891年生人，属大龙的，〈如活着，今年〉92岁。

他家8口人，三儿三女，六间房，一骡一驴，100多亩地，雇一扛活的。地都租出去，靠吃租子。他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读过私塾五六年，老师是张杖子的，姓关。

车河口大成兴是财主，给土匪供枪。孙组织团会把大成兴抄了，后来大成兴抓孙永勤，没办法，到路通沟起义（大约在民国24、25年，腊月十一日）。回来后，给我做工作，要我参加义勇军，打土匪。我不去，就捆上我了。我参加一个多月，开始就到张杖子张如增（大财主）家，张交了30多支枪，弄了五六百斤［原文如此］银子，还得了一些衣物。在他家吃住好长时间。

孙永勤也干活，日子好过。他母亲叫“二奶奶”，待人热情。孙常年雇一人干活，全年打三四十石粮食。

1933年12月8日，在二堂子大财主高作中〔高作忠〕家弄了20支大枪、三四支手枪、一台车子、一匹骡子，消灭敌人五个，得了一驮子洋钱，我们分了点，剩下都买武器了。在打半壁山据点〈时〉，我负伤。这次我们砸了局子就跑，鞋都跑丢了，趟着滦河过去的，冻得腿都不能回弯。

在同年十二月十八九日，在遵化舍身台打了一天一夜。日本人很多，我们50多人，打死四五个日本人。几次突围，冲出了敌人包围。

在高作中〔高作忠〕家，敌人包围了，孙永勤带领我们冲出去的。

孙永勤勇敢、胆子大。纪律很严格。

有时候没鞋穿，就不让孙永勤知道，跟穷人要，他要知道就得挨处分。财主家的东西可以动，不给不行，不管是谁。有一次，我们到王宝石去，路上正好碰上他妹夫（财主）。说了几句话，关仁和刚要往下走，孙永勤就说，捆上他，叫他把枪交出来。弄了四支枪。凡是财主都先捆上他，交出枪来，拿枪放人。



在茅山〔毛山〕战斗，孙、关牺牲，头都叫敌人割去了。这次是夜间包围了，一直到早晨。这次是受骗了，敌人说给大枪，结果上当了。

孙永勤常对我们说：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财主家的拿可以。不许开小差。有一次我想家了，跟孙请假说我母亲病了，他说明天回来呀，不许强奸妇女，土匪才强奸妇女。

孙永勤有威信，都听他的。

起义开始十几个人，最多3000多人。

孙永勤很能说，在农民中有威望。

孙文阁谈孙永勤的情况[1]

孙永勤部队最多时三千多人。

孙永勤属龙的，“龙年生人，蛇年讲命”，今年有92岁。

1983

92

——

1891

［原文如此，当为采访者在计算孙永勤出生时间］

孙永勤100 亩地，一头驴，一头骡子。人口：八口人，三闺女三儿子。房屋六间。

孙永勤有文化，读私塾五六年。唱唱呜呜，乐唱的人。

孙永勤弟兄五个，孙永勤是老三。

孙永勤读书在张杖子，老师姓关（官家庄）。

孙永勤办事吃不了亏。

孙永勤打匪，大成兴煤局子〈给土匪运子弹〉，（中华民国）［指日军尚未侵入热河前］，有子弹被伙会卡住。大成兴通匪，打了大成兴，掌柜逃走，把一个伙计枪决了。大成兴反扑，捉拿孙永勤。抓住〔了〕一冬天，没有抓到孙永勤。

孙永勤家中有枪，自卫团总。

民国24、25年（旧历十一月十一日）。

孙永勤不恶不孬，谁欺侮他不干，手艺什么也不会，农人。

[1] 此为栾、邢二先生采访孙文阁时，同时作的采访记录的另一篇。

孙永勤热爱人。

他爷爷、爹爹都会过日子，放债。

孙永勤吃点租子，帮着不足。每年起租40多石粮食，一斗顶两石。

孙永勤就是敢干，没有军事，和八路军接上头就好了。

孙永勤父母为人老实。父亲老实，母亲能说会干，会过日子。提起孙母“二奶奶”，三里五村都知道。

二道河被围情况：起义那年腊月（腊月十一二这两天，九日有月亮），舍身台、刁山岭打一天一夜，消灭敌人十多名（我方50多人），我方逃走20多人。日本人当时，敌人先围上我们，我们没有开枪。我〈们〉摸近敌人，看见敌人再打。我们从山下摸到山下［原文如此］，和敌人接火。一个伤员留下，被日本用刺刀挑起。（机动灵活）。

半壁山局子警察署得枪20多支，有车子、一头骡子、一驮洋钱。敌人收税的，消灭敌人四五个人。后来用洋钱买枪支弹药，每人分得40块洋钱，三只手枪。旧历腊月初十，和起义相差一个月。警察署被打之后，在洒河〔瀫河〕二道河高作忠家中被围。日本人抓去四个站岗〈的〉。敌人围到窗户跟前，孙永勤用手枪冲开一条路，冲出敌人包围。

第二年春天。

抗日救国军，穷人东西不用，谁要穷人东西挨处分。财主有衣、粮都要，有枪就得交出来，不交不中。

孙永勤就是敢干，胆大，有勇无谋，几次被围，几次突围。

探亲，孙永勤妹夫有枪，是财主，绑了起来，让其拿出枪支。坚决，不给枪不行。〈王宝石上庄子，关仁和〉拿出了三四支枪。

城墙峪财主张奎一有枪，交出四支，还有五六支枪，没有交够，把其过继的儿子枪决。

车河梁三义儿［疑为“三岔口”］被围，被日本人打死十多个人。

大彭杖子煤局，大成兴东家，打了一个多月，用炮炸毁了敌炮楼。孙永勤200多名民众军。

打宽城，遵化说付款20000元，受骗被围。

孙永勤和我们经常讲：不许拿老百姓东西，吃饭要吃有钱的，不客气，跟八路一样。

赶不上吃穷人的。

一个战士拿老百姓东西，被打跑了，枪丢下了。

奸淫妇女〈按〉土匪论罪。

谁给敌送信，〈把谁〉抓住，孙永勤非常赞成。

张杖子打了之后，粮食分给穷人。

孙文阁谈孙永勤的情况[1]

孙永勤1893年生人，属小龙的，91岁。

他家八口人，三儿三女和老伴。六间房，一骡一驴，有土地一百亩，雇一人做活。土地大部分都租出去，靠吃租子。他兄弟五个，排行老三，读过私塾五六年，老师是张杖子的，姓关。

车河口大成兴是财主，给土匪供枪。孙永勤组织团会把大成兴抄了，后来大成兴抓孙永勤，孙没办法，起来抗日，抓财主，打土匪。到路同沟〔路通沟〕起义，大约在民国22年腊月十一日。回来后给我做工作，叫我也参加，我不去，两个人把我捆上了。我参加一个多月，开始就到张杖子张如增家（财主），叫我们给抄了，得了卅多支枪，五六百斤银子，还得了一些衣物。在他家吃住好长时间。

孙永勤也干活，日子好过。他母亲叫“二奶奶”，待人热情。孙常年雇一人干活，全年打三四十石粮食。

1933年12月8日，在二堂子大财主高作中〔高作忠〕家弄了20支大枪、三四支手枪、一台车子、一匹骡子，消灭敌人五个，得了一驮子洋钱，我们分了点，剩下都买武器了。打半壁山局子，我左膀受伤。砸了局子就跑，鞋都跑丢了，趟着滦河过去的，冻得腿都不能回弯。

同年腊月十七八，在遵化舍身台打了一天一夜。日本人很多。我们50多人，打死四五个日本人，几次突围，冲出了包围圈。在高作中〔高作忠〕家，敌人包围，是孙永勤带领我们冲出去的。

孙永勤勇敢，胆子大，纪律很严格。没鞋穿，有的背着孙永勤跟穷人要，孙知道就得挨处分。财主家的东西可以拿，不给不行。有一次我们到王宝石去，路上正好碰上孙妹夫往下走。说了几句话，关仁和（其妹夫）刚要往下走，孙永勤说：“捆上他！把枪交出来。”弄了四支枪。凡是财主都得捆上他，交枪放人。

在茅山〔毛山〕战斗，孙、关牺牲，头都叫日本割去了。这次是夜间包围的，一直打到早晨。这次是受骗了，敌人说给大枪，结果上当了。

孙永勤常对我们说：“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不许开小差；不许强奸妇女。有一次我想家了，跟他（孙）请假说我母亲病了，他说：“明天回来呀！”

孙永勤善说好唱，有威信，都听他的。起义开始十几个人，最多达3000多人。

栾福忠、邢连义采访

1983年6月1日

[1] 此为栾、邢二先生采访孙文阁的整理稿。

关于张如增情况

讲 述 者：张如山

讲述时间：1983年6月1日

采 访 者：栾福忠、邢连义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张如山（孙杖子公社张杖子大队人）：

我在张如增家中扛活，给他家放羊。张如增的爹（父亲）叫什么我记不清了，我知道张如增爹那辈是承德和遵化一带较有名的地主。我扛活时，他家每年收五六百担〔石〕租子，家中有20多口人，有五个长工扛活，一大部分土地租给人家耕种，每年收租。

孙永勤是孙杖子的富户，吃租子，放粮债。张如增放债是春天借一斗，秋后还两斗，加码子利息（加倍利息）。孙永勤对揭不开锅的穷人，借粮不要利息（特别穷的不要利息，有的也要几成利息），实在还不起的，就拉倒了。

孙永勤起义原〔缘〕起是，孙永勤听说闹匪时，土匪（绺子）有两箱子弹藏在“大成兴”。“大成兴”是富户老岳家开的，老岳家是车河口的大地主。孙永勤抄了“大成兴”，搞出了子弹。老岳家不让了，报告了日本人，说孙永勤是匪，是胡子，日本人就到处抓他。孙永勤就跑了，到路同沟〔路通沟〕一带，联合了几个穷人，拉起了队伍。谁家有枪跟谁要，动员百姓参加他的队伍，要打日本人。

孙永勤跟老张家要枪，不给枪就绑人，老张家把家里护院的20多支枪送给了孙永勤。孙永勤成帮后，张如增全家都搬到外地去住了。

张如增对穷人表面上都是有手腕的，平时骑着毛驴，见人就下来，打招呼。谁家穷了，揭不开锅，吃顿饭不算啥。

孙永勤起队伍，在五凤楼打了胜仗，缴获了两个日本人，一个翻译，带到了老梁上。结果放走了一个翻译，说给枪子弹，就放走两个日本人。谁知放走了翻译，人家带来了队伍，包围了孙永勤，受了损失，逃了回来，到黄花川一带活动。

孙永勤就是敢干，有了子弹就打一阵。谁家有枪跟谁要，不给就绑起来。

孙永勤我觉得他是有勇无谋的人，没有和党接上头，所以败了。

张如山谈[1]

张如增每年收五六百石租子。

家中20多口人，扛活五个人，其他租出土地。

“金银堂”、“吉庆堂”，张如增。

张如增的爹和张如兰的爹是哥俩。承德地区和遵化县境等地最大的地主，较有名的大地主。

孙永勤是中农户，吃点租子，放点粮债。穷人揭不开锅的，别人都借一斗还两斗，加倍利息，孙永勤不要利。

孙永勤，罗降梁闹匪。

车河口大成兴是南河〔暖儿河〕口老岳家开的。孙永勤抄了大成兴，“大成兴”掌柜和老岳家报告了日本人，说孙永勤是匪，是胡子，就抓他。

孙永勤抄大成兴的原因，是大成兴有两箱子弹，是老奉军当匪后存在那里的。

孙永勤是有勇无谋的人，气粗，胆子大。

孙永勤到路同沟〔路通沟〕，联合了穷人，拉起来。谁家有枪跟谁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队伍。

张如增20支枪交给孙永勤。

国民军打垮之后，张如增收了一些枪，护院用的。张如增、张如兰两家拿出24支枪。

孙永勤家中干点活，有时雇一个伙计，有点文化。

孙永勤成帮之后，张如增全家都搬走了。

张如增每〈年〉收100多石租子。

张如增到哪去都骑驴，见人下来问话。谁到他家吃饭不算啥。见到花子也说话。

中农户、富农、地主都有枪。地主不出人就出枪。

车河口的地主枪收了不少。

孙永勤到哪儿要点子弹，就打一阵。

孙永勤抓住两个日本，一个翻译（五凤楼）。日本人说给写信，参加保安队，给你们子弹，结果上了当。

打一阵走，追敌人追不上也就撤了。

孙永勤在五凤楼打胜仗，20多支枪收缴。

活动在黄花川，不上当，队伍保存下来。

孙永勤说打就打，有勇无谋，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所以失败了。

---

[1] 此为栾、邢二先生采访张如山时，同时作的采访记录的另一篇。

访刘俊岳同志

讲 述 者：刘俊岳
讲述时间：1983年6月15日
采 访 者：栾福忠、邢连义
采访地点：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柏各庄农场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77岁〔当指刘俊岳的年龄〕

时间：1983年6月15日上午8时10分

地点：刘俊岳家中

参加人员：柏各庄农场（二队）十一分场党委秘书李庆春

谈话记录：

刘俊岳同志，现住唐山市唐海县十一分厂。

我从家中走时，四月初七到孙永勤部队去的。河南大峪有个叫雷庭玉〔雷常玉〕的是大队长，“磕巴”。燕子峪赵帮海〔赵邦海〕是中队长。这些人都没了。

我在孙永勤队伍，去四个月，打乌龙矶，砸局子，消灭敌人四十多人。我们去二百多人，孙永勤当时参加了战斗。

茅山〔毛山〕我们有三千多人，我们如果在兴隆小山不会有那事。茅山〔毛山〕时，我们从东面冲出去了。在黄台子吃了饭，五指山前怀。在黄台子我们解散了。

我当时是中士，管号房子、粮食。

我是党员，我们之间谁是党员也不知道。我是1930年入党，我在黄槐峪大队入党。入党原因，刘昆明当甲长，我有一亩地，旗地改民地，改刨荒地花钱多，一亩地掏三块现大洋，应着再给不中。越说越多，我打了甲长。甲长有权，报告警局，去巡警抓我。我拿锄下地，甲长领着两个人，拿绳绑我，把我打了。

前韩庄，韩东征、韩有信（子英），在我们家介绍我入了党。

我在孙永勤部队，韩东征是县委的。

第一连，刘玉堂是指导员，负责讲话，雷庭玉〔雷常玉〕连长，我是中士。我在部队中，党员不开会，不会召集党员开会。

我在部队回来过一次。找到韩东征，韩东征让我回来，以后有啥情况再说。

我们当时自觉参加的，不是有组织派去的。刘玉堂是哪的人，我不清楚。不打听哪的人，怕落网遭联络〔连累〕，失败。谁也不说是哪的人。我傻了一辈子，总是叫一个刘俊岳一个名字。刘玉堂说不准是个党员，但一定是担任指导员。

刘玉堂先去，我后去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我去的时候叫救国义勇军，有红旗。大队中队都有旗帜，〈上写〉“抗日救国军”。

赵帮海〔赵邦海〕是中队长。

四月初，我没有去前面就改了称号。

我在滦河西长河峪上的学。

我跟孙永勤战斗四个月。

孙永勤亲自指挥，没有去。

袭击潘家口战斗经过：我们一连队去一百三十人，潘家口是警察署，据点，消灭敌人四十。夜间包围，凌晨3点收拾干净。滦河沿去一部分，占领山头要道，冲进去消灭敌人。打了二百发子弹。

袭击车河口，两个连队，我们参加了。

赵帮海〔赵邦海〕中队长率领。

夜战歼敌是孙永勤的一贯战术。

车河口消灭一百多人。

敌人还击时，我们多一半冲进大院。

我们牺牲三四人，敌人死了四五个，放走一部分。

有十多名俘虏参加了孙永勤队伍。

缴获八十多支枪。

回五指山整训，练兵下操

1934年5月，指导员刘玉堂让我去找韩东征，问韩东征暴动。韩说：“暴动没有到时间。”我们想里外接应暴动，我汇报了孙永勤情况。前韩庄，在峪古寨［疑为“渔户寨”］找到韩东征。韩东征四十多人开会。韩东征是游击县委，县城被敌人占领。

韩东征跟我说：你回去，有什么紧急情〈况〉再来。暴动不到时候，没有枪支哪能暴动？

1934年6月，打半壁山警察分驻所。夜间十点钟打的，去了三百多人。

赵帮海〔赵邦海〕中队，三个连队，孙永勤去了。孙永勤那是打一个地都怕拿不〈下〉来，都亲自参加，他领着走的时候多。不让白搭一粒子弹，不见敌人不发枪。把院围占好，孙永勤带头冲进去。孙永勤都是亲自领阵，不是站在一边指挥。孙永勤都是先撂倒哨兵。将胆大，兵也胆大。放火烧了半壁山，把粮食分了。

半壁山战斗9点开始，两点钟收拾利落。

打孤〈山〉子据点经过：是我们连队打的，赵帮海〔赵邦海〕领着去的。

打罗文峪据点：四连、五连，四百人。

我们是第一连，刘玉堂是指导员。雷庭玉〔雷常玉〕是财主的儿子，“秧子”“油子”。雷庭玉〔雷常玉〕是不是党员我不清楚。关外的党员，说不准。我们打仗勇敢。

打洪山口。

九虎岭打仗经过：宽城失败时候，站岗都没有，敌人占领东山，牺牲不少（三个连队被围），我死伤八十多人。九虎岭我们走大路，在九虎峪〔九虎岭〕休整，夜间敌人占领，夜10点。打不了就跑。

打宽城，宽城不是县。区长刘玉书是关里人，迁西县米口人。我参加了，孙永勤没有参加。

老梁山一带，团员乡下人，熟悉地理。

老梁山被围，敌人有六百多人包围，没飞机。我们被敌人打死三十多人，敌人死了一百多人。“舍死能敌万人”，不等死，冲了出来，善罢甘休。怎么也是死，豁出命冲了出来。革命不是请客送礼。

茅山〔毛山〕没有树，没崖，没有松林，没有树木柴草，干干净净。感觉茅山〔毛山〕高，没有经验。茅山〔毛山〕活动，敌人看得真真的，一行动，四周哪儿都能看到。孙永勤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

我在茅山〔毛山〕跑出来，赵广海等人［原文如此］，在黄台子吃了午饭。

刘玉堂在孙部是连队指导员，我知道他是党员。

刘俊岳1930年入党，韩东征介绍。

我参加孙永勤部是和刘然一起去的，刘然听说孙永勤暴动后告诉我的。我从小喜欢枪，刘然在我以后是党员，他没有参加孙部，胆小，我自己跑去的。我自愿去的。

刘玉堂身份是指导员，我是中士。

我找韩东征，问问暴动什么时候。韩东征说，我听上面的，得李运昌说啥时候，才能暴动。让我先回去。

暴动是抗捐、抗税、打土豪、分田地、打日本。

韩东征对孙部没有什么指示，有孙永勤指挥，韩东征不会说啥。各有各的权，各有各的队伍。

韩东征跟我说：多起作用，不要投降叛变，以后我们能结合上好起作用。我回队后跟刘玉堂说了。

（红军进平西，冀东暴动）

在十三团二连我跟刘玉堂见过面，他还是十三团二连指导员。

1936年6月19日，我参加迁西暴动，一百九十人参加。

我们提出的问题：

刘玉堂，我在十三团二连我才知道刘玉堂是党员，在孙永勤部我不知道刘玉堂是党员。党员没有开过会，谁也不暴露是党员，也没有人问谁是党员。我不知道刘玉堂是哪的人，是不是党员不知道。在孙部没有党员活动。孙部有多少党员不知道，我是党员别人也不知道。

孙部最多我估计有三千多人，人不少。

党员在孙部不知道谁是，也没有开过会，都是孙永勤怎么说我们怎么办，都听他的。

孙永勤是个团长来着。他们暴动时听说有七个人，在庙里“钟鼓齐鸣，有个命大的”，才起队伍。他把村里的枪收来才暴动。

我不认识何子桥。听说过，没有见过，见过也不认识。何子桥听说有他，后来没有听说。

何广永我没有听说过。听说过何子桥的名字，没有真见其面，是哪个人不认识。

我在十三团二连也是中士，管号房子、伙食。

我在孙部没有当过中队长，没有文化，号房子花一百元我记个数，零碎账不会记。

何子桥我听说有这个人，没有见过面。

我知道自己是党员，也没有打听过别人是不是党员，也没有开过会。刘玉堂我叫他指导员。我和韩东征汇〈报〉是问一下暴动时间，联系起来好力量［原文如此］。韩东征没说暴动时间，不过，让我好好干，起作用，不投降叛变。在孙部不知道谁是党员。

访刘俊岳[1]：　1983年6月15日上午

地点：唐山市，唐海县第十一农场二队

采访人：栾福忠、邢连义、李庆春（十一场党委秘书）

我今年77岁。

我四月初七参加孙部队。〈具体队伍是〉河南大峪雷庭玉〔雷常玉〕大队，他是大队长，燕子峪赵邦海〈是〉中队长。我去四个多月，打乌龙矶据点。我们去了二百多人，孙永勤也去着，打死四十多敌人。孙杖子，撒河桥〔潵河桥〕我一个亲戚说，孙的爱人现在还活着。打茅山〔毛山〕三千多人，我也去了。冲出来，我和雷庭玉〔雷常玉〕在黄台子吃的中午饭，解散了，我就回家了。

我在孙部是中士，管号房子、吃住。我是1930年入党，在黄花峪〔黄槐峪〕。我是怎么入党的呢？村里刘坤明当甲长，我家一亩地，旗地改民地，改刨荒地，花钱多，一亩地掏三块现大洋，应着再给不中。越说越多，我打了甲长。甲长有权，报告警局，去巡警抓我。我拿锄

[1]　此为同次采访的另外一份原始记录。

下地，甲长领着两人，捆上我，把我打了。前韩庄韩东征、韩子信（子英，1928年入党）在我家介绍我入的党。韩东征是县委的。在孙部党员不公开，互相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党员也不清楚。没有党的组织，也没开过会。刘玉堂是哪的人不知道，不知是党员不。我去他就在孙永勤部队，当时他是连指导员，雷庭玉〔雷常玉〕是连长。我是连里中士，我们是第一连。孙永勤很坚决，不知是不是党员。给我们开会，一站队他就讲话。刘玉堂我们都是自己去，不是党组织派去的。日本人抓我，听刘然（是党员，胆小没参加孙部）说孙永勤暴动了，我去找孙永勤。我去时大队、中队都有旗，当中有月亮，上头写着“救国义勇军”。我去二十多天，指导员就叫我回来一趟，找韩东征〈问〉暴动不（迁西），并汇报我们部队打仗情况。我在于孤寨［疑为“渔户寨”］见到韩东征，他们四十多人正开会。我跟他说了，他叫我先回去，有事再来。〈说〉暴动还不到时候，没有枪怎么行，都得听李运昌的，李说暴动才暴动。韩没说别的，有孙指挥。我记得他叫我们好好干，不投降，不叛变，多起作用，以后暴动关里关外接应，就会合了。我回来跟刘玉堂说了。在十三团二连又跟刘见一面，还是连指导员，这时我知道他是党员。我跟孙永勤四个多月，打潘家口。雷庭玉〔雷常玉〕我们去一个连，一百三十多人。打死四十多敌人，夜间3点多钟打完了。我们滦河沿一部分人，先把山头站好了，打了二三百发子弹。打车河口，两个连，孙永勤指挥这个战斗，都听他一人的。赵邦海是中队长，管三个连，大队长忘了。这次也是夜间偷袭的，敌人不备，车河口一百多人，我们四面包围。敌人还击晚了，我们都冲进去了。打死四五个人，都俘虏了，得枪八十多支，放一部分人，十几个都参加我们部队了，我们牺牲三四个人。回五指山整训，练兵，下操。王平陆听说过，干啥的不知道。打半壁山，夜里12点钟去了三百多人。赵这个中队，三个连，孙永勤也去了。孙打哪都怕拿不下来，领着去。提前怎么打，他都讲。子弹少，不让把子弹白打了，不见敌人不能开枪。在战斗中都带头冲，亲临战场，真像干部样。弄得粮食分给老百姓，其他东西都烧了。打了十多个钟头（两点开始的）。打孤山子二百多人，也是赵庭玉〔雷常玉〕领着去的，我是第一连的。雷庭玉〔雷常玉〕是大东峪大财主，说不准是不是党员。打九虎岭，宽城失败的时候，连岗都没有，敌人把东山占住了。我们去了三个连队，死伤八十多人。我们走的大道，想在那休整，结果失败了。也是在夜10点多钟，敌人还没睡。我们一看不行，就跑了。刘玉书是一个区的区长（宽城不是县），迁西米河口人。打宽城我去了，孙永勤没去。在老梁上，那时乡下有团员，他们消息灵通，地理熟。在老梁我们四百人，敌人六百人。我们死伤三十多人，敌人也死亡一百多。在茅山〔毛山〕我们占的大山，连树都没有，敌人包围了，如果占小山走着也便利。

孙起义前是自卫团长，开始七八个人，庄里把枪集中暴动的。

何子桥听说参加过孙的部队，是党员。

我参加二十多天后找的韩东征汇报，在茅山〔毛山〕战斗以前。



关于孙永勤情况

述　　者：雷永兰

讲述时间：1983年6月25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雷永兰讲：

我17岁和孙永勤结婚。他家有七亩半地。孙永勤看书有瘾，“看三国，瞅六国”，快吃饭了也要看，经常饭都凉了，还在看书。有时通夜地看书，一夜点半斤灯油。我因为不让他看书，他经常骂我打我。

孙永勤起伙会，联合路同沟〔路通沟〕七个弟兄，在积银堂开会。

孙永勤起队时说：“先安国，后治家。抛妻子，甩父母，也要打日本，不当亡国奴。”他跟家里人这样说，跟弟兄们也常这样讲。“打垮了日本，再用八抬大轿接父老乡亲。”

孙永江说媳妇，要一头猪才把媳妇送来。孙永江日子穷，给不起。孙永勤从家里抱了一头小猪，六斤多，给送去了。娘家逗得哭笑不得，〈孙永勤说：〉“你们说一头猪，我就送来一头猪，你们没说大小。现在小猪，养大了就是大肥猪。”把大伙说乐了，欢欢喜喜把姑娘送来了。

孙永勤起队伍，我和大闺女跟着三个月。后来更名改姓，不敢姓孙，到处流浪。

孙永勤弟兄四个，排行老三。老大孙永宾［有的写作“孙永彬”］，老二孙永连，老四孙永庭。全家二十多亩地，分家得七亩半，房子有六间。

1983年6月25日上午

骆凤庭谈孙永勤

讲 述 者：骆凤庭、阎龙

讲述时间：1983年12月29日

采 访 者：栾福忠

文件原名：《骆凤亭〔骆凤庭〕谈孙永勤》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谈话笔录[1]

骆凤亭〔骆凤庭〕：

我1932年我当迁遵兴县委书记。1933年迁遵兴县委书记［原文如此］。

我有个兄弟叫骆凤明〔骆凤鸣〕。

我派过马子敬支持孙永勤。

马子敬是孟家铺游击队。

1933年派李子华，区委委员，与孙永勤联系。1933年或1934年，我记不很清了。

铁厂北店有共产党员高存在那里活动。高存与我们常有联系，1933年后半年跟我说，他在口外有一个他介绍入党的同志，姓关，关元有同志。他跟孙永勤暴动打日本，那面有消息时，请你支持。我听说孙永勤暴动消息，派徐英，由高存〈写〉介绍信一封，找到姓关的。徐英，迁安县，省委派来的人。高存〈在〉当时迁安一带、板城起过暴动，负责铁厂一带工作。省委派徐英负责军事方面工作。徐英到孙部〈后，写信说〉急需药品。我收到信后，我派兄弟、共产党员骆凤明〔骆凤鸣〕、阎龙（贫农党员，八路军），给孙永勤送去三支好枪、七支旧枪，套筒、汉阳造，一箱子治外伤的药，自筹的资金，送给关元有。

第二次，我们县委决议支援孙永勤，在孟家铺开会。孟家冀热边［原文如此］，开辟一个临时根据地，地处山区。我〈在〉王家铺、牛圈子一带活动，开辟根据地。李子华同志曾给孙永勤送过武器、弹药，跟我汇报。孟寿田是孟家铺的教员，日本投降时牺牲于承德柴禾兰子〔柴火栏子〕。

我任县委书记时，有樊凌喜〔樊凌玺〕，有王平路〔王平陆〕。我认识王平陆，在遵化县委。

[1] 此为栾福忠先生采访骆凤庭的原始记录。



我兄弟跟我汇报，孙部在口外站不住脚，要开进口里。第二次派阎龙接头，取〔与〕孙部联系。走到岳各庄，正好打仗。孙永勤受伤，用椅子抬着他。

孟寿田就是冀光，是小学教员，当时派他与孙永勤联系过。

我派过李子华、马子敬与孙永勤联系。

我派李子华、马子敬于1934、1935年期间与孙永勤联系，送去了一批枪支弹药。

我于1936年被捕，孙彩叛变。

李子华是早期区委委员（孟家铺一带区委），什么工作都抓。马子敬也是区委干部。

1933年日本占领长城以外，全民抗日。孙永勤抗战，中央当时主张民族利益高于阶级斗争，民族抗战，孙永勤是人民抗日，应该支援。

我们先后在东草厂、孟家铺一带活动开会，决定支援孙永勤，有王平路〔王平陆〕、樊凌喜〔樊凌玺〕。王平路〔王平陆〕在这里工作半年之久。

高存同志是铁厂一带活动的党员。

高存于1933年下半年常到我家住，跟我说，口外有个同志姓关，要起暴动，你要支援他们。我让徐英拿着高存写的信，找到关元有。徐英给我来信送到。徐英是省里介绍来的同志。省里介绍信〈上写道：〉派徐英为你县军事干部。此人在部队干过。

我派李子华、马子敬送过枪支弹药。

谈话记录[1]

阎龙（遵化县山里各庄公社骆各庄大队人：

我是1932年10月20日入党。

我买了几张席，捆上枪。我刚十七八岁，让驴驮着，用席子捆上。我到车河口，走了三天两夜才到车河口。直接找到孙永勤，别人我也不认。我们见到孙永勤、关元有，长短枪都是旧枪，没有太好的。

1933年，我送过去之后来［原文如此］。

孙永勤民众军在茅山〔毛山〕被好几千人围攻。

我在岳各庄找不到孙永勤，无法接近，联系不上。

遵化县南北堂有枪，想动员出来，支援孙永勤，这件事没有做到。

[1] 此为栾福忠先生采访阎龙的原始记录。

调查记录[1]

时间：1983年12月29日

地点：遵化县骆各庄

调查对象：

骆凤亭〔骆凤庭〕，遵化县骆各庄人。

1933年任遵化县委书记。

1936年被捕。

1951年被判刑15年。

1983年在落实政策，每月20元补贴。

判刑一事正在复查。

调查主要内容：遵化人民支援抗战情况。

与孙永勤的联系。

骆凤亭〔骆凤庭〕：

1933年我任遵化县委书记。1933年铁厂一带有关外的共产党员高存在那里活动。高存与我们常有联系。1933年后半年高存向我反映，有一个姓关的同志，叫关元有，是他吸收介绍入党的同志。他和孙永勤一起闹暴动，搞抗日，请遵化县委支持他们，他们是打日本的。孙永勤闹暴动的消息传来以后，我派徐英同志去孙永勤部，并让高存同志给孙永勤、关元有同志写了介绍信。徐英同志到孙部找到了关系，来信说孙永勤部急需药品、枪支。我接到信后，派我的兄弟、共产党员骆凤明〔骆凤鸣〕、共产党员阎龙给孙永勤部队送去了十支枪。枪是汉阳造、老套筒，没有太好的，都是旧枪。从药铺买了一箱子药品，都是治外伤用的。交给了关元有、孙永勤。这是第一回。

第二次，我们县委在孟家铺一带活动，那时叫开辟冀热边根据地，我们在靠近长城一带的地区活动。1933年日本占领热河东四省后，党中央〈号召〉全民抗日，阶级斗争要让位于民族矛盾，主要是团结抗战打日本。孙永勤是民众军，抗日的队伍，我们县委在孟家铺开会，决定要支持孙永勤。和我在一起开会的有王平路〔王平陆〕、樊凌喜〔樊凌玺〕。王平路〔王平陆〕我只知道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人，那里〔时〕介绍信没有公盖〔公章〕，便条，上面派人写个条子就行了。王平路〔王平陆〕在遵化工作半年之久。那时我〈们〉在一起开会，王平路〔王平陆〕讲中央主张全民抗战，打日本，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后来我派李子华、马子

[1] 此为栾福忠先生采访骆凤庭的整理稿。

敬，他俩都是孟家铺区委负责人，要〈他们〉支援一些枪支弹药。后来他们给孙永勤送去了枪支弹药，他们向我说送到了。我派子华、子敬支援孙永勤是在1934、1935年时间里，这是第二次。

冀光就是孟寿田，小学校员，共产党员，日本投降时牺牲。

徐英是〈在〉遵化县工作的军事干部，当时是省委派来的，在部队干过。到过孙部，后来参加了孙部，情况我不太清了。他到孙部以后说要枪弹，这是第一次送弹药前的情况了。

注：骆凤亭〔骆凤庭〕采访之后不久，全面落实政策为党的老十三级干部待遇。

调查记录[1]

时间：1983年12月29日

地点：遵化县骆各庄

调查对象：

阎龙，遵化县骆各庄人。

1932年10月20日加入共产党。

1933年孙永勤闹暴动抗日，县委书记骆凤亭〔骆凤庭〕派我给孙永勤送枪。那时我才十七岁，我买了一张席，把十支枪捆好，让毛驴驮着，背上放了一箱子药，和骆凤明〔骆凤鸣〕一起，走了三天三夜，摸到了车河口。找到孙永勤、关元有，把高存他们写的信给看了。我不识字，不知写的是啥。孙永勤、关元有清点枪支、药品。送的都是旧枪，那时候旧枪都是宝贝。

第二次骆凤亭〔骆凤庭〕让我找孙永勤，孙永勤已被围了，我没有找到。

[1] 此为栾福忠先生采访阎龙的整理稿。

忆张福义与孙永勤

作　　者：王永枝

写作时间：1984年3月5日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地　　址：承德市寿王坟郑家庄大队

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关于你们寄来的《兴隆县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一书及慰问信已收到，内情尽知，我很高兴。组织上对我们很关怀，表示深切地感谢。

书收到，我找人给我念了几遍。里边记录了大量的抗日斗争时期的兴隆县人民的斗争史及优秀的领导、同志们〈的〉英雄事迹，是一部珍贵的材料，是同志们用鲜血、记录［原文如此］换来的血写的事实，看到后我十分感动，是县委领导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书中的故事及战斗场面，将我带进了童年，及战斗的年代的回忆。

看了书中的人物，我为此事步行四十多华里，专程到承德县八卦岭沟村进行了访问。张福义的妻子刘氏，今年93岁高龄了，身体还很健壮，说话还很健谈。她述说了当时孙永勤将军及张福义的斗争情况，我让她写成材料一起邮去，供请你们参考。

我在〔再〕把我的情况在〔再〕简述如下：在1932年张福义起义军成立后，我三哥王千参加了张福义的部队。走后，寿王坟保董孙永香将我家抄袭，我母亲和我们哥四个夜间跑到黑河。跑到黑河后，地下工作者赖邦将我兄弟收下，参加他的部队。到1942年秋，我二哥、四哥被敌人围攻，死在山上烧炭窑里。我参加了黑河成功村李青的地下工作者［原文如此］，担任成功村的民兵队长。1942年入党，任区干部，干地下工作，经常和敌人周旋。组织民兵埋地雷，打游击，使敌人闻风丧胆。

上述情况是我的回忆，不见得妥当。但是《兴隆县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这本书很好，希望早日定稿出版，让我县人民早日看到此书，让后代记住日本在我县的罪行，牢记我县的人民英雄事迹，为振兴中华，更好地工作。

祝贵室同志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王永枝 草
1984年3月5日

孙永勤在大小十二岭

讲 述 者：李春会、赵明河

讲述时间：1984年6月21日

采 访 者：栾福忠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李春会，64岁。

孙永勤的队伍当年在这里活动有上千人。他的队伍经常活动在王杖子、李杖子、小十二岭一带。

三几年的春天，孙永勤的队伍活动在西高尖。孙永勤的队伍听到敌人到了王杖子。敌人从蘑菇峪上来，时间上午8点多钟，敌人是岳老亮地主勾结满洲队。敌人从蘑菇峪——阎杖子——宋杖子——王杖子——李杖子——小十二岭——西高尖。孙永勤边打边跑，西高尖——过雪山——洒河〔澈河〕。孙永勤损失有四十多人，我们一头大马被拉走，是满洲队干的。

孙永勤当年活动地点是阎杖子、宋杖子、王杖子、李杖子、小十二岭、大十二岭，吃住在这一带。这一带离敌人远，藏在这小山沟里。

在这里打仗不多，只有两次战斗。是被敌人追着打的，被敌人第一次消灭二十人左右，李杖子小岭有十多个人。

赵明河，今年72岁。

孙永勤起队伍我23岁，岳荫臣勾结国兵满洲队打孙永勤。承德县下板城鲫鱼坑。

十二岭战斗情况：孙永勤带队几百人打半壁山局子后从洒河〔澈河〕过来，过雪山到十二岭，要在十二岭分东西，二月十几。孙永勤到李杖子要粮食，有雷音亮，北大地村的人，有车河化鱼沟江福英，有阎杖子村阎永泰，三个人要粮。“赵明河、李云满、李春青三家拿三斗高粱米。”我和李春胜送去的，用骡子送到小十二岭，骡子累倒了。我到十二岭，陈冬春（黄花川人）［原文如此］。孙永勤队伍在十二岭活动，队部住徐久岭家。见到孙永勤，让他们来了一个人，牵着一头驴把粮食拉走。

打仗的头天晚上，住在王杖子村的兵，被满洲兵住满，不让老百姓出来。王殿勤（王杖子人）偷偷跑出来送信。孙永勤派阎永才探听消息：“到李杖子和赵明河打听消息”。我和李茂去探听，在村外敌人打了一枪，我们俩跑了。我们后来跑到一块。回到李杖子，这时我村也来了满洲队。别人这样说，我不相信，回到家里来了。敌人没有来。鸡叫时我起来，敌人从王杖子向十二

岭开进，我们过不去了。

小老道正在算卦，刚出门就被抓住。

时间是二月二十六七，天下大雪。敌人天刚亮摸上来，孙永勤正在十二岭南沟，当时没有过西高尖梁就被敌人追上。交战地点在西高尖（万石口）。

孙永勤在这次战斗被消灭三十多人，打死一匹骡子。

李杖子小岭战斗，时间四月份，孙永勤有一千多人。

孙永勤四月份驻扎在王杖子、（李杖子）阎杖子。敌人从三道河过来，雪山——西高尖——李杖子小岭。孙永勤来不及逃走，就被日本子追上来了，打了败仗，被一百多人日本子消灭孙永勤二十来人。

孙永勤当时武器差，没有多少子弹，西高尖、李杖子小岭都被敌人打跑。小十二岭死了有三十来个，李杖子小岭死了二十来人。敌人一个没有打死，连受伤的也没有。孙永勤武器不好。

孙永勤走哪儿吃哪儿，吃了就走，也不给钱。

孙永勤在大小十二岭、双堂子活动期间，就在小十二岭、李杖子小岭打了两次。都被敌人打跑了，损失三四十人。

茅山〔毛山〕战斗突围出来的人，在这一带乱抢乱夺。第二次起团会，就没有干什么好事，成了匪，没有营业。

孙永勤当时招的兵都是老百姓。开始十七八人，后来参加他队伍〈的〉人都是一些没营业干的人，好小伙子不多，都是一些好吃懒做的人。好的社员也动员参加队伍。孙永勤心不坏，是打敌人的，家伙不好打不了。



关于孙永勤和忠义救国军遵化毛山战役的补充材料

作　　者：闻成

写作时间：1985年2月8日

文件原名：《关于孙永勤和忠义救国军遵化茅山〔毛山〕战役的补充材料》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茅山〔毛山〕战役前，孙的主力在小于家沟〔小于沟〕，他们知道日伪部署兵力，企图包围救国军，做出了撤离遵化，通过马蹄峪、秋克峪〔秋科峪〕口到口外坚持斗争的部署。1935年旧历五月廿三日下午，孙率其主力部队三百余人从小于家沟〔小于沟〕出发，经陡岭子、粳子峪、吴家沟到三里店，从庄北走上北山坡（去傅家城、大屯的方向），突然发现山梁上有穿军装的保安团十几人（是一个班来换岗）。孙发觉前面的去路有保安团设卡，孙即派员上去联系，要求借道。站岗的士兵请示下级军官，不肯借道（《遵化史话》一书41页载保安团队长派人与孙接头一段情节查无实据，未必真实）。孙无奈把队伍拉回吴家沟村住下，号房找米做饭，没做任何战斗准备，次日凌晨才仓皇撤至茅山〔毛山〕。

救国军的另一部分（一个大队）没来吴家沟，当晚住在了楸花峪〔秋花峪〕（今东小厂乡方家峪〔房家峪〕村的一个自然村，几十户人家）。廿四日凌晨，从三屯〈营〉、西铺猛扑过来的日伪军在楸花峪〔秋花峪〕、茅山〔毛山〕东麓及山上与救国军遭遇，这里的仗打得十分惨苦，日伪军的伤亡主要是在这里，而救国军的一个大队的官兵也所剩无几。

以上资料，是我最近去吴家沟时，访问战争目击者和在陡岭子山坡上被抓去给救国军带道，去三里店北山梁上的老人——陈安长〔陈安良〕介绍的，这是比较可靠的。

我不管公孙訇、温学儒、李永春等同志如何写救国军和茅山〔毛山〕战役，愿意提供以上资料来澄清事实，纠正讹传。

调查人：闻成

1985年2月8日于吴家沟

孙永勤首级下落

来 电 人：彭明生

时　　间：1985年2月27日

文件原名：《承德市党史办来电话》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们去中央档案馆查资料，翻阅“山斋秀也〔三宅秀也〕”卷一，编号5，第12页，记有：有一个部队长山田把孙的首级带到承德，在河南街向一般街民展示（河南街就是二仙居）。

来电人：彭民生〔彭明生〕

1985年2月27日



关于孙永勤和忠义救国军的调查材料

作　　者：闻成

写作时间：1985年12月12日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1984、1985年我在本县宽甸村访问李志清，在遵化县的吴家沟村访问陈贵正、陈贵平、陈安良、吴广树、张启生、穆柏成等老人，获取材料整理如下。

一、进关后的概况

抗日救国军进入遵化县，群众叫"闹民众"，吓得到处躲藏。主要在城东的东西小寨驻防，也在小于家沟〔小于沟〕住一个时期。在遵化境内的城南、城东打过一些仗。这时为了剿灭十分猖獗的马拐子等土匪，省保安团有两个团的兵力在城东大安乐庄、东小厂等地驻防。遵化城西有不少日本，借口是给伪"满州国"的溥仪守护东陵，那里叫特区。孙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又遇到枪支弹药不足，军饷不足，换季困难等实际问题。

二、最后的战斗情况

五月里，孙部从小于家沟〔小于沟〕往西，想撤回兴隆。孙率一个大队，300多人从陡岭子过来，在吴家沟村南地里遇到陈安良，叫他带道，通过傅家城、大屯，出马蹄峪、楸科峪〔秋科峪〕回兴隆。队伍走到西三里店庄北山根下，看见山上有保安团战士数人，正换岗，时间是下午5点钟以后。孙派员上山与站岗士兵联系，要求借道。保安团士兵答复是：要向连长请示。而连长还在松棚营，离这里三华里。孙考虑不好通过，又念及战士十分疲劳，不便强行通过和乘夜突围，决定在吴家沟住一宿。村中筹集粮柴，吃了晚饭，一齐睡大觉。庄西头、马山上均未放岗。午夜后敌人集中包围了村子，日寇用两辆汽车载士兵、武器（机枪、小炮），直达吴家沟的村西，下车即冲进庄里。孙部仓猝应付，没有还击，即整队往东西方向的茅山〔毛山〕跑，孙的警卫员的臀部中弹受重伤。孙部在山上，从第一道山撤到第三道，想从主峰由后背往北撤，后背又被在九虎岭后的大块地盘据的马拐子匪帮一百多人堵住。这时孙部也〈已〉处于绝境，当场牺牲四百多人。

另一个大队在方家峪〔房家峪〕（茅山〔毛山〕东麓的一个大村）住，遭从三屯营、洒河桥〔潵河桥〕过来的日寇的包围。撤至山根的楸花峪〔秋花峪〕与敌激战，一百多人全部壮烈

牺牲。战斗打了半天多，晚上敌人撤走。

在吴家沟村隐蔽下来，在山下溃逃的少数人，如马宝德〔马保德〕、何广永、年焕兴、郝玉祥〔郝敬义〕等人逃出脱险。马宝德〔马保德〕（东双城人）和张××（西小寨人）各自逃回本家。张逃往东北，马后被遵化县抓捕处死。何广永等人回到上港藏匿。

李连贵的一个大队没在吴家沟住，连夜绕过保安团驻地东小厂、松棚营，从庄客西沟逃往口外。

战场目击者说，日寇在村西头架上机枪、小炮猛扫，孙部无法抗抗〔抵抗〕。后来敌人又调来飞机在上空侦察助战。

孙部不过有几百条长短枪，子弹不多，没多少手榴弹，没看见有机枪，只有两匹军马。看见了他们带着捉来的俘虏，有日本人、中国人。孙永勤住在张志辉即张启生的隔壁。看见孙永勤正闹病，带伤，行动找人用椅子抬着他。

三、关门岭战斗

孙部没进关前，为了收集黑河川的枪支，孙率队进驻宽甸村。孙住在李志清家。上板城警察署和骑兵一个团从北部追过来。敌人尖兵到曹台子以北，孙才接到情报。孙急忙率队往南撤，过关门岭到口里。赵四川等率部据守四楼沟、五楼沟的长城抵抗，赵受伤。敌人追到宽甸，在宽甸村南架起一门炮，往关门岭村猛轰。一颗炮弹打中关门岭长城的楼子，塌了下来。从大小西峪收枪回来的士兵没过河即退回去，过梁绕灰窑峪到潵河川了。

这个骑兵团住在宽甸〈一夜〉，团长也住在李志清家，因此李志清和他父亲是这场战斗的目击者。李现住宽甸村（离休老干部）。

四、孙永勤在暴动前的革命活动。

孙永勤在暴动前就对在车河口开商号的岳荫臣（承德县八家乡庙梁大恶霸地主）对贫苦大众的剥削压迫恨之入骨。一次孙和几名弟兄带枪夜间去庙梁抓岳荫臣，进不了院子，没办法把岳的祖坟扒了，岳更加痛恨孙永勤。孙永勤也逐渐认识到与地主、官府打交道是严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五、关于孙部的“郝小辫”

大杖子村西边郝家庄的郝玉祥〔郝敬义〕，是个风水先生，人称“郝小辫”。他早期参加孙的队伍，茅山〔毛山〕战役逃回本村。有人问，他有你这个神通广大的军师，怎么会全军覆没呢？郝自我解嘲地说：“大柜他不听我的话。我叫他走生门，不走死门，他不听。”实际上他身带罗盘，行军前靠占卦问卜吉凶，根本不懂军事。郝已去世。关于孙部下还有一名姓商的



老道，叛变投敌，可能也是导致孙部失败的另一个原因。

六、几个疑团有待查证

1. 商佩章〔商佩璋〕投敌报密问题。

2. 共产党员王平陆（迁安县人）在遵化与孙接触问题。

3. 遵化县上港村的老革命何广申〔何广森〕（何子桥）是否在孙部工作过。有人说在过，有人说那是他的叔叔、弟弟。何子桥已去世，遵化县党史办、档案馆应当有何子桥的历史档案，从档案中可以查出他自己填表是否写上参加孙永勤的队伍。

4. 孙进关队伍究竟有多少人，多少条枪，说法不一。

5. 孙部在茅山〔毛山〕失败后，余部有几十人逃到侯家寨西边，被日军捉住，在楸科峪〔秋科峪〕庄南河套枪杀十几人。这是楸科峪〔秋科峪〕的王宗泽介绍的，也有待查证。

6. 孙部进关及剿匪问题说法不一，是否与马拐子等土匪接过火？有过战绩？有待查证。

7. 孙的司令部内设置了哪些机构，如后勤部、参谋部、军法处、警卫连、通信班等，说法不一，应当核实。副军长是不是赵四川、马宝德〔马保德〕？

8. 骗孙永勤的遵化县县长是谁？兴隆与遵化的说法不一致。

闻成

1985年12月12日

为《孙永勤抗战与“何梅协定”》专题访刘秀存记录

讲 述 者：刘秀存

讲述时间：1986年10月25日

采 访 者：马秀山、李永春

采访地点：遵化粳子峪刘秀存家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时间：1986年10月25日

地点：遵化粳子峪刘秀存家

刘秀存：现年72岁（虚岁），1946年入党，现在乡农民。1934年冬至1935年5月曾在孙永勤民众军中任中队以下所设六班的班长。

主要内容：我是1934年冬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投奔的孙永勤。初去，孙永勤身边人不多，只有十八九个人，别的地方是否有军队不知道。他正驻在舍身台，随后到过洒河〔潵河〕，再半壁山，再西华于沟〔化鱼沟〕，再黑河，这也是李连贵和孙永勤会合的地方。又荞麦梁，再黑河，又华于沟〔化鱼沟〕，人员不断壮大。这时我请假回家，后又去，在青杏沟碰上李连贵的队伍，就留在他那里。随后跟李连贵出发，到横河大水泉子，又返回青杏子沟。在整编队伍，设一个大队长李连贵，大队稽查徐连芳。大队下设四个中队，我在第×中队，中队长是年焕兴。中队以下设班（相当于小队），我们班的班长姓陆，名字叫陆国×，他时间不长就回家了。他回家以后，我接他的手，当这班的班长。中队里也有稽查，他的名字叫察海。这四个中队队长的名字是第×中队、第×中队、第三中队、第四中队。随后就打半壁山，接着打米子地〔糜子地〕，后又去黑河套开大会，李连贵讲话。黑河就是五指山，受日本军包围。突围后又去青杏子沟。我领少数人去蓝旗营子站岗哨，与满洲队打起来，得了枪，俘了马。队伍又转到西偏堂，住下，吃老财，后又返青杏沟及蓝旗营。再后又去北厂沟，收拾了“白毛子”老财。朝他要枪，他说没有，又翻出两支来。又要子弹，他说没有，就给的钱。后来又转到青杏子沟，全大队500人左右人，每人分上两块多钱。我的两块钱给赵顺数（现住略高庄〔廖高庄〕）。随后由青杏子沟出发，经马蹄峪进关。在进关前也进过关，打马拐子。以后又返回西大洞（南天门），再去青杏子沟，这才经马蹄峪进关，直奔西小寨驻地。在西小寨当天下午，



经孙永勤安排，李连贵下令由各队抽出廿左右人，化装成卖柴禾的，由遵化东门进城，意欲揪出县长（当时县长何孝怡——笔者注），逼他答应军需供应。但事未成，被敌察觉。一进门，他们就关了大门。事不好，一下从南门撤出。遇有警察人员（戴平顶帽子），我们拿出〈枪〉来，他们放过了我们。随后城墙上有人朝我们放了数枪，未打中一个人。我们回到西小寨。当时是傍晚以前，看到一个矮胖子，头戴草帽，穿便衣的人，一定要见孙永勤，结果见了（不知人家与孙永勤说的什么）。次日上午，又派两队带一张写有字的纸，听说是向县里要军需物资的意思，扔进了城门里边，就回来了。当天中午听说（村里人说），县里给送来两千斤大米、两箱子子弹、两支枪，反正中午吃的是大米饭，就是那项米。随后〈午后〉听说有日本人来包围，马上转移，奔大寨北华山一带。不知为什么，后又返回朝北走，又奔茅山沟〔毛山沟〕。

出访人：马秀山　李永春

张如山老大爷回忆

讲 述 者：张如山

讲述时间：1986年11月8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张儒山〔张如山〕老大爷回忆》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81岁了，在这住多少代了。这条沟为什么叫黄花川？因为上边有个大柏砬，上边长有几搂粗的大黄木，开始这里叫黄木川。后来黄木被人砍了，大甸子上都是黄花，所以又叫黄花川。

孙永勤大个子，左鬓角上有疤。他起义后，过了年，1934年过了旧历年，孙永勤来我们西屋，找杨佩之老师。杨老师是宽城县的家，二十八九岁，师范学校毕业。孙永勤找到他，让他跟着去。杨说让我去也行，你得听我话，得围月亮庵（广东山）、五指山、棒槌山（马架山）这些架大山转。转下二年去，紧急时要跨县界、省界。1935年春，杨佩之随孙永勤一二个月便去了茅山〔毛山〕。被围了，杨佩之他们三人在山头上松树底下，用绳子把自己绑上。日军把他们带到村里审讯，上边用千斤顶压，下边坐铁砧。日本的翻译官是杨佩之的老师，把杨放了。杨在旧历六月回到我们这，把口里情况说了。不久，杨就搬回宽城。杨的岳父家在宽城县

老爷庙（清河口往里，塌山这边）。走后未回来。当时，我十八九岁。

孙永勤起义是岳老亮逼的。

闹匪，匪头龙三点、小白龙、张玉书、刘忠臣［一说“刘宗臣”］，车河川。团会有孙永勤、宽甸［疑为“宽城”］梁国玉。我们这边团会把罗降梁，宽城团会把长峪沟〔常峪沟〕。

匪给张儒增〔张如增〕来信：你好好准备，上你们那过年。堂名吉兴堂，下板城往下，洒河桥〔澈河桥〕往这属吉兴堂。张儒增〔张如增〕、张儒兰〔张如兰〕哥俩分家，张儒增〔张如增〕下院，张儒兰〔张如兰〕上院，让孙永勤起出14棵大枪、2棵手枪。以后，张儒增〔张如增〕、张儒兰〔张如兰〕就回洒河桥〔澈河桥〕了，他们洒河桥〔澈河桥〕有买卖。

孙永勤他们把匪打跑。匪里有一个排是老奉军，他们的子弹放在大成兴里。孙永勤去把大成兴砸了，岳老亮告了，官兵来拾掇孙永勤来了。

这庄张儒伶〔张如伶〕，其侄拴子跟孙永勤去了，牺牲在毛山了。林凤宝去了回来的，傅万亮、张儒香〔张如香〕去来着。

张凤林跟着干几天来的。

关元有是王宝石河北的。

孙永忠是孙永勤的助手，张老志也是助手。

孙永勤的大哥〈叫〉孙永彬，老二［原文如此，未写名字］，孙永勤〈是〉老三，老四是哑巴。过去孙家也是富户。孙永勤说话很愣。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孙文阁同志回忆

讲 述 者：孙文阁

讲述时间：1986年11月17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起义那年的腊月十七十八日，有大月亮地，民众军到半壁山，孙永勤说打警察署。咱们起义军十六人，没亮就到半壁山打局子，打到日头出来9点多钟。警察从里往外打，我们从外往里打。咱们把他们草房点着了，他们缴枪了。一次绑他们十二个人，一个小的没绑，一个大师傅没绑。咱们得了十几杆手枪、大枪，钱，洋钱驮了一驴驮子，还有很多满洲票。打完后，奔东阎杖子吃了早饭。东阎杖子有个甲长想计策，孙永勤把他绑走了。他媳妇追到雹神庙，先给三棵枪，后应着还给钱，把人赎回去。咱们军队奔口里，到陈家堡遇到保安队。保安队说："在口里待着不行。"把咱们送出来。黑夜送出来，奔舍身台，住一宿。次日11点钟左右，日军把舍身台围了。开火，打了一天，月亮出来还打呢。打伤一两个日本人，看着从山上往下拽来的。当时和尚都进了地窨子了。鬼子没敢进去。我们就在大梁顶上站岗。杨树林的一个甲长到梁上找我们，说让下枪。我说得找孙永勤商量。孙永勤在庙里做饭还唱呢。马保德脚受伤，抬着，找到杨树林的甲长，把那甲长绑上了。我们到洒河〔潵河〕北，把那甲长吊起来，打。有一个妇女说情，要啥给啥，把那甲长放了。过了梁到二道河住了，住在老高家财主家。狗咬，咱们有四个站岗的都被满军抓去了。孙永勤睡觉呢，狗咬，我出去看看。敌人打我一枪，我在胡同里挨了一枪，然后我就跳墙跑了，我的枪挂在栅子上了。孙永勤用手枪往胡同两边打，敌人躲了。孙永勤跳到前院去，走了。孙永勤把我的枪得了。我跑到灰窑峪，进一个人家烤火，孙永勤、关元有他们也到那屋里了。过了梁，到蘑菇峪上边的黄花峪。去几个人到蘑菇峪，朝蘑菇峪的三先生要枪，他给了孙几棵枪（孙永勤的亲戚）。腊月根回到孙杖子。这时人多了，上千了，好几千人了。腊月根去车河永和堂〔永和堂〕扎着，在那过的年。我去南沟紧后堵一个家里家［方言，指有亲属关系的人家］养伤。

1933年打场的时候。车河口买卖大成兴，〈东家〉在大彭杖子开煤局子，大成兴给匪运子弹。孙永勤头一次打大成兴，没打了。第二次打了，得了布匹，得好几匹马。大成兴煤局子东家不干了，有人，官家人抓孙永勤，抓了一秋一冬。孙永勤一秋没上家，这才起义。

1933年秋，这里闹土匪，孙永勤领着团会打土匪。打了一季子，连迁西的民团都过来了。

正打土匪时，大成兴给匪运子弹。在长峪沟〔常峪沟〕关杖子沟口，把子弹十二三驮子，被团会卡住了。一问，才知是大成兴给土匪运的。这才打大成兴。把土匪打垮了，才打大成兴，兴隆民团也来了。咱们这边民团分八匹马，兴隆那边民团分的更多。

日本进关的第二年，1933年春从东边过来土匪，每一拨都有一头二百人［指一二百人］，净头就十几个头，所以兴隆、迁西的民团会就都集中了。从春天一直打到八月，当时日本军不管。

冬，十一月起义，又打一次煤局子。腊月打一次，春天又打一次，把煤局子打垮了。伪满军追来了，孙永勤上了五指山。日军又追，在五指山打一天。民众军五宿没睡，才撤到半壁山。

第二年二三月，孙永勤去宽城。准备打，没打，宽城应给多少钱，多少物，遵化交东西。这才去遵化。

张儒山〔张如山〕，可能知道一些。张儒本〔张如山〕也可能知一些。

刚一起义时，陆同沟〔路通沟〕大庙里有个小老道跟着当军师。

第二年郝家庄郝世祥〔郝士祥〕会掐算，跟着当军师。郝世祥〔郝士祥〕前二三年去世的。

孙永勤属龙的，腊月生日。

我今年76岁，起义那年我25岁。

兴隆县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孙文炳同志回忆（一）

讲 述 者：孙文炳

讲述时间：1986年11月17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孙文炳同志回忆》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是1934年旧历正月参加民众军的。腊月孙永勤他们从陆同沟〔路通沟〕过来的，有孙永勤、马保德、赵林、赵有、赵四川（火拉火的，是北边的）。我跟着走了后，黑夜打半壁山局子。打下来了，得几十只枪。咱们去30多人。敌人都跑了。敌人伪满兵、警察追我们，民众军回到黄花川，又奔车河。煤局子，车河口大成兴供匪子弹，把大成兴抄了。冬天又奔西梁顶、老梁，到老梁就有两千人了。在乌龙矶东边，住半拉多月。打一天仗，敌人跑了。打仗，黑夜撤下来奔西梁顶、柳河。从西梁顶又奔寿王坟，烧了孙进香〔孙永香〕的房子。奔黑河，五指山。春天，第二次又打半壁山局子，把草房点着了。在五指山没开火，到小十二岭开火打战〔仗〕，打一天。从十二岭奔宽甸，又奔东城峪（迁西县的）。砸了东城峪局子，没得着啥，敌人来了。过完年，春天又奔青河〔清河〕（宽城这边），待一天。有人报告来两个日本，孙永勤派一百多人，在青河〔清河〕松挠子沟把两个日本人抓住了。抓住一个日本大胡子，一个日本叫小木，还有一个翻译。大胡子说给枪，叫去遵化取去。日本给大胡子来信说，给一百棵大枪，给一棵捋管炮。民众军进口里是从洪山口进去的，不知有多少人，住了三个大庄。咱们去遵化城取枪，遵化城门用麻袋装沙子囤了。马保德要开火，赵四川说别打，回到鸡鸣村。屡屡地得到信，孙永勤的朋友老百姓来信说，敌人都发来了，你们在这待着不行啊！孙永勤召集队长们上军部开会。关元有、老张我们说回五指山，马保德（副军长）说悬呼山（洒河桥〔澈河桥〕），孙永勤说奔蓟州盘山，依着孙永勤了。到鸡鸣村梁上，有伙会、军队不让过，要过就开火。说合〔和〕一回，还不让过。住在一个小山沟里，住半宿敌人就来了，咱们部队上茅山〔毛山〕了。孙永勤当时脑袋疼呢，用椅子抬上茅山〔毛山〕了。大清晨上了茅山〔毛山〕。开了火，敌人的炮住了，就抱山［方言，上山之意］，山上有战壕。我们在三道梁头南面的梁鞍，敌人来了飞机，我们被包围住。我把那俩日本枪毙了，那翻译一劲磕头央求：“孙永勤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就把那翻译扔那了。这时孙永勤在三道梁头上。这时，赵有在我跟前，军法处队长。我们从战壕里跑上三道山头，看到孙永勤。孙永勤说：“你们顶住

打！”打有一顿饭时间，两个钟头，上边山头上也有敌人用机枪扫，我们就跑下山去。跑到山半腰，有一片榛柴，有一小沟，身子上热，发觉受伤了，就爬在那小沟里了。一黑天，敌人就吹号走了。黑夜我就劈个小树杈子，一拐一拐地下山了。强庄的强连瑞把我接到强庄，离鸡鸣村十多里地，在强庄养一个多月零七天，能走动了，才回来家。我们也不知道孙永勤哪去了。史耀华是军法处战士，从茅山〔毛山〕回来的。小老道是摇卦的。

夏天，我们在清河口跟警察署打过仗，抓住过一个小木匠。

头夏天，在清河口打一次大仗，把孙永勤打到砬翅上去了。我们在瀑河顶着打，敌退，孙永勤下来了。

在舍身台打一次大仗。有张杖子张儒香〔张如香〕。敌人把孙永勤追到长城炮〈楼〉里了。我们顶着打，黑了，敌人撤了，孙永勤下来了。

头一个年在西梁顶，在寿王坟东北。二个年在柳河口过的。

我今年74岁了，属虎的。

孙永广、孙文华。

孙文华我们在茅山〔毛山〕见面来的，他的脖子后头被打个大口子。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孙文炳同志回忆（二）

讲 述 者：孙文炳

讲述时间：1986年11月18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孙文炳同志回忆》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勤打宽城，是进了宽城街，可是来了敌人，我们又退出来了。

我不知道在宽城附近孙永勤带兵打日本、救妇女同胞的事。

孙永勤的亲兵有赵文义（在孙杖子小梁后住）、彭永宽（也在小梁后和大盘道沟住）、陆同沟〔路通沟〕赵林的儿子、孙田员（孙杖子人），这四个人都去了茅山〔毛山〕，就是赵文义回来了。赵文义前三四年死的。听赵文义说，在茅山〔毛山〕被打散了。赵文义遇到一个放羊的，那放羊的赶着一拨羊。赵文义扛着一只羊，下了山。回了家。回家后还当村干部来着。

王福合，前铺子家，大东峪，他是第三队长，领着一百五十多人。在茅山〔毛山〕被围前一天，王领着一百五十多人回来了。走到栗树湾南边的大块地，孙永勤打发两个队把他追回去了。当晚王自己走了，回来了。

孙永勤起义后，从张如增那把枪起出来，张如增就搬到口里去了。开始起枪时，孙永勤派人把张如增大儿子张文第［一说"张文弟"，下同］绑到车河永和堂〔永和堂〕去了。那时张文第四十多岁，当家人。我们把张文第绑到永和堂〔永和堂〕，张文第说我们有三棵枪、两袋子子弹。我跟孙永勤说了，孙永勤让一个队跟着，把枪起了，让张文第回家了。

有一年夏天，我们部队在五指山王杖子，我听说八路军那边来人了，接咱们来了。听说来五六个人。孙永勤怕是坏人没见，可能是关元有、赵四川、马保德他们见的。他们跟了咱们两三天呢。跟到，从十二岭进沟，到五指山，又到解放那边，跟着二三天呢。

五凤楼那一仗，民众军打了胜仗。上五凤楼时，咱们部队就把孙进香〔孙永香〕抓到五凤楼上。我们住在一个富户人家，把孙进香〔孙永香〕锁到仓房里了。我们都住在那大院里，孙永勤也住在那。那大院在山根，后边是大山。敌人从后梁上来，开炮把大门楼子轰了。咱们撤到南山，南山高，把敌人打退了。咱们也就把孙进香〔孙永香〕扔在后院仓房里了。那次敌人来就是孙进香〔孙永香〕让来的。孙进香〔孙永香〕的家在寿王坟北边的一个山沟里。以后咱们部队绕到孙进香〔孙永香〕的家，把他的房子给烧了。

过一个年，在西梁顶过的年。在乌龙矶，在西面。西梁顶上有不少人家，不到二十户。

去宽城以前，天气暖和了。在青河〔清河〕凤凰山（在塌山沟门），咱们部队住在塌山的一个财主家。前半晌歇着前，敌人（满军）从山上压下来。在尖山住一个队，青河口〔清河口〕住一个队，塌山住一个队。孙永勤带一个队一百多人住塌山了。敌人往下打，咱们往上打。打了半天多，咱们抢到山上去了。两下都撤了。在打仗时，把孙永勤和孙田员围到一个砬翅上去了，敌人有两人围砬翅去了。咱们去个队把敌人打退了。我跟张如香说，敌人把孙永勤围砬翅上去，我们说还得调队打呀！这就上去一个队把敌人打退了。

在舍身台与敌人打仗也是暖和了。在舍身台打仗就是那一次。咱们绑个秧儿（被绑去的），一个不大的孩子，被敌人过山炮打死了。舍身台有两个柏树，大柏树一搂半，小柏树也一搂。



张凤阁、张凤林回忆孙永勤起义

讲 述 者：张凤阁、张凤林

讲述时间：1986年11月18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张凤阁同志回忆》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张凤阁同志回忆：

那一年，七、八、九保团会联合起来打匪，把大成兴也砸了。官兵就抓孙永勤。孙永勤跑到鹿同沟〔路通沟〕，带着队伍回来把张杖子围了，朝张儒增〔张如增〕要粮要钱要枪。要去后，官兵又来了。孙永勤又打煤局子。又打过宽城，没打了。以后又来个县长，说我是遵化的，你这么多人没处关饷不行。

张凤林同志回忆：

成立团会，孙永忠［一说为“孙永宗”］会长，孙永勤副会长。

打土匪，土匪跑了。西八保的卡子在水泉沟上卡住三驮子子弹，说是给大成兴送去。煤局子雇三屯营的陈所长〈维护利益〉。大成兴的何玉明〔何育民〕，迁西人，与陈好。西八保把大成兴抢了，把土匪的马给分了。何玉明〔何育民〕向陈所长告了孙永勤，陈所长派警察抓孙永勤。孙永勤跑到陆同沟〔路通沟〕，孙永勤、赵四川，计十七个人，从这拉走了。先砸了车河口警察署，又到半壁山打了局子，回来又打了大彭杖子岳老亮的煤窑。腊月，我就去了。五六百人把煤局围了，煤局子里边是官兵。孙永勤让我去点炮，大火炮。第一次点时，门子哨大西沟的王××被打死。第二次我点。第三次菜园子刘长春把炮点响了。里边一点动静没有。我们三人去放尖兵。头一个牺牲。第二枪把王麻三的腿打中了。我们几人又向前走。大门关着，上边是炮楼。一推门哐啷一下。回去一说，孙永勤说撤岗，回去吃饭，回头用炮轰它一下。咱们都去大彭杖子吃饭，官兵把大彭杖子围了，咱们撤柳河口。官兵上大彭杖子前山，打了一天一宿，敌人占到高处，咱们派部队从山后又上去，官兵又跑回大彭杖子。

听说孙永勤的同伴金中奇的队伍下来了，去了两个送信的上鸡冠砬，一看是日本军。日本一过河，咱们就开枪了。鸡冠山下的滦河，打死好几个日军。日军进大彭杖子了，咱们还是围着打。后来听说高杖子又来了日本，咱们就跑了——奔老梁。孙永勤说咱们是打日本的，日

本来了咱们哪能跑，回去打。回去到长峪沟〔常峪沟〕打的。咱们在山上，日本在山下，打一天。腊月三十咱们撤下来，到刑杖子〔邢杖子〕烧板子沟。四五百人。头一天没吃饭，到烧板子沟吃饭。孙永勤打发一个老乡去探，可不好了，来了一群日本，到前院了。我们放了几枪，咱们战士李荣贵刚一上山，就中弹滚下来。我钻到一个草垛里，里边刘五子、赵文义、李林朝、陈义之，连我五人。刘五子说："老弟，过年咱们是周年了。咱们不如见他们去！"我说不行，刘五子就出去了，日本在屋里，被日军绑上了。我们四人出来，有钻草垛的，有钻棒子秸垛的。赵文义钻草垛里。呛，我们就爬出来往北跑。前边都是鬼子，我回来，钻小西沟里去了。日本回来，从干草垛里翻出个小狍子羔。鬼子抓狍子羔，我们那四人就没被翻去，出来跑了。此时，孙永勤在沟外，鬼子来，孙永勤钻了猪圈里。鬼子走了，把刘五子（老王家庄）抓去以后，到姜家庄被扎了十几刀。咱们的几百人散了。敌人后晌黑走的，咱们又集中。我们全在山里过的三十。初一我就回家来了，以后就都回来了。又集中二百、四五百人［原文如此］，正二月去五凤楼。孙一香〔孙永香〕领着团会五六百人、满洲兵打孙永勤，打了半天了，孙永勤住在一家，敌一炮把住宅门楼揭开了。咱们死好几个人。撤下来奔老梁，从五凤楼——月牙山——北川〔北鄺〕——老梁沟口进东沟、大坡——老梁（过去住过土匪，上边住过人家）。在那待七八天，又拉下来到安河〔暖儿河〕，转山子的王殿荣死在安河〔暖儿河〕沟里了。青河〔清河〕塌山的财主杨秀山，其父杨老文，与岳老亮是亲戚。赵山，柳河口的。赵山的大儿媳妇——他妈会使双枪——她是杨秀山的闺女。路过塌山，打杨老文。杨老文跑到宽城，宽城有买卖。孙带队围宽城，〔宽城〕讲和，给六万块钱，〈孙〉就让〈先〉给三万块。商务会出来说和。宽城那有一个县长，说给孙永勤一挺机枪。春天了。那三万块说去遵化取去。孙部回到黑河，西边来兵，咱们撤到宽甸。咱们在宽甸要吃饭，敌马队来了。炮向五楼沟后山打，我就站在宽甸曹家村那了。咱的人齐上五楼沟后山，咱们一千多人，后山被打着火了。咱们从那绕到黑河赵大地，从那想起来去遵化取机枪。从洪山口、刁山进口，住在榆树沟了，咱们有一百二十四马的马队。咱们去遵化城，城门紧闭。敌人从洒河桥〔潵河桥〕等地调兵围茅山〔毛山〕。

洒河桥〔潵河桥〕这边关家庄有一个关元士（商人，与岳老亮是亲戚），派人来孙部，想搞红枪会，刀枪不入，孙未听。

关元有，王宝石河北，二军长［即副军长］。

赵四川。

张福义，一队队长。

王次玉，三屯峪，队长。宽甸关门岭子王兴周知道王次玉，家里［即亲戚］。

小老道，脸上有小红麻子，大高个，三十来岁，说话不算侉。爱放火烧房子，他会推八门。

郝进秀〔郝敬义〕，郝家庄的，河西，推八门。他也从茅山〔毛山〕回来。



领着我那队的队长是张起，城墙峪的，从茅山〔毛山〕回来。

王福合，河南大峪，队长。

凤阁同志回忆：

王占山同志1942年参加县大队爆炸班。

大杖子庄里关恒录岁数很大了，参加过救国军。他跟我说过，他在救国军里当过文书。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王宝石座谈会

讲 述 者：关恒现

讲述时间：1986年11月20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关恒现同志：

关元有是我四大爷，我父亲是老五，我现年59岁。他们老哥四个，两妈一父，小哥俩是一个父亲。小时候我四大爷拉船，以前在滦州蹲一年大狱。拉船时在滦州遇到红胡子，红胡子欺负人，他水性好，武艺好，与红胡子打起来，蹲了一年狱。回来后家里很困难。孙永勤拉流子〔绺子〕，孙永勤在孙杖子立伙会，以后我四大爷入了孙永勤的队伍。我给他们遛过马，那时我七八岁了。孙永勤身背两把剑［疑为“两把枪”］来了，我四大爷才回家。他〈们〉得过日本的洋马。那次他们往北去，砸了上谷。有一次他们回来拉回十匹马，让我遛马。我说白遛不行，给我一块钱。接着他们砸了老岳家的煤局子。这次我三大爷关元富也去了，砸了岳家煤局子。回头煤局子人来了，我的几个大爷都藏了。日本来了，把我四大爷房子烧了（草房）。我们家挨着，我把房子草也撩了。以后把我四大娘抓去了，以后又放了。回来我四大娘又招一个。后来，我四大爷去了茅山〔毛山〕。我四大娘一个儿子，三个闺女。我哥哥叫关恒利，后老也顾不过来，关恒利就放牲口，给人家放牲口。我大爷那屋的哥哥找他，关恒利也参加区小队了。1943年打仗时，恒利牺牲在遵化。以后我四大娘找了主。1944年，我四大娘全家、我们全家，这村死了28口。划为“无人区”，遭日本围攻。1944年旧历十一月初一围了，围到柳河口。初三，我村的28人都被枪杀在柳河口（其中有我四大娘和我三个妹）。我和我叔伯弟弟关恒绪都被打那了，日本走后我们回来了。我们哥俩都受伤了，回来了。

我四大爷那门的我大姐，搬到黑龙江省龙江县碾子山，姓马。我大姐去世了，蠢子。

关元善同志（1946年入党，62岁）：

我四哥，以后参军，到茅山〔毛山〕牺牲。上述情况都属实。

我四大爷坏事没办过，在青河〔清河〕砸了塌山财主杨秀山。放账，把粮食放光了[1]。

[1] 从语气看，此句话应为关恒现回忆。



关元贺同志：

我没啥补充的。

我四大爷贫农，拉船出身，大个子，今年87岁。

我爸爸1942年入党，我爸爸叫关元才。从部落蓝旗地回来，我们那次，我爸爸死在柳河口。我四大爷留家一棵手枪。区里干部陈树良、赵元泽等朝我爸爸要那棵手枪，以后来部队又朝我爸爸要手枪，群众给保下来了。

顺义，波罗口大队党支书，彭善永。

1964至1965年，顺义四清，来人到咱们这调查，我们说了。八天，把我们接去了。他们那开了三万人大会，把彭善永判了死刑。

关元文知道这事。

张德庆，警察，崩我们的，现在还在柳河口呢。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孙文阁、孙文炳同志回忆

讲 述 者：孙文阁、孙文炳

讲述时间：1986年11月21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1933年旧历腊月底，第一次打煤局子。没打开，咱们撤了。

第二次打是过了年，旧历二月间。咱们有一千多人，把煤局子围了。里边的他们雇的十多个护院的都跑了。这时岳荫臣已经病死，丘着来着，把岳荫臣（六十多岁）的尸身抬到老梁的炭窑里去了。第二次打时，老岳家家里没人了。咱们从煤局子井里得一支七九枪。

岳老亮的儿子叫岳珠环。岳家在大彭杖子住。第一次打时，他们家护院的有二十多个。大院，四周有炮楼子。

从烧板子沟撤到五凤楼，头行人［即领导］开会，关元有提出要联合民团。从那儿孙永勤到八卦岭把张福义联合来了。头行人开会时，关元有说过迁安暴动的事，说民众不要吃迁安暴动的亏。在五凤楼，孙永勤把旗子改为抗日义勇军，告诉民众要舍身不舍土，要国不要家。

佟靖功采访

调查孙永勤队伍的经过

讲 述 者：小于沟三位老人、吴凤忠

讲述时间：1986年12月21、22日

采 访 者：吴宪国

抄 录 者：闻成

抄录时间：1987年3月12日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吴宪国从1986年12月21、22日，在小于家沟〔小于沟〕村，请吴文献（离休老干部）陪同，开了一个有三个人参加的座谈会。又去柴户厂〔柴户场〕、马石沟、楸花峪〔秋花峪〕搞了调查，获取了一些材料。从笔记本上摘记了以上两页材料。

在柴户厂〔柴户场〕找了庄世忠、庄庆丰、庄庆富三人座谈。在马石沟找房占义调查。在楸花峪〔秋花峪〕找人没在家，白跑一趟。

闻成

3月12日

抄录吴宪国生前用的笔记本

1986年12月22日，在遵化县东小厂乡小于家沟〔小于沟〕村，找三位老人，座谈有关孙永勤的事情，谈话摘要如下：

一、听宪国念的《民族英雄孙永勤和他的忠义救国军》一文，出入不大。

二、孙永勤在牺牲前驻扎在小于家沟〔小于沟〕好几天，不是有伤而是患病，请农村医生庄久海给治过，行动着人用椅子抬着。

三、方家峪〔房家峪〕村的楸花峪〔秋花峪〕有李永发，日寇战士的士兵尸体曾在李永发家停放，以后日寇运到原驻地洒河桥〔潵河桥〕（今迁西县境北部重镇）火化的。打死日本人是在石梯子。李福尊住在石梯子上，李永发住在石梯子下。打死三名日军士兵。

四、战后日寇进行报复，把李福环（？）家杀死六口，剩下一口。李永发四口只剩下李树森一人。日寇让人赶驮带着一些人头到洒河桥〔潵河桥〕，让人认是否是孙永勤？

五、这里的战斗，民众死了二百多人。日寇也死了不少，垛满一屋子，以后运走。

六、民众军五月左右来柴户厂〔柴户场〕住几天，带着两名日本人、一名翻译（俘虏），住在庄宽的西屋。翻译对民众说，只要把两名日本人放了，要啥给啥。孙永勤坚决不放，说日本人死一个少一个。

七、孙永勤腿部有伤，找方德福给治过。也曾派人去遵化城请过医生，没请到。

八、在遵化的马拐子土匪共有三百多人。

……

闻成

1987年3月12日

吴凤忠谈孙永勤的民众救国军

头一次来小于家沟〔小于沟〕，住三天，有二百多人。他们有三个大队，第三大队长叫刘秀存，第二大队长叫张××，第三大队长是个老道。听说他们去过遵化城南。

第二次来小于家沟〔小于沟〕，是从大寨转回来的，住在我们家，头目是个大胡子。对带的俘虏，大家要处决，孙不同意，说要与之谈判，枪支、弹药给了再放。

第三次来就不如以前了，纪律不好，找吃的。

三屯营的庄士忠是探子。这时孙的队伍已被包围，孙在小于家沟〔小于沟〕开了头头会。三大队住在柴户厂〔柴户场〕的马石沟。孙已不能骑马了，只好找人抬着。

刘秀存大队长在九虎岭后的头道城子，以后又回来。

茅山〔毛山〕战役孙永勤牺牲在四洞沟沟里，与茅山沟〔毛山沟〕（村）交界处。在那里发现了他坐用的大椅子和一具没有头的尸体。在李福尊家门口打死几名日本军。日军报复，把李福尊家全杀了，把人头带去遵化城挂起示众。

孙去茅山〔毛山〕是从小于家沟〔小于沟〕走的。

闻成

1987年3月12日抄于吴宪国家



史耀华同志回忆

讲 述 者：史耀华

讲述时间：1986年11月22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今年73岁，我十七岁跟着孙永勤去的。

我是那年旧历十一月间去的，我到黄花川去的。那时孙永勤有150多人，小南沟来20多人，遵化来20多人，其余都是本地、黑洒河〔澈河〕人。领导人孙永勤，河南大峪雷成玉〔雷常玉〕，小河口的王福合，小南沟吴恒山，赵四川（八沟六沟，参谋长），关元有（副军长）。那时年焕兴还没去，他是以后去的。李连贵也没去呢。张福义也没去呢。赵林、赵来、赵有、赵林的儿子他们已经来了。

我管孙永勤叫表姨父。

一、腊月，我去后第一次打仗打车河口，警察分驻所（有八九个警察）。打的大成兴。赵老子，大成兴的大掌柜。

半夜围住的，挑哨开火。打了两个来小时，两个警察跳井，抓住两个警察（一个姓刘），其余警察跑了。得了六七棵枪。

进了大成兴，孙永勤说赵老子在这么？说在这，到了外屋地，孙永勤一枪把赵老子打死了。

二、接着从广东山奔五指山后背，奔洒河〔澈河〕半壁山。住到半壁山，挑哨打警察署。打一个钟头，警察都跑了，得了几棵枪。把警察署房子烧了，附近的松树烤死了。警察署的孙翻译被咱们抓住了。孙翻译给孙永勤跪下了，央求。孙永勤说，咱们都姓孙，留你一条命，今后你就别干了。再干，我就不留你命。孙翻译往兴隆发电报，发了满洲军沿着洒河〔澈河〕追孙永勤。

三、从半壁山撤走到舍身台，满军围了舍身台。打一仗，打了两个来小时，咱们没牺牲，满军也没死。那时舍身台还有老道。咱们在那住一天一夜，第二天就开火。

四、咱们撤到遵化东双城子。关里的伙会来信要开火，孙永勤去信说，试吧试吧。他们会长来了，孙永勤要武器，给送过几棵枪。

五、撤出来，奔吴家沟——王茨峪——庙梁——韦庄——关家庄——上板寨——住栗树湾——水峪——洒河〔澈河〕——二道河（二堂西边河南），住在高德忠〔高作忠〕财主家。

待一天，夜间，孙永勤正拿虱子，两个站岗的被抱去，两个日本人进屋了。孙永勤蹿出去，蹚水过河。咱们失落五六人。有日本人，有伙会围的。咱们跑出来130多人。孙永勤打手枪，蹿出来了。过了洒河〔澈河〕，从灰窑峪进沟，过梁，住红石峪了，腊月。

六、又在黄花峪住一宿，奔河口、城墙峪，住在城墙峪张老店（是孙永勤的亲妹夫）家。200来人住六七天。张家开杂货铺、裁缝铺。他问妹子："我来六天了，干啥来了？"妹子说："住妹子家，管得起饭。""你管得起，我住不起。你把枪拿出来吧。""没有。""胡说！"问外甥媳妇，媳妇说没有。问外甥，外甥说没有。让我们用鞭子打〈他外甥〉。打死二三遍了，孙永勤说，不用费这个事，毙了他。孙永勤把枪拿出来，拉出去要毙，他大外甥说，三舅呀，枪有啊！他们家拿出七棵枪，六棵大枪，一棵匣枪，他们去了七个人。他妹子跪下，孙永勤说："我踢你下巴！我要起不出枪来，我们就自消自灭了！

七、接着住在王宝石河南财主老关家，孙永勤的姨家。住三天，起出几棵枪。给臭水湖和瀑河口老任家去信，要枪。黑夜来了四个有头有脸的人说和。"你们姑奶子把我打发来的。你妹妹说了，枪有，那有100多伪军驻着呢，你们打不进去。""你们回去，准备好，我去打去。只要我去，就不留情。"腊月根。第二年清明，瀑河口来信，孙永勤带领500多人去打瀑河口，分兵另一路抄后路。孙永勤喊："我打不下瀑河口，一天不站！"打死满军、伙会十六七人。打进去，那些财主们拿出40多支枪，出来40多人。

八、回来到柳河后石洞，宽城的日军、伙会夜间来围。打一仗，咱们死一人（遵化下港陈子兴）。陈子兴拿一把菜刀，钻在草囤〔垛〕里。日军把他翻出来，他仍然砍伤两个日军，其他日本兵把陈绑上了。一个日本押着他，他把绑绳解开，用大石头把日本砸伤，把日军的三八枪砸坏。他藏在炭窑里，又翻出后，把他带走了。陈子兴，30多岁，大个子，200来斤力量。孙永勤被围在院里，他一跳栅子，一把盒子枪挂在栅子上，被宽城伙会拾掇去了。

开火是三十晚黑夜。孙永勤在后石洞过年，我们长峪沟〔常峪沟〕西山顶过的年。这时有六七百人。

九、三十晚黑夜咱们撤到五凤楼，住了十来天。住在五凤楼小庄，六七户，姓孟的老哥仨。三岔口也住着，看着寿王坟那条路。这时，张福义与他两个儿子贩卖大烟，四个骡子，三四个毛驴子，跟着八九人，还有几个汤二虎军队的保镖，计十几人、十几支枪。那边有人送信，说八卦岭得过来大烟客，孙说去两个排。到大八卦岭打了半宿，打杀两个老客，别的保镖的跑了，张福义和他两个儿子投降了，大烟拿过来了。这是正月初六七的事。领导人开会，关元有说要联合民团，把张福义留下了。

十、接着兴隆的日军、寿王坟伙会头孙义香〔孙永香〕（罗圈沟）。

咱们在五凤楼住着时，把罗圈沟的孙义香〔孙永香〕绑来要枪。他儿子孙某在兴隆日军里

管事，他儿子带日本军、伙会来包围五凤楼。开火了，咱们站岗的被抱去好几个。这阵有1000多人，这时李连贵、康永贵、年焕兴都来了。打五凤楼时就是孙永勤我们一拨400多人，别人分开，李连贵在洒河〔潵河〕赵杖子呢。开火后，咱们在后五凤楼损失六七个，连抱去的死了十多个。孙永勤损失一批马，损失两驮子大烟，孙永勤派人又追回一驮子大烟。

从挑哨打到八九点钟。咱们把孙义香〔孙永香〕捆在仓里圈着。日本到近前了，咱们撤了，日军又把孙义香〔孙永香〕弄回去了。这时也该正月十五前后了。

十一、咱们又撤到车河东华鱼沟〔化鱼沟〕永和堂〔永和堂〕，住六七天，没开火。又奔广东山，住两天两宿，伪满军、日本军来围，又打了三小时，撤了。敌人把广东山上的两村庄烧了。咱们又奔半壁山。

十二、半壁山警察署搬村庄里去，咱们半夜包围半壁山，活捉了几个警察，弄来五六棵枪，有二三〈把〉手枪。

十三、旧历的三月十几，山青了，大份［原文如此］种地了。

天亮，四五百人，我们奔三道河的西大洞，黑夜到那。夜间三道河来了日军。三道河有人给咱们送信，孙永勤说别吃饭，上梁，咱们顶他一阵子。有点月亮，咱们在山上，日军在河沟。黑夜开火，打死20多鬼子。鬼子退了，咱们也退了。

日军一清早把轻机〈枪〉又拿回去了。咱们也撤了。

十四、撤下来奔小十二岭，挑哨就碰着满军。我们前哨入了敌人伪满军的埋伏线，被打死三个人（遵化人，刘义春、马占忠、×××），现在坟还在那呢。丢落一驮子东西和一匹马。一撤撤到南双塘子的黑山沟，吃早饭，从梁上黄花甸撤到黄花峪了。住一宿，次日夜，又奔梓木林，去双桥东沟，吃饭。半夜，搭东梁车厂沟出沟是潘家口滦河沿，那有日本军，日本海关税。一挑哨，不认人呢，咱们开火了。日本钻炮楼了。孙永勤派人搭梯子，塞干草熏。滦河东过来几汽车日军，开火。挑哨就打，打到八九点钟，咱们死了五六个。咱们把那个孙翻译抓住了（他藏在草囤里），孙永勤用手枪把他枪毙了。在住家里把他抓住。从〔在〕海关税里的中国人，一个姓商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冯的。这四个人被咱们抓住。抓住四个人，得了四棵手枪、二三支步枪。

接着打日本，三四个日本鬼子钻到长城楼子，日本人还说："孙永勤胡子大大的，我们至死也不出来。"孙永勤蹬着梯子，往里打手枪，没打着。往里装柴草，熏他们。这时候，河东岸来了几车鬼子。咱们退回来奔河南大峪，又回来。

四月二十几日了，打鬼子。奔清河，住在清河口。住两宿，宽城发过来鬼子，满军从清河平顶山发过来。打一仗。咱们撤到瀑河口，住了三四宿。把孙永勤的一个远方姑奶子的儿子，才十五岁，绑来了。他们没给枪。

十五、从瀑河又奔洒河〔潵河〕赵杖子。这时李连贵在罗文峪口抓住两个鬼子，一个是鬼子查边关税海关税的司令，一个鬼子30多岁叫小木，还一个翻译姓宋，30多岁（奉天人）。这几个人就交给我们军法处了。老日本给日本军写信，老百姓给送去的。黑洒河〔潵河〕的日本撤了。在赵杖子住一宿，撤到柳河寿王坟梆子沟，李连贵仍在洒河〔潵河〕。日本人托出人来找孙永勤（头一次在赵杖子，说和一起〔次〕。日本人说，孙永勤大军长要啥我给找。孙说，我不要啥，我要的全中国。老日本说，这个我的办不到，要热河的我让。孙永勤说，我要武器，要2500棵三八枪，×××重机，×××轻机，子弹，炮。老日本说，这个我能办得到，千八百支办得到。老日本答应给一千支枪，20万发子弹。翻译〈官〉给翻译。孙永勤让他写了信，寄走。没过几天枪集中在遵化，几个鬼子奔罗文峪口来了。几个鬼子找不着，哇哇好哭。鬼子发兵往北找，到寿王坟附近，老鬼子又给写信，鬼子军又撤了。这时上老梁。孙永勤这儿800多人，别处还有1000多人，总计一千五六百人。到老梁上，两个鬼子还绑着，宋翻译跑了（没绑着）。从兴隆、下板城、宽城发来鬼子兵（五六百鬼子）围了老梁（旧历四月十几二十几）。咱们七八百人。在老梁上十天半月了。大高山尖，四外全是黄砬子，里边是大蟠桃坑，那时住十二三户。有人来信说，三面进兵来了。一天，一挑哨，鬼子上来了，三架飞机照着，迫击炮、机关枪向上打。咱们人抱团扎窝子了。孙永勤一看不好，他带20多人先从东南闯山尖上走了。打死30多个鬼子，打开一条路。打了一天，黑夜从东南，咱们部队闯出来，撤到王厂沟。一天没吃饭，刚吃上饭，鬼子就摸上来了。咱们撤到椴树洼梁，小木说走不动，孙文炳把他枪毙了。椴树洼打一仗，咱们死几个人。奔平顶山，想奔河口，老乡说那有几百鬼子。我们奔王宝石（臭水湖就有鬼子），我们从王宝石奔关家沟（河南大峪北沟），到后堵吃饭，小米干饭。刚吃上，河口来信，鬼子从王宝石上来了。孙永勤让哨兵在梁上上岗，鬼子刚一上梁放机枪，咱们的枪就把鬼子打下去。孙永勤带兵来到饮马坑，把住河口这边。孙永勤正打鬼子，鬼子开枪把孙永勤正腿肚子打个眼，受伤了。打一个小时，黑夜到张杖子马架沟，与满军打一仗。黑夜奔广西山，从三道梁子、头道沟、撂荒地下去，到解放的华鱼沟〔化鱼沟〕开一仗，奔天明村、南大台，过分水梁，奔大山、老窝铺、青杏沟、杨树林，洪山口西边过的长城，〈到〉大块地，住在大块地庙里，第二天奔吴家沟。

我们到蓝旗营，我们200多人奔车河，赵文义（亲兵）、张文香到车河、柳河。吴恒泰，小南沟，与吴恒山（亲兵）是亲兄弟，在下板城警察署，他起下执照，把我们回来的这200多人在车河西华鱼沟〔化鱼沟〕门义得堂（粉房名）收了。200多人，60棵枪交给吴恒泰，在那个大院里交了。交枪后，吴恒泰亲兵把赵文义、张文香绑上了。我们就全跑了，我们就都回家了。回家时是旧历七八月了。

孙永勤在饮马坑被打个透眼，一上火，上脖子，说不出话来，就得刮。



孙永勤上茅山〔毛山〕时，李连贵没去，张福义没去，康队长没去。黄花峪的赵刚是三队长，死在毛山了。

我们在老梁上住着六七百人，在下河西住200上下人。孙永勤写信，给宽城商务会写信，〈说〉把这棵枪给我拿回来更好，不拿回来我打进去鸡犬不留。一个伪满军的营长偷着到老梁来，说你们打吧，我们里应外合。商务会知道〈后〉给送来几把盒子枪，这时已经是四月间了。孙永勤这把盒子好，打100发子弹也枪筒子不热。宽城没开仗。

没听说孙永勤救过妇女的事。

在下板城火车站打一仗，抓住过一个鬼子。

孙永勤穿一尺二的鞋。手大指头粗，五大三粗，一嚷起来人人都得怕。

开始孙进香〔孙永香〕的伙会把大成兴抄了，孙永勤去得〈晚，得〉不点东西。赵老子找岳老亮告状，官家抓孙永勤。孙永勤请客，杀两个猪。二回告，又抓，又请客。回去赵老子、岳老亮又告了。孙永勤家有一个伙计，一个跑外的，张福林。他［指孙永勤］半夜走了，他到小南沟、鹿同沟〔路通沟〕半个上下月。回来17人，磕头的。十几人都是大皮帽子、腰带、手枪。他媳妇不同意，孙永勤打他媳妇两枪。别人一抬，打到房棚上了。

孙永勤接到过共产党组织来的信。他们念时我听到过，信里说毛主席、朱总司令、红军快过来了。以前叫民众，看信以后，孙永勤说："咱们也起个名，叫抗日救国军。"以后就红臂箍，黑字，〈写着〉"抗日救国军"。红旗〈上也是〉黑字"抗日救国军"。

看信，在五凤楼看过一回信，还看过一次信，没见到人。

双塘子姓刘，拐子，参加过。

王杖子李明德，箍娄〔篓〕匠，参加过。

李杖子李春起参加过。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孙永勤队伍在遵化的活动

作　　者：闻成
写作时间：1987年2月4日
抄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一、孙永勤队伍进关后的驻地

先在城东廿里铺〔二十里铺〕驻扎。后在东小寨住一宿后，开赴遵化东北偏僻山区——洪山口，在野鸡峪、尤山口、三道沟、头道城子一带活动。最后从尤山口向南过九虎岭，去茅山〔毛山〕东麓的小于家沟〔小于沟〕村驻防，孙住在吴宪国家。几日后去吴家沟。

二、孙的队伍最后的进发意图

孙等派人去三屯营侦察，得知那里驻有保安团主力，才决计取道傅家城、驸马寨，出片石峪、马蹄峪口，以躲避日寇的包围。行进中在三里店受阻击，在吴家沟住一宿。

三、孙的队伍进关的真正意图

避免关外日寇的“围剿”，解决后勤供应的困难，在遵化收缴乡团的枪支弹药。

四、孙的队伍在遵化的剿匪

遵化几股土匪猖獗，遵化请来保安团和县内的区团、乡团合力围剿。乡团在西小寨与马拐子匪帮交火获胜。保安团在大安乐庄与马拐子土匪交战两小时，土匪向九虎岭后逃遁。孙部两次去洪山口，是否与土匪交战待查。孙部在茅山〔毛山〕被围，马拐子匪帮驻大块地，一百多人在山后堵截救国军的退路，帮日寇的忙，可见孙部及保安团都没能击溃土匪。

五、驻遵化保安团的活动

主力驻三屯营时间较长，是否驻防〈过〉鸡鸣村？茅山〔毛山〕战役时保安团参战情况不详。保安团头目约会孙永勤会晤并告诉已被包围一节待查。

六、孙的队伍在遵化是否扩大

西小寨、王老庄、许庄有人参加救国军，但茅山〔毛山〕战役后的去向不详。

七、何子桥是否参加救国军

何系遵化城东下港人，早期参加包森的队伍，任连长，参加过打东双城子战斗。迁西刘俊岳的回忆文章有关何子桥和救国军内党组织的叙述有待核实。王殿臣、刘玉堂等人也有待查证。

八、遵化茅山〔毛山〕战役后日寇在王家沟烧阵亡士兵尸体一事的真实性

经吴宪国调查，小于家沟〔小于沟〕有大自然村叫王家沟，但日寇没在这里火化尸体，几具

尸体运回驻地澈河桥火化。王家沟一家的羊圈烧着，一群羊烧死。这股日寇在柴火场〔柴户场〕的屠杀、烧房应当记载。

九、日寇在侯家寨西、楸科峪〔秋科峪〕庄南河套屠杀救国军廿多人一事需要查证。可能是茅山〔毛山〕战役后返回兴隆的日军在途中杀害捉住的俘虏。

十、救国军在烟园子的战斗

救国军是否在烟园子战斗中俘获十几名乡团？并带往吴家沟？在廿里铺〔二十里铺〕了解这次战斗可能有人知晓，因为烟园子距廿里铺〔二十里铺〕不远。

1987年1月（春节前），我在吴家沟、东小寨找老年人交谈中〔后〕，整理以上九点，供参考！

闻成

2月4日

孙永勤进关路线及白马问题

作　　者：王宗泽

写作时间：2月21日

文件原名：《调查材料》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一、孙永勤，第一次进关是经过秋科峪转战到铁厂一带，又转战到长城以外。第二次进关是进的马蹄峪口，转战遵化茅山〔毛山〕被日本打垮的。

二、日本屠杀民众队伍有二十来人，是在侯家寨西小河屠杀的，不是秋科峪南河。

三、关于白马问题：是秋科峪村王举、张宝顺二人把白马抬回来，剥了吃肉了。孤山子南边海关税的日本找马找不到主，给干家（楂）峪〔甘查峪〕的赵进忠、安了庄花了很多钱才完事了，这与霍家没有关系。

四、关于吴从理的历史：因家贫，直奉交战时卖身当了直军。直奉交战后回了家，又当了几年乡团。日本进罗文峪口那年（1933年）当了民众。出去后不知什么时候当的八路军，跟包森一起抗日。后来到了地方工作，因为作风问题，被仇人所害。

遵化县楸科峪〔秋科峪〕村（侯家寨乡） 王宗泽 2月21日

（王宗泽系兴隆县病休在家的教师）

骆凤庭同志介绍抗日救国军与党的联系

讲 述 者：骆凤庭

讲述时间：1987年3月6日下午

采 访 者：佟靖功、栾福忠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

文件原名：《骆凤亭〔骆凤庭〕同志介绍抗日救国军与党的联系》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是1933至1935年任县委书记。

一、高存同志介绍我，孙永勤是抗日队伍，要支持。

高存领来了徐英（徐斌），徐英是省委派来的。徐英下落不明。当时是我派走的，后来没有来信。徐英的下落，后来估计是牺牲了。我记忆军事干部叫徐英，后来省里也没有打听过下落。高存后来也没有提起过了徐英。徐英是高个（中上等个）、圆脸，30上下岁，听说话口音是豫北或冀南，河南河北交界地带。和我在一起，没有在一块工作。徐英在孟家铺住过。我派他去的时候是在孙遵化来之前，1935年春天以前，年前去的。徐英是军事干部，高存领来徐英，去孙部。高存给关元有写了介绍信。关元有是高存发展的党员。高存是铁厂、迁西方面的负责人。

当时领导遵化县委的有姓郭的，有姓张（本姓赵），山西人。遵化县委是受郭黑子领导。当时我不知道谁是李葆华。

二、樊凌喜〔樊凌玺〕与孙部联系，我记得是马子敬、李子华与孙部联系，是在徐英去的〔了〕以后。

他们（李子华、马子敬）回来汇报，说我们给孙永勤送武器，七八天才追上。那边的形势不太好，经常在战斗。

我不记樊凌喜〔樊凌玺〕同志的联系情况。

我不知李子华、马子敬任命孙为军长。

地委派来的人有个姓陈的，是乐亭人。

三、王平路〔王平陆〕同志和孙永勤有联系，王平路〔王平陆〕可能在部队（孙部）牺牲了。他们1934、1935年可能有联系。王没有和我说过，和省委说过，说什么也记不清了（我是在一旁听的）。

王平路〔王平陆〕和孙永勤见面可能在车河口，或在上下板城见过面。

王平路〔王平陆〕可能是迁西负责人，来遵化参加省里会议，我们见面。

在没会时，我们平时不打听。

王平路〔王平陆〕在茅山〔毛山〕与孙会面不太可能，孙没有站脚之地。

孙永勤来茅山〔毛山〕，王平路〔王平陆〕没有在遵化。

我和王平陆见面在1934年。

王平陆在1934年没有在遵化担任过工作，只是来遵化参加省委召集的会议。

王平路〔王平陆〕没有和我提过研究支援孙部，他可能直接和省委联系。

地委来的姓陈、姓刘的没有和我商量过支持孙部。

我在孟家铺活动是1934、1935年，常来常走，没有固定的地点。

孟家铺现在有无老党员，现在记不起来了，想不起名字。

高存和我说，高存是介绍关元有入党的，他和我说过。

孙部来遵化和国民党县长的关系我不知道，县委不清楚。

徐英很可能是牺牲了。

王平路〔王平陆〕可能和孙永勤有联系。王平路〔王平陆〕当时有病，我听话音中有过联系。和我没有说过，只是和省委同志说。

樊凌喜〔樊凌玺〕去的那次和我没有说过。

李子光不在了（孟家铺的李子光是老党员，不是蓟县的李子光）。

邵王志，党员（王家铺）。

孟家铺的牛圈子或马圈子有个老党员，不知姓名。

马子敬他们给孙部委任状我不知道。

我当县委书记是在1935年，在冀热边创建根据地。后来我在特委工作。

我担任县委书记后，可能是马子敬，茅山〔毛山〕被围时我是县委书记，马子敬他们是区委。

我的上级有姓张的，原姓赵，山西人，不知道姓名。姓李的，不知姓名，可能陕西人。

张明远有联系，苏林燕早期有联系。

那时地委没有准地方，在新店子待过，待过有一个多月，后来跑了。

高存介绍关元有入党，什么时间不知道，也没有问过。

高存和我说关元有是党员，是1934年春夏季，有了消息我派徐英去的。肯定和我说过关元有是党员，高存介绍的，不知道啥时介绍的。关元有搞暴动时，高存还向关介绍过迁西暴动的教训，是李运昌总结的：今后搞暴动要注意争取各村的民团、自卫团。

孙部茅山〔毛山〕被围失败之后，上级有这么个建议，开会追悼和研究孙部失败的原因。

在口外冷嘴头大青山开的会，检查孙部失败的原因。孙部和何孝怡的联系也不知道。孙部没有党的组织，那个地方也没有群众组织，枪支弹药少，军需太缺，经不起敌人打。孙永勤到这来，就是到有党的组织、有群众组织、有游击队的地方，可以得到支援，保存实力。那次会上同志们这样分析的，我们力量小，但是地委也没支援上，都有责任。最后得出一句话是“人民战争万岁”，没有人民支持，是不行的。总结检查会议，冷嘴头大青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志全、高存、马子敬，当地的同志不知姓名。这次会议主持人可能是张志全。张志全是丰润县委的，和苏林燕一起活动。张志全不在地委，那次会议没有地委参加的。王平路〔王平陆〕没有参加。会议时间是1935年接近冬天，秋冬季。

孙永勤茅山〔毛山〕被围怎样汇报到上面的我不知道。我也向上级汇报过，失败后汇报省委。省委负责人的姓名我不知。

访问人：佟靖功 栾福忠

栾福忠记录

佟靖功校正

1987年3月6日于遵化骆各庄

抗日救国军路经秋科峪的情况

讲 述 者：王宗泽

讲述时间：1987年3月6日

采 访 者：栾福忠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路线：秋科峪——大寨。住在侯家寨、禅林寺等地。

这次是第一次，进关的时间是1935年。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几个月。

第二次是从马蹄峪的方向进关，便开始茅山〔毛山〕战斗。

茅山〔毛山〕战斗后，在舍身台有20名民众被日守备队抓住，在侯家寨西小河被杀。有一个跑了出来，肚子被扎了一刀。逃出的战士〈是〉白马川人，是王满把他送走的。

“集家并村”之前这一带没有常驻日守备队，应是来围攻的日军。

这次被抓的是茅山〔毛山〕战斗溃散的二十名民众，逃出的是被刺刀穿透了，没有死，王满给救活、养伤，送他回兴隆。

情况提供者：王宗泽（60岁），兴隆县教师

关于遵化县长与孙永勤问题的
材料分析依据（参考）

征 集 者：遵化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抄 录 者：栾福忠

抄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遵化县长当时到底是谁？

遵化县志载：

县长关恩霖 1933年冬~1935年（冀东非军事区）

县长何孝怡 1935年（时间不长）日伪统治时间

县 知 事 1935~1936年（李潮）

说明：年月日均无记载。

霍实子：1933年~1934年曾任古北口外事专员，殷汝耕的外交处长。

他在材料〈中〉曾提到，当时县长何孝怡曾协助孙部运军火，日寇企图逮捕，何逃往南方。

关于这一问题，没有文献资料记载，只是他个人写的材料提及此事，此人已死。

（三封信中）

党史资料征集负责同志：

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先父遗稿“塘沽协定……情况纪实”没有写何时（50年前的事了，我见他日夜回忆，想到了，半夜也立即起来写，花了不少心血），不过先后总有二年，即1980年前后。以后又补充稿件，寄给石家庄市政协及全国政协，有稿费寄来，未知是内部发表还是公开。

二、1933年至1935年，任〔在〕蓟密区专员公署任外事专员及担任蓟密区古北口办事处主任，和日寇相处于古城第一线。

三、逝世前的政治身份及职务，抄录上海市政协人事处所发霍实子逝世的讣告，及上海市民委在追悼会上的悼词。

以上各点如有不足处，以后再来信补充。

此致

敬礼

霍泉明

1984年9月22日

地址：上海昆山路108/28前门



孙永勤暴动，是1934年到1935年。当时我在汇文中学念书，我家一带住有京东特委和县委的人员。特委的两个人曾想派我去孙永勤的队伍进行工作，后来因为我小，没有让去。看来特委这两个同志是专门来做孙永勤的工作的。两个同志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一个是山东人叫大李，一个是山西人叫小李。其他都是本县的。后来他们派了我们村的一个姓樊的去了，做孙永勤的工作。去了不久就回来，饿得啃青棒子粒。他说孙的队伍很不像话，没法做工作。到1935年孙就失败了。至于党的其他单位是否跟孙永勤联系过，这就不得而知了。

1982年12月21日

宋诚同志谈话录音整理

抗日救国军在遵化活动的有关情况

作　　者：佚名
写作时间：1987年3月7日上午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遵化县委党史办提供：

遵化县委党史办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在遵化的战绩等；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与冀东党组织的联系；“何梅协定”的前后经过。

刘秀村〔刘秀存〕回忆李连贵进城情况。刘秀村〔刘秀存〕系李连贵部下。李连贵率十八人进城一事系刘秀村〔刘秀存〕回忆，这一情节重要。通过他可以了解李连贵行军作战路线。粳子峪人，1934~1935年5月在民众军，李连贵部下班长。1934年冬到孙部，人不多，只有十八九个人，别处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孙部活动在舍身台。后来转移到洒河〔潵河〕、半壁山——西化榆沟〔化鱼沟〕——黑河与李连贵合，乔麦梁〔荞麦梁〕——黑河。我请假回家又去，在青杏沟遇李连贵部，就留在李连贵部。随后跟李活动，横河——大水泉——青杏沟。大队长李连贵，稽查徐连芳。大队、中队，中队长年焕兴，中队下设小队。我班长姓陆，时间不长回家。中队稽查颜杏海。随后打半壁山、迷子地〔縻子地〕，黑河套开大会（五指山），受日军包围——突围去青杏沟——去蓝旗营，驻青〈杏〉沟，在蓝旗营。西偏堂吃一家老财，又返青杏沟。收拾老财，〈之后去〉青杏沟，每人分两块洋钱。马蹄峪进关。以前进关打马拐子。马蹄峪进关——西小寨。化装成卖柴禾20人，进城揪县长，逼他答应给军需。这20人中，一进门，关上大门，我们拿出枪来，警察放了我们。西小寨，有个穿便衣要见孙永勤。次日上午，带一张有字的纸扔进城门。县送来两千斤大米、两箱子弹。午后听〈说〉包围，转回奔茅山沟〔毛山沟〕。以上反映李连贵活动路线。

刘秀村〔刘秀存〕同志谈进城找县长要弹药，第二天给送来大米和子弹。何孝怡弃职南逃报纸在抗日救国军失［原文如此］。

遵化县长何孝怡辞职

《北平通信》　遵化县长何孝怡，前来平参加蓟密区各县行政会议。嗣因身体多病，在平休养，已向当局方呈请辞职。闻已照准。，继任人选尚未确定。将由殷汝耕氏推荐，提请省府全委。我方开赴遵化追剿孙永勤部之特警张翰明〔张含明〕区队，因匪患已平，业已开回三河原防云。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6 日第4版）

请刘秀村〔刘秀存〕订正：支援两千斤大米、两箱子弹。

孙部来遵的目的，在口外非常苦难，到关内来请求共产党支援，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刘秀村〔刘秀存〕关于打土匪马拐子，进关之前打马拐子，末了县里派人不要打马拐子，马拐子和何孝怡是亲戚等，这种说法问题值得分析。

刘秀村〔刘秀存〕介绍县里支援两千斤大米、子弹等需要群众进一步证明。

刘秀存同志回忆

讲 述 者：刘秀存

讲述时间：1987年3月8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今年73虚岁。我21岁参加抗日救国军，1934年腊月、1935年春天参加的。开始跟着孙永勤，在舍身台参加的。孙永勤在舍身台，又回到黑河广东山。请假回家（二月间），没过两天，回去。到青杏沟遇李连贵，留下我。李连贵的四大队编成四个小队，每小队120多人。我们是第三小队，年焕兴〈是〉小队长。我们班长姓陆，以后我担任班长。

旧历四月十几从马蹄峪进口，进来直接住到西小寨。那天的晌午到的西小寨。我站岗，来了一个戴大草帽的找孙永勤，上身白汗褟，下穿蓝裤，三十左右岁，中等个，口音有点侉。见着孙永勤，工夫不大，那人走了。工夫不大，拨18个人，有我，带队的是徐连芳，稽查长（李连贵部的），说咱们去时注意，手枪插在后腰。每人背着干草和柴，每人柴草里一棵大枪，歇头歇前进的城东门［原文如此］。保安队把门，问啥时还进城。我们进到陈家饭铺（东街道北），东门关了。我说，往南快走，露了。我们到南门，刚关门，徐连芳叭一枪，打倒一个，我们跑了。刚出南关栅栏，城楼上机枪扫下来，也没扫上，我们跑回西小寨。

去时，徐连芳说，给咱们一个任务，把县长抓回来，啥都有了，粮食弹药都有了。孙永勤给李连贵任务。

我们进关时，李连贵的四大队五百上下人，属这个大队最大。孙永勤带队过来，到青杏沟与李连贵商量进关。李连贵不愿意进关，在青杏沟待两天，八、九队从北边过来，这才随着孙

永勤一起进关。

1935年过年旧历二月间，我们民众军在半壁山药王庙北方与日本、警察打一仗。打两个上下钟头，咱们第四大队打的。咱们队伍里有一个廖高庄赵顺，外号老虎，老兵，会打炮。四大队从长城上抬牛腿子炮，小盆粗，二三人高，铁炮，二台炮，让赵顺打炮。年焕兴让赵顺架在北山，第二炮把庙里炮楼盖掀开了。敌人有100多攻北山，咱们退到白云寺。夜里，糜子地来信，有100多马队要来。糜子地，咱们没亮时就上白云寺西梁，李连贵带人上去的。天亮看着来了100多人的马队，看清是伪满军，亮天打到傍午，敌人跑了几个，消灭敌八九十人。得了八九十支枪，得七八十匹马。也得其他东西，俘虏20多人，以后又放了。不知是哪个队伍。

打药王庙三两天后，药王庙那一个民团四十上下人到青杏沟投咱们去了。

打完时我们撤到黑河，上五指山。日本围五指山。五指山尖上有一家人家，吃人家不少粮食。他们没衣裳穿，李连贵让我们一人给脱一件衣服，脱了上百件给他们了。两个小孩烤火，身上烤成吉吉花样了。日本来围，我们从南天门西大洞撤到青杏沟，这时药王庙民团四十人来投。

我们又从偏堂奔西厂沟，奔杨白毛子那。他给了钱，每个人给了二三块大洋的饷。

第二天，上午10点上下钟，有话，敌人要围西小寨。赶紧做饭，不到12点吃完饭，奔西小寨南口子，奔那个庙了。战线拉挺远，前头到七户东边梁上。从南边过来了一支队伍，黄衣平顶帽。我们队长说先别打，到跟前一看是民团，咱们打一枪，民团就下去了。我们奔景忠山、白马峪，下来两条道奔小于沟，日头不高了，住下。没粮食，有一家拿出点黍子，给我们推碾子（一个老头）。我们进了王家沟。傍黑，我们四大队集合，李连贵说，咱们不上茅山〔毛山〕，明天茅山〔毛山〕要有危险。我们从楸花峪〔秋花峪〕奔茅山沟〔毛山沟〕——小厂——松棚营——西沟，黄花峪宿的，漆黑的。我犯心口疼。从西小寨到这里一天。我心口疼，我们班里有个唐山附近的人，姓李，他给我点大烟吃，有棒子粒那大块。我吃了，迷昏。傍亮了我起不来，年焕兴说，你咋不起来？我说，迷昏，吃大烟了。年焕兴说，哎呀，吃那多呀！毙他！集合，把我搀出去了。八沟的一个人给我一点药吃，觉着清快些。我们奔房山，刚到当沟，发现房山外边山上有日本。日头要出来了，李连贵说，奔山沟走。日本打枪，我们死十多个人了，李连贵爬上小山头向日本打枪，日本撤了。我们在山头上，从南边又过来一股日本抢山头。李连贵他们往北去了，我们几个人藏在山沟里了。我躲到一个牛圈里，过来一个人，老乡，我问，上边日本走没有？他说，四周都是日本。我们待到日头不高时，我们几个人奔到房山阳坡根几家人家。人家给做晚饭，小米水饭摊白果。听到外边有人，一看外边七八个小伙子拿着大镐把。我们班里有个横河羊羔峪的小伙子想打，我说别打，我问，你们干啥？对方说，日本没走，你们上我们这来，房子给点着怎么办？我掐着枪，我说，你们散散，既然没感情，我要开枪了！他们就走了。不大工夫，闯进一群当地人（还是关里），把我们四人的枪



下了。对方说，你们走吧。我们四个人分别回家了，这时已经是黑夜了（这是第三宿），到家亮天了（我们在房山山沟脱〔躲〕着时，茅山〔毛山〕上响一天枪）。我奔到黑峪沟了，那是我的家。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我们那天背柴进城回来的第二天，孙永勤又派三人进城给县长送信。时间不大，就给送来一花轱辘车大米，有猪肉，有枪，有子弹。说不准还是从县城送来的，还是从别处送来的。小车来时我看着来的，车上有子弹箱子，也有枪。车上还有两人，脸盘挺新鲜，不像老百姓，穿着漂白布汗禢、青裤子，衣服像老百姓，都是30上下岁。车上套着两个毛驴子，驾辕的一个，拉套的一个。从西边来的，我是从庄头上看着的。西小寨离城十多里地。

进口前半个上下月，我们来了两个小队，进马蹄峪，绕到粳子峪西梁，来打马拐子匪。到松棚营西梁，迎面来几个人，拿着县长的名片传话，说情况有变化，你们还是回到口外去。接到县长〈送〉来个〈名〉片，不让打马拐子匪了，咱们撤到青杏沟。

正式进关就是房山沟与日本军打一小天子。那次跟着李连贵走的八、九队，队长何广永、康永贵，八、九队在河套死12人，我们第三队没死多少人。

我们到黄花峪走以后，八、九队有几个人跟我们四大队走了（八队200多人，九队200多人）。李连贵神。

第一、第二、第三队把守茅沟［疑为“蘑菇峪”］一带。

第五、六、七队把守冷口一带。

四大队把守横、洒〔澈〕，黑、车、柳河一带。

八、九队把守老梁子一带。

我参军后在黑河广东山以前编队。

年焕兴是蓝旗营人，跟我是磕头弟兄。进队伍以后磕头，有李德功（北京的）、广玉文小队长（马圈子的）、陆班长、我、年焕兴、年焕章（年焕兴的哥哥，年焕章也是队长）、横河马架沟揣红。我们哥几个都是李连贵部下。

在西小寨时，我们一千三四百人，送来大米全军吃了一顿，约有二千上下斤大米。

从杨白毛那回到青杏沟，二三天孙永勤来了，以后就进关了。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遵化县秋花峪老农
王俊成、王俊山回忆

讲 述 者：王俊成、王俊山

讲述时间：1987年3月8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遵化县秋花峪老农王俊成（61岁）、王俊山同志回忆》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头天夜里住在小于沟。起早从南边茅山沟〔毛山沟〕上了茅山〔毛山〕，从秋花峪也上了茅山〔毛山〕少一部分。

日本从马台子、关台子〔官台子〕、西边的九泉山往茅山〔毛山〕上打炮。民众军在大脑峪〔大垴峪〕沟里死了200多人，偏道子往上死140多人，大王家沟死30多人。大脑峪〔大垴峪〕沟里有13人被绑着来的，穿着便衣，死在一起了（其中一人被烟园子人认回去了）。这沟外李福尊（其子李生宽）介绍，打仗时他家进来一个民众军，看到山外来三个日本，民众军开枪把三个日本打死了。从茅山〔毛山〕上下来三个日本，把李家六口人打死了。民众军走了，李家七口人死六口。

死的日本都垛到李永发的屋里，以后运走了。

孙永勤牺牲在头道茅山〔毛山〕尖东面坝墙洼。我们上去时发现那有一个椅子，有一具死尸没有脑袋。那椅子是茅山沟〔毛山沟〕刘万亮家的，抬着孙永勤用的。

李向元从茅山〔毛山〕上抬下一个日本。

下去二三天还有日本上山来寻找日本死尸的。

打大战那天是旧历四月二十二日。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遵化县房家峪老农李春云同志回忆

讲 述 者：李春云
讲述时间：未注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遵化县方家峪〔房家峪〕老农李春云同志（68岁）回忆》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战斗结束第三天上，我们民众军一位伤员拄棍子往东走。走到沙岭子东梁上，遇到县保安队两人在梁上站岗（于学忠队伍）。〈他们〉给伤员馒头吃，并说："吃饱着点，把伤养好了，还打他们去！"

佟靖功采访

孙永勤打宽城是“一打”而不是“三打”

作　　者：杜青怀

写作时间：1987年4月1日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作者本人处

最近看到许多史料文章记载有关孙永勤打宽城一事，文中说：孙永勤于1934年10月率一千多名抗日军第三次攻打宽城镇（头两次经宽城商民劝解半途而止），消灭日伪军三百多人，残敌弃城向青龙方向逃窜。笔者认为，这个史料无论是作战时间上、作战对象上、作战结局上都有很大出入，很有纠正之必要。

孙永勤打宽城是“一打”还是“三打”，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当年亲身经历者、目击者、知情者三十多人次，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经过座谈回忆，查阅资料，基本弄清了始末来由。

孙永勤打宽城是1934年公历6月22日左右（阴历五月中旬）。参加座谈的许多老人说：刚到夏至，正是剩大烟时节（注：当年夏至是6月22日，阴历五月十二日）。孙部来打宽城就这一次，不是三次。是五月，不是十月。第一次是1929年11月［此时间上又有手写“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字样，似在更正］，小白龙率千人左右打进宽城。早晨进街，下午四点左右钟撤走。第二次是1933年秋季，镇山虎率三百多人打进宽城。没有久站，第二天清晨撤出。第三次才是孙永勤部队攻打宽城。孙部主将赵四川率近两千人，从承德方向，经宽城小前坡峪，于傍晚到达下河西、上河西、缸窑沟门儿。部队一到，全部抢占山梁，打的野盘，老乡家一户未住。从岔沟门儿一直到东岭子（宽城街外一山岭），长达十几华里山梁全部布满军队，把宽城街围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另半圆是陡峭大山），双方战地中间横隔一条瀑河。孙部指挥部设在下河西的后杨树湾，是个简易席棚。孙部大旗插在下河西后山梁的最高地，还架有两门小钢炮，炮口直对宽城街。河对岸杨树行战壕里是商团[1]、民团[2]，没有日伪军（孙部未到，有人告密，商民团得知军情，提前两天就沿瀑河岸挖好战壕。当时商会会长是王俊波，商团团长是

[1]　商团：为维护商家利益，由商会牵头，组织各商家出钱雇人组建商团武装。有总团，下设若干分团，每团二十至三十人不等，统一归商会领导。

[2]　民团：为维护乡镇豪绅富户利益，由巡警局牵头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



杨香普，镇民团团长是翁容久）。商民团员约有二百来人。商民团的武器全是商会组织各商号[1]集资购买的新武器。双方人定时开的火，战斗非常激烈。作战中，上河西、下河西老乡给孙部送水送饭。特别是下河西是拦截敌人要路之口，因此守兵最多，仅一处就有四五百人，当然下河西群众负责战场供应任务也就愈大。一河之隔，双方怒骂声听得真真切切。孙部将士向对方中下级人员大喊："你们一个月挣八九块钱，给谁卖命呢？"当见到街里买卖家弃货逃窜时，孙部向街里百姓高喊："穷哥们，你们见东西咋不拿呢，打宽城就是为了咱们穷人！"当作战到第二天时，街里商会准备调集乡下的峪耳崖、板城、汤道河三个民团五百多人到宽城（峪耳崖民团团长是刘述，板城民团团长是李介侯，汤道河民团团长是王三喇叭）。援军一到，商民团凶气大长，火力倍增。当打到第三天下午时，孙部马二炮头在上河西王申斋院墙下掩蔽还击时，不幸被对面（马神庙，现宽城街瀑河桥头）敌人击中，当即阵亡。加之孙部子弹所剩无几，只好用石块敲打铁桶，以迷惑敌人。因此孙部只好下令停止战斗，于傍晚全部撤出阵地，从原路撤回承德方向。这次战斗打了三天三夜，双方没伤亡多少人，只有街里一个卖烧饼的妇女，绰号叫王大包子，当双方开火时，她去上河西卖包子，中途中弹身亡。战斗结束第二天，商会下令各商号出钱，进行所谓慰劳全体参加人员，以鼓士气。

战斗经过基本就是这样。当笔者问到，孙部来这么多人，商民团六七百人，为什么没有打进宽城呢？参加座谈的老人一致认为，攻城不破原因有三：第一，情况不明，地形不熟；第二，孙部武器低劣，好多都是徒手战士，双方武力相差悬殊；第三，街里百姓未有安排疏散，惟恐双方开战过多伤害百姓，故此不敢大打；第四，敌方早有准备，工事防守坚固；第五，孙部虽未打进宽城，但是给反动势力一次沉重打击，商团民团再也不敢随意出没良民百姓家里，巧取豪夺，坑害百姓。

综上述，孙永勤打宽城是"一打"不是"三打"。是1934年6月，不是10月。是与商团民团作战，不是与日伪军作战。攻城未破，而不是打进宽城。双方未伤亡多人。当时之所以这样记载，可能出于某种宣传需要，鼓舞士气。

以上个人浅见，难免主观，敬请大家指正。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办　杜青怀

1987年4月1日

[1] 商号：向商会立字号的买卖家。当时宽城街立字号的有三十六家，没立字号的有十九家（主要是小摊点）。主要大商号有：福兴合　福厚昌　福聚成　福厚兴　福德永　德玉兴　德胜永　德胜全　永玉成　永吉成　永聚成、永兴成、永兴昌、永庆成、永丰玉、永德发、义庆成、义成永、同发永、同济堂、天德泰、万泰兴、广来永、长发祥、长茂祥、谦兴德、春生堂、长城药店。

附件：

关于孙永勤三打宽城座谈记录

时间：1987年3月24日下午

地点：下河西

参加人员：赵凤德、张德勇

赵凤德（现年82岁，社员）：

孙永勤打宽城已经五十多年光景了。前两次打宽城不是孙永勤，而是小白龙、镇山虎。第一次是小白龙打的，是在民国18年11月。来的一千多人，早晨进的街，下午4点多钟走的。为什么没久站呢？当时宽城街有个回民阿訇叫王少武，与小白龙认识（都是凌源人）。王少武告诉小白龙说："这里不能久站，民团多，又离承德汤大帅近，闹不好会吃亏的。"小白龙听完，决定立即撤出宽城镇。第二次是镇山虎，于秋季带了三百多人打进宽城，不到一天也撤了。第三次才是孙永勤部队。他是在民国22年阴历五月过来的（正是剌大烟时候，就要到夏至了）。他们带有一千多人，从小前坡峪过来的。晚上到我们这上下村庄后山打的野盘。部队从东岔沟门一直到东岭子，长达八九里都是他们的人。瀑河对岸是宽城镇商团民团二百多人，趴在早已挖好的战壕里，都是杨树行，他们在暗处，孙永勤在明处。人定时开的火，打了三天三夜。街里商会一看很危险，就调峪耳崖刘述民团、汤道河王举人民团、下板城李介侯民团前来救援。这样镇商团、民团加上乡下民团一共六百多人死死抵抗，孙永勤部也打不进去。我们下河西是主战场，我们大庄、前后杨树湾子、上河西群众负责给孙部送水送饭。我是亲眼看见上下川后山都是孙部人员，作战双方高声怒骂听得真真切切。孙部见街里老百姓吓得乱跑，就高声大喊："穷哥们，你们不要跑，不打你们，不碍你们什么事。"见到街里买卖家丢下货物逃跑，孙部就喊："穷哥们，你们为啥不拿呢，打他们就是为了你们！"同时还听见孙部对商民团团员喊话："你们一个月挣八九块钱，你们还在这顶着打，给谁卖命呢？"

到了第三天下午，孙部二头子在上河西孙发当院把院墙掏个大窟窿，伸枪向对面瀑河桥头与马神庙那打，结果对面一还击，把二头子打死了。孙部立即命令撤出阵地。吃完晚饭，孙部顺原路小前坡峪翻梁向承德县方向撤回去了。

孙永勤来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打进宽城呢？据我所知，一孙部人多武器少；二是情况不明，地理不熟；三是对方早有准备。对方有一定作战能力，商会会长是王俊波，商团团长是杨香普，镇里民团团长是翁容久，还有两个小头目，一个叫李永生（外号叫李三白话），另一个是



刘品一，他们都有一定军事素养，受过训练，枪法挺好，指挥能力强。当时街里有字号的买卖家有三十六家，加上没立字号的买卖家，一共有四十多家。商团人员都是买卖家出钱雇的，每人每月六块钱，都雇的是壮年、枪法好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从奉军回来的人。对此，孙部就差火候了。我看不少人手里没枪，徒手战士，有枪也是旧套筒子、破洋炮。这么多人就仅有两三个小钢炮，在我们后山架着。结果双方武力相差悬殊，所以也就没打进去。

张德勇（78岁，社员）：

孙永勤打宽城那年我19岁。我记得是刺大烟季节过来的，他就来这一次。前两次是小白龙、镇山虎打的。孙部赵四川带一千多人从小前坡峪过来的，到我们这已经吃完晚饭了。我亲眼看到上下河西、陆庄子后山都是兵，把宽城围个半圆圈。瀑河对岸就是镇里商团民团，趴在战壕里。人定时双方开的火，子弹嗖嗖地顺我们头顶直过，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趴在炕沿根底下。打了三天三夜，孙部也没打进去。商会调来峪耳崖（九区）、汤道河、板城民团，人家人一多，武力也强了，孙部就更打不进去了。再加上孙部二当家的一牺牲，司令部就立即命令全军撤退。第三天晚上撤的，顺原路向承德方向去了。

记录人：杜青怀

时 间：1987年3月25日上午

地 点：下河西

参加人员：张德发、张德生、郑张民

张德发（74岁）：

孙永勤打宽城，我那年十九岁。那年二月日本到宽城打喜峰口，五月节后，孙永勤就带来一千多人打的宽城。当时宽城街只住一两个日本人，大部是商团、民团。商号有三十多家（指立字号的），商团有四十多人，民团有一百多人。商会头子是王俊波，民团头子是翁容久。

我记得孙部是晚上来的。他们部队都没进庄打扰老百姓，全部在山上打的野盘。部队从岔沟门一直到东岭子，把宽城街围个半圆形。隔一道瀑河，对岸是个大杨树行，都早已挖好了战壕，商团民团在壕里隐蔽待打。人定以后开的火，打了三天三夜。商团看着不好，就急忙调来板城、峪耳崖、汤道河民团救援，加在一起，对方有六七百人。他们武器挺好（都是新买的），火力挺硬，加上第三天下午，孙部二头子在孙发家被打死，部队于第三天晚上就从小前坡峪撤回去了。

作战中，我们上下川村子穷人负责给孙部往山上送水送饭。我们庄是主战场，后山架两个小钢炮。打得激烈时，我在我家院墙根下亲自听见孙部人员向对方团员大喊：“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这么不要命地顶着呢？”

这次双方哪也没伤亡多少人。孙永勤打宽城这一次，以后再也没来。

张德生（77岁，社员）：

孙永勤是我22岁那年过来的。记得过端午节不久，正是剥大烟时候。孙部总有一千多人，近两千人，晚上到这的。部队一到，就把我们上下川后山占领了。是从东岔沟门到东岭子，长达七八里，把宽城镇围个半圆形。河那边杨树行战壕里全是街里商团、民团，持枪隐蔽。人定以后双方开的火，打的挺邪乎，子弹雨点似的。

郑张氏插话（张德生之妻，73岁）：那年我刚结婚，18岁，从来没经过这样场面，吓得我从后院墙爬过去，跑到高粱地躲着去了。就听着孙缕子〔绺子〕这拨人喊："你们一个月挣十几块钱，还卖什么命啊。"

张德生继续说：

打了三天三夜，街里商会从乡下调来三四个民团，有峪耳崖的，有板城的，还有汤道河、新甸子的。总共有六七百人，他们武器硬。到了第三天下午，孙部二当家的（实际是二炮头）在孙发家当院被打死了。孙部下令全部撤退，晚饭后从小前坡峪奔承德县方向去了。

郑张氏：那回孙缕子〔绺子〕部下有一个人违反军纪，在街外黄土梁子那就地正法了。

张德生：孙永勤打宽城那年，我记得街里没有什么日本兵，有也是一星半个的。当时有巡警局。打宽城目的就是抢街里买卖大户，杀富济贫。

记录人：杜青怀

时 间：1987年4月7日下午

地 点：下河西

参加人员：赵凤明、张德民、张德金、刘景合、王乃文

赵凤明（78岁，社员，原德玉兴店员）：

孙永勤打宽城那年，我正在街里德玉兴买卖家当店员。孙永勤缕子〔绺子〕是1934年阴历五月份围打宽城的，他就来这一次。我记得，孙永勤缕子〔绺子〕来宽城前两天，街里商会、民团就知道消息了，商会命令街里商团、镇民团到瀑河沿杨树行挖战壕，准备拦截孙部进街。当时街里大小买卖家四十多家，为了维护商人利益，在商会领导下，组织商团、民团武装自卫组织，两团加在一起二百来人（都是买卖家出钱雇的人，每月最多的二十五块，最少六块钱，一般的是九块）。我店白经理（叫白昆化，迁安县人）听说孙永勤缕子〔绺子〕要打宽城，先让我们几个年轻的店员躲到乡下去了。我去的是峪耳崖，打宽城前一天走的。回来听白经理说，孙永勤缕子〔绺子〕带来一千多人，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打进来。当时亏得调来峪耳崖民团、板城民团、汤道河民团，不然也够呛。咱街里一个人也没伤着。



张德民（73岁，社员）：

我是卖窑货出身，孙永勤老家我都去过。

孙永勤打宽城那年，是他部下赵四川领来一千多人，将近两千人，是民国22年阴历五月中旬左右来的，可能离夏至不远了。是晚上从小前坡峪那过来的，部队一到，就占满了上下川大小山梁，战线总有七八里长。西到岔沟门，东到东岭子，把宽城街围了个半圈。我们下河西是要塞，部署兵更多，后山梁人挨挨的，插着孙字大旗，山梁顶上冲着街里架着两门小钢炮。瀑河那边就是商团、民团。开火前，孙部就让我们庄里人男女老少在家躲着，不许乱跑。人定时双方开的火，孙部先打第一枪。枪声爆豆似的。我们村前后杨树湾子、下河西庄给部队送水送饭。我和刘景春都送过，那年虽然挨大饿，但各家都做的是干饭。打了三天三夜，街里商会从乡下调来民团，六七百号人，趴了一河套沿（都在战壕里）。街里那边火力硬，孙部打不进去。第三天下午，孙部二头子在孙发家当院被打死，这才宣布部队全部撤退，晚上从原路回去的。

张德金（74岁，社员）：

孙永勤只有一打宽城，不是三打宽城。孙永勤打宽城那年我19岁，那年五月一天晚上来的。从陆庄子到东岭子山梁上全是孙永勤的兵，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打进去，最后从原路小前坡峪向承德方向撤去。

刘景合（78岁，社员）：

孙永勤打宽城那年我是23岁，可能是民国22年阴历五月十几。我记得，我正在烟地里刺大烟，一听枪声，扔了二十多烟盒跑回家去。我在烟地里清楚地看到我们上上下下村庄后山都是孙永勤的兵，把宽城街围个半圆形，总有一二千人。他们的司令部设在后杨树湾。先天晚上双方开火，开始时不太激烈，第二天天刚一蒙亮，打得就凶起来了，枪炮声听不清个数。我们全家老少都〈趴〉在炕沿根下，我有时站起来向外看，只见东岔沟门和我们后山插着大旗，双方连打带骂，听得清清楚楚。孙部人员大喊："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这么卖命。"我们下河西后梁兵最多，因为是要路口子，拦截对方进攻。对方商团、民团就在对岸杨树行战壕里，商团团长杨香普、民团团长翁容久指挥。打到第三天，商会调来不少乡下民团，这下子更打不进去了（当时子弹打光了，从庄里弄了不少铁桶，乒乓乱敲顶子弹），第三天晚上撤回承德方向去了。

这次战斗，双方没伤亡多少人。我就知道孙部牺牲一个二头子，是在上河西孙发家当院被打死的，用孙发家门板给抬到沟门给埋了。老百姓死一个，就是街里有一个妇女叫王大包子，双方开火时，王大包子挎着烧饼筐去上河西卖烧饼，半路上被打死的。有人说这次打死不少日本鬼子，那是不实。宽城街住大量日本鬼子是1937年以后。1934年2月日本鬼子在宽城占一两天，就打喜峰口去了。那时街里是巡警局，没日本鬼子。

王乃文（72岁，上河西社员）：

孙永勤打宽城是1934年5月。他就打这一次，前两次是别人打的。第一次是1932年小白龙打的。这次我被小白龙缕子〔绺子〕第一队绑秧子绑去的，是旧历十一月初二，在外一共二十七天，十二月二十九到的家，两手冻掉。第二次镇山虎打的。第三次才是孙永勤。他是阴历五月来的，一千多人，都在宽城街外围山梁上。打了三天三夜，没打进来。因为街里有商团、民团二百多人，又调来乡下不少民团，一共六七百人，武器比较强。孙部火力差，始终打不进去，到第三天夜撤回承德县去了。

时　间：1987年3月21日

地　点：宽城镇

参加人员：鲍凤朝、刘士恩、许成芳

鲍凤朝（74岁，离休干部）：

孙永勤部打宽城的具体时间是春季四月份，即1934年4月。此部由上谷那边经大前坡峪而来，部队住在上河西、下河西、大前坡峪、小前坡峪，有千人左右，是孙部一部分人。打宽城的时候，孙部没有打进街，而是在街外交的火。孙永勤打仗勇猛，他打仗是为抗日，不是为钱财。

刘士恩（77岁，社员）：

孙永勤的部队在上河西打过一次，是在小白龙打宽城之后来的。当时我正在德胜泉（北烧锅）当店员。

许成芳（82岁，社员）：

孙永勤部队，1935年4月由大前坡峪那边过来的，同时也是从原路撤回去的。他的部队到宽城只打过一次仗，地点是上河西，没有进入宽城街。

调查人：刘美英 李翠荣

1987年3月21日

时　间：1987年3月19日

地　点：宽城镇

参加人员：王会川、全玉仁

王会川（82岁，退休医生）：

我记得打宽城有三次。第一次是1939年11月，这年发大水闹蝗虫，来的是小白龙，一千左右人，在宽城待了半天就走了。第二次是1931年秋季，是镇山虎，来了三百左右人，站了一两天就走了。第三次是1934年四五月间，孙永勤部下首领带一千多人从承德方向过来，驻扎在上



下河西，打了二三天没打进去，就撤了。当时宽城街大小商号四十多家，在商会的组织下建立商团，三四十人。还有宽城镇一个民团，一百多人，团长是翁容久。在开火期间，商会从乡下调来三四个民团，火力较硬，孙部未打进宽城。那年我家开的是药店，打仗那天我躲到板城去了。我记得这年街里没日本鬼子，只有一个巡警局，是汉人。

全玉仁（77岁，市民）：

孙永勤打宽城那年，我正在街里万聚永当店员。我们经理姓白，迁安人。那年我22岁。记得孙部未来之前，有人报告商会、民团，说孙永勤要打宽城，结果商团、民团就组织人力，在瀑河沿杨树行挖战壕，各买卖家准备物资、食粮，供打仗之用。结果孙永勤晚上来了。一交火，双方在瀑河两岸打得挺激烈，商会急忙调乡下民团来救援。结果，孙永勤部队打不进去，就从原路撤回去了。双方都没有伤亡多少人。打完仗，商团出钱慰劳参加人员。

调查人：杜青怀

思文同志介绍宽城核实情况

讲 述 者：杜青怀

讲述时间：1987年4月7日

记 录 者：佟靖功

记录地点：承德地委党史办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宽城杜青怀同志说：

一、孙永勤三打宽城就是一打。1934年刺大烟的时候，由赵四川率领的，一千多人。群众说部队包围宽城半圈，没有两千人不可能。是从承德县过来的，野营，未惊扰百姓。入定时开仗。开火后，商团还击。围了三天三夜。第三天从洒河桥〔澈河桥〕来个民团，民团、商团计六七百人。老百姓拥护孙部，以后孙部撤回。双方共伤十余人。孙部第一天围宽城时，群众乱跑，孙部让群众去拿东西。群众拥护，商人反对孙军。

未打下来，〈原因是〉①孙对敌情不明。②武装低劣。③长途跋涉。④群众未疏散好。

二、商人集资是二次，1931年给镇山虎集过资。

三、三打时，商团长〈是〉李三白，民团〈长是〉翁荣久。

四、宽城有柳河，没有流河。

五、三打，洒河桥〔澈河桥〕民团增援。

六、救妇女的事不成立，击毙日军事不成立。

七、有烧饼铺一地，在喜峰口外，敌人伤亡几十人。运走几汽车尸体不成立。

八、汤河口没有，瀑河口有，贾家安截三艘船的事有。两船人，一船物资，大米白面二三千斤。

九、九虎岭打仗，1934年9月打死日军六七十人，伤日军几十人。日军没有死伤五百人。

十、打烧饼铺的时间对，仗也打了。

佟靖功记录



关于乱石沟活捉日本人及翻译郑宏彬的调查

讲 述 者：齐林、齐云、马祥、王宗泽、吴从山、吴从信、田贵珍、徐开士

讲述时间：1987年4月15日

采 访 者：闻成

文件原名：《抄件（送党史办）》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1935年春，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一部（27人），在楸科峪〔秋科峪〕外的乱石沟，巧遇敌孤山子海关署的两个日本人、一名翻译，带一匹白马（三支短枪），去乱石沟逛山景，发生战斗。在沟门击毙日本人佐佐木，活捉署长徐藤［一说为“斋藤”，一说是县里署长下去检查到孤山子或称罗文峪海关署的”］，翻译——中国人郑宏彬（东北人），缴获短枪三支。白马（已死）和鞍鞯为楸科峪〔秋科峪〕人所得。

救国军把这两人带往口里遵化，想从这两人身上弄武器，所以没处理。在吴家沟住一宿时，人们看见过这两个人。夜里上半夜，由于看管士兵疏忽，郑宏彬逃出，向遵化敌人报告。次日发生茅山〔毛山〕战役。

郑宏彬回到孤山子海关署，要在楸科峪〔秋科峪〕、干楂峪〔甘查峪〕找财主赵家等诈财。在干楂峪〔甘查峪〕抓走了一个人，用钱赎回。郑在乱石沟齐家找回了铜马镫。

上述情节是大厂的齐林、齐云、马祥，楸科峪〔秋科峪〕的王宗泽，孤山子的吴从山、吴从信、田贵珍、徐开士八人提供的。

注：被捉的翻译官不太可能是王善礼。包森部侦察员在张家坟活捉赤本大佐，捉住的翻译官是否是王善礼？王是否即遵化城南团瓢庄大地主的儿子？有个王翻译因出事被日人解雇，去遵化南关西岔二中当日语教员。

闻成

1987年4月15日

对民众军在我村我家宿营的回忆

讲 述 者：陈安良

讲述时间：1987年9月4日

采 访 者：闻成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今年74岁，现住吴家沟村。

闹民众那年，一天下午5点多，我和老叔陈贵平、吴广胜在狮子峪薅粳子，从陡岭子过来的民众军一部先头部队叫我们仨给带道，说明从鸡鸣村去傅家城出口。我和尖兵走在最前面，我老叔和吴广胜在中间。我们走到三里店庄北梁根，看见山上乡团六七人（正换岗），坐椅子的孙永勤派人上山联系借道，乡团不肯借。这股乡团只有廿八人，总部在松棚营，怕民众缴他们的械，谎称七八十人。民众军怕强过易惹事，怕乡团从后面打，为此，孙永勤决定返回，住吴家沟。

庄西路南从西数第一户张志耀〔张志跃〕，第二户是我家。我们两家房子多些，军部设在我们两家。孙永勤住张家。我家东厢房（两间瓦房）押两名日本人（绑着）、一名翻译官（没捆）。南屋正房也住军部的人，听口音有当地人。后来知道这几个本地人后半夜结伙向西逃去，没上茅山〔毛山〕。

那两名日本人在茅山〔毛山〕上被民众军打死，次日把两具尸体运走了。

陈安良口述（右食指指纹）

闻成记录

1987年9月4日于陈贵平〈家〉

对孙永勤的救国军的回忆

讲 述 者：吴宗耀

讲述时间：1987年9月5日

采 访 者：闻成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今年82岁，现住吴家沟村。

民众军来吴家沟住，我看见孙永勤坐爬山虎（一把椅子，四个人抬）进村。另一名头目骑匹黄马，两名警卫员，住吴占祥家，听说是瀑河口人。这人死在茅山〔毛山〕，次日我上山看见了死黄马。

茅山〔毛山〕战斗结束，下午一股日军带七名俘虏到吴家沟村西，找我、陈贵平等几人挖坑，活埋人。我看见七人中一个四十多岁、胡子很长，突然向日军军官和那名廿多岁的翻译官用日语讲话，立刻受到欢迎，给他一支撸子。接着就杀人。一个小伙子撒腿就跑，等日军要开枪，他已跑出十几步。日军没追，也没开枪。听说这人是糜子地村的。杀死五人，天黑他们走了。次早这两名翻译官又乘汽车来了，在吴家沟村要八名壮年、两付门板和杠子、绳子，另找张启生牵一头毛驴，两名翻译官轮流骑，带我们到三道茅山〔毛山〕（顶峰下），从沟里挖出两名日人尸体。四个人抬一个，送到东小厂，装上汽车，放我们走了。

几年以前，承德地委来人在遵化县委找赵涌兴，赵让他们到吴家沟找他岳父吴秀和，找我去问民众军的事，说清孙永勤的家属在原籍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要求我们如实说明情况。我讲了上述这些，录了音，给我照了相，表示十分感谢我提供了十分珍贵、可靠的材料。

吴宗耀口述（右食指指纹）
闻成记录
1987年9月5日于陈知生家

关于口外、遵化城东一些志士参加抗日暴动的回忆

讲 述 者：吴宗耀

讲述时间：1987年9月5日

采 访 者：闻成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今年82岁，现住吴家沟村。

起便衣队那年，口外的年队长带队伍两次来吴家沟村，手下有股长、队长、队副，官不少，实际只有六七十人。第二次住吴家沟，在村西放一名岗哨，被两名便衣下去了枪，并在西河套用这支步枪打了一枪。这是附近日军据点的小队长春木（人们叫他椿木嘎答〔疙瘩〕）和特务××去松棚营特务家去喝酒，回来途中夺的枪。

年队长在这一带，没听说还有何叔叔。他手下有个股长是东小厂村的国占全，后来跟岳县长（长林）当八路军，又叛变当特务，被我方处死了。

上港的岳长林带领便衣队在长城东活动，后来与包森队伍联合，带二大队。一次在庄客（九虎岭南麓）被敌包围，岳被捕。以后从敌人手跑出来回村，与九区区长丁冲不睦，土改时又和群众打死上港村村干一人，下石河村群众起来要岳偿命，这时已任县公安科科长的丁冲泄私愤，逮捕岳，错杀。

这时何广永（下港村人）也起便衣队，拉一拨人，当队长。一次他在大寨西的长圩村住在女朋友（姘头）家，被部下杀害。

城东西还有十七人的九路军，后为包森队伍处理。

吴宗耀口述

闻成记录

1987年9月5日于吴家沟村陈知生家

对何广永、马保德的回忆

讲 述 者：吴宗耀

讲述时间：1987年9月5日

采 访 者：闻成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民众军里有个队长叫何广永，听说，在口外他率队活捉了三名日本人（其中一人是翻译官）。他是下港村〈人〉，兄弟仨（广来、广永、广申〔广森〕即后来的何子桥）。

东双城村有马宝德〔马保德〕、马宝贵〔马保贵〕兄弟俩，但不知道他［指马保德］在民众军里的所有情况，他的结局我也不清楚。

吴宗耀口述

闻成记录

1987年9月5日于遵化县

东小厂乡吴家沟村陈知生家

关于孙永勤民众军的回忆片断

讲 述 者：贾明玉

讲述时间：1987年11月22日

采 访 者：闻成

抄件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家住松棚营（遵化县东小厂乡）西沟——高家峪村，现年65岁。吴家沟住民众那天，有一部分队伍没在吴家沟住，走山道从庄客西沟往西转移了（后来才听说的）。我家住沟口——黄花峪，在道北，过队伍能听到。而且当时松棚营驻有乡团。

西去的民众必须走到我村紧西沟脑〈垴〉梁根下的柴庄子，然后拔梁过架大山，下山即是房山沟、大屯南山……次日在那里也发生了战斗，这也是以后听说的。

贾明玉口述

闻成记录

1987年11月22日于吴家沟村

赵廷山同志回忆录

讲 述 者：赵廷山

讲述时间：1988年12月13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赵庭山〔赵廷山〕同志回忆录》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勤是军长，我爸爸是副军长。

茅山〔毛山〕，我父亲出去到围场。

赵四川，白脸膛，四方脸，中上个，当地口音。

打车河口后，民众去埋葬。民众军的名单，被日军发现，在赵来怀里。

1. 赵林
2. 柴启瑞
3. 孙永勤
4. 马宝德〔马保德〕
5. 赵有
6. 赵存

来抄家，我们都跑了。

我们各家跟着往南走到黄花川，头后晌走的，第二天后晌打。三十后晌打车河口。我在外躲了一冬。孙永勤回来抓了陈混蛋。在大平台打一仗，我父亲受伤，大腿中一枪。上老梁，在老梁二三个月。赵有是军法处长，看两个日本人和抓去的有钱的。孙永勤出门去打宽城。

抓住俩日本〈人〉、一个翻译官。翻译官答应给咱们枪，孙永勤把翻译放了。没超过二三天，日本〈军〉来了。傍亮天时，日本〈军〉摸上来了。咱们站岗的抽大烟去了，日本〈军〉从小后福——老梁东摸上来了。就能走一个人。摸了两道卡子，占了战壕，蒙蒙亮开火。咱们人都跑到南山。好几架日机扔炸弹。

棺材沟到大平台，有一小道。

老梁上到沟门。

北山叫老梁后山，阴面〈有〉三道沟。

二道沟那边南坡叫大坡，老梁上。

老梁前山，前山阳坡是八道石湖。

那时都是大柴禾，小后福杨松有的是。打一天，日本〈军〉退了。咱们从小后福奔八家了。先走的，用船过滦河，敌人打沉咱们两个船。

孙永勤，大个子跟他［指佟靖功先生之子佟明开，身高1米92］差不多，眯缝眼，脸盘与他差不多，嘴有点歪歪，枪法好。

赵廷玉——赵堂的大儿子，死在九道岭。大彭杖子煤局北山就是九道岭。

二十四五岁。

张福山，六队队长，在一个洞里。

打河口黄花川时我回来了。北川〔北鄺〕南山四道沟有个洞。在洞里，张福山对我说，张福山说，孙永勤受口里的伙会的骗了。骗到茅山〔毛山〕，受包围，说孙永勤自刎了。他在一个什么小洞里，被打散后，没子弹跑出来了。

警察彭显廷。

胡品卿，下板城甲长，带着彭显廷。他俩没让警察上去，“我俩先上去”，给我大姐找的主。把别人都围在洞里，单把张福山带下去了。

张福山在路通沟牺牲了。

孙永勤绑过高二绝户，跑了，盯得紧。他爹被张福山毙的。

陈混蛋让警察赵福回来说孙永勤，没说了，那夜赵福住辛增歧〔辛增祺〕那了。然后警察把辛增歧〔辛增祺〕枪毙在河沿。

警察，王岐山警察，不是村长。

孙成用一根细筬〔席篾〕撅两截，捣鼓捣鼓，就算计。

赵有、赵廷普都死在茅山〔毛山〕。

赵有是我堂叔伯叔叔。

孙永勤与张福山的大哥最熟。他大哥给孙永勤做零活。他们哥六个，张福山是老三，老四张福瑞。张福山小个儿，挺粗壮，有劲。张福山在这种我们的地。

当时栽两棵烟也要税，干啥都要税。我们外边有一片地种种大烟，要大烟干儿，缴了后还要，把我爸爸弄到警察署，打，没治。张福山把孙永勤请来了，商量。

马保德是羊皮挑子，在我们家站脚，我们家有吃。在茅山〔毛山〕时，他又拉出去跑了。

佟靖功采访

杨秀琴等回忆抗日救国军

讲 述 者：杨秀琴、赵玉先[1]、栾成章、赵廷江、赵廷梁

讲述时间：1988年12月13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承德县老梁村老人杨秀琴（80岁）》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赵来在车河口卖首饰。有一年冬天，正月，赵来、马宝德〔马保德〕、赵林他们在路通沟耍钱。输多了，怎么办？日本人来了，就去老牛河口修铁路。也没挣来钱。再商量，把柴积瑞〔柴启瑞〕（东郭杖子人，上谷郭杖子人）〈请来了〉，柴积瑞〔柴启瑞〕是先生，会推八门。柴积瑞〔柴启瑞〕推八门说，不能从大门走，半夜子时走。从下板城撕来红布，做大旗，上写抗日救国军。招的人有赵存、赵堂的大儿子、赵有、赵来、赵林、赵林的大儿子赵廷普（18岁）、马宝德〔马保德〕、赵林的地户张二、张三（张四还活着呢，现在狼窝呢，张四没去）、孙永勤，他们一起到老梁上，在老杨家（我的娘家）安了大柜。没有粮草，就出去绑秧儿……在老梁上待了好几个月，我们庄的人都给站岗。日本人来了，他们都跑了。屋子里墙上挂个老奉军的帽，黄布三块瓦的，他们的男的赵廷在下板城卖柴禾买的。日本人问帽子哪来的，要毙我。翻译说是赵廷买的，没毙我，日本人走了。后来日本人又包围老梁，日本飞机扔炸弹，我爹死在炭窑里了。我二哥跳在萝卜窖里，日本人打了七枪，我二哥死了。白天前晌炸的，那人死多了。我老兄弟杨万成那次被日本抓住，带到老梁沟门，被日本人用烙铁烙，浑身全烙了，死了。我的老兄弟媳妇被日本人扔在火堆上，烧死了。我妈被吓死，又被日本打了三枪。

赵林他们被打散了，就奔车河口，袭击车河口警察分驻所。赵来、赵福亲哥俩商量里应外合。赵来他们进去了，把警察堵在屋里。赵来以为赵福在里边，就没先开枪。结果警察先开枪，把赵来打死了。赵来是文书。赵福（警察）当时被调走了，那夜宿在辛家庄了。赵来死时，脑袋上还带着枪子，疼得咬地，牙都咬掉了，挠地，指甲都挠没了。

张三和廷山、廷山的妈、廷山的大姐（栾家大姑奶子）、二妹子被抓着。下板城的排〔牌〕头〈叫〉胡品卿，胡领着日本〈人〉来抓，在北川〔北鄗〕大洞把这些人抓住。栾家大姑奶子给胡磕头，胡把那些妇女都放了。日人把张三（是起义军中队长）带到鹿同沟〔路通

[1] 据赵林之孙赵文忠回忆，他大姑的名字叫赵玉芝，非赵玉先。

沟〕，让张三说鹿同沟〔路通沟〕谁是坏人。张三说，都是好人，就是我抗日。就在这个后山，日本人把张三绑在桲罗树上，一日人照张三脑袋十字架砍两洋刀，张三没叫唤。日人又一刀扎心窝，张三叫唤一声。次日，日人又来，把张三脑袋砍走，带到满铁。张三那时28岁，在满铁（下板城）悬头一个多月。

赵廷普28岁死在茅山〔毛山〕。赵堂的大儿子也死在茅山〔毛山〕。

赵林，老梁一散，赵林奔围场了，奔他姥姥家。在那挑货郎挑，解放后患伤寒病死了。后来廷山舅舅给廷山来信让去起尸首，廷山去了。埋尸首的人没在家，没起回来。赵有和赵堂的大儿子都死在茅山〔毛山〕了。

赵玉先（76岁）

我弟弟赵廷普21岁死在茅山〔毛山〕。

商量打日本有赵来、赵林、孙、柴启瑞（上谷）、马宝德〔马保德〕、赵有、赵存、张福山。

孙成，老道衣服，30多岁，中等个，长巴脸，当地人口音，在杨树洼三仙洞住。

商量日子不少了，明5点起事，往南走。

打车河口以后我跟着走了，到墙子峪王家一些日子。他们往南开火，我们就往回奔了。在大洞半个月，在北川〔北鄺〕大洞里，我姐、妈、老妹子。

好不错的给送点米汤。不久，张福山也去那洞里了。那时我23岁，没主呢。

栾成章：朝梁子人，我怎么落在这呢？这是庄头地，都归下板城烧锅，庄源亨。这里地让他们种，我来这给应名，到土改时就没回去。

马宝林〔马保林〕在这买羊皮，他弟弟马宝德〔马保德〕就在赵林家住着。马宝林〔马保林〕是马宝德〔马保德〕的二哥。

赵来祖辈当掌柜的。股东是人家，赵来给人家当掌柜的。受雇，在车河口。以前在下板城孙勇堂果子铺当掌柜的。

赵廷江同志：有人说赵来是孙永勤的大队长，我们这边人说赵来是孙永勤的文书。

赵廷梁同志：我父亲叫赵廷，赵廷说过赵四川的名字。在老梁打死不少日本，运回好几汽车日本人死尸，弄回承德满铁火炼的。

赵廷普、赵堂的大儿子赵廷玉是孙永勤的亲兵。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承德县老梁村老农吴连杰同志回忆

讲 述 者：吴连杰

讲述时间：1988年12月14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勤是孙杖子村人，当过多年村自卫团团总。张杖子有一个姓张的大地主，孙永勤不得烟抽。孙永勤与路通沟赵林相好，马保德、马保祥也与赵林相好。孙永勤投奔赵林这来，孙、赵、马、马会见。赵林住在路通沟柴禾沟门，赵林是当地小财主，赵林会要钱。那时讲天津字票子，比满洲票值钱，能顶现大洋。赵林输了3000票天津字票子，赵林走投无路，正赶孙来。孙向赵林说："二哥，咱们有家难奔，有国难回了！"赵林说怎么办？孙永勤说起义打日本。赵林说拿烧火棍打不了日本。孙永勤说："三二棵枪，我回去可以闹。"孙说先在你们家这动起来。那时我13岁，正在路通沟给高长贤放牲。赵林动员他大儿子赵廷普（铁蛋儿）、二儿子赵廷山（长存）、赵存（赵林叔伯哥们）、赵存的儿子赵廷玉、赵有、赵来。赵林又动员给他扛活的张福林、张福山、张福存（承德县蓝旗地羊杈子人）。杨树洼里有个三仙洞，供地母三娘的。有个老道叫孙成，会看麻衣神相，推八门，那时30左右岁，他是五龙山那边过来的。孙永勤说得有一个军师，把孙成也动员出来。孙成推八门，说腊月初十去柳河口，砸警察局子，取枪。赵来说："那的署长是赵佩卿（是赵来的同姓不同宗，下板城人）。"约在腊月十七八日，夜，把局子砸了。得个单子撅子，警察都跑了。赵佩卿藏在大门旮旯，赵佩卿开枪把赵来打死。别人都回来。赵林说不幸，刚一出去把赵来伤了，军师算的不吉。这时又把姓柴的请来当军师。柴算腊月二十三或二十五。出发去孙杖子，到孙杖子起出十几棵枪，腊月二十五日正式起义。柳河口上边山环有个吴家套小庄，咱们还得打大顺兴〔大成兴〕，岳老亮开的。打了几天也没打进去。孙永勤调炮，从长城上拿来的铁炮，从潘家口南山二楼拿下两尊炮，在吴家套北边的九道岭上放炮。煤局子四个角，一个犄角一炮楼，两炮都打在炮楼上。那时孙30多人，十八九支枪。还没打进去。老岳家有70多人小队子。孙一退退到暖河〔暖儿河〕满杖子，到打家口遇到一伙柳子〔绺子〕，小白龙，60多人，二流子似的一伙人。70来人，50左右棵枪，两下合伙了。从上谷那边回来，腊月二十五日正式起义。过出去到清河，打杨老文、儿子杨秀山，财主，起出二三十棵枪。增到100多人，过了年，回到路通沟。孙问赵林，上哪去？赵问柴先生。赵有的亲姐夫王占德在老梁（许家）。赵有说上老梁。孙打发赵有、张福山来老梁看地形。孙永勤说，这

地方好是好，就是不能久待。赵林说，南北上不来，东西一卡没事。他们商量，还得在这隐遁一下。赵林在老牛河口那修铁路时，有伙子人是赵林的朋友，（抻头的）赵林把那几十人也拉过来。次年旧历三月初七即上了老梁，从东边干沟子棺材沟上来的。在老梁待了一个来月，那时老梁上还是吴家、王家、杨家、许家四大姓，超不过二十五六户。这时岳老亮已经死了，丘在家里了。孙部又去打老岳家。岳珠环领着家上天津了。孙他们把岳的棺材搁在许家烟筒沟窑里了。这时孙有一个卫队、一个部队、一个稽查队。一天，老柴说这地方不能待了，得走了。赵林说没事。孙永勤说小心没使〔事〕。孙带着卫队到暖河〔暖儿河〕二道河子找财主老孟家，遇到日军，孙退回来。日军又从棺材沟进来，孙带队在松树梁抗击（李家后堵棺材沟上脑〔垴〕），把日本军打抱团了。突然来了六架飞机，把杨家、王家中间大杨树一炸两截。刘殿荣枪法好，刘看到一日军用旗指挥日军，刘一枪（老筒枪）把那日军打死。日机扔炸弹，炸死十几个战士。孙永勤领着出八道石湖，经大彭杖子、转角楼，到遵化。

赵林到车河刹下，奔围场了，做小买卖。

孙到茅山〔毛山〕，上〔中〕了牢笼计。铁蛋、赵有、赵存、赵廷玉都死在茅山〔毛山〕了。马保德、马保林都死在茅山〔毛山〕了。

路通沟支委赵彦丰还清楚点，在大队部那。

我十三四岁时，赵林就50来岁了。

路通沟宋成儒是廷山的二姐夫。

赵林是细把连扦大个子。

他妻大个子，有点麻子。

马保德大个子，胖子，脸上没麻子。

马保来［疑为“马保林”］大个子，挑着羊狗皮。

赵林二闺女脸上有点麻子。

张福山的哥哥张福林死在暖河〔暖儿河〕后窝子了。

小老道叫孙成，小个，车轴汉子，一脸黑麻子，当地口音。云游老道，说不上是哪的人。

我姐姐大姑子的儿子，下板城东李家沟大队刘成章。刘成章与柴磕过头。今年刘成章71岁，还在。他参加过孙部。

武厂公社东石洞的张可顺是三头，死在茅山〔毛山〕。

卫队队长赵有。

文书是姓王的，小结巴。

张福山是六队长，俊巴子，大迫子个儿，是个人物。

稽查长是刘殿荣，打死日本那个人，枪法好，死在茅山〔毛山〕了。



稽查队戴着红袖章。

孙〈永勤〉被叫做大柜。

在我们前梁坡上枪毙一个叫于什么水，他在我们西边站岗。

孙永勤是联庄会会长。

孙永勤让白荣给送来一个七九枪，叫姓于的给留下了。姓于的是牛头山来的工人的头，山东人。他要走，孙让把他那一班人缴械，把姓于的毙了，毙在我这前脸山头了。

我11岁时在路通沟，刘崇经柳子〔绺子〕带着200来人来了老梁，占了三个多月，吃我们粮食。刘崇经往东走，被大柳子〔绺子〕张玉书给缴械了。

刘崇经，奉天人，大当家的，逃到阜新煤窑，死在煤窑了。

谢九洲，二当家的，奉天人，大武家子。

有一个双龙柳子〔绺子〕被刘崇经覆灭了。

张玉书是北边人。他的媳妇落在下板城，嫁到下板城染房，现在活着。其子张宝之现在下板城工作，家在北边大杨树林。

在老许家安孙永勤的大柜，放在赵林姑奶子那。

南坡有个大洞。头道洞装100多人，二洞装100多，三洞100多，往上还能爬出去，叫小南沟大洞。从门到天窗100多米。日本往里打炮炸不着。

〈管孙永勤〉叫孙大酒瓶子，长脸，黄褂子有不少枪眼子。有人说他是娄金狗转的。

井水一丈深。

哨鸡，灰色带花纹，尾巴似孔雀屏，好看。一对一对的。15元一对。一个鸡二三斤，吃石花。

这里是无住地带。

〈赵〉林20多亩地。

〈赵〉来7亩地。

辛增歧〔辛增祺〕，承德那有龛。

挂地，花一个，收10个。

我们缴他三四斗，他连半斗也缴不上。

我们交20升，他交1升。

一亩地缴5两大烟干，日伪戳子大。白要。

一亩地最好能产28两至30两。

日伪要10至15两。

另外还要。

自己最多剩1/3。

我父亲吴永财1996年死的。

王占元84岁。

我叔伯大哥吴连江81岁。

现在76户，317人。

冬暖夏凉。

原有9000多亩山场。

现在4000亩山场。

阴坡青杏，阳坡梓罗、白枣。

井，冬天不冻，属温水泉，井口冬天冒热气。

缸里冻，挑几挑水就化了。

野〈菜：〉山菠菜、山白菜（小芋术）、蕨菜、山黄瓜（菠菜似的，大叶子，黄瓜味）、山马菜、榛蘑、肉蘑、松蘑。

夏天，细心菜，迅甜。

大叶细心菜。

小叶细心菜。

洋桃满山遍野，八道石湖有的是，秧子盆粗。

到八卦岭找修福东，老支书。

赵佩民，老队长。

一进老梁沟，遍野大石头。

旱时没有水，涝时水长流。

［佟靖功先生所画老梁图略］

老梁约12里。

北大砬海拔1300多米。

似龙嘴，20里。

滴水崖。

石头里有石油，传说是海眼，传说14亿年前这里是汪洋大海。

棺材沟东坡。

流水。



吴、王、李、许。

八道石湖：

1. 小旱石湖
2. 大旱石湖
3. 水石湖
4. 牛犊子坑
5. 乱石窖
6. 大冰沟
7. 冰沟
8. 小头道沟

孙部撤退从水石湖东便道下去的。

兴隆县委党史办

佟靖功采访

柳河口村老人回忆录

讲 述 者：张亚香、张金祥

讲述时间：1988年12月14日晚

采 访 者：佟靖功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柳河口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张亚香回忆（女，53岁，柳河口人，娘家大彭杖子）：

岳老亮的大媳妇中等个，精瘦的，白净脸，面善，脑门长个痦子，上面又长个瘊子，平常穿大襟衣服，姓关，口里迁西关家庄人。

另据张金祥说：传说岳老亮的媳妇会双手打枪，曾把孙永勤的人从院子里打出去

张亚香：岳老亮的大媳妇不生育，住东厢房。小媳妇住西厢房，孩子都是小媳妇生的。整个住房占地约十亩，在大彭杖子东庄。大院是正南正北方向（坐南朝北），有大围墙（石头垒）约3米高，四角有四个岗楼，有护兵护院。另在庄西还有一个小院。当时大彭杖子有四五十户人家，有姓张、修、关、彭四大姓，还有个别姓李、姓任的。

岳老亮家开煤矿，大坝上南沿东面和鸡冠子山根存煤，无护兵护煤。

当时流传的歌谣：

六月里开荷花，荷花水上漂。

孙永勤调大队，把煤局子攻。

何玉民〔何育民〕打电话，电话还不通。

……

伪满时大彭杖子是个部落。

岳珠环个头不高，大红黑脸，说话齉齉鼻子。

路科（化名）："满洲国"时是大杖子区长，后在门子哨被捕，在北京解放。和许广峰是老乡（离五里地），67岁。

注：何玉民〔何育民〕是当时的管账先生。

佟靖功采访于柳河口

关于大成兴的回忆

讲 述 者：罗振环、罗振廷、罗振华

讲述时间：1988年12月15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罗振环老人，79岁

罗振廷老人，74岁

罗振华老人，72岁

车河口，六七十户，水陆码头。有六七家买卖，大成兴、平升号、公义合、泰和栈、裕顺号。

大成兴是杂货铺，经理王老瑞、费××（外号废物东家），正东家老岳子。秦老子是看院子的。赵老俊，被打死的。做买卖，要人儿的，人物。

土匪：小白龙、野狼。

参加民众军的：

郝世玉〔郝士玉〕，郝家庄的。

郝敬义，军师。

李长友，石佛。

车河口安过伪警察分驻所。

柳河口安过伪警察署。

岳荫臣，大个子，胖子，长得像当官的似的，出门带几个当差的。有病死的，死后〔丘〕在家里了。传说他棺材里有宝物，有珠子，有钱，让小白龙弄到老梁上去了。以后从老梁把尸首又弄回来埋地里。

发引。

分大成兴是还冷的时候，冬天。

大彭杖子还有岳珠环的侄女。

当时土匪都穿着便衣。

车河口罗振秀被绑，到暖河堂（东华鱼沟〔化鱼沟〕南沟），花80块现大洋赎回来了。

党史办佟靖功采访

1988年12月15日

大杖子郝家庄老农郝士玉回忆

讲 述 者：郝士玉

讲述时间：1988年12月15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大杖子郝家庄老农郝士玉（72岁）回忆》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们庄郝连明的大哥，小名叫大栓子，跟着孙永勤参军了。听郝敬义回来说，大栓子死在外头了。

听郝敬义说，孙永勤1000多人在老梁上活动，日本军来了很多，围攻老梁，孙永勤率军奔茅山〔毛山〕了。孙永勤子弹不足，朝遵化县长要子弹，那个县长答应给，让孙永勤上茅山〔毛山〕等着。孙永勤上了茅山〔毛山〕，可是县长投敌，与日军勾结，日军围了茅山〔毛山〕。孙永勤病了，刮打青紫。孙永勤被围后，子弹打净，孙永勤拿出手枪让别人赶紧走，别人不走，逼着别人走了。孙永勤死在茅山〔毛山〕了。

郝敬义推八门，说不能上茅山〔毛山〕，往那么去不是生门，是死门。孙没听。

郝说，他藏在榛子棵里，日本人来回走，没看见。

化鱼沟有张凤义，他们一起从茅山〔毛山〕回来的。

郝说，孙的旗帜上写着“抗日救国军”。

郝敬义是入食堂以后死的。大高个，长挂脸，我们庄数他高。车河川都知道他是推八门的先生。

我小时候在三道河念书。

孙在这个月的二十一日，打车河口警察局。

三十晚上，在长峪沟〔常峪沟〕开火，孙永勤往全宝河退去。

刘玉田开小差了。他是我二大爷姑爷，跑到我二大爷家里这。

倪坤怎么回来的，我说不好。

警察所打发刘玉田（邢杖子家）、倪坤（车河口滦河南）去抓孙永勤。

大成兴买卖，老岳家开的，一万块钱成本。来了400多名匪，上五凤楼安盘子。车河口伙会在雹神庙把着，不让匪上来。打三枪，匪轻易没敢上来。地方伙会约寿王坟伙会孙义香〔孙永香〕、漖河、车河伙会都过来，围住车河口。总会安在郝家庄南台（河南），让孙义香〔孙永香〕当总会长（罗圈沟的）。打了七天七宿。匪缺子弹奔乌龙矶那边去了，从那边来的，又回

那边去了，扔下40上下匹马。在这个东台子，几个伙会把马分了。车河伙会没要，别处伙会分了。地方人反映，这些匪，若没有大成兴供应子弹，打不了七天七宿，大成兴有子弹卖给土匪。孙义香〔孙永香〕有气了，把大成兴分了。

大成兴掌柜何玉民〔何育民〕跟岳老亮气不出，告孙义香〔孙永香〕去。可是孙义香〔孙永香〕不好惹，蘑菇头，没敢告。认为孙永勤是个土包财主，就告孙永勤。

在下板城，警察署批准让车河口警察冬子月21日去抓孙永勤。孙永勤有个哥，叫“老会长”，问干啥来？警察说暖河〔暖儿河〕岳老亮把孙永勤告了。给他们做饭吃。快吃完了，老会长领人进屋，把俩警察的枪给下了。孙家哥俩领人带警察上了这大南山广东山了。

腊月初一日，集合20多人到车河口来了。警察分驻所40人。20多人分三四股，黑夜一放枪，警察吓得都跑了。赵来死了。

另一个，赵老俊死了。车河口住户，开香磨。岳告孙永勤，赵老俊给证明来的。孙永勤把他打死了。暖河〔暖儿河〕色树底下的，叫赵老俊。

车河口10多间瓦房安警察局子，孙永勤把那房子都给烧了。打局子腊月初一。过年孙部就100多人，到暖河〔暖儿河〕煤局子，打了二三天，用大抬杆打（小盆粗，大火枪装一二斤药），打不进去。下板城的日本军坐着三个船来了，上煤局子北山攻击，孙永勤退了。

那400多匪，外号小白龙，从下板城那边起来的。

正打煤局子，从杨树沟又过来一队日本子。

孙永勤从北边过来，到杨树沟又起出一棵枪去。

孙永勤就从全宝河那边绕到车河梁拱肚子沟老孟家（五凤楼北部），扎盘子一个多月。

来这以前，孙永勤到罗圈沟找孙义香〔孙永香〕给扩个队，孙义香〔孙永香〕当面答应，后起奸心向兴隆警察局报告了。兴隆发兵过来，打拱肚子沟老孟家这儿。

孙永勤后来到罗圈沟把孙义香〔孙永香〕房子烧了（就是林场那）。

打煤局子时，有一股日军奔那柳河姜家庄烧板子沟了。孙永勤的一部正在烧板子沟吃饭。抗日军跑了，日军把王冲子（老乡）给打死了，孙部一战士腿被打坏。日本人回到车河口。在烧板沟打仗正是年三十晚上，我们听机枪响，赶紧吃饭好跑。上边过飞机。吃完饭，上边杨树沟把孙部受伤战士送到我们这了，我们又给送到永和堂〔永合堂〕去（我们南沟）。郝敬义一起给送病人。见到孙永勤，郝说会推八门，孙让他当了军师，这还是三十晚黑夜。

这以后，这一带伪满官家人就不敢来了。

郝世祥〔郝士祥〕没参加。他会合婚嫁娶阴阳宅。

赵四川是孙永勤手下头头，不知是哪的人。有一个关大队长。

暖河〔暖儿河〕的范老五教过杨树沟的武会，参加抗日军，藏在一个山洞，饿死了。在北

边受的伤，死在暖河〔暖儿河〕那边了。听说把周围榛棵叶都吃光了。

岳老亮做买卖的本钱全是他嫂子的，口里的。一年他嫂子来一次，算一年的账。

煤局子院里支应做买卖的30多人。

车河堡西洼义德堂粉房安过盘子。

土匪来了放双响，哪庄听着哪庄放，告诉是土匪来了。

佟靖功采访

郝连存介绍郝敬义情况

讲 述 者：郝连存

讲述时间：1988年12月15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郝连存介绍郝敬意〔郝敬义〕情况》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大杖子郝家庄郝连存支书：

听说给孙永勤当军师〈的是〉郝敬意〔郝敬义〕，不是郝世祥〔郝士祥〕。

郝敬意〔郝敬义〕死10多年，若活着，现在有80多岁。郝敬意〔郝敬义〕两个儿子，大儿子郝世才〔郝士才〕已故。

郝世祥〔郝士祥〕过了三周年了。

郝其二儿子郝世亮〔郝士亮〕，60多岁，缺点心眼，聋。

听说孙永勤被围在茅山〔毛山〕，郝敬意〔郝敬义〕藏在死人堆底下，敌人撤了，他回来了。听说孙永勤是玉鼠星下界，茅山〔毛山〕是猫，犯地名了。郝敬意〔郝敬义〕不让上茅山〔毛山〕，结果被围在那了。

佟靖功采访

1988年12月15日



关于张福义的回忆

讲 述 者：张凤枝、张德兴

讲述时间：1988年12月16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张凤枝同志（66岁）：

民国22年日本来了，起民众，日本说是匪。黄花川是孙永勤的头。

八卦岭民团叫大兴会，民团头是张福义。

那时我们家里有六七个骡子，土地20亩，从南〈往北〉运棉花、布……从北往南驮羊皮，从围场做买卖。雇一个长活，还有半个活。

那时我们家有几棵大枪，他们哥俩还有手枪。跟孙永勤走，这爷仨有一棵盒子、一棵手提式大枪、一棵撸子，张德录使的。

他们哥俩可能是民国23年死的。

我父亲死那年我6岁，阴历六月，阳历七月。

张福义大个子，圆盘脸，黑黪黪的，一脸浅白麻子，是这沟信任的人。

若活着75，张德泰大二等个，圆盘脸，红白镜〔净〕子，属虎。

若活着七十二三，张德录属龙，容长脸，尖下颏，瘦瘦的。

孙永勤来是正月初三，待到初五，去王胖沟。

刘子彬也是这沟山湾的，抗日军。打死张德录，抓走刘子彬，被杀。

附件：

张德兴同志回忆：

我听我母亲说，孙永勤来这里我才六岁，孙永勤穿着长袍礼褂。张福义、我大哥张德泰、二哥张德录他们仨是一起参加的。孙来几次，我父亲他们才去的。

是那年正月初五从这走的，进王胖子沟，扎营。找寿王坟罗圈沟孙义香〔孙永香〕，让他给助队扩军。那时日本来了，调来日本军打了，孙永勤走了。孙永勤从东边下去了，这爷仨带队回到这边游动一段。张德录在这刘支书山湾庄北沟门，次年四月初，正榜头遍高粱苗，被日军打死了。以后张德泰在全宝河西山被日军打死。

我们家被日军抄了。他们哥俩死后，我父亲不能在家。我父、我母亲领着我〈住〉在承德市附近葛家，腊月。过了年，往北走，过松树梁，观音堂村里，待了三个上下月，我们三口人，没别人。四五月间我们［原文缺失］。

我姥姥家在榆树沟楚榆沟〈的〉土城头。我们回来没敢到家，到宝地我表舅谢家待着。把我们娘俩搁那，我父亲偷着回家看看。〈一次，〉我嫂嫂、我父亲又回到宝地谢家。那天中午，耥地时候，我们正在屋里坐着，外边来人问："张福义在这？""在这。"一进屋，就把我父亲拽住了。我表哥把我背出去了。兵把我父亲带到东院，打我父亲，问："你媳妇、你儿子哪去了？"有带道说我们三口都在这。我妈要去东院，一个兵问我妈："张福义媳妇在这吗？"我妈说："去大水泉了。"兵回去。兵把我父亲弄到兴隆，枪毙了。

我表哥送我母亲和我到山沟里。下大雨。早晨回到谢家吃点饭，半夜前表哥送我们到梁上，我们又到土城头我姥姥家。

天亮到土城头我叔伯舅家，叫刘恩林，与孙义香〔孙永香〕、大坡邓云祥都说上话了。回家我们杀猪请客说和，这才回到这。

我父亲在茅山〔毛山〕打仗回来的。

佟靖功采访

于承德县八卦岭



司显文同志回忆录

讲 述 者：司显文

讲述时间：1989年1月19日上午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司显文同志回忆录（76岁）》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年焕兴是蓝旗营老户。他父亲叫年学文，老大。〈年学文〉是年焕兴的父亲，还有亲叔伯兄弟年学斌（老六），年学×（老七）[1]，会武术，老八会武术，武林会武术，年学孔（老九），年学成（老十），都是农民。

年学文的儿子〈是〉年焕兴，就哥一个。

赵福成原是马圈子人，他父亲叫周××，过给蓝旗营赵廷喜（无子）为子。有一年赵福成参加孙永勤的民众军，赵福成又叫年焕兴参加，年焕兴又让我去，我正闹病就没去，年焕兴与赵福成去了。黑夜打半壁山警察署（冬天，11月间）。以后司显奎（蓝旗营）、郭占岐（蓝旗营）等人也去参加民众军。

年焕兴说，一天，遵化来信了，让去遵化领饷领军装，到遵化去了。从咱们这过了半天，好几千人。到那，遵化城门闭着。撤到茅山〔毛山〕，三下日本一下匪围着打。一天，我在南山薅荞麦，从山上往下骨碌石头。一看，是年焕兴。年焕兴说，是被围后从匪这边打出来的，匪有意也放他们。郭占岐回来，房子漏水，淘水有病死家了。司显奎在口里做活，好几年后回来了。

年焕兴回来，又去遵化马家洼那干活，说了媳妇。好几年，八路军来抗日，年焕兴参加了。他当了第五大队队长。

年焕章在村子里是要人的，官向〔厢〕也联系，八路军也联系，公私两面都联系。后来在这儿把给日本人办事的不忠不孝的人埋了三个人。李光辉、王子民他们又埋了几个人。有一个瞎特务（给日本人当特务），年焕章把他埋了。特务队长阚队长来，把年焕章抓兴隆弄死了。

年焕朝在我们部落当过警察。

赵福成从茅山〔毛山〕回来当满洲军特务，满洲军不信任他。一次出发，满洲军把赵福成打死大石门那了。

[1] 司显文未记住老七的名字。

司显奎还活着，78岁了。

我们庄赵永才是年焕兴的亲兵。在山楂峪，特务请年焕兴喝酒，喝醉了，把年焕兴逮捕了。弄到佛爷来警察署，让年焕兴到各村去说八路军的事。年焕兴到我们村还没有说八路军怎么不好。被捕后，年焕兴又跑回来了。在家里当治安员、治安主任。年焕兴有个毛病，过去好整人。有人说年焕兴与他侄媳妇不清楚。

〈年焕兴〉一九七几年死的。他有胃病，“文革”中挨折腾，不久死了。

佟靖功采访

管振兴同志回忆录

讲 述 者：管振兴

讲述时间：1989年1月19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管振兴同志（69岁）回忆录》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李连贵出身：他父亲李老广，虽不算太富裕，在这一片也属的着，雇活雇月。没钱花时，李连贵偷过他爷爷的东西。后来李连贵过没招儿了，要钱，赢俩钱维持生活。在这河东开个店。李连贵在村子里负责任，当头行人。当过村自卫团的团总，使过枪。这时日本就进来了，李连贵在家待不住了。这时孙永勤把队伍拉起来了，李连贵就投奔孙部去了。

孙永勤帽子衣服都是透眼儿，传说刀枪不入。孙成立的队伍叫民众军，是农民起来的。孙永勤来南山北山。李连贵是佟家沟的门婿。佟家沟的张生（有名的神枪手，火〈枪〉、大枪，手准眼毒，一个物扔在空中打碎了）[1]、西茶坡管玉文，还有好几个人，都跟着李连贵去了。李连贵与孙永勤来回走信。

李连贵投奔孙永勤以后，日本〈军〉常来苇子峪抄李连贵的家。打车河口最激烈。民众军也很困难，跟有钱的要鞋要袜要枪要子弹。药王庙这也打过，打个天翻地覆的。日本〈军〉在明处，民众军在暗处。民众军一天比一天威望高了，队伍就有几千人了。民众军见着伪满洲兵

[1] 管振兴此处回忆有误，据李连贵重孙李海东亲到佟家沟帮助了解，随李连贵抗日的神枪手名叫张申，非张生。



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十四五岁时，有一次春天，耧地的时候，民众军从这沟过了一天一宿，说是进口，口里给换服装，发枪发饷。中了计了，一进口里，就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了。从那儿，民众被打花达了，以后就没听到李连贵的消息。张生死在茅山〔毛山〕了。管玉文回来了，日本〈军〉抓他，他隐在玉田沙流河（亲戚家），花钱，没啥事了，又回来了。不久八路军过来开辟地区，管玉文也参加开辟地区的工作了。

李连贵哥俩，他哥哥叫李连福，李连贵是老二。李连贵是大个子，比你个子不小，细柳子，刷利［方言，指动作利索］，会点武术。日军抄他家时，他家人躲的躲，逃的逃，也是闹过妻离子散。把他家也烧了。

李连贵没当过土匪。

我听过管玉文回来说道过。

张生没回来，我也是听管玉文说的。

李明是李连贵的大儿子，过给李连福为子。

李连贵的大儿子李明，二儿子李清，三儿子李年，四儿子李恩。

李山是李连福的儿子。

佟靖功采访

管主任回忆

讲 述 者：管主任

讲述时间：1989年1月19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吴连芳（马圈子人）是土匪。

李连贵是伙会的头，李连贵带队打老抢，这时打的吴连芳、吴俊田。以后吴连芳就不当土匪。

李连贵把土匪吴俊田打死在小石门沟门那边了，吴俊田是马圈子的。

管玉文以后被日本人检举到承德，被杀害了。

李恩同志回忆录

讲 述 者：李恩

讲述时间：1989年1月20日上午

采 访 者：佟靖功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苇子峪村

文件原名：《李恩同志（59岁，属马）回忆录》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父亲（李连贵）于遵化茅山〔毛山〕被围以前，我们家（在苇子峪）的七间海青房被烧毁。是特务白义斋领着警察来了给烧了，烧的时间不是冬季就是春季。

茅山〔毛山〕，民众军被打花达了，我父亲跑了出来。听我母亲说，我父亲的双枪插在上水河（遵化城东20多里地）。我父亲在上水河黄老二家住（黄老二是我二哥的干爹）。这时我们娘儿几个不敢在家住，在外边藏着。不久，我母亲、我二哥（李清）、我五哥（李云）、我三嫂、我、我妹子（现在口里刁山住）去到上水河，与我父亲住在一起。我父亲的左膝上有枪伤，右肩上有枪伤，黄大衣（从日本军那俘虏来的）上都是破绽〔洞〕。在上水河住一个月，日军张贴画像捉拿我父亲，父亲又带着我们搬到唐山他的一个朋友家住，姓名不详。在唐山住了三个月，我三哥（李儒）给我们送信说，苇子峪抓人气氛松些了，我们娘儿几个就都回苇子峪了。我父亲说："日本子不倒，我不回家！"

我们回来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老爷子，现在分析老爷子是死在外边了。

我们老爷子什么都喜欢，喜欢说书，说快板书，枪打得好。

李山同志回忆录

讲 述 者：李山

讲述时间：1989年1月20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李山同志（70虚岁）回忆录》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16岁那年（1934年，这是第一次孙、李取得联系），旧历二月间，这沟里榆树林唱影。我二叔李连贵也在那看影，说孙永勤来了，打发四个弟兄来找我二叔。孙永勤与李连贵一嘀咕，说要在苇子峪收枪。李连贵说："好，我也算一份。"一夜之间把苇子峪村的一二十支大枪都收了。

我二叔对我爸爸说："孙永勤来要枪来了。"我爸爸说："你跟去呀？"我二叔说："我不过日子了，就豁出来了。"就跟着去了。

听说李连贵是第四大队。

以后旧历四月二十三日，孙永勤受遵化县长的调虎离山计，民众军在茅山〔毛山〕受了打击。以后，李连贵说："咱们为了抗日救国，咱们死了也值。"

我父亲叫李连福，我二叔叫李连贵。他们的父亲〈叫〉李有，原籍是宝坻县林山口人，我祖太爷挑在这里落户。

李连贵老爷子念过书，有二三年私塾底。心灵，性傲，能说大鼓书，自拉自唱。家里有地，开过店。好打山鸟，一枪打过三个山老鸦。当过苇子峪村的民团团长。本村有几十棵枪。匪头〈有〉孙宝贵、坐山雕、大镜面、马拐子……

司俊恒同志补充：我爸爸（司秀清）说，一次李连贵率领人围了小石门，打土匪，打死吴俊田等三名土匪。

赵山同志回忆：我就知道他们打孤山子海关税署，抓日本翻译官的事。

〈李山：〉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二日那天，我和李儒我哥哥在遵化城东40多里地黄台见到李连贵我二叔。临走时我父亲说："你二叔去口里，没有大山，能行吗？你们去让你二叔回到口外来。"我说给我二叔，我二叔说："你们回去吧，革命人死了算完，就算抗日到底。"

午后4点多见着的。

茅山〔毛山〕突围后，李连贵隐藏在上水河黄兴家。通过黄兴的关系，又受到上水河的头行人的掩护。

赵山同志回忆：茅山〔毛山〕突围的第二年，夏至以后，李连贵从唐山回来。夏至以后，又带着手枪来到遵化城北八里皮各庄我姐姐家（陈德玉是我姐夫），藏了两宿。

〈李山：〉唐山有一人叫杨迺儒（他的大名叫杨国林），耍人儿的，与李连贵是朋友，他掌握我二叔的情况。他借给我二叔俩钱，在唐山做买卖，混几天。

李连贵小时候成天爱打枪，爱打鸟。

李山：打着旗，上写“抗日救国第一军”。

佟靖功采访

马广泽同志介绍

讲 述 者：马广泽

讲述时间：1989年1月21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马广泽同志（马永兴同志的侄子）介绍》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金斗峪常久芳，70多岁，雪山塘沟人，现住金斗峪。常久芳曾参加民众军，是从茅山〔毛山〕回来的。常久芳招到金斗峪老高家，听说他与孙永勤一起扛过活。

蔡连青老人回忆录

讲 述 者：蔡连青

讲述时间：1989年1月21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蔡连青老人（78岁）回忆录》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民国16年闹匪，我们这里成立乡团，李连贵是队长，我们跟着李连贵打匪。打一年多，我们使火枪。匪头叫孙宝贵。

有一年李连贵起民众，过来，对我们说："咱们打日本去，干干呀！"我们说："干呀。"我二哥蔡连臣、我、王占朝我们都去了，发给一支大枪。从马蹄峪出去，往东走到万树庵，与孙永勤碰头，孙永勤是军长。从万树庵奔凤凰山（滦河东），打日本。我们过去，日军追来。我们散开，日军入口袋。滦河口我们把日军打花拉了，得了几棵枪。日军约400多人，大约打死打伤日军一半人，日军跑了。咱们从凤凰山奔潘家口，打日本税局子。打二三小时，敌人跑了，拿住翻译官孙本，一个眼，呲牙咧嘴，40上下岁，他竟强奸十六七岁的姑娘，坏得很，把他抓住后枪毙了。从潘家口回来，到蓝旗营北沟住下，听说去遵化城关〈取〉子弹，我们三人就把枪撂下，就回家了。这一圈上下十天。春天，旧历三月间。

佟靖功采访



陆奎、高印臣二位回忆录

述　　者：陆奎、高印臣

讲述时间：1989年1月21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文件原名：《陆奎（81岁）、高印臣（73岁）二位回忆录》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1934年旧历腊月，陆拥的亲兄弟、我的叔伯兄弟陆增娶媳妇。乡亲们正在坐席，孙永勤领着28个民众军突然来了，他们都背着大枪。大家一早晨正喝酒，他们来了，吓得酒都不喝了。孙永勤让大家别惊慌，说我们是民众军，打日本的，不害老百姓。孙永勤拿出20块现大洋，随了份礼。孙永勤不让陆拥再买东西，就让东家把剩的羊头羊骨头煮了，喝了羊汤，吃了剩饭，走了。

为什么叫舍身台？

那庙里什么也没有，两个师傅外出化缘，小和尚是个傻和尚，小和尚问："你们走了，我吃啥呢？"老和尚说："吃啥？你吃石头烧大腿！"小和尚就真地吃石头烧大腿。几年后，老和尚回来了，一看小和尚吃得白胖白胖的，老和尚问："你吃啥来着？"小和尚说："我吃石头烧大腿来着。"老和尚说："你再烧一个，我们看看。"小和尚一伸大腿，疼痛难忍，就跑了。两个老和尚追，小和尚跳了崖，老和尚也跳了崖。后人修庙，把小和尚为正位，两个老和尚一边一个，在两侧偏位。

头道山涧、二道山涧、三道山涧。〈小和尚〉在二道山涧跳下去了。二道山涧上有一片大光石，石上刻着象棋盘。

前后两殿，前层殿里大肚弥勒佛，后殿十八罗汉。

东西配房，和尚住房。

靠大殿的西北，100米，是舍身台，给三个和尚塑像。

有一个小庙，叫祖师殿，〈塑像〉坐着，比一般真人高一些。

高印臣老人回忆：有一年冬天，没穿棉衣裳呢，后晌，我给孙永勤带路。我给扛一捆枪，还有一个潘家口的人给扛一捆枪，当间有瀑河口的小秧儿，13岁，小男孩，瀑河口财主家的，孙永勤认他是干儿子。敌人从杨树林往这边打炮，我们往舍身台撤。走出二里多地，打来一个炮弹。炮弹从我身边过去，我当是一个野鸡。当，炮弹一响，把那小秧儿崩死了。后边两个民

众把小秧抱起来，小孩已经死了。我们到边关上，孙永勤他们从后边赶上来，孙永勤〈说〉小孩胆小，没死吧，结果还是死了。孙永勤好哭，说这是我的干儿子。

当时还绑来半壁山的二掌柜的。

在黑锅顶与敌人打起来了，与满洲队打起来了。打了半天，有一个队长挂花，不碍，敌人也死了几个。孙永勤没子弹。我带队带到茅山〔毛山〕万树庵（在茅山〔毛山〕大后背，大块地附近），我在万树庵挨了一宿冻，天亮我回来。到家第二天去埋小秧去，去七个人，陆拥、高印臣、陆奎、张永义、张殿士、张志龙、马××（杨树林）。我们还没埋呢，伪满军把机枪支上了。伪军没走，黑锅顶山尖上满了。伪满军下来攮了秧儿三刺刀，然后把我们带到杨树林。日本〈军〉走了，剩伪满军了。

陆奎、张殿士、张永义给他们铡草，铡到半夜，一边铡，〈伪满军〉一边骂："杂种肏的，赶快铡呀！"到半夜没人盯了，我们仨钻进马鸿龙大秫秸垛里去了。回头伪满军边找边骂："杂种……找到他们，非处死他们不行！"两个伪满军跟到马山家追妇女，马山扛枪拦过来："干啥？要粮给粮，要鸡给鸡，干啥呀？"伪班长把那俩兵找回去了。天亮他们走了，我们就回来。

那次打仗，民众军举着一杆旗，一庹长，三角旗，绿色的，三尺长把，黑墨写的字，字有拳头大。孙永勤让把那旗插在黑锅顶山尖上，引诱敌人打炮打枪。等敌人到了，民众军没影了。那次民众军在杨树林那边打死一个日军。那次有李连贵。

孙永勤在舍身台庙里打过仗，救过烧香的妇女。

陆奎回忆：以后民众军也在舍身台开过会，住过。

高大爷回忆：李连贵是四队长，何广永是九队长。何广永也到过咱们这儿，那时何广永就是一个当家的。

陆奎回忆：我也见过何广永，头一次29人，就有何广永。何广永肚（dǔ）子脸［即长方脸之意］，长挂脸，中等个儿，30多岁，遵化下港家。

陆奎回忆：李连贵黄白色脸，大个子，肚子脸，黄白镜〔净〕子。不知道李连贵死哪了，自从去茅山〔毛山〕后就没有上家。

骆驼脖——（开庄）。

崔海、崔宝、崔岗、崔宽亲哥四个，孙永勤在他们家吃过饭。

陆奎回忆：孙永勤在舍身台庙里打过好几回仗。据说有一次，敌人来了，孙永勤让弟兄们走了，他在亮台（山包上，大殿南边）一个人盯着敌人，打仗。都说孙永勤是娄金狗星下界的。孙永勤大个子，大耳朵。有一次他们在舍身台打死20多个鬼子，救过烧香的妇女。

佟靖功采访

常久方同志回忆录

讲 述 者：常久芳

讲述时间：1989年1月23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勤是中农户，岳老亮是地主富农。孙永勤是团总。日本〈军〉来了，佛爷来南边有个飞机场，日本〈军〉把我要去，在佛爷来训练，准备让我们当讨伐队。训练到第五天头上，一个教官把我打够呛，我跑到蓝旗营北沟（我在三道河北沟大洞住），两天到家。牌长对我说："抓你呢，和我要呢。你躲躲吧，别让他们抓着，我说没看着你。"我跑到三道河北沟长沟去了。还是抓，我家里没地，从那我跑到孙永勤家做了四五天活计。

民国16年，车河有一股匪，孙永勤是团总，岳老亮也是团总，把匪打了。因为分手枪，岳、孙打官司，把孙永勤弄到承德大狱去了。岳老亮钱厚，四分斗大院，家里养着七八十兵。后来孙永勤跑了，承德大狱来信让岳老亮抓。孙永勤侄子有一棵大枪，孙永勤有一棵大枪，王宝石他亲家有一支大枪，一天一宿集中三棵大枪一支火枪，占了沟门。岳老亮的兵20多人来抓孙永勤，孙永勤的四支枪把他们打花达了。在河口打的，又得了几支大枪。几天，两个月［原文如此］，孙永勤集中60多人，在车河、柳河转，又转到半壁山，把警察所拾掇了。又转一个多月100多人了，又奔半壁山、大兰口往西转，得着目标，苇子峪有一个李连贵有一个张嘴蹬把撸子，花牌撸子。孙永勤动员李连贵："这个撸子我们使使吧。"李连贵说："这撸子不是我的，是我亲家的。"咋说也不给。孙永勤说："你在洒河〔潵河〕套成立一队人，你这枪就不用交了！"李连贵是佟家沟的丈人家，张申是李连贵的小舅子[1]，李连贵来到佟家沟，张申、金斗峪的司福来、蓝旗营的年焕兴等集中十二三个人，李、年是队长，在洒河〔潵河〕套活动。孙永勤就上黑锅顶了。露目标，满洲队追，把黑锅顶点着了，孙的100多人从刁山那边跑了。奔红山口〔洪山口〕——洒河桥〔潵河桥〕，弄了1000多斤火药，弄十六七支火炮，一宿奔灰窑峪，把三四千斤火药、锅岔子弄到岳老亮前山上。前山上离岳老亮家半里来地，一亮天就往岳老亮的院子开家什了。岳老亮的兵出不来，大院四角都有炮楼，打到烧后晌火，把岳家院推平了。怕下板城兵下来，撤到车河西大山。刚住下，黑夜来话，孙永勤把岳老亮的尸首弄到老梁上去了，伪满兵围老梁。

[1] 常久方此处回忆有误，张申非李连贵小舅子。

这时李连贵、年焕兴就在洒河〔澈河〕套和遵化以北活动，有80多个人了。分拨了，年焕兴领着五六个人，正好三个日本〈人〉、一个翻译官来了，在岳王庙南沟口，年焕兴他们四五人把几个日本〈人〉捉住了。这时，我在三道河北沟大洞呢。我爱玩火枪，三道河北沟张连秀和李连贵是一块的，张连秀找我，把我弄去参加了，于良也同时去了，跟着李连贵转。在蓝旗营北沟河西（蛇皮外头青杏沟北边），我还看着几天。在车河口把几个鬼子交给孙永勤了。孙永勤挨着包围呢，一劲调李、年北去支援去，这么事把日本〈人〉给孙永勤了。我们80多人都去车河口，把日本〈人〉交给孙永勤。李连贵这儿调我们又转到白河，又打上仗了。翻译官在王宝石跑了。翻译官跑到遵化，把遵化县长使出来了。遵化县长打发人送来小报，当孙永勤朋友，〈说〉你们来到口里，给你些枪支衣服，比那里大林子强。听他们念叨，遵化县长来过两次信。这时我们就1000多人了。孙永勤答复了，可能这人又回去，给遵化县长回信了。送信这人是60上下岁的一个老道。在口里，李连贵我们这个队在头，我们住侯家寨，孙永勤他们住在上下港，待一宿。听见啥话了，日本子遵化县就满了，汽车来回直跑。次日，就拉到遵化东南笔架山，到山上就打上仗了。打了一天，我们1000上下人没大伤损。孙永勤醒过梦来，还是往北返，往北撤，奔景忠山往北撤。我们在大寨西沟、南沟，撤到大寨。孙永勤、王宝石他亲家、他侄子、还一个占卦的老道、一个小亲兵（十四五岁）一进大寨西门，这五个人骑着四匹马，到大寨庄里，日本子开枪了，孙永勤等人就冲出去了，奔石桥头了。我们在西门外伤了好几百人，少了400多人。天亮，我们奔了景忠山南坡坡，孙永勤带着300上下人奔茅山〔毛山〕了。一到柴禾场〔柴户场〕。我们后边的下了景忠山，到电道上，李连贵、年焕兴还有四百上下人，看见日本兵东电道过〈来〉十几〈辆〉汽车。我们藏起来，等日军过去，我们也奔茅山沟〔毛山沟〕了（白天），我们也住柴禾厂〔柴户场〕上下了。这空儿，孙永勤在老梁上过滦河、正面踝子骨挂花了，到柴禾厂〔柴户场〕，孙永勤伤疼。住五天，四周的甲长一劲来，和孙说："你们还是躲，还是打呀？"四周都被日军围上了。到五天后末晌，我们在柴禾厂〔柴户场〕集体开个会，烧后晌火前。孙永勤讲："我们现在别紧张，本来就没想活着回去。哪个队出去，咱们上五指山集合，再找关系，再做计划。"李、年一个队，何广永（下港人）、陈广发（下港）一个队，康永贵（荞家洼）带着40多人是第五队。康永贵是一个匪头。"你们这几个队往西转，奔黑锅顶。"我们几个队400多人到茅山〔毛山〕顶，一看都是齐胸深的战壕。我们在茅山〔毛山〕顶上眼瞅着孙永勤的300多人出大沟，奔景忠山了。也可能又奔茅山〔毛山〕了。

我们绕了一宿，也没出敌人圈。一宿也没断了走，一亮天到三道房子，走到日本军跟前。我们走到三道房〔三道房子〕山根，山上日军支着枪呢，我们400多人被打死一河套。到三道房〔三道房子〕山大门下的红石砬子一搭话，日军开枪了，咱们死了一河套。青杏沟的姓司的

副队长（会抽大烟）司福×，死了。他的撸子我提起来，往回跑，我的右小腿下挨了一枪。我跑到北沟里，走不了啦。钻黑了，日军围了三面了，我拿了一支韩连春大枪，还有那棵撸子，我扛大枪一搪〔躺〕。亮天了，朝外100多步，对面梁上有挎洋刀、背兜子的，是官。我要打，又爬到我跟前一个人，柳河姓苗，他说："我大腿走不了啦，死在一块吧。"我说："你能跑不？"他说："知不道啥，〈不知〉能迈步〈还是〉不能迈步？"我说："咱俩死死在一块。"我说："你向背兜子打，我向挎刀的打。"砰砰两枪，同时把那两个鬼子打下去了。我们往北尖爬20步，再往北就是阴坡，敌人打不着。到阴坡一看，跑出去的就是20多人。就是这个队两个，那个队两个，散班了。我们不一块，我说："不能走的就钻这里去吧（这地方叫寨子沟，四月前，有榛子棵子），能走的得走了，日本要来了！"我们在那待了一个半钟头（茅山〔毛山〕上一劲打炮）。横河的一个排长，叫徐连芳，蓝旗营北沟杨树台的，温显有说："我小的时候，徐连芳是土匪。"小车轴汉子，红脸，放了以后就不知道他哪去了。我说："排长，往哪跑呀？"排长说："还是由着上级指示，奔黑锅顶吧！"我们离黑锅顶不远了，就隔着刁山一个洼。我们奔梁鞍，奔黑锅顶。黑锅顶边墙上有一拨匪，日本〈军〉供他们子弹，匪头姓王，100多人，从玉田那边过来的（红山口〔洪山口〕、大块地立伙会打这拨匪）。土匪把头把枪伸出来："缴枪吧！"我们没法，把枪扔上去了。缴一个被绑一个，匪跟着一个被绑的人（小黑鱼沟子下来的）。在绑这个空，日本〈军〉从刁山下来了，朝北阴坡打枪（还不到晌午呢）。那些匪也是便衣，日军把他们当民众打，匪不还枪。匪头最后绑的我，日本〈军〉一枪把匪头（穿旧麻呢）打骨碌了，我的手枪，他的手枪邪三把都骨碌了。他刚绑我一个胳膊。往前跑还跑匪怀〈里〉去，在那待着也不行，我伏在桌子大的一块石头后头了。待一会，日本〈军〉从刁山上了黑锅顶，从黑锅顶压下来了。日本〈军〉头里的离我不够20步了，我不顾疼痛，翻身跑了20多步，跑到小黑鱼沟庄。匪喊："过来！"我翻身又往上跑七八十步，钻了树林子。敌捉住我，被他们捉住的，他们交给日本〈军〉了。匪捉住我们20多人，交给日本〈军〉。康永贵原是那匪队的副队长，匪与他有仇，抓住康永贵的人，匪就杀了。是李连贵的人，就事前偷着放了。李连贵与该匪头有过联系，谁也不打谁。说孙永勤死在茅山〔毛山〕不见实。

年焕兴有个二把手枪。在房子一打，年焕兴钻在猪圈里去，把枪插了，自己把自己绑上了。日本〈军〉抓住他，他说民众把他绑去的。他这么出来的。

李连贵的手枪没失落，也可能把枪插哪了。也被俘虏了，他回得好，又出去了。他到遵化县粥厂喝了一些日子粥，以后又到唐山下煤窑。他有手枪，听说他劫人打杠子，被人家打死了（我是听南天门唐营说的。三道河北沟雪山有一个唐营，是被复查的，没办法，去唐山卖板子。还一个唐杖子花开山，也去唐山卖板子。他们回来说，他们也是听人家说，因为他们去唐

山两三次）。

吴××，听这老爷子念叨，孙永勤打岳老亮，用柳木格［疑为“搁”，用、拿的意思］轮掏空了，用铁箍上，打火炮。

康永贵以后的情况不知道了。

关元有大个，圆盘脸，光下颏，白净子。

匪头王队长是玉田的一个财主，被匪抢了，又当了匪队长。后到红山口〔洪山口〕，抓伙会十几个人去，在大块地把这几个伙会杀了。康永贵说，咱们为财，谁该谁的命呢？后些康永贵走了，找李连贵，又当了民众了。匪头打发方文明出来调查康永贵。方玉明走到小石门，往下走。康永贵我们四五人往上走。康永贵认的，掏出撸子要毙。方文明磕头礼拜，认康为干爹，方文明也当了民众军了。茅山〔毛山〕回来，在刁山，方文明又被日本〈军〉抓住了。伪满军留住他，方当伪满军了。到红山口〔洪山口〕，红山口〔洪山口〕人认的，说方吃了我们多少多少人心，满军转到三道河，把方文明毙了。

李连贵丈人家在佟家沟，姓佟。

张申是佟家沟的。

佟家沟有十多人当民众，是李连贵的一窝子小舅子。佟玉奇当民众回来了，闹病死了。

佟靖功采访

李伯然、续振声同志回忆录

讲 述 者：李伯然、续振声

讲述时间：1990年2月

采 访 者：佟靖功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灰窑峪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李桂攀先生是这一带有名的老文人，曾去北京考过学，在洒河〔潵河〕、黑河等地教书多年。他曾经在黑河教书，教过孙永勤。

李先生教书，很有进步思想。他除了教五经四书以外，还给学生讲中国历史［指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还给学生讲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鸦片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还讲过红军、土地革命。每天夜间他都给学生讲《说岳全传》、《聊斋》等爱国或正义的故事。由于他有爱国主义思想，孙永勤曾受到他的启蒙教育。

1990年春，正月

佟靖功于灰窑峪采访

孙文孝回忆录

讲 述 者：孙文孝

讲述时间：1990年11月14日

采 访 者：佟靖功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兴隆镇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我今年58岁，我听孙杖子村的孙永海、孙永芳、孙永彩（孙文阁的父亲）这些老年人介绍（这些老年人都是我父亲小时候的同学）。

他们小的时候，灰窑峪的李桂攀先生在孙杖子教私塾，他们都跟李老师念书。李老师教书教得好，不仅教《论语》、《孟子》，还教给学生中国近代史，讲鸦片战争、孙中山辛亥革命、三民主义，可是李老师也抽大烟。

有一次，孙永勤对李老师说："我有三句话，你听，我就跟你学到底。不听，我就不学了。"李老师说："你说吧。"

孙永勤说："第一，除去诗书以外，请你还要教我们《岳飞》、《三国》、《中国近代历史》、"三民主义"，我还要跟你学武术。第二，你们家的土地很多，向穷人少要些地租。第三，（这时我父亲给老师跪下了，接着说）老师，你给我们讲鸦片战争，林则徐如何爱中国，禁烟，烧了英国人的鸦片。老师，你是爱国的，可是你为什么也受了鸦片的流毒？老师，你不能再抽大烟了，我帮助你忌烟。别的学生一年给老师五斗棒子米，为了帮助老师忌烟，我给老师一石棒子米。"

李老师是个有志气的人，为了忌烟，在我们家住了21天，都是我母亲[疑应为"祖母"]侍服他。我父亲是大学长，第二天给学生上什么课，都是在头天晚上李老师教给我父亲，第二天我父亲再给李老师代课。

李老师忌烟以后，对我父亲特别重视。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还给我父亲等几个学生讲鸦片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我父亲深受李老师的影响，很早就有爱国思想。

莫俊荣50多岁，还在，现住三道河中兴大队一生产队。莫俊荣的老人家以前是大地主，有一次我父亲带着队伍在老莫家那村号饭，莫家的老当家的就让民众军在他们家吃的。他们给杀猪宰羊，犒劳民众军。还没等吃饭呢，被日本军包围了。那个地方叫透眼山（山上真有一个



地方透眼）[1]。我是听莫俊荣介绍的，莫俊荣是听他的爷爷、父亲介绍的。当时日本军的头喊话：“谁是孙永勤？听说你的枪打得好！我举起大拇指，你若一枪打中我的大拇指，我就一枪不递［递，指打枪之意］。”

我父亲说：“你举起手吧！”砰地一枪，我父亲真的把那日本头的大拇指打去一截。日本军果然没递枪，退了。

莫俊荣的爷爷支持民众军，交了七棵枪。莫俊荣的爷爷又给带道，那条沟里交出十几支枪。莫俊荣的爷爷又报告：二堂的大地主高作忠家有枪。几天后，我父亲去高作忠家，动员高作忠支援枪。去了三次，高作忠也不交枪。第四次，我父亲带着队伍住到他家，才从他家起出几支枪来。以后，高作忠就向伪满告状，告我父亲。

我爸爸活着已经98岁，属大龙的，我妈妈活着88岁。［我爸爸］比我妈妈大10岁。

1948年（我13岁）土改时，给我们家定的成分是中农。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

采访人：佟靖功

1990年11月14日于兴隆镇

[1] 当地称之为透骨山，非透眼山。

李永春先生谈遵化县长何孝怡

讲 述 者：李永春（83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马各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永春先生　2006年4月

李永春（83虚岁，离休前为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副科级干部）：

何孝怡当时是遵化县长，冀东政府委派的一个县长。根据访问抗日救国军的人，他们提供的情况，遵化县里当时有日本顾问，他基本上是被挟制的。当时遵化闹土匪，挺厉害，都搬城里了。像我们村往东十里的有钱的都搬城里去了，城里都住不开了，我们村没搬。他想把土匪赶走，就同意民众军，想借他们的势力把土匪清剿了，这才答应给他们大米、枪支等。一进来，他就受日本顾问左右了，弄不了了。

孙永勤，我在一小儿念书时就觉得他很伟大。因为民众曾行动到我们村头上。那时候人都跑反，我当时十几岁，1923年生人。以后念书，搞党史，对他的情况知道的更多了。我觉得这个人很伟大，我敬佩他。孙永勤到遵化后，到处招兵，像粳子峪刘秀存、盆楼峪廖金柱都是这么加入的。他们都是很正直的穷人，不是无赖，是生活所迫才加入的。张志全的侄儿张学礼也参加了民众。后来，毛山战斗，遵化人大部分没死。因他们懂得情况，没有军装，把枪一扔，化装一走，走小道，大部分没死。后来闹便衣队（即八路军），很多人又参加了八路军。

孙永勤在遵化一带活动，起到发动群众、播种的作用，对人们抗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毛山是遵化第一高山，周围山连山。

打毛山时，别人都跑了，刘青林因有一群羊，没跑。

李永春先生谈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

讲 述 者：李永春（83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8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马各庄、团瓢庄乡骆各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永春（83虚岁，离休前为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副科级干部）：

骆凤庭死了有几年了，是很进步的一个人。胆子很大，不是胆小的一个人。

他出身很高，富农，雇一个、两个长工这样的。他父亲当时在群众中反映不怎么好，他很反对他父亲的剥削行为。他在南岗高小时，遵化党员的大部在南岗高小，校长、老师都是共产党员。有两个共产党老师，有意讲共产党、马克思、唯物论等等，他挺爱听。表现得很积极，直接靠近组织。1928年毕业时，老师找到他家，说，你申请入党，我代表组织批准，你今后服从什么什么工作。于是1928年入党，由兰小川介绍入党。那时都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他跳跃式进步的第一级。

第二级，冀东党的创始人张明远，抗战时期任河北行署主任，玉田人，那时在西边的捣药口组织了一个党员训练班。把他找去了，还有很多人，培训。他思想又有一个跃进，应该怎么办，要怎么办，就懂得了。这个人同情革命得很哪，以后很积极，直接在张明远的直线领导下做了好多工作。他水平不高，但非常肯干，忠于党的工作。给咱们党跑交通，办了好多事。特别是蓟县有个怡新商店，那儿是他们搞地下活动的一个长期据点。张明远是玉田人，对遵化不太熟悉，他熟悉，给张明远的工作起到很大支持作用。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很积极，领张明远开辟地区的时候，他在头走，离张明远有100多米，说："发现了问题，我咳嗽，你就快跑。豁着逮着我，也不能逮住你。"就这么积极工作。

1933年当县委书记。他曾经多次发动小型暴动。那时候不是主张罢工、小型暴动嘛。由于孤军作战，又没有长远计划，也没什么依借，基本上都失败了。以后听说孙永勤起义了，很高兴，就号召党员支持孙永勤的活动。等孙永勤来到遵化，他卖了十五亩地，买了枪。也许是早买的，准备暴动用的，不一定是闹民众时买的。一闹民众，他就把枪、药品送给忠义救国军了。送的人，我访问时还活着，一个是骆凤鸣，他兄弟，一个是阎龙。买了十二支枪，不少子弹，买了药品，派他的兄弟骆凤鸣和阎龙，用席捆打着，驮到梗子峪毛山沟，交给孙永勤，以

支持孙永勤的活动。

1935年底，一个孙彩叛变，把他逮捕了。包括骆凤庭、省的干部在内，几个人被逮捕了。回不来，找了一个人说情，把他放出来了。听说，特巧，给他说情的人是殷汝耕的近人，他的一个姑姑的儿子，表兄弟。这就成历史问题了，咋说呢，说不清道不明的。反正是放出来了，但不许回来，只能在北京万国道德会待着。你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了，没法再隐瞒了，必须在万国道德会待着。待了几个月，化装跑了出来，参加工作。因有这么一个历史插曲，心情很不愉快，很多人都说他是叛徒。他也非常倒霉，回来后，复查［指1947年的土地复查运动］前后，他给他妈赶脚，他妈骑着小白驴去西刘村治病去。这一天，他们庄一个村干部被捕了，也是一个骑小白驴的报告的。误认为是他报告的，这一下子就把他逮捕了。共产党把他逮捕了，把他判到保定监狱，坐牢。他的同志很多呀，狱长过去是他的部下，问："你咋来了？"他说："我咋知道呀？"狱长说："我到公安局看过档案，就简单的几个名词：破坏合理负担、破坏贫下中农、投敌叛变，没说欺负贫下中农是欺负谁啊，投敌叛变在哪啊，做了什么坏事啊，没这个。"判了16年，因狱长是部下，说："老骆来了，就当个医生吧。"在里面学的医，医术说不上高明，但也可以。提前释放，到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就是双料的反革命：一个是反革命，一个是地主富农分子。两个帽子戴上，好把他收拾了，收拾得好苦，非常困难。等我们访问他时，好可怜，相当惨，不起来，就那么躺着呢。我们一回访问，二回访问，一启发他，他就说："咳，拉倒吧，我就当做了一场梦啊，不用拉了，不用拉了。"开始总是这样说，我们很多人访问他，都这样说。我比较坚决，得访问他十回以上，约有十五回。他说："我也知不道这样，我这梦不做就中了，别耽误我就中了，别耽误我就中了。"我说："你还是实事求是说。"然后再拉，他说了。跟张明远一汇报，张明远说："他还活着呢？赶紧看看他去。"张明远那时在北京是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坐车到遵化来看他，而且给遵化县委打证："你不能等这样的老同志死了再后悔，你得给落实政策。"这个证对恢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又找了李一夫，刚解放时，他是唐山市长。批准逮捕由唐山市长负责，我又找了李一夫，在北京住。他说："这个人很好，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罪证。"也给打了个证。我又屡次启发他写了一份回忆录，他很积极，不瞎说，始终也不瞎说。后来恢复，可能定的18级，定的县委的干部，给他补了点工资，心情也就很好，感谢共产党。后因心脏衰弱去世，2001年死的，90岁。[1]

那惨地方多了，他大儿子早死了，没啥好处。他二儿子逮捕了，在昌黎监狱，唐山地区劳改犯都在昌黎，打石头，监狱就业了。他三儿子60多岁，现在还没找上老婆呢。因为他是富农分子。

骆凤庭支援孙永勤的枪送到小厂，那边就有人接。那边是张志全，他们是一个支部的，

[1] 据骆凤庭之子骆玉占回忆，其父因为心脏病转老年性脑出血而去世。



县委委员。张志全在那儿担任救国军总稽查长，管这个工作，他们有联系。但是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没说那么详细。估计他们是有联系的，直接送给他的。

他特别尊重孙永勤。因为在那时候，卖十几亩地，买十几支枪，那也是不简单的事不是？过去一年留二亩地，地主户也是能够发家的。

张明远是玉田东边一个村的人，以后冀东地区党组织的领导者，大部分的党员都是他发展的。抗日时期，他是冀东行署主任，就是相当于省长。以后派到东北，任行辕主任，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因高岗事件受牵连，坐了大狱。后恢复工作，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这个人很有贡献。

王平陆是咱们蓟热边行署主任，相当于地委书记这个职务。因为咱们遵化北部跟承德搭边，遵化属蓟东，承德地区过去叫热河，所以叫蓟热边地区。王平陆是能干的，他受张明远直接领导。张明远是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的负责人，是他的直接上司。

孙永勤被“剿灭”后，骆凤庭还参加工作。后来由于敌人叛变，有个叫孙彩的，可能是大西边贾庄人，他要求入共产党，共产党不吸收他，因为他是个痞子样的人。没吸收，他就叛变了。报告保安队，在西边草场把骆凤庭逮捕了。在北京押了几年，放出来了。

我觉得骆凤庭是个好同志。那时候共产党八字还没一撇呢，一不得工资，二不得奖励，积极为党做工作，发展党员工作，我觉得非常好。能那么舍家救国的，要没这些同志，不能说解放不了，要推迟几年。

特警队有两个亲日的。因为《塘沽协定》后成立非军事区，用四个保安队来维护这二十多个县的社会治安，其中有两个是北京代表，两个是伪满代表。

张志全是丰润的，也是很进步的人，舍家取义。土改后，他家平分了点地，他把地做了抗日纪念馆。那时候，农民把地都当宝贝，他却把地做了纪念馆。张志全很了不起。

傅连贵回忆毛山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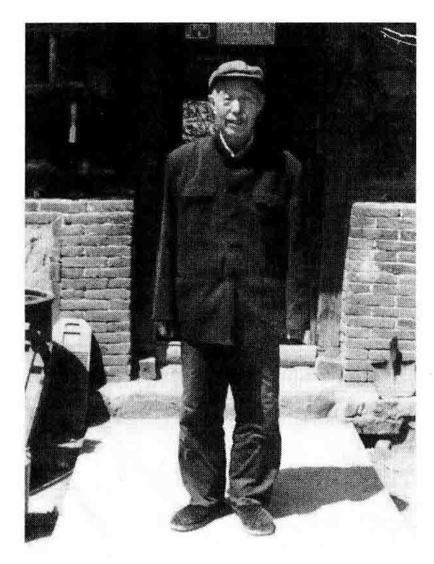
讲 述 者：傅连贵（74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2005年8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傅连贵老人　2006年4月

傅连贵（74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村民）：

土匪，我父亲讲过，我们庄有一个叫李福叶的给他们做饼，在伙房，两案子，给烙饼。饼搁手里，往锅里一扔，都叫好，说："走时，非得把你带着。"土匪收拾财主，穷人家他不管。

老百姓对他们（民众）反映好。一开始，在八区华山那边打了一仗，这边听念叨就知道打仗了。那时没见过面，不知道他们队伍怎么样，打老百姓，不打老百姓呀。等到见面知道了，一概不惹老百姓，不骂人，也不打人，不混巴溜溜的，对老百姓不错，还是一心一意打日本，军头还是好军头。

头一天，在八区大寨那儿打了一仗，之后就退过来了。一清早，到了我们庄大街上，庄里人都没起来呢，还没开门呢。我们庄东头有个哑巴，那哑巴初一、十五的哪儿唱戏都知道，都懂得，一般的都会。他起得早，到大街上了。民众也到大街上了，打听道儿："上毛山怎么走？"哑巴一哇啦，民众说："今天早起不顺，大清早起，碰上个哑巴，今天好不了。"那可不，都讲究迷信不是。这就到他们（指傅义老人家）院来了，先问他们："有方便饭没有？做点吃，好几天没吃饭了。"那时候哪有粳米白面哪，都是粥渣子，说："有粥渣子也中，赶紧给我们做点吃。"

见一个打一个。从吴家沟朝上是火线里，日本子见着一个打一个。都上民众圈打，怕混淆不是。民众也是老百姓衣裳，知不道哪个是民众，哪个不是民众不是。

日本人把人突突了，房子也点着了，就抓山了，就往上打去了。往上打的时候，四面包围这个山。小于沟那边也往上围，这边也往上围。打那过山炮，都过山了，把那边自己人还打死



不少。像秋花峪李永发家垛一屋全是尸体，那是自己打自己打的。

不是民众打不了他们，是关里柴草小。听念叨，他们在口外瀑河那边，八卦岭，刚才我大哥说了，瀑河在八卦岭那边，山好，柴草大。他在这边堵着，他从那边绕到他屁股后面去了，咣咣给他两枪。日本人一打，又钻到旁处去了。日本人不敢往柴草里钻，柴草一人多高，日本人不敢进去，孙永勤队伍在那里平趟。在那边打仗，打一仗，胜一仗，就是在关里，操蛋了。关里山上没柴草，到哪儿都光秃露面的。人说打不了，日本给他起外号叫“山耗子”，说关里有个毛山，打了的，猫吃肉，他们信奉这个玩意。一个二老道军师，军师没死，庙岭山不是庙嘛，军师换上衣裳当老道了。日本也信神，老道都是宗教，他们不害巴。

有个大军师，有个二军师。大军师是老道，二军师也是。大军师不让上关里，上关里没好处。福星高照，不让上关里。没法了，过来。二老道过来了，领着。

这村那时人口不多，也死了好几十口子。有的是在河套让机枪突突了，有的是上房救火，日本兵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开枪打，人就掉火里烧死了。那边一个老奶奶岁数大了，瘫痪了，出不去了。她大孙子让日本给圈出去突突了，老爷子烧得看不着啥了，也跑了，没人管了，就烧死里了。保安队来，在上面看，脑瓜骨头还冒烟呢，嘶拉嘶拉地，一个人烧不透不是。

沟里头也有人家背着孩子、领着孩子叽叽抓抓地往外跑。跑的时候，那两山往下打，两山都是日本，把背孩子的老爷们的大脚指头给穿上了，瘸楞瘸楞地往下跑。跑到我们后边这弯子那儿，听见孩子的叫声，他那个爸爸从那个死人堆里偷着往外一瞅，是跑反的下来了，这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跟着往外跑。跟跑反的人跑到宋家窝棚，他兄弟脑袋上的骨头渣子还插到手上了，到那儿，才拔出来。

东院我们老爷猫到哪儿了呢？猫到牛圈里了。房子都点着了，牛棚也着了，他猫在里面也没出来。牛棚着了，头发、眉毛全燎了，你把圈门子开开，跑哇，他迈过圈门子跑了。把牛都烧死了。他跑出去，眼都烧得花不瞪瞪，岁数再大点，跑到西边这儿，就转起来，找不着道儿，雾迷［方言，指迷糊］了。我父亲在南边犄角内，看见了，说：“不是老叔吗？”“是啊，大小子，我找不着道了。”“你顺着我的声音来，冲我来。我把你领到河套去，你跑出去吧。”就跑出去了。

南边，这边家数少，我们在这南边住。我父亲把我们东西抢出去了。日本人南边没来，要来也就撵北边突突了。我叔叔挑水，把我搁到南边一个院子里了，有个井，我看得真真的，我五岁。他挑水，呼哧呼哧快挑，我父亲在那边等着。都是草房，到那儿，我看着泼上一勺子也不灭，泼上一勺子也不灭。一个劲儿地挑，挑着挑着，北面跑反的下来了：“你们还哭呢？都打死一大堆了，庄北啊。你们还不跑呢？”我奶奶坐在南山根上哭着，瞅着房子着了。“还哭呢？”我奶奶也不顾得哭了，下来就往河套里跑。我就着急了，就叫唤上了，得抱着我啊。不

抱上我，你说我还不哭。这一哭，我奶奶不顾我了，平时没事她顾我，这时各顾各的了。我妈到跟前了，抱上我，跑出去了。我在这儿瞅着，日本人已经到后街门这儿了。

那之后，村人都住在遵化了。遵化那时是县城，我们都住在玉林堂了。城里放粥，开粮仓，给这儿去的人做饭吃。

四面包围呀。那时技术也不强，这边打炮，打到山那边去。那边打炮，打到山这边来。这个下边都是日本人不是，他妈自己打自己。他妈咣当四面炮，当当地，它把自己不少人给咣当死了。晌午时，孙永勤一个跟班的跑下去了，奔着黑胡桃那条路跑下去了，还到沟里头刘青林家来的。早晨在刘万福家还想杀羊吃，那吃啥，枪就响了。孙永勤他们都在那儿来的。有一匹白马，孙永勤骑着白马上来的，赶到这儿，就病了，骑不了了。孙永勤几个跟班的，都那么高，就是手长过膝，就这一样特殊。你要把他们都逮住，说哪个是官？不认得，看着都一样，就那一手特殊点儿。白马骑不了了，就找人用椅子抬着上山了。在头道毛山打来的，晌午前，跟班的就跑下来了，帽头里兜着枪。刘青林一看孙永勤跟班的下来了，就往他跟前凑。那跟班的就往后退，不知道当地老百姓打他呀，不打他呀，害怕了。刘青林说："你不用害怕，我不会咋着你，不害巴你。我就问问咱们军长到啥份上了？"他这回不往后退了，靠近了说："军长那儿，当下还有四箱子弹。四面包围往上打呢，够呛了。"跟班的下去了。

有飞机在上面绕，开始飞得高，民众打不中。那飞机忒靠近了，使快枪，当一下，飞机吱歪一下，飞走了，飞澈河桥了。澈河桥是日本局子嘛，打下去了。

埋那人，是这边上去也埋，那边上去也埋，那都埋不起，死的，都扔到沟渠子里头。就那么回事吧。那哪埋得了哇，没土，挖不了坑子。那上面还是国民军在上边挖的沟渠子呢，想与日本作战来着，没用上。日本进关时挖的沟渠子，战壕。顺着梁挖进去，都是往下扎，往下扎，都是饭槽子坑。人往那儿一蹲个的，留着打仗的。日本进关时，日本进遵化城东门，国民军出西门，就那么眼前。这庄都住过国民军，像那边，现在没房子了，是空地，过去都住那儿，练武术。

我们羊儿峪这儿的，外号叫"虻六"，上上面捡洋落儿去来着。人都打死那儿了，趴在那儿，枪在怀里抱着呢。按说捡洋落儿的，他也是废物，边上这么拽呀，他冲着这么一拽。手还搂着扳机呢，这么一拽，当，把自己给打死了。捡洋落儿还给打死了呢。



傅义回忆毛山战斗及哥哥之死

讲 述 者：傅义（85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2005年8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傅义（85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村民）：

那阵16岁。

土匪过去了十来天吧，民众军队伍就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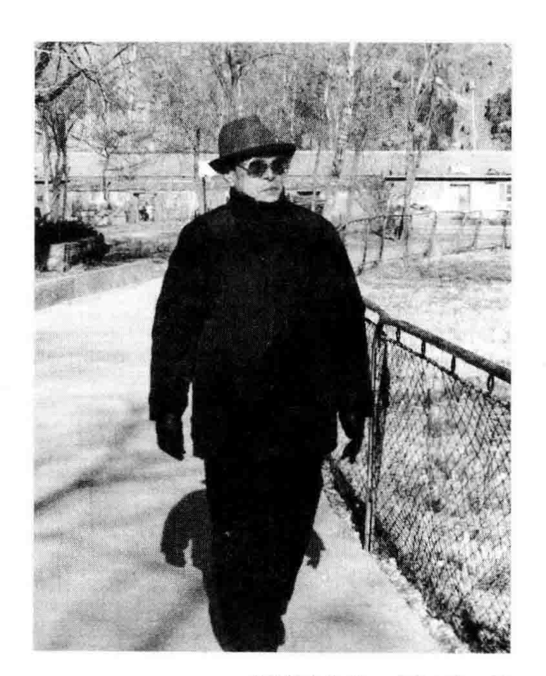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一那天前晌，就听说到大寨后山了，劳动力就都回家了。到东梁上瞅着，也瞅不着人。黑了，日头没了，讲："咱们咋想啊，是跑哇，还是在家待着？"说："往哪儿跑哇，你知他们上哪儿去？""那咱们就家待着。"就在家宿了。等二十二那天，刚一蒙蒙亮，就到了。招呼开门，这屋来了十来个呢，绑了三个日本的官，在这屋待着。说："给我们做点饭吃。""中，做啥饭呀？""啥饭都行，稀的，啥方便咱们吃啥，是饭就解饿。"大劈柴点着了，烧了一锅水。刚要舀粮食，枪就响上了。"别做了，别做了，给我们带个道吧。"我有个哥哥不是，那年刚21，让我哥哥给带个道。我们老爷子说："我去吧，他们年轻人没主意。"我们老爷子就领着他们，出了大门，有个胡同来着，从胡同一直往北去了。"去哪儿？""上毛山。"到了半截，还没到毛山上呢，梁上，从后面、东面，哐哐，枪就响上了。接着九虎岭，咣咣，大炮放着。"我回去，行吗？""行啊，回去从阳面走，别从北面走。"北面枪炮直响。我们老爷子顺着阳坡突噜突噜下来了，从那边回来了。还没到家，房前面有个猪圈，枪炮响得啥似的，就猫在猪窝里了。头里有个车，着了，火星子落身上，哪儿落哪儿捻，择（音zhái）不了了。到他们后头院子，那儿有个薯坑，猫那儿去了。我们老爷子就看见日本人了，日本人没看见他。猫那儿，听见枪炮哐哐一劲儿响。他们一家子在这屋炕根上猫着呢，我们一家子在这屋炕根上猫着呢，和我哥哥我们。枪炮过劲了，还响着呢，日本兵来了。三四个进这屋（指西屋），"呀呀呀呀"。三四个进我们屋（指东屋），"呀呀呀呀"。也听不懂说的是啥，我们全立起来了，也不敢出来啊。拿枪挑着门帘子，进去个日本兵，把我拉出来了。拉到这儿，把我哥哥拽出来了，把这屋的也拽出来了。出去，刚到大门，东边隔壁门里傅老爷子是个财主，有个管事的，连他儿子，圈出来了，到一块，往西走。西道口有个道，往后寨去的。

到那儿，拨拉拨拉，连我母亲，连孩子，把我们和几个大人拨拉开，就上后台子了。后台子那儿有三间房子，到那儿，封火檐点不着。让我哥哥他们，连那管事的，傅老爷子仨儿子，把他们拨拉开了。柴禾垛拆开了，窗台前摆上一摞树枝子，点上了。把我哥哥他们全都圈东北犄角河套那儿去了，跪那儿，突突突突，拿枪打死了。他们老爷子不知怎么该活，趴那儿猫着，把膀子穿了层皮。趴那儿跪着猫着，也不敢动。抬头，沟里有人家跑反下来了。有孩子、老娘们，孩子妈呀、妈呀，他们老爷子听见孩子叫，趴那儿抬头偷偷那么一看，孩子、妇女沟里的，就跟他们跑了。我们这庄死好几个呢。东边还有两个，打河套里了。他二叔，这儿（指前额）掀开了，眼珠、脑浆流出来了，还这么奋拉，趴着呢。我们在庄西头待了会，就跑了，到吴家沟，也不敢回来，日本还没走呢。接了一天，看见日本走了，我们才回家。一瞅，河套躺着好几个呢，都死了。我哥哥末了死的，枪从腰这儿打进去的，还拿手指头这么塞着呢。埋了，就到城里去了。我父亲躲东院白薯坑里猫着，没死。

佟靖功先生谈孙永勤（一）

讲 述 者：佟靖功（76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城佟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佟靖功（76虚岁，原中共兴隆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兴隆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兴隆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佟靖功先生　2005年1月

调查孙永勤事迹经过

我是1982年到县委党史办的。在党史办，除日常工作外，我还有两项专题任务：一是接受中央党史委部署，撰写《孙永勤传》；再一个就是地委党史办部署我帮助李运昌将军寻找冰儿。我把这两个任务结合着进行。找冰儿的过程，也就是对孙永勤转战二年六县的事迹的追踪过程。在五年中，累计行程有两万来里，为冰儿的事，访问了一千多人，征集孙永勤将军的事迹，也访问了一千多人。基本上走遍了兴隆、宽城、承德县、迁西、遵化的结合部，也就是孙永勤活动的五大山的范围，到1987年完成了《孙永勤传》的写作任务。

1982年到党史办后，首先接到上级党委关于撰写孙永勤专题资料的通知，至1985年，中央党史委要求写《孙永勤传》。

1986年，我们才知道中央早已批准孙永勤为烈士，享受军长级待遇，雷永兰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孙永勤英雄事迹

（略，可阅读佟靖功先生所写的《孙永勤传》）

对孙永勤的评价

一个农民，为了祖国，为了抗战，为了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为了祖国的荣誉、民族的尊严，能够顽强到那种程度，是可歌可泣的。我们决不能再遗忘、再埋没这些英雄。我们不应该单单记住官方的烈士，我们也应该悼念和记住民间的英雄、英烈。

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表彰了孙永勤是位民族英雄，对我们热南、冀东是个很大的鼓舞。孙永勤不仅是兴隆县人民的光荣，也是热河和冀东人民的光荣、北方人民的光荣。

值得缅怀的人们

我们承德市建了一个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为孙永勤搞了塑像，在纪念馆里给孙永勤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便于热河人民永久地缅怀这位革命先烈。

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约有上千名的战士牺牲了。像陈子兴，遵化下港的一个农民，突围时用菜刀砍伤几个鬼子兵，被俘之后，挣脱绑绳，用大石头砸伤一名日军、一支三八枪，最后壮烈牺牲。我们要缅怀这些民间的战斗英雄们。这里最值得立传的还有关元有烈士。他是1933年春季由遵化县委发展的地下共产党员，他为抗日救国军的建立和扩大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本来在毛山有生存的可能，他却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其他同志，把死的最大的劫难留给了自己。最令人惋叹的是，关元有在毛山牺牲后，一直到1985年，我们到遵化外调的时候（指为写《孙永勤传》外调的时候），从遵化骆凤庭同志那里才知道，关元有是1933年的共产党员，这使我们党史办的人非常感动。毛主席曾讲过，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正是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民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我们中国人民一百年来一切伟大斗争没有一次能赶得上的。所以我们体验到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也锻炼了我们的共产党员。关元有同志为了抗战，不仅自己牺牲了，他家里没剩下一个人，都为抗战付出了生命。可是这样一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党员，我们50年之后才发现！我为我们兴隆县有这样高尚的共产党员、优秀的共产党员感到自豪，为我们党能够培养出这样纯粹、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感到自豪。这说明50年前，我们这里就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党员。

孙永勤将军，他怎么能从17个农民发展成5000人的大军呢？最根本的是他接受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主张和建议。比如他原来的口号是“杀富济贫，天下第一军”，后来我们党建议他改为“抗日救国军”，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这样孙永勤将军就升华了他的经验。经验是什么呢？争取民团的大联合，这就是他对统一战线的朴素的理解。所谓民团就包含了抗战的地主、富农和贫雇农、中农。民团的大联合，就是整个爱国农民的大联合。孙永



勤就是这样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正确的主张，用他的口号和切身实践实现了民团的大联合，这样最大限度地团结了长城脚下的广大农民，才从17个人发展成蓬勃壮大的民众军。以至于坚持了二年苦战，攻克100多个据点，毙俘伤敌人15000多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孙永勤烈士这种闪光的壮举在长城脚下是永垂不朽的。

值得表彰一九三几年的中共遵化县委。孙永勤将军之所以能和共产党交朋友，那样诚恳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主要是通过遵化县委，特别是通过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孟家铺区委书记这些共产党人帮助实现的。这里要提到1935年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同志，这位老书记非常重视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他几次嘱咐孟家铺区委，并帮助孟家铺区委买枪，买治伤药，买物资，来支持孙永勤将军。有三次都是他们自己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枪、药，用毛驴驮了200多里，从遵化运到塞北的孙永勤的司令部。在最后一次募枪的时候，1935年5月22日，正是孙永勤将军率领部队和日军在遵化尖山屯激战的时候，骆凤庭书记派共产党员阎龙去和孙永勤联系，准备把南北堂村的几十支枪动员出来，交给孙永勤将军。由于激战当中，阎龙没能和孙永勤联系上，所以用这几十支枪支援部队的愿望就落空了。骆凤庭书记、孟家铺区委这些共产党员是那样地扶持孙永勤、支持孙永勤，我们在缅怀孙永勤将军同时，也应该记住这些个好同志，记住他们为孙永勤将军、民众军做出的一系列贡献。

孙永勤为什么要到口里去

过去对孙永勤为什么要到口里去，都不太理解。等宋邓支队来才有了比较。他们也是5000多人，并且是八路军的劲旅，可是他们来了之后，在兴隆、遵化、平谷、迁安这一带跟日军作战了两个多月，不行，站不住脚。像这样精锐的八路军都站不住脚，最后又返回平西，返回根据地，留下三个小支队在这儿活动，这是一个比较。再一个，李运昌将军组织冀东军分区的主力十二团、十三团在冀东活动。1941年6月，他带十二、十三团走到玉田南部，被敌人包围。十二团团长陈群非常英勇，老红军，那次受了重伤，不久就牺牲了。十三团一个营保护李运昌，其他人把枪全都插了（藏起来之意），藏入民间，换成便衣才出来的。两个团，一个是人员受到很大损失，一个是武器受到很大损失。李运昌带着一个营，非常艰难地突围。出来后，李运昌将军反思这次行动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同时向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请示。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示：开辟冀东要注意，冀东必须与热南山区相结合。如果冀东平原不能以热南山区为依托，就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也难以建成稳固的根据地。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李运昌接受上级意见，认真总结1941年夏季教训，决定大力开辟热南。实践证明，冀东平原必须和热南山区相结合，热南山区也必须与冀东大地相结合，这两者必须相辅相成。所以

从1941年秋开始，组织开辟宽城、兴隆的长城工作团和开辟青龙、平泉的青平工作团。李运昌把很多部队化整为零，变成工作队，带着药、粮食、布匹，到热南地区发动群众。李运昌将军亲自过来，在兴隆、青龙的结合部艰苦工作了七个月。从1941年秋到1942年冬，一年多，在雾灵山以东，都山以西建立了七百里的山区游击根据地。

后来，每到敌人搞“强化治安”的时候，用重兵“扫荡”冀东平原的时候，冀东的领导人、主力都转到青、兴等这一带热南山区。等到敌人“扫荡”过去，主力又回到冀东平原。事实证明，1942年以后，我们始终利用长城以南是“非战区”，以北是伪满“西南国境”，南边紧了上北来，北边紧了上南去，把平原和山区结合起来。到平原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扩大根据地，解决大部队的衣食住行等军需问题。到热南山区，主要是为了回避敌人的锋芒，保障我们这支壮大的队伍能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冀热边”这个名字是非常确切的，在李运昌、李楚离等冀东党政军领导同志的艰苦的工作之下，我们的根据地发展为冀热边，后来从冀热边发展为冀热辽、冀察热辽，从两个主力团发展到几万人的大军。等到抗战胜利时，冀察热辽根据地已经成为全国十九个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并且在接收、开辟东北的时候，起到了捷足先登的巨大作用。

所以总结从孙永勤将军到李运昌将军，从冀东平原到冀察热辽根据地，结论是：热南山区必须和冀东平原相结合。一个山区，一个平原，一个要着重解决隐蔽地，一个要着重解决物资，这就是相辅相成的作用。回过头来看，孙永勤往南发展，大方向是对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他那时已有5000人的队伍，在蘑菇峪、马架山一带已无法解决军需问题。问题是他那次挺进口里没有成功，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卖国，何应钦、殷汝耕卖国。假如他们不卖国，接纳了这支部队，孙永勤将军的队伍就可能发展成为一支更强大、更精良的部队。

关于特警队“协剿”孙部问题

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冀东在谁的领导下的问题。当时冀东有两个区，一个是滦榆专区（遵化到山海关），二是蓟密专区（蓟县、密云到通县以东这个范围）。开始两个专区都有专员，后来都由殷汝耕来担任，也就是所谓冀东区的领导人。冀东区当时划归河北省，但由于处于“非战区”，受日军严格控制。殷汝耕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亲日人物，妻子是日本人，此时已暴露出卖国倾向。孙永勤进入遵化，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的时候，殷汝耕就答复，一定要“协剿”孙永勤土匪。后来殷汝耕的卖国行为就更加明显了，担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不仅脱离了河北省，而且脱离了蒋介石，完全暴露了汉奸嘴脸。

当孙永勤进入遵化时，名义上遵化归河北省领导，实际上归殷汝耕领导。他手下共有四个特



警总队，第一张庆余，第二张砚田。他派出特警队，目的就是来协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把特警队密布在日本人所布置的战区的南部。日本人设置的战区就是长城以南15里，这就是日本人布置的跟孙永勤决战的战区，所以战区南部十五里边缘上都是特警队。西部是张庆余，东部是张砚田的特警队，联合了很多民团，组成一道防线，阻止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南进。现在我们研究历史，要尊重当时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从哪里来？一个重要方面是依据那个时期的记载。1935年5月下旬，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申报》等很多报纸都报道了孙永勤被日蒋“协剿”的情况。其中一篇报道很明确：1935年5月22日，孙永勤带部队南进时，在尖山屯、七户一带，首先阻击的就是当地民团。孙永勤指挥军队，说民团是我们的兄弟，不愿与民团交战。但当地民团不顾民族情肠，首先开战。民众军向天上放了一些空枪，以示警告，但民团继续向民众军开枪，孙永勤这才指挥民众军一部打退了民团，俘虏了十几名没有民族情肠的民团团员。当民团后退的时候，报纸报道：日军突然出现，是山田一支队，继续向民众军进攻。孙永勤大怒，指挥民众军打退了山田队。在山田支队不支的时候，报纸又报道：张庆余两个中队配合日军合击民众军，阻止其南进。激战四个小时，所以遵化县委骆凤庭书记派共产党员阎龙把几十支枪送给孙永勤，没能联系上。这篇报道就证实了张庆余两个中队配合日军非常反动地向民众军攻击。因为这样，为节省子弹，孙永勤才带部队转移到三屯营以南皇阁村、马甸子村一带。此时已天黑，派出侦察员向群众了解情况。群众报告，皇阁村、马甸子村南有很多特警队，且组织了很多民团，在那儿等着民众军。说明张庆余、张砚田特警队在重重围阻着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不准其南去。我们分析，隶属于遵化县何孝怡的保安队的某些人确实对孙永勤网开了一面，而隶属于殷汝耕的特警队确实顽固地、反动地配合了日军“围剿”抗日救国军，这是有据可查、有历史记载的。

孙永勤头颅的下落

再一个要说的是孙永勤、关元有将军的头颅。当地老乡的见证和文字记载都表明了一点，1935年5月24日中午12时15分孙永勤壮烈牺牲后，山田队部分尖兵割去了孙永勤将军、关元有将军的头颅。后来山田为了庆功邀赏，把孙永勤将军头颅拿去了承德（当时的伪热河省省会和杉原师团驻地），向杉原师团长呈上孙永勤将军头颅，且把孙永勤将军头颅拿到承德二仙居（大街的名字）示众了三天。这是有历史记载、有据可查的。

回忆婆婆与公公

讲 述 者：贠玉萍（60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兴隆镇拥军路贠玉萍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贠玉萍（60虚岁，孙永勤二儿媳）：

我们婆婆叫雷永兰，只知道她32岁就守寡。我们结婚的时侯，她对我们说过，老爷子死在遵化毛山。

“文革”时，我们老家有一支部书记，他爷爷跟我老公公是叔伯哥们。他爷爷那阵是跟日本子办事的汉奸，我老公公是打日本子的。“文革”期间他是支书，就批斗我们，说我们是土匪后代。“文革”后期我们出来搞平反，知道我们老爷子是在遵化毛山死的，打官司期间，我们就去了一趟毛山。就知道我老公公他没脑袋了，听说把脑袋割下来，用漆油了，在澈河桥、半壁山一带震唬老百姓，说是孙永勤的脑袋，挂在树上示众，身体被埋了。扒了几个坟，都有脑袋，有脑袋就不是。后来在兴隆听说什么地方，我们也没找到地方，后来也无法去找。

听婆婆说，好像让他舅爷去找尸首来的。她自己去没去没说，就说我们舅公公去找，也没找回来，也不知尸体埋在哪儿。

进关时，婆婆没去，走远了不行，有孩子。我丈夫当时才两岁，我们三小叔子是梦生，他们间隔2岁。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老太太给我公公他们做棉衣、袜子，给他们送，一说上毛山，远了，就没跟着。就这次没跟着，那还偏偏打死了。

我们婆婆是17结的婚，公公比婆婆大十岁。我公公先娶过一个老婆，是我们本大队的，地名叫樊家沟，是那儿的娘家。她死了之后，娶我现在这个婆婆的。我丈夫是这个妈生的，原来那个就撇下一个闺女，现在也没了。

我这个婆婆是宋杖子北大地的娘家，家里挺穷的，两个人感情还很好。我婆婆进门时，还有老妈呢，也是32岁守寡。公公他们哥四个，我公公是老三。

婆婆有时侯也发牢骚。他（指孙永勤）死得早不是，她才30多。走一处吧，有好几个孩子，怕当奶犊儿，只好守着呗，一直守到80多。上了气头她也骂呀，和我开玩笑似地唠叨，说你爸爸要是不死，现在我也不至于这样，比李运昌他们不次。让“文革”闹的，几个儿女七零



八落。她有时也这么发牢骚。

婆婆是88岁有病死的。跟半身不遂似的，二年零八个月没下地，都是我接屎接尿的。临死前一句话也不说，晚上死的。怕火化，当时县三级政府都要求火化。搁了七天。后来政府说不给找地方埋什么的。她32岁守寡也不易，还跑兵打仗什么的。我婆婆还会使双枪呢，现在也有照片。一想她一辈子不容易，就这么点心愿，我们就自己找地方把她埋了。1981年到的车道沟，1991年正月初六去世。

婆婆曾到承德烈士陵园去过，清明节，那些年每年都去。坐火车，都是政府接待的。到烈士陵园，买了花圈，放到烈士塔那儿。自己老爷们没了，说那塑像太像本人了，抱着塑像哭呗。婆婆死后，我们还去了三年呢。

婆婆死第二年，去烈士陵园还是政府接待我们呢。冷不丁我妈一死，政府也就不接待我们了，招待都不招待。去的都是烈士的亲属，塑像就在那儿摆着，哭哭咧咧的，这个去买票，那个去买票，搁谁也难过。后来政府一不管呀，有那么一年我气得差点想把烈士塑像推了呢。反正也是我老公公的，我们也犯不了错误。虽然气话那么说说，也不能那么办啊。

我们是哥三个，姐三个，连我们先那婆婆撇下的算上。现在姑娘一个也没有了，哥们一个也没有了。

老大是搞平反之后留在老家的。政府给盖的房子，盖的不合格，让大队把钱贪污了，没处说理去，他就窝囊得上吊死了。

我们二大姑子没出阁，21就得病死了。那时跑兵，得了热病，按当下说，就是重感冒。

老姑奶子在黄花川河口，也是给人做填房。前边撇下的一个，在黑河套，解放。两外甥也在我们大队，关家沟。他们这支，都岁数不大就没了。

说那时让他（指孙永勤）上遵化去，婆婆不乐意让他去。他那时人多了，好几千人呀，没枪，也换不下季（指服装）来。那时不是讲跑信吗，就让他带着部队去遵化，给他们枪，还给换季节衣服。那时都到了三月了，就去了。那时候说有一个老道，会算命，说他不应该去。为了部队好打鬼子啊，就去了。到栗树湾子那里还有人参加他的部队呢。有活着回来的不是，说那个老道到栗树湾子就跑了，没去。偏偏到那儿还打花了（即打散之意）。

当年我老婆婆活着的时候说，我公公是受刘邓领导的，还封了军长呢，叫抗日救国军。记得当时我婆婆说，我公公是在一个卖水鞋的地下党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打鬼子，斗地主。起初他组织了5个人，砸了一个地主，弄到了枪支。从那以后，他就广泛招兵，扩展力量，提出了“敌不灭，怒不息，头可断，志不屈”的口号，竖起“天下第一军”大旗，建立了革命民众军，他任军长。1935年2月的一天，接到上级命令，部队要到遵化去打鬼子，然后和太行大部队会合。等他们一到遵化毛山，说山上全站满了鬼子，那就走不出

去了已经，都围住了。他也就是不要命的人，人家说要是投降了也就保住命了，他宁死不降，可惜没打过人家。李运昌他们都知道我们老爷子的事，平反的时候要没他作证，根本就平不了。

我婆婆活着的时候说，我公公胳膊伸直了，到这地方（比划膝盖下），胳膊到腿弯子底下。个也不矬，大高个，长巴脸。

也有人说过，说他不是真人，是天狗转世。在碾盘上待着，冷不丁一看，就一条大黄狗在那儿呢，都说他是天狗下凡。

毛主席早就派人给他通信，说是让他跟太行军会合。他就说，承德不打下来不去，必须先解放家乡。他就在承德这一带，半壁山、栗树湾子这一带，还有遵化这一带打鬼子，要不他咋去遵化呢。

抗日救国军战士史耀华回忆孙永勤

讲 述 者：史耀华（92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

采 访 者：佟靖功、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自然村（第十村民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史耀华（92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自然村村民，孙永勤表外甥，原抗日救国军军法处战士）：

孙永勤是蘑菇峪的姥姥家。

孙永勤手大，脚大，大长方脸子，大下巴，穿一尺长的鞋，个子还高。

头一个老伴也是黄花川的，姓李，早死了。

他先是伙会会长来的。

那个时候，他接着毛主席还有朱德的信了："你要起义，你就起吧。起了，你避难，别打呀，打不过人家呀。"让避难哪。"快了，日本进来三年了，苏联也打它呢。"这时孙永勤从北面勾过来十来个子，可能是磕头十八个，勾过来了，就起来了。

车河口有个买卖，大杂货铺，叫大成兴。谁开的呢？暖儿河有个岳老亮，开煤局子，他有



个小舅子，他在那儿。寿王坟罗圈沟有个孙义香〔孙永香〕，也是会长，把大成兴给抄了，抄个溜净。孙永勤到那儿是末了，啥也没拾掇着，就把张北的唱戏的昆角、武生都绑来了。

后来大成兴的赵老子诬告孙永勤抢的，他不敢动孙义香〔孙永香〕。孙义香〔孙永香〕的侄儿是一个司令，日本的。说了一场又一场，孙永勤给告了三回，下了三回台阶，吃了三口肥猪，孙永勤就回来了。再三再四，车河的给信，说："你快躲开吧，又让大成兴赵老子给你告了。告到岳老亮手里了，说你是匪头子，赖你拾掇的。"左一场右一场地说和，后来孙永勤说："我不了。"跟他媳妇说："我这回要抗日去了。"老伴说："你抗啥日，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你瞎胡闹。"孙永勤说："不中，日本子已经进来三年了，快不行了，毛主席、朱德都给我来信了。我就得……[1]，先治国，后治家。我要出家了。"老伴说："你别瞎胡闹了。"打了一架。晚上说他老伴："咱们不要家了，家里爱啥啥，啥也不要了。"老伴说："你别瞎胡闹了，放着好日子不过，你怎么摆乎这个呀。再摆乎，赵老子是岳老亮的大当家的，他说了算。"岳老亮的小子对岳老亮说："你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煤矿不开，弄这干啥？听说是孙义香〔孙永香〕伙会抄了这买卖。"

……[2]

孙永勤说："赵老子呀，你别勾搭岳老亮告我了，我没拾掇他。"说："你说你没有，就是你。"后来大伙也说："赖孙永勤抄的没那事，他啥也没得着啊。"……[3]又花钱赎回去了。

孙永勤对老伴说："你就琢磨着吧。"出气，去北边十来天。

从北边回来，不是十八个，就是二十个人。孙永勤大白天就喊："开门！开门！"报复他的家眷。把衣服穿上，开门。哎呦，有二十来个人，全是双手枪挎着。"说三月三孙永勤勾搭伙会打我们，这回我们又来了。"

老伴就骂孙永勤："你这个疯子不疯子，你说你干这个，你打日本，你打过人家了？人家有兵工厂，人家是个国家。除非你把我枪毙了，你出家。"孙永勤说："杂种操的，你说这话我不爱听。先治国，后治家。"后头他把盒子掏出来，叫开狗头就打呀。他旁边的弟兄们、亲兵那，就把他胳膊拦住了，枪子从瓦缝里打出去了。亲兵们劝说："别这样，消消气。"让家属隐到山沟里，由军队保护着，这才又聚了二百来人。

孙永勤说："这还有家没有家啊。"

对穷人不错，就是财主不喜欢他。

打仗，他是至死不退，就是那样的人！他也不怕死，日本人也是认识。翻译官讲话："认

---

[1] 采访史耀华时，他已目盲耳聋，卧病在炕，一年多后即去世。此三处虽经反复听录音，仍无法得知准确内容。

[2] 同上。

[3] 同上

识孙永勤了，至死不退。”就这么个人！

日本作战厉害，厉害也不中。老梁一仗，就打死五十多个鬼子，后来日本人急了。

孙永勤死在毛山了，死了好几百啊。

我管看着，要枪不给的。

孙永勤打北面时，挂彩了。

史耀清忆孙永勤（一）

讲 述 者：史耀清（84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

采 访 者：佟靖功、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自然村（第十村民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史耀清老人　2005年1月

史耀清（84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自然村村民，史耀华之弟，孙永勤表外甥。1922年出生，1947年10月参军，曾参加过解放东北、华北、华中南的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1956年复员）：

孙永勤个子大，高。要当八路军，鞋都得定做，这么长的脚啊。他是黄狗转的，他显形都是大黄狗啊。不是凡人，迷信讲话。

他也是阶级高，也使着好几个伙计。

见过他（指孙永勤）。他是我表姨父，他一个劲来，大高的个子，那阵儿我十二三。我妈跟他媳妇是亲表姐表妹，他媳妇是我妈的表妹。

（孙永勤、雷永兰）两口子感情好，仨儿子，俩闺女，在她手里养活。

岳老亮，就是车河拔尖这个，是个财主，有个大顺兴〔大成兴〕买卖，给他抄了。

孙永香是寿王坟的，孙永勤是这儿的，都是老会长。

抓他（指孙永勤）不是，赶了没办法了，我非抄他小日本，就下这个决心了。他要是不赶

了他，他告他抄的，不革命不是。

把他赶了的，招人招人招人，先是二十来人，后来到千十来人。但不是一拨呀，这儿二百来人，那儿还一百来人，但都是他的领导。

他这仗都是游击战。你比如说，今天在车河，梆当了，把日本打死了，还兴打跑了，明个兴又到这边来了。到这儿碰着了，又扫崩一阵子，明儿又去那儿了。

老百姓那拥护，他打日本不是。日本进中国，老百姓都膈应不是，那咋不拥护。他到哪儿吃哪儿，没给养，都吃地主富农。贫农没粮食，他也不要。

日本那咋不厉害呀，日本子抓住人不是杀了就是剐了的。有孙永勤照顾着，咱们这北边好一点，没扎营。他拉一个连来，打了，日本子就撤了。老百姓拥护他。

你想想，地主富农都是有枪的人，绑去不是，让他们（指史耀华等军法处战士）给看着。绑去要枪，他的枪都是跟地主压出来的枪。他哪儿得枪啊，除了打死日本了，得点枪，地主富农都有点，就压。绑了去就揍。交了枪就放了你，不交，就生揍。他（指哥哥史耀华）就管监察，看守所不是。

小老道在毛山跟着孙永勤，毛山逃出来又往北去了。

闻成先生谈孙永勤和毛山战斗

讲 述 者：闻成（2005年时78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遵化镇大草店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闻成先生　2006年4月

闻成（1928年12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先在穆杖子高小当教员，后任教导主任、校长。1965年开始在大杖子区担任副区长，当时车河川、黑河川及滦河以东均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常下乡。1975年开始在孙杖子区任区长，1982年任兴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孙永勤是被逼造反。孙永勤为防土匪，买枪，湖北造，手枪很少。承德县警察局来收，孙永勤觉得不合理，好不容易用小米等买来。当时鹰手营子以东不属兴隆县管（属承德县），1935年才把黑河川、车河川划归兴隆县。

承德县警察署要收民间枪支，虽然命令很紧，他得下来收哇。像宽甸、关门岭、曹台子、梓木林这一带，枪并没被收走。

孙永勤队伍为啥要往南走呢？一个是这么多人在家乡吃饭有问题。整个队伍逐渐扩大，在黄花川几个村子养活不了，几顿饭、米都成问题。还得扩充军队，扩充武器弹药。也是上农村收缴武器，盒子枪、步枪，收了一部分。

队伍扩大以后，打车河口局子。据宽甸李志清说，承德县保安团马队六十四马从下板城出发，走毛牛梢、乌龙矶、车河口追过来。当时孙永勤在宽甸住宿，一二百人。把一个人抓去，有手枪，不交。赵四川鞭打，孙永勤看见，问为什么打老百姓，赵四川说他不交，孙永勤说拉倒吧。第二天下午，来自承德县下板城的保安团马队追过来了。从下板城到宽甸有多远？七十多华里。孙永勤就往南跑，他们就退到关门岭长城口内。赵四川说抓山，在四楼沟、五楼沟，据着长城迎敌，居高临下往下打，承德县保安团撤了。晚上住下，让李志清找黑豆。费尽心力，找了一斗，让喂马。住宽甸一晚上，据李志清说，不过四五十支枪，都是湖北造，老套皮。这次情况是准的，因我在宽甸住过、工作过，老百姓讲的。他虽然时间说得不一定准，但

情节就是这样。

孙永勤队伍里枪支很少，他也是靠收集民间原来伙会防土匪的枪支，逐渐增加的。孙永勤队伍从整个成长过程来讲，并没有跟官方作战，缴获官方武器多少这个记录。后来孙永勤扩大后，到兴隆南部离长城近一些的地方，一是离敌人远一点，保存自己力量，二是没办法，看样子，在口外就得到口里来。

孤山子海关税、警察署十几个人。李连贵把孤山子海关关长和翻译官掳走。两人骑马带枪在秋科峪口外没目的地往东走，好像逛山景。走到大佐、大厂到小石门，让李连贵得手了。小石门狭窄，李连贵十来个人把白马打死了，把两人带走了。孙永勤满以为跟日本人谈判，换武器，是错误的。冀东党委1935年欢迎农民抗日力量，同意他们过来，但也无能为力。孙永勤没有找着负责人。从他进长城以后到覆灭，近一个月，当时除蓟县、遵化外，都比较穷，应找魏春波、王平陆、李子光，他们几个是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不应找骆风庭。

河北保安团来是为打土匪，当时遵化匪患严重，不是针对孙永勤来的。当时保安团团部在鸡鸣村，在安乐庄打一仗，把马拐子土匪打了。遵化老百姓对保安团没有不好的反映。

（孙永勤）他们的队伍从东边还是南边过来，我老舅陈贵平、我大表兄在地里薅粳子，见着他们了。下午，他们从吴家沟往西转了，奔三里店了，后来又撅回来了。从吴家沟村西往三里店梁一走，岗哨遇阻。要不遇阻，放行，或冲过去，过三里店梁，顺沟走二里半地，就是傅家城了，有七百多户，很富。从傅家城北沟往北，很快一走，就是长城了。三里店梁过不去，在吴家沟住一宿吧。一是走一天了，太饿，二是孙永勤有病。找了一把大椅子，不少人抬着。军队也没有药，也没有医生。三是三里店前一里半地是鸡鸣村，保安团团部。晚上在吴家沟村住宿了，村干部现给找点小米，做的小米饭，鸡蛋汤，吃了一顿饭。夜间，在吴家沟住宿时，兴隆王宝石的关元有，孙永勤的重要副手，孙永勤马骑不了，让关元有骑，那人第二天在毛山牺牲了。孙永勤当晚住在张志跃家，关元有住在老关家，我姥家也住了两铺炕，像下港的何广永、东双城的马保德、西小寨的姓张的，住姥家西屋，睡了两个房子。住宿，导致最后失败。要是离开这儿的话，那不会是那个结局。

孙永勤队伍在遵化辗转近一个月，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军队的行踪被敌人掌握以后，日军那通信、交通条件，就是半夜知道你情形，照样也能调来军队。在吴家沟住宿，敌人紧急从古北口调一个连，从迁西，就是三屯营东北潵河桥，那儿有日本驻军，住着好几百日本兵，调一个连。潵河桥那一个连，从三屯营扑过来后，用汽车半夜运到房家峪，毛山的东麓。陡岭子、房家峪、强庄子、柴户场，那是潵河桥来的一个连。直接从南面进攻的，是从古北口来的。这个连从古北口到城东是夜间行的军，三个汽车可能是，就直接从靠山庄往北，从吴家沟村南、马山口嘴开到吴家沟村西去了。东边的日军和西边的联络得非常好。

孙永勤这支队伍毕竟是农民的军队，庄西头没有岗哨，睡大觉，西大庙有岗，没用。等到黎明，在吴家沟村西，古北口来的这一个连就冲进来了。敌人进来，鸣枪才跑。这就仓皇地抵抗，战士们都没做准备，没找到工事，顺着沟里，顺着庄往东撤。吴家沟，山村啊，往东撤。这时，孙永勤因为有病，不能跑，找人抬着。副司令姓关。这次撤退相当慌乱，缺乏指挥。在我姥家住的何广永、马保德就悄悄溜了，随便藏在哪儿。一看敌人追过来，就藏起来。敌人一走，就回家了。日军进吴家沟村，没有挨户搜查，就顺街筒子追。孙永勤队伍由于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事啊、阻击火力什么的都没有，所以没有秩序地顺街筒子往东走。过了小河，往东北就是毛山，抓山了。登山以后，再逃，机会就很少了。因为登梁后，头道、二道、三道山梁，你只能往后撤，敌人把你包围了，火力也很猛，这时候，你再逃没有退路了。他们抓山以后，后面敌人也就跟上去了。更重要的是，来自滦河桥的一个连的日军，火力很猛，有小炮。救国军登山以后，对地形也比较生疏，没有找到防身的、有利的工事，武器弹药不足，好多人没有枪，有枪的子弹不多。开始，虽然孙永勤有病，关元有等中层领导干部还是奋力抵抗，由于武器弹药不足，加上毛山是一道、二道、三道，越往北边越高，从一道往上撤，撤到第三道，就是往下退已经来不及了，敌人把你包围了。到第三道时，后面是山梁了，没有退路了。在敌众我寡、武器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救国军虽然奋力抵抗，还是大量牺牲了。在山上，孙永勤把一个日本人处决了，翻译官没杀，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孙永勤让李连贵、年焕兴走，这是他最后的决策，自己没走。李连贵、年焕兴过洪山口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毛山战斗结束前，才允许李连贵、年焕兴走的；另一种说法是李连贵、年焕兴没在吴家沟住宿，突围成功。

幸免于难的，极少数。像郝小辫这样的，最后安全回到郝家庄，奇迹了。日本人不是看你有枪才打、没枪不打，看见就打。

作为一个农民的军队，孙永勤底下有一个郝小辫，郝家庄的，后面梳一辫子，他说是东门、西门那一套。

郝小辫，梳着大辫子，手无缚鸡之力，还逃出去了。说，孙永勤不听我话，东门、西门的。

毛山战后，日本人下山，三人一组，很谨慎，发现屋子可疑，就进去搜捕。

滦河桥日军，汽车就在房家峪搁着，战后就撤了。

从古北口来的这一个连，在吴家沟庄西河套挖了十个坑。把从山上抓的俘虏，包括孤山子海关的翻译官，把十个俘虏一人一个坑活埋了。打一枪，才埋。突然有一个俘虏，胳膊绑着，腿没绑着不是，就往北跑了。跑得挺快，敌人没有开枪，就跑出去了。因吴家沟往北跑就是九虎岭，过九虎岭不很快就是长城嘛。我老舅陈贵平亲眼看埋了几个。他只管挖，不管埋。埋了七八个，日本翻译官就用日语向日军啪啪一说，他们怎么在孤山子海关工作，怎么被李连贵他



们抓来的。李连贵在孤山子抓他们的地点我都访问过。敌人一看是自己人，马上就给他一个手枪。这是我舅提供的，是比较准确的。翻译官回到承德县后，又回孤山子小石门报复来的。因枪、马都是在那儿丢失的。马让秋科峪的人给宰了分吃了。翻译官来找铜马镫、马鞍、马屉，一个老百姓挺老实，把马镫交给了他，挨了几下，后来调走了。

吴家沟村，在敌人走以后，村民因为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群众对抗日救国军很惋惜、缅怀，很少有人上山去打柴放牧。因山上尸体很多，有味，老百姓也不肯到山上砍柴放牧。

那时候，敌我力量还是悬殊。往南进没有路，没有人接洽。往唐山、迁西、蓟县都没有可能。千方百计搜集点武器，有的还是陈旧的老套皮呀，子弹也不多。整个队伍里，长短枪不超过四百支，很多人没有枪。很多人还没换上季呢，还穿棉衣服呢。你想都薅粳子了，粳子都长那么高了，粳子就是旱稻子。说明队伍里给养、武器供应，相当多的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整个情况，即使再返回兴隆，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敌人进吴家沟搜捕时，何广永、马保德早已离开吴家沟了。

日军在口外追得紧。到口内一个月，没武器，换不了季，每天为两顿饭奔波。三分之一人没武器，三分之二人有武器，没弹药。没法训练，也无军事人才，到最后就失败了。当地人对地理特别熟，早已各回各家了。何广永回到下港。马保德回到东双城，毛山战斗十天后，被城里警察局所抓，绑赴东双城枪决。何广永没在家待着，不然难逃一死。

逃出战场的，都隐姓埋名了。

赵四川，那是他的军师。有人传说是老道，他不是承德县当地人。

赤本，特务机关长，官不大，但权力特别大。

2005年1月

孙永勤当时患感冒（指在吴家沟时），作为总指挥来讲，有一种末日之感。

孙永勤等想用俘虏换武器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反倒引起日军的注意。

孙永勤队伍在毛山当地人地两生。

2006年4月

孙永勤抗战与“何梅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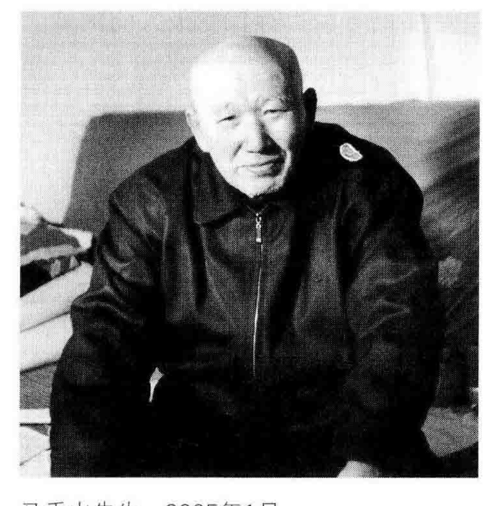
讲 述 者：马秀山（71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1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马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马秀山先生　2005年1月

马秀山（71虚岁，原中共遵化县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遵化县委党校副校长）：

我们遵化党史办1985年接受了唐山党史办专题任务。因是革命老区，事情多，给了78个专题。其中一个题目是《孙永勤抗战与“何梅协定”》。当时是老外，不是干这个事儿的，外行转到这儿负责。组织调动，给你这个任务，让你完成这个。“何梅协定”，我当时除了耳朵听说过有，别的情况一概不知。还有孙永勤这么个人呢？不知道。和“何梅协定”还有关系呢？更不知道。总之这个题得调查、研究、完成啊，当时人员少，力量薄弱，就决定自己担任这个题。

在这之前，原在党史办工作的李永春同志搞了何应钦与孙永勤专题，跑了很多地方，了解了不少情况。从他那里了解了一下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情况渐渐浮出水面，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多事呢，于是写了《试谈当年日军逼签所谓“何梅协定”的两个借口》。虽然不能百分之百自信，但是也觉得自己写的有道理，因为没有看到反驳我的意见。稿子送走后，唐山、河北省、中央党史研究室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县里搞出这样的稿子，非常难得。稿子后来被刊登在1988年3月《党史博采》上，是河北省刊物。

我认为“何梅协定”是不存在的，日军逼签这一所谓“协定”的两个借口也是不成立的，这是我的最终认识。两个模糊的借口，引出了一个模糊的协定。

保安队中下层军官对国民党上级是例行公事似的执行命令，上级指示他们“围剿”，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遵化，孙永勤与保安队、遵化县长所发生的冲突，或者说应发生的冲突，都没很明显地



发生起来，就没发觉到有互相激打的场面和过程。保安队追，孙永勤跑，也就是这个意思。究竟是追着跑，还是跑时追，情况都模糊、迷离，我感觉到。保安队朝孙永勤他们打了枪，有稀疏的枪，也有密集的枪，但孙永勤没有反击的枪，没看到介绍。

一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武装冲突，没打过，这是一个印象。这里面呢，何孝怡甭管多少，给孙永勤送过军需。孙永勤住西小寨期间，何孝怡给他送过军需，有皮鞋、大米、猪肉，这可见他们之间有联系。再有孙永勤在毛山被“剿”时，日军开始缩小包围圈，进攻孙永勤时，当时保安队在日军的后边，日军在前边，在日军压缩包围圈时，保安队就有人开了枪，实际上暗中给了孙永勤信号。怎么知道是信号，不是真打呀？别人介绍情况时这么说，在孙永勤部队中当过兵的人好像是也这么认为，可见保安队对孙永勤的态度。鸣了枪，孙永勤他们从山村群众家出来，进了山沟，这是一个迹象。再一个迹象，日军空军扫射，孙永勤被打死后，日军撤走，保安队清理战场，上山看到孙永勤部队死的战士，都受到感动。有的打伤了的战士，弄下来，抬下来，喂饭，安慰他们。有一个战士不吃，战区保安队劝他，吃吧，治好了伤，咱还打他日本王八蛋。就这样，不说掉泪，也至少眼含着热泪。说明什么问题？事小，但是说明问题。如果战区保安队的人十分仇视孙永勤，哪个战士敢说这话呀？而且战士敢说“打他日本王八蛋”，和他周围的、平常的气氛都有关系。你“文化大革命”时，谁敢说毛主席什么？它与大气候都有关系。我就觉着这里头有思索的地方，这算一个。可惜的是，没把介绍情况的人名记下来，反正都是当地上岁数的老百姓。老百姓说，保安队也同情他们，清理战场没有一点敌对的情绪，这是一个方面。再一方面，吴家沟村开始打之后，孙永勤要退。当时南面是保安队，东面有日本，后来日本过去了，走到保安队前边去了，孙永勤他们被包围了。实际上西边是空虚的，孙永勤他们不知道。不知道，也往哪边走来的。在山头上遇到了两个岗，让他们传话，借道。这两个东西说我们当不了家，孙永勤也没跟他们发生大冲突，就转回去别处了。等孙永勤被消灭后，有一个保安队里的相当于营级干部的人，与城里一个裁缝叫王子顺的，王给他们做过衣裳，认识，在饭馆里吃饭。提起这件事来，保安队的人说，孙永勤是个大笨蛋，西边给他留着，他也不知道，不往西走。往西走，就不会被消灭了。在饭馆里谈这事，这是王子顺介绍给我们的，这也引起我们的思索，又是一个小情节。另外当时的背景情况也引起我们的思索。战区保安队是《塘沽协定》以后划了一个非军事区，咱们这边成立战区保安队是负责战区治安的。不许正式军队进入非军事区，才成立战区保安队。它由两股势力构成，一股势力是于学忠的兵，其中的一部分组成到保安队里来了。还有一股是亲日的，起码是混蛋的人们，不是恨日，还跟日本有过交往的，这样一股势力也编到保安队来了。他们不是混编的，都是各编各的，都叫保安队，这么两股势力。在遵化这一带的，是于学忠手下的那些保安队的人。这就涉及到历史背景了，于学忠是张学良的部下，仇日心理是相当浓厚的，而且也有好些小的作为，

不少恨日仇日的行为，这样他传染部下战时也有仇日恨日心理。何况中国人受欺负，谁赞成啊？这些背景情况，使我们对前面的情况更深入思考了。加之自己是干这个的，利用机会，一个劲儿了解。李运昌来了，打听，问战区保安队的情况怎样，他说不大离儿，不错，不是那么反动的。后来“七·七事变”之后，把他们调到北京那边抗日，打得也不错呀，对他们印象也不错。还有一个政法大学副校长，原来在遵化活动来的，问他对战区保安队的感觉。他说在老百姓心目中，不那么难揍，不太难为老百姓。另外他那时在学校向学生宣传抗日，对战区保安队不大避讳。这都反映了战区保安队对抗日的态度，对抗日的态度就导致了对孙永勤的态度，这些都是有所联系的。

总之，感觉到战区保安队是例行公事，“追剿”来的。就是战区保安队如果被何应钦追究的话，也能够答复何应钦，说我们追来的，哪天哪天，由哪儿追到哪儿，完全能够交待过去。掉过头来，天知道。所以是迷离模糊的。

孙永勤去县城找何孝怡要东西，城楼上开枪，是朝天打，没有什么关于孙永勤士兵伤亡的报道，这都说明类似的问题。地方政府的态度跟地方保安队的态度往往有共同点，特殊情况下。

密令（指于学忠严禁河北省特警队向孙永勤部队开枪，否则格杀勿论）可能有，但是来源得找。那是从资料上得到的，不是访问得来的。搞这个过程中，看了一些资料，佟靖功、南开大学张宏祥教授、唐山党史办资料库提供了一些资料。

何应钦，我联想和推论的感觉，是属于无奈。他何必让保安队“剿”孙永勤？他没那路儿瘾。他多少是中国人，有点中国人味，不会泯灭真正的感情。但在《塘沽协定》之后，中日关系暂时缓解这节上，反正蒋介石表面上是中日关系缓解，日本心里也是明镜地关注着中国，是真好，还是假好，准备抗日打我们哪？蒋介石，当时他也不算汉奸啊，他不是汉奸，起码是愿意抗日，有所抗日。何应钦，我感觉那时受很多的窘迫，属于无奈的状态。你硬了，惹不起，引起中日关系的变化，对上面担不起。何应钦也是很为难，比较卑微，作为国家的国防部（马先生这里实际想说，何应钦作为国家负责华北地区军事的最高长官），在日本面前显得很卑微的。日本的这些官，跟他交涉的，拿他不当啥，连呲带横的，他也不时向蒋、汪，上级汇报。总之，感到何应钦属于软弱和无奈的位置。

何应钦也就算真心“剿灭”孙永勤了。你不“剿”，日本交涉上了，你答应中日友好，就得有所行动不是？日本告孙永勤往关内跑，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接济，鲍文樾答复：我们有能力自己独立“剿灭”，不用日军代劳，以防引起国人不安。实际上这话不够硬，尿话。非军事区线已划定，你凭啥过来呀？日军没有理由越过非军事区分界线“追剿”孙永勤。跑分界线这边来，那是侵犯主权的。不用你们代劳，我们自己办，不就承办了嘛。承办还不下令，得有所行动不是？实际上都是违心的。咱们都是站在某个角度，分析它有勉强性。另外日军如果认真追



究起来，何应钦、鲍文樾也可以对答：我们哪天由哪哪儿“追剿”来的。

（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攘外必先安内”，“七・七事变”后才比较积极地抗战的问题）得站在哪个角度说。从共产党、国民党之间矛盾的角度说，你放着日本不打，“剿”共，也说出理，也有事实。你掉过来，共产党不用他“剿”就没了，他当时也未必打得过日本。那时的实力，他等着国联来解决呢，打日本无力也是事实。

据有人介绍，吞吞吐吐地也没搞清楚，孙永勤在西小寨开会，商量结果，决定南投国民军，并且立即行动。已越过了非军事区，日军从南面把他们兜回来，正好保安队也赶来了。

“何梅协定”没有正式文本，谁拿出一个看看？现有的当不了正式文本，只有一个条。

日军宣传有“何梅协定”，是为在英美和世界其他国家面前表明自己不是横蛮无理，抢夺中国主权，是和中国领导人之间有协定。日本投降后，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咱们得告，算他一条侵占中国主权。日本就要反驳，拿出理据。在那儿，它拿出这个所谓“何梅协定”，没被国际法庭所认可。这算一个什么协定啊，给驳回了，中国成为胜诉国，日本侵占华北的罪行推脱不了。国际上不承认有“何梅协定”，就是日本他妈的不说理，侵略中国，类似这么一个结论。

这样一个结论，我就联想啊，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既然没根据，你何必，你还非得站在就是有“何梅协定”，就跟人家签“何梅协定”了这样一个立场，给日本一个把柄，这恐怕不是我们的初衷。而且那时候，蒋介石都不承认有“何梅协定”。一听说有“何梅协定”了，北京等国内的大学生游行啊，上南京找蒋介石去，不依不饶的，说丧权辱国、卖国协定什么的。无可奈何，蒋介石出来接见学生，说：绝对没有这样一个“何梅协定”，何将军只是给他们一个回信。蒋介石那时候便不承认有“何梅协定”，而且战后国际上也不承认，而现在你历史书上还那么写着呢，连字典上都查着这个那个的，也有的说，“这一条就是‘何梅协定’”。还“就是”啥的，我心里话，还“就是”，“就是”你为啥国际不生效？你惦记着让上国际上生效去呢？你要惦记着让上国际上生效，你就是他妈的民族的叛徒！让中国失败了？让日本有理了？况且要的确是合理合法的协定存在着，远东军事法庭上它也不能轻易否定不是？它就得承认有那么回事不是？那不日本胜诉？研究历史的时候，你得有基本的观点。所以我认为，起码说是没有典型的“何梅协定”存在。所谓那纸条，是“非典”，那是“非典”。

这稿子，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秀昕看过，说这方面的问题，您的文章很有价值，在史学界还在继续争论着呢。给介绍到河北省，李继准看后还写过一封信，说，使我们省里的都很受教育，县里的同志能搞出这样的来，从你的观点到水平都开了先河。后来，唐山市委党史办让我做了一次发言。

不要忘记孙永勤[1]

讲 述 者：陈振民

讲述时间：2005年4月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陈振民（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5月入党，原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机要参谋，离休前任唐山市标准件厂厂长）：

孙永勤是我的先辈，我来世方晚，没赶上，我抗战末期才参加革命。因为最近几年写《冀东革命战史》，我除西藏外，走遍全国搜集资料，在抗战史上才得知，孙永勤是我们整个冀东抗日打响的第一枪。1933年起义，这我知道，并且于1935年就光荣地献身了抗日和革命事业。我希望我们今天来祭奠先烈的学生和同志们，都能记住先烈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所创造的这个事业，千万不要忘记烈士们的鲜血，不要让它们白流。我们不忘先烈的事迹，发扬他们的精神，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大家共享幸福。

[1] 2005年清明节，编者到冀东烈士陵园拍摄军民祭奠英烈场面，在那里与陈振民先生偶然相遇。当他了解到，我们正在拍摄关于孙永勤的纪录片时，讲了上面一番话。



公公牺牲后孙家人的逃亡生涯

讲 述 者：郭瑞萍（69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4月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郭瑞萍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郭瑞萍（69虚岁，家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孙永勤的三儿媳）：

我听我婆婆说，我们公公要不死不了。让他们给诱骗去了，在遵化打了口袋仗了。上面受围攻，下面也受围攻，突围不出去，就牺牲了。挂花还指挥战斗，受夹攻，没有突围出来。

我婆婆说，去来着（指毛山战后，雷永兰到毛山之事）。都黑了吧，偷着去的，也不敢让人发现。去也找不着尸体啥的，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呗。

我们那大姑姐是前一个婆婆生的。我们公公死后，她更名改姓，不管逃到哪儿，不敢再说是姓孙的，孙永勤家的后代。要是敌人知道，就全家抄斩不是啊。她可能改名姓雷，我们婆婆家姓雷。她好像逃到过丰润那地方。到那地方租人家房子，给人锥帮，纳底子，给人家干活。大姑姐挺大了，有人想要，不给，恨不得抢了，婆婆就吓得雇马车，半夜三更带着她偷偷跑了。

婆婆她们后来还去过东北。老太太去那儿，气候特别冷，水土也不服。

原来房子卖了，卖给供销社了，我们后来又给买回来了。

仗打完以后，日本人去婆婆家找有什么后代，什么人，婆婆她们见他们来就钻山洞，孙杖子、河口这边不都是山洞嘛，往山里钻，跑。我们上班的不是梦生的嘛，她怕她老儿子的哭声引来什么不测，捂着他的嘴，甚至想掐死他，也是为保护安全不是。我听我们上班的说过："我从小，我妈就险点把我掐死。"我听我们婆婆也说过："怕他哭，日本'扫荡'听见了了不得呀，小孩一哭，孙杖子都姓孙，连别的都吃挂落儿，都得死了呀。"几次把他扔山洞外边，差点死了，让侄媳妇给捡去，侄媳妇给吃东西养大。我们上班的一回去，总给侄媳妇砍两挑子柴禾挑去。到她家，还给挑两挑子水。"哎呦，侄媳妇中了，吃侄媳妇奶长大的，我总也忘不了啊。"

我们回家的时候，看到灵牌（指孙永勤灵牌）在柜子一角，总是在那儿供奉着。

婆婆是打完仗之后，夜里去的毛山，白天不敢。骑毛驴去的，在山脚下哀悼一会儿，就回来了。

年焕兴总查访他们家（指孙永勤家）的人，等查访到的时候，就得病死了。

孙文顺和我1961年结婚。

回家看到婆婆，山坡子地里长着大老窝瓜，玉黍拿碾子轧了，吃这种窝瓜粥，有时还吃不上，觉得不应受这种待遇。

见雷永兰经常胃痛，肚子经常馒头似的起包。

烈士证明办好后，一月给雷永兰三十块钱生活费。

当然我们公公在婆婆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了。她经常赞扬他多么勇敢，了不起，脾气说一不二。遇到抗战救国的事，她特别尊重公公的意见。

1972年总回家，1973年以后，就总走访办理（指办理烈士证明），觉得婆婆不应总过这种生活。带着婆婆绕着滦河川，滦河在中间，两边都是高高的山。我们背着婆婆，一走一滑的。走羊肠小道，羊走的路，过摩天岭，特别高的山。上上下下，左一个山，右一个岭的，才能到下板城坐车。不论到哪儿，到兴隆、承德，都得到下板城坐车。

背着婆婆到承德办烈士证明。承德烈士纪念馆张环、张书德带着到民政局，民政局让回来等。1980年还是1981年2月，让办理烈士手续。烈士承认了，但没见到证明。以后每月给30块钱。

我们婆婆是一个很刚毅坚强的人。不像一般女人一样，都是很柔弱的。什么事都能克服，泰山压顶不弯腰似的这么一个人。

最后一次从兴隆回来，孙文顺就病了。住院，一二年就死了。以后和兴隆再无联系。

孙文顺说，小时特别苦。那时候说命硬似的，雷永兰怀着他时，就把孙永勤方死了，生下来就很受气。（部分内容略）孙文顺也是挺执着的一个人，从我跟他接触，就发现他是挺正直、挺要强的人。生活中，不管怎么艰难困苦，自己做出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奔成天天向上似的，不是依赖家庭和别人。从小就好像，一到十三四，劳动各个方面，就都由他来创造。比如说吃饭，一年到头吃饭，都是他早起到山上打柴禾。回来后还得轧碾。轧完，做中午饭，喂猪，下午再去打柴。他幼小的年龄，十三四，一天再付出多大的力气，也不能扛一座山、背一座山来吧。他一次能背多少，顶多一百斤。到夏天的时候，下午还要下地薅苗、锄地。结婚后，他曾经说："瑞萍，从我记事，会走，过年时候，就没和家人吃过一顿年饭。"一到吃饭的时候，杀猪了，老姑娘在河口这儿，大姑娘可能在羊茬子这儿，就派他给这两个姐姐去送东西。年饭，回来时，有时跟我哭着说："都快冻成冰碴了。"他们那地区特别冷，尤其是到冬天，见太阳的时候特别晚，起码得十点、十一点，太阳落山时也特别早。

（部分内容略）

后来结婚后给他做棉鞋，他说："瑞萍，我过去从来没享受过这种温暖。过去打柴禾什么的，冬天上山，别说棉鞋，夹鞋我都穿不上。竹帮挂底的，大搓板上山，就想办法找草、榆树条，不绵软嘛，把鞋捆上。"自己说着就哭了。他这样说，我都不相信，说不可能吧。那回回



老家，咱们一进门，你（指孙团营）老姑也在那儿，说："哎呦，可了不得了，我老弟弟回来了，真没咋着的。侄子也这么大了。不是在家受气呀，总也吃两样饭，干活都是文顺干哪。"还没坐下，就说做裤衩的事。（略）

孙文顺埋怨过。结果有一天，雷永兰说："文顺你，你要是看不到家里烟囱冒烟，你就活不了。"一赌气，十四岁就出去了，到鹰手营子当工人。

我们老孙特别孝顺他妈。生孙团营时，家里写信，就去了。（部分内容略）给他妈洗脚，洗裹脚布，洗衣服，拿虱子。一到过年就脑袋疼，有病。原因就是想家，想他妈。也想过一团圆年似的，但达不到愿望。

我是迁西的，上学时在宽甸。孙文顺也在那儿上过学，但没说过话。后来孙文顺当兵探家，一侄子的爸爸，孙中国爸爸孙文治，因发水，妻子淹死，孩子没妈，招赘到我姥家所在村子北峪子村。孙文顺到北峪子去看他，提起有这么一个同学。侄子孙中国说，我还管她叫老姑呢。孙文顺转业后，从那里过，我们俩人见面。父母都不愿意给，主要原因是到孙杖子路太不好走，但我爸对孙永勤非常赞扬，说他家庭挺好，但路远不想给。我妈拿烧火棍捣灶："你走吧，走吧，不想给你。"孙文顺都是笑脸走了。结婚后，他对我父母很好，老两口都是死在唐山。我父脑瘤，1969年去世。我母亲地震时砸死。他特别敬重我爸妈，对他们特别好，既敬重，又孝顺。实际上，结婚后，我父母对他也很好，觉得他从小没见过爹。

去承德办烈士证明，还有老外甥赵连生。

文顺劳累过度兼冤枉委屈，死了，胰腺炎。实际上他是一个刚强耿直的人。

老孙是一厚道耿直之人，回村特受欢迎，东家请，西家请。

文顺不想回家。觉得小时候都瞧不起他，说他没出息，在家里都拿他那什么，后来经我劝才回家。婆婆后半生比较幸福，不受歧视，过上了正常生活。

生活条件不好，粮食不够吃，婆婆那时有病没人管。大儿子身体不好，丧失劳动力。尽管这样，老大也下地劳动去，一点一点地。

怀念爷爷孙永勤

讲 述 者：孙团营（42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4月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孙团营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团营（42虚岁，家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孙永勤三子孙文顺的长子）：

我奶奶、大爷跟我说过，我爷爷那时把大地主的枪收了，怕落入日本人手中。本身军需缺乏，也需要枪。把他外甥吊起来，军长、参谋长围坐在桌子旁，桌上有菜和鱼。那时滦河自然条件好，鱼都这么大。把人吊起来，问交不交枪？说不交。为啥不交呀？说打猎用。那时，山林里野猪野兔比较多。我爷说，那也得交，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就不交！我爷脾气不好，就要枪毙嘛。最后没法了，才交枪。就是他亲外甥，都不留情面。

起义原因：收税，把税关署长打到滦河里了。

他家是个大财主。据我奶奶说，当时钱都用斗量，后来把家产都卖了，买军火了。按他的能力，生活肯定比普通百姓过得要好，即使受压迫，也比他们要强一些。但他就是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意看着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他起来就是想反对侵略者。那家里肯定不干啊，谁都想过安稳日子，有点啥事谁不愿意躲？再说，肯定枪林弹雨，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我大爷讲，我太奶，就是他妈，一看他，生气呀，也没法。我爷爷带队打仗回来，问，老太太吃了吗？没吃。没吃他肯定不高兴。他是很孝顺那种人，大孝子，就想，老太太不高兴了，又为我担心了。就也不吃，就撅个大嘴，说等下回回来。下回回来，送过去了，问，吃了吗？吃了。我爷爷也就端起大碗，扑噜扑噜吃了，特别高兴。因为他妈吃了，他没有负担了。有时甚至是，我端着碗上你跟前吃，扑噜扑噜地，把他妈逗乐了。他是既爱国，又爱家。

大概有一百多兵保护我奶奶。

从我奶奶个人来讲，肯定是不愿意我爷爷起义，担心他生命安全。你说，枪林弹雨，日本人那么强大，从实力上来讲，作为老百姓，她肯定有这种担心。从夫妻感情，她肯定不愿意他去。但当时那种环境，日本人都逼到家门口了，你方圆几十里之外都是日本人的天下，不起义也没啥好处，只有等死。为啥起义，不就是不交枪不交粮吗，交枪不就任人宰割了嘛。拉家带口，有儿有女的，夫妻感情再好，她愿意他走？肯定是不愿意。我爷爷脾气肯定不好，他还是



得顾全大局。

我奶奶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以至于她一生就守着那灵牌过。在一个紫色的板柜上摆着，在当时陈设中占着突出的位置。那灵牌烟熏火燎的，上面写着：孙永勤之灵位。从成色上看，至少有二十年以上历史了。我那时才十几岁，爷爷已经牺牲三十多年了。给我的印象，我奶奶内心特别敬重我爷爷，特别怀念我爷爷。

据我奶奶、大爷讲，爷爷几乎没打过败仗。兵书战册，反正那书，我爷爷都拿着。有的拿着，有的驴驮着。

那边的山区，日本鬼子为啥进不去？就是靠地理，他们又是当地人，这样日本鬼子吃了不少亏。抄了几次，抄不了，日本鬼子伤亡不小，他的队伍才发展到这么大。要是不出关，肯定没问题，因为地理环境、其他问题都对他有利。一出关以后，就属于离开自己的根据地了。实际上，他手下的参谋长、军师什么的，都不愿意他出关。我奶奶、大爷都不愿意他去。我大爷那时都十几岁了，据他和我描述，那时候开会研究，好像是就地打游击，化整为零。他考虑到军队各方面困难，那边说给武器弹药，还是决定出关。一出关，一过长城，整个地势都不一样，不就全军暴露了嘛。如果说就地化整为零，咱们克服一下子，不说遣散，斗争肯定是要坚持的，也许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就是思想上有些接受不了，这么多人，抱着团来的，一遣散，士气受影响。他本身是个好强的人。

据我奶奶说："你爷爷那时去张家口挂对"，我奶奶那时年纪已经很大了，挺能讲的，哒哒哒，"一去多长时间不回家。去好几个月，再把队伍带回来。也不管我们，上张家口。"

看到将士们成群地倒下，听人说，我爷爷落泪了。他心疼他那些弟兄们、将士们啊。我爷爷是挺讲义气的人物。据说，他本来可以活着出来，但他还是命令他人突围，他自己做掩护。因为他目标太大，日本人消灭的是孙永勤，不是他的部下，能够多突出去一个是一个。他最后还是舍生取义，精忠报国。

据我奶奶、大爷讲，他不怕日本鬼子，不怕小日本。说中国大，日本小，他多强也没咱们大、咱们强、咱们人多。他到咱们家门口打，他怎么也打不过咱们。

据说日本为了劝降他，委任他讨伐大队长。他肯定不接受，不愿为日本人卖命啊。把热河省给他，我爷爷说："我们的领土，我用你给我！你给我滚出去就中了，从中国滚出去就中了。"可见他的爱国思想是很强烈的。

部队走起来，头尾相距十几里。部队好像还有少量水军。

小时候回老家，奶奶就把我带到爷爷灵牌前，给我描述爷爷，第一印象就是，个子挺高，白马双枪，长袍礼帽，就是这种形象。柜子上始终有牌子，我奶奶就拿这块牌子给我讲述我爷爷的经历。

奶奶是我内心挺敬重的一个人。从爷爷没了以后，我奶奶始终守着灵牌，一直没改嫁，拉扯着我大爷、姑姑、我爸那一帮儿女过来的。我爷爷牺牲后，又逃荒又避难，隐姓埋名的。

她内心对爷爷特别好，有那种尊敬和崇敬的感情，我特别敬重我奶奶。我爷爷为国，为反对外来侵略抛头颅，可是我奶奶同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爷爷牺牲时，我奶奶当时才三十多岁。

你不让他去也不中。早晨起来，我奶奶紧紧搂着他，目的就是想挽留他，把衣服给藏了，参谋长来找了，我爷爷想尽一切办法，该出征出征，该打仗打仗。

奶奶说："你爷爷那么厉害，率领千军万马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见他就跑，他跟我使不出去。早上睡觉的时候，我把他衣裳给藏了，他围着被子在炕角：'老婆，媳妇媳妇，快给我衣裳吧，给我衣裳吧。'那么威风，他也得跟我说好话。"实际上奶奶说时，有一种历史的感情在里头。

比赛装枪。奶奶、大爷曾说过，他们挺好的朋友，哥几个在屋里把枪拆了，用手绢包上，比装枪速度。赶出门，枪就响了。爷爷装枪速度最快，枪法也是爷爷最准。

起义的一个原因：他看书或听说日本人侵占朝鲜后，那时叫高丽国，让朝鲜人跪马下，日本人踩着上马，我爷当听到这儿的时候，就流泪了。说日本人已到了咱们眼皮底下了，咱们要当亡国奴的话，肯定也是这种下场。再看到日本人对百姓的做法，于是决定起义。

以后我问奶奶："爷爷是死是活你怎么知道的？"奶奶说："那么多人，飞机大炮打好几天几夜，还活得了？"我奶奶认为，用现在话来讲，死活都是正常的。她没显出悲痛，虽然内心肯定是痛苦的。大队都打没了，他还活得了？他是头儿不是。要是说活着，不管怎么说，有勤务兵，得跟她报信不是？没报信的，她心里明镜似地知道我爷爷牺牲了。

小时候听岁数大的人说，在毛山那儿打，飞机的嗡嗡声隔着几十里地都听见了。山区里回声大不是。那么大的兵力围攻他，九死一生，奶奶应该有思想准备。

爷爷家在当地是比较富裕的大户。起义后，把家产都卖了，买军火了。那么多人得有枪弹不是。

雇过长工，"文革"时因为这个挨整。

先那个奶奶留下一个大姑，大概五十多岁病死，扎针扎死的。后代叫赵显刚、赵显朝。

大爷孙文伶、二大爷孙文孝、父亲孙文顺，好像还有一个老四，出天花死了。

奶奶的老家是聚宝盆。解放后，李运昌接她去，她说过："我住妈家去了，聚宝盆。李运昌留下话，说有事上北京找我去。"始终没去。

我很敬仰我爷爷这种民族气节。任何外来侵略都要反抗，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现在也应该有。我当然敬仰我爷爷，虽然死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光荣。那种浩气，那种精神，小时候回老家，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种场面，真是热血沸腾，我现在也被那种精神所感染。过去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确实应该如此。你国家不存在了，你家还存在了？你不起来反抗，肯定不



中。让人打死，不如拼死。我也是这看法，死得有价值。至少在当时抗日战争时期起到唤醒国人的作用。日本人不是不可以打，他有啥了不起的？爷爷不也照样跟他们打了一年半吗？那就看人的骨气。要是没有骨气，没有精神，那就是一个懦弱的人，懦弱的民族。我对我爷爷相当敬佩，他为国家、为民族尽力了。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当亡国奴，宁死不屈。

二十几年前，岁数大的人，一说孙永勤，没有不知道的。“一条好汉，天不怕地不怕，专打小日本，专打汉奸，专打坏人。”那时候坐车，一听说你是孙永勤的孙子，那，“你爷爷活着可了不得！”

说起有二十年了，那时候，我坐车回家，岁数大的人都知道我爷爷，说：“你爷爷了不得，胆子大着呢，天不怕，地不怕。小日本鬼子恨不得让他追着直跑。”反正他胆子特别大。他不怕小日本，他逮住的，肯定枪毙，一个不留。该杀的杀，该剐的剐了，他也不怕报复。你净说他脾气不好，他有那种精神。他不是说，我怕杀一个，胡乱报复怎么着，逮住就杀了。回老家时，对他有印象的岁数大的人都说：“你爷爷了不得，逮住日本人，说跟他交换，把热河省给他，他都不换。该枪毙枪毙，该杀杀了。”据说有一个日本军官，逮住后，跟我爷爷谈条件。我爷爷恨日本人，据说把日本人穿上条子，拴在马后边，把日本人生生拖死的。这个传说现在也有。他恨日本人，你说中国老百姓他们说杀就杀，说剐就剐，跟碾蚂蚁一样，他不恨他们？他不光胆子大，他有一种恨在里面。

他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我死都不怕，我怕啥呀，所以汤玉麟那么多人跑了，他几百个人敢跟鬼子干。

起义原因的另外说法：日本不是收税吗，收粮食。他们找当地有威望的大户去负责收。我爷爷他关系特别好，又挺有怜悯之心，底下老百姓一说，粮食还不够吃呢，我爷爷说，那就免了吧。日本人跟他要，他肯定没有，说老百姓还吃不起饭呢，我上哪儿给你交去。说翻了，他家离滦河不是近嘛，掏枪就把日本人打滦河里去了。关税长。我大爷跟我说：“你爷爷就这脾气！”这么着，日本人抓他，因为这起义。二指宽的纸条，写了六七个，送出去了。联络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个乡的民团团长，那个乡的民团团长。又交粮食又交枪，肯定不交，就起义吧。你交了枪，肯定受人奴役。让你趴马底下，人家蹬上去，那不任人宰割了吗？

我老舅他们庄大地主叫董大天，我爷爷上他们庄抄过枪。那董大天大地主，还有龙井关、北峪子、二堂、栗树湾子的大地主，哪家没抄过呀，枪都给抄走了。十几年前，我上老舅家串门去玩，那时候董大天还活着呢，那裤子都耷拉着。“那大地主，你爷爷当年抄过他呀，到那儿就把枪抄走了啊，还得管吃管住。”不抄枪，军火怎么来呀，他就抄大地主大土豪呗。

现在我舅姥爷还活着呢，我妈的舅舅，亲眼看见过我爷爷率部向日本鬼子开火。迁西龙井关、喜峰口关口属于兵家必争之地。

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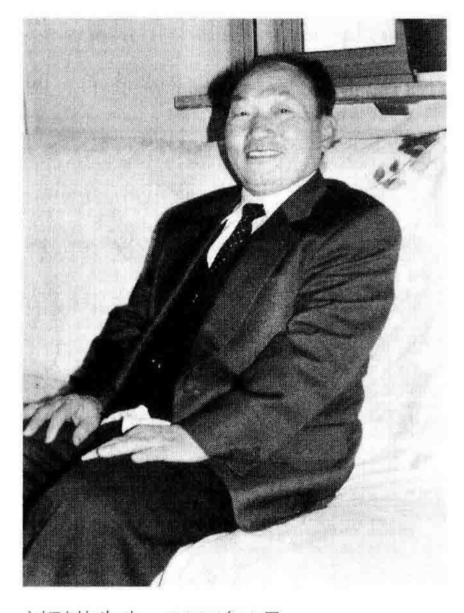
讲 述 者：刘刚范（71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4月、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社科院刘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刘刚范先生　2005年4月

刘刚范（又名公孙訇，71虚岁，原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现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

1971年到1983年，我在承德师专政史系教书。1983年的春天，李运昌号召要搞一个孙永勤调查，出一篇像样的文章，肯定孙永勤是民族英雄，因为《八一宣言》里写了他的名字。当时实际负责此事的是承德地委宣传部和地委党史办。宣传部孟副部长亲自来学校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学校很支持，派我去了。我先到兴隆县城，后到孙杖子。去孙杖子路上非常艰难，坐大卡车，刚下完雨，险些发生事故。我用一周的时间在孙杖子周围进行了调查，孙永勤的妻子雷永兰和他的儿子们都见到了，还接触了一些活着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战士。孙杖子的人们对孙永勤、对他那几句话都还记得，那几句话是"敌不死，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包括亲属、战士在内，当时总共接触了大概十几个人。对孙永勤的事迹了解得比较多以后，觉得还应有敌伪资料，就向地委党史办作了汇报。党史办的人告诉我，热河敌伪的材料都在辽宁省图书馆，因为日本人撤退的时候，把承德的资料都拉走了，准备在大连装船，被截住了，全转到了辽宁省图书馆。我便去了沈阳，到那里以后，所有的敌伪材料都是辽宁省图书馆提供的。从开始调查到查阅完敌伪档案，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正反两方面的材料都有了，我便开始写作关于孙永勤的文章。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了《孙永勤与民众抗日救国军》。

（刘刚范先生谈孙永勤事迹部分略，详细内容可参见他写作的《孙永勤与民众抗日救国军》一文，作者署名为"公孙訇"）



我个人对孙永勤的看法，他是一个领袖人物，在孙杖子，在整个热南地区威望非常高。我对孙永勤非常崇拜，他在我头脑中位置很高，是一个很高大的英雄形象。

孙永勤的部队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绝不是一盘散沙。孙永勤多次强调不投降、不贪财、不贪色，他的部队有军法处，专门管军法，是一支很正规的部队。

孙永勤和东北义勇军有联系，孙永勤很愿意和东北义勇军联合起来抗日，但义勇军失败了，所以后来只能自己单独抗日。当听到喜峰口抗战的消息时，他提出只有抵抗，才有出路，说明他有一定的素质。所以孙永勤绝不是一般的农民，他有智慧，有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视死如归，他具有英雄的品质。他的名字能在《八一宣言》上出现，中国共产党把他视为民族英雄，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代学习的。

知道孙永勤事迹的人不多，主要还是宣传不够。从我参与调查那时候起到现在，河北省对孙永勤的宣传上，基本上还是那几篇文章。实际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很好地把孙永勤和他的部队全面地、深入地宣传一次，让青少年知道河北省第一个扛起抗日大旗的是孙永勤这个民族英雄，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人说他不是党员，是财主，参与了剥削，我觉得这有些牵强。周总理什么家庭出身？我们党许多领导人什么家庭出身？他们很多都出身于剥削家庭，但他们最后背叛了这个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对孙永勤为什么不能这样看待呢？孙永勤曾经是富户，但调查中并未发现他欺负过穷人，群众对他评价很好。日本侵略中国后，他积极地行动起来，最先打起抗日的旗帜，消灭了那么多的日满军队，河北省的抗日英雄谁能比得上他对日作战英勇？杀了那么多的敌人？我认为孙永勤不仅是河北省，甚至是全国的抗日大英雄。他的部队起来得最早，杀敌最勇敢，给敌人的打击最有力，敌人害怕他，不是还给他还起了个外号叫‘山耗子’吗？不是文艺作品要塑造民族英雄，孙永勤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不用你塑，只要把他的英雄事迹搜集起来、传播下去就行了。这个工作本来应该是史学工作者、党的宣传工作者义不容辞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做到。不能忘记这样的人，但实际上我们忘了。在这点上，我很敬佩李运昌，李运昌对孙永勤很重视，建议热河省要下力量搞，他不是下命令，是“请”。

孙永勤是我们党，也是我们中国人民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率领几千人的队伍，最先打起抗日旗帜，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让帝国主义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国家应该对得住人家，这是几千人的大队伍，不是一小股的抗日武装。

通过进一步的宣传，继承孙永勤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回忆父亲于学忠

讲 述 者：于允贤（69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于允贤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于允贤（69虚岁，于学忠四女儿，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工厂高级工程师）：

我是1937年7月2日出生在北京的，7月7日“七·七事变”，后来我们家就搬到重庆。由于当时小，对通县起义这件事肯定是没有记忆，有记忆都是在我年龄大一些以后。那时在重庆有办事处，办事处里来来往往总有从前方回来的副官。他们讲，因为通州起义是个挺大的事，张庆余、张砚田把在通县的日本鬼子整个给抄了，那个事情对日本人的震动挺大的，而且后来他们又带兵找五十一军，接着投入战斗，对这个事情，副官他们都挺佩服。那个时候，在前方他们都把我父亲叫老板，为什么呢？从前方打电报、带信什么的，你就不能写总司令或司令什么的，代替的名词就是老板。他们就说，老板吧，在事先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了，考虑得挺远的。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老板他在华北时就想到了华北那块地方不能让日本人，不能让真正的汉奸给占领了。所以趁着殷汝耕要组织保安队，那时候殷汝耕还没有公开地成为汉奸，还受中央政府的指使的时候，要组织保安队，我父亲就想了，他说，不能让他们控制保安队，结果他就从他五十一军里选人。选人，起码得选河北人，因为这是他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会更加地爱，所以当时就选了五十一军的两个正规的团长。这两个团长都是河北人，就让他们到殷汝耕那儿埋伏下来。听他们讲，当时我父亲想得挺多，又不能真把五十一军的士兵都调拨过去，当时五十一军这些人好多都是从东北过来的，我父亲是山东人，从山东来参军的也有很多。他们说，我父亲讲的，我把武装，也就是枪支弹药、编制都给你弄好，可是下边的人自己去招。这样就等于是扩大了，招的都是河北人，就这两个团。我父亲派人给他们进行正规训练，支持了通信设备，派五十一军管通信的人去教他们怎么使用啊，而且还给他们说了，这个事情要保密，谁都不许说。就是五十一军的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只知道这两个人走了，连他们的家属都不知道。当时就是保家卫国嘛，为国家忍辱负重，这两个人真的是忍辱负重。这两个人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从来没有。一直到后来，听他们前方回来的人说，到“七·七事变”打响了之后，我父亲从前方派人告诉他们，现在是你们该回归的时候了，这两个才在通县起

义。其实要说起义并不准确，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汉奸部队。两个人带领部队把通县的日本兵，日军的机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全给抄了杀了，然后他们带领这支部队又投奔了抗日前线。他们那些副官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后来通县的事情出了，他们又回到五十一军以后，这些副官就说，老板原来早就埋伏了这样一支军队。当时谁也没想到，都以为这俩人怎么那么没骨头，宁愿离开抗日队伍，给殷汝耕当黑狗子，五十一军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他们真的是抗日部队。通县的事情，我就知道这么一点，都是在重庆的时候，听从前方陆续回来的那些副官们讲的。后来，全国解放以后，不知道住在通县的是张庆余还是张砚田，搞不清是他们哪一家，在三年困难时期，知道我们家人多，还给送来了一麻袋芝麻叶子。当时以菜代粮嘛，和着玉米面蒸窝头，特别香。我父亲那时候特高兴，就说："不管怎么说，他们没忘了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鸡蛋太珍贵了，还送了几个鸡蛋给我们家。感觉得出他们之间的感情超出了上下级，真的是生死与共的那种感情。

在河北的时候，一是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是日本人收买、暗杀我父亲。

要说抗日，我父亲从小就对日寇非常憎恨。我祖父曾经在满清的老毅军当兵，毅军那时驻扎在旅顺，我父亲是在旅顺出生的，在那里一直长到五岁（虚岁）。甲午战争爆发后，祖父跟随毅军的统率宋庆和日本人打仗去了，留下祖母、父亲在家。听到日本人要进攻旅顺的消息，祖母、父亲回老家避难。战争结束后，从蓬莱又回到旅顺。父亲当时的家就在旅顺万人坑的边上。那坑里埋着一万八千多中国人的尸体，都是被日军杀害的普通百姓。这让父亲从小就对日本人的暴虐凶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给我们讲起当时的事，那时我们还小，我是1937年7月2日在北京出生的，7月7日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他说："你想，日本人跑到中国来打仗，把中国的无辜百姓给杀了那么多，旅顺的中国人差不多都给杀光了，总共才活了三十几个人，一个国家要不强盛，这国家的人民真的很倒霉。"而且日本人不是说在甲午战争、抗战的时候才侵略中国，我们的家在山东沿海，查历史，明末倭寇就在海上对中国的渔船进行拦截抢劫，所以要说中日之间的关系，其实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已经很长了。由于这些原因，我父亲对日本人很有看法。他自己后来当了兵，他老说他是蓬莱人。因为蓬莱出了个戚继光，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非常勇敢。父亲最佩服的就是他。

从"九・一八"日寇占领东三省，整个东北军转移到华北以后，当时已是没有根据地的部队了。他到华北以后，一开始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主要在北平。那时候河北省的省政府是在天津。东北沦陷了，日寇进一步蚕食的目标就是华北了。日寇开始逐步向华北扩张，因为天津所处的位置太重要了，日本人就经常在天津不断地制造骚乱，不断地制造麻烦。当时的河北省主席是王树常，王树常本人也是抗日的，但与我父亲比较，他的性格软弱一些，我父亲这个人可能更硬一些。王树常那时候有一些困难，张学良后来提出，让河北省主席和平津卫戍司

令对调。就找我父亲，问我父亲愿意不愿意。那时都管张先生叫副司令嘛，我父亲是个军人，他说："只要是副司令说，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然后他就到河北省去赴任，当省主席。当时东北丢了，老百姓对整个内幕不清楚，对张学良的意见特别大，再加上张学良当时身体也不太好，就出国了。出国之前，东北军当时有26万多人吧，他就把17万军队交到我父亲手里了。当时很多人都说，他是山东人，你把东北军大权交到于学忠的手里，那你将来回来以后，这些部队还能属于你管吗？张学良就说，你们都不知道，我交到谁手里，都没有交到他手里放心。你们放心，我只要回来，这支部队绝对会原封不动地回到我手里。我父亲就一直替他管着这17万人。因为他手里掌握了17万的兵权，那在当时来说，除了中央军，就是最多的一个部队了，日本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起初，对他进行了好多的拉拢，给他许愿。这些情况家里人都知道，像我妈妈就说起过，我爸每次回来吃饭时，就在饭桌边说："小日本太不开眼，能拿钱买了我于学忠，他们太小看人了。"以后钱不行了，就用权。当时，实际上许诺过我父亲，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投靠了日本，你就像溥仪在"满洲国"一样，就是说在华北你跟他一样地位。下面的人们说，许我父亲为华北王，而我父亲表示，钱、权，我从来就没有把它们看得那么重，这块地方是中国的地方，我是封疆大吏，我就守土有责，我就得守住这个地方。其实在"九·一八"的时候，他说，我就主张抗战，当时因为各方面条件，不是我说了算。现在这块地方，我是河北省主席，我就得说了算。所以他在河北的时候，跟日本人真的完全针锋相对。日本人在用钱、权买不通以后，怎么办呢？就暗杀吧。他们曾经暗杀过我父亲好多次。那时家里特别紧张。当时河北省政府在金钢桥，我母亲说，在河北的时候，省政府在金钢桥的那边，我们家在二马路，是在金钢桥的这边，每天我父亲都要通过这座桥，而且我父亲上班特别准时，每天八点一定到，差五分八点通过金钢桥。他们想暗杀，肯定要摸规律的，摸得特别清楚了，他们就定了个暗杀日期。十几个人在金钢桥二马路一带埋伏下来，都是日本人买通的汉奸，就在那儿等着。那时候，马路边都有小摊儿，卖早点，他们就坐在早点摊上。听我母亲说，当时好像是以举帽子为号，他总有带头的吧，我父亲的车过的时候，他一举帽子，每个人身上都揣了好几个手榴弹，他们十几个人的手榴弹就一块扔过去，还有枪，当时是志在必得。要说我父亲在那时候很有福气，是个福将。就在那天早晨，很奇怪，他就是在家待不住了。吃完早饭，七点半，他说："我今天老觉得有什么事，我得早走。"家里人都劝他说，那么早去省政府，人家都没上班呢，你去早了，人家都没到，会觉得很不自在。你要是七点半去，所有人以后都得七点半去，你别去那么早。我父亲说，平常我不去那么早，今天我就得早去。我不知道有什么事，那儿肯定有事等着我。提前半小时，七点半，当时好像是两辆车，听家里人说是两辆，一个是他的车，一个是卫队的车。有时候他的车在前面，卫队的车在后边，有时候卫队的车在前面，他的在后面，反正两辆的前后顺序常调换，但是车牌谁都认识。那天我父亲提



前七点半就走了。出了二马路，一过金钢桥，那个头儿正在吃早点，他根本没想到我父亲会早出发，他一看有那车牌的车过去了以后，赶紧站起来举帽子，赶紧扔手榴弹，但车早已经过去了。当时也有人扔过去了手榴弹，也有人看车过去了没扔。这一扔手榴弹，他不是有卫队嘛，卫队的人就下来，把这些人抓住了。一审，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知道有十几个人。如果十几颗、二十几颗手榴弹都砸向那个车，那估计就没什么希望了，可那天偏偏不是这样。后来抗战的时候，我父亲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反正比较福气吧。除了这个之外，买通他身边的人，给他下药啊、怎么怎么电死他呀，反正日本人出了很多招儿，而且花了很多钱。因为我父亲对下边的人比较好，他们有很多自首的。拿了钱后，告诉我父亲说，我是想骗日本人的钱。你不是给我钱吗？我们就拿了钱，然后告诉司令。好多次，可能书上写的是两三次，其实不止两三次，好像多次暗杀。钱、权、暗杀，各种手段都使尽了。

他一直教育我们要忠孝节义，就是对国家、对民族你必须要忠诚。我父亲对我的祖父母非常非常孝顺。生活上，我祖母是山东蓬莱人，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没什么好吃的，就是已发臭的小鱼小虾，别人剩下的那种，都做成虾酱，我祖母就吃那个长大，所以那个虾酱是离不开的。我们后来到重庆，那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我父亲到处给我祖母找虾酱。还有，我祖父母都是山东人，吃面食。在重庆的时候，家里全吃米，因为四川就是米。那面呢，除了馒头，别的就没的好吃。这面条，那时候不像现在到处是切面，那时候没有。我父亲就自己到乡下，请人做简单的压面机，压饸饹什么的。把面放里面一压，底下就出面条，可以做给我祖父母吃。就是说对我祖父母是非常孝顺。他对国家忠诚，对父母亲孝顺，而且他自己是非常有气节的。他经常教育我们，你可以穷，但是你不可以没有气节。我觉得看一个人，你得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看。现在也许有些人觉得这些事都特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必须要这么做。对日本人，我就要有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不管你给我多少钱，给我多大的官，还是你想要我的命，但我是中国人，我绝对要站直了。而且对像张学良也好，对吴佩孚也好，他曾经是吴佩孚的部下，当时吴佩孚已经下台了，他说虽然你下台了，我跟你同进退。他带着我母亲回山东老家种地去了。以后是张作霖，还有蒋介石，他们都请他出任要职，但是最后他跟了张作霖。张作霖看中他的就是这个义字。他请我父亲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到北京，就跟我父亲说了一句，他说："你只要像对待吴子玉（即吴佩孚）那样对待我和张学良，我就心满意足。你的部队，你带多少人，我不给你改编，跟我完全一样的待遇。"他看中的就是我父亲的义。以后我父亲对张学良也是这样。他后来就说，实际上他这一辈子就跟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佩孚，一个是张学良。他对张学良那份忠诚、义气，别人不知道，我们家人知道。他根本不看重什么官、禄。蒋介石后来也要收买他的。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第二次把东北军交到我父亲手里，蒋介石也知道这是很大的一股军事力量，派他的同学都来做过工作。蒋

介石和我父亲接触挺多的吧，后来蒋介石也知道没有可能性。我父亲说过，蒋介石留在西安的一个小记事本上有这么一句话："于学忠两眼炯炯有神，可惜不为我用。"我父亲说，不管你许诺我多大的官，但是我绝对不会背叛张学良，就是说卖主求荣吧。张学良特别明白这一点，对我父亲从来没有怀疑过。一直到后来张学良谢世之前不久，在美国还说过，说王树常和我父亲是他的左右手。其实他一直很器重我父亲，但是他们都不是嘴上说的，谁也没说过。张学良被羁押后，我父亲多次见蒋介石，蒋介石做过很多工作，也没把东北军弄走。解放以后，毛主席曾经派统战部李维汉到家里做工作，让我父亲当抗美援朝慰问团的团长。那时候有个抗美援朝慰问团，人家都争着去当慰问团的团员，团长就更是一份荣誉了。派了统战部给我父亲讲，说毛主席希望你当慰问团的团长，他说三天以后给答复。我父亲在家里考虑了三天，他来回不停地徘徊，三天后，他还是婉言谢绝了。当时有人说我父亲怕死，说去朝鲜，怕飞机炸弹炸死，我父亲就说，我是个职业军人，前方打仗拼刺刀我都没怕过，一个慰问团，我能怕死？谁都不明白他的心。其实要说起来，我真的很自责。解放的时候，我才12岁，我受到的教育就是我父亲是个军阀。解放前，我还小，对他的了解不深刻，或者说根本没往心里去。解放以后的教育就是说，凡是国民党的军人都是坏蛋，所以在我的心里，一直对父亲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后来反右的时候，有些人就说我父亲是右派，虽然没有划成右派，但他们心里头是这么认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抗美援朝你都不去，你怕美国人。后来我父亲就说，谁都不明白他的心。只有我母亲知道他的忧虑，连我们都不明白。当时我们小，我说我为什么自责呢，原因就在这里。当时对父亲很不理解，说政府让你去，你都不去，你什么意思？后来才懂得，他当时还是为了张学良。因为当时张学良羁押在台湾。那是1951年、1952年吧，大陆和台湾关系非常紧张。如果没有这个抗美援朝，咱们就准备解放台湾啦。就是因为抗美援朝，把解放台湾给拖下来了，一放就是这么多年嘛。那个时候，台湾成了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它是借着台湾运输啊、打朝鲜嘛，蒋介石靠美国。我父亲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去了，那时张学良仍在被羁押，已经那么多年，无声无息，也就是说国民党已经不太注意他了。如果我一出头露面，又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了。他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当然这个省主席也没了，我父亲也就是一个河北省政府委员了。当时人们对他有很多的误解，差一点他就被划成右派，后来可能是周总理把他给保下来了。做人要有个标准，他一直跟我们这么说，他心目中的标准就是忠孝节义，不管今天怎么去看这个标准。他说，他的一生，只要他能做到的，他都要做到。当然抗战八年，他不能尽孝。那时候他以国家为重，抗战那些年，他没有回过家。直到蒋介石给他解除了兵权，他才回去。

他在河北的时候，跟日本人有过很多的正面冲突。比如说，我妈妈就讲过，当时日本人搞暗杀，杀了一些抗日的人，杀了中国人。我父亲说，我作为河北省主席，我就要为中国人主持



正义。他就找日本人，当时是天津领事馆，就找领事馆的日本人交涉。把证据都找全了，说，你们杀我们的人对不对？领事馆的日本人说，没什么，不就杀你一个中国人吗？我赔你500大洋。我父亲说，好，这是你们说的，那行，以后中国人要是杀死一个日本人，我们也照样赔500大洋。所以日本人以后不太敢公开地暗杀。那时候他们找来很多日本人，我母亲知道，像我们家的周围经常有日本浪人出没，也有一部分是日本特务，穿的是日本人的和服和趿拉板。还有一部分朝鲜人，就是韩奸，有一部分中国人管他们叫高丽棒子。那时候朝鲜叫高丽，被日本人占领后，就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了。这些人就经常在河北省政府门口和我们家附近活动。我母亲常说，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地小心，因为这些人实际上在挑衅，不知道会干什么事情。像这种情况，我父亲就说了，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天，我就要保卫我的国土。以后“何梅协定”就是因为我父亲对日本人采取针锋相对态度而发生的。还有我大姐说过，日本人连坦克车都往省政府那儿开。我国士兵真是非常非常地勇敢，他们出主意，就是身上捆绑着手榴弹，躺在马路上，你日本人只要敢把坦克车开过来，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当时那些士兵都是自愿的，所以我觉得抗日战争它是一个全民族的抗战，不仅仅八路军在农村抗击日寇，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其实从“九・一八”以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已经开始了。东北那时候有义勇军，还有北大营的东北军王以哲部队，蒋介石不让抗战，他们也自发地打。全面抗战爆发，那是“七・七事变”以后，最后迫使蒋介石下决心抗日，其实抗战早就开始了。

他的一生，其实很不得志。在国民党的时候，眼看抗战就要胜利了，蒋介石怕我父亲的这部分部队控制不住，就从前方把他给调回去了。给了个虚职，就是军事参议院的副院长，等于解除了兵权。蒋介石因为知道他能带兵打仗，所以就千方百计削去他的兵权。曾经想任命他为山东省主席，不让他再当五十一军军长。我父亲心里明白极了，他说我一辈子当过两回省长，一个是河北省省长，一个是甘肃省省长，他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当省长，所以他就拒绝了。我就当我五十一军的军长，他的思想是，等将来抗战胜利，我还得把军队还给张学良。

至于“围剿”孙永勤部队时，说有密令，不许向他们开枪，到底是谁下的密令，他下没下密令，他不会给家里人讲的。我父亲一直给我们讲的一句话是，抗日无罪。他的思想里没有那么多党派，只要是抗日，不管你是哪一党哪一派的，我都会支持你，不会对不同的党派采用不同的态度与做法，他从来不是这样。他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五十一军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他不是不知道。你说他一个军长糊涂到这种程度，甚至于连他的那个机要秘书郭维城都是共产党员，他都会不知道？最后是他把他们放走的。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心里一清二楚。就一点，看你是不是真心抗日。你只要是真心抗日，我绝对不会另眼看待。所以不管是哪支部队或者哪件事情、哪个人，你只要是抗日，我不会去加害你。

不管是哪个部队，只要是抗日的，起码在我父亲心目中，他不会下命令去打你。我觉得这

一点他心里特别清楚。他知道跟日本人早晚得打一场战争，否则他也不会把张庆余、张砚田他们埋伏到殷汝耕那里。反正只要是抗日的、反日的，我觉得他都会支持。

我父亲好像是有一个说法，各个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别人不许插手任命，我当河北省主席，必须通过我。所以我估计这些县长，他大概心里也都有数。他很清楚，东北失陷了以后，华北就是最大的焦点了。所以他早与中央有明确的说法，谁也不许插手河北省的县长和公安局长。他任命那些县长的时候，他心里大概都是反复考虑过的吧。至于具体的情况，他不会告诉家里的。像我母亲说，比如就像县长来谈什么的，他绝不往家里带。而且亲戚朋友来了以后，别说是在河北省的时候，就是解放以后，只要有客人来，像我母亲和我们一定是不能在客厅里待着。他们说话的时候，家里不许听，这都已经成习惯了。只要家里一来客人，我们站起来就走，就回避。所以有很多事情，家里人是根本不会知道的。我们家知道最多的是我大姐。我大姐当时十几岁了，何应钦撤我父亲职的时候，她正好在家里吃饭。大姐说，电话打进来，我父亲正在饭桌上，那客厅里有电话，我父亲就去接。大姐说，我父亲的脸色特别生气，后来说了一句话："我于某人要让日本人逼着我辞职，我嫌丢人！只要我于某人不死，我绝不辞职！"后来，他就把电话给摔了，他说："我一辈子不骂人，但是今天我骂了他！"他骂了句："混蛋！"

他从来就不信任蒋介石。他之所以到东北，是部队找他。他本来不想再进军界，就是一辈子种地了。后来是他那些部下去找他，说没有你出来，我们没办法。那些部下在冯玉祥的部队里特别受气，他们说，愿意跟着你。他最后出山，是因为他的这些部下找他。为了这些部下有一条出路，最后他就带着他的部下投奔了张作霖。

他为什么不投奔蒋介石呢？他说蒋介石这个人太狡猾、阴险，我是个军人，我一辈子都没法跟他打交道。这是他从自身的经历和张学良的事情上总结出的看法。比如说，东北失陷，当然你说全是蒋介石的责任也不对，还有张学良，就是说，东北军自身的很多问题在里面。如果张学良坚决抗日，或当时有西安事变那时候的思想，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做了。但是，一个人必须经过了一些事情后，他才能明白那些事情，当时他还不明白。但是呢，东北的失陷，蒋介石有很大责任，这一点，所有东北军的人们都明白，不是不知道。以后，像我父亲被调到甘肃，其实是蒋介石使的一个花招。蒋介石把我父亲调走以前，因为过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我父亲是张学良的部下，他得和张学良有个交待。他给张学良打电报说，要把我父亲调走。张学良不同意。但蒋介石弄了一个什么花招？说张学良给他的电报他没有收到，所以他把我父亲调走了。像这种事，我父亲心里明白极了，说蒋介石是一个搞政治的人，而我父亲是一个军人，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他一直认为蒋介石在东北的问题和华北的问题上是有责任的。

"何梅协定"都是何应钦签订的。我大姐说，饭桌上，我父亲就骂他说，他是混蛋嘛。其实，他以前是不骂人的，从来不骂人。那是逼急了的时候，眼看把华北像东北那样让给日本人

时才骂的。当时他自己的看法，不光他守在华北挺难的，谁在那儿都挺难的，但是他呢，觉得自己还硬一点吧，要再换一个，后面接他的是商震吧，都不可能再像他那么去做的。

在东北的时候他就说，牺牲几万人，咱们这个仗都要打。“七·七事变”以前，还没打呢，东北军就被分化了，五十一军东调到了淮阴。在那儿的时候，他就跟家里说，你们都做好准备，仗是一定会打的。从他的思想上，他早就看到这一步。他说早晚这大仗一定要打，而且那时候，他讲忠孝不能两全。我们家当时在北京，住在地安门那边。我出生的时候是7月2号，7月7号“七·七事变”，我母亲没有满月，我父亲就从淮阴来了个电报，说你们必须离开北京。他就知道，打起仗来，一旦北京失守了，我们家没好日子过。所以他当时就说了，又连着来了电报说，你们必须离开。所以我生下来10天，我们家就开始逃难。

对那些不抵抗，他有看法。对黄郛，还有何应钦，当时何应钦逼我父亲辞职，理由就是外交上有困难，我父亲就反驳说，你外交官不能搞卖国外交，我只要活着，我绝不辞职，除非我死了。后来蒋介石同意签订“何梅协定”后，我父亲就等于是被撤职了。当然蒋介石没说撤职，而是用了调离的说法。因为你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省长，现把你从这省调那省，他是以这名义，把我父亲从河北省调到甘肃省当主席了。紧接着就有了我父亲参加西安事变的事。

以上是对我父亲在华北时的一些零零星星的回忆，作为纪念吧。

邓一民先生谈孙永勤抗战

讲 述 者：邓一民（68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市邓一民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邓一民（68虚岁，原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热河革命史办公室主任、编审）：

孙永勤起义的历史背景

严格地说，我对孙永勤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只是在编写《热河革命史稿》时才对他的情况进行了一些了解。佟靖功先生对孙永勤研究得比较深，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应该说，我和孙永勤是同乡。孙永勤起义那个地方叫黄花川，隔着一道梁就是我的家乡车河川。我是1938年生人，和孙永勤起义也就差着四五年的时间，所以孙永勤的名字我从小就知道。当时说法叫孙永勤"起匪"，当然这是日伪宣传的结果。我有一个大伯叫邓连云，他就参加过孙永勤起义。我那时候年龄比较小，后来他去世的也比较早，没有和他谈过这方面事，现在想来挺遗憾的。但是孙永勤这个名字，起义这件事，在我的印象中是比较深刻的。1985年，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对这个事情接触得比较多一些了。该书中第一章第四节即为"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孙永勤抗日起义的全过程及其重大历史意义与教训。

孙永勤在我们这个地区，甚至全国，影响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当热河失陷，国民党长城抗战失败以后，"亡国论"甚嚣尘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正处在最关键时刻，孙永勤出于民族大义，能够揭竿而起，组织民众，武装抗日，高峰期发展到五六千人的大军，坚持了一年半之久，与日伪军作战200余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100余处，毙伤俘日伪军数千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重大而深远的。

孙永勤为什么起义，其背景也是很深刻的。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后，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它在政治上建立省、县、甲、牌一系列组织，来实行殖民统治。并在1933年11月实行"战时连坐法"，就是在一个村子里，谁家出了问题，全村都要受株连，这是非常残酷的殖民



统治。当时，警察岗哨林立，牢房监狱遍地，汉奸特务横行，真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它在经济上实行的是敲骨吸髓的殖民剥削。当时日伪搞所谓“组合制”，就是将老百姓收获的粮食、棉花等，即所有的东西，全部交到组合里。然后它再配给你一些东西，叫“配给制”。就连那火柴、煤油、食盐等日常生活必须品都是配给的。它就是从农民手里把你收获的东西都征上去了，都交给“满洲国”了，然后再“配给”你一些东西。征上去的东西是很多的，领回来的东西就很有限，质量也差了。我就吃过配给的那种“组合面”，就是以红高粱为主的杂合面。以前都是当牲口料，根本没人吃的。而且它配给的这些“组合面”，有些是发了霉的，老百姓吃了拉不出大便来，只好用柴火棍子去剜，痛苦极了。它发的那个布，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次，不是棉花布，是一种次生布，没穿几天就碎了。所以穿不上衣服的人是很多的，十七八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是平常事。没衣服穿怎么办？在屋地上挖个坑，来外人时就躲到坑里去，叫“遮羞坑”。它经济上的残酷的剥削掠夺，迫使农民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另外，文化上是搞奴化教育，什么道德会等等，是进行文化、思想统治的工具。

在日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种殖民统治下，老百姓确实是没法生活。有压迫就有反抗。日伪为了更进一步加强统治，防止可能发生的武装反抗，搞一个“铳器回收”政策，即把民间的枪、弹药都收上去。因为在民国时期，民间枪支是比较多的，特别还有民团等农民武装，他们武器是比较多的。“铳器回收”政策就是限期三天内把所有的枪支弹药都交上去，这就更激起了老百姓的普遍反对。孙永勤起义就是在这种深刻的历史背景下搞起来的。

孙永勤起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3年12月11日举义至1934年5月改编，是发动兴起阶段，属于自发的抗日武装起义；1934年5月改编至1935年2月南征，是发展壮大阶段，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抗日态度更鲜明了；1935年2月南征至1935年5月毛山兵败，是起义走向失败阶段，在南征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被日、伪、蒋三方面联合消灭了，余部回到热南山区继续抗战，直至迎来冀热边抗日大起义。

孙永勤起义的大背景还应该看到这一点，孙永勤是在国民党领导的长城抗战失败后，共产党领导的冀热边大起义之前，当时“亡国论”搞得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搞的起义，确实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那种情况下，能够举起大旗，敢于和日本斗争，是非常不简单的，也是非常悲壮的，体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民族精神。共产党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将他列为民族英雄，是非常正确的。

关东军发动热河战争的原因

日本对热河始终是有野心的。打热河战争，关键是热河有鸦片。有一位日本学者说：发动

热河战争，实际是一种鸦片战争，从热河到沈阳的路是鸦片之路。主要是搞热河鸦片，把热河划为“满洲国”，鸦片起到支配作用。

热河的鸦片叫“热土”。别的地方鸦片是黑的，热河鸦片是黄褐色的，特别香，产量特别大，大致每年在1000万两左右。日军把热河鸦片贩卖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以贩卖鸦片的收入供侵华战争之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日本侵华战争也是一场鸦片侵华战争。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

原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一再谈到孙永勤，认为孙永勤是抗日民族英雄，抗日是有功的。冀东的共产党组织对他有所支援，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参加到起义部队中，但李运昌对孙永勤部队总的评价是：有共产党员进入，但不是党领导的一支部队。他多次谈过，他个人很佩服孙永勤，虽然没接触到他，因为1938年冀东大暴动时，孙永勤抗日起义军已经失败了。

孙永勤不是共产党员，也应该提高到全民族抗战这个地位来看待他的抗战。因为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国内主要矛盾已由阶段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应该从全民族利益角度宣传民族抗战。特别是后来国民党抗战也是很悲壮的，正面战场牺牲了几十万人，也应该有地位，不应该是“禁区”。现在基本上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取得对外斗争的第一次胜利，过去宣传得很不够。有个国际上的学者，他说应该在国际法庭上提出向日本索赔，我给你们出庭。但中国有一个问题，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说国民党“一溃千里”，那你们到底抗日没抗日呀？中国的抗战从“九・一八”东北抗战算起，是全世界最早的，也是最惨烈的，损失最大的，但为什么中国的抗战在世界抗战史上不占位置呢？是咱们自己把自己搅乱了。我的看法是排除党派纷争，站在民族利益高度看待抗日战争这个问题。



日本侵略者在承德的残酷统治

讲 述 者：尹忠（80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市尹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尹忠（80虚岁，原承德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

首先进入承德的日军部队是关东军第八师团，叫川原挺进队。它进来之后，从红石砬沟，承德火车站那方向出来，到咱们承德大桥那儿，日本人很狡猾，不走大桥，怕把他们崩死，通通穿着衣服渡过了河，从河里走过来的。到了草市桥头，就直奔夏宫门，就是今天的德汇门。德汇门当时上面的字是“天下为公”，这是民国政府的汤玉麟，那是第八任都统、热河省主席写的，他当时的省公署就在现在的东宫。日本军进来的时间是1933年3月4日，上午11点50分。它就举行进城仪式了，上边的字它就不要了，弄个布，马上搞四个大字“共存共荣”。日本人站上岗了，把挺干净的大门修上了炮楼子。

（尹忠先生所画的画略）

这幅画画的是日本侵略者当时在承德搞国事犯、政治犯、经济犯，抓到他的特务机关里面吊打、逼供。这是吊的两位中国同胞，这是火炉子里烧的火钩子、火烙铁，这是用这大壶灌凉水，还要加上辣椒。你看这个日本家伙多么凶狠，这是在逼供，举着拳头：“你说！不说还得吊！还得烫！”就搞这套。当时地方在哪儿？一个是承德草市街日本宪兵队，一个是小溪沟里福音堂地窖子。日本投降时，从地窖子里还翻出有死尸。

这是我和街坊一个同学，我们趴着墙头看到日本干的这样的事，我当时11岁。

承德沦陷后，日本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教育，一进校，就得说日语，实行军训。学生带病，不许请假，有的学生就病死在学校。还要拜祭神社、忠灵塔。

汤玉麟把承德刮苦了。把离宫、外八庙的东西，再加上贪污大烟土，在离宫里搞白面工厂，把搜刮的民财，还有多少个媳妇，这些东西都捣腾到天津了。他最后是死在天津了。他在这儿闹得“大庙不存，小庙不留”。实际上二十九军宋哲元是搞抵抗的，他是败退的，但是他能吹牛。张学良到这儿来，跟他讲抵抗日军进攻，他拍桌子：“没关系，你看好吧，看你六叔的吧！”他不排行第六嘛。

老汤的军队，穿着灰军装，抽大烟，一个一个大烟鬼，探着个膀子，瘦骨伶仃，那能打仗吗。

承德沦陷后的日子

讲 述 者：白春旺（83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市白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白春旺（83虚岁，原承德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1933年3月4日，阴历二月初九，早晨起来，看到承德东边山区10公里左右，天上是几架飞机，下面有机枪响声，日本人打进来了。做工的、上班的、上学的都不去了。人们都非常关心，实际上早就知道了，日本人从锦西过来。8点多钟到10点半左右，附近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怕投弹。我和家人躲到一坑里，能容五六个人。后来看，投了两三颗弹，我们一会儿都出来了。

当时汤玉麟部队的抵抗情况是这样的：抵抗部队番号是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一师三十八旅，一个三十七团，一个五十七团，大约两个团的兵力，都是步兵。沿狮子沟、外八庙一线撤下来的，大约有一个团吧。当时部队看起来还比较有秩序，是四路纵队，以连、营建制为单位地往下撤。最后看团的指挥员，是个老头儿，白胡子，骑着马，手里托着战刀。他的部队还是比较整齐的。看来当时那个心情，蒋介石不主张抵抗，底下部队看来还是抵抗的。随着他们往下撤的时候，日本飞机在狮子沟，那儿有个小街，瞅瞅，投下一颗炸弹，炸坏两栋民房，还没伤人。在须弥福寿之庙前，不有个石桥吗，撤下的部队在那儿休息，在那儿又投了个炸弹。它那炸弹很小，比啤酒瓶子大一点，就像可乐瓶子那么大。当时有部队用机枪还击，一还击，飞机就拔高了。一共九架飞机。等到下午三四点钟，从普乐寺南山上，从东往西进嘛，下来120多人。看得非常清楚，前面的人端着枪，枪上带着日本国旗，膏药旗。一共120多人，看样子侦察连的样子。到傍晚时听说，它的主力，还有战车，是从红石砬子沟进来的。当时有一些富商、地主、士绅，他们就到红石砬子沟那儿欢迎，把他们接进来了。从那时开始，一直统治了十三年，1933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

这十三年，他们（指日本人）在承德，说实在的，坏事做尽了。一个叫抓国事犯，当时也叫思想犯。你反对日本，有这思想动向，就是思想犯。实际上要说思想能知道吗？他就看你不顺眼，这就抓你。看你有点背景，这就抓你。抓了很多人，弄到锦州，关起来，很多人就死在那里了。另外一个叫抓经济犯，经济犯是怎么回事呢？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凡老百姓生活必



需品都实行“配给制”。给你多少，你用多少，不给你，你到商店就买不来。像火柴、油、盐、米、面、布这些都是给你分配多少是多少，他发给你一个本子，本子上还做记录。当时日本人吃的东西，咱们中国人根本就吃不到，造成很多人营养不良。粮食不够，饿死，穿不上衣服，这种事情普遍存在。后来承德成立了一个“西南特区防卫司令部”，由日本的攻城部队、伪满的国军、警察联合组织，由它指挥，沿长城一线，抓了好多人，也杀了好多人。主要是在那地方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有的地方划一个圈，这范围内，允许你住，不影响你种地，出去你可以种地，晚上回到部落里。每个部落里都有警察，都按人头数，谁回来晚都不行。甚至几家连坐，一家要是犯了法，那几家同样受处分，受法律制裁，它整得非常严密。有的地方不仅不允许住人，而且不允许种地，大片的土地都荒废了。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没有着落，所以把老百姓逼急了，在热河南部一带呢，就出现了孙永勤的抗日第一军。这个延安也知道，毛主席也知道，都很重视这支部队，所以他的队伍后来发展很快。他们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受到很大损失。后来日本鬼子对他的部队展开大规模的清剿，派飞机轰炸，以后逐渐地越来越少。但孙永勤这个名字，热河人都知道，都崇拜他，认为他是一个抗日英雄。大家都想有这样的人带头，能早一点把日本鬼子消灭掉。后来延安派宋邓支队和小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到兴隆鹰手营子区这一片，雾灵山当时也是一根据地，逐渐发展发展，抗日势力越来越大。由于八路军的艰苦奋战，后来加上苏联红军的协助，在1945年终于打垮了日本鬼子，承德人民才翻了身。如果不发生这样的情况，再统治下去几年，承德人民恐怕得死伤大半。

承德人民不愿意当“满洲国”人，没办法，老百姓他有什么办法？也有跑出去的人，参加革命的也有，但是很难跑出去。有的失踪了，也有后来又回来了，少数。底下群众中也有人做一些反日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也有，但都是比较隐蔽的。中国人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哪国人也是一样，何况他（指日本人）那样的统治，那样的杀戮。老百姓反抗力越来越越大，所以后来日本投降时，苏联红军来了，八路军刚到城里，从监狱里解放出八路军部分干部，他们出来后，到群众中做宣传，群众就告诉他们，哪个地方还隐藏着日本鬼子，哪些地方还藏着伪满的军警人员，苏联红军也抓，我们的人也抓。后来建立政权了，也好了。

对蒋介石、何应钦，恨，肯定恨。当时老百姓还不怎么知道，社会上层有点知识的人知道，背后也议论。你像我父亲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画家，他国画画得很好。他在1935年冬天，跟我一个我叫二伯父的姓那的，叫那峻峰，他俩儿过去年轻时是把兄弟，他们两个人在我们家，议论起来就说，1935年冬天他们就知道，他们说，南方有一个姓朱的，有一个姓毛的，他们两个带着起义军，是人民的军队，他们北上抗日，到延安来了。逐渐地就打过来了，已经打到山西了。只有他们过来，我们才能解放。所以当时的话，我父亲就提笔写了一首诗：“军阀混战民生苦，日寇侵华百业凋，火热水深何时了，万家翘首盼朱毛。”这是1935年写的，它代表了

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他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后来通过一个哥哥帮我回忆起来的，我当时13岁。

二十九军长城抗战，都听说了，就希望他们打胜仗。特别是大刀雪夜砍了不少日本鬼子，承德人那是欢欣鼓舞，特受鼓舞，说中国人如果这么干，日本人站不住。就是恨蒋介石，蒋介石不让抵抗。

蒋介石、何应钦这两个人确实是卖国求荣，就是图他们的安逸。蒋介石不是提出先安内后攘外吗，先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老百姓意见特大，特别恨他。所以后来1945年解放之初，国民党通过电台广泛地宣传"不要向八路军交枪，各地的日军和伪满军队要向国民党政府交枪，向国民党军队交枪"，大家说，这样弄的话，就完了。大家也承认，也希望八路军壮大起来，以后打败国民党。知道国民党过来后，和日本人进来前一样，在东北地区还得建立满洲。大伙说：可不要走满洲的老路，走这条路，老百姓就更完了。

我那时候很小呢，土匪的情况，只知道一点儿。像我们家里，自由职业者的家庭吧，也没什么钱，但土匪那时闹得很厉害，官匪勾结吧。有时候汤玉麟的部队晚上出来，明火执仗地抢。半夜经常听见狗叫唤，狗一叫唤，有时候就听到枪声，睡不了觉，穿上衣服，出门。从后墙跳过去，把我们小孩儿抱过去，抱到山上。把家里门关上以后就不管了，家里也没什么东西，就怕他杀人。土匪不少，也听说外地闹土匪的情况。

（邓一民先生插言）大的土匪叫"白三阎王"，白凤翔，热河围场那边的大土匪，抢劫过丰宁县城。日本人进驻热河后，被东北军收编了，编成骑兵第七师，师长就是白凤翔。后来在"西安事变"时指挥抓蒋介石的就是这个土匪。抓蒋介石的两个都是热河的，都是土匪。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不打了，华北不抗战了，老百姓感觉很失望。老百姓非常希望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太恨他们了，真希望打。

你像老百姓日常生活买东西，排队，包括中国的商店，中国的商店也是日本人指定的，销售什么东西。到这儿以后，排很长时间的队。日本人也排，中国人也排。排到那跟前了，"中国人的没有，不给。"白排了。从前边就传过来了，"咱们别排着了，没有咱们的。"拿钱买东西都不卖给你。

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嘛，他（指日本人）是这么宣传的，跟希特勒是一样的。希特勒不是说，犹太民族是低等民族嘛，都得消灭嘛，一样。



佟靖功先生谈孙永勤（二）

讲 述 者：佟靖功（76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林业局绿缘宾馆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佟靖功（76虚岁，原中共兴隆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兴隆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兴隆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第一次听到孙永勤名字的时间

我第一次听到孙永勤这位抗日志士的名字，是在我当文化馆长的时候。那是1952年秋后，那时候我任兴隆县文化馆馆长。文化馆有一项业务，要搞社会文化调查。到下边一搞调查，就接触了很多抗日时期的老战士、老民兵、老干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那个时候还没看到《八一宣言》呢，就是听到了黄花川农民大暴动，黄花川农民大暴动的领袖是孙永勤，那个时候是这么一个说法。感觉到孙永勤这人很了不起，在国破家亡的严重关头，能够领导农民大暴动，起来抗战，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由于那个时候还没有专门搞党史，所以做社会文化调查的时候，还仅仅是一般地了解了一些孙永勤的情况。

当时了解的情况，说他家庭比较富裕，是个富农，是农村的一个有威望的人士。孙永勤在世的时候，他们家里有三十多亩地。孙永勤只有母亲、妻子和孩子。由于孙永勤常年搞自卫团，所以他就雇一个人给他种收土地，这样的话，土改的时候，认为他雇长工了，有剥削行为，所以给他们家定一个富农。（之后的孙永勤事迹部分略。）

关元有——不为人知的共产党员

关元有是孙永勤最得力的一个助手和参谋。他没有留下很大的名声，但是孙永勤的成功跟关元有密不可分。关元有是1933年被中共遵化地下县委介绍入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高存。据我们推测，那个卖水鞋的商人，有可能就是高存。卖水鞋的之所以来到孙杖子，并且住在孙永勤家，很可能是经过关元有秘密介绍的。关元有帮助孙永勤起义之后，始终担任重

要职务。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任队长。变成中队的时候，他任中队长。变成大队的时候，他任大队长。变成总队的时候，他任总队长。除去这些兵权以外，他还是军参谋长。他非常受孙永勤的倚重。关元有有个外号叫二军长，那就是除了孙永勤外，就是关原有，可见他的威信非常高。

关元有这个人虽然是不露名的地下党员，但是他能够团结一切人，能权衡利弊，注重大局。你比如说，在毛山决战的时候，本来孙永勤让他突围，可是他不走。他说把生的机会让给别的队长，他陪着孙永勤决战到底。牺牲以后，敌人割去孙永勤的头颅，同时也割去了关元有的头颅。关元有这位革命先驱隐着高风亮节。他牺牲50年之后，我们于1985年到遵化外调，找到遵化当时的地下县委书记骆凤庭，骆凤庭证明关元有是隶属于遵化县委的口外的党员，我们才知道他的这一身份。所以我们感觉到，关元有这位前辈确确实实是一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党员。他为了抗战，家破人亡，现在他家里面连一个人都没有。

关元有牺牲以后，他的妻子带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过着四处逃亡的血泪生活。他的儿子叫关恒利，一熬到青年就参加了八路军。1943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在遵化。他的妻子被日军抓去，杀死在柳河口。他的女儿叫春子，被日军移民移到黑龙江，很快也病死了。

民众的大联合

孙永勤之所以从17个人发展到5000多人，这里面，他有一个宗旨，那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话要搁关元有说，那叫“爱国统一战线”，搁孙永勤说出来，就是民团的大联合。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是抗战，打日本，什么人他都联合。1935年春节，他回黄花川过节的时候，发现了杨佩之。杨佩之是张杖子小学唯一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师范毕业生。在民国来讲，那师范毕业生在农村来说是很高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孙永勤见了他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孙永勤感觉到自己非常急需现代文化知识，他什么老师都有，但现在他急需现代文化、科学老师。他跟杨佩之谈了之后，特别邀请杨佩之作为自己的科学文化老师。杨佩之经过谈心之后也非常拥护孙永勤，他说，我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我就当你的老师，我就跟你去。孙永勤说，什么条件呀？他说，你接受我的建议，不要离开地利。人和你有了，你必须再具备地利的条件。也就是说，不要离开五指山、五凤楼、月牙山、马架山、老梁这五座大山。他跟孙永勤说，你的优势就是人和、地利，你要离开这五座大山，你就没有优势了。孙永勤说，行，我一定听杨老师的。那以后几个月当中，孙永勤确确实实始终没有离开这几座大山活动。孙永勤之所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就是因为实施的是山地的灵活的游击战。等到后来，孙永勤到五千人之后，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时看到，宋邓支队来了也是五千多人，但是在



遵化、迁西也站不住脚。为什么？因为来不及建设根据地，解决不了装备问题。所以孙永勤发展到五千人以上，那不是“山耗子”了，那是大部队了。这个时候，历史上的一段经验是，热南山地必须跟冀东平原相辅相成。后来包森将军的成功、李运昌将军的成功，就是热南山区跟冀东平原的相结合。孙永勤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必须进口里。所以当日军逼迫他的时候，孙永勤决定进口里。他向口里进军的路线与四年后包森将军向口里进军的路线几乎完全一样！有人说，孙永勤进口里是错误的，不对！由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要开辟冀热边就看出来，热南跟冀东必须结合好。谁结合得好，谁就成为大抗战区、大解放区。如果没有这个结合，单是热南不可能成为大解放区，单是冀东也不可能成为大解放区。在孙永勤要进冀东的时候，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进冀东的时候，杨佩之建议孙永勤，冀东和热南要相结合，但是还要以山区为根据地，这个意见孙永勤也接受。只是正在进入冀东之际，便遭遇大量的日军和特警队的协剿。在敌人重兵“围剿”这个关键环节上，孙永勤没意识到。这个他不可能意识到，那是关东军司令部的策划，是他无法意识到的。

中国农民特色的抗战

孙永勤将军，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的特色。我之所以这么多年始终执着地追寻他的足迹，总结他的历史经验，就是因为他代表了民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民众想说的话他说了，民众不敢说的话他也说了；民众想做的事他做了，民众不敢做的事他也做了，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的特色。现在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孙永勤他那时打的是一场具有中国农民特色的抗日战争。他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现代的东西；既有封建的东西，又有进步的东西。总的说，他是进步的。他主张的民团的大联合恰恰符合以后毛主席提倡的人民的大联合。他的一些朴素的思想，恰恰近似了毛主席后来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某些论述。另外，他济困扶危，见义勇为，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这些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气节。以前的长城抗战，只是一些政府军在临危抗战，虽然也出现了几次壮烈场面，但是维持了很短时间就退却了。等他继续长城抗战时，为什么能坚持一年半之久？就是因为他抗拒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充分发动了老百姓。所以他白手起家，用简陋的装备，抗战一年半之久，大小战斗2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5000多人。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就因为他体现了民心。我们现在怀念他，我们现在怀念这位将军，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在于他代表民心，重视民心，不失民心。

造成孙永勤悲剧的原因

我们现在回忆起孙永勤将军来，心情是非常压抑的。我们的民族英雄孙永勤轰轰烈烈地抗战了一年半之久，但最后是一场悲剧。这个悲剧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孙永勤将军之所以最后蒙受了悲剧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蒋介石卖国。如果当时中国政府不卖国，对孙永勤能够尽一份力量支援，我们的孙将军就不会遭到这个结果了。为什么我们的吉鸿昌将军、方振武将军和以后的一系列将军都惨遭悲剧，这是因为这些将军代表了群众的愿望，却违背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党私策略。当时孙永勤这支部队，共产党虽然是一再地支持、一再地帮助，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一再地帮助，但是那时候我们遵化的共产党、冀东的共产党还处在童年，共产党没有力量来领导、来支持、来改造一支五千人的大军。那个时候，蒋介石和他手下的部队不但不支持孙永勤，而且还跟日军“协剿”孙永勤。我们注意这个“协剿”，蒋军跟日军“协剿”孙永勤。我们说，孙永勤的悲剧就来自于国民党的“协剿”。孙永勤向来不怕日本鬼子，我们中国有这么大的地盘，我们可以东西南北的自由驰骋啊，因为有了国民党的“协剿”，结果孙永勤受了暗算，最后造成了非常遗憾的悲剧。我举个例子，孙永勤的副军长马保德在毛山突围之后隐蔽在他的家乡——遵化县东双城子。殷汝耕的特警队知道后，把马保德逮捕。通过殷汝耕向日军献媚，把我们的马保德副军长引渡到马兰峪日军的司令部，结果马保德将军在日本司令部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后来，川岸旅团长在古北口跟殷汝耕的驻古北口办事处主任霍实谈话的时候，川岸说，希望今后仍按照处理马保德的事那样办理。霍实当时不知道什么叫马保德的事，后来一了解，哦，闹了半天是特警队抓住了马保德，后来通过殷汝耕又引渡给日军，希望继续像殷汝耕那样卖国呀！马保德的事件说明啥呢？它说明了殷汝耕的某些特警队卖国求荣，出卖和陷害了马保德。

“协剿”孙永勤的是张庆余的特警队。有人说特警队没有真打，不对。特警队里面是有人有中国的良心，给孙永勤送信，像中队长吕振江那样，但是也有一些死心塌地、卖国求荣的人，确确实实是协助了日军，“协剿”了我们的民众军。

尖山屯那儿的特警队就是张庆余的部队。张庆余以后在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时候是明文规定的殷汝耕的保安处长。在通县起义，是他后来的事。在尖山屯的时候，本来孙永勤的部队已经打退了日军，结果张庆余的两个中队又加入了山田一支队，合力攻击我们抗日救国军。那个时候，我们孙将军的部队不能大量地消耗子弹，所以只有向遵化的东南转移了。这次战斗是有据可查的，而且是敌人的《大同报》登着的，它登的是特警队和日军“协剿”我们抗日救国军。当时的特警队，虽然是中国人，我们可以分析，有人同情孙永勤，但是有相当的人卖国求荣了。



对当地老百姓的说法（指遵化当地百姓说特警队没有打抗日救国军）我们要有分析，有些情况，有些军情、军事秘密，老百姓并不都知道。

尖山屯战斗本是敌人炫耀他的战绩，却暴露了“协剿”的阴谋。另外，敌人设置的战场是遵化城北十五里，遵化靠南边十五里以外并不是日军的包围，而是特警队的包围。孙永勤为什么走不了？就因为特警队死死地围困，不得已才转回毛山。所以可以这样说，是特警队协助了日军把孙永勤，把我们的抗日救国军围困在毛山这个裸露之地，便于敌人从四面八方进行炮击。

要重视对抗日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

对孙永勤将军的纪念，不单单关系到孙永勤将军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我们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问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一次彻底的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毛主席曾经讲过，这次战争锻炼中国人民、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一切以前战争没有一次能比得上的。所以我们今后，有历史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家，和有远见的有觉悟的中国人民，都应该不断地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总结得并不是很够，而是很不够。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是面对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地抬头，把政治行为演变为军事行为的这种特殊的时期，我们更应该重视深刻地、全面地、科学地、与时俱进地总结抗日战争的珍贵经验，这对于今后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地自立、自卫、自强，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遵化民众与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讲 述 者：石学锋（49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委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石学锋（49虚岁，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遵化当时作为京东河北省的一个县城，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位于北京到山海关的一个中间部位，地处京津唐三角地带，而且还是当时河北与热河交界处，并作为民国政府与伪“满州国”的所谓边界口岸，因而地理位置十分特别。在长城抗战中，侵华日军和二十九军都把这儿作为一个重点。

在长城抗战中，遵化城是抗战的指挥中心。当时，二十九军的军部设在遵化县城的老一中院内，城里的一些商铺都成了它的军用仓库、给养中心。当时遵化县城的老百姓对二十九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从人力、物力、担架呀、抢救伤员啊，方方面面给予了支持。当时，当地老百姓拆门板就拆了四千多块，拆下来后，作为担架使用，还腾出了不少的房子，供前线伤病员使用。另外，老百姓还主动地杀猪宰羊，把猪羊肉、鸡肉、鸡蛋等送给二十九军前线官兵。遵化老一中的中学生们也在学生会的领导下组织劳军活动，男生帮助运送弹药，女生帮助救护伤员，给二十九军的抗日将士们以极大的鼓舞。

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装备十分落后，给养也供应不足，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军需上给他们的支持很不够。由于战士们的步枪都是老式“汉阳造”，没法上刺刀，于是他们只好采用大刀杀敌。当时，遵化有好几位刀术的教练帮他们培训刀术，还从当地老百姓中补充了一些兵员，总数达到600多人。

长城抗战东起冷口，西到马兰峪，大体150公里左右，整个都是二十九军的阵地。前几天，我看了几份二十九军的抗战图，在网上下载下来的，可以看到当时交汇点几进几出。二十九军在冀东长城沿线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竟把侵华日军赶出长城以北30多华里，不敢继续向南进犯。后来，二十九军奉上级命令撤走了。随后，侵华日军才占领了遵化城。



李成民先生谈长城抗战与孙永勤抗战

讲 述 者：李成民（72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唐山市李成民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成民（72虚岁，原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李成民先生　2005年6月

京东这个地方，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个是非之地。30年代初期，兵荒马乱，各派势力，包括我们国内的，还有日本的，很乱。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如何生存和发展是当时的实际问题。

1930年初，中共顺直省委指示“冀东要加紧组织开展工人罢工和发动京东游击战争”，特别指示要在唐山搞兵变。搞什么兵变呢？搞一个唐山的工人和丰润车轴山学生联合起来，跟部队合着搞兵变，来扩大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这实际上做不到，是“左”倾产物，所以说没搞起来。还没容搞时就不行了，我们京东特委的组织就被敌人破坏，不存在了，京东特委就被瓦解了。

1933年5月16日，日本军队进入唐山。很快，不到20号，日军直接威逼北平和天津。到5月31号《塘沽协定》一签，冀东就成缓冲区了，实际上是被日本统治的。那么这时候你再打土豪分田地，显然，国内的矛盾上升到民族矛盾的时候，这种做法就不适应了，所以群众、党组织、各派政治势力都拢不起来，都拧不到一块。因为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对，因为矛盾不是国内矛盾了，在京东来说，不是国内矛盾，而是升为民族矛盾了。在民族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如果还用国内阶级矛盾处理问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所以在迁安搞暴动是失败的。当时李子光被开除党籍，因为他不服从这个命令，被开除党籍之后，李子光被迫自己单独成立一个县委，要解决什么呢？解决民族矛盾这个问题。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京东矛盾不允许当时王明路线在京东存在，当然

更不能发展，所以你搞什么都是失败的，这是1934年的事。当时情况你看，这个地方变成缓冲区，实际上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人已经说了不算了。变成缓冲区之后，京东的东部地区由日本进关时带来的李际春、刘佐周两个汉奸队伍负责唐山以东的的治安，唐山以西的治安由于学忠部下的两个团变成两个保安队来负责。

当1934年8月，孙永勤正是兴旺发展的时候，有时候到关内来，大部分还是在兴隆一带活动。到1935年初时，孙永勤越过长城，那时候，让热河的日伪军势力发现，孙永勤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对它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所以他就被迫过长城。况且孙永勤那时给养匮乏，亟待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所以过来，想到这边来求援。这是两方面原因。当时国民党政府县长何孝怡，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当孙永勤派人找到何孝怡时，何孝怡秘密通知孙永勤，也给了他一些物资。

在我心目中，何孝怡还不完全像有些史料说的他迎合日伪、迫害孙永勤，我还没找到这些资料。在我掌握的资料中，他给了孙永勤一些物资。此外，中共遵化县委曾派人与孙永勤联系，那时我们的力量很弱小，力所能及地提供他一些枪支弹药和物资，不多。后来，在他临失败之前，那时的京东特委书记是王平陆，专门会见过孙永勤，这是共产党对孙永勤的支持和政治态度。咱们也派人给他改编过部队，他原来那么一个组织，后来给改成抗日救国军，这个还是咱们共产党建议他弄的。所以说，孙永勤在当时几股势力情况下，能够生存发展，能从500人发展到5000多人，体现了长城沿线的不管是南边还是北边的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外来侵略的抵御精神，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反映。

毛山战斗，确确实实是四面围攻。

在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上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驻伪“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如果不协调，他没法弄。我顺便说几句，我们后来在“无人区”里进行斗争，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除了我们绝对艰苦斗争以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利用了所谓的两国边界的不协调。你满洲军是满洲军的部署，华北伪军是华北伪军的部署，它们两个部署里有很多是步调不一致的。我们正好抓住了这个步调不一致，我们发展我们自己，壮大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孙永勤能存在那么长时间，被中央领导誉为民族英雄，那是他在战略思想上也有这个。而且呢，我想，王平陆在冀东来讲，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事指挥者，他一定在和孙永勤见面时谈过这个情况。但到了后期，孙永勤四面被敌包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失败也是自然的，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省委那时候叫顺直省委，在天津，也是几次遭到破坏，大部分是因为逮捕。

省委有张明远，也有李运昌，这是冀东两个人。张明远是1933年到顺直省委，当年下半年由顺直省委到京东特委做宣传工作。当时京东特委还有阎达开，做组织工作，书记是王平陆。这是1933年到1934年初的时候。后来又调张明远到河北省委管宣传工作。那时候林铁在省委管

军事工作，姚依林管宣传工作。张明远那时候调北京执行一个特殊任务，还没执行好，就被捕了，关系就丢了。以后，河北省委被破坏了，1935年以后解体了，就分散到各地去了。

京东党组织直到1935年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仍然还是特委，书记王平陆，到1936年、1937年左右，完全是地下活动。周文斌在唐山活动，吴德常常过来搞工运。到1937年刘少奇来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解决了王明路线，这时候才开始统一起来，工作转入比较正规。

关于地下党是否客观上帮了日伪忙一事：那时候咱们不可能那么做，要让我说。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候我们的党非常薄弱，需要武装力量，不是不需要武装力量，京东党也需要有武装力量，好像急盼有个组织过来。另外一点，当时有个《塘沽协定》，客观上不允许你中国军队过来。后来日军不是抓住这一条了吗？来借口吗？所以我们说，孙永勤是被迫来求援。

围绕李子华回忆私刻公章，委任孙永勤一事：这事听说过，但我们没采纳。因即便有此事，也不符合逻辑。研究孙永勤时还是从正面来看这事，你为什么要把他调到关里来呀？把他调到关里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查不到主要根据是什么，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这关里需要武装力量。如果说当时我们京东特委有这个力量，你可以弄这个事吗？我们几个人研究过这事，虽然不能说有点滑稽，反正没用这个事。

冀东缓冲区这边，唐山以西叫作蓟密区，唐山以东叫滦榆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两个区。唐山以东滦榆区就是他们的队伍，由刘佐周负责，西边由张庆余负责，这是两个防区。滦榆区一开始在滦县，后来设在唐山，蓟密区就是通州。张庆余在通州，张砚田在蓟县。不只是冀东防共自治之后，之前就已经是两个防区了。东边是刘佐周，西边是中国特警队，当时就是这样，不是后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才划分这个区域。实际1933年日本进关，就把李际春带过来了，那时候在滦县，管唐山以东这块。所以当日军要“剿灭”孙永勤部队的时候，日本方面在协调这个事情的时候，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这两个方面来协调组织力量，它就首先要从唐山这儿调刘佐周、李际春的队伍往那儿赶。

李际春、刘佐周不受于学忠节制，应受殷汝耕节制，他是蓟密专员。河北省主席管辖范围还包括滦榆专署，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这边于学忠管不了，日军控制力量很严，就是李际春、刘佐周他们控制得很严。

因为何孝怡秘密支援了孙永勤，关东军威胁过他，他不服气，关东军就逼迫中国当局把他更换了，换成一个关恩霖，亲日的。

关于何应钦问题：在我的印象当中，何应钦是亲日的。我们也没给他定个汉奸，但这个人确确实实是亲日派。蒋介石是不抵抗的，现在对这说法有疑义，但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历史事实摆在那儿呢，不抵抗，节节后退。你想，《塘沽协定》是谁定的？《塘沽协定》中国政

府是承认的。你不承认为什么把中国军队撤出去了？把两个正式部队变成两个保安团，这就是说你承认《塘沽协定》，不许中日双方军队进入缓冲区。孙永勤是武装力量，越过长城到这边来，就是进了缓冲区了，就属于军事行动，而且也确实是军事行动。那么根据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塘沽协定》，同时也就承认孙永勤进入长城是个非法行为，所以它进行“围剿”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这样分析。根据它在《塘沽协定》里的态度，态度是承认了缓冲区。这实际上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为什么1933年成立缓冲区，1935年就成立防共政府，进行自治了？而且尽管国民党反对殷汝耕也好，不承认也好，历史上有这么个事实，也没采取措施，只是个反对，还不如底下好多县长绝不附逆，跑呢。从蒋介石、何应钦承认《塘沽协定》这个问题上可以想象而知，他们就认为孙永勤是军事行动，侵犯了缓冲区，也叫停战区，所以说，他们视为非法，也就有可能指示有关部队进行“围剿”。

在研究长城抗战时就看到了，二十九军下那么大力量，死得那么悲壮，一声令下，把二十九军就撤了。喜峰口一仗，把日军打出十几里地，确实打出了中国的威风。日军当时也想速战速决，一看力量不行，马上往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撤退，老乡抱住一个团长的大腿，说：“长官，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长官不愿意后退，拍拍老乡肩膀说：“起来吧，往深山里躲一躲，我们还会回来的。”就是说，国民党的那些部队是愿意抵抗的，可是蒋介石、何应钦一声令下，二十九军往西撤，一个劲儿往西撤。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问题：那时我国军队的发展，军队现代化，不如日本。国民党已经看到这点，我们在实力上打不过日本，但是确确实实对它构成很大威胁的是共产党。如果不解决共产党，它要是把力量都投到前线，后院着火，它受不了，所以必先采取这种政策。所以当东北三省已经被日本侵占，华北抗战很危急的时候，它还在进行五次“围剿”。

1934年华北是什么状态？1933年冀东这块已经变成停战缓冲区，蒋介石非常清楚，可是1934年还进行“围剿”，把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什么办法也没有，共产党只能进行长征了。那就是要把共产党彻底消灭，我只有把你消灭了，才好回过头来打日本，不这样的话，后院起火没办法。他这个算盘打得不对，是民族利益大，还是阶级利益大？当外族已经入侵你这个国家的时候，你哥俩还在打架，你就没考虑外族已经对我构成多大威胁？蒋介石的思维方式、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失败是必然的。共产党那时虽然很弱小，“九·一八”时咱们还在南方，咱们已经有态度。可惜咱们当时也很乱，一开始是瞿秋白的“左”倾路线，后来是李立三、王明的，几次“左”，闹得党很不安定，所以在对付“九·一八”时，你本来党内力量就很薄弱，再加上内部有个思想不统一，当然发展就有问题了。国民党想就着共产党内乱时，把你消灭了，然后回过头来打日本。蒋介石也不是不打日本，咱们也没定蒋介石为汉奸，他也是打的，你不管怎么着，正面战场还是国民党来维持的。一个是打不过人家，一个是不想打，所以至少



是说贻误了当时战机。中国共产党提出全民抗战没提错，我们共产党虽然弱小，你国民党是主，我们服从你，最后不还那样吗？1936年后不还那样吗？但有一点，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有道理，是个好法，是为以后埋下了伏笔。不能光听你那一套，因为你那思维方式、观点不正确。

国民党二十九军的防区里，打得最激烈的是喜峰口和罗文峪。喜峰口是长城东线的重镇，日军下力量很大，我们也下力量很大的。一开始发起进攻，我们把敌人打退了。敌人又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咱们也准备大干一场。首先从罗文峪开始，进攻之后，喜峰口就做好准备。罗文峪胜利后，敌人就偷袭喜峰口，中国军队这时就大量投掷手榴弹。《大刀进行曲》是喜峰口传下来的。我们的战士举着大刀向前冲，向前杀。据当地老百姓讲，那气势，不知道战士们怎么来的一股子劲儿。有的老百姓形容，战士举着大刀过去之后，那鬼子真是屁滚尿流，滚得哪儿都是，有的简直是不还手，让我们二十九军将士打得溃逃，一下子就可以推进十几里地。这个举动可是对咱们中国震动很大，咱们老百姓组织慰问，煮鸡蛋呀，蒸馒头啊，拿好吃的东西慰问他们。这一仗打得非常好，将士也非常自豪。有很多二十九军将士回忆录写得非常好，像我刚才说的，老乡抱着团长的腿问："怎么办？"团长说："往深山里躲一躲，我们还会回来的。"回来了没有？到今天也没回来，国民党军队到今天也没回来！刚才我说的那个团长，他非常沉痛这个话语，就证明了他对这个事是一种惋惜，我们这么好的战机，我们不打，还要我们撤退，他是不满意的。1933年是这样，6年以后，是共产党、八路军过来了，四纵的宋邓支队八路军过来了。这是当时老百姓的心情，渴望中国的军队防御外国军队，打击外国侵略这个心情。

日军占领冀东以后，中国军队不满当亡国奴，老百姓也不满日本进来，到处反抗，军队也介入，暗杀的事情不少，日军也觉得这是个是非之地。它还想搞"华北自治"，一个是"东北自治"，一个是"蒙疆自治"，还想搞"华北自治"。"华北自治"要搞不容易，包括北平、天津、山东、山西，先在冀东搞个"试验田"。要搞"自治"必须设立军事缓冲区，不能开战，有这有那的，所以订了几个条件，早预谋好了，在塘沽逼迫中国代表签字。比如说，这条线从昌平一直到宝坻、芦台以西，向北到长城，东到山海关、渤海，变成缓冲区。为什么变成缓冲区呢？就是双方没有军队了，没有冲突了，它好"自治"了。

何应钦在北平当军分会代理委员长时，我认为他没起好作用。好多事情，应他交涉的事情，他都妥协，一直到南京，以后"西安事变"，他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亲日派。没有给他定汉奸，但他确确实实是亲日派。他干了许多日本人应该想做，别人做不到，他却做到的事情。这个人在我心中，他很阴险。你看国民党的硬派人物，包括戴笠这样的人物，他都很明确，我就是特务。你比如说白崇禧也好，孙连仲也好，李宗仁也好，我是个军阀就是个军阀，我是什么人就什么人。唯独何应钦这个人很阴险，好像是在国民政府这边吧，他很硬，他是负责军事

的参谋长，但是对日本这边呢，他反正不太正，给我的印象不好。

孙永勤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一个民族英雄，这个不假。他是一个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一个人要想生存的话，他有这个条件，并且在当时来讲，还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他要过一个比原来富裕一些的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不，他为什么不？我也想过这个事，一是他本身有浓厚的民族意识，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另外他受长城抗战的影响，咱们军队的影响，他对外族的侵略抱有相当的仇恨；而且他亲自看到过日本对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残害，都能够激起民族感情，他才能有这样的义举。正是这样的义举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想法，才有许多仁人志士也向他靠拢，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这么大的规模。特别是后来在共产党的指导和微薄的支援后，他觉得共产党好，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但是由于后来他没办法了，几方面因素，也不排除有诱惑他的因素，我们没立这个观点，上了圈套，最后遗憾地失败了。

从始至终，他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应该值得永远颂扬的英雄！

关于是否因为孙永勤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对他的宣传才比较少的问题：这个看法很偏激，有很大的偏见性。共产党才成立多少年呀，到今天才84年嘛，中国出了多少英雄好汉，难道说不是共产党就不应该宣传他，树立他？党外的人士我们曾宣传过很多很多，当时把李鼎铭先生还立起来了呢。民族英雄就是民族英雄！到什么时候孙永勤这个民族英雄、这个形象是抹不掉的！

原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
李运昌谈孙永勤

讲 述 者：李运昌（98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北京医院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运昌（98虚岁，原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党组代书记、第一副部长）：

孙永勤是兴隆县黄花川人，他是民族英雄。在中华民族困难的时候，他发起了义勇军。

日本军国主义对孙永勤这个民族英雄非常害怕，非常痛恨，所以想用全力消灭孙永勤的部队。孙永勤在热河的战斗比较孤立，热河的伪组织都反对孙永勤。关里的伪组织表面上赞成，实际上也不赞成。但共产党赞成，派人和他联系，把民众军改成了抗日救国军。

我跟孙永勤并不认识，我们党派人去过，去的人叫王平陆，迁安人。他回来报告了孙永勤起义的经过，说孙永勤很开明，你一说，他赞成，把民众军改成了抗日救国军。孙永勤战斗了一年半，在口里口外很出名，最后开到毛山，想取得遵化县政府的援助。遵化县长是卖国的，他没有援助孙永勤，还勾结日军打孙永勤，孙永勤是老实人，吃了亏。

现在已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文件已登了他了，说他是冀东的英雄。实际上孙永勤不是冀东人，他是热河的民族英雄。

中国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不抗日，日本一进中国，他实行不抵抗主义，要先安内后攘外，这跟中国的传统是不符合的。中国是兄弟阋于墙而外敌欺负，大敌当前，应该先抗日，才能团结起来。不抗日团结不了民众。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全力支持孙永勤抗日，派许多干部到孙永勤部队。蒋介石不好，积极主张不抵抗主义。在日本进攻东北以后，下命令给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张学良的部队都撤到关内了。当时张学良问蒋介石怎么办？主张先抗日，后安内。蒋介石答复道，先安内，后攘外。什么意思呢？先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后抗日。实际上他消灭不了。他借口安内攘外就是打内战为主，抗日是次要的。

孙永勤到毛山，到中国地方了。何应钦就不同意，跟遵化县政府联系。伪遵化县长表面上是同情孙永勤的，实际上跟伪军、日军勾结，反对孙永勤。孙永勤是老实人，吃了亏。

蒋介石对孙永勤不援助，说孙永勤是土匪。孙永勤是民众军，不是土匪。

河北党组织与长城沿线的抗战

讲 述 者：赵胜军（43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6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胜军（43虚岁，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20世纪30年代初期，北方党的活动中心就在河北。当时河北省委领导党的斗争活动的区域是很广的，京东特委也是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之下。“九·一八事变”以后，党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1932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也发了一个宣言，号召民众武装起来，对抗日本的侵略。当时我们党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之下，北方在斗争形式上还不是很灵活，但对民众的抗日斗争，我们党还是积极地去领导，去组织的，包括当时的反帝大同盟，通过这种关系，通过党的外围组织，来组织活动。当时发传单呀，搞集会啊，抵制日货。那时党的任务是两个：抗日反蒋。当时的中共河北省委作为党的一个地方机关就要执行中央的决策，斗争策略就是既要宣传民众抗日，同时还要组织民众去反蒋，因此当时北方还举行了一些目标是对准国民党反动派的农民武装暴动。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以后，京东的党组织也组织民众去支援前线。当孙永勤组织抗日武装以后，当时的遵化县委曾经派人和他接触，也给他一些帮助，包括队伍的建设。但在当时的北方，要求抗日受到国民党的制约，尤其是《塘沽协定》签订以后，冀东的抗日活动受到扼杀，所以最后他归于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就是说，日军要巩固它的伪“满洲国”的边境线，而国民党又是“攘外必先安内”，它不愿意让民众起来抗日，这就形成了几股势力共同对付农民的抗日武装，孙永勤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当时也缺少其他方面的一些有力的支援。

孙永勤的抗日武装归于失败以后，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一个《八一宣言》，宣言里把他称为民族英雄，对他的抗日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句古话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河北确实有一种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孙永勤作为一个农民，能够在外族入侵的紧要关口，揭竿而起，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于外来侵略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他当时的武器很简陋，拉起的队伍军事素养也比较低，但仍然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他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尤其是他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抗日，确实令人敬佩！



孙永勤起事的时候，党组织在发挥作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河北各地都拉起了抗日队伍，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冀东，1938年有一个冀东抗日大暴动，20万人参加，最后形成了10万人的武装，当然有民众的觉悟因素在内，党组织的作用也必须承认。还有，在冀中也组织了一个河北游击军，号称10万，也是靠各个县党组织的努力。

毛泽东提出我党要到敌后去，要进行游击战，这是他基于对抗日战争思考的结果。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比较穷，我们党、军队的装备远远不如日本，就要深入敌后，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只有把民众号召起来，抗日才有希望胜利。为什么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日？他就是号召打阵地战，搞了很多会战，但对民众的力量他没有重视。毛泽东认为雾灵山是可以建立根据地的，他应该指的是长城沿线这一带。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八路军如果在这里站住脚，东就可以出击伪“满洲国”，可以更加深入地到敌后，往西与太行山脉斗争形成一个整体，战略部署是相当有远见的。这个地方斗争也有特点，就是接近伪“满洲国”的“国境线”，斗争非常残酷艰苦。光头山、老岭这些地区都是当年日军划定的“无人区”的核心地区，日军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切断了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物质上极端短缺。我们的抗日军民在这些地方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但还是坚持下来了。

应该说，孙永勤虽然牺牲了，但长城沿线民众的抗日精神、反抗外侮的精神并没有被扼杀，相反倒越烧越旺。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长城沿线爆发了20万人的抗日大暴动，之后在这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依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且为八路军出兵东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满洲国”——中国人的人间地狱

讲 述 者：李茂杰（70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吉林省社科院东北沦陷史总编室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茂杰（70虚岁，原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现东北沦陷史总编室常务副主编）：

张学良的“不抵抗”不同于蒋介石的“不抵抗”

（略）

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略）

对日本民族的看法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日本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曾经和亚洲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相处得很好。中日历史上曾经有着千余年的友好往来，这在历史上是有明证的。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把周围的国家作为掠夺的对象，向日本民众灌输对外侵略的思想，日本民众在那种统治之下，被这种思想所控制，所以当日本一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时候，几乎举国一致拥护对外侵略战争。

日本自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以来，尤其是早期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来，无论胜负，中国都得赔款。赔的款拿到日本，一是用来继续发展军力，二是日本民众也从中得到好处。凡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那些人都被作为神供奉起来，而且到目前仍然领取着所谓的“恩给”，我们叫作“抚恤金”。供奉到靖国神社里的都有。不管是什么原因战死的，不管是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还是国内战争中战死的。所以日本经过半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灌输，整个民族都扭曲了，人民看不起正义。当然日本也有先觉者，也有进步人士，也有共产党在那里面工作，但他们处于少数。特别是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侵略战争的思想，没有受到认真地



清理，战犯除极少数外，大多数没有受到认真追究和整肃。和德国不一样，德国至今发现纳粹的战犯，发现一个就缉拿归案一个，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你多大岁数。在日本，侵略分子可以在靖国神社前穿着当年的军服，打着当年侵略的太阳旗，在那儿耀武扬威，没有人管，日本政府处于放纵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出生的日本民众，分不清历史的真实和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所以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就讲，他烦了，那是我们上一辈的事情，你找我们算什么，与我们没有关系。日本政府之所以这么不负责任，就是因为它整个军国主义思想没有肃清。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日本民族还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不可否认，只不过被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所笼罩。终究有一天，日本会把这个问题摒弃，但是目前，光靠它自己的力量很难把这个问题解决。作为我们被害国家，有责任把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干的那些事实，一笔一笔地清理出来。我们不是为了向它算账，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如何面对未来，这是摆在日本民众面前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课题，而总结历史经验，则是我们中国历史工作者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日本民族对世界的贡献还是应该予以肯定。毛泽东曾讲过，日本民族仍然是个伟大的民族。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但是就是执掌政策的反动派给搞坏了。

我和日本学者讨论过，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各个家庭中有没有这样的家庭：从来没有出过征，当过兵，战死的。他说一个没有。男人上战场，不是战死了，就是最后老死了，女的也要为战争做贡献。这些个家庭，在近代都被日本绑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战车上，所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一开始，就举国雀跃欢呼。女人做挺身队，做慰安妇，青年到部队出征，家里的人报国，回报天皇，支持家庭，整个日本被这种气氛笼罩着。但是把这个问题彻底清理，难度相当大。而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战后美国的政策，对华政策，对共产主义的政策。

“满洲国”——中国人的人间地狱

“满洲国”内中国人民的生活应该说是非常悲惨的。“满洲国”，日本人管它叫“王道乐土”，实际上推行的是霸道。对日本人来讲，它是乐土，对中国人民来讲，它是人间地狱。日本人在国内吃不上，穿不上，饥饿，失业，都推到中国来了。地痞流氓摇身一变，到了中国，到了县里就可以当什么县长、副县长。其他的人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当中，都是发了财的。东北的大好河山被他们侵占，物资被他们掠夺，掠夺到什么程度？粮食叫“组合粮”，就是所有打下的粮食都得交出去。当然也给一些钱，微微了了。其他的物品，重要的，都被征集为战略物资，划到那里去了。所以东北人民的生活是每况愈下，苦难到什么程度？可以对比一下。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时候，它把它自己叫作“五族协和”。五

族指日本人、满族人、汉人、朝鲜人、蒙古人。“五族协和”也叫民族协和。它并不是几个民族，包括日本人，和睦相处。日本人是领头的，他们是执掌政权的。他们把自己喻为优秀民族、天孙、人主，当然要来统治在伪“满洲国”的其他民族。所以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占据主要地位，工薪也高，住房条件也好，交通设施，方方面面都是很好的。中国人，当然也有一些汉奸借日本人的光活得不错，而其他的人民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苛捐杂税很多。到伪满后期，连家里的铜盆、铜壶、铜碗都要被收缴了，连箱子、柜子里的铜饰件都要被拿走，窗子上的铜合叶等也被拿走，去做炮弹。到后期，所有的棉花都充作军用品。老百姓穿的是什么呢？把穿破的衣服绞碎，纺成线，织成布，叫“更生布”。织成后，用手一搓一窟窿。后来连这个都穿不上了。我小时候，在伪满的时候，穿过“更生布”，后期穿的就跟纱一样了。老百姓过年过节，给你一点大米白面，那叫“配给”，你可以吃；如果不给，你吃大米白面，那叫“经济犯罪”，要抓起来。一是吊起来拷打，一是判刑，送你服劳役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中国人民，不论汉、满、蒙、朝鲜人，都是这种生活状况。只有在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人被从中国土地上赶出去以后，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才开始恢复起来。

辽源的煤矿就是万人坑，那儿实行的就是人肉开采。只要出煤，死人没关系，中国人有的是。劳工，在东北、华北征召劳工，把战俘运到东北做劳工，手段非常残忍：用铁丝把肩胛骨穿起来；吃的都是发霉的，而且量很小，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都不行；劳工病了一般得不到救治，有的甚至活着时，就被抬出去埋了。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奴隶，你只要为我干活就行，稍一反抗，就打死。因为中国人有的是，是廉价的奴隶。

兽　军

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手段非常残忍，这就是日本的中枢指挥机关唆使、放纵造成的。你只要在战场上杀死敌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手段至少有250种，在有史以来交战的军队中，最凶残的就是日本军队。日本创造了文明，它军队的野蛮也达到了极点。如果是健壮的人，它可以把心摘下来，蘸酱油吃了。把人的头颅切下来后，用水煮了，把头颅寄回日本，作为摆设，在日军中比比皆是。

具体到武士道来讲，在日本国内也没发展到在中国那种程度。它可以把中国人的肉割下来吃了，就是达到野兽的程度，所以日本军队它是个兽军。到任何一个地方，烧杀奸淫，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国在抗战期间，尤其是无辜的老百姓，死伤的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日本还有一种屠城，不是南京大屠杀时才有，早期的旅大就有。“九·一八”后，侵占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9月15日签订日满议定书，9月16日就把平顶山3217人全部杀掉。后

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进南京后，更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随意残酷杀戮中国人民，这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们曾考察过日本军人的组成状况，大部分也是从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但是这些人征召入伍后，日本军部在教育军人的时候，告诉军人，当你的敌人站在你的面前，你别把他当人看，所以把中国人民不当人看，完全当成发泄的对象。所以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完全是一个没有人道的国家，一个野兽的国家，它的军队就像是野兽组织起来的军队。

孙永勤与赵家庄

讲 述 者：赵廷良（72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老梁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廷良（72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自然村村民，赵林的亲叔伯侄子）：

（以下是在赵家庄所作的采访）

那时孙永勤叫起绺子，他这大旗就在我们这儿插着，写着“抗日救国军”几个大字。南老梁安的大柜，西梁顶安的二柜。在南老梁打死33个小日本子，结果飞机把南老梁炸平了。

一进口，走的毛山，到毛山就给打散了。

毛山打仗，撵到那儿，子弹已经打光了，剩下两个人，在我们这儿被小日本抓住给杀了，把头抬到下板城警察所。我们老爷子和赵满把它们抬着，抬到那儿，挂一大杆子上面示众。被杀的人叫张三，一个队长，是下面小狼窝的家。就在我们这山里的石洞子给抓住的，在那儿猫着来着。有个叫崔永明的给石洞子里送饭，露了马脚。警察署来人，小日本跟着，下板城有个甲长叫胡品卿，他们来这儿，把张三抓住，杀了。张三的脑袋抬走了，身子还在这儿埋着呢。我们老爷子抬中队长张三的脑袋，满街抬，他不去，打他，拿皮带把鼻子给抽掉了。

柴先生会推八门，哪天怎么着，往哪儿去啊，会推这个。

孙永勤管赵文忠的奶奶叫干妈，是干儿子，在这儿拉起的队伍，想把小日本打过承德县去。

那时赵有、赵来给小日本修公路。干了一年，也没给工钱，他们搞出火来了，差点让日本人把他们给杀了。回来后就起义了，打日本。

反正岳老亮让孙永勤给收拾得够戗。孙永勤跟他要枪、现大洋，成驮子给他架出来。要出来后，买枪，买子弹，打日本。那时叫“绑秧”，就是我是大家主，趁钱，他把你绑去，你拿钱就赎回来，你不拿钱，就把你崩了。我是老梁的姥姥家，我正在老梁的时候，把岳老亮绑去的。

岳老亮是病死的，有两房媳妇。

孙永勤他对老百姓也不打，也不骂，他就收拾地主、富农、那些有钱的，别的他不管。穷人没吃没喝的，给家里点现大洋，就跟着他走呗。穷人都跟他走，当兵去。

早上八点多钟从这儿（指赵家庄）走的，上的南老梁。还是柴先生给拆的日子，哪个点走。老梁那儿安的是大柜。这儿（指赵家庄）不是离下板城近，地势也低嘛，打仗容易吃亏，就把人拉到南老梁，要不打死日本一堆？那地势高，一般人走不了，找不着道。老梁是大柜，西梁顶是二柜。老百姓送军饷全都送到柜上去，要不当兵的吃啥。那时别的没有，打的粮食是够吃了，养点军队还是可以的。开始在这儿只有100多人，等发达了，达到800多人。

（以下是在老梁所作的采访）

日本人抓孙永勤抓得厉害着呢。抓着没好，崩了呗。那时可了不得的，那时候在这儿还崩了一个呢。抓住了，就在这儿崩了。他也不管你张三木头六的，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有这人，你比如说，咱们两个人，你要比划，这是胡子，那没好，当时就崩了。胡子就是小绺子。

住姥姥家来着，那时都记事了。那是秋天，孙永勤的军队就把着这个梁，小日本拱上来了。他（指孙永勤）的兵打枪不准也不知怎么回事，日本兵就跟演电视一样，三褡子，扛着机枪，打到半山腰。再上了梁，就没治了，眼看要过梁了，孙永勤带队伍上来，一枪一个，打死30多个，给打回去了。第二三天，日本的飞机就过来了。炸弹哪儿都扔，一气连轰带炸，有的炸死了，有的炸跑了。

小日本就从这个道，往上爬。孙永勤在下板城抓了个翻译官，给带到老梁这儿来了。翻译官跟孙永勤说：“你把我放了，我给你要机枪去。”就把他放了。翻译官机枪没要来，回去报告，这日本飞机才飞来，炸他们。要不报告，他们进不来。这左近，就是这一条道，别的地方进不来。它不来飞机炸，别的地方进不来。在早，这儿没别的路，就顺着阳坡那儿转过去有一条路，别的地方没路。

赵廷普那小伙子岁数小，二十一二子，当绺子跟着走的。好小伙子，挺棒的，给他一个排长，领着一个排。还没结婚呢，是承德县大杖子，那丫头子。



棺材沟，沟口小，里面宽。里头大，外头小，叫棺材沟。孙永勤为什么在南老梁呢？它是个严密的地方，不仅是小日本子，谁上来，他也得走这个道，不是这个道过不去。小日本就给打死在这儿了。老百姓说小日本犯地名了，死在棺材沟。

赵来牺牲经过：有个叫赵福的，那时给“满洲国”办事，说，你们都来，把警察抓住，那儿有大枪32条。让板城街警察署知道了，赵福就叛变了，给调回去。赵来去了，扑空了，让警察给打死了。

回忆爷爷赵林（一）

讲 述 者：赵文忠（59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文忠（59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自然村村民，赵林之孙）：

我爷爷跟孙永勤算拜把子，八拜之交的。那时叫闹绺子，就是打日本人。孙永勤是司令，我爷爷是大队长，反正都是平吃平坐。这儿有个叫赵来的，可能他管钱粮，后来去的。

我爷爷跟孙永勤在南老梁打过一仗，日本飞机就扫射老梁。我大姑也去了，是我爷爷的大闺女。反正他们都乐意，连我大姑都乐意。人都在阴坡藏着，飞机扔炸弹，怎么也扔不到阴坡，都扔到阳坡了。在那儿不该绝，消灭了点日本兵。

我大姑大，比我爸大，我爸当时才十六岁，家务事都是我奶奶操持的。

我大爷赵廷普，长得挺帅，很好。订的河西大杖子的媳妇，还没结婚就跟我爷爷他们抗日去了。走了，就没回来，死在毛山了。

我爷爷赵林、我大爷赵廷普都为了抗日救国死在毛山了。我老叔呢，是我奶奶抚养大的，跟亲儿子一样，抗美援朝打美国佬，死在朝鲜。我奶奶那以后有点顾虑，有点伤心。我们哥儿几个大了，要是当兵，修民工，出远门，都惦记着，都不愿让我们去。心理难受呗，死在外头的人多。

毛山突围后大哥被害经过

讲 述 者：张凤林（84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小东山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凤林（84虚岁，原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敌工科战士，解放后曾任塌山村支部书记）：

那时候，我大哥叫张福存，参加了农民暴动了，参加到孙永勤的部队。他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日本鬼子，对富农、地主实行出枪出钱，农民没枪没钱的出人，组织了一千多人的部队，活动在黄花川、车河口、清河这一带。和日本鬼子作过多次战斗，最后在毛山，让日本鬼子包围了。那次战斗中，孙永勤牺牲了，队伍跑散了，我哥也就回来了，带了一棵枪回来的。我哥就成了地主的眼中钉了，就抓他。有个民团有几十人，这伙人和当地的甲长、保总来抓他，在西院把他抓到了。其中就有我们村一个叫张陈的，我管他叫叔叔。他用什么办法勾结民团来呢？我哥夏天藏在庄外的庄稼地里，他把我哥弄到了屋里，说："张福存，我看看你这个枪啥样的，好不好哇？"我哥想，还应管他叫叔叔呢，就说："你看看。"张臣就看看，就拿过去，他"咔"把枪一拉，撞针就给别折了，对付上去，说："行了，你这枪就这样吧。"他说："我泻肚，我出去会儿，回来咱们再谈。"他出去到庄头，找到地主的民团，说："张福存的枪让我给弄坏了，你们去没危险了，进去抓他吧。"就把我哥抓住了。我哥拉枪栓顶子弹，不管事，不响啊，撞针折了，它还响呀，就把他给抓住了。土改时我们和地主斗争的八块银元，也让他们弄去了，翻去了。抓住我哥后，就弄到院外房后头庄稼地里，让六道河有个叫杨宗宪的，把我哥，给这儿（指胸口）打了一枪。民团走后，我叔伯哥叫张福山，听他直叫唤，就把他抬回屋来了，满炕都是血。第二天，吃完早上饭，民团又来了，要活埋他。在这庄找了几个劳动力，上我父亲的坟地底下，就给他挖坑子。挖好了，就让他上坟地，说："你走不了，我搀着你。"哥说："我走得了。"走到坟地去了。到了那儿，我那叔伯叔叔张陈就说："你躺到那坑子里头。"我哥就躺到那儿了，用一月白色的衬褂把脸一蒙，说："你们埋吧，过二十年，我还二十，我再报仇不晚！"那一年，他二十岁。这么着，把他活埋的。

几个月后，承德警察署来人了，承德县大彭杖子警察所都来了，把我父亲和我找去了。我们在承德县下板城住呢，找来了。因为地主有钱，买通了他们，不让我们再告。"要再告的



话，你们也得不到好处。”这样，人死了，也就拉倒了。旧社会，谁有权力告呀。后来我当兵，1942年当兵，1952年回来的。后来我回来呀，我兄弟在唐山税务局，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去了。中央批到县，让县里处理这个事。主要的是民团的一个团长，处理时，已六十多了。审判员叫王正，我当时是这村的支部书记，他说：“你饶了他吧，就是把他抓到法院，关起来，他能活几天了呀。他六十多了，也活不多久了，让他检讨检讨，认认错，也就中了。”我这人也心软，就说：“行吧。”就这样处理了。

张福存是我亲哥哥，他老大。我二哥也在这儿，是庄稼人，52岁那年就死了。我是老三，还一个兄弟叫张福贵，是老四。我叫张凤林，为什么不起福字呢？为什么兄弟都是福字，我是凤字呢？那时在部队，敌人“扫荡”，我们都是分散活动。我在李运昌司令部的敌工科，后来科长的一个警卫员投敌了，所以在那儿的人都得改名改姓。我说：“我姓张，还姓张，我不改姓，改个名得了。”我原来叫张福生，后来改叫张凤林，这么回事。

“师爷”岳荫臣

讲 述 者：杨印增（76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西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杨印增（76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西沟村村民）：

岳荫臣在当地有势力，当地人都管他叫“师爷”，为人不狠，资本家。

就在大矿后山这个梁，有老项家和老岳家两个煤矿，他们争边界。当时宽城、承德、青龙县都没有，统一归平泉县管，他们去平泉县打官司。老岳家拿西瓜装的银子，老项家拿鲤鱼装的银子。县长说：“鲤鱼没有西瓜大，你们的矿在哪儿？”说：“在小庙梁上。”县长说：“以庙为界。”这庙原在大庙梁的梁上来的，这老岳家回来，一夜之间，就把庙搬到大矿后山这梁上来了，所以这地方又叫小庙梁。他那头找人拆，中间找人递，这头就找人垒。那庙是瓦的，有一间房那么大，一宿黑夜就把庙盖完了。平泉县县长到这儿一验，庙在这儿呢，“就以这儿为界吧。”矿都是老岳家的了。

岳荫臣病死，什么病不知道。他死了以后没埋，就在陆地上明葬着，得几年发引。孙永勤闹绺子，给偷去了。偷到承德县路通沟里去了，搁那去了。就跟老岳家要钱，赎这尸首。结果老岳家在庙梁上有一张老五，胆子大，黑夜摸到路通沟那儿去，把尸首给背回来了。尸首搁路通沟一个炭窑里，没埋，搁那儿停着呢。让孙永勤的绺子兵看着，也不知怎么睡着了。张老五，那大庙梁的，他胆子大着呢。他黑夜去到那炭窑里，给偷回来了。岳家给他不少钱。



王胤淋谈抗日英雄孙永勤

讲 述 者：王胤淋（69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三岔口屯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胤淋（69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三岔口屯自然村村民）：

我父亲就给孙永勤当过兵。跟他走，到大山坡峪，在小刘杖子那儿住，孙永勤在满杖子那儿住。夜里得到消息就跑了，日本鬼子就围攻了。上边也没来得及通知，一放亮，日本鬼子一开枪，全打垮了，我父亲差点没被打死。打散了，孙永勤他们黑夜走了，散了就回家了。我家里的我亲大爷就跟孙永勤走的，死在毛山了，叫王福富。

我听传说，根本不是因为日本鬼子要他闺女、妹妹的，不沾边。根本原因是，孙永勤有民族感、正义感。他是地主，不是地主也是富裕中农这样的出身，生来就不愿意当亡国奴，反对日寇侵略中国。富有正义感，就要跟日本鬼子斗，联络广大贫苦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军，这个目的，为了救国救民。根本日本一开始没到他们家呢，不可能的那事儿。

老岳家那倒是那事儿。老岳家开煤矿，抓民工，用船也不花钱，往承德运，跟汤司令官商合伙害老百姓。孙永勤一看就急了，为民除害，发兵这就打老岳家、老杨家、老任家。哪家为恶作歹，他就找哪家。他是这么一个人，富有正义感，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替老百姓出气，杀富济贫。

我相当佩服，对孙永勤相当佩服。据说孙永勤在塌山，敌人围着，孙永勤在凤凰庙吃了顿饭，不慌不忙地过了河，上了东山了，他也不慌。有人说，他是个什么星，是条狗，星辰下界，命大，那一般的弄不了他。大量的敌人围着，从容不迫地，毫不在乎，富有大将风度。杀富济贫，那是个好人。可惜呀，被当时的亲日派所害呀。联络去口里，被糊弄上当，上了毛山，最后弹尽粮绝，战死了。英勇牺牲，誓死不投降。那英雄，大高个，趁点玩意儿，抛弃了自己家庭，都不要了，都买了枪，抗日。连他妹妹都不放过，有一条枪，也要捐献给队伍。抗日，不当亡国奴，就这么个英雄。

我一小儿记事，就听人讲孙永勤。老百姓都说孙永勤好，抗日的，为老百姓服务、说话的，都佩服孙永勤。

关于有人说孙永勤有勇无谋问题：那不对呀，那是一九三几年，有勇有谋也不中。日寇势力太强大，承德组织什么政府，口里殷汝耕组织什么政府，内外封锁，宋哲元、冯玉祥有勇有谋都不是对手。孙永勤不是没谋没勇，那军师、干部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英雄汇集到一起的，才造成这么大规模。那口里口外的，声势也挺大的呢，不是一般的人物。有勇有谋也不中，日寇势力太强大了。那蒋介石有谋，不是把东三省、热河都拱手相让了吗？慢说一个孙永勤了，那斗不过，势单力薄。要是和八路军接上头好了，可当时支援不上，离得太远。在当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斗得过日本子，那了得？你得认识当时的局势，孙永勤不是没勇没谋，那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比他强大多少倍的也不是个呀。八路军还没起来呢，没过来呢。斗过它了，斗不过日本子。离开时代背景论英雄，那不行啊。

大爷那时家里贫困，也没媳妇，孙永勤为百姓打仗，杀富济贫，就跟着孙永勤去了。走对路了，跟着他干，为穷人打天下，抗击日寇。一直战斗到最后，到毛山牺牲了。毛山战斗时，日本兵使一种毒气，把那些兵都撂倒了。后来日本人上去，照着士兵心口，一个人一刺刀，一个人一刺刀，全部杀死了，就那么干，那日本子。

人人都说在毛山，最后日本放了毒气，都死在毛山了。

大爷死后，家里人反应都很悲观，也没治，没处找去。大远的，消息不灵通，也不知毛山在哪儿，就知道死在毛山了。

据说日本子千方百计引诱孙永勤，和他谈判，不干，不投。和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李兆麟似的，和他同时代的人物一样，都是抗日英雄。

孙永勤的部队过来，路过，人们自愿参加，愿意跟他干。因为他名声好，抗日救国的，打日本、地主的，为老百姓说话的。跟他去了不少，稍微一动员，甚至不动员，自动跟他走，受欢迎，扩大到那样。

那抗日英雄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当时那孙永勤打算入党，都没处找门子去。

大地主没有不挨过他打的，尤其和老岳家打得最激烈。只要把哪儿的大地主财富打下来了，都分给大伙，一散，打到哪儿，分到哪儿。为啥参加他的队伍呢，早就有耳闻了。不认识的也参加他的队伍，杀富济贫，做好事，为老百姓，打地主恶霸。

老岳家那恶霸地主，你这么说，那拉船的，出煤，他不往承德运吗？他不花脚钱，船逮住后，就给他拉一年，上冻为止了。爱给了，就给你点粮食让你吃，救命。船上插着小旗，官船那叫。就这么给他干。他不花运费，就那么霸道。那死多少人哪，那两边河滩，修个大门子，水口，有守卫，夜里船有跑的，那里边，砰一枪，打死勿论。白打死，就那么干。无法无天，官匪勾结，官商勾结，祸害老百姓，老岳家没有好名声。跟这儿老杨家大地主似的，年轻，势利霸道，让孙永勤给收拾了，那人民拍手叫快啊。

杨秀山，地主，和老岳家一样，都属于比较恶的地主。要活着的话，乱棍打死、枪毙。到他儿子这一辈就好一点了，不管事，也比较善良了，不犯众怒。

回忆关元有

讲 述 者：关元奎（82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王宝石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关元奎（82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王宝石村村民，四野老战士，关元有的叔伯兄弟）：

我和关元有是叔伯弟兄，我俩一辈，管他叫哥哥，他老四。

关元有那时候穷，拉船为生。等到孙永勤队伍来，他就参军了。

长瓜脸，个子不矬，参加起义时也就30多岁。孙永勤队伍的旗子是三角旗，黄字，上下写着。

土地没多少，受人剥削，自己拉个船，从滦县至承德，维持生活。等孙永勤一组织起来，人不多呢，一二百人吧，他就参加了孙永勤的队伍。孙永勤是大军长，他是二军长。

他懒得看有钱的剥削者，乐意看穷人。他为什么要参加抗日的队伍呢？他为了穷人翻身，打倒封建主义，推翻三座大山，他才参加的。他参加的队伍也打死不少人是不，在承德老梁一带，在瀑河口一带，在清河，一直到玉田。

他最反对地主富农、剥削人的，好打抱不平。穷人挨欺负，他不满意，要抗拒。我们这儿有一财主，以剥削为主，雇长活，雇几个，吃租子，放高利贷，一米三谷，他跟他干，后来参军了。

我12岁那年，他走的，上的毛山。

上毛山，是受遵化县长蒙蔽。说给他们枪炮子弹，给他们换军衣。赶上孙永勤还有病，抬着椅子上的山。把“新京”的兵都调来，包围了。

毛山战斗惨，死人死多了。村里关元士、关恒发、李起发二儿子、杨德义、关元清儿子、

关元山弟弟都死毛山了。

听到人都死在毛山，家人那还不哭？元士我大哥，我那大娘哭得死去活来。他也拉船的，跟关元有一个船的，跟关元有一块参军。

关元有和其他人的尸首，那不敢找哇，当时都是敌人占着的。孙永勤和关元有的头都被日本割去了，拿到“新京”。

关元有家房，参军以后就被烧了。那时候当了军长了，孙永勤的房子和他的房子都是一块烧的。

关元有的妻子以后嫁了关元敏了，河北的，叔伯家的，早死了。她原来与关元有有一子一女。女儿在东北黑龙江碾子山，小日本时候，移民到“满洲国”的。那时候穷人让你去哪儿就得去哪儿。关妻后夫原来有子女，两人之间没再生育。关妻后来在“集家并村”时被日军所杀，枪毙，1944年。

那时候日本实行“三光”政策，鸡犬不留。只要是“无住地带”，别说人，牲口都不留，赶尽杀绝。

关恒利，是关元有亲儿子，共产党员。参加游击队，在遵化，过河，被伪满军用机枪扫死了，1943年。

宽城岳家庙那儿有个杨佩之，他给孙永勤当先生。原来是教学的老师，那人早没了，要活着100多了。两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吉林，叫杨震岳，后来参军，是团级干部，如果活着，80多岁。女儿在宽城工作，如果活着，70多岁。杨佩之在王宝石小学教学，当时40来岁，会摇卦，出门顺不顺，仗怎么打啊。杨佩之在死人堆里待过，装死来的。全军覆没，四面八方围得风雨不透，敌人特多，咱们才多少人。

杨佩之1948年左右去吉林哄孙子去了。



马春林谈马保德

讲 述 者：马春林（82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马春林（82虚岁，家住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原河北省军区武装部干事）：

马保德大个子，虎虎实实地，了不得呀，一两个人到不了他跟前。

他们原来哥仨，老大马保田，老二马保德，老三马保林。他们做买卖，往口外锡盟，买卖皮子，什么都做。我们庄指望这个多。让日本人压迫得没办法了，这就当了民众。我们庄死在毛山五六个呢。我那时十一二岁。

马保德这庄有一干兄弟，叫马德禄。马德禄当乡长，在敌人那边，回来就投奔他了。他（指马保德）带回来七棵大枪、两颗手榴弹，以后把他出卖了，卖给日本人了。得了钱了，大枪也都交出去了。马保德被抓到城西清风寨，砍了头。以后，八路军过来，把马德禄枪崩了。

我们庄很多人为啥都当民众啊，都赞成民众。打日本，谁不赞成。赞成管啥，一消灭，谁也不敢起头。下去三年，才起八路。民众得有我们村一半人，都是当官的。刘玉春是军法处长，马保德是二头子，除了孙永勤就数他。我们庄掌握着民众的一半力量。马保德小伙子了不得呀，往那一站，威武，个又高，又粗。马保德没结婚。按说应该追烈，真正为革命死的。死了好些年了，谁招呼呀。按说应该追烈，人真正抗日来着。

日本子怕民众，在口外，山大，一打，他们就钻山，没招。最后，挤挤挤，把他们挤到平原地区，站不住了，消灭了。

马志忆马保德

讲 述 者：马志（79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马志（79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村民）：

打毛山我都记事了。

马保德是在南河套子大道上被逮的。

来子之死

讲 述 者：马广兴（2005年时83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马广兴（2005年时83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村民）：

我那时也就十几岁，他们开始招兵买马都在边关外。日本子这儿也攻，那儿也攻，待不了就进了口了。就由东边这道奔大寨，日本子就给追回来了，一下子给追到毛山。毛山是座荒山，啥也没有。围上后，上面飞机照着，下面就炮往上打。那得看是不，都是老百姓，便衣，都死在那儿了。也有跑了的，我们庄跑回来仨呢。我们庄去了不少，都冲二头儿去的呗。这以后也没人了，也就没再组织组织。

那还听不见，都看到了，离这十多里地，就一荒山。



我们庄还带回来三棵枪呢，都交给马德禄了，乡长。不知他交没交，反正没了。马保德回来就在南边大河套躲着，上边就跟马德禄说，要这个人，就派人去大河套给诓回来了，还背着个钱褡子呢。诓回来，就让人捆上了，给弄走了。

关于特警队是否攻打了抗日救国军：那没打，就是日本子。

特警队把当民众的抓来，压杠子，嗷嗷叫。

特警队以后还搬我们庄住来了呢。他们吃日本的俸禄，专门抓民众。都是国民军，日本子一进关，跑不了，投降了。不是本地口音，都是侉子，南方的。

民众是革命的，不骚扰老百姓，就是供吃，就是打日本子。要是稍微等等共产党过来就好了，让人收割得太早。人也不少呢，一两千人呢，整过了半天呢，就这道上。我就在这儿住着，从我们门口路过，就咱们这随便衣裳，都是普通老百姓，有领章。我们庄去了好几个呢，都奔着马保德去的，他不是二头嘛。孙永勤是口外的。

2005年7月

马贺臣，小名来子。

哥五个，来子排老大。晚上跟马保德一块走的，死在十二岭。受伤后被日军刺刀挑死。孙永勤带100多人来慰问，说："我们同胞的哥们，为共同打日本人，牺牲了。"临走，给我妈撂下100块大洋。100个人不过50条枪，剩下全是大刀片。母亲那还不哭。大哥撇下一个三岁的小小子。

马保德双手枪，让国民党诓到大道上，逮住，两个便衣背着钱褡子，把他按住了。那时候死个人上哪儿找去呀。他没媳妇。

打毛山之后，特警队在东双城子安了据点，专门抓民众。在厢房里压杠子，嗷嗷地叫唤。都是侉子，灰衣服，平顶硬帽。调查谁家有民众，压杠子。吃日本俸禄，不是国民党，待了约一年时间。

打毛山时，是日本人打的，掺着中国人，便衣。

2006年4月

父辈们的生与死

——忆父亲跟随孙永勤抗日

讲 述 者：单志华（64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9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单志华家中、河南省新乡市百泉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单志华（64虚岁，抗日救国军第八分队长单忠英之子，画家，国防大学研究生院特聘教授）：

“文革”前，我父亲老战友张守礼经常和我父亲一块谈起当年他们在口外抗日的事情，我开始知道孙永勤将军、我父亲过去的一些情况。更详细地了解是“文革”时期。老人都得交待历史问题。我们老头后来参加了冀东地下党，地下工作直接领导张志全同志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了，“文革”期间，知情的死了，不知情的没法证明，交待问题过程中才了解。

孙永勤将军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文革”期间就视为土匪了。一个抗日的革命队伍，由于当时“左”的思潮，老头在牛棚中得把这历史一段段写清楚。这样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一下孙永勤将军和他前前后后一些起义的情况。

我们老头呢，最早在东北沈阳。他原来是学武术的，跟着沧州的一个萧老师，学武功。小时候要饭到的沈阳，带着他的小弟弟，才十几岁，那时就无家可归了。对一个卖艺的萧师傅很殷勤，就教他形意、气功、轻功。张作霖活着的时候，就把他老师弄到大帅府了，当卫队去了。这样把老头也就带进大帅府了，在大帅府里当兵，搞警卫。张作霖死了以后，他们背着洋钱跑到北票，开始在一个税务所给人打杂，日本抓劳工的时候，抓到板城修铁路去了。

修铁路时，手头不是有几个钱吗，这就到了1933年了，上冻的时候，年根下。孙永勤他们可能是春天的事，他是冬天的事，差一阶段。他就把钱发给弟兄们，喝酒啥的，打成一片。20多人，到年底，日本人应该给这些工人开支，结果让一个日本鬼子把钱全卷跑了。工人一分钱没落着，借这个风，那时候叫丫头沟、小子沟，有一个地方开汽油机，把一工人烧坏了。在猪头山北沟养病，搁那儿养着去了。20多名工人到猪头山北沟去看他。人一集中，日本人就犯忌，去了两个日本鬼子，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当时也听不懂。回去一个，留下一个。我老父亲



当时一看这事，可能要麻烦，当时也没什么政治工作，就拿洋镐把一日本鬼子给刨死了。这不出人命了吗，日本鬼子给打死了，他就说："兄弟们这么说吧，你们留下来，得让日本人给挑了。要想活命的，不当亡国奴的，跟着我走。"在这之前，有一个姓洪的，孙永勤将军部下，在铁道线活动。在小酒馆喝酒时，他和我父亲交上朋友了，透露他是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让他可能的时候，把工人组织起来，投奔抗日救国军，有这么一个约定。这不把事办了，这边把人杀了，枪一拿，大家跟着跑了。没有人留下来，留下来都是死，上山了，奔老梁山去了。到老梁山那道上，日本鬼子已经追下去了。以后，姓洪的，下面枪一响，上边就接应了。到了山上，让孙永勤给编成了第八队。他们是最后一拨，都是年轻人，都是铁道工人。他会武术，枪法又好，原来七个队，又编了一个，八个队。

（单志华之子单健插言："九・一八"后，东北军散了，一部分往北走，抗日，退入苏联；一部分往南走，爷爷往南走。）

老头在"文革"前说过这么一件事，什么事呢？他部队里也有不遵守纪律的，改编的，可能有点匪性，让他们弄一沟子里，把那几个全部枪毙了。军纪特别严明，不许干扰老百姓，不许强奸妇女，不许夺老百姓的东西。

还讲过，逮住日本两个俘虏，由我父亲出面，代表民众军，在黑河还是潵河接交一车弹药。那时没有枪弹，完全靠这两人换机枪，换弹药。有这么一个谈判，下雪天头，两边都支着枪，就在中间谈判交接。

还有趴雪地。老头酒是会喝的，就那葫芦，趴雪地，打伏击，一趴就是多少个小时啊，全仗着酒暖身子呢。所以老头一生没断酒。

沦陷区，日本人封锁得特别厉害，全仗在日本鬼子手里夺点弹药。另外呢，老百姓也特别贫困，孙永勤他们的吃、辎重呀就遇到了困难。《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整个遵化、迁安、山海关这一带不都成了日本的特区了吗，在这时候，遵化有个伪县长，具体叫啥我想不起来了，告诉他，当时咋意思呢，给东北孙永勤报信说，这边比较空虚，也比较富庶，另外，辎重、弹药啥的好解决，准备供他多少弹药抗日。这很有吸引力，他也为部队发展不是，决定上长城沿线发展，靠燕山山脉和敌人周旋。遵化不就在燕山脚下吗，结果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我父亲这支部队人比较年轻，体力棒，所以就作为打阻击，在黑河川打阻击，保护大部队撤退。第八队基本上边打边撤，边打边撤。大部队撤进来后，先到的大寨、小寨屯兵。从洪山口进来的，进来以后，打了一仗，然后到的大寨、小寨。到那时，就被围住了。敌人组织了很多兵力，承德、迁安、古北口，这一带的日军全部集中在遵化，由大圈到小圈围，最后由大小寨撤到毛山。等到我父亲他们从大小寨追下来的时候，孙永勤他们已经朝毛山上撤了，我父亲他们就向毛山集中。孙永勤他们大部队被困在毛山上了，我父亲他们困在毛山旁边一个圈，伪军的

圈里了。孙永勤他们让日本鬼子套了两圈。上边是飞机，把毛山山头都炸平了。我父亲他们在对面山头看得清清楚楚，最后在全军覆灭的时候，人死得太惨了。到底是多少人，具体数字也搞不清了，我父亲他们剩的人也不多了。抗日救国军到最后的时候，把日本俘虏拉出来枪毙了。孙永勤亲自枪毙的，之后把白马打死了，然后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我父亲他们朝外闯，就剩四个人了。闯到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有一个汉奸队的队长还有点中国人良心。我父亲他们把枪藏到三里店，打扮成老百姓朝外走。一看他们，知道是民众，把他们给放了。知道他们是爱国的战士，把他们给放了。我父亲他们就跑了，夜里跑到北二里庄。我父亲听说，受伤的、被俘的民众有好几十人，全部绑到侯家寨，那儿有一河，一个投降的没有，全被日本人挑了，都给推河里去了。我父亲他们四个人怎么出来的呢？有一个叫曹万林的，卖皮货，给一个叫张志全的［单志华此句话未讲完］，张志全、张守礼他们可能和共产党沾边，张志全是共产党，但是他们在山上没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们不是从山上跑出来的，是大部队进关时，这两个人蔫溜了。四个人当中有个叫曹万林的，是遵化北二里庄的农民，跟我父亲他们在山上，临散的时候，哥几个拜把子了。同甘苦，共患难，一定闯出去，跟日本人干到底。四个人被吕队长放出后，就到了北二里庄曹万林家。他家特穷，也没吃的，就藏在白薯窖里。冬天，全是单衣，衣服褴褛，也没被子，大娘也是瞎叽叽的，穷得不得了，弄点棉花套子睡觉。那时候，我外祖父是满清的秀才，那一带的绅士，是东二保的保长，思想比较进步，以后也给共产党办了好多事，开明绅士，博古通今。一看，知道民众在曹家藏着呢。都是一姓不是，就周济他们，给点吃的。总猫着，也不是回事，经商量，兴隆张维利，还有一个迁安的，两个人回家了，就散伙了。唯独我父亲，老家是东北兴城人，老家没人了，跟孤儿一样，无家可归。咋办呢，就跟曹万林家一块过。总得活呀，他看到城里有做洋铁壶的，就把人家扔的破铁壶踩巴踩巴，鼓捣鼓捣，要点手艺，给人焊点活，做个壶，勉强维持生活，帮助曹万林他们过日子。我外祖父看上这个东北汉子了，就准备把我母亲给我父亲。这一来，让一个村里的汉奸不服气，觉得我父亲，你一个东北的要饭的，他知道我父亲是抗日救国军，在我们这儿娶媳妇，我母亲年轻，还挺漂亮，大家闺秀不是，这还没结婚呢，刚有些舆论出来，就去城里给告了。特务就说，单掌柜的，县政府有点活，你给干干。他们已经透露了，这人逮，不能直接逮，有轻功、气功，是武林高手，得想办法。我父亲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担着担子就去了。一进头道门关头道门，一进门，大杠子就架上了，多少个小伙子，上去就把他按住了，绑起来。那时，还没有交给日军，交到伪政府。有一个翻译官，我父亲怎么出来的呢？先给他灌凉水，压杠子，没说。后来把曹万林带了出来。原来他们抓我父亲的同时，把曹万林也给逮住了。曹万林一压杠子，不行了，说单忠英是我们领导。我父亲一看，就认了，但心生一计，说我是抗日救国军八队队长，但我身为中国人，打的是日本人，不像你们给日本鬼子当汉奸。你



们看着咋办吧。说那你招吧，就说我是坐地户，有多少把手枪，多少杆大枪，多少两烟土，那时是作为他们的一种经费，多少洋钱，说了不少。说你态度挺好，帮着我们把它们起出来。我们老头年轻，见过世面，在大帅府里当过卫队不是。他对翻译官哈哈一笑，说你是东北人，我也是东北人，你不想让我活，我总得拉个垫背的，死了咱们做个伴啊。你倒卖军火也是死罪。你报吧，东西没有。你把我交日本人也是这套，你倒卖军火，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破枪筒子，曹万林已经取出来了。日本翻译官一看，你比我还能耐，不行，把他交给日本人，他铁嘴钢牙，我也完了。跟日本人讲不清楚这些事不是。说，那把他先押起来吧。押大狱里了。里面并没怎么受罪，有一个叫张福的，他哥哥是遵化人，看狱的，也挺敬重我父亲，还经常弄些酒、猪头肉啥的，不让别人看见，偷偷给我父亲吃。我外祖父不是东二保保长嘛，像曹万林等都得保出来。就从庄里弄了100块现大洋，把曹万林先保出去了。里面传出话来，得一个一个保。曹先保出，对我父亲也没啥法了，看也没啥油水可榨了，也不敢交日军，最后就把他给放了。这100块大洋保出两个人来。保出后，我父亲就搬到城里和我母亲结的婚。后来张志全、张守礼到城里办事，一看见我父亲："哎呦，这是我们部队的老单哪！"这以后我们家就开始做冀东联络站，锄奸组的联络站，天天在我们家开会。我父亲以后就搞地下工作了，跟冀东联系上了。

我父亲平时不爱说话，给张作霖当卫队这事一直没说。要说了，"文革"中得打死。

我父亲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处伤，有刺刀伤，有枪伤。死里逃生，跟随孙永勤抗日时，侥幸活了下来。

经常拼刺刀，要没轻功也完了。四个人围攻一个人，拿枪把一杵，人就飞出去了。得有轻功，没点功夫，几个单忠英也没有了，但深藏不露。只有遵化一个武林高手王广生跟他握过手。有一个萧先生掰过腕子，给扔柜上去了。

会武术的人嘴都特别严，老是不爱说话。历次运动那么整他，他都不理会，这东西见多了。

此事不是我父亲亲眼所见，据说，日本人把孙永勤尸首弄到十字路口，搭上灵棚，在遵化的日本军官全部为他守灵。日本也看他是中国一条汉子，他们也用这种方式教育他们自己民族的人。

父亲对孙永勤的评价：第一个是爱国，第二个是义气、仗义，第三个是有勇有谋。父亲到死也佩服孙永勤。

父亲功夫情况：杆子朝地下一戳，也不埋上，找重心，咔咔就爬上去，再爬下来。

70多岁的时候，从医院出来，跟孙子玩，这么厚的板石，咔，切开。

当时的失败不怪孙永勤。在那种大的历史环境下，国民党军撤了，红军还在南方反"围剿"呢，在那种大兵压境，日本人动用一切兵力集中对付东北抗日势力的时候，再没有吃的，没弹药，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持一年半，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能够坚持一年半，若无勇

无谋的人根本办不到。他要无勇无谋，就不会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当卖，然后揭竿而起打日本。这个举动，应当说在当时来说，长了中国人的骨气。什么叫中国人，让日本人也知道知道。不是有勇无谋，是有勇有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多少人能做成他那样？连蒋介石都败下去了，能坚持一年半，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孤军作战哪。

建国以来，我们党内的毛病啊，现在它把国民党军队的薛岳啊等等的都弄出来，说是抗战的英雄，它是为了统战。对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不沾边的这个，共产党不太关心，这是可悲的事。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像孙永勤那样的死去的烈士，那些真正的民族英雄，连块碑都没给人给立，谁来纪念他们？毛山那么大战役，死了那么多人，谁去吊唁过？谁去给烧过纸？谁去上面给立个碑文？

民族英雄孙永勤，这是河北的荣耀啊！

一米九的大个，长方脸，有点浅白麻子，高鼻梁，厚嘴唇，一脸英气，真是一条东北汉子。

我父亲他们那几个队长，枪法都厉害着呢。打绳子，绳子一挑，当一枪，打断了。砖一扔，打飞砖。我们那时候当民兵，打靶，我父亲说，打靶还那么打，瞄准，我们都手一抬，砖就下来了。都不得了，那拨人很多都是打红围子出身。打红围子，就是打猎的。我父亲他们是铁路工人，还有一拨子农民。

我父亲说过这话，四五个日本人，别看他凶，搁不住拼。一个人对付四五个子没事，个小，力气还是不行。

我父亲说，对付日本人，你要是熊了不行。他说，日本人不退缩，拼刺刀时，他玩命，使笨劲，咱们是巧劲。会武术的，他当然可以这么说了。四五个日本人围住的时候，要是没有功夫，不完了。他拿枪把子，地下一点，人就飞出去了，跳出去了。

不可怕，啥都怕恶的。你比他还恶，他也害怕，人都怕。他说过这话，像狗似的，你越跑，它越汪汪，越追你。你真要盯上它了，它就向后缩。老头说，日本人跟狗似的，柴狗。

你像我父亲这么说过，杀鸡，我们家谁都不敢杀鸡，都送人，我说战场，他说，战场上杀人，跟这不是一码事。杀红眼，一刀砍一个，一刀砍一个，都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些会武术的人，战场上跟日本人打起来，红眼，真的是红了眼啊。自己挨一刀，挨一枪，我父亲身上七处枪伤，连刀伤，哪次也不知道，当然都没打致命地方。都是事后了，才知道流血了，疼啊。在东北的时候，天太热，连治伤的药都没有，伤口都烂了。那时候，就用火烫，用盐水杀，疼一阵，叫唤一阵，过去了。当然这都不是他一个人身上的事。

冬天喝酒，酒葫芦背着。为啥学会喝酒了呢？酒撂不下呢？要不浑身都是病啊。他说，在雪地里趴着，身上衣服少，就那么一破羊皮，要是再没点酒暖暖身子，人早就顶不住了。那时候没军衣，就是老百姓的衣裳。不像八路军还有正规服装啥的，他们那部队没有那条件，都是



家里带出的衣裳。

整个的山头给炸下一两米啊。上面飞机照着，下边炮往上轰，周围全是日军，出都出不来，炸都炸死了，人都炸死了。向外闯一部分人，也没闯出去，几道圈啊。我父亲他们就侥幸，打阻击的，围在外圈上了。如果围在里圈，也出不来。

都混战在一块了，最后搅到一块了。向下冲啊，突围呀，冲不出去啊。炮都打成那样了，日本人集中了好几个地方的兵力，连炮带飞机，下多大功夫。差不多，冀东来说，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共产党在冀东，日本人也没动用这么大的兵力呀。那时候共产党主要是打游击。

上边飞机炸，下边都是山炮，像纳鞋底似的，把毛山炸得一片火海。他说不要拼刺刀啦，就拿炸弹就把整个人都炸飞了，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

那都是石头山，藏都没处藏，太惨了。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只有向这儿退了。最后像狼牙山五壮士似的，哎呀，太壮烈了。我们老头也不愿聊这些个。聊也没啥用，他说，谁还拿过去的事当个事。生活一幸福了，还回忆过去事的人就少了。

孙永勤自杀是因为不投降，不让日本人逮活的，与战士共存亡，他就是这个心理。他不说，心里也是这样想。他不当汉奸，要说当汉奸，日本人敲锣打鼓，还不得抬他来，吃香的，喝辣的，还得给他一个大官。他自己要与部队共存亡。

汉子！血性汉子！如果不是血性汉子，他不可能在整个东北都沦陷的时候跟日本人玩命。就不当亡国奴，不服这个劲。那孙永勤是个富户啊，他不知道享受富裕的生活？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全变卖了，然后抗日，有几个人哪？他要没那么高的威信，全庄人都跟他起来？我父亲他们几十人都这么心齐，都跟着他上山？那时就是不服日本这个劲，不当亡国奴。那时候，当亡国奴那罪也不好受。

对于死，他们没有那么深的概念。死和活，就一个界限，非常简单，它非常简单。今天这吃着饭呢，明天就少几个哥们喝酒。今天他倒下来了，明天你倒下来了，不知道哪天就完了。谁不知道死啊，要怕死，能够干这个吗？

还是好意，还是歹意，反正把他诓进来了。进来以后，让敌人围了。因为在关外吧，气候条件特别恶劣，经济情况也不好，如果能够得到长城南面的支持，弹药和枪支，吃的啥的，然后再跟敌人打，这也不是坏事。没想到，进关之后就被敌人从很多地方调来兵力，把他们围住了。

那漂亮仗没少打。打伏击，他们打伏击多。老头叫口袋，入葫芦，进口袋嘛，往往设个口袋。他经常说，日本人也像瞎虻子一样闯口袋里去，几十、上百人就给消灭了。只要入了瓮，入了罐，谁也跑不了。什么炮车，什么机枪，啥都不管用了。

这就要辩证地看，孙永勤如果是一个土匪，日本人可以争取他。如果是一个笨蛋，日本人

不会动用几个地方的部队来对付他。孙永勤对日本构成的威胁太大了，所以动用了好几个地方的部队，多少门大炮，还有飞机来打孙永勤。这么辩证地看，孙永勤绝不是有勇无谋的人，只是命不行。人得占天时地利人和。那时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国民党没人支援他，共产党支援不了他什么，孤军奋战，当时那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下，不用说坚持一年半，就是几个月，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都说张守礼当时没上山，他们在从关外朝这边转的时候，他就没跟大部队走，躲到老乡家了。当时说闹病，所以以后见不着张守礼了。以后也没见着张志全。张守礼躲老乡家以后，他自个卖皮货，回到了关里，他是这么回来的。

孙永勤失败的原因：太相信伪县长了，太相信他了。不过，我父亲说，也别怪他。因为那个时候，吃的粮食几乎断顿，他们都吃草根了。那时候要有点粮食，他可能也不会走这步，是逼上那条路了。吃的没有，弹药不多，人家说给点装备那又合理，于是就进来了。我父亲崇拜孙永勤，说他不愧是一将领。他曾说，都说是因为孙永勤指挥上的错误，才导致后来的失败，他说这个事搁到我身上也可能出现问题。你说什么吃的都没有，这么多的队伍，他得想办法解决呀。他不解决，部队存在不下去啊。又不让抢老百姓，他要是让抢老百姓还可以，他不能抢老百姓，要抢老百姓，也备不住真把你当土匪了。所以这种情况，我说不是孙永勤的过失，是那种整个大趋势的结果。我们党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父亲只说，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南撤了，整个冀东地区是个空白区，或者叫“非战区”，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对中国人下手。老爷子说了，到那时候知道什么是汉奸了。事实上，确实上当了。但确实这帮子人没对孙永勤将军有什么怨言，我父亲到死那天也没说孙永勤在战略上的错误。

对孙永勤的评价：不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日子过得好好的，要当个汉奸，绝对那日子过得很好，再咋着，他也弄个一官半职。他为什么把家产全部变卖，最后落啥结果？不就是为了民族抗战嘛！那就是中国人应该有脊梁，应该有中国人的脊梁。在民族传统上是精忠报国，他对孙永勤的评价，就是一个精忠报国的英雄。从没有说孙永勤打败仗，他不承认败，我们老爷子到什么时候也没说他们的仗打败了，这败字不说。那就是在特定环境下，能够走到那步那是必然现象。如果要是能够取得冀东这边的支持，他也不至于出现后来的结局。只要给他们粮食，给他们弹药，接收之后，他们准备还是回到山区，与日本人打。原来是这么考虑的，取了弹药，有用的了，上山，不能在平原待。我父亲说这是在会上定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都是中国人，哪知道真是汉奸。

我个人这么认为，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时候，能够不做汉奸，能够举旗抗战的，本身这就是精忠报国。在关外那样的气候条件，关东军把东北四省全都占了，长城以南是“非战区”，“非战区”实际上还是被日本人控制了，周围全是日本人，在侵略军四面包围的情况

下，能够坚持一年半的时间，那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能够在关外那个环境坚持那么长的时间，那是了不起的帅才，遭到全军覆没，这是必然的。不管是谁在这种情况下都没办法。我说孙永勤将军那就是一个革命的先驱，革命的烈士，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牢记。如果我们忘记他，那就是民族的罪人。忘掉孙永勤本身就是民族的罪人。

在侯家寨挑了那么多人，这都是烈士啊，太不简单啦。

孙永勤当时领导有方。虽说没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他能够利用他的侠义，利用他的身先士卒影响他的整个部队，打仗打得很漂亮的。不是说瞎打瞎冲，在军事部署上是很了不起的。孙永勤那是双枪，他在那当头，那可不是说给你部队派一个党的政委，领导思想政治工作行，枪不会打，那可不行，孙永勤都得比他们高一筹。那队长都比队员本事大。孙永勤部下有很多是打红围子出身，枪都打得好着呢。

父亲说，孙永勤打仗很巧的，不是蛮干的。像那种环境，蛮干的话，几天就完了，还用日本人费这么大事。日本人把他恨坏了，他就是东北当心这么一个钉子。

他虽不是专业军人，但他的队伍里头，像我父亲他们是专业军人，他们在东北军里干过，什么子弹、什么炮都知道，战术他们也都懂，不是说都是蛮干的。

在孙永勤问题上都有愧于祖宗。哪怕一方面军队，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去救他，这支部队绝对能存在下来。没人救他，谁去救他？到卢沟桥事变还有多少年，好几年哪。能坚持那么长时间，谁也不要吹牛皮，随便拉一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如此。你说谁谁谁能打仗，把他搁那儿，没人支持他，最后他的结果一样。你说在关外，好几千人哪，那部队好几千人，那吃喝拉撒睡这事怎么解决呀，这些人得吃啊，得穿啊，打日本得需要弹药，所以没有点巧劲，蛮干，那不可能存在。我说能存在几个月就是不得了，何况是一年半。

那时候全在打日本人。日本人笨，老爷子说掐头去尾打当中，掐头去尾打汽车。他说，两头一打，车就不动了，塞住了。然后呢，在当中打，一冲就散。日本人也搁不住巧打。打出瘾来了，这些人反正大圈小圈下套，日本人吃他们亏也大了。要不说日本人恨孙永勤，他是日本人的眼中钉。

我父亲他们那时候子弹少，打仗时，经常得拼刺刀。日本鬼子受过训练，他那个刺刀力量非常大，像狗熊一样，他一刺刀扎过来，你要是拨不过去，那就完了。拨他那个刺刀，是个寸劲儿。把它拨过去，日本鬼子就到你跟前了，这时你就要把他干掉。根据情况，有的时候，直接刺刀解决。有的时候是踹，踹他大腿的位置，马上他就瘫了。要不就踢他的裆，哪一脚，踢在裆上，他马上就尿了，然后再刺。中国人拼刺刀得讲武术，他们平时也训练这个。不讲武术，光是按规矩拼刺刀，那不行。

日本人没啥可怕。开始的时候有点犯怵，弄几回，一看不是那码事。日本人也就狗一样，

宰他们也就如宰鸡。那时候打起仗来，没有人说："哎呀，我这一刀下去，把人杀死。"你不杀他，他杀你！那时候都那样，再善良的人到那时候都眼红了，都杀木了。你说这一仗打下来，回去说杀了几个人，有的时候都犯迷懵了。那时候一打起仗来，拼刺刀都眼红，没人敢说自己活。没有人说这场战斗我得活下来，根本没那思维，什么都是下意识了。赶上这一枪，挨上这一刀，死了就是死了，活了的捡了。没有那么多想法，很简单。那时候不这么死，就那么死。反正知道早晚都得死，赶到最后，对得起中华民族得了，那是大道理，咱们像个中国人样，活着像个中国人就行了。老头就说这个，到这时候你怕死也没用，到那时候也没人怕死了，都红了眼了。那时候人比较朴实，那时候说："咳，像个中国人样，死了也不会后悔。"他们那时候也没什么政治工作。

昨天还在一块喝酒呢，还热闹呢，第二天就死了，死尸都抬不回来。伤心哪，伤不过来啦，没准明天就排上他了，后天就排上我，这玩意，哪有准？我父亲说，跟他一起起义的那伙子人没剩下几个，大部分都牺牲了。

打伏击的时候，在雪地里一趴就是一两天，都不能动。吃的也没有，有时候弄点松籽，有时候到大雪里扒东西吃，把草根都吃了。粮袋是空的，子弹也不是那么一排搁在身上，掀盖都是假的。

我们老头一生的嗜好是爱喝酒，这酒离不开就在那时候。不喝酒，就搁关外了。那时候，趴雪地，破帽子，还有个破羊皮袄，东一块，西一块，向身上鼓捣呗，没有就活不下来。哎呦，这么冷，冷就喝几口酒。哥儿们几个拿葫芦，你来一口，我来一口，挺乐乎，开个玩笑，拉个家常。这些人活得不是一天到晚的紧张，有时候也放松。弟兄们在一块，特别有感情。解放以后，他那几个弟兄到我们家，说哥，到你们家了，没这话，他们都是随便去来，没钱拿钱，没吃的吃。那时候的感情特别朴实。

我父亲说，孙永勤让他作为代表出面去谈判，八队一部分人掩护着他。具体什么地方记不清了，一个大雪天，那边日军的大官挎着刀向这边走，他们向那边走。走到当中，在一块谈，结果是谈崩了，谈崩了，人就撤了。他要了他们机枪多少挺，步枪多少支，还要小钢炮。可能是在要小钢炮、机枪问题上谈崩了，没弄成，但是没伤亡，都撤了。看两边，当时实力都挺厉害，那边保护日本军官的火力挺强，这边保护他们的也是把最好的武器都拿上去了。没谈成，日军不能接受。

我说你们负了伤咋治的？他说啥治啥治，烂死拉倒。一看流血了，有的时候把这刺刀烤红了，烫。要不就是火炭烧。要不有盐的时候捏点盐洒上，不长蛆。那时候没药，急缺。即使有点药，不论是从药铺买的，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的，队长们也不能先使，得让着。治病不搞特殊化，吃饭不搞特殊化。孙永勤跟大伙吃的一样，他那大个子，彪形大汉，饿那也得忍着。要不他能够把部队带下来？要是官兵不一致，这早散摊了。那儿吃树皮，这儿吃米饭，那还平衡？



他们那时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思想，但是明白要官兵一致，受罪咱们一块受，有福一块享，弄了罐头咱们一块吃。我父亲说，当队长的，弄了好东西你先掖起来吃，那当兵的肯定不服，不服就乱了。

我认为孙永勤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中国人现在就缺乏他那种精神。如果都能像孙永勤那样，今后谁还敢侵略我们的国家！中国人再富裕，别忘本，别忘了过去的那些个烈士们。

作为孙永勤来讲，他不知道钱是好的？如果他没有爱国主义思想，没有精忠报国的精神，他日本人侵略侵略呗，我家日子过好了得了呗，你杀杀，别杀我们家得了，是不是？他不这样，他把自己的家产变卖，然后投入了抗战，这一点，现在值得人深思啊。在军事上，他虽不是行伍出身，但是他非常有文化有头脑，那不是一个土包子，打仗很巧啊。当然我没见过，我父亲说他打仗很巧。失败，失败也是胜利！

迎着日本兵，冲！

——爷爷的抗日岁月

讲 述 者：单健（38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9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单志华家中、河南省新乡市百泉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单健（38虚岁，抗日救国军第八分队长单忠英之孙，单志华之子）：

我爷爷腿上、肩膀上有好几处刺刀伤。我爷爷给我们看，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刺刀刺的。"我们问："怎么刺的？"他说："跟小日本拼刺刀时刺的。那时候，我们哪有子弹呀，就是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我往前冲，他往这儿来，当时就那么打。"

还有小时候，我和我兄弟拿着秫秸秆玩打仗什么的，他告诉我们怎么拼刺刀。他说："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牛气着呢，他跟你同归于尽似地，直接奔着你就过来了。"他拿过去那秫秸秆，"你得这么搪一下，然后再回过来刺杀"。他说："头一下你要拨动了，日本人也就白扯了。就那一下，你顶住了就行。"

给我印象深的，是在山区里，那时他们二十多岁，年轻，每天在冰天雪地里睡觉。"每天早晨一醒来，"他跟我说，开玩笑，说，"你们这一代，知道啥叫生死？我们那时代，每天早晨一醒来，一摸脖子，'哎呦，感谢老天爷，我又多活了一天'。"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咱们生活当中，几年、几十年以后怎么活都提前计划出来了，他们那一代人，多活一天都要感谢老天爷。

我们那时对枪感兴趣，问爷爷："怎么跟日本人打仗啊？"我爷爷说："枪打一口气。"我们说："你那时当队长，有枪吗？"他说："有枪，没用。"他们那时候，除了孙永勤，都使大枪。我们问："你是当官的，干嘛还端大枪啊？"他说："小枪没用，那是一块铁疙瘩，没子弹。"我说："大枪呢？"他说："大枪大部分时间也是空筒子，就是有刺刀，就是拼刺刀，有的时候有几发子弹，就是这样。"我说："你们跟日本人打，打得过吗？"他说："不是打得过，日本人也是人。他们在山里清剿，不知怎么的，呼啦一大堆冲锋。"他说，"冲锋时，你不用害怕，就瞅住头边几个。你不有的时候有几发子弹吗？你当当当把前面三四个给打倒了，后面的那帮人就不敢上了，叽哩滚蛋的跑下去了。日本人连鞋都跑丢了，背包都掉了。在山上往下跑，可不叽哩滚蛋的，连鞋都跑丢了。"

还有机关枪，有时候他们需要打冲锋。"冲锋，你就掌握这个规律，三八枪打枪的时候，



你就听耳边‘刺刺刺’的响，你别理它，那是老天爷给你定的，你要是挨枪子的话，就挨上了。你得注意躲那歪把子机枪的子弹，它是一节一节的。打的时候，突突突突，然后得换子弹。你得抓住它停那一空档，往前跑一段。响起来，你再趴下，停时再起来跑。”

“冲锋时，你得注意躲心脏。领头冲锋的时候，你把右肩膀靠前，心脏靠后，往前爬的时候，也这样，活的几率就高点。那时候，天天看死人，都麻木了。”

他们的生命都是以一天一天为计算单位地活着，不像咱们一年一年地或者半辈子都计划出来了。“活一天是一天。”爷爷一般是我们在院子里玩时，他看着高兴，就讲一段。

我们是小孙子辈，听我爷爷他们聊天时说，我爷爷那时候年轻，有时候，行军的时候看见村里的女人，看两眼，我爷爷说，哎，一咬牙就过去了。就这样，想过凡人的生活，但是骂自己不可能。有没有纪律，不知道，但是多少是自制的，不像土匪扰民，这种情况好像没有。

我爷爷对自己这段历史很自豪，但是他很保守，平时大部分时间沉默寡言。

他们入关的时候，退进关里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子弹了，有子弹的也不多，就是陷入绝境了。我问他：“那你们怎么打仗啊？”“怎么打仗呢？拼刺刀呗！就是拼刺刀。”我问：“你们怎么拼刺刀？”他说：“跟小日本拼刺刀，你要研究小日本的特点，然后有你的一个方式。你像我们在东北军的时候，那种正规拼刺刀的方法跟日本人是一样的。他冲过来，你用枪的上半部拨他的枪一下，然后再刺他。但这个跟小日本用，没咒念。日本人冲刺的时候，力量非常足。十几米之外他就发力，就跑过来了。越跑越快，直冲着过来，一条线地就过来。你想这么一拨，根本拨不动，直接把你前心后心给穿透了。所以那种正规的拼刺刀的方法用不上。我们那时候研究了一套新的办法，那新办法怎么回事呢？”他给我讲的时候，就从院里拿那个秫秸秆。“是这样，日本人来的时候，他是一条线冲你来的，跑得非常快。他的特点是有劲儿，但是他不容易变线。所以你端枪的时候，你这么端，别冲着他这么端。等他枪过来的时候，你身子是往左拧，同时把枪呢往左搪。你把他枪搪过去以后，他的半个身子就都露在你刺刀前面了，你再一拧身肯定把他扎坏了。然后你顺势右腿这么一踹，就可以把刺刀拔出来了。”他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拔刺刀必须要快。捅进去以后，一拧一踹，刺刀自然地拔出来了。如果你要不那么做，你一下拔不出来，第二下想拔的时候，另一个刺刀就冲你过来了，你就躲不开了。还有一个办法，他直线过来以后，你端着枪，枪托向上，身体往右拧，拧的同时，用枪托搪他的刺刀，往右搪。一搪过去以后，他整个的脸就对着你的枪托来了。你马上往回拧身，冲着他的脸，往左抡枪托。一枪托砸脸上，肯定把他脸砸扁了。你就甭管他了，这个人肯定丧失战斗力了，我身后的弟兄们就把他解决了。不理他了，往前冲，接着对付下边来的那个。”他是这么给我讲的，讲的时候，他是面带微笑。用这两套战法跟日本人贴身近战的时候基本上不吃亏，他们得到甜头，所有的兵都是这个打法。不直接跟他硬顶，

躲，躲的时候拧身。问题是选的时间必须要准，你稍微晚一下，你的肩膀就挨上了。你躲的稍微大了，你的枪的劲就跟不上去了。就是一个小拧身，枪同步往外一拨，然后直接捅过去，这才行。我爷爷给我讲的时候，那眼珠儿发亮，好像一下又回到几十年前年轻的时候，就好像正在迎着那日本兵冲上去，就那种感觉。平时都是很和蔼的一个老头，挺和善的，但是就那一瞬间，他跟我说的那一瞬间，表情、眼睛里面的那种光芒让人感觉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年代。那时那地，那种拼刺搏斗的状态都有了，这给我印象特别深。

“日本兵啊，小鼻子，东洋小鼻子。什么关东军厉害呀，我怎么没看出他们多厉害，我们打仗的时候不吃亏。那些日本兵冲锋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怕他们。你就沉住气，你知道你的口袋里就几发子弹，但你要是把那几发子弹利用好了，趴那儿沉住气，当当当，就照着头上几个给打倒了，只要响一枪倒一个，响一枪倒一个，他们就都受不了了。你要是乱放枪，他们不害怕，但是你放几枪就倒下几个人，他们那个精神上就受不了了，就崩溃了，就得往回跑。叽哩咣当，乱叫乱跑，那乐着呢，乐着呢。看他们跑乐着呢，可乐着呢。鞋也跑丢了，那背包、手雷什么的到处乱扔，叽哩滚蛋地跑下去。一跑下去，至少俩时辰他不敢上来。”他这么给我讲的，“小日本！”

那时候，我还问爷爷：“你是八队队长，你手下有一堆人，那你怎么当领导啊？”他说：“那怎么当领导啊？”我说：“你有枪吗？”我爷爷说：“原来有枪，小手枪，后来都扔了，都不要了。那不行，不管用。我们都拿大枪，我们当官的也都是拿大枪，上刺刀。”我说：“怎么领导啊？”爷爷说：“怎么领导啊，这帮弟兄都看着你呢。你往前走，他们就跟着你走。你往后撤，他们就跟着你撤。你怎么做，他们就跟着你怎么做，这就是领导。反正大家要死一块死，活的话一块活，就这样。”

那时我特别关心射击，打仗时怎么瞄准，怎么射击，什么是枪打一条线，我爷爷说：“那么打枪，那你早完了，早吃枪子了。一般就是抬手一枪。枪打一口气，抬手就是一枪。”我那时候觉得爷爷神了，不瞄准就能打。那时候我还不太信，以后看奥运会，看枪手打飞盘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瞄，就完全是一种感觉，抬手一枪。我爷爷说，那时候经常打的是遭遇战。他们在山里面转，日本鬼子也在山里面转，随时随地就突然地遭遇了。照面就打枪，先开枪你就占便宜，你要开枪晚了，就倒了霉，就该吃枪子了。“就是一个速度。”他讲，“一射击，开枪得快，就是一个速度。而且那时候几乎没有子弹，每发子弹必须打中，不打中就别乱打。”还有，那时候我特别关心怎么打冲锋，我问：“您冲锋怎么打呀？”他说：“日本鬼子他有轻机枪、重机枪，都是带梭子的。哒哒哒，打一梭子，就得换另外一个梭子，这中间有两三秒的时间。别的你别管，你先冲上去。一听到机关枪响了，你就赶紧趴下。等他那儿一停，你一跃身，再往前扑几米，再趴那儿，这时候他机关枪又响起来了。主要是躲他那轻机枪、重机枪。至于其他的枪，你就听着子弹嗖嗖地在耳边响，你就甭管它了，那就听天由命了，该着你死，

你就得死。”还有打阻击，我爷爷跟我讲，打阻击，那小日本也怕死，也特别怕死。他跟我说：“打阻击的时候，我们在上面，他们在下面。他是一群一群地往上冲，你别害怕，他不知道你有没有子弹，有多少子弹，你根本不用害怕，别被这阵势给吓倒了。你得打头儿，这一群人过来了，你就瞄准了，当当当，把这一群人里面打倒两三个，他们往前奔的速度就慢了。你再打倒一两个，这帮人就东躲西藏了，就都受不了了。别看他人多，你就瞄准了，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甭管他别的，只要是他倒了五六个，他的那神经就绷不住了，就垮了。”他说，“小日本跑了，叽哩哇啦，咱也听不懂喊什么，反正就往山下跑。把鞋都跑掉了，那手雷沉，把手雷给扔了，钢盔也掉了，往下跑。”我爷爷一边乐着一边跟我讲，“他们也怕死。”

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天天死人。经常看死人哪，哪害怕呀。像我们那时候爱玩打仗，小孩，爱玩打仗，爷爷就说：“打什么仗，不好好活着。”我就说：“爷爷你们那时候打仗多好玩啊。”爷爷说：“好玩？不像你们现在，想着今天，想着明天，想吃啥好的，喝什么好的，想着娶媳妇，还想着将来出国玩，最后还可能想长生不老。我们那时候，每天早晨醒了，一摸脑袋，‘哎呦，我这脑袋还在呢！哎！感谢老天爷，我又多活了一天’。”他说那句话给我的触动特别大。他感到高兴，他感谢老天爷是因为他多活了一天！所以说，那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这种生活的理念真是截然不同。那时候就是天天的，用我爷爷的话说就是，脑袋夹在裤腰带里。你不知道哪天就死了，你甭想它，就打仗。天天死人，弟兄们天天死，日本人天天死，天天看死人，都麻木了，都无所谓了。我爷爷有时候给我看拼刺刀留下的伤：“你看这儿，”他指着肩膀上的疤痕，“这就是刺刀扎的，腿这个地方也是刺刀扎的。”我说：“疼不疼啊，爷爷？”他说：“疼？根本都不知道！打仗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以后呢，战场上退下来了，感觉这儿有点湿了，一抓，有伤口，才知道是受伤了。”那时候在那一种亢奋状态下，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受伤了，没有那感觉。不像现在小刀拉一个口子，拿针扎一下，吱地疼一下。他们是被上了刺刀的大枪扎。有时候，爷爷的胳膊让刺刀给扎透了。我见他的胳膊上这边一个疤瘌，那边一个疤瘌，那是扎透了，还不知道疼，那时我就特别郁闷，特别不理解。

孙永勤部队往关里走的时候，我爷爷那个八队跟孙永勤主力是有一定距离的。不是乱哄哄一大团走的，他是前卫、主力、后卫这么行动的。那次日本军队分进合击的时候，是奔着孙永勤他们去的。在合围的过程中，我爷爷的部队跟日本兵发生冲突了。但是发生冲突的地方不是主战场，他们拼出来了。他们死了很多人，听我爷爷说，就剩下几个人了，浑身是血。出来以后，进了一个村，村里老乡特别好，一听说抗日救国军的，那时热河、冀东这一带的人都知道这支队伍，老乡特别善良，就把他们藏一个柴火棚子里头了。这时候，外圈那些中国的特警队就在各个村挨家挨户地搜。我爷爷那家听着也进去了，但是在里头绕一圈又出来了。爷爷跟我说，这几个人到底是没看着，还是有良心，谁也不知道。由于当时有破绽，他们进去的时候，门那地方

有血迹，我爷爷觉得往这儿搜查的这几个特警队员可能还是多少有点良心，这才放过了他们。

我听我爷爷说，日本兵往毛山上打排炮，跟纳鞋底似的。可以想象，那次战斗是怎么打的，多么激烈！抗日救国军没多少子弹，主要是刺刀。很难想象当时战斗是多么的艰苦，抗日救国军是如何宁死不屈、决一死战的，那种战斗意志是很难让人想象的。我爷爷他走运，活下来了。我小孩的时候，有时候，爷爷看着我和弟弟满地玩，老头口叼着小烟袋，看着我们就乐。他的那种感情，那种快乐，我现在才有所体会。他不是一般的老头，他见了很多生死。他年轻的时候，好多战友都死了，死了，他们的整个人生便戛然而止。我爷爷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而且又活了几十年，他儿孙满堂，生命有了延续。生命一代一代往下传，子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一大群，他有一种天伦上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咱们一般平民，没有经过战争，没有经过生死的人，很难理解的。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随时都可能死，他从来没想到过还能享受这种天伦之乐。我有好几个姑姑，我爸，然后是我，我弟弟，子孙一大群，他能感受那种天伦之乐，一般人感受不到。估计他很怀念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都二十几岁就死了，死了，就是生命到他那儿就停止了。中国人从伦理观上说，承上启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承上启下的任务。当他们死去，就意味着很多生命再也不会出现了，没有儿子、女儿了，没有孙子、孙女了。这是极大的不幸，在中国来讲，极大的不幸。我爷爷通过这种比较，认识到自己太幸运了，生活对他来讲，太值得知足了。我长大以后才理解了这点，小的时候不懂。见老头看我们玩，高兴了和爷爷一块说说话，让他给我们讲故事，不高兴了，把爷爷一扔，自己玩去了，就这样，很平常。以后知道了爷爷的那些故事，只言片语地说一些过去的故事，我才一点点对爷爷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爷爷曾跟我讲过，他们部队的纪律非常严。他说："谁都怕孙永勤的那把小手枪，那是专门整肃纪律的。如果谁要违犯纪律了，在下面打家劫舍，跟土匪一样了，一旦事实确凿，逮着了，有时候，孙永勤是亲自枪毙。孙永勤纪律整肃特别严。"

我爷爷那时候过村过庄的，他有时候看着那些个家庭，看着那些女孩、妇女呀在打水、做饭什么的，也羡慕。这是生活。女人，结婚，生子，这是生活。行军路过村庄，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那也是一咬牙呀，哎，走了！这辈子，没这命了！一咬牙过去了。他们要是贪恋生活、当亡国奴，那有机会呀。但是不想，死就死了，抗日嘛，别的不管了。

一开始，队长都配小手枪，但那是个摆设。以后，当队长的也和队员一样都用大枪。因为当时他们打仗，子弹少，大部分是贴身近战，拼刺刀，你拿个小手枪没用，既防不了身，又不能进攻。就孙永勤用一把手枪，是用来整肃纪律的。打仗时，都用大枪，孙永勤有时都用大枪。带头打，没有什么口号、命令什么的，所有队员都看着你呢。你就是一面旗帜，你上哪儿，队员跟着你上哪儿。你冲锋，你玩命，他们跟着你玩命。都是一帮生死弟兄，谁都帮不了谁，谁又都是相互照应的。



爷爷跟我说过，孙永勤有时候脾气特别急。“打仗时，有时候打不动，他就抡膀子就要上。下面的弟兄们就要赶紧拦住他，因为他是头，他死了，那哪儿行。我们当队长的死了再换一个，孙永勤不行，没孙永勤不行啊。但孙永勤有时候拦不住，疯了似的往上闯。”

我爷爷说：“孙永勤是这个（单健竖大拇指），英雄好汉！英雄好汉！要不我们为什么跟着孙永勤？他抗日！他不怕死！他不投降！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跟着孙永勤的。跟着他，谁不知道最终是一个死啊，都得死，那我们为啥还跟着他呀，我们吃上什么了，喝上什么了，得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那为啥几千人都在他旗下，听他指挥呢？还不是因为他抗日嘛！没别的，就服他，就跟着他走，跟着他打。”

爷爷对那段历史相当自豪，他聊起过去的事时，从他眼神里我感觉到了。爷爷平常是很沉默的一个人，笑很少，笑起来的时候也不会说一些忘乎所以的话，一些故事什么的不会见着谁就跟谁说的，他基本是很沉默的一个人。每次他跟我们谈这些事的时候，我都发现他表情很平静，但是他的眼睛发亮。那是一种很特殊很激动的眼神，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那种表情平时没有，只在每回给我讲故事的时候才有。

吃不着饭，饿肚子是经常的。就是能吃上饭，好多时也吃不饱。以后我爷爷说，饿得都跟狼似的，到处找那草根树皮。找着了，就能坚持再活一天。不然的话，就饿死了。

老百姓对他们很好。孙永勤他们在那一带的威望相当高。他原来是一个大财主，有的是钱，以前就仗义疏财，所以影响很好。抗日后，变卖全部家产，而且他那抗日救国军纪律很严，不像土匪，而且还剿匪，帮着各地剿匪，所以抗日救国军在热河、冀东交界这一大片地方是很有名的。要不然的话，毛山战斗结束，许多救国军官兵战死，负伤突围出来的，像我爷爷这样的，就没有人救。谁敢救？在日本人还没有走，中国的特警队到处搜查的时候，谁不知道保护救国军全家遭屠啊，谁都知道，为什么还保护他们？这就说明老百姓对他们是有深厚感情的。我爷爷就是被善良的老百姓给救下来的，不然的话，也死了。

爷爷跟我讲，他早听说过孙永勤。都是口口相传，说孙永勤是大财主，有的是钱，而且是特有文化、特别仁义的这么一个人。他有钱，但不是守财奴，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要给四乡八邻送礼，就是穷人，也要给他们送东西。过大节、小节的时候他还舍粥，就是在他家院子外面摆上桌子，做高粱米饭、馒头什么的，往上面一放，过路的人都可以拿着吃。他是视金钱如粪土的人，虽然有钱，但不把钱当回事儿。爷爷就是因为孙永勤有威望，坚决抗日，投到他大旗之下的。

一些人相当有军事素质，不论拼杀格斗还是战术都懂。他们做了好些土制设备，攻城拔寨时用。爷爷那时候给我们讲蜈蚣梯子。什么叫蜈蚣梯子？就是中间一根木头，然后一个十字、一个十字地往上绑木棍，上边一个小轱辘，还有一个挠钩。人往前冲的时候，咔，一对墙，轱辘咕噜咕噜上去了。叭，钩那儿了。紧跟着，人就蹿上去了。这是蜈蚣梯子。自己制造了很多土武器，特别有效的武器，攻打城寨、工事时用。

高印萱忆孙永勤压枪（一）

讲 述 者：高印萱（76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高印萱（76虚岁，家住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村，高作忠之孙，退休教师）：

高作忠是我亲祖父。我父亲他们哥六个，我父亲是老大，因为这个缘故，我比其他房里的大一点。祖父死时，我已经记事了。

听老年人说，孙永勤在“满洲国”建“国”以前，上这庄来过。

我爷爷在兴隆来讲，是首屈一指的大户，趁一点土地，雇十来个伙计吧。土地不是自己经营着，挺分散的，哪儿都有。迁西有，比如说迁西有一架松山，给置过来了，那你没人看不行，就找那近处穷困一点的，土地白经营着，养牛羊也行，或者出钱给你买点牛羊，帮助看一下松山。据说迁西、兴隆、遵化三县都有我们家的土地。那时候一不安定了就跑遵化县，在遵化县城里置的房子。

日本子进关时，我已经记事了。日本子刚一进来时，走的道路是宣传帮助中国建国来的，恢复清朝政府，建立“满洲国”。日本人不是在东北建立了一个“满洲国”吗，我们这地方都被划入“满洲国”。我念书那时，人一问，你哪儿的？我说我是“满洲国”的。那时龙井关这边叫“满洲国”，过龙井关就叫华北了。“满洲国”时，正县长和各单位正职是中国人，副县长和各单位副手是日本人。你中国人虽然是正的，但是当不了日本人家。开始过来的日本人，还中了的呢，宣传“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也写标语，宣传好着呢。那时候，在农村，中国人还是落后、没文化，有的人觉得对自己有利，他就认为日本人挺不错的。咋不错呀，你像那抽大烟的，你抽大烟他不管你，不犯法，随便抽。没钱吧，他配给你，特别贱，质量还好。这抽大烟的人就觉得日本人好。实际上他不领会这个道理，抽大烟不就亡国了吗？不过日本人刚一来时，都挺好的，不是拉拢嘛。

“满洲国”以前，这儿的老百姓没有枪，只能掏点金子、银子给他（指孙永勤）。他得开支不是。他养活军队，咋开支呀，他用这个来发展他的军事势力。

头一次没给。我爷一听说来不少兵，知不道咋回事不是，害怕，就跑了。不光高作忠害



怕，跑了，这庄人都跑净了。没有人，把房子给点着了，看你下回还跑不。当时日本人没过来呢。孙永勤来，不是要东西，也不是要粮；而是要钱，要武器。他没武器，结果就把房子点着，烧了。烧了，更不敢回来了。后来，孙永勤把家里人传了去了，家里人得拿银子赎。据说我父亲他们都让绑过，绑到黄酒铺那儿有个地方叫金銮殿，他们长期在那儿住着。那就是你有钱，你出点钱。实际上，那时宣传得不是很明确。你有钱出钱，有啥出啥，咱们打日本。他宣传得不是很明确，就知道要钱。一要钱，就把人吓跑了。后来知道，他是为发展部队，发展势力。他养这个军队，需要钱，那跟谁要去，只能跟大户要。他不是说，你是当地大户，通过跟你有亲戚的，或者他部队里有的人认识你，通过那人一拉线，他需要武器，得买，需要开支，你有钱，掏点钱，这样就不绑了，他只要钱就好办了呗。他把你绑了去，就害怕了不是。你不是跑吗，这下可把你逮住了，只有给钱才能放人。那个时候是花现大洋的，这样为了钱，家里就借借啥的，给了，就把人放回来了。孙永勤属于绑票，把你有钱人绑来，你给钱才能赎人，用这钱他壮大自己的力量。等后来知道了，人们也就不跑了。他要过马，这倒是真的。我们家有个大马，挺好的，这个他要。

那时这地方没有这么大庄院。二道河就高作忠趁点瓦房，旁边都是小草房。这庄才十八户，夜里睡觉，就是来小蟊贼都吓跑了。蟊贼跟你要东西，腰里掖着个钱勺子，用红布包上，就说是枪，吓唬你，动作和拿着真枪一样。跟孙永勤不一样，蟊贼是为个人要点钱。比如你卖粮食，使出钱来，他在澈河桥知道了，黑夜就来找你。不给还不中，得了钱他自己要。

孙永勤属于民族英雄，是抗日的，他目标不是对准中国人。但是他发展势力，需要钱，需要粮食，谁供给呀，那就得大家主。

要按现在来讲，他当时舆论宣传工作不到位，所以大家对他不了解，一听说他从这过，吓得都跑。经过两回，他不是把你绑去，把你崩了，他的目的是打日本，这样老百姓拥护他，说出多少钱，我都愿意了，你打日本，我沾光呢。这样矛盾就缓解了，对他就没有恨了。

我都记事了，第一次，他还没来呢，就把我们这小小子，小丫头，人儿，送到遵化去了。遵化有城墙不是，省得让人绑了去。头一次来，我们北街这房挨过他烧。一个劲儿跑，可你这土地都在这儿啊，还得在这儿生活。后来逐步地和当地的亲戚朋友联系上，能和孙永勤挂上线的，当中有人来回跑道，和他商量，你找大家主什么目的，是要他命啊，还是要他钱、粮食。一了解，他的目的是，你趁钱，给点钱，穷家主你也别跑，也不用你，当兵你乐意去就去，不去也不抓你。闹了半天是这样，就放心了。他刚一开始发展起来，谁也不了解，不光大户怕，穷家主也害怕，全跑。等后来，发展大了，日本子再一进中国，他目标是跟日本子打了，孙永勤就越来越得人心了。站在老百姓角度讲，他豁出来了，等于是给老百姓卖命的了。这样对于孙永勤，感情自然就全好了。

可以这么说，孙永勤一起初，也没有明确目标。他是由于打日本人才发的家的，得到了老百姓

的拥护。不用你绑我了，你用啥，我给你啥。你用衣服了，我送给你布匹。用钱，给你钱。以后，不光孙永勤，高作忠掏过钱，杨二等过来，都掏过钱。据说杨二等都绑过高作忠，目的都是要钱。

孙永勤死后，一个人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有一个反应，绝对不一样的。有的人感觉对他本人没啥利，看不出对他有啥利，死了就死了，不死他也不恨。实际上他享受到好处了，但他个人觉得没享受到。你比如说，打日本人，你不把日本人打跑了，就受他们屠杀了。你没受着，觉得我没他，我也没受着，这是见识太短。你要懂得道理的，还是拥护孙永勤的。要不日本人咋不敢来这边呀，就是因为他打他们。他不是站在个人角度。咱们中国倒出来一个英雄呀，敢打日本人啊，挺缺乏的呀。对孙永勤的死，当然是挺悲痛的。你像我父亲那样的，他就认着支援孙永勤，他也不乐意支援日本人。因为孙永勤不要你命，你日本子，你一句话不行，还兴误会了。我把你一告，你反对日本人来的，他一听，把你抓进去，把你屠杀了。孙永勤，你就是有人告，这个大财主挺恶，他得亲自来这财主家看看，你是不是真恶，你是不是对穷人真不照顾，他不能随便把你害巴了。要不老百姓，不管穷人、富人，只要心里明白的，他一比较，就恨日本人。这孙永勤一死，是他们的一大损失，对他的死当然是挺悲痛的。他死在敌人手里，说明他不是为了个人。

陈桂荣忆公公李连贵

讲 述 者：陈桂荣（85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7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苇子峪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陈桂荣（85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苇子峪村村民，李连贵五儿媳）：

公公大高个，长方脸，不离，挺好的，连个相片都没留下，那时候也不实行这个。五个儿子，四个闺女，还剩一个闺女活着。穷得都恨不得要饭吃。前后三间房子。我们老公公跟孙永勤走了，咳，一想起我都头疼，三间房子全让日本子给点了。闹民众，孙永勤他们走了，这就挨抄，走了就抄了，没死呢。



刘宝全讲述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刘宝全（53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8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刘宝全（53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村民，刘青林之子）：

1935年，那时我父亲15岁。

过去这山拾柴都拾光了，上面就剩下橡树棵子，就没别的柴禾，容易发现。

5月24日那天清晨，孙永勤将军从我们家门口直接地上了山。孙将军负伤了，原来他是骑着马，爬山走不了了，找了两个椅子，绑在一块，四个人抬着上了山。天亮前，日本飞机四面包围，就朝毛山主峰夹击了。在炮火特别激烈的情况下，孙部下全在主峰，敌人飞机这么一打，孙将军就在主峰下面，坝墙洼上面那么一点，就在那儿，孙将军掩护一下火力，然后孙将军就牺牲了，壮烈了。清理战场时，日军就把孙将军头颅割下来带走了。孙将军身上挂着一条礼仪绶带似的东西，上面写着：忠义救国军军长。我爸发现后，回来就喊乡亲们上山埋尸体去了，就地葬在那儿了。

我父亲平时都在这山上放羊，但是打仗那天，他没法放。战争结束后，上山就发现了孙永勤尸体，与在门口看到的正好符上。

小日本那炮直接往主峰打，下面机枪挨着排，四周全是机枪，朝主峰那儿打，上面还有三架飞机。其中一架还打落了，落澈河桥了。

我父亲讲，孙永勤将军在八区曾打过一场仗，孙将军在这次战役中负重伤。

八区大寨那一仗，没吃多大亏。日本子在他们跑了后兜着他们，也就是说，日本子早已选择好了这个地方。要不我父亲说，孙永勤将军在长城以北，打一仗胜一仗，到口里了，不行了，因为山上光秃秃的，过去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多植被。打这个地方，日本子精心设的这个战场。

肯定是好人吧，不扰民，上来都规规矩矩的。想到我们家喝点水，做点饭，人家也都带着粮草。当时刚要做饭，下边立刻上来通信员报告：“赶紧上来，黄豆皮子［指日军，军装颜色与黄豆皮相同］就在后边追着呢。”实际上，黄豆皮子就在他们后面，离他们也就一二里地远，而且四面早已设下埋伏。在小于沟东山使炮，近处是高峰的地方都使机枪，在北面是洪山

口大岭，西面是九泉山，南边上来有部队往这面赶。我父亲说，四面山头都夹击一个主峰。

打仗那天，从小于沟东梁，马台子山边那边，有十几门大炮，朝那主峰打。炮弹一个一个地倾泻，把主峰整个都炸平了。孙永勤烈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朝下一撤，中弹了。在清理战场时，被敌人把头割去了。清理战场时，在南侧还有我们战士呢，日本子上来，顺着梁上那么一走，敌人一露面一枪，打死不少。当时那个枪法，咱们部队的枪法，我父亲说，都是打红围子出身，枪法准极了。

就在我们下面那山沟那儿，一麻袋多子弹壳，两挺机枪。我爸放羊，就在那小山下面看着。那儿有两挺机枪，他说那火力忒猛，两挺机枪打完了，一麻袋多空壳。

埋尸体，主要是当地组织埋的。要按我父亲说，当时山上得死了五六百人。具体谁也没数，因为死尸遍野，哪儿都是。这么大山，还能一个坑埋呀，都仨一个坑、五一个坑埋的。

我们这庄原来是个大村，结果让日本子杀了几次，基本上不够一把子活人了。日本人在孙永勤上山之前、上山之后，都来过。我们庄跟地下党、地下武装早就发生联系，是冀东根据地，像李运昌、包森过去长期在我们这边活动。因为山区僻静，另外，我们庄过去能喝两碗粥，他们愿意到这样的地方来。

攻击抗日救国军的土匪在山西被剿灭经过

讲 述 者：傅连明（81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8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傅连明（81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村民）：

父亲名叫傅旺。那是四月初十，我给他们种地，十一岁我就会牵牲口了。一亩地还没种上呢，我们这西大梁上，北山堡的团就站满了，往北打。土匪就在松棚营后山，人家枪好，有一挺机枪，咔咔，往那西大梁一打，把那民团吓得都退下去了。土匪追到鸡鸣村，点着三间房子，在葫芦峪那儿，又点着一间，在这儿点了几间，松棚营还点来着呢。民团退走了，土匪翻



回去往□[1]庄了，他们在那儿住着呢。我们这种地的也不敢种了，枪响了，看得真真的，还敢种？就家来了。我从南边这胡同这儿过，有块石头，坐那儿歇会儿。不大会儿，过来四五个人，不知从哪边过来的，对我说："起来，起来，起来。"把我弄起来了。正赶上我爷爷死，穿孝褂不是，把它弄起来，朝我的脖子上这么一拴。我爸爸出来了，还有我一个亲叔叔，一块都拴上了。跟前一个小名叫"迷柱"的，都绑去了。后台子还绑了一个，共计六七个，上后山了。到了梁上，跟我们说："坐下。"共计六七个匪，不多，是小拨匪。大拨匪都在庄上住着，出来几个小拨在外面转旋。要什么呢，跟我们每个人要三百块现大洋、几两大烟、几两白面，把我们都弄树上了。"要不给呀，赎不回去，都打死你们。"这么说的。那咋办？我爸爸一个劲儿好说歹说，说好听的："放出几个人去，我们给你们办钱去，办白面去。"土匪欢喜了："中，那好。"挨个问，我们对面街里子不会说，说话倔，他说："我一个子儿也不趁！"你跟土匪这么说还中，他不爱听不是，人家把枪一指："我给你个子儿。"我爸爸赶紧说："别这样，别这样，老总啊，他不会说话，我们也给他办钱去。"这一说好听的，土匪把气也消了，枪就收起来了。又问第二遍，问到他，就挨着我趴着来的，让趴着。他就冲着匪，脸朝上，土匪问他："你准备预备多少大洋，多少大烟？"他没说旁的，还说："我一个子儿也不趁！"那土匪没容说，把枪一顺，"当"一下子，把他给崩了。哎呦，我这一瞅，我才十一不是，咋着，打死了？之后，把我爸爸，另外一个是谁记不清了，给放回家，办大洋、大烟、白面。把我们这一群人都绑到庄上去了，现在我还记得那地方呢。住了好几天，就等着大洋、大烟、白面送过去。上哪儿找去？就这三百块现大洋都找不来啊。后来一两个土匪还上我们这儿来了一回，问我爸爸："你们办没有？"说："办着呢。"告诉后，他们就回去了。后来，我爸爸活着经常说，这回干了，他们还得来，办不来，咋办？人还不都得崩了？就跟我奶奶说，我奶奶那时还硬朗，就说："土匪再来了，告诉他们，我去给他们办大洋等东西，在城里让兵们给抓住，押起来了。"我奶奶就记住了。接了两三天，晚上，我爸爸串门去了，去各家了，土匪来了好几个，就问我奶奶："你儿子呢？"我奶奶就说："给你们办钱去了，让城里的兵给逮住了，押起来了。"那土匪气得把腿一拍："你知不道那是犯法？你让他们逮住还中？"气就小了，比不办强是不？这天晚上，土匪出门就走了。土匪刚走，我奶奶东瞅瞅西瞅瞅，前里后里找到我爸爸："别出来了，土匪刚走。我把你让我说的都跟他们说了，土匪拍大腿，气得一下就走了。"

在庄上待了几天，把我们弄到毛山顶上。把我二叔放了，让他告诉我爸爸："跟你哥哥说，赶紧办。办了，把小孩放回去。不办，把他们都崩了。"我二叔就从大梁上下来了，要不我在那山尖上，知不道哪里是家呀，没去过那山上。结果我们几个又回到那庄里，在那儿待了

[1] 录音无法听清。

几天，开车又走了。到洪山口，中街道南有两间房，把我们搁那儿了。土匪都住满了。之后就闹民众。民众一过来，就跟土匪接上头了。土匪怕民众，不敢惹。他有机枪也不中，民众有两千多人，他敢惹？这天晚上，民众就围我们住的庄子。等到毛山打起来，土匪也没走，就从洪山口又撤回到九虎岭上，接着打民众。那回他们得了点子弹。为什么得了点军火？他们帮助日本子打民众来的，为了得到点军火，日本子送给他们的。我没见着，我听他们讲。把仗打完了，土匪就奔口门子外头大东沟。又待了一两个晚上，就走了。一直奔到古北口，就往那边去了。他们那点子弹就用了几个月，因为北半部的民团什么的不少，哪儿都打。打也打不着啥人呀，开枪一打，呼，人全跑了。土匪绕到延庆住了十天，之后直奔山西大同。以后都不看着我们，要把我们卖到半道上。土匪说："你管这老奶奶叫妈，管老头子叫爸爸，你就待这儿吧，别跟我们去了。"那我说："我不在这儿。"土匪没法了，说："那咋办，走就还跟我们走吧。"我走不动了，他们就还得给我抓驴去。那么小，一个劲儿走，走不动是不，把我放驴上，走。等以后，看我小孩，挺好，就让我伺候当官的，一个土匪的队长，给他拿着烟卷，还有大烟。走的时候，让我拿着。住下来，把大烟扔过来，我也会摆乎了，装好，他们躺那儿抽着。走时，我就背着。以后不知怎么去了一个日本官，有两个参谋长，他们三个，这是一个大头子，我背着一卷地理图。我啥字也不认识，就给他们背图。不知那是山西啥地方，你看也看不到，问也问不到，人都跑了。两天没吃上饭了，把我饿的。就有这么一道大梁，我们从小梁上去，上边有一间小窝棚。我上窝棚里摸去了，里面有萝卜，冻得当当的。我就拿了一个，啃不动。哎呦，怎么办，就这么饿着吧，谁也没法子，没处吃饭啊。土匪大队正走着呢，谁扔了一头骡子，夜里也看不清啥色，个儿挺大。土匪就说："这儿有个骡子，谁扔的？"我说："不管谁扔的，给我，我骑上。"土匪说："你骑吧。"骡子个儿挺高，我上不去。拽住镫子，骡子尥蹶。我拿石头就打它，不尥蹶了。估计它也饿坏了，一个劲儿勒草吃。怎么上去呢？后来我骑到骡子头上，拽着鬃上去了。把脚插到镫上褥套里，鞋还掉下一只。任它掉下去，那也不下去了，下去还上不来。终于拽起骡子，准备走，一看，一个人都没有，土匪都走净了，谁也没招呼。就顺大梁走。走到一个路口，不知往哪边走。骡子这么那么就是不走，好容易下来了，爬下来了，后来发现前面十来步远有堆冰棱子。骡子卧那儿，不起来了。好容易把它拽起，过了冰凌子。前面有条小道，骑着骡子走下去，朝前走，自己就在骡子上睡着了。骡子吃草，一低头，差点掉下来。睁眼一看，一个人也没有。这大山，怎么办？喊一声，回声嗡嗡的。实际上这儿离宋哲元的国民军部队不远了，都是好枪。决定听听哪儿有狗叫，去哪儿住。结果全是大山，没有一个庄。决定继续走。出沟，沟是东南——西北向。骡子想朝大路方向走，因它熟悉路，我没让。拽它转了两个圈，让它朝南走。约半里地，听见前面问口令。我说："没口令。"问："你十几了？"我说："我十一了。"哨兵对一士兵说："去，你把



他卸下来。”那兵害怕有枪，问我：“你没枪？”我说：“没有。”说：“那你在骡子上拍巴掌过来。”走到跟前，我就头冲下，顺着骡子脖子下来。那人还是个矬子，把我拽下来。一看，那堆岗十来个人。一个当官的说：“你把这骡子交到营部去，把这小人交到连部去。”那人领着我去了连部。我一看，没炕没啥，一盏小煤油灯。屋里已逮着一个了。一看，都认识不是，房山的，土匪裹来做饭啥的。我问他啥时来的，他说：“刚抓来的。”问：“你那东西呢？”说：“全扔了。”问：“离家乡多远？”说：“二十多里。”“哎呀，土匪这么大面积呢。”点着灯，我进屋一看那衣服，国民军哪。我九岁时，家乡来过宋哲元的部队，才过去两年还不认得？待了一会，又逮进来一个。那个十七，这个十九，我十一，岁数最小。待着吧，不一会，连长进来了，挎着双盒子，军装齐整，扎着武装带，问：“你们都是家乡人吗？”“都是。”“有多少土匪呀？”“有一百多。”“有多少大炮？”“没有。”“没有，好咧。有多少机枪？”“一挺。”“有多少大枪？”“七十来支。”“有多少手枪？”“三十来支。”“噢。”问完了，说：“你们好好待着啊。”出了屋，到窗根下，一拉鼻音，来了个站岗的：“明天早晨四点钟，咱们上去三个连，满着算，收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刚一露红，三个连上去就打。大小官都打死了，拴了一串子人，都认得不是。走，这么一条沟，那么一条沟，顺东还一条沟。顺东面这条路走半天，到了临城县，在那儿过年了。把我们关一大屋里。日头还没落，端来一大盆大米干饭，一大盆白菜豆腐粉儿，给我们这一大群人吃着。可熬着一顿饭了，哪儿有饭哪。吃了饭，待着，大锁把门一锁。第二天初一了，包饺子。“把小孩放了吧。”把我放出来，给我端来两盘饺子、两盘菜。“你就在这儿吃啊，别跟他们吃去，你抢不过他们。”那吃得多踏实呀，吃完了，把家伙收拾走。日未落时，有个值班国民军，四十来岁，穿着黄呢子大衣，说：“小孩，出来。”来到一条胡同，全是水泥的，挺干净的。把黄呢子大衣脱了，铺在地上，说：“你坐那儿，你的裤子咋都开线了呢？”说：“天冷，烤火烧的。”说：“把衣服脱了。”就把衣服脱了。因穿衣服睡觉，全是虱子。拢着火，把虱子烧净了。里边的衣服就扔火里烧了，说：“别要了，天气也冷不了了。”把衣服给缝好，那人可积了大德了。过会儿说：“行了，我下班了，开开门，在里面待会儿去啊。”二班没看着他，国民军好着呢。初二，还是初三，一个人给了五个大馒头，说：“省着吃饭，要送你们到高邑火车站。”下午，到车站了，馒头也吃完了。上了车，晚上十点到的保定。一看，南北向大街，真热闹呀。那些拴着的，没看到他们，不知押到哪里去了。把我们送到一个大衙门里去了。我一看就知是大衙门，有胡同、石狮子。让我们进一屋，有电话，说：“你们别跑了，要是偷跑，不但回不了家，抓住还得枪崩了呢。你们要不跑，还有回家的希望了。”那往哪儿跑呀，你知道有多少队伍啊。一会儿送来一盆切面汤、一盆炒大米干饭，我们仨没吃了，这回又全都吃饱了。睡觉。第二天早上，又端进来一大盆切面汤，吃饱

了，过堂。我说："咋又过堂做啥呢？"说："就是问话。"跟县委大院似的，叽里拐弯，叽里拐弯，到跟前了，大柱子都一搂粗。我数了数，七个大官都这么坐着呢，后面都是记者。我们靠墙边一待，官问话，记者写字。先问岁数大的："你们什么地方的？""遵化的。""什么庄？"那个说："房山的。""离城里多远？""三十来里。""你们赶集跟哪个铺口有熟人呀？"那个说："我跟德全铺认识。"这个说："我跟东街有个铺口认识。"最后问到我："你小人离县城多远啊？"我说："三十多里地呢。""上哪儿赶集？"我说："也遵化。""跟哪铺口熟呀？"我说："我才十一呀，哪知道啊。"正月初十、十一左右，就把信打家里来了。我的信是送到衙门，衙门班头给送到家来的。家里赶忙找人写信，那时土匪把村里烧得不像样子，没什么人了，找识字的人写：因土匪祸害，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们没钱领，请上级司令部解到本县才好。信接到，又过堂："把你们都送回去，一个人给五块钱盘缠。"那时候，五块钱顶事，能买一千多斤棒子。把钱装起，第二天几点几点送北京。有个主任，听人说的，记住了，说："我是北京人，你乐意在这儿念书不？"看着我人小，说："你要是乐意，我供你读书。你遵化，我北京，离我们那儿就三百来里地，我们是老乡。"我说："想家了，想回家了。"他说："中啊，那你就回家吧。"从北京走家来的。钱丢了，要饭走回家的。谁偷去了呢？我们那群伙伴给偷去的。有一个人我知道，不厚道，十七的那个。早没了。回到家后，那时闹八路军，等到八路军成气候，他当八路军去了，没了。我不知道他叫啥。另一个叫刘宝堂，他死了四五年了，十九那个。我这儿还活着呢。

在东面小于沟这儿，有一部分保安队使旗子跟民众晃来着。让接头，让他们往东跑，据说是往东走。他们枪向高里打，让日本人逮不着影，让他们撤出去。民众还是没有计划，他怕都是日本人，根本不都是，有保安队。保安队没打不是，没上山呢，上山的全是日本人哪。据他们活着时候讲，保安队没上山，保安队在底下那就是敷衍事。等到战争打完了，日本兵下山，把民众岁数大的杀了几个，赶那年轻的，叫保安队把绳子给解了，往西跑，快跑，这就跑了。等到日本兵一杀民众，提了个鞘，拿着个刀，一看人少了，就问保安队，往哪儿跑了，说往那边跑去了。往西跑了，他说往东跑了，上哪儿追去，没处追去。放的这都是民众，没死，岁数小。

土匪那要是不截着，民众也许能跑出去。他们一截着，民众就不得跑不是。有卷回去的，在三道毛山那儿。打死的哪儿都是啊，民众啊。赶以后我放牲口到那儿去，没少看见骨骸啊，哪儿都是啊！

这块儿有当民众的，我们一块开会，都谈过这个。那时候，日本人在北部有据点，老百姓生活不了，民众咋起来呢？孙永勤是黑河人，他自个就起义了，把房子一点。他洪山口有亲戚。孙永勤个儿高，双手过膝盖。你说你现在有人个儿高，手耷拉到这儿？他把家里人都送到亲戚那儿，把房烧了，他就到了九虎岭这儿。也不知几个人，听说派了八个人下去，在九虎岭



前召集八个大队。八个大队召集齐了，这边当民众的不少，还是后边岭后的多。粳子峪刘秀存当民众来的，他跟我拉过，说让日本人逮住五六个呢，都给绑上了。日本人追别的民众去了，把他们撂在山根。山根哪儿有洞他们都知道，偷偷钻洞里去了。他给他解开，他给他解开，就全解开了。日本人钻山里追民众去了，顾不上他们，他们几个人逃活命了。那山上的人也跑了，山上柴草大，看不着。

据说召集八个大队在□[1]梁那儿打了一仗。日本人五千多人围那个地方，沟百十里长，头边河是大瀑河，剩下是山。一天晚上，军长紧急开会。八个大队召集齐了，酒菜吃饱，军长说，今晚咱们打一仗。把人分派了，几个大队顺梁往下推，几个大队四面包围日本人。打了半夜，把日本人推下瀑河两千多人，连枪带人的，都给水冲走了。一回就打胜了。他们要不进九虎岭这边来，没事。因为啥没事呢？这边山上没柴草。那边山大，柴草大，一上山，你就找不着了。人家打麻雀战，那叫厉害。武器夺得都是日本人的，都是民众砸据点得来的。不夺他们哪有呀，各家哪有呀，我们一庄才趁一棵七九。那有枪的，一棵枪，两棵枪，民众来了，都给敛走了。那都是哪样的枪，那枪都软哪。那还不中，你没子弹不行不是，你还得有子弹啊。

那民众，你还别说，艰苦的地方真中，真有两下子。据他们说，我们拉这个，有的时候吃得上饭，有的时候吃不上饭。没有给养，没有粮票，那就是转着各家号着吃饭。有住家的，号点饭，没有住家的，哪儿吃饭去，都这样。

[1] 录音无法听清。

吴广顺回忆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吴广顺（81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8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吴家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吴广顺（81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吴家沟村村民）：

父亲叫吴占满，当时也就四五十岁，会先生。

孙永勤晚晌到这儿就住了。孙永勤那天懒得动，我父亲会先生，给整治整治。黑夜都睡觉了，日本子就追上来，围上了。民众都知不道，连庄人都不知道，全圈上了。天亮时，看见山上有人，才知日本子围上了。民众要顺山根往小厂那边跑，没事来的，他看不到，上毛山，还得上毛山。立刻两边各家大门全被日本兵踹坏了，追下去了，就围上了。一边追，一边打。一直打到毛山后背，民众都死那儿了。那天晚上要走就没事了。抓起来七个民众子，第二天晚上，在我西边，庄南那个河套，那全都枪崩了。剩一个，往起跑了。跑了一宿，顺着山那边，有个人家，早晨一看，这是哪呀，哎呦，一看，把他吓坏了。跑了一宿，没离开吴家沟。那人家说："日本子还没走呢，把你送送啊。"把他送送，往别处跑了。就跑了一个。

打了将近一天呢，晚末晌就结束了，日本子把民众都消灭在这儿了。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走了。

民众不是跟日本子那样打老百姓。不是那样不是，跟咱们是一家人不是，他也打日本子不是，要不日本子咋追他呢。

保安队在西梁上来的，都在西梁上来的。日本子顺着这儿来的，保安队没动手。



想念爸爸骆凤庭

讲 述 者：骆玉占（64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8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骆玉占（64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村村民，骆凤庭之子）：

我1942年生，我们家原先据说是富农，地有100亩，雇两个伙计管理农业地。

我觉得父亲是一个很直性子的人，办什么事情都不带转弯的，做事特别认真。原先革命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不告诉。听我奶奶说，不传妻子，不传父母，他那时候谁也不告诉。上外面干革命，他说上北边做买卖去了。

我想念他，我很崇拜他。我想起我爸爸就掉眼泪，当下也净做梦，梦见我爸爸。他这辈子特别苦，不容易。

他这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罪，他还不够可怜的，够苦恼的。你说他经过多大事啊，让日本人逮着过，共产党逮过，“文革”，挨批斗第一，在我们庄。他经历三次大难，我为啥不想念他呢？他多苦，有几个人有三次大难，这一辈子？

三次大难是：日本人逮他，共产党逮他，“文化大革命”挨打。

“文化大革命”挨打，是村里的造反派打。

共产党押他，在保定、芦台、南浦盐场，后来又转到兴隆煤矿。1951年关押，1966年出来。回来就戴上帽了，反革命和叛徒两个帽子，批斗。关押15年，戴帽13年，共28年。1984年平反。

我父亲晚年总是有病，心脏病，我长期伺候他。晚年心里倒不苦了，共产党不是给我爸平反了？平反以后，他心里愉快了。原先净戴帽挨斗、挨打，那时候苦，也没少受罪。平反以后就享福了。

父亲2001年因病去世，心脏病又转的，人家检验是老年性脑出血。

父亲生了大哥、姐、二哥还有我四个子女。

目前靠种地为生，种玉米。

回忆哥哥何孝怡

讲 述 者：何方生（80虚岁）

讲述时间：2005年8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何方生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何方生（80虚岁，原福建省体委副主任，前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何公敢之子，何孝怡的族弟）：

我们这个祖是在福清龙田镇，何家是个大地主。

何孝怡，1902年出生，属虎。他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商科毕业生，后来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毕业生，他学历主要是这样一个学历。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我的曾祖父的父亲从福清迁到朱紫房以后，生了三个儿子。何孝怡算大房的后代，我们这支算小的。我和何孝怡是同辈，都是孝字辈。我本来叫何孝尧。大房里下来的三兄弟，一个何孝更，一个何孝清，何孝怡老三。我们这边很多，几百个，发得很大。何孝怡，我不知道具体生在什么地方。按我的估计，他也应该生在朱紫房，因为当时很少住到外面去的。

当时，我们家很多人很小就去留学了，去日本。当时的家庭境遇还可以，因为同时两个考上进士，一个五伯公叫何甘德，还有一个叫何建德什么的。两个同时进士，其中一个是解元，所以家里生活还可以。何孝怡小的时候就到日本留学，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也留学日本。我父亲14岁就留学日本，那以后回来参加辛亥革命。何孝怡小时候留学日本，我的一个大哥叫何孝光，我亲哥哥，抗日战争时牺牲了，也在他后面留学日本。留学以后，都对日本没什么好感。

我看到何孝怡的时候，他当时在福建省政府，陈仪当省主席，他当时比科长还要大一些，会计长职务。在我的印象当中，人家说陈仪还是很相信何孝怡的。以后我到上海去念书，何孝怡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解放战争开始后，陈仪在浙江不是要起义吗，这个时候，何孝怡可能也跟他在一起。我没问过钱履周，钱履周跟我很好。为什么很好，因为我跟我父亲没有划清界限。我父亲是头号右派，为什么没划清政治界限呢？因省委一个书记交代过，你父亲有可能将来国外还有人来找他，来说一些国民党的好话。他不讲话，不是影响很坏，所以你不能和他划清界限。但是我又不能公开说，不和他划清界限是省委书记交代的。我不说，也不划，给斗争斗得很厉害的，为这个事。



蒋介石反对何孝怡，可能有两个怀疑：一个他是陈仪的部下，陈仪在浙江要起义；一个是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在我们这边算右派，但在国民党那边算左派呢，因他是反蒋的。因此那个时候，据说何孝怡一到台湾就被枪毙了，给国民党枪毙了。

他家人告诉我，他被枪毙了以后，他全家迁到美国去。何孝怡爱人在我们家族里面算文化程度很高的、比较洋化的一个女孩子。碰到这个情况，她大概也不愿在台湾待了。到了1985年，还来过一封信，委托何孝萍（何方生先生的妹妹）看房子。1985年之前，何孝怡爱人还经常写信给何孝萍。

何孝怡，人块头挺大的，比我大得多。他这三兄弟，都很大。个子有一米八二到一米八五，头也很大，人也还长得比较英俊。他三兄弟里头，大概何孝怡长得最英俊。脸有点白白的，头发这么向两边分，中间打开两边分的，穿的衣服比较笔挺，不像抗日战争我们那时候随随便便穿了，都破破烂烂的，因为他算当官的，当时。在我的印象当中，他跟家里人来往也不多，跟我妹妹玩玩，因我妹妹比较小啊。跟我们讲话不多，他整个全家人和我们来往都很少。以后去了台湾以后，我们就只知道他被枪毙了。怎么知道的呢？我父亲被划右派的时候，说他包庇反革命嘛，主要指在那边工作的几个人。也就在这时，听到何孝怡被枪毙了，被蒋介石下令枪毙的。

我比他小得太多了。抗日战争要结束没结束，大概1945年的时候，我见过何孝怡。第一次从重庆回来时见到他，是在他家，他在和小孩子谈天。

何孝怡那当然同情抗日。在那个时候，在国民党政府工作是不能不抗日的。你不抗日，不能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

我太小，何孝怡不会跟我谈喜不喜欢日本这个事，但是所有我们留学的对日本都没好感，主要就是日本人太看不起中国人。尤其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中国站起来了，那时候中国没站起来啊，在那个时候，很不平等的。

我家门牌在国民党时期是18号，我父亲也排行十八。

我们家族都比较崇拜我父亲。哪家过生日，红白喜事，都问十八哥或十八叔来没有。因为家族中，我父亲算比较有成就的人。我父亲和钱履周很好。钱履周是我父亲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大概是陈仪的秘书长，省政府的秘书长。据我所知，钱履周是非常耿直的一个人，我父亲有不对的地方，他也当面批评。钱履周跟我父亲是很肝胆的，物以类聚，你想钱履周跟殷汝耕能好吗？大概我父亲、林之夫、钱履周，这一批都是当时留日的。

我父亲没有专门怎么讲，好像几个侄子里，何孝怡是他比较器重的一个。

他对大房的几个都比较器重。

马保德被捕经过

讲 述 者：赵德（85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德（85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村民）：

那时编唱本：

中华民国22年，中外之事演一演。

各国全比日本大，日本虽小变强权。

它往中国来交战，惊动汴英宋哲元。

二位军长重重怒，发来队伍有万千。

骡马驮着迫击炮，驴马驮着水机关。

耀武扬威往前走，来到三河住几天。

……

马保德原来家是小三间。给人干一年，三石玉米，这是干得好，干不好，一石到两石，但管三遍饭。地主，干得好，“还在这儿干哪。”干得不好，就不让在这儿干啦。好人性，皮货商，堵到家里给害了。不富裕。马保德家后来开小旅店，不包饭。

早饭后，村里保长马德禄带着十来个便衣。

马保林早晨出去，一到大街上，见五六个穿便衣的。一看不对，有事，返回来。到他们大门，马保林正在当院朝外瞅，朝马保林一指：“告诉马保德。”从后门围上来，到屋里，前门就进去了，绑走了。人家脑瓜子切半拉也不叫唤，就有这本事，是个汉子。说话瓮声瓮气的，呜里喊叫的，外号叫“马三嚷”。

毛山，过去是穷山，没人养树，有点柴禾，穷小子还给割了。

打毛山时，有特警队，黑军装，大盖帽。日本人从南山头把民众追过来，特警队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没通知他们。庄北四门大炮朝十几里外毛山打，看得真真的，炮弹落在哪儿，山上人乱跑。

毛山仗打得很艰苦，用石头砸。

孙永勤在庄客住，革命的，打日本。



毛山上松树是前30来年种的，公社时期。

炮阵地在茂隆山。

孙永勤是革命的队伍，打日本人挺狠的，老百姓都说是好队伍。

遵化城，三丈多高，外边是大砖大石头，大楼子。

特警队都是日本狗腿子，给日本人效劳。

中国人非得上压着，下挤着，才厚道呢。

东双城离遵化十五里路，离毛山十五六里。

兴隆县这附近，地痞流氓跟财主要钱、绑票。在九虎岭下一个庙住，限期多长时间送来，逾期撕票。这里是兴隆、遵化、迁西三角地区。

马金龙回忆马保德

讲 述 者：马金龙（82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马金龙（82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村民，马保德邻居）：

民众从村西过去，五六天从二十里铺回来。马保德他们几个干部先回来，露了馅。去蓝旗驿，又回家，打探，打毛山之前被抓。两天后，大部队过来，日本人上来，才开始打毛山。后来，马保长被马保德家一个侄子，当时是民兵，把此事上报区长。召开会议。第一次刚开，敌人过来，散了。第二次，区长李金决定杀。上报后两三个钟头，敌人过来，马喆枪毙的。



马金龙老人　2006年4月

民众军与土匪交战经过

讲 述 者：方宝青（70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大块地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方宝青（70虚岁，原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大块地村村长）：

土匪乱抢，杀人，实际上不是土生土长的。绑票的土匪穿军服，骑马，装备挺好。

民众曾用抬枪杆打侉子匪，再装火药来不及了。散兵组成的侉子匪，把民众杀死七人。

马队从房山沟往这边来，民众在九虎岭后面看见，埋伏着。洋桶、鞭。追散了，土匪在庄头把民众抓住。

回忆姥爷孙永勤

讲 述 者：赵显刚（61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关家沟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显刚（6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关家沟自然村村民，孙永勤与第一个妻子所生女儿之子）：

（孙永勤）打仗把衣服脱了，用杆子支起来，让日本人打。

在饮马坑受伤。

母亲孙玉香，1972年大旱那年去世。

赵显朝[1]，57岁，在挂兰峪铁矿装矿石。

[1] 赵显朝为赵显刚弟弟。



有关孙永勤枪法的传说

讲 述 者：张青山（40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小学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青山（40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村委委员）：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孙永勤枪法准，头上顶洋钱，一枪一个。

张如增很有钱，据说有九缸十八锅的银子。雇人挖地道埋银子，一个哑巴夜里睡，白天清渣。去澈河桥买酒，赶毛驴去，腰里系一个葛条。

史耀清忆孙永勤（二）

讲 述 者：史耀清（85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史耀清（85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自然村村民，孙永勤表外甥）：

打仗时能看到孙永勤是黄狗。

不属狗，是黄狗转世。

雷永兰在毛山仗打完后躲到我们家。

孙永勤没去毛山之前，雷永兰就经常躲到黄花峪，大川，容易躲藏。

张如增在黑河等几个川是最大的财主，放账，收粮食，人缘不恶，是善财主。九缸十八

锅银子都没找着呢。雇着十二三个院兵，有大枪，有炮楼子。一天进个元宝。养活十二三匹骡子马。据说后代在台湾，传说解放后，后代开车按图纸将几个金砖取走了。张如增七十岁左右时死。去遵化、滦河赶集时，不抽捞布袋子。那时有钱人都讲究抽捞布袋子。抽葛条，两天干了，换，再用新的，不招摇。

谁借钱都给，都是五分利。起租子，你种我地，交租子，就放锅伙那里。锅伙就是粮仓。哪儿没人家买卖呀。小老头，长得挺富态，留着小胡子。

关元有，二头子，大高个，长方脸，也挺善良的。

孙杖子村就孙永勤家在村西头，谁都住不了，凶着呢，就孙永勤能压得住。

车河口在大杖子。

岳老亮没张家财势大，是个恶财主。大胖子，死时手脚都攥着洋钱，尸首不爱烂。搁六十个洋钱，摆三趟，然后接一除一，捡回三十块。老百姓是摆制钱。让孙永勤夜里给扒了。

岳老亮也使着十来个院兵，归下板城管。

雷永兰“七·七事变”后才回孙杖子。

孙永勤死在毛山上时，头被日军割去，黄狗出窍，绕了几圈。

孙永勤大个子，鞋得另做，一般人穿不了。

过去叫“大柜”。

他吃都吃大户。

李桂攀家开药铺。

日军是关东军守备队，一个部队只有一个翻译官是中国人。

日本人坏也不如中国人坏。翻译官说你有问题，就杀了你。

孙永勤牺牲后，一部分人也当了土匪，利用手里有枪，抢大户，慢慢就灭了。

回忆爷爷李桂攀

讲 述 者：李思伶（76虚岁）、李思尧（62虚岁）、李思迁（53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灰窑峪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思伶（76虚岁，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灰窑峪村村民，孤儿，被李桂攀收留抚养）
李思尧（62虚岁，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灰窑峪村村民，李桂攀之孙）
李思迁（53虚岁，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灰窑峪村支部书记，李桂攀之孙）

太爷李老东先生，是清朝的秀才，以画画为主，画庙、房前脸，水墨画。

爷爷1967年去世，活了88周岁，曾是1949年后第一届县政协委员。

15岁教学，在蘑菇峪、宽甸、孙杖子教书。是私塾先生，也会中医，妇科看得好。

“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现在还记得跟爷爷学过的课文。

书全烧火了，做了好几顿饭。有医书，天文地理、《天地眼》。

爷爷会看风水，阴阳穴。

不信迷信，会看坟穴、打井的地方。

一米七高，白胡子，走路走得快。拐棍也是烟袋，学生不听话，啪一烟袋，烟袋是特制的。没听说会武术，听说会念咒。

孙永勤路过我们家，必定过来看看。

人缘好，爱编顺口溜，如：机关枪，迫击炮，打死敌人两河套。宽殿宽殿，大殿三百三，小殿赛牛毛，前街唱戏，后街知不道，东庄下骡子，抱到西街就老死了。蒋介石，你别愁死后没棺材，我这儿还有两个寡鸡蛋。

编过书，书名《糟糕传》，20多本。写一对夫妇开小铺子，供财神。两口子打架，财神发怒，店烧了，没衣服，躲到月饼堆里。

老人去世，不搁牌位，搁照片，水果下来，必定放上，说是对先人的尊敬。

管高作忠叫“折胳膊烂”。

日本人来后，不让教私塾，让学日语。

“集家并村”到二堂，回家被日军看见，叫往山梁上挑水，后躲到黄石砬山洞。

县委组织部部长杨玉良是爷爷的干儿子，爷爷年轻时的情况他可能知道得多一些。

高印萱忆孙永勤压枪（二）

讲 述 者：高印萱（77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高印萱（77虚岁，高作忠之孙）：

1957年在大水泉乡黄酒铺当小学老师。刚到时，晚上开群众会，金銮殿村民讲，金銮殿是个小山，上有两户人家，父亲高景歧当时三十来岁，“把大掌柜的绑到这儿，我伺候来着。当时不绑着，跟军官吃一样的东西，达到目的就放了。”被绑的除父亲外，还有叔叔等几个人。

二叔高景林打枪打得准。受爷爷影响，在庄南砍“满洲国”电线杆子，被伪满警察逮住，交给日本人。傍晚被日本子枪毙于龙井关外鞑子沟，原准备砍头，花钱后被枪毙。这是“集家并村”之后发生的事情。

国兵和警察不一样，国兵是挑去的，警察是自愿去的，警察坏。“集家并村”时，傅文生在“无人区”被抓住，一东北国兵没杀他，把他放走。

回忆太爷李连贵

讲 述 者：李海东（2006年时35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2010年3月、2010年5月3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苇子峪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海东（2006年时35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苇子峪村村民，李连贵次子李青之孙）：

（以下为2006年4月采访）

太爷李连贵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

太爷大高个，骑白马。

“集家并村”时，爷爷李青和三爷见日军把太奶奶、奶奶抓走，准备移民坝上。爷爷在山上看见太奶奶准备跳石砬，白旗营保长王桂芳，大概是这个名字，把她们救了。

（以下为2010年3月所接李海东电话内容）

为牺牲在毛山的是张申还是张生一事，我专门去了一次佟家沟。遇到几位岁数挺大的老人，刚提起闹民众的事情，还没提张申的名字呢，他们就主动说起张申的枪法如何如何。他们说跟着我太爷打日本子、牺牲在毛山的是张申，不是张生。张生是病死的，也没参加过民众军。

张申不是我太爷小舅子，他姓张，我太奶奶姓佟，不是一个姓。

佟家沟在蓝旗营西边二三里，离我们村也就六七里。

苇子峪离蓝旗营七八里，原来近一些，修桥后，绕了一些远。

苇子峪村后的山叫青山。

我们家原为苇子峪五组，现为十四组。

（以下为2010年5月30日李海东电话内容）

太爷家有住房六或七间，旅店十间。住房、旅店不在一块。

李山出生时间为农历九月初四。

村村通水泥路宽约三米至三米五。

苇子峪离马蹄峪三十华里。

前山寨到鹫峰山山根约二三华里。

陈国林忆李连贵

讲 述 者：陈国林（84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苇子峪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陈国林老人　2006年4月

陈国林（84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刁山峪村村民，李海东姥爷）：

当时我十来岁。李连贵小伙子挺漂亮，细高挑，一米八左右。北五保当过保长，挺威武的。开过旅店，南北向房，两层，十间。老伴挺年轻，佟家沟人。

年焕兴对老百姓不好。我没少伺候他，那时19岁。想问他在家里住不住："年队长，休息不？"他马上说："你怕日本人把你房子点着？我先点着。"把他送到门口，他回头说："你看啥，想报告？"

副队长王麻子好。

年焕兴是个叛徒，吓唬孩子时都说他的名字。

据说日本人刚进来时挺老实的。

伪警察没好的，官衔小，出来就抢东西，维持生活。

老百姓都恨不得一下把日本子打出去。



我的“野人父亲”

——李金荣忆李连贵

讲 述 者：李金荣（75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侯家寨乡前山寨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金荣（75虚岁，河北省遵化市侯家寨乡前山寨村村民，李连贵女儿）：

父亲是个野人，光顾国，不顾家。

我5岁时父亲起义，父亲出走后就没回来过。父亲要现在说是个英雄。

父亲临走对我母亲说：“你该出门子出门子，我反正‘满洲国’不推了，不上家。”

母亲累得心口疼，嗷嗷叫，因孩子太多。一个老妹子不得不过〔继〕出去了，没法过。

母亲在“满洲国”时（指“集家并村”，强制移民坝上时），差点跳山涧。母亲小脚，骑着驴，一哭哭出西门。男子都跑了。二哥钻席筒子，被警察拽了出来。三哥跑了。瓦房烧了12间。

我16岁时，母亲心口疼，病死。母亲七月十六死的，我九月初六出的门子，大舅给保的媒。村人说：“那么小岁数就出门子？”回家时，去母亲坟地好哭一场。觉得没爹没妈，命太苦，太可怜了。5岁，谁不想爹，有个坟骨朵，也给他烧纸呀，想管啥。

遭难时，谁都不理。二哥不得不给人锥鞋。

老抢，抢财主家，不行好事。

孙永勤在石湖沟梁

讲 述 者：莫桂金（52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经委安监站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莫桂金（52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乡经委安监站工作人员）：

我家在三道河中兴莫家窝铺，父亲莫俊贵，82岁。

中兴，小名大洞。

听我父亲他们说，孙永勤在石湖沟梁受伤，把枪插到山石缝里。仗打完后，满地都是黄子弹皮子，小孩去捡玩。

吴凤起忆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吴凤起（83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小于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吴凤起（83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小于沟村村民。1944年入党，抗战时期曾任武装班长，1949年起先后任村治保主任、会计，1968年~1984年任大队长）：

那时十三四岁。民众从口外来，往哪儿走，日本人总大围攻，到毛山就围紧了。民众没多少枪，很多是大刀片、扎枪，还有棍棒。毛山那时候是光山，民众没处跑了。民众挺厉害的，日本子挺怕。日本子在北边全是用炮打的，没使机枪。抓的俘虏，二三十一串，二三十一串，



拴上就杀了。大部分都杀了。

我和家里人跑三里屯了，看得清楚，一炮一个烟儿。那人死得惨，有没脑袋的，有的一串串拴上，推下来摔死。有特务穿便衣，给日本人更出力。翻译穿军装。

最激烈是前晌跟中午。

民众枪打得准，但没那些枪、子弹。

捋管炮，一个人背着就走，腿一弓，一按，炮弹就出去。

毛山底下王家沟，二三个月臭得进不去，死尸流的水都是红的。

吴显来忆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吴显来（80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小于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吴显来老人　2006年4月

吴显来（80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小于沟村村民）：

民众从六七天前就住这儿。

早晨一起来，日头刚从毛山一出来，炮就响上了，庄里人都跑了。我有个大哥让地枪崩着了，走不了，我和我妈把大哥架到大石门了。我们跑到一里地外一个石洞。我们庄有个叫吴守义的，看人都跑了，就喊："坏了，坏了，今儿个庄里要死人。"

日本人一个劲往山上打炮。就听见炮响，没看见他们往上冲。炮打得挺厉害，一打一冒烟儿。

上午11点起，日本人开始往滦河撤。一直到夜里点灯后，还往那边走呢。

吴凤卜让日本人抓住了，让他用打栗树杆子和别人抬着一个布包着的头，说是孙永勤的

头，实际上是王家沟狗剩台子一个没脑袋的人。吴凤卜穿得阔，整齐，夜里到马台子墒家沟梁上，歇着时，说解手去，跑了。

秋花峪李福尊装死，家人都死了，后来跑三屯营去了。

民众子，那时候把粮食都埋地下，拿棍子杵，好衣服也拿走。

据亲家刘秀存说，孙永勤死在曹树沟，看不行，就让亲兵们能走的走。

王家沟、秋花峪、春石沟死的多。台子那一个地方死二三十呢。

民众死的大部分都埋了，还有狗拽的。

吴艳民谈孙永勤及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吴艳民（55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政府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吴艳民先生　2006年4月

吴艳民（55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信访办信访科员。1972年~1978年在天津警备区86978部队服役，任班长）：

父亲吴凤忠，21年生人，四个党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建明地区武委会主任。

孙永勤个子不矬，脸发长，看着挺朴实，庄稼人样子，他是专打日本人的。

孙永勤部队被日本人从兴隆、承德追过来，把日本人惹太急了，三面包围，没处走，只好到毛山。日本人占领大块地、官台子（属迁西县），这两个地方是炮群，老磕炮，打得挺准的。

老年人评价，相当义气的一支部队。据说谁要说日本人好了，抓起来就打。孙永勤对上岁数的人特别好，婶子、大爷的，叫得特别亲。我奶奶说，当时孙永勤住一两天就走。回来后，“大娘啊，我们回来了。”奶奶起来就给腾地方。当时我们家是三间草房，坐东朝西。院子南



面两间草房，坐南朝北，是我大爷大妈住。南边还有一个柴棚子，北边一个羊圈。

孙永勤住大房子，勤务兵跟我大爷、大妈住小房子。大部队来，住过小于沟，主要是军部。吃饭朝大户大家要，想吃肉，买，但票多，洋钱特少。有时候买不来，背着跑的也有。在小于沟没打过老百姓。

孙永勤跟奶奶、父亲一块住。爷爷没了，奶奶、父亲、孙永勤住大房子里，对面是我大伯大妈住。

打毛山时，父亲他们全跑到小于沟东山上，枪声稀少时回村。村沟里死的多，山梁上，东一个，西一个。

据父亲说，有一部分人顺着小于沟东北角奔喜峰口杀出去了，最多一拨二十多人冲出去，出去大约半年光景就覆灭了。

在王家沟沟门那儿住，总共七户人家，家在村西头。

狗剩台子，一个叫狗剩的人死了，埋在那儿。毛山仗打完后，台子上的血，太阳一晒，皮翘起一指头厚。

庄稼坟，老百姓埋了七十多口。以后抬不过来，就得哪儿埋哪儿了。前十年盖房，挖地基，还挖出锈的刺刀、铜锈的裤带钎子。

听父亲说，第一次要冲出呀，就出来了。因联络不上，又回去找，才死了很多，不然得冲出一半。

听说孙永勤特别孝敬，到哪儿看到上年纪妇女，就谈他妈如何如何，特别尊重上年纪妇女。

孙永勤对对他有好处的人，挂花了，有搀他的，给他裹绷带的，好了，他就给人磕个头，包括妇女。

九大时，乡干部组织在毛山上种树，请父亲上去讲种树意义。父亲讲："当时毛山上有现在这么多树，孙永勤不至于死呢。"

民众有劲使不上，全是炮打的，炮够得到民众，民众够不到日军，而且民众枪不好。毛山很怪，南面不连着，只能往东跑，官台子又驻有日军。

吴凤卜让日本逮去了。他比较富裕，是小财主，长得比较胖，戴着毡帽头，穿大褂，是王家沟的老庄家，就几户人家。日军以为他是民众的官呢，傍晚抓住的，准备去请功，他装解手，出来跑了。

尸首，说衣服像孙永勤，但穿一样衣服的不少，都是光羊皮板、羊皮帽子。

埋尸首时，父亲跟着来的，都是民众自发的。半个月后，还不敢进沟呢，臭的。一开始还能辨认姓名，衣服口袋里有一个布条，上面写着叫啥，哪地方人，大部分是东北（即热河）的，这些人被迁走不少。也有没法辨认的，家属烧张纸就走了。

听说，孙永勤有两支手枪，一支叫快慢机，打20发，由勤务兵背着，斜挎着，另一个像左轮。

说只看见过一次孙永勤穿马靴，其他时都打裹腿，着羊皮坎肩。部队有的人棉袄还露着棉花，有的穿生羊皮。

部队大部分人穿的都是牛皮缝制的靰鞡，里面装着草、纸，上面是裹腿，有的是布，有的是皮，腿弯处露着一些羊毛。也有穿缴获的日本军靴军服的，但没有整身的，外面裹着羊皮坎肩，一看就破破烂烂的。

老百姓对这支部队没反感。

传说，日本一个什么人的儿子或侄子让孙永勤他们给掏走了，日本人急了。

据说有支正规军从兴隆过来，奔喜峰口去了，孙永勤他们没跟过去，被围在毛山了。

毛山为孤山，像一个坟头，到了坟尖上，军事上陷入绝地了。

“老耗子到了猫山上了。”

他们绝对属于从溥仪伪“满洲国”杀出来的一支队伍，他们的根基在那儿。

原来一直属于打游击，毛山属于打阻击，不适应这种转变。从兴隆到遵化，一路顺风，打阻击战打不了。

毛山北面与庄客连不上，有两公里宽的大沟。东面与小于沟连不上，两公里宽的沟。往西三公里宽的沟，越往西山越小，只能叫丘陵。南面一块开阔地，断绝7公里。只有东北角一条很小的缝隙，从王家沟那条沟杀出来，往小于沟、喜峰口撤出去。据老人说，冲出去一次，但往回一冲，死的就多了。

没有战术位置，也没有战略位置。日军四面攻上来，打阻击打不了。抓山头抓错了，要是抓庄客、北岭，向东西两边撤，完全可以。只有毛山特别孤，吃亏在于抓了一个孤山头。日军抓住了三个点，日本兵炮能覆盖。

大块地有日军一个炮群。

惨烈，敢死队不是不敢死，是已经没有死的精神，腹中饥饿。

日军用的炮不应是迫击炮，应是两个轱辘的山炮，因直射距离有二三公里。

如由王家沟、迁西县高家房乡前往铁门关长城、喜峰口，也许能冲出去，因正是日本人空隙。但第一部分人一回来，则不行了。

据说第一阵炮过后，下来的人有三分之二，约一千多人，但哥们义气，回去救援山上三分之一，则失败了。

这批人不正规，有的饿倒，有的撑死。统一指挥也不成，如留下敢死队，也许能冲出去。如果敢死队留在山头，用一百多人换一千多人，也是胜利。

如早一点占据大块地一线，可奔马家沟（庄客村的一个自然村）、柴户场，如果抓长城，



绝对是胜利者。炮战没经过，最多是轻机枪。打近战夜战成，游击习气，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阻击战不行。日本人也把他们专钻山沟的特点摸透了，所以占住了三条山沟。日本人上山时，炮火延伸，这时正好三分之二的人回来，所以死的人最多。

冲到小于沟就安全了，往东北就能冲出去了，后来冲出去的人也走的是这条道路。当然这是现在的猜想。

没有一点迹像要打仗，突然听说毛山上上来人了，也不知是什么人，老百姓只能跑。民众三分之二人翻回去，老百姓都不明白怎么回事，都觉得仗打得不明不白。

过去打仗以高为准，以为毛山高，没想到日军用的是炮。

说到枪，日本人三八大盖能打三千五百米，汉阳造只能打两千五百米左右，差一公里。再说准确性，汉阳造肯定不如三八枪。

这块属于国民政府管，警局子（即特警队）对民众说，你们必须撤到关外去。警局子没过邦宽公路（即邦均至宽城公路）。

尖山屯战斗经过

讲 述 者：陈瑞祥（91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尖山屯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陈瑞祥老人　2006年4月

陈瑞祥（91虚岁，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尖山屯村村民）：

尖山屯，明朝时有一个山西省临水县的人在北京做官，坟埋在村子北边。扒坟时，发现石碑上写着叫尖山公，从那时起叫尖山屯。现有500多人，养牛户不少，挤奶。离大寨8华里，离遵化24里。

我那年21岁。

民众四月十八（阴历）到尖山屯，北山、南山都站上了岗。军官在本村老刘家住。有两个老道一掐，说有危险，应往东北撤。山上全是岗。日本兵进了关，到了茶棚，车撂下就打上了。民众打不过，撤下来，日本兵就追。到东双城子北，日本的兵撤回来，后来到了关外。日本兵用的是捋管炮、歪把子机枪。孙永勤到毛山，日本兵二次进关，围了，都死那儿了。

那时（指尖山屯战斗）打伤了一个民众，在新立屯五道庙子养伤，大伙给送饭。养了好几个月，才回去。

狗肏的老蒋，日本人都是他放进来的。要不是老蒋，日本人能进来？宋哲元打了那么长时间，都是老蒋让撤下来，这事忘不了啊。

冀东22县之后，保安团变成治安军。

土匪猖狂，打杠子劫道，那时候没人管。当地庄稼人当土匪、流氓，没钱花，绑点人，要点钱花，好人没人干那个。土匪拿大棍子就进去，财主把墙盖得特别高，财主全跑到城里去。

老穆穷，把妻子的镯子卖了，买挂面，想回来挣俩钱，在村西边让人抢了。

韩凤岐家穷，搬口外，后种田发财，从口外搬回来。黑夜把一孙子和一户老奶子给绑走了，绑到南山上。孩子80大洋，老奶子100大洋。家里托人赎，把钱交了，放了。



民众子就是庄稼人打扮，穿啥的都有，要不叫民众。对老百姓不错，就是有枪要枪，都比日本子强。

中国人要是没有汉奸，就鸡巴点日本子，有多少啊，中国人要是齐齐心，凿也凿死他们。多少人扶持他们呀，治安军、保安团、警备队、大褂子队、特务都帮着日本人。

日本人对中国人就跟捻个臭虫差不多。

治安军比保安队强点，就数特务难揍，本地人。

回忆父亲李子华

讲 述 者：李小伶（61虚岁）

讲述时间：2006年4月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李小伶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小伶（61虚岁，原遵化市工商局干部，李子华的女儿）：

父亲属猪，如果活着，今年109岁。

原名尹福坤，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哥三个，姐三个。上有两个哥哥，父亲排三。家里总想把他过继出去，主要是穷。他总在崔各庄姥家住，躲在那儿，怕过［继］出去。十三岁才回家，还是过继了出去。过给宫里村一户老头、老太太，给比较富裕的人家做长工的，改名李福坤，字子华。十几岁开始学习武术，武艺较好，好打抱不平。66岁还练大刀、九节鞭。1933年入党。冀东有一段，农民党员不发展。

当时地下党没有活动经费，父亲把爷爷奶奶的棺材板卖了，把钱交给党，解决经费问题。后来兰村一位叫宋子义的地下党员知道后，马上把自己家的树砍了，破成棺材板，给爷爷奶奶送去了。

曾有一个重要人物在家里养伤，当时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窝铺里住，父亲对他说，只要我在，你就在。

在五里桥，父亲跟李楚离分几次联系。联系方式是，一按第一粒纽扣，对方一按礼帽，接

着对行话："花生。"答："弹药。"

曾打进战区保安队里面当武术教练，启发官兵抗日爱国。参加过四次农民大暴动，特别是1938年冀东大暴动。

1938年暴动时父亲是新五总队总队长，县委书记是政委，围攻过丰润沙流河镇日本据点。1938年秋，八路军四纵和一部分暴动队伍撤平西，整个冀东党随之迁平西。父亲走后，家里由于贫穷，一个月内连续死了两个孩子。冀东党在平西整训后，又返回冀东。父亲由于当时身体不好，留在平西，司令员是萧克。在平西根据地，父亲先后担任过粮秣科长、军需科长、代理供给部部长。根据父亲回忆，延安最吃紧时，曾组织过毛驴队，把布、盐、药品从山里绕弯送到延安，受到嘉奖。其他很多队都被阻截了。1942年后，父亲在晋察冀边区十一军分区负责采购经济工作。抗战结束后，到冀东负责部队后勤供给，任冀察热辽军区供给部冀东办事处主任。以后转业到外贸部中央对外贸易学院。学院后来搬到了鼓楼，即现在的经贸大学前身。1954年，妻子患肾炎去世。回家去祭祖，从北京回到遵化家中休养，1969年病逝。

马子敬，1938年暴动后，敌人来抄暴动领导人的家，他媳妇在看场的棚屋里搓玉米，涂脸，混过去了。他嫂子被抓走，给打得死去活来。

孟寿田，化名冀光。在孟家铺以教学为名发展党员，1933年发展了李子华等人，孟家铺首批党员。1947年牺牲在赤峰柴火栏子。

日军调兵进关经过

讲 述 者：赵金山（55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政府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金山（55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村民）：

父亲当时十三四岁。

父亲说，日本子从口外用骡驮队驮着机枪、小钢炮，由半壁山、蘑菇峪、三道河子三条



沟，调兵调了一天一夜，到九虎岭变电所这儿把炮支上了。日本子觉得可在毛山打一决战了，高兴坏了。

父亲说，孙永勤部见日本人多了，就躲了；人少了，就把他们灭了，说日本人都叫孙永勤“山耗子”。

父亲当时在三道河子乡瀔河南大东沟亲眼看见日本人调兵，后来“集家并村”才到毛山沟，招赘到毛山沟。日本子往这边走，一听说打孙永勤，呲牙咧嘴，瞪着眼珠子往这边发兵。

让老百姓牵着骡子，或者推着骡子屁股，牲口流着汗，往山上驮炮。老百姓挨打，拿枪托子砸。三路、四路纵队往这边赶。往哪儿跑呀，跑不了啊。

吴艳民谈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吴艳民（56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3、1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政府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吴艳民（56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信访办信访科员）：

唐山矿警子赶过来，在大寨堵截孙永勤部。

毛山顶上工事是国民军构筑，正山顶上有一个重机枪阵地，三条腿那样的。

如果一拨抓毛山，一拨抓三里店，一半人得出去。傅家城、驸马寨、大河局子、马蹄峪这块根本没布防，往鹫峰山也可出去，古北口兵没从这边来。

小于沟，一个姓于的立的村，但是现在都姓吴。

小于沟当时百十来户。

奶奶当时正坐在院外自然挖出的一块棕色大石头上，石头很平，孙永勤来了，说，大嫂，这石头挺好啊。共在我们家住三次。

孙永勤从洪山口、九虎岭经小道到小于沟。往正东，翻山可到马台子。往北走，经关庄可到官台子。小于沟是前往瀔河桥、喜峰口的交通要道。

三里店，传说松棚营守边关的一个营盘里，一个弓手一箭射出三里，最初叫“三里箭”。

小厂，传说中的唐王征东时炼铁打造兵器的厂子。

孙永勤住小于沟，为什么不从村南过去，为什么从马石沟过去？为什么以后又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日本人飞机从哪儿来？根据它的航程，如从喜峰口，当时的飞机飞不了这么远。为什么专绕毛山西，而不绕毛山东？当时附近没有飞机场的记载，日军飞机从哪儿起飞的？

当时潵河桥没有飞机场，喜峰口建不了飞机场，如在下板城，飞到毛山，再转几圈，已经差不多了。

奔遵化来的古北口日军到得很晚，毛山打完才上来。如冲过三里店，就没事了。

孙部一部分人当时确实冲下来了，奔秋花峪下来，但下到一半，又翻回去了。为什么翻回去，至今令人不解。

日军使的应是九二步兵炮。

我是当过兵的人，知道孙永勤就该死。

死人主要是西坡，东坡少。像吴显来说，在东坡没看见飞机，只听说有。

吴凤卜，管他叫六大爷，长袍马褂，扣碗帽，比较富裕，是学校校董。经常跟我们拉，他说民众是土匪，跟别人观点不一样。那个人待不住，说话还结巴，在狗剩台子屁家沟被日军逮住的，往秋花峪押时跑的。

毛山，一九六几年乡里办的一个林场，各村都上山上种树，才有树。上学时，带一个收音机，播毛主席第几次接见红卫兵，那时种的树。

父亲1934年初入党。

官台子，在迁西与遵化交界处，属迁西。当时哪儿死人哪儿吃官司，一个要饭的，倒卧儿，庙岭山极乐寺庙里的和尚崇泰把界碑从山背上往山下挪了一百米，这样他就不用吃官司了。

极乐寺，唐王东征，饿了，搭箭打野鸡，野鸡咯咯叫，飞了。唐王问，啥地名？答，庙岭山。一看有个庙，叫极乐寺，唐王说，怪不得打不着鸡呀。

舍身台寺庙叫栖云寺。

小时，十六七岁放羊时，毛山上面太阳，下面下雨，九虎岭上面下雪，下面下雨。

九虎岭上春天开的花有：二月蓝、鸡鸡花（也叫白头翁）、冻青子花（也叫金达莱，越冻越好看）、苦菜（马山菜）。

狗剩台子前开着羊妈妈花。

何万勤、刘国梁忆毛山战斗

讲 述 者：何万勤（68虚岁）、刘国梁（83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杏峪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何万勤（68虚岁，原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杏峪村会计）：

飞机扔炸弹，主要是炮打的。

刘国梁（83虚岁，原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杏峪村党支部书记）：

1944年入党，当过乡武装班长，村治保主任，贫协主任，党支部委员，书记。

那年在遵化住，家里都没人了，都跑了，在遵化看见打毛山。

民众以前是土匪，后来叫民众，民众改的八路军。

民众有点破套筒子，有时给点棉衣裳、单衣裳，灰的，白布用苇叶染的。把苇叶烧成灰，在锅里煮，放少许盐。

让人家追的，没法了，跑毛山上，听说是二三百人，有的有枪，有的没枪。

底下是日本兵，上面是飞机，没处藏，没处躲。炮是老磕炮，用的是铅弹，炮膛里装的是羊粪蛋大的炮弹。打在毛山上了，小牛子沟了，都死在那儿了。把毛山打完了，回去瞧瞧。瞧啥呀，房子点着了，民众让人打那儿了，冲出去没几个人。这咋弄啊，这儿一大腿，那儿一脑袋，那儿一骨碌肠子，不好听（指味道不好闻）。陆占和说，你们上去，盖盖吧。就盖，后盖不过来，不盖了。那狗就疯了，吃人肉吃红眼了。

毛山是日本子打的。

刘明贵背着他的孩子，跑到沟里，在那儿躲着，待了一段时间，说，忒饿，得回家找点吃的。孩子也闹。走到下边村委会这儿，被日本兵扎了脖子，一刺刀扎死。

庄开云忆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庄开云（89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小于沟村王家沟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庄开云（89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小于沟村王家沟自然村村民）：

16岁时给庄里站岗，放倒消息树，让日本人看见，放石头，双腿被砸伤。

王家沟当时就自己一大家子。

老哥四，两大家子，三四十口人。

日军由草场子上来，那天借的驴，打白薯垄。日本子把民众围上来，应是龙井关、澈河桥方向的，自己跑到山上。

炮从官台子往这边泻。

打民众时，飞机一个劲儿过。没扔炸弹，都使炮轰来着。

秋花峪死了三百多人，王家沟这条沟死了二三十人，哪儿都埋。

秋花峪李福尊一家被杀六口。

民众在这儿吃饭，好几十人，日本探子郭天禄探听走，民众发现后就走。在南边顶回来，上毛山。

狗剩台子那儿，日本子打完仗，在核桃树下吃饭。那树有一搂粗，有一民众跑到核桃树树尖，日本子没发现，后跑到马石沟去了。

闹过绑票的，当地人。

民众时，村里年长的人就自发组织放哨，风气特好，不然为啥八路军总住这儿？抗战时出去三个县委书记级干部，一个伪军都没有。

李清来讲述毛山战斗

讲 述 者：李清来（57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秋花峪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清来（57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秋花峪村村民）：

秋花峪，早先叫丘虎峪。有一个老道叫金永，他修的墙，下山都骑着虎，把虎放在这儿。一九五几年改地名叫秋花峪。

秋花峪村沟长六华里，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

有可能李福尊杀了三个日本兵。

只有李福余（弟弟）跑了，李福尊确实和民众有联系。

大兵离李福尊家二三里远，参加过清兵，用刀杀死日本人，大兵也让日本人杀了。

杨树洼梁死了很多，不止几百人，都上垛了，发水都是蓝的，因民众衣服是蓝的。

死的日本人都用劈柴火化了。

民众好多只有扎枪，甚至扁担。

每个小山头都有机枪，用交叉火力封锁山沟。除民众外，还打死不少捡洋落的，不是本地人。

满洲兵，黄衣裳。

李昆峰忆宽甸、关门岭战斗（一）

讲 述 者：李昆峰（78虚岁）、李春辉（75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宽甸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昆峰（1930年生人，78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宽甸村村民）：

当时3岁，父亲和哥哥跑了，怕抓去。父亲走前对我说，就在炕桌底下猫着，满洲兵来了别怕。

后道上，满洲兵往关门岭上打机枪，追孙永勤。

孙永勤一个义子有病受不了，孙永勤怕落到敌人手里受罪，亲自枪毙。

李志清家当时在宽甸算比较富裕的，两层草房，前面有两厢房，数他房子好，有雇工干活。

关门岭从西城峪岔过来，明朝拓边时修的。

孙杖子离关门岭43华里，宽甸离关门岭3华里。

1934年、1935年时也就20多户，八九十口人，过年时串两遍还不到十二点呢。主要靠种地，地少，庄稼有玉米、高粱、谷子、豆子。

李春辉（75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宽甸村村民）：

后边一溜儿五间，西边三间是李志清，东边两间是李志轩。前边五间，西边两间是李志清，东边三间是李志轩。前后都是草房，草房前边有配房，两边配房是瓦房。



史耀清忆孙永勤（三）

讲 述 者：史耀清（86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史耀清（86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自然村村民，孙永勤表外甥）：

孙永勤的父亲不傻，就是老实厚道，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

孙二奶奶会扎痞积，扎风。

孙氏兄弟当中，属孙永勤最鬼头。

孙永勤有两个妹妹，一个嫁到王宝石老关家，一个嫁到城墙峪张家。

孙永勤确实是三儿三女。

孙永勤的亲哥哥在外地被害。

孙文顺是在去毛山之前出生的，大东沟。

孙永勤有可能属龙，好唱戏曲，性子暴。

蹴拳捋腿那就是武术了。

两三个甲一个学校，得趁的才办得起。

孙永勤有可能在张杖子念的私塾。

孙永勤好唱，当地叫“山坡羊”，山坡上砍柴禾时唱的，内容是影戏，像“吼断桥头水倒流”，个人解心闷儿的。好看书，老《三国》。

高粱、谷子、玉米、杂粮都种，栗子树也有。山上有山羊、狍子、虎。打虎人少了不敢打，打虎时少。

岳老亮雇的院兵都是日本子，四个炮楼。孙永勤打主要是要枪，有枪才上来人。丫头不大呢，都在我们这儿躲着。燕子过来，可以打下来。枪法好，我有威望，可以带队。外号叫“大柜”。

岳老亮，挂“老”字的，都是喝的号。岳老亮真名扬出去不远。岳老亮不算太恶。不种千顷地，不打万石粮。地出租。雇日本院兵，白天黑夜把着。后来一点一点把院子里的东西都弄出去，都弄空了，粮食没剩多少。

棺材里摆三趟，接一个捡一个，捡回一半，铺的大洋，普通人是制钱，再把人抬进去入殓。

岳老亮四个炮楼子，八个人换岗，人少打不进去，他子弹充足。岳家有势力，雇日本院兵，子弹有的是，三五十杆枪打不进。岳家有钱，跟日本官一说，要多少人去多少人。孙永勤想把岳家打败，势力消灭，还能得枪。“无论如何要把岳家拿下来，不拿下来，北边消停不了！”双方损失都不小。

大顺兴[1]离煤矿不远。并不是跟大顺兴有仇，是因为岳家跟日本子连着，弄下来，枪、子弹都有，才能镇住。伤害不少人也要拿下来。

尸首都扒出来，看谁还敢摆活？他拿下来，别人谁还敢冒头？

孙永勤性子暴。主要是地里汉，打不平。主要是日本人进来不服气。要枪，组合，配给，五户该不着一包洋火。放组合荞麦，就是苦荞麦，吃时好吃，放不着小米。吃盐完全靠日本供给。

孙永勤，一个不怕老婆，一个不嫖女人。我既革命了，再顾着你们？你爱躲哪儿躲哪儿，能躲就躲，我就革命了。大男子主义。

三角旗，多半拉月牙，黄色，红底。

孙永勤起义就是因为不忿。日本子进中国，使点火柴、穿点布还配给，起伙会，揍他。

抄大顺兴，把丫鬟给抓回来，跟手下人说：“每天打仗，你采花就挂花。”底下人偷着采花，不让孙永勤知道。“让大柜知道不行啊，真崩呀。”

孙永勤不采花。

孙永勤住在红石砬，媳妇让回来一趟，孙永勤说，没时间。

孙永勤弟弟哑巴，没说过媳妇。

伙会叫会长，孙杖子之前有个会长，说话没孙永勤有威望。

孙义香（准确名字为“孙永香”，下同）跟孙永勤是亲戚关系，两个人意见不一致。孙义香没走孙永勤的道路，所以打他。

老道，有两个，一老一小，小老道姓商。最开始是老的，姓什么记不清了，早晨起来算卦，有喜有财没有？仗能不能胜？比如三号五号不行，得八号才行。军师算得很准，还不伤人。四十多岁，比孙永勤大，有胡茬子。后来，留胡子不留头，怕挂花了不好裹伤。老老道对人和气，和孙永勤一块吃住，不穿道袍。看庙时穿，起义后不穿了。打毛山，推算来着。吴家沟有日本子，准备打。推算下，说不行，推算不出来，人家把的道路忒多，咱们有法进，没法逃。说往后找，还不行，说推算不出来，得败，除非早着点，哪号哪号试试。找不出来，不中，非得打。

吴家沟，孙永勤问，真推算不出来？前推后推的。老老道说，不中啊，这个卦里头……

[1] 岳老亮在车河口所开商号的名字说法不一，除“大顺兴”外，尚有人回忆为“大成兴”、“大昌兴”，认为应叫“大成兴”者居多，准确名字已难考证。



老老道推了好几天，也推不出来。孙永勤待着着急，说这东西要拿不下来……

老道找，睡不着觉，最后还是说，死路一条，不中啊。

孙永勤说，不行，调，围。里三层外三层的。

到了，还是败了，头让人割去了。

孙永勤对老道说，往细了找。老道说，找不好，凶多吉少。孙永勤说，不信这个了，揍，调。这一拨那一拨围，里三层外三层。

老老道没死，可能隐了。

小老道道行浅，不出名，但是人在孙永勤跟前是军师。摇卦，“注意，今儿个有敌情”。看书，拆八字。

两个老道都是北边来的，看大庙的。

那要不是好汉子，不大男子主义，起不来，惦着妻子儿女的，气不忿。要不是一条肠子，前怕狼后怕虎的，一个人碍着什么事，人家革命，豁出来了。

雷永兰跟他差七八岁，在黄花峪躲二三年。让他来，不瞅不看，不打听，气地。

史耀华常回家。雷永兰让史耀华捎话，史耀华说：“中，也没时间啊。”史耀华说，人家那大干部，天天看老婆，底下还不都回家。他不动弹，谁敢动弹。

黄花峪离红石砬不过二里地，不回来。

雷永兰那叫守了多半辈子寡，从拉出去到死也没找主，五个孩子都是她养活的。

几个孩子都藏在黄花峪。山沟里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山里跑。大川里不敢待不是？

女儿最小的四岁时，孙永勤起的义。

雷永兰没有卫兵，都是找亲戚，山沟的地方，半个助威的都没有，各想各的地方。

雷永兰背地里骂：“大盒子背上了，把他妈都忘了。”

史耀华经常背三八大枪回家，讲孙永勤说过：“妈那个×的，地主富农不打垮了，枪不给部队装备起来，不能饶啊，给日本子溜须。”老婆说：“管那个干哈使，孩子老婆都撇了，你就自个一人吃饱，把我们裹裆尿裤的。你说你逞那个强干啥，当军头子，还大柜！”

孙永勤有两个警卫员。

孙永勤显过两次黄狗。孙永勤在车河打大顺兴时挂花，腿擦一溜儿皮，躺担架上，跟前一个大黄狗趴着。有的说：“死狗，人前趴着。”醒了，就没了。打吴家沟，显原形了。大哥说了好几回，表姨父那是天星下降，不是凡人。大哥问雷永兰：“表姨父不是属狗的？”雷永兰：“嗯（摇头发长音，“哪儿呀”的意思），属龙。”如果属狗的，那是七阳出窍。过去黑狗多，看见孙永勤时都是黄的。打毛山时，死时黄狗显圣。

孙永勤开始就一把盒子枪，别腰上。后来是两把德枪，让两警卫员背着，但自己也有一

个。就是大男子主义。

老百姓主动找到他："我也来干，行不？"

房子凶着呢，动静大，不是这儿"砰啪"，就是那儿"砰啪"。孙永勤死后，儿子们都不敢住，住到另一处去了。西头头一户，台子上是坟圈子，没人住，其他人都在庄里住。距离有半里多地，孙永勤在那儿盖了三间房。挺好的一个窝里圈，就是风脉忒硬。没厢房，独房独院。院里三间，瓦房，一盘井，院外是碾子。碾子是唐山石头，自己打的。

他家的地，实际有三五十亩就了不起了，种地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孙杖子卫生院那儿。

孙杖子那时也就五六十户，都姓孙，没外姓。过去没杨树、槐树，只有柳树。也没瓦房，全是草房。

那时候，马金贵，一般的户都养头毛驴，它吃草不是？不给粮食。他的部队人还没吃的呢，哪儿还有牲口啊。都是白天在哪庄待着，夜里干活。该出发了，摸那儿去了。

那时候要挂花了，能骑驴的给送去，不能骑的，两个人担架送。

孙永勤骑过两天马，挂花后，找地主借几天马，找人经办着。要打仗了，"你回去吧"。穷人哪儿有马，连驴都养活不起。打下板城时，得了几匹马，哪儿养得起呀。

大喀嚓山。

孙永勤一没，没头头了，底下仨一堆俩一伙成土匪了。

孙永勤受伤地是饮马坑，也叫河口南山，孙杖子下边二里地。

大户养枪，国家配购。户大点就养枪，连珠，套皮，马拐子。

孙永勤趁个鸟子枪就了不起了。

张如增趁三个水连珠，派购的，就了不起了。

当地枪械有洋鸟子、火炮，这都是火枪，还有单子、水连珠、马拐子、套皮，后三样都是一压五发。

张杖子、孙杖子叫黄花川。

哥哥在军法处，黑夜去抓几个大户来，审，要枪。没有，揍，使皮带鞭。没枪交钱，弄不出来的，走哪儿带哪儿。几天交不出来，就拉出去，埋了。

秧房，关押秧儿的地方。各拨不是都有，只有大队这儿有秧房。

史耀华，管他叫"黑小子"，打人狠着呢，都怕他。

到哪儿都吃大户，要二斗米，几只鸡，哪儿有钱买呀。羊中不？中。衣裳没有，士兵回家要去。

还有使战刀的，打的铁刀的。

穷百姓不反对，不藏不躲，也不害怕。

大户都翘杆子了，有家属啊，“哪去了？”“出门子了。”“看起他来！”

张如增在迁西就三个锅伙，院子里有粮仓。

张如增，土鳖财主，也使院兵，不是日本兵，自己花钱买的枪。

日本一个守备队有一个中国翻译。

一个讨伐队的满军里有几个日本兵，掌握电台。

日本子并不恶，恶的是汉奸。

中国都害巴在中国人身上了，日本子一点点就恶了。开始卖鸡蛋，人家要多少钱的就给多少钱的。以后就不这样了。

当时种地，高粱、棒子、谷子，白薯都少，豆子，有三棵两棵栗子树。

土匪：砸个姑娘，打个杠子，白天装好人，晚上下夜就是土匪。

张文如谈孙永勤

讲 述 者：张文如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聚宝盆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文如（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村民）：

黄土梁子，去蘑菇峪必经之路。

黄花川源头在双山梁。

张如增土改时被批斗，病死北京，善财主。大儿子在台湾，滦河、包头各有一支。

孙永勤就绑张家、岳家俩大户，要枪，要钱。

孙永勤打仗去五凤楼就从这儿（指张杖子）走，一天就到了。

何树宝谈孙永勤

讲 述 者：何树宝（47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聚宝盆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何树宝（47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村民）：

孙文炳说，就叫牛鼻子老道，让往北走。是地下党，三个。孙永勤非要往南边要枪去。

孙文炳说，毛山没看见孙永勤尸首，只看见狗。

把孙永勤围在积善堂（即张如增家），就看见一条狗。

张廷云介绍张如增情况

讲 述 者：张廷云（85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村部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廷云（85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村民）：

我那时十来岁。

上瓦房，给老二了。下瓦房，张如增自己住。

张如增是哥仨，张如增、张如辉、张如兰。儿子三个，张文弟、张文兰、张文辉。

一开始，置地，上至承德，下至迁西，乌龙矶、车河口、潵河桥，好地都是他的。置铺子发家的。善财主，穷人卖柴禾，秤平平的。有院墙，有管家，没护院的。



雇五六个伙计，一个打头的。半个月改善一次，粳米。平时都是一天一顿干饭，小米、高粱米，两顿稀的。平常都是豆腐。

打猎，山羊，狍子。

日本来之前，孙永勤也吃大户，为枪。

爷爷张永仁跟孙永勤干过，也说他好，为了抗日不是。

张如增病死，1938年、1939年左右。

一般没人去，挺大的院子，院墙，挺深的。

岳老亮，日本子进来，就把院子给占了。孙永勤费了好大劲。

大顺兴，非大成兴。

车河口庄，过去是水陆码头，人家挺多，估计有100多户。

黄花川，从柏碰子发源。有西黄花川、东黄花川，东黄花川在宽城。

日本子进来后，整个黄花川（指西黄花川）划为一个甲，北至罗降梁，南到南大梁，西到广东山梁，东到河口、滦河，都是一个甲。甲下是牌，有牌长。

陈永会谈杨佩之

讲 述 者：陈永会（82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村部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陈永会（82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村民）：

孙永勤父亲，二憨子，说话不真灵。

最早是孙永宗会长，奸臣似的，黑胡子，发疹。团会，会长。

杨佩之，开始在王宝石当老师，后到张杖子。挺大



陈永会老人与女儿陈翠莲。2007年4月

个子，微胖，约30多岁。手里出来不少学生。

我跟他念过三年书，他儿子和我一块念书。

岳老亮大儿子叫岳书桓[1]。大户，趁枪。

黄花川，过去有黄花，小时候黄花还不少呢。黄花川发源地在双山梁，从双山梁到河口25华里。过去水少，发水时才有。

山叫月儿庵。

北面是罗降梁。

孙中彦讲述孙杖子孙氏迁徙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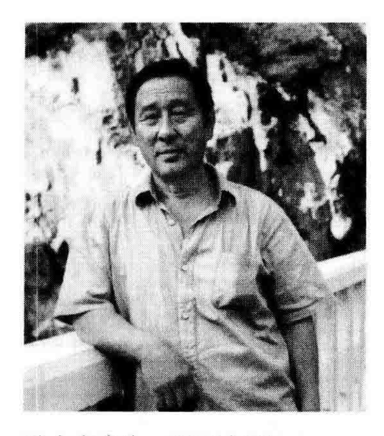
讲 述 者：孙中彦（59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中彦先生　2008年7月

孙中彦（59虚岁，家住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自然村，原蘑菇峪乡办公室主任、乡土地站站长）：

爷爷、父亲在世时常背《孙氏家谱》。据他们说，我们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杏花村柳树底下人氏。有孙广先、孙广召兄弟俩，孙广先到了寿王坟，孙广召乾隆时挑着担子到了蘑菇峪宋杖子。西山，祖坟在那儿。过去上坟时，宋杖子管提供锹镐，上完坟还管一顿饭，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宋杖子第一户，地方是咱们的不是。

孙广召后人后来到了张杖子。有个人在列门子附近的河里下“mí”（音迷）。“mí”这个字怎么写，不清楚，总之意思是捕鱼，在河里放一个酒壶似的嘴小肚子大的东西，过去人们管它叫“xū long”（音虚笼），捕鱼。一个姓雷的人夜里去偷鱼，

[1] 岳老亮大儿子名字还有“岳珠环”、“岳著环”两种叫法，准确名字目前难以确认。



被抓住，挨了打。姓雷的人就埋怨我们老孙家的人不去拉架，因为当时他们就在列门子那儿住。一气之下，把老孙家的房子给烧了。老孙家一个老奶奶觉得实在是太冤枉，就一个人蹬着一双小脚，翻过罗降梁，穿过隆坡洼，走100多里山路，到承德府告状。告了很多回，终于赢了。官司虽然是赢了，但老孙家的人们也不想再在张杖子住了。他们在张杖子村东三里多一块没人的地方，盖了房，定居下来，于是有了孙杖子。

当时住在列门子，现在大坝上面一点。七几年修水库时，姓雷才几户。

据老人们讲，孙广召生了四个儿子，孙红、孙秀、孙祥、孙利。后代是良字辈，孙良青、孙良武、孙良玉、孙良书、孙良毕。这几个人之后是宗字辈，孙宗尧、孙宗起、孙宗富、孙宗贵。宗字辈后，老孙家又经历了福、进、永、文、中五辈，中字辈后起名不再统一。

孙永勤属孙秀这支。

《孙氏家谱》以前一直保存在孙杖子。后来为什么没了呢？有种说法，孙广先、孙广召兄弟俩当年分家时，孙广先欠下了孙广召一块金元宝。金元宝有50两的、100两的两种，到底欠的是哪种，不清楚。总之这事被写到了家谱上，算是欠款的一个凭证。大概二几年，或许是三几年头儿上，反正那时日本还没进中国，孙杖子老孙家派人去寿王坟，找孙广先的后人们要这笔旧账。那时候的人都是用钱褡裢装东西，就是往肩膀上那么一搭的那种，就把家谱装褡裢里，作为凭据，走着去的。孙广先的后人们得知孙杖子来人意图后，也可能是当时还不起，也可能觉得都老辈子的事了，不应再提，总之是不想还这笔钱，于是好酒好菜把孙杖子去的人灌醉，把写着欠款一事的家谱从褡裢里抽走了。孙杖子的人酒醒了以后，跟对方提欠款的事，对方说，好，既然家谱上记着这事，那就拿家谱来吧。孙杖子去的人在褡裢里找，找不着，结果不但钱没要回来，连家谱也丢了。

以上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说《孙氏家谱》在下台子。

孙杖子一直到七十年代，交通都极为不便。八几年到大杖子才通车，还只有敞篷车。我记得清楚极了，脚冻得都不会走路，得用大衣捂着。下了车，还得步行五六十里山路，走罗降梁或者是猴山梁，才能回到家。要是从半壁山回家，到栗树湾子下车，走着回家。

过去没道，去大杖子、兴隆县城，要走罗降梁。

孙永勤最早在下板城起家。

孙永勤说，先从我开刀。孙永彦家有枪，起了枪。

张如增立的学校，请杨佩之、李桂攀教私塾。

过去上私塾先读三本小书：《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一冬三个月念完。随学以上三本小书，随学算盘，开立方，好的可以袖口褪（tùn）金，就是心算。

杨佩之会日语，毛山回来后，亲自跟我父亲孙文云说，日本人让他带着一个一个找孙永

勤，没有。

杨佩之也会推卦。

孙文炳毛山受伤，毛山一个老太太无儿无女，敬佩他是救国军，把他藏在猪食囤里，后送他一个数米（即念珠），那数米对着太阳能看到菩萨。后来老奶奶还专门看过他。

伙会，口里那边有伙会，这边没有。

孙永勤家祖坟在张杖子。

广东山、月儿庵是一座山。

孙永勤大房咳，可能肺痨死。雷永兰32虚岁守寡。

孙永勤盖完房后，夜里睡觉有人拍他脑门。睁眼一看，有人形，没脑袋。拿起枪或者扁担就追，出门就没了。请人看，说此地叫“灰飞烟灭”。

孙永勤不信邪，忒拧啊！

说孙永勤是二十八宿娄金狗下界。

先有西寺，后有钟游寺。钟是从潵河桥逆水冲上来的，钟上有孙家名字。

西寺和尚抢男霸女，黄天霸给收拾的，《施公案》里有记载。

1957年、1958年修兴隆到承德铁路，孙文孝等人修铁路，到罗圈沟找住处，被赶了出来。

大彭杖子公社社址正是岳家老院。

有关孙永勤家庭的一些情况

讲 述 者：孙中训（79虚岁）、孙继民（48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中训（79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自然村村民）：

孙永勤父亲就是太老实。

孙永斌、孙永连、孙永勤，老四叫“傻子”。

孙永勤的哥哥对穷人也可以，对孩子不管，想咋着咋着。

打猎的人不多，四五个一拨。有狼、山羊、狍子、兔子、野鸡。

庄稼有棒子、高粱、谷子、豆子，栗子树有，少，自己吃。

老百姓拥护孙永勤打日本人，因不让吃咸盐。日本人在栗树湾子设卡子，见到谁买了盐就没收。

大杖子那边说得玄乎，说孙永勤是天狗下界。头天晚上一个大星星落哪庄，第二天孙永勤准到。

孙永勤在毛山灭后，老岳家又把被分的缸等东西都要回去了。

过去黄花也叫驴鸡巴花。

孙继民（48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自然村村民）：

现在长的黄色的花叫“猫儿眼”。

任梦奇讲述瀑河口之战

讲 述 者：任梦奇（71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7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河南大峪村老房子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任梦奇（7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河南大峪村老房子自然村村民）：

我6岁那年，父亲被日本兵打死，随娘到老任家。

雷长玉[1]是我堂叔，在家务农，穷。孙永勤媳妇姓雷，孙杖子附近老雷家都是一家子。过去一块住，后来才搬到不同的地方，亲戚关系不远。姐夫起义，舅爷子跟着起义。

雷长玉哥五个，他排四，过不去20岁。孙永勤民众就在附近转悠，雷长玉、王福合都是队长。王福合，前坡峪人，仅剩一个亲闺女。

雷长玉中等个，没结婚，就走了。

孙永勤队伍清河口一拨，河南大峪一拨，贾安河路一拨。

围攻瀑河口老任家，任继文、继承、继武。秋天，早晨出去，中午打上，打到下午四点多钟。瀑河口有团，把团盯住了，团人少，总共100多人，孙永勤有六七百人。团打得枪管都软了，把子弹搁石板盖上，跑了。老任家都跑宽城去了。

从河南大峪到孙杖子，走需要两个小时，小道很难。日本兵只能顺黑河套跑车。

雷长玉起义时，老房子大约十户人家，60口人。日本人实行“集家并村”后，人口就少了。现在九户，30多口人。

孙永勤中地名了，“琴”就是“禽”，见“毛”，也就是见“猫”。

雷长玉应为好说的人，他专门绑富人，把地主儿子、家属绑来，让家人用钱赎。

[1] 任梦奇外甥朱金城认为“雷长玉”应写作“雷常玉”，原因是他小时候见姥爷的印章上刻的是“常”字。朱金城的姥爷名叫“雷常宽”，与任梦奇所谈的“雷长玉”是亲兄弟关系。据此，“雷长玉”当写作“雷常玉”。



回忆三姥爷雷常玉

讲 述 者：朱金城（40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朱金城（40虚岁，深圳市千秋家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常玉的外孙）：

雷常玉，后改名雷邦靖，1909年生，河南大峪老房子人。家中四兄弟三姐妹，三姥爷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四兄弟名字分别为雷常洪，是否是这个洪字不清，雷常宽，雷常玉，雷常来。三姥爷曾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大队长。据姥爷雷常宽说，三姥爷骑白马，拿双枪，负责河南大峪及滦河两岸。从毛山冲出来后，约当年冬天回到家乡。才回家，行踪即被人发现，报告给日伪。日伪来抓，三姥爷在河南大峪一带山中躲藏一个月，终被捕获。押到下板城，被日本人剖腹。日本人剖开来看他吃什么，一看，只有草根。尸体被抛入滦河中。

和三姥爷一同被抓的还有一个人，跟着三姥爷回来的。

三姥爷牺牲后第三年，即1938年，太姥爷先搬到了上板城镇白河南村小塘沟。次年，太姥姥带着大儿子、小儿子和一个闺女也搬了过去。大姥爷后来带着妹妹又去了东北。

赵来、赵廷普、张三牺牲经过

讲 述 者：赵廷良（74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廷良（74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自然村村民）：

赵来是中队长，亲兄弟赵福给日本人干事，在车河口局子当副局长。说有七八棵枪，让去，去了一投降，枪就是他们的了。结果事败，黑夜把赵福调走了。八路军来了，赵福被枪毙。

三霄洞，柴先生推八门，说那天不让出兵，伤属虎的。结果当官的不听，那天走了，赵来死了。

赵林、赵来，一正一副。

赵林、赵有修铁道，日本人不给钱。

起义那天，不从门走，从窗户走，少死点人。

老梁有梁东、梁西。梁东三四户人家，姓杨。

日本子打老梁时，母亲把我夹着跑。

赵廷普对象家就在大杖子，就等结婚了，结果死了。年轻，受日本官员气，满洲军经常抓兵，为日本子办事不愿去，结果当绺子了。

张三从毛山逃回，住四道沟山洞里。送饭的崔永明漏饭，下板城一个甲长叫胡品卿带人来，把张三绑上。胡品卿会日本话，把大姐，叔伯大姐，叫赵玉芝，保下。张三给绑在大柳树上杀了，刺刀捅，把头带到下板城，在警察署门楼子上悠荡。是崔永秀告的密。



孙永勤抗日与赵来之死

讲 述 者：任富（72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任家庄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任富（72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任家庄自然村村民）：

老爷子任福林说，山穷，好打围。

任家庄、崔家庄、赵家庄有火枪的组织成一块，有名单，但火力上不行。

有人报了，孙永勤闹绺子，在广东山上扎的根，朝东、西、南看多远，钻进去，全是柴草，看不着边，拉起来干。后来有人报了，在高家庄。来了日本兵，上屋一看，一老奶子在屋坐着呢。一抹胡子，老奶奶吓得往后一比划，日本兵上山了。在北山上看，滦河上摆渡的人不少。打，伤了一些，跑了。后来又来了，上南老梁了。那时十个情报一个真的，日本兵扛着炮弹箱子，看见洞就说有，炸，房子烧。

开始赵来厉害劲儿，两手攥空拳，啥也没有。老爷子回来，问："干啥上街？"说："上街，把街上警察撂倒，枪不就夺回来了。"后来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棵枪。

夜里，知道赵福在大杖子车河口，叫号，怕打着。其实赵福早跑下板城了。屋里人说："这么多人，怕他？"赵来就端着枪靠墙站着，被打死了。死了还端枪站着呢。一九六几年四清还捣这事呢。

军师也姓孙，老道，也参加，跟日本人打了多少次。

孙老道在庙下有两间房住。小时候放羊经常玩去，泥像后面有假山。三娘庙。

赵来、赵福是亲哥俩。

老百姓都拥护打日本人，日本人来之后什么事都做。

孙永勤根据地是广东山，老梁也没少待。

刚开始日本人也不像后来那么厉害，中国人谁跟他说实话？后来糊弄得坏了。

收税别说了，东西还没吃呢，牌长来了。要马料，没有得借去。"穿个黄褂子算军衔"，摊几升马料，论升不论斤，不给，揍你一顿。今儿马料，明儿马草，你就得给。哪儿有树，要道木，几家摊一根，就得给。不给，打，"三宾的给"一说，棍子就打你脑袋了。

那时，收大烟，有白花、蓝花、紫花大头三样，要让看见，拉一斤，恨不得要你十斤。你

想留下，没门。那时，大烟最值钱了。要十斤，到日本人手里也就六七斤。中国人来收，得听日本人的令。中国人也没办法。

国兵、宪兵、国兵漏子三种，宪兵最大。

收枪，厉害到啥份就不说了。我们老爷子有一个，收枪的去了，老爷子说砸废铁，卖了，把人支出去了。崔家庄有一崔永秀，坏，他都知道在哪儿藏着呢。老爷子病了，在炕上躺着呢，收枪的把老叔绑去。“要么把枪交出去，要不就把吃饭家伙割去。”太厉害了，那时有火枪太受罪了。把老叔（任福深）绑去多少日子，托了多少人，最后还是把枪交出去了。

崔永秀，啥也不是，跟现在地痞一样，弄点钱花。那哥几个都好心眼，就他坏家伙。哥六个，他老五。崔永秀后来有病死了。

火枪开始置时，是养羊等防狼，后来跟孙永勤部队用。孙永勤说：“组织你们时，就打。不组织你们时，就在家待着，种地。”孙永勤安排好了，打时，就组织起来打。

按老爷子说，对赵林、赵来评价都不低。日本人烧杀抢，谁不恨？房子烧了，墙都得推翻了。

其实，那时当兵的也不都是那么坏的，都是抓去的，谁愿意干哪。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不去，把你揍一顿。年轻人到啥程度，胡子留挺长，一看老头子，“不行！”

三霄洞地理

讲 述 者：张俊文（63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杨家洼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俊文（63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杨家洼自然村村民）：

自古以来，时兴庙时就有了，供的是赵匡胤的三个妹妹。

两条山脊环抱着洞，自然生成一洞。外面石头，水滴成洞。

原来路上有棵大柏树，刮风倒了。

坝台上，柴老道住，过去刨地还刨出油灯什么的。

杨家洼原来十七户，现在就剩我一户。放羊，七十多只。



吴建华谈岳荫臣后代情况

讲 述 者：吴建华（52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9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吴建华（52虚岁，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村民）：

老大岳珠环，没后代。老二在日本留学，参加国民党，又投诚到共产党。

老二的后代在集宁察右中或左旗，1983年、1984年左右带子女回来过。

我叔伯叔叔家婶子是岳老二闺女。

岳家大院旧事

讲 述 者：吴志平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9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吴志平（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村民）：

供销社所在地就是原来的岳家大院。最早有大影壁，八字形。影壁上有龙图案，上面是青瓦，檐上有两个龙头。1980年左右，当时主任是孙文英，上谷乡榆树沟门的家，拆西厢房，挖地基时曾经挖出来一个小坛，里面装有二十五块洋钱，一对半（即三只）金镯子，一个金麒麟。

孙永勤两打岳家大院

讲 述 者：徐文林（84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19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徐文林（84虚岁，原河北省承德县八家公社彭杖子村支部书记）：

我那时十二三岁。

岳老亮，真名岳荫臣，管他也叫师爷，河南的人。承德有个汤玉麟，有个师爷，红笔师爷，姓吴，叫吴少连，跟岳家有关系，是岳老亮的舅舅，岳家根据这个落在这儿。当时叫岳家城，院子相当大，约有二亩地，四周是院墙，有四个炮楼，都管叫岳家大院或岳家城。岳家城里，护院的兵有六七个，都是手枪，长枪是湖北造，炮楼眼里都是大抬杆，装火药。他手下的护院的，有不是东西的，像梁荫田、王国宾，还有一个姓马的，都是双手枪。以前有张玉书、小白龙、李海山，绺子，北边叫拉杆子，大烟鬼什么的都有，烧杀什么都干。

庙梁岳伙房煤矿就是岳老亮的煤矿。煤都是用口袋背，前面一嘟噜，后面一嘟噜，包括我老爷子的老爷子都给他扛活。

车河口大成兴，老岳家买卖，杂货铺，卖酒什么的商店，是老岳家分出的一个杈。王老瑞是大经理，这是他的号，王老瑞在后房，前面开烧锅、杂货。孙永勤的叔叔是给王老瑞护院的一个民团的团长。1933年，日本人已在承德城里，张玉书、小白龙等被日本人弄垮了，王老瑞在车河口说，张玉书、小白龙想整他，打大成兴，孙永勤的叔叔把民团团长给孙永勤了。有一个辛家庄的辛增祺，给王老瑞运子弹，应给孙永勤，孙永勤好打土匪，结果辛增祺都给绑票的了。孙永勤大怒，“我保你，给你护院，你给他”。孙永勤就有火了，就找到王宝石关元有，把大成兴给烧了。孙永勤就分得一匹马，王老瑞就跑到岳家城，调兵。

歌：正月里开迎春，迎春正发，

日本人进平泉，二月初八。

二月里开杏花，杏花不红，

何育民打电话，两下不通。

三月里开桃花，桃花深红，

四月里开梨花，梨花叶青，

白马川修铁路，民人去修工。

……

赵老子，名叫赵老俊，王老瑞手下的一个掌柜，被孙永勤枪毙。

拉绺子，就是绑票的。

老岳家用的都是火药枪，腰里两个卵子似的，装火药，火绳。后来有单子，后来湖北造，盒子枪。梁荫田等都会武术。

大门楼子，上面还有房子。大门是铁的，虎头钉，有看门的。孙永勤打了一天一夜，没打进去。四个炮楼都有大抬杆。孙永勤带二百来人，有三个土炮，炮楼都给打出裂纹了。打完，炮楼就不响了。

孙永勤抽大烟，大烟鬼，脸上有点麻子似的。我大娘抽大烟，孙永勤跟一个院住。孙永勤一上火，就要刮痧，说："谁会刮呀？"刮得血葫芦似的。

第一次，孙永勤没打进去。死了一个装炮的，一个人子弹从大腿穿过去，没死。早上，我二哥徐文有看见炮在那儿支着，在口里边关墙城楼子里挖出来的，牛腿子炮三个。装炮的被打死了，藏在二哥柴禾堆里。看见柴禾垛外有血，日本讨伐队给扒出来。见装炮的穿着羊皮，怀里还有花生。四个从九道岭抓来的孙永勤队伍里的士兵在影壁后让日本人枪毙了，小晌午前，埋在头道沟门。前些年，开石灰窑，挖出骨头。

第一次没打进来，孙永勤就扩兵。第二次来时，老岳家搬口里，岳老亮的媳妇是关家庄，口里。东西没带走的，都让孙永勤用船带走了，其他东西全给砸了。

第二次，那时候小，白天都在地里趴着，孙永勤黑天进庄了。据说孙永勤提一桶汽油，在影壁后骂老岳家来着。墙是沙石夯成的，点不着。去下板城煤场，把三间房子点着了。第二天日本军来了，孙永勤他们把一个日本人打死了。日本人想把全庄都点着了，老百姓跪下求饶，没烧。

小孩子去捡子弹皮，还有臭子，兜回家。我在树墩子上还捡了一个套筒子，背着回家。王国宾看见了，说："小孩小孩，背着什么东西？"让王国宾把枪弄回去了。

打煤矿城之前一年，岳老亮已死，四五十岁。何育民是大经理，负责管理煤矿、烧锅。何育民给日本打的电话。

岳老亮算东家，大少爷号岳珠环，岳老二叫岳列英，或者岳列营。岳老二，日本留学，回来后，1943年，在暖儿河乡当乡长，参加共产党。解放后在南方当兵，二十七团团长。三查五整，把岳老二查下来。家里一个媳妇，在南方又说了一个媳妇，金场的会计。去蒙古，坐飞机。

岳老亮为人，发财，啥事也没干，就抽大烟。发引，都扎上牌楼，搭上架子，写上大字。开锣鬼，打锣鬼。小屋画得挺漂亮，岳老亮尸首丘在那儿。

第二次，孙永勤调兵越来越多，何育民也调王司令等老奉军。老汤一倒台，兵干啥的都有，净给我面包吃。“小孩，过来。”孙永勤把岳老亮尸首弄老梁去了。

何育民后来调兵调不起了。后来，孙永勤骑大马从树行子过来。我在这儿放羊，他前面的马队都端着枪，怕有奸细。到大门口，张仝周打开大门，扫干净。张仝周，管院子的管家，在门口迎着。孙永勤怕空城计，进去后，就开始砸，天津字票子都从墙里给扔出来了，我们捡了好多。

何育民可不行，放高利贷，起租子。

王老瑞到这儿来，何育民保着王老瑞。

何育民，以后八路军经常来，搞秘运，夜里砍电线杆子。后来“集家并村”，何育民从老岳家出来。国兵十一团住在这儿，庄里是日本宪兵队。日本人往东去，何育民送他们。他身上有八路军的麻袋票子，被检查出，说：“走吧。”把他捆上，有个贠贺庭，是何育民手下的，在门口看见了，日本人叫上一块，在八家子北沟枪毙的。

王老瑞后来有病死的。

王老瑞大名王成，号王老玉，是狗腿子，恶气着呢。打场，都是黑天打。要是白天打，过冬粮都留不下。王成抓起一把粮食，从手往下流，“不行，有谷糠”。“啵”，用斗搪子往下压，可压下半升谷子。

老汤在时，院外河套有卖煎饼、豆腐脑的。三百多只船都是官船，给老岳家往承德送煤，船上都插着红旗。暴发四十多年，承德烧的煤都是老岳家供的。私人不许送别的东西，只能给老岳家送煤。

岳老亮在家就跟大爷似的，多少个丫鬟伺候着。影壁旁，有六或八个大粥缸，穷人没吃的，用瓢盛。自己是小孩，住的近，想多弄一次，狗腿子认得人，“不行，一人一瓢”。央告也不行。实际上老岳家粮食从哪儿来的，吃租子，又舍你。

孙永勤来时，岳老亮尸首还没坏，从口里抠出一块玉器。岳老亮死，已接近三年了，发引都过了，三周年发引呢。把他尸首用席卷抬走，抬到老梁一个炭窑，要钱。

岳老亮发引，搁在院外花园里。有花，种菜，盖了一个小房，墙上有各种各样画儿。

个人认为，把岳老亮尸首抬老梁，孙永勤也在老梁遭受打击，挂花。

吴少连上口里弄大烟什么的，在潘家口、喜峰口那儿有海关、水闸，只要师爷在，就不用检查。

庙梁煤矿最早是老项家的，后来给吴少连，后来送给老岳家。老项家是坐山户，说河套都是他的，过河不论摆渡还是趟水都要河底钱。自己小孩管他叫项大鬼，追我没追上。



羊贩子淹死好多羊，抱着脑袋哭。要是多花点钱，雇点人，花点河底钱，不就没事了？小日本倒那年冲的，下雨七天七夜，部落墙都倒了，也怪。

滦河，鸡冠山。

孙永勤当绺子是生让人逼的。

岳老亮净在后面抽大烟、吃喝玩乐了，哪儿都不去，出去恨不得都丫头伺候着。大媳妇也是河南的，没生养。二老婆生的岳珠环、老二。杨秀山的女儿（应为妹妹）杨培贤给岳珠环了。双手使枪，小脚，蹬梯子，上杨老文墙，上一个，打死一个，文化深着呢。出嫁时，坐骡驮嫁过来，漂亮着呢。杨家看不起老岳家。据说，岳家去提亲，杨老文说："你不有着（音zhāo，即办法）吗？先给我驮三驮子金条、八驮子洋钱。"第二天给驮去了，杨老文说："中了。"

杨培贤为人很好，死七八年了，死在乡敬老院。

小白龙等闹了一年多，1930年左右，日本军一来就跑了。彭安祥他妈和妹妹跟他们走的，妹妹很小，怀里抱着。据说妹妹后来被劈掉，反正没回来。

回忆父亲张福义

讲 述 者：张德兴（78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德兴（78虚岁，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自然村村民，张福义之子）：

父亲做点买卖，用两头牲口驮羊皮、狗皮、棉花，从遵化左右往北边承德、围场去卖。冬闲时做买卖，父亲和两个哥哥一起。庄稼有玉米、高粱、谷子、豆子。

那时还小，记得孙永勤来家几趟，后来父亲就跟走了。孙永勤媳妇跟着一块来，孙永勤戴礼帽。父亲大个子，一米八得多，脸上有几个麻子。母亲不同意，能挡住了？

大哥张德泰，二十三岁死在全宝河西山。二哥张德录，十九岁死在村子一块地里，同一年被日本人打死。

大哥、二哥头年死的，父亲第二年被抓到兴隆，死兴隆了，给打散了。在兴隆宝地地方，有我一个表舅，父亲、我妈、我三个人住在表舅家。有人告密，父亲被抓到兴隆警察署，传说被铡成三截。母亲带着我藏在后面高粱地里，后来又找，正问到母亲身上，问："张福义媳妇在这儿吗？"母亲说："昨天在这儿，今儿去大庙西了，大水泉亲戚家去了。那儿有他家亲戚。"老奶子说话脆生，日本人就信了。母亲和我又跑到一个叔伯舅舅家了。

六岁父亲死，七岁回到家。回来后，一个叔伯叔叔把我们接回来，又找人请的客，都是为"满洲国"干事的人，有头有脸的。



王桂英介绍张福义父子情况

讲 述 者：王桂英（82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桂英（82虚岁，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自然村村民，张福义儿媳）：

日本军官相中他（指张福义二儿子张德录），说兵："这小伙儿挺好的，你把他打死了？"把左耳割下，包走了。

刘家店北沟刘子斌也跟一块干来的，说是来兵了，顶着桌子从山沟里出来，想认不出自己是谁，好跑。带道人说："他叫刘子斌，也跟他们干。"就给打死了。然后进山沟，围住二哥他们，也给打死了。父亲早没了，自己也没说媳妇。

俩大儿子能耐，办啥事都行。爷仨儿死了，婆婆成天哭，眼睛都哭得看不见人了。

双枪，骑马。

村子26户，玉米为主，少量高粱、谷子。

东面大东沟，西面大西沟，南面东山，北面歪脖沟。

关于张福义的一些情况

讲 述 者：高庆树（71虚岁）、杨桂芹（73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高庆树（71虚岁，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自然村村民）：

张福义爱穿胶皮掌鞋，庄稼人。

据老奶子（指张福义媳妇）说，张福义做买卖，从围场，那儿出线麻、大烟，南面麻、大烟贵，往南倒麻、大烟，往北倒胶皮掌子，穿靰鞡用。不知怎么在承德犯事了，给抓了。一天，老奶子在碾子上推碾子，累了，抽口大烟。一个人拉白马往上走，一瞅这老奶子抽大烟，犯大烟瘾了。老奶子看他可怜，请他住下，抽了一顿。走时，老奶子又给了他一块。这是一个恩情。张福义倒大烟犯事了，官说："张福义，给你三个月时间，你只要招十五个全副武装的人来，就放你。"张福义出来，要饭，不敢回去。到警察署门前，不敢要。警察署的官看到他，问："你是哪儿的？"说："我是八卦岭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福义。"说："你是张福义？"原来拉白马的那个人做了警察署长。为报恩，就负责招了十五个人。张福义有了势力，就不倒烟了。后来有好几个骡子、驴呢。

据别人讲，孙永勤上毛山了，张福义在全宝河被打散了，各奔各家。打杠子，在寿王坟葫芦峪，让人把脑袋用铡刀铡了，用锅炸了，示众。这事是不是真的不清楚，我小时候听人这么说。

张德泰好枪法，一扬胳膊，鸟就掉地下，一般人。张德录漂亮，利索。张德泰死在全宝河，张德录死于家北沟。

杨桂芹（73虚岁，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自然村村民）：

张德泰死因：一亮天，日本兵包围了。据说张德泰有个皮带，朋友看中，说："日本兵来了。"张德泰正聚精会神打日本兵，朋友打了黑枪，给打死了。

张德录死因：（略）。



八卦岭地理

讲 述 者：彭安会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彭安会（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支部书记）：

八卦岭，南山四个岭，北山四个岭。

张家锅伙那时五六户人家，三四十口人。

车河梁，海拔580米，这边1.5公里，那边1.5公里。

从下板城到八卦岭村口23公里，从村口到张家锅伙12公里，从张家锅伙到车河口5公里。

孙永勤在老梁

讲 述 者：李振庭（80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1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振庭（80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村民）：

老梁当时30来户。

首先是刘宗臣，待的日子少。二是孙永勤，在这儿待一个上下月，一百多人。他走了，小日本来，我们老梁的房子全给烧光。后来小日本又来一次，在东梁盖上插一牌子：无住地。

〈孙永勤部队〉都上外面绑秧儿去。大米、白面、钱都得送，不送就不放。老三他们那儿

是秧子房，李长瑞那儿还有一个。打呀，那罪受的。

爷爷李忠那时给他们做饭，不做不行。一个人耳朵差点被割掉，连一点，爷爷拿糨子给粘了粘，还好了。

孙永勤个子不小，挺粗，部队不祸害老百姓。

日军飞机轰炸老梁经过

讲 述 者：王树森（76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1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树森（76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村民）：

孙永勤队伍在这儿，日本军打去的电话，几分钟，来了三架飞机。贴豁子半腰来的，没走砬尖。贴山头，过了砬子那个豁子，炸弹就扔，把我们这老百姓都吓跑了，钻山洞里了。孙永勤部队跑到东边榆树梁，和日军交火了。呵，就我们这大柳树、杨树，炸坏多少啊。一个大柳树炸两截，后来（指解放后）我们拉锯板，把锯齿都崩了。一看里面是一块大炸弹皮，那还拉得掉？后来又长严了。

小南沟大洞，老岳让绺子拉秧儿，把尸首放到小南沟大洞里了。绺子走后，自己家人把尸首抬到八道石湖，那石湖有两丈多高，把尸首搁下去，从旁边绕下，再弄走。一个人背不动。他有宝器，不坏不是。

老梁地理与移民历史

讲 述 者：王树于（72虚岁）、李振庭（80虚岁）、王贺林（50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1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树于（72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村民）：

大洞为三节，有天窗，可住二三百人。

三十上下户，七八十人，种地，玉米、谷子、大豆、土豆为主，那时没果树。到下板城镇35里地。

老梁上有人家至少300年外了，有的从下板城，有的从团庭搬来的。

李振庭（80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村民）：

山东济南搬来的，祖太爷那辈搬来，到自己已是第八辈。那时山东十年九不收，来时已有好几家搬走了。

王贺林（50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村主任）：

推车都走不了，早先东西都是用驴驮或者肩膀挑上来。早先只有一条通往下板城的路，从老梁、老梁沟门村到北鄮村、路通沟村到下板城，四十二华里。1975年挑柴禾下山，那时十五六岁，六七十斤，四十多里，两块钱。

东边路过小平台村到下板城，三十五华里，1971年修通公路。

西边公路2005年修通。

小南沟洞深二十米，上小学时，拿松明进去。

老梁村一共二百八十口人。现在家四十多口人，种地。出去打工二百三四十口，主要在针织厂、煤矿工作，或者当搬运工人，妇女在饭店。

杨老文父子发家经过

讲 述 者：张凤林（86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1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小东山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凤林（86虚岁，原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敌工科战士，解放后曾任塌山村支部书记）：

父亲还小时，杨老文从下面清河口村搬上来。当时什么也没有，一挑子挑上来，落到塌山河西，那时不讲户口。后来有个儿子叫杨秀山，比他父亲还霸道。欺压农民，高利贷剥削。借给你钱，还不上，就把左近的好地都交给他。到秋天，五分利的租子，要粮食，给不上就加利。下年再给不上，就一个粒也不留，赶着骡马驮子到这儿装了就走了。我们家原来借他钱，给不上，就给的他地。

杨老文得外财发的家，得什么不清楚。杨老文自己没多少地，都是人家的土地，佃户的土地。借给你钱，有时还招赌。张进旭给他拉赌。“上老杨家大院要去。”抽的头多，有些人还溜须他，多给点。他用这个钱（指招赌得来的钱）和借出去的钱的利息购置的土地，霸道。

要是在口里，搞土改，早捶巴死他了。

杨秀山和老岳家是亲家。

我到过他家，那时归车河口管，曾到他家喝过水，后来他穷了。

杨老文，长四方脸，一米七零左右，青的绸缎衣服。

杨秀山，和他父亲差不多。他儿子杨作霖，比他爹强。爷俩都够坏的，但比他爹是强。

杨秀山本身是个地主成分，是个经营地主，不下地，还得说是个封建地主。只管要租子，剥削穷人。

大院有十多亩地，有一个炮楼，挺高的，有百十个护院的。管护院的人叫李国栋，号助臣，好溜个，溜地主。哥哥张福存就受了他的害。兄弟张福贵写了封信给国务院，转热河省青龙县，到孙杖子调查，证实哥哥是革命的，让青龙法院派一审判员来。当时自己是村委书记，那审判员说：“李助臣也60多了，就是抓到法院，抓起来，也就七八年，不处理他也活不了多少年，怎么办？最后让开个群众会，检查检查行不行。”考虑他儿女一大帮，说：“依着你们办，法院怎么处理，怎么接受。”开个群众会，解决了。有个姑爷王德本，吓跑了，回来认

罪。后来张福贵对我不满意，说："不满意。"我当哥哥，得考虑以后在塌山怎么为人。

李国栋护院以前当过保董。

杨秀贤（彭杖子方面认为叫"杨培贤"）是杨秀山的妹子，瓜子脸，长得中，年轻时挺漂亮的。

杨老文、杨秀山都比较势利，平时有势力的打招呼。

老岳家离这儿30里路，翻庙梁。

杨家大院，30多间房子，开个商店，在院里。杨老文有两个媳妇，儿子也两个媳妇。杨老文病死的。杨秀山，日本投降以后，搞起土改，在宽城病死的。那时我已在冀东当兵。他还有个儿子，当医生，在赤峰。

瀑河口老任家也是地主成分，也放高利贷。具体情况不清楚，我10岁就去下板城了。19岁给人扛活，20岁回家种一年地，21就当兵去了。14岁那年，哥哥死的，比我大6岁。

杨秀山土改以后就穿粗布衣服了。

杨家暴发了四五十年，主要是杨秀山这一辈，杨老文没过什么多好的日子。杨作霖没当过家，不算地主，得直接掌握剥削权力才算。杨作霖净什么也不管，待着没事。

张城鑫介绍杨老文家情况

讲 述 者：张城鑫（43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1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城鑫（43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支部书记）：

塌山村共九个自然村，二十个村民组，1300口人。

杨老文家地址在河西村（自然村名）。

杨老文曾在现在杨家坟圈地方挖出过东西，过去叫高丽大街。以后找阴阳先生看，说上面能发人，下面发财。后来选了下面，叫杨家地。

杨家坟圈原来小学校地方有一泉眼，说是风脉。

1976年，搞农田基本建设时，那时我十一二岁，在上小学三四年级，在杨家坟圈还挖出过弓箭的箭镞和刀币。

左青龙，右白虎。西边是花园，杨家住东面。

杨老文儿子杨秀山在现在县公安局院地方开过酒厂。平泉、赤峰、天津都有他们家的产业。

王士和介绍杨家大院遗址情况

讲 述 者： 王士和（54虚岁）

讲述时间： 2007年4月21日

采 访 者： 翟丽芳

采访地点：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

原件保存地点： 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士和（54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村民）：

宽城法院有烧锅铺，平泉有酒厂，发家是靠烧酒。

地主，收了不少棒子，做烧酒，卖酒。一般穷人买不起不是？

碾房。

房后有一个台阶，观花的，后来我盖房时给拆了。房子那头有一个炮台，挺高的，比看守所矬点。小时候还上去玩过，从门上去，上面也有枪眼，四方的，石头垒的。十来岁时还上里面玩过呢。

杨家住的地方后来是卫生院，花园成了供销社。

孙永勤打车河口经过（一）

讲 述 者：徐敬礼（86虚岁）、辛连海（77虚岁）、张凤树（80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徐敬礼（86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村民）：

岳老亮有病死在彭杖子，发引，很多杂彩，金山银山，摆在滦河沿，很气派。很多拨吹鼓手。有的是钱，没处摆，阔气，烧。

杂货铺有七八间大，院子不小。掌柜的是王老瑞。炭局子，没有日用品，口里的人到这儿买炭往下运，走滦河水路往下运。

杂货铺名字叫大昌兴。

当时十五左右，亲眼看见孙永勤他们从南山下来，进街。

孙永勤从南山下来，从坟茔沟共下来18个人，夜里下来，没用打，杂货铺没死人。

当时在炕上，听见枪响，先打的局子，后打的老岳家杂货铺。赵成、赵来都死了。

辛连海（77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村民）：

辛连成早上起来，从赵来身上踩过去，吓一跳。

张凤树（80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村民）：

日本人把孙永勤打得没治了，撤下来，撤到滦河南南山上。警察局子人少，把局子砸了，烧了，人跑了。下来打煤局子，孙永勤要攻进去，老岳家给日本人打电话，日本人带枪带炮过来。孙永勤抵抗不住，在我们家住了俩钟头，过化鱼沟，进孙杖子了。

先打死赵来，后打死赵成。

以后孙永勤也来过两回，跟八路军扩军似的，招人。但没人过去，瞅着不行。那时人当兵的心情还没有呢。都愿意当庄稼人，不招灾不惹祸。后两回，孙永勤住我家，他跟我爸爸张永禄相好。

日本人当时在这儿人很少，大部分还在下板城。日本人来就没好的。

警察没好的，除了使黑钱，克扣老百姓，“你姓啥呀？”“姓啥姓啥。”告诉他了，过

几天拿本来了。找到甲长、牌长，带着他们找你，说你投靠八路军，“过几天到哪儿哪儿哪儿。”要多少钱，就得给。不给，就给弄车河口去。烙铁烙，灌煤油灯水。铁棍子烧红。啪，把人摔一仰巴跤。人倒，煤油灯水蹿出很多。

孟家沟战斗经过（一）

讲 述 者：孟繁林（63虚岁）、孟庆生（46虚岁）、孟庆礼（59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孟家沟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孟繁林（63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孟家沟自然村村民）：

听奶奶讲，孙永勤那时叫拉杆，反正打日本人，在上面老房子住，三太爷孟朝贵家。人数大约几十人，没超过一百人。在老房子正住着呢，罗圈沟有个孙朝阳的，他家不是地主吗，把他爹孙永香绑到这儿来，跟他要5000大洋。孙朝阳表面答应，到营子警察署调来的日本兵。从后面石戳子沟上来，在后梁谷支的迫击炮，把孙永勤住的房子给打了大窟窿。孙永勤把棉被子啥都裹上，连头裹上，挡枪子，在这儿直接进的沟，奔西大山。

当时哨兵站在右山梁上，树大，没看见。

村子只供他吃住。当时就孟姓一大家，20多人。现在10户，40多人。

五凤楼，老辈子就叫五凤楼，上面有梧桐，落过凤凰。这儿距罗圈沟十五华里。

我大舅张连玉是他的稽查处长。

老孟家之前是老于家，老于家前可能王家。

老孟家明初从山东邹县逃荒过来，分三大支，大部落在承德县孟家院，二门落在解放孟大地，我们落在大杖子乡柳河口西山嘴，就是现在的车河口大桥头那儿。60年代末，在门前路上刨一树根，60公分粗大柞木，一镐下去，底下有一坟，有一罐，能盛二斤米，挺结实，没刨坏。

孟庆生（46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孟家沟自然村村民）：

听父亲孟宪刚说，住在我们这儿，安盘子，几十人，火炮、火枪。在我们后院打起来，让日本人打跑了。

日本人从石戳子后沟过来。

是在这儿安过盘子，外面抢的东西都放在这儿。

孟庆礼（60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孟家沟自然村村民）：

五凤楼，过去有梧桐树，五个凤凰落在山上。

王胖子沟海拔800多米。

李瑞言忆孙永香

讲 述 者：李瑞言（78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罗圈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瑞言（78虚岁，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罗圈沟村村民）：

当时叫伙会，民众聚起来打土匪。

孙永香是董事，为人中了。梁豁子，嘴唇一个豁口，“洋鼓洋号一吹，小旗儿一摆，可威风着呢”。

伙会，连营子、大杖子，1000多人，一串的。

孙永香，总头，当地评价不错。那时都护群，谁有事，都着急。老死了。

过去没矿，主要靠地。土改时定为地主。

孙朝祥，土地入社后是个好社员，一九五几年死的。

孙守合忆孙永香

讲 述 者：孙守合（77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罗圈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守合（77虚岁，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罗圈沟村村民）：

孙永香是老爷，当过保长，北七保的保长。六个孩子：孙守礼、孙守银、孙守新……

听我父亲说，正月初几，孙永勤队伍到我们庄。连男带女，怎么也得十几口子，全弄到车河梁去了。老爷是北七保保长，当时没在家。

大杖沟门有个叫孙守学的，他爹叫孙朝什么来着[1]，说，你们在这儿待着，我找老爷去。到梁家沟找着了。一说，老爷去了。说是，老爷到那儿一瞅，恭而敬之的，这让骑他的马，那让骑他的马，都放了。到三岔口南沟（即王胖子沟），老爷就给孙朝阳一封信，让他上哪儿找日本兵来，黄大衣斜背着，暗号，看见那个，不让打。那回把孙永勤打垮了。孙朝阳那会儿就在家，好像是一个包工头。

老爷家说有没有，说没有也有。伙计也有，干活的也有，做饭大师傅也有，吃的还不够，年年借粮食吃。

老爷辈（永字辈）哥四个，孙永香是日本子还在时去世的。听念叨，他是一个好人。

---

[1] 2008年7月16日，我前往郑家庄第二次采访孙守礼老人，他认为孙守合老人此处记忆恐不准确。他说：“是大南沟门，不是大杖沟门。孙守学父亲的名字叫孙国安，孙国安管爷爷应叫叔叔，不叫老爷。”



回忆爷爷孙永香（一）

讲 述 者：孙守礼（78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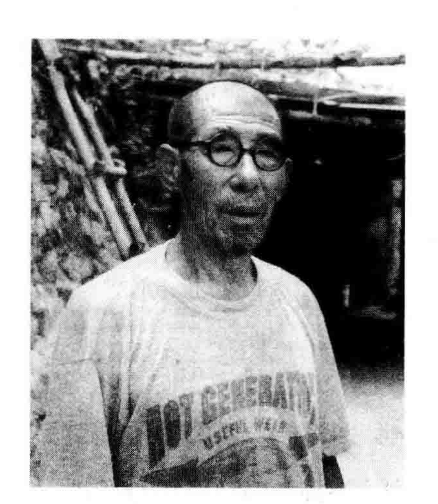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郑家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守礼，78虚岁，家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郑家庄，孙永香之孙。1930年生，1947年参军，在九纵二十六师任机枪手，1948年11月改成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参加过解放锦州、天津、湖南、广东的战斗，1952年复员。之后先在寿王坟河北铜矿工作，1966年调至山西源曲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1970年调回寿王坟铜矿，1986年退休）：



孙守礼老人　2008年7月

爷爷那时有势力，日本军、八路军都吃得开。

北七保的总保董，从盘道梁到遵化的边关、城外都归爷爷管，一直管到兴隆东边，管到车河堡、下板城这一带，西到兴隆。

土匪，砸明火。

那时候不叫消灭土匪，不是把这拨消灭了完事。忒大事，处理不了的事才找他。

土地100多亩，老家有20间房左右。

孙永勤跟他要钱，爷爷答复不了，交不了那么多，给了一部分。20多间都烧了。

爷爷被绑走了，父亲救不了爷爷。

父亲孙朝访当时领着伙计干活，20多个伙计。

父亲哥六个。我大爷孙朝君，教书；二大爷孙朝阳，游手好闲；父亲老三；老四孙朝举；五叔孙朝聘，农民；六叔孙朝斌，浪荡公子。大爷、二大爷都住在郑家庄。大爷有病死了。二大爷修盘道梁，带工，和日本人干架，得伤寒死了，生憋八道的。

要大洋，给不起，给了一部分，把房子给烧了。

祖籍山东登州府长书社十二甲，爷爷的父亲那辈搬迁过来的，生了爷爷哥四个。东北马杖子跟我们是家了（即有亲属关系）。从山东过来时的朝代不明。

日本人来之前，孙永勤就是土匪。

爷爷1946年去世，病死，岁数不大。右眼靠鼻梁地方有个瘊子，筷子头那么粗，开着花。一米五六这样，不忒高，挺胖。

我参加过解放东北、天津、湖南战役，解放后在河北铜矿（即现在的寿王坟铜矿）挑过水，烧过澡堂子。在山西待过四年，又回到铜矿，后来退休。

对爷爷没什么好看法。我没享着福，跟他倒吃到挂落儿了。爷爷是地主，1947年，父亲、哥俩、两个妹妹，十四亩地，一个伙计没雇过，一条毛驴没有。

感谢邓小平，不感谢毛主席。

我父亲虽享受过富裕日子，后来却在罗圈沟村让人用皮绳蘸凉水打。

对爷爷没好看法，幸福我们没享受，罪恶替他享受了。

郝连玉忆郝敬义

讲 述 者：郝连玉（81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郝连玉（8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村民）：

郝静一[1]（即郝敬义），大个子，小辫，斑白头，过门口得低点头。

毛山，打不过，趴在榛柴窝里，日本兵没看见他。

受遵化县长骗，跟孙永勤那一回打散了。

算卦，算的没啥准，不识字，“拿么拿么（意为考虑考虑，想一想）”。在本庄不大算，串山沟算。

人不离儿（即人不错），一九五几年就没了。一个儿子，一个孙子。

[1] 2008年7月中旬，经兴隆县大杖子乡组宣干事杨福东先生帮助多方了解，证明被一些人回忆为“郝静一”的孙永勤军师的实际名字为“郝敬义”。此一结果，在与郝敬义孙子郝连坤见面后，得到了确认。



陆翠芝忆孙永勤

讲 述 者：陆翠芝（77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陆翠芝（77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村民）：

孙永勤大个子，因为打小白龙才起的匪。

小白龙起匪，孙永勤是伙会会长，柳河口大昌兴[1]供小白龙子弹。

小白龙是北边人，起匪起的，抢东西，小白龙打散了。以后大昌兴告的孙永勤，孙永勤才起的匪。那时起匪就是革命，就是跟八路军没联系上。

小白龙不多几个人，净抢东西，骑马。

日本人来之前没土匪，小白龙是日本人来之后才来的。

孙永勤不抢，他革命倒是革命，就是管得不严。他手底下抢东西，他知不道，都瞒着他不是。

孙永勤不抽大烟，就是稀罕大烟，换钱。

那时候哪儿有善财主，都是地主那样的玩意儿。

日本人刚来时也不拿中国人当人，说打你就揍你两下子。日本子税重着呢。

孙永勤是好样的，他是跟老百姓一心呀，为了打日本子啊。

[1] 也有人回忆为“大成兴”、“大顺兴”。

郝连发忆郝敬义

讲 述 者：郝连发（76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郝连发（76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村民）：

郝静一（即郝敬义，下同）是我亲叔伯大爷。

毛山，猫在树林里，壕沟里，大气都不敢喘，出来的。其他的都打死了。

算卦、推八门，准。依着他，不上毛山，司令反对，说："不听郝军师的，就要上毛山。"郝静一说："上毛山，就得受损失。"后来孙永勤埋怨司令，说："郝军师算得准。"那个人说："算鸡巴啥准？"孙永勤说："我就相信郝军师算得准。"

日本子进中国，孙永勤起伙会，想朝外打，没打出去。孙永勤也想搞大家来的。

他（指孙永勤）看得起穷人，看不起大户，大户净剥削人。日本子进中国，大户都有连带不是。

郝静一，人不坏，挺善良的。

两个儿子，老大郝士财当八路军死了，老二聋傻，在敬老院里，也七十多岁了。

一个孙子在大杖子招亲呢。

孟广发等谈孙永勤

讲 述 者：孟广发（44虚岁）、王福清（51虚岁）、霍秀成（46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政府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孟广发（44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村民）：

孙永勤第一次打大彭杖子，没打下来。几个人想不干了，不甘心，一合计，还得干。一抽勾（即抓阄），又是孙永勤，第二次打下来了。

王福清（5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村民）：

二大爷王永瑞在车河口警察署，双手使枪，枪法准。后来参加了孙永勤部队，给孙永勤当警卫，毛山没回来。

霍秀成（46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村民）：

太爷霍福庭做王永瑞的工作。太爷与王永瑞关系非常好，劝他："你老当警察，日本倒了没有出路。"王永瑞去了。

老太爷子官厢私厢都中，在车河川、柳河川是大家族。

关元会谈孙永勤、杨佩之

讲 述 者：关元会（87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关元会（87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村民）：

民国10年生人，1941年参加国兵，1944年春天退伍。入伍时20，24岁退伍。在承德当国兵。当时当兵是征去的，三年义务兵，一个月六块钱，到年龄就检查。

警察到处勒索。

孙永勤素常哪儿有日本兵，想法把他消灭了。

杨佩之在王宝石教私塾，40来岁。孙永勤在王宝石把杨佩之找去，给他当先生。教学好，那时念不好，真挨板。毛山打完之后，杨佩之又到王宝石，回来到车河口村公所当会计。

王宝石那时比现在打鱼的少，都拉小船。

孙永勤是条好汉，那得那么说。

（大户）被烧的，一定是有原因的。

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



回忆老师李桂攀

讲 述 者：杨玉良（77虚岁）

讲述时间：2007年4月2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城杨玉良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杨玉良（77虚岁，原中共兴隆县委组织部部长、兴隆县人大副主任）：

我老家是偏岭子大队尖山子。李桂攀最早在我家前面的两间空房教书，三里五村都去念书。1938年，那年我8岁，他在尖山子教书，十来个学生。那时他40多岁，脸有连鬓胡子，大圆盘脸，别人要看着，呲目瞪眼，红脸。

1938年冬天一冬，我念了三本书：《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谁上学都这三本书，这三本书下来，就相当于现在小学毕业了。

教书中，就是对学生严格着呢。今天给你号十页作业，你必须明天上午背写下来，还得讲下来，你得讲清楚。今天讲“人之初，性本善”，你得讲下来。他后屁股底下专门坐着一个板子，念错一句，或者不会了，你就自动把手伸出来，“啪”打一下。写错一个字或是念错一个字，都是三个板子。差一笔画还不中呢。我有一次，就差一点挨打三板子。打儿子更是没数。淘气也好，被他发现，就得挨揍。

红唇发紫，厚嘴唇，大眼珠子，学生一见就害怕。

1938年冬，1945年冬，我跟着他念了两冬书。

“满洲国”组织上洋学。

抽旱烟，大烟袋锅子。

学生哪天也有几个挨打。有一个杨新文，挨打，说：“你别打，你别打，我给你拿饹馇儿（即锅巴）。”他的妈在外面听着，说：“打！打！”

1945年冬，日本投降以后，社会秩序还没恢复，又把他请出来，弄二三十学生教书。

在那儿，续振宗20多岁了，我们几个都十几岁，挺要好的，都拜哥们了，他老儿子李如柏也是其中一个。管李桂攀叫干爹，默认，谁也没叫过。

偏方都会开，那时三里五里看病都到他家抓药去，他大儿子李如池开药铺。

管李桂攀叫“三先生”。

当时左近就数他文化高了，编顺口溜。

在我心目中，最主要的是他会教书，有时看手相、看宅子。

长得还不丑，大四方脸，连鬓胡子，嘴唇发紫发黑。不戴帽子，大襟棉袍，黑色，夏天蓝色、黑色居多。那时买洋布的少，都是家织布，染蓝染黑。夏天戴草帽，不戴眼镜。

他教的学生一般出来都差不多。

我一冬念三本书，都得背下来，还得写下来。

晚上钻被窝里都得念呢，不念第二天交待不了。

那时就是死记硬背，你还得写下来。

有的学生承受不了，中途也有不念了的。

那时不管上学一天两天，你不光要背，给你出了仿影，写个十天八天，再换一个，你还得写。一般跟他学下来，书法都可以。随便写不中，笔杆得冲鼻梁，想手一侧（音zhāi）歪，歪着脑袋写，姿势差一点，“啪”一脖搂子。

那时候，教室里供着孔子、孟子。初一、十五烧香。每天一进教室门，先给像鞠躬，再给老师鞠躬。背书都得在孔子像前背书。他挺信奉孔子、孟子。

1946年以后上洋学，不主张念私塾，李桂攀歇了两年。都上小学，不上他那儿去了。

解放后，兴隆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就有他。那时讲民主人士，又算是老知识分子。

他有四个儿子。



1933年12月11日孙永勤起义人员

名单提供者：佟靖功

提供时间：2007年5月9日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1933年12月11日孙永勤起义人员名单

孙永勤、关元有、赵四川、王殿臣、雷长玉〔雷常玉〕、马宝德〔马保德〕、王福合、张山、张山的哥哥、李长发、赵林、赵有、赵来、赵文书、孙成、赵林的侄子，另一人不知姓名。

赵四川、王殿臣是赵林的朋友，不是兴隆人。

马宝德〔马保德〕是遵化人。

2007年5月9日　佟靖功提供

孙永勤、雷永兰后代情况

讲 述 者：孙翠芝（38虚岁，孙永勤次子之女）

讲述时间：2008年3月

整 理 者：刘玉兰

文件原名：《孙永勤、雷永兰后代》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孙永勤、雷永兰后代

<table>
<tr><td rowspan="5">孙永勤（1893~1935年5月24日）
雷永兰（1903年2月~1991年2月20日）</td><td>长女</td><td>死于“集家并村”时[1]</td><td colspan="4"></td></tr>
<tr><td>长子</td><td>孙文伶（1922~1977）[2]</td><td colspan="4"></td></tr>
<tr><td>次女</td><td>（1924~1994）嫁到河口[3]</td><td colspan="4"></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2">次子：孙文孝（1928~1996年6月）
儿媳：贠玉萍（1946~）</td><td>长女</td><td>孙翠文</td><td colspan="2">1966年生，现住平安堡镇东南沟（下岗）</td></tr>
<tr><td>次女</td><td>孙翠珍</td><td colspan="2">1968年生，现住兴隆镇车道沟4755号（下岗）</td></tr>
<tr><td rowspan="5"></td><td colspan="2" rowspan="2">次子：孙文孝（1928~1996年6月）
儿媳：贠玉萍（1946年~）</td><td>三女</td><td>孙翠芝</td><td colspan="2">1971年生，现住兴隆县城果品旧楼（下岗）</td></tr>
<tr><td>长子</td><td>孙中然</td><td>1974年生（下岗）</td><td>子：孙宇航，1999年生</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3">三子：孙文顺（1935~1983年冬）
儿媳：郭瑞平[4]（1937~）</td><td>长子</td><td>孙团营</td><td>1962年生，现住唐山陶瓷厂，下岗</td><td>子：孙瑞，1985年生</td></tr>
<tr><td>长女</td><td>孙秀文</td><td colspan="2">1963年生，现住唐山陶瓷厂，病退</td></tr>
<tr><td>次女</td><td>孙秀红</td><td colspan="2">1972年生，现住唐山，没工作</td></tr>
</table>

[1] 孙永勤共有三子三女，与第一位妻子生有一女，与雷永兰生有三子二女。孙永勤与第一位妻子所生的女儿，据其子赵显刚（家住孙杖子村关家沟自然村）2006年4月回忆，名孙玉香，1972年去世。孙永勤与雷永兰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即孙翠芝所说的“长女”，名字不知。综合孙永勤二儿媳贠玉萍和蘑菇峪乡二道岭子李秀花的回忆，她在即将出阁前遇日伪搜捕，躲避过程中，患热病去世，时年21岁（虚岁）。未婚夫名字为二道岭子张坤友。

[2] 孙永勤长子名字写法不一。除“孙文伶”外，尚有“孙文邻”、“孙文令”两种写法。认为准确写法为“孙文伶”的占多数。

[3] 孙永勤次女（孙永勤与雷永兰所生第二女）的名字，经孙翠芝2010年1月21日向河口的老人们进一步了解，大名为“孙文红”，小名“彩云”。

[4] “郭瑞平”亦写作“郭瑞萍”。



蒋维权先生谈“挂对”

讲 述 者：蒋维权（77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蒋维权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蒋维权（77虚岁，原中共张家口地委党史研究室征编科科长）：

“挂对”这一名词从铁路上开始，詹天佑修京张铁路，引进火车铁钩将车厢挂上钩。

1922年，张家口成立党组织，领导北方三条铁路一次车务大罢工，也叫铁路总工会张家口工人小组。这个组织提出“挂对”两个字，具体领导何孟雄，以后又来了邓中夏等。口号是“团结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对就挂，见好就收，提高再斗”。把铁路用语用到斗争上了。有目标就干。碰对心意，接上关系，有一定目标，排斥别人。与当地“合手”意思更贴近。

“合手”，在袖子里，一摸就知道了，排斥外界，别人不清楚。

1922年首先在铁路工人中创建了张家口第一个中共党小组。

1925年10月，张家口地委成立，管包头、呼市、承德。

冯玉祥进驻，给党组织带来方便，李大钊来了很多次。

1925年、1933年张家口工农革命斗争两次兴旺。

1933年张家口有个中心市委。

抗日同盟军时，热河民团有可能参加。

“挂对”，肯定和民团有联系。联合剿匪叫“挂对”不可能。

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经过

讲 述 者：马瑞林（80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城马瑞林先生家中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马瑞林（1929年生，80虚岁，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政协副主席）：

老家宁夏，好几代在多伦了，搞了38年教育。

多伦是兵家必争之地。淮军将领王怀庆驻扎过，直军，冯玉祥西北军，奉军穆春、吴俊深，奉军二号，外号吴大舌头，晋军，都驻过多伦。

实际上，多伦自古就没有城墙。周围都是房，里面是街道。民房挨民房，进不来，得走几个堡门，清朝修的。别处都是老乡院儿。

南北5华里，东西最宽2华里。周围一圈河，叫鸳鸯河。东边一条，西边一条，在城北外边汇合。

打的时候，日本鬼子修了很多炮台，叫八卦炮台，冲着几面。还搞了壕沟、木柴棒。打的时候很苦，得先过河，然后过壕沟、铁丝网、障碍物。

吉鸿昌在山西会馆戏台上开大会，枪毙汉奸苏焕武，山西商人。吉鸿昌打了五天，打不下来，让士兵扮成柴草贩进城，住到礼拜寺。吉鸿昌在宁夏待过，父亲跟回民也有交往，对回民风俗比较熟悉。让大约40人进了五个堡门，在街口重要位置放上柴草，里外呼应，打进来。北面200多米有一个马王庙，放了一堆柴草，苏焕武给拿走了。原来他是晋军赵承绥留下的一个暗探，住在一个商店利泰和里，旅长。吉鸿昌把他当汉奸毙了。

日本人1933年5月1日进的多伦，轻易进的。吉鸿昌对蒋介石不抗日很气愤，成立抗日同盟军。

“双簧”是吉鸿昌的一个策略。因为开始牺牲很大，化装进城是最后一招。不是像李守信说的退的，不然打得不会那么激烈。

“双簧”，当时似乎有协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得不退了。

说城内日本人少的问题，日本人为尽量缩小他的失败，所以主要说成是伪军。汪精卫他们也要缩小吉鸿昌他们的功劳。日本人到底多少，现在没法确认。

李守信部队的服装是日本人给的，有可能把他们都当成日军。



日军极力贬低吉鸿昌，说他是从伪军手里，不是从日军手里夺的，国民党也遥相呼应。

刘桂堂在多伦名气非常不好，投来投去，军纪也不好，都管他们叫“土匪队”。吉鸿昌、冯玉祥部队很守纪律。最孬的是奉军，进多伦大抢三日。东北退下来的义勇军军纪也不好。

我们家也住过，是奉军。我当时4岁，记得当时是灰军装，拉着马进来，把马鞍放在台阶上，让做饭。“四个碟掐饺子，家常饭”，这是奉军挂在嘴边的话，嘴里不干不净，这是小时候的记忆。

义勇军退下来，吃了败仗，精神状态不好，到老乡家也要这要那。当时多伦商家很多，山西商人、河北商人，一住住十几天、一个月，把商人都闹草鸡了。后来山西商人大部分随晋军回山西了。

义勇军在这儿横吃乱花。

日本鬼子二次进城时，城里已经很萧条了。

岳云霞讲述岳荫臣后代情况

讲 述 者：岳云霞（75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南杖子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岳云霞（75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村民）：

老大岳著环，老二岳连英，又名岳连欧。

管岳老二叫老姑父。原来家是板城街，姓王。6岁母亡，吃不上，穿不上，父亲把我送老郭家，郭启恒家。老郭家、岳家是换亲关系。7岁，老姑父给要过来。当时老姑父在彭杖子当村长，那时一个村管辖的比现在一个乡还大。老姑父后来跟着八路军二十七旅走的，当时我14岁。老姑父走后，老大给养大的，管老大叫爸爸。老二走后，他当村长，给两面（指国民党、八路军）办事，两面拉抽屉。

老大"文革"期间在影壁山跳山涧自杀，差一点就解放（指放出来）了。冬天挑水，冷，找嫂子焐手，她男人看见，把他给抓进去了。觉得寒碜，一个月后自杀。

老大没子女，最好最好的一个人。当时群众开大会，问："岳著环该死不该死？""不该死，他是个好人！"

杨培贤一九九几年去世于八家乡敬老院。

老二后来去了察右中旗，姐六个，一个儿子。现在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还活着。

老二就一个媳妇。

彭杖子到车河口十华里，到岳伙房煤矿十多里路。



罗凤书谈车河口

讲 述 者：罗凤书（7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南杖子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罗凤书（78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村民）：

车河口当时是个村，那时车河口管解放、蘑菇峪、孙杖子、黑河一带。

我两三岁过继给叔叔罗振芝，他没儿子。叔叔也当村长，白天给“满洲国”办事，晚上给八路军办事。过小梁以后就是八路军。黑夜过去给八路军办事，供应纸、笔、油印机。当时都是背包政府。日军准备在小印子峪集体突突，柳河口警察署丁署长和父亲把这些人给保出来了。冲天打空枪，让他们隐姓埋名。当时下小梁就是“无住地带”，就穿黄衣裳。八路军一见到，“谁？”老爷子答：“四维芝。”就给接过去了。解放后，李运昌来信让他去，没去。“文革”期间也挨揪了，群众从公安局给要回去。后在蘑菇峪给供销社帮忙。

到庙梁，从黄厂沟进沟，别过桥。

原来车河口有一百多户，“满洲国”时有名的水陆码头。过去十来岁。大买卖不少，呵！“一京二卫三车河口”，当时有名。卖盐的、香面子，那时候都使骆驼啥的。以后解放了还运呢，从东北地方，把碗口粗的木柴劈开，用水磨磨成面，大木头车运。船，从承德到滦州，拉船的不少。船有帆，帆的宽向有一丈五，高向有二丈多。朝上水使，刮风使，下水使得少。没有风，得俩人，好多地方得在地上爬着拉。一船得四五千斤，煤、盐、白面、大米，啥都运。从口里往上运栗子、梨。那时候交通不便，有的地方小毛驴还走不过去呢，就得搁船。车河口经常有十几只船落着，我还拉过几天船呢。

一个船，头面俩人拉，后面一个掌舵的。船上有个纤杆，一条线有个二三十米，筷子那么粗。用线，用猪血血了，不沾水。当时一条船长向得十来米，宽向两米多。家里有一分路子，也不能拉船去，是最低的劳动力了。

盐店、香面子，个人买卖。

过去从彭杖子先摆渡过滦河，一毛钱满洲票。有的不要钱，年终了，拿着口袋，到各家打点粮食。走十好几里，有牲口的骑牲口。到柳河口。水大了，就摆渡。水小了，就走土桥，或趟水。

土桥，搭上木头，铺点柴禾、秫秸，铺点土。年头多了还漏了，水大了还给冲走了，再出工再搭。

柳河口有警察署，国兵。

彭杖子到下板城40华里，车河口到下板城50华里，下板城到承德市36公里，车河口到孙杖子30多华里。

日本人“老南坡”、“老黑烟”，恶气极了。

鸡冠山，山嘴这边叫小河子，那边是大滦河。

老话“山要高，人就刁”。

张玉书介绍岳家大院情况

讲 述 者：张玉书（55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玉书（55虚岁，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村民）：

鸡冠山背坡有一小洼，过去驻过军队，打柴禾时见有小箭头。

暖儿河从八家发源，彭杖子当地叫“小河子”。

煤局子在大桥下，大院为总经销。

过去影壁后是大树行子，全是大柳树、大杨树。

影壁和房的二龙戏珠都是“文革”期间毁的。大院南角做烧锅，墙外花园、菜园，院里两井，院外一个浇菜的。

岳老亮死后发引，发丧，原来放在花园西南角。

过去岳老亮从庙梁都是毛驴子驮煤，从庙梁梁路口进，十二三里，驮到大桥下煤场。1994年、1995年，当队长垒坝，在下煤场遗址挖出灶坑、缸、大铁炉条。

现彭杖子小学有一四合院，岳老大在那儿住。

承德还有当铺。

孙永勤两打岳家大院（二）

讲 述 者：徐文林（85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徐文林（85虚岁，原河北省承德县八家公社彭杖子村党支部书记）：

第一次没打进去。

第二次没用打。二月左右，暖和了，我正在岳家树行子放羊呢，孙永勤马队过来了。不是都骑马，就几个人骑着马。孙永勤就在后院徐文岐那儿住，是我亲大爷家叔伯兄弟。我大娘也抽大烟，给孙永勤打大烟抽。孙永勤挺胖的，挺大个，抽大烟。

第一次，孙永勤队伍死了四个。在影壁后，日本人亲自枪毙四个。

第一次开火，我们不敢在炕上，都在炕根下趴着，窗户蒙着。孙永勤是白天进来，打一天没打进去。大院有兵，有四个炮楼子。夜里，孙永勤摸到村里。岳家又调的日本兵，从九道岭调来的。

第一次没敢进庄，是在南山坡、北山坡上打的。夜里，孙永勤他们抬了三个炮。放炮的，打死一个，一个腿打透了，藏在张广臣家。天亮不是个儿，子弹也没有，孙永勤天亮走了。走之前，把被打死的藏柴禾垛里。在影壁后死的四个是从九道岭给抓回来的，让日本人枪毙了。

日本人也死了四个，在沙坨子炼的。蜡、香祭奠，然后柴禾上倒上油。当时我在场，十二三岁，放羊，看热闹。日本人说："过来，磕头。"一个给磕了四个头。磕完了，"小孩，去吧！"给撵走了。装了骨灰盒。在老岳家城子东北，离河套不远，沙坨子炼的。

日本人想用砖头裹上干草把子，蘸上汽油，想烧房，说彭杖子窝藏土匪。日本人管他们都叫土匪。不都是日本人，也有很多满洲兵。一庄人都跪下了。

开始都是满洲军队。

后半夜，天要亮了，日本人到的九道岭，死了四个。孙永勤没子弹了，要撤了，日本人又从九道岭、椁椤树洼压下来。

绺子：张玉书、小白龙、李海山。都绑大户，要钱。

孙永勤原来是给老岳家大昌兴护院来的。有个叫辛增祺的给王老瑞送子弹，结果辛增祺把子弹都给土匪了。孙永勤说："我给你护院，你把子弹给土匪了！"有气，后来这气不出。王

老瑞跑彭杖子，孙永勤要王老瑞脑袋，何育民保着。孙永勤对何育民有意见，激起来了，就要打老岳家，老岳家就调兵。

原来团长叫孙永福，后来给了孙永勤。孙永勤把仇恨加到王老瑞身上，因他是大老板。

当时我家在岳家大院西南一百来步。

王司令、彭司令兵都从承德来过岳家，在老岳家吃住。人多了，才在老百姓家住。

第一次打时，岳老亮已死一年多了。

赵老子是彭杖子大队第九生产队赵鸿祥的爷爷，与岳老亮没有亲戚关系。

孙永勤生气，不保大昌兴了，在黄花川又组织了一些人，串起来。开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方法、组织纪律，都管孙永勤叫“绑票”，实际上孙永勤也不愿意当绑票的，请了几次客。

打大昌兴时，岳老亮还没死，五月份左右死的。

第二次没打，把岳老亮尸首抬出来，用席卷起，抬到老梁一个炭窑。

老岳抬回来后，都臭了，用四五六寸（指棺材底、帮、盖的厚度）大棺材埋了，发引排七天。“文化大革命”时，当地红卫兵都给刨了，地主嘛，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啥也没有，只有棺材底下铺的那点儿洋钱。

王老瑞是大老板，赵老子，吃香的，掌柜。

孙永勤一开始也不想抗日，是激起来的，请了几次客。

日本人让孙永勤收拾得够呛，兴隆、承德、宽城、迁西警察署让孙永勤收拾得老鼻子了。

孙永勤在老梁让飞机轰炸，在屋里听嗡嗡很大响。平生头一次看见飞机，胆小的都不敢瞅。在树梢上边，看着也挺大个子。记得是春天，树没青呢。

第二次来，就剩下管院子的，叫张全舟。孙永勤骑大马，掐着枪，把我吓得够呛，赶紧把羊往沙坨子后赶。张全舟把四门大敞，接进去。孙永勤部队进去，把天津字都扔出来：“小孩，拿去玩去！”孙永勤没在老岳家住过，只在大爷家住过，待三四天。我妈会拾掇火，一般都找她。孙永勤有病，让我妈刮。孙永勤躺着，那么高，我妈不敢刮。孙永勤说：“刮吧，不怕疼。”

孙永勤确实对日本人仇恨大。

头一次打仗时，净徒手的呢。刚参加的，没枪。二三百人。夜里子弹没有了，退到小梁那儿，就把鞭炮搁桶里，噼啦啪啦响了。

我是1924年生人，18岁跟方杰宽，遵化双城子人，学做烟管。

1951年当财粮，1952年当副村长，1953年村长，1956年高级社社长，1960年到1977年当书记。1966年任八家公社党委委员。1977年到公社中心校一年。1978年到庙梁煤矿整顿，当负责人。六个月斗批改，之后回家下地。



从彭杖子到老梁顶十五六里，从老梁沟门进沟到老梁。

从彭杖子到车河口十五里，过河向西到柳河口、车河口。

陈署长，下板城，长驻柳河口警察所。人还中了的，爱骑小毛驴。二型个，五六尺高，不高不矬，中流个，长方脸。彭杖子分驻所归他们管。

岳家大院四个犄角有炮楼，到顶一丈多高。院里二亩左右地，院墙七尺高。大门顶上盖着一间房，叫“更楼”，从地面到房脊有一丈五尺高，黑天白夜有站岗的。里面三层房，前面是买卖，开烧锅、咸盐、百货什么的，后边是岳老大。第一任老板是老戴，第二任是老何。贠贺庭，小掌柜的，口里人，一块被杀，在八家小北沟，在何育民身上翻出麻袋票。何育民是口里三屯的。第三层是岳老亮“师爷”住。这是从北面数。花园是在城墙外面。城外往北都是树行，一色杨树。

当时彭杖子一百四五十户人家，一千左右人。徐家紧挨着西墙根，炮楼想占二奶奶地，二奶奶不干，躺那儿，说：“那你先把我发送了，再垒墙。”不得不拐了个弯。老岳不恶，都是手下的狗腿子恶。实际岳老亮没剥削人，都是手底的掌柜的、狗腿子。

老百姓管王老玉叫“王小鬼”，没人性。后来他上年纪，岳家不用，抽大烟，死了。他儿子和我同岁，叫王和尚。念书在圣贤寺，我念六个月，念不起书，买不起纸，从窗户上撕纸，王和尚给我们拿纸。一块玩耍，他当孙永勤，我们当讨伐队。他算土匪，我们抓他，拿杨树条子抽他。都拿秸秆当马，都拿孙永勤当故事玩。那时我十三四岁了，孙永勤还没有死呢。王和尚在王老玉死后，移民东北。

从老岳家到岳伙房煤矿，走庙梁沟、片石，走大坡上去。从庙梁到老岳家十五里地，赶着小毛驴往下驮煤，把煤驮到下煤场，紧挨滦河沿，再装船。解放后，县里收了。

老项家是彭杖子人，项因臣、项碧臣，坐地户。

项因臣，外号“项大鬼”，因为抽大烟。我在街里一个井沿看见项家一个分家单，说：“这儿还有项大鬼的名呢。”项因臣听见了，说：“谁叫我项大鬼呀？谁啊？”把我撵了好远。忒恶呀！有一个卖羊的，想过河不让过，要交河底钱。项因臣后来抽大烟死了，子女也不孝敬。

岳荫臣，彭杖子都叫“岳亮臣”。

老项家卖给吴少连（指煤矿）。

岳家大院后来成了国兵十一团团部。小日本倒后，1947年土改就都分了，分给吴作奎、修文荣、孙宝玉等，好几户在里面住。后来成了八家供销社彭杖子分社。

“集家”以后，国兵占了，老岳家就在西边又盖了一处房。又给分了，就跟老百姓住一样的房了。

老二，当过暖儿河乡长，那时归青平县管。八路军下来，把他绑了，是伪乡长，就参军了，二十七团团长。三查五整，才整下来。家里一媳妇，南方一媳妇，在内蒙又说了一媳妇。

岳老大、岳老二、一个妹子，哥仨在院里雇了一个老师。

老大1976年左右，我当时是书记，揪出来一大屋子有污点的。是共产党，又叛变，投降国民党。在大队部，西头岳珠环屋子，红卫兵造反队看着。老大罪恶也不小，开明地主，后又叛变。1947年起还乡团，开黑会主要以他为主。老大被绑着，一看不交代不行，群众不认，早上刚一放亮，说解解手，厕所在当院东房山，进去很长时间没出来。徐文革、吴兴云两人是红卫兵，一看，老大去影壁山跳了。

还乡团闹了两年左右，1947年到1949年，五中队等，闹得挺凶势。农会主任张俊青等都叛变了，后来被八路军枪毙了。

国民党十三军在承德王八盖把还乡团打回来，不许进城。

地富反坏右组织起来，叫还乡团。彭杖子、暖儿河上下叫五中队，队长佟玉华。他死后是张俊青。

岳老亮死时四五十岁，有病死的。个子高，胖，挺大的肚子，团团脸，大眼珠子，好几个丫鬟伺候他。就是胖，大烟只抽一遍，大师奶把大烟灰攒起来，卖给别人。大师奶是河南人，吃香，长得挺富态。二师奶是关家庄人，不吃香，却生了三个孩子。岳老亮五月份死后，何育民执掌，老岳家就不执政了。

张玉书、小白龙等都是绺子，实际上里面有很多老奉军，他们来是绑秧、要钱、扩大自己的队伍。张玉书、小白龙在彭杖子当地没开过火。

“号大枪，买单子，挑选大户，打胡子往北打，两下都不通了。”洋枪火炮队，老岳家让老百姓买枪，挖战壕。用火绳驱的那个。能买一棵就一棵，两棵就两棵，不能买就三家买一棵。

护院的也就六七个，梁荫田、王国宾。有单子、湖北造，小日本进来后是三八大盖，后来是苏联的水连珠。

目的是不让土匪抢，应是何育民的主意。

庙梁离潘家口得有一百三十多里。

赵老子，名赵老俊。

何育民，尖下颏儿，长方脸，胖，长得挺富态，够个大老板样。

民歌《十二月》：

正月里开迎春，迎春正发，

日本人进平泉，二月初八。

二月里开杏花，杏花不红，

打吉口，郭明远，号儿群英。

号大枪，买单子，挑选大户，

……

三月里开桃花，桃花甚红，

孙永勤拉大队，把煤局子攻。

何育民给承德打电话，来了日本，

打胡子往北打，两下不通。

四月里开梨花，梨花月月青，

白马川修铁道，民人去帮工。

……

老梁战斗发生原因

讲 述 者：谢福成（80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7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黄花甸子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谢福成（80虚岁，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黄花甸子自然村村民）：

应该是春半季，树上刚长八字，也就是二月（指农历）左右。听石卫山说的，他跟孙永勤干过几天。在老梁沟门下卡子，抓住一个小日本，抓到老梁上去了，怕他知道道儿。孙永勤一看，挺喜欢他，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后来小日本认孙永勤干爹了，以后啥事也不背着他了。结果里面消息都让他掏去了。孙永勤开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器。黑夜他跑了，跑到日本人那儿，说："没什么好武器，就是炮仗搁洋桶里。"就不怕孙永勤了，打他，设什么计把孙永勤弄到毛山去了。

毛山上，孙永勤兵都顾不上打了，跟绵羊似的一堆。

水泉沟傅文明他老叔，可能叫傅春，跟孙永勤参军了。我去看，戳着一大枪，我小，一看，还给吓哭了。那时他也就十八九左右，死毛山了。

岳伙房煤矿地理

讲 述 者：石振林（57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7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岳伙房煤矿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石振林（57虚岁，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村主任）：

主峰棒槌山。

庙梁人口不超过650人。

岳伙房来历：老岳家安了一伙房。

老岳伙房煤矿在假门沟山顶，位置在乡村联营岳伙房煤矿东南四华里，地表已没什么东西。

过去小板镐，一面尖，煤油灯里面是牛油，一个小盘搁捻儿，用钱衩子往外背。毛驴驮，经片石、庙梁沟，走八里到彭杖子。用柳条罐排水，一人多高一个坎。计数，计算出多少水。我爸那时都说过。

现在的联营煤矿井口海拔540米，在四五组交界，到公路八里。煤矿隔岳伙房与宽城交界。

东平顶山，林场修路时挖出过箭头。

张三遇害经过

讲 述 者：赵廷良（75虚岁）、张福玉（70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廷良（75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自然村村民）：

阴历二月间，都有树叶子了。轧磙子种地一般是三月份。

高家庄，原来往下8里地，解放后3532工厂从沈阳搬来，给占了。

赵家庄离下板城15里地。现在35户，130多口人。20世纪30年代才30多口。孙永勤一失败，抓、杀，还剩二十四五口。

赵家庄距任家庄1华里，距杨树洼大庙2里地。

到老梁，要经过一个大豁子，叫二道沟大豁，从赵家庄到老梁30来里地。从下板城走不行，有小鬼子。当时年轻小伙子走三个小时左右。

到车河口，经乌龙矶、九道岭到车河口，40多里地。

赵家庄到孙杖子六七十里地。

从孙杖子到庙梁、老梁，都是山道，不好走。老梁在赵家庄东南方向。二柜在常峪沟西梁顶，得50来里地。上二柜都是黑夜走，从乌龙矶趟滦河过去，别处走不了。

赵有，小日本抓他，不敢回家，死在围场。

赵林大儿子赵廷普死在毛山。大闺女赵玉芝骑着大马，使双枪。小脚，穿着靴子，穿青衣小靠，姑娘长得俊。让庆家亨大烧锅大掌柜的保下，不然也枪崩了。死了十来年，病死。

张三要不是因为顾赵玉芝，不至于被抓，被割下脑袋。他是中队长。

给张三送饭的人的名字叫崔永明。

把张三从北鄗四道沟山洞里掏出来。胡品卿是下板城甲长，听说他有枪，吓坏了。实际上枪打不响，炸口枪。赵玉芝认胡品卿干爹，饶了赵家庄好多人。把张三弄到后山坟圈子杀了，日本人砍的。张三是中队长。

高长存，高家庄中农户，孙永勤在他家拿过枪，给了。那时候是有枪的都交给绺子了。赶闹大了，叫“抗日救国军”，不叫绺子了。

柴先生与赵家庄三兄弟是朋友。

陈混蛋，柳河口分局局长，日本人。赵福、杨晓峰给他当差。不管对不对，就揍一顿。大高个，圆盘脸，一米七八，连鬓胡子。什么都干，勒索民财，强奸妇女。后来调走了，原来这一带都归他管。修部落墙，限多少日修好，陈混蛋差点拿刀把赵家庄人全砍了。他有时在柳河口，有时在下板城，骑着马。

赵来是属虎的。

当时老梁有楸子沟、夏沟、南头，三条沟有人。

小后福：从棺材沟进沟，往东南走，柴草大，藏龙卧虎的地方。

张福玉（70虚岁，路通沟村杨树洼自然村村民）：

三霄洞在石湖坑山下，离赵家庄2里。

陈敢干，平泉人，恶着呢。

回忆爷爷赵林（二）

讲 述 者：赵文忠（62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文忠（62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自然村村民，赵林之孙）：

大姑死十多年了，脑溢血，死时八九十岁。

房子后来被日本人烧了。要不烧，家里得划富农。我爷爷爱置地，爱置办家庭，得五六十亩地。大囤小米子都给烧了，就剩一破柜，那还划中农呢。

我奶奶刘玉荣心眼太好，瞎子、瘸子，啥人来都对他们好。我表叔他们都白吃白住，给干点活啥的。

爷爷有两儿两女，还抱养一个儿子，赵廷海，抗美援朝死朝鲜了。我爸跟赵廷普是亲哥们儿。

爷爷那时三间草房，一个小东厢房，一个小西厢房。起义不久，抓他们时，给烧了。

南前山，东山，后山。

赵家庄目前东西向三百多米。

老梁小南沟地理

讲 述 者：王树海（61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9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小南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树海（61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前党支部书记）：

小南沟，老梁村第三村民组，原来107口，现在家22口。出去打工的，在下板城附近、兴隆，搞建筑、运输、煤矿、铁矿、饮食业。

20世纪30年代，20来户，八九十口人。

大洞离村民组250米，正南方向。飞机扔炸弹，村民都躲到大洞里，洞给炸坏了。

孙永勤在老梁

讲 述 者：王永存（75虚岁）、许振岭（6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9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小南沟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永存（75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小南沟自然村村民）：

孙永勤时，六户，五六十口。

孙永勤闹绺子，日本人炸，洞炸坏。三队（即小南沟村民）一百多人，想出八道石湖，躲到大洞里，结果好几个没气了。日本人从八道石湖上来，过东大梁走的。

许振岭（68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小南沟自然村村民）：

春天，日本人从冰沟上来。到山豁子，孙永勤的兵一枪把扛旗的打死了，日本人回去。孙永勤原准备老梁打三年，结果几天。

烟囱冲东，灶冲西，门冲北。

老爷王德祥、老叔王占德，孙永勤在这儿安的办公室，住好长时间。许志那屋住一拨。

刘宗臣也住这儿。

我们在东厢房住，爷爷、奶奶、爸、妈都在，我刚出生。

王永存住在王占德的西厢房。

这窑是王占德他们的，山是他们的山，一窑出六七百、七八百斤炭，拿柞树烧炭。苦柳、色木、牛筋子都能做炭。

炭窑里躺三四个、四五个人都可以。

我母亲李玉珍把绦子从岳老亮大衣裳上撕下来，在张老五背走之前拿的。绺子走了，把岳老亮尸首给背走了。张老五，可能是暖儿河的。

姓吴的在一组，有十五户，六十多口人。

抗日救国军在常峪沟

讲 述 者：姜以周（84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柳树底乡常峪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姜以周（84虚岁，河北省承德县柳树底乡常峪沟村第二组村民）：

在这儿拉过绺子，从这儿走嘛，这儿跟着好几个呢，下边五组李占德、大杖子姜青都跟着走的。在全宝河抓一个老的日本人，四五十岁，一个小的日本人，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样子。住李成国家，小的日本人跑了。小日本跑到后山，爬到柏树上藏猫了。找一宿，找着了。给抓了，好打。老日本人表现挺好，给放了。老小都放了，在别处放的。孙永勤他们就走了，当时带着百十来人来。

冷的时候来了，都穿棉衣裳了。

当时走小道到下板城三十五里地。

当时五十左右户。

孙永勤从这儿过，叫“起伙会”。我当时七八岁，看热闹。

常峪沟地理

讲 述 者：姜以田（63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柳树底乡常峪沟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姜以田（63虚岁、河北省承德县柳树底乡常峪沟村村主任）

常峪沟，长20里左右，8个村民组，221户，831人。

种地，果树有苹果、梨、核桃、山楂。

打工，建筑、运输一小部分，其他人在饭店、针织厂。

刘宗臣土匪，起伙会为抓他。

西梁顶也叫南山顶。

常峪沟西梁顶地理

讲 述 者：薛金城（5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柳树底乡常峪沟村西梁顶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薛金城（58虚岁，河北省承德县柳树底乡常峪沟村第一组村民）：

原先最多时10户，43口人。现只剩6户人家，20口人，其他人都到城市打工去了。

孙永勤时大概也就两三户，十多口人。那时都大家口，一家六七口。

听爸爸和老爷丈人，就是我们岳母她爹，说过，是土匪安盘子的地方，土匪拉绺子。

姜以珠忆抗日救国军

讲 述 者：姜以珠（81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营子乡前莫河北台村北山顶（又名北梁顶）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姜以珠（8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营子乡前莫河北台村十二组村民）：

1947年参加本地区小队。国民党去台湾后，到兴隆公安局看守犯人。后来脚上犯结核病，打游击时扎的，1953年回来。在大队当了三年委员、治保主任，以后是生产队长。四清弄乱头了，就没再干。

北梁顶，原来七八户，四五十口人，现在十六户，六十多口人。

孙永勤拉杆，来过两三次，七八百人，千把来人，相当于共产党的一个营。老百姓那时管他叫"匪"。

过去的路：大杖子——常峪沟——全宝河——小牛叫——下板城。

到上板城：小牤牛叫——月牙山——上板城。

孙永勤部队没在北梁顶住过，就是路过。孙永勤部队见着鸡也抓，见着猪也杀，见到好吃的自动就弄，不是共产党部队这样，所以管他们叫"匪"嘛。比日本人强点。想杀富济贫，但是兵胡闹，没有党的领导，到处抢抢夺夺，老百姓不喜欢他们。共产党多大的纪律啊。

兵胡闹，头儿思想不错，也想走共产党这条路，但是没有正确领导，不像共产党有明确的纪律。他那纪律不中，不执行，三搞两搞就乱套了。老百姓都管孙永勤叫"匪头"。

我自己那时才十来岁小孩，害怕，不敢到兵前面去。

南山有个叫王洪喜，存着几百石粮食。孙永勤来了，主要吃他的粮食。别人管不起，自己还没粮食吃呢。

衣裳啥都有，跟杂牌子队伍似的。有小旗，三尖那样的，指挥用的。有红的，有白的。退了使白旗，出红旗就上。马不多，三五匹。头儿骑。白的、黄的、黑的都有。

北梁顶海拔一千多米。

陈敢干，在柳河口下大彭杖子住，中国人，南边的。

下板城到常峪沟村部四十华里。

村部到西梁顶十三华里。

西梁顶到北梁顶三华里。

李秀兰忆日军轰炸小南沟

讲 述 者：李秀兰（74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承德县中医院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秀兰（74虚岁，家住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街）：

1935年阴历二月十九出生，一个月零十天，日本来飞机炸，老百姓都跑三节洞里去。老梁人四五十口人都在洞里。大人吃不上饭，孩子没奶水，爸爸让我妈把我堵死，怕哭，说：“一洞人吃亏。”母亲李孔氏抱我出去，说：“俩儿子、一个闺女，死一块儿。”抱着我出去，上山尖树墩子上坐着。还没得着我济。我12岁时，母亲生小孩，失血过多死了。从娘家回老梁，39岁，没大夫。



孙永勤老梁突围路线

讲 述 者：李长文（5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承德县中医院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长文（58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村民，李振庭次子）：

孙永勤突围路线：榆树梁——八道石湖——大彭杖子——九道岭——王宝石。

八道石湖有一段得搭。

榆树梁离二组三里来地，东南方向。

棺材沟：从小平台进沟，到关家沟。现在叫白了叫棺材沟，到山顶七八里地。

姓吴的在一组，当时有十来家，亲当家子，在老梁的西梁。

小后福是榆树梁梁顶岔开的道，通到满杖子。

老梁上树木有：色树、杨条子（开花，满山红）、楸子树、冬青、枣树、杏树、桃树、杨树、柳树……

九虎岭地理

讲 述 者：甄德贵（81虚岁）、王树庭（82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九虎岭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甄德贵（81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九虎岭村村民）：

从梁尖到大野峪沟里10华里长，都是九虎岭庄。现有20来个生产队，4000多人口。

从南天门到九虎岭归宽城镇管。九虎岭距离宽城县城25华里，离瀑河也是25里。

听老辈子人说，曾有九只老虎从西往这边来。

王树庭（82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九虎岭村村民）：

因为有九个山头，所以叫九虎岭。不是老虎从这儿过，哪儿有那么多老虎呀。现在修道都切开了。



任克泰谈瀑河口任氏父子

讲 述 者：任克泰（77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瀑河口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任克泰（77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瀑河口村村民）：

任继承、任继武、任继文都是我们庄的，他们与我家就隔着一个河沟子。“继”字都管我叫叔叔。他们都富，养团。哥仨分家另过。

听老人家讲，他们的父亲在口里滦县打工，用现在的话讲，有“小姐”，那时叫“窑子”，时间长了，就跟着他，跟了好几年。那时候趁钱，洋钱，时间长，钱就交给他了。那时都用船，他就悄悄把钱整出来，坐船回来了。“小姐”一打听，他没回家，就追。追到贾家安，当地人说没这个人，“小姐”就回去。用这个钱买的地。那时候地，这头搁水罐，那头搁咸菜罐，渴了这头喝水，饿了那头吃咸菜。他是“克”字辈，只知道外号叫“三掌柜的”。后来发展大了，你困难，出俩儿钱，就把地置过来了。在宽城搞买卖，宽城半拉街都是瀑河口的。清河口还有他们两处宅子，开着买卖。三掌柜的养团，三掌柜的病死。“文革”时，两口子坟都被扒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两口子接半拉月死的。不知拿出多少钱来，可着俩钱儿抹乎。尸身搁一个月，糊一个喷钱兽，戴一个假帽子，往外撒钱。当时糊纸的左近没有，都是从瀓河桥请来的。出名从死这节出的名。不管啥人，多远的，就是要饭的花子，只要拿两张烧纸来，一样看待、招待。就那样，钱还没花了，都攮给老百姓了。解放前死的，当时日本还没败呢。

三掌柜瀑河口院子不大，在村子的北面。

“集家”大头了（即刚开始时），房子被日本人烧了两次。从下面下来七船满洲军，里面有几个日本子。船一落沿，我们这边拿上旗子（指日本旗）接应去了，他们没出来，只是看了看，结果房全给烧了。那时八路军没有子弹，就靠几颗手榴弹。日军烧完房走，在下边遭八路军埋伏。八路军那边枪一响，人家机枪就朝大河套打，扫够呛。当时人没死，就打死一条日本狗。

哥仨中任继承最大。任继承人不错，“文革”时期不受冲击。人家那眼光，对穷人，看得起穷人了。解放后死。

任继武另过，死在家里了。土地改革之前死的。铁锹，搁堆儿炭火烧红了搁身上，冒油，

冒烟，至死没说一点出来。那罪受的，我看了下不了手。当时问埋的钱。

任继文小，一点罪没受，把钱财都拿出来，告诉在哪儿哪儿，你们拿去吧。任继文解放后搞互助组，转社，病死。

当时瀑河口不到100口人，全姓任，一个外姓没有。从“集家”回来，才有外姓。

船，下边通滦县，上面通承德，干啥都用船。

现在瀑河口35户，140口人，三个村民组。1979年搬迁上来的，离老家一华里。现在离宽城县城70里地，瀑河口东边。

跟孙永勤去的，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过不下去的，只要过不下去，想参加，就收；一部分人是眼光远，跟他去的。

父亲任万巨、叔叔任万利，还有一个大爷，亲哥仨都跟孙永勤走了，毛山没回来。庄里去了十几个，就他们哥仨没回来。

附近没有松挠子沟，只有一个大杨树沟，八路军兵工厂。从贾家安朝上，塌山朝下没有。凤凰山下有一个四间房的大庙，里面有泥像。我有一个姐姐，给老庞家了，所以知道。院子让山上下来的水给冲了。

塌山，原来归孟子岭管。三岔口（即现在塌山村）一座山，上面有很多柏树，长得像塔，原来叫塔山，后来叫成塌山了。

臭水湖，原来叫秀水湖。



孙永勤攻打杨老文经过

讲 述 者：王德云（72虚岁）、王德彬（75虚岁）、王吉满（7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河西村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德云（72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第二组村民）：

塌山，原来叫塔山，在河西村东南方向，山像塔。60多年前，东大顶塌下来半拉，乡政府给改名塌山。

西风水、后风水。

小学校山名老坟地，底下叫杨家坟圈子。

杨家大院现在河西村中央。当时花园往西没人家，往东有人家。解放后那里是塌山乡供销社、村卫生院。东院由15户村民住着。

河西村现在3个村民组，300多口人。

距宽城原来（指未修公路前）50华里，距清河口15华里。

张凤林所在村名字叫小东山，与河西村相距二里地。

有小东山、大东山两个山。大东山在小东山上面一里地，距河西村三里地。

王德彬（75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第二组村民）：

打杨老文，打两次。头一回，没打进来。二一回打进来，抓去一个护院的。三节炮楼，木头搭的，上面是瓦。四个炮楼，东南方向、西边的一节，北边的两节，东边的三节，都有枪眼。

王吉满（78虚岁，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第二组村民）：

王吉和，给杨家送信的，一天跑平泉一个来回，藏在我家前院胡同子里，绑票的（指孙永勤队伍）看见给绑去了。

杨家大院东南边是马圈，南边是厕所、猪圈，外边是菜地。

杨家大院图（略）。

村后是后大岭、小塔、老坟地、杨家坟圈子。

大院后面是西风水山、东风水山。

大院北面，从西往东分别是花园；杨老文、杨秀山住房；伙计住房；账房、客房。

南面从西往东是厕所；猪圈；马圈。

最南面是菜地。

老地主杨秀山，他儿子杨作霖也一个儿子，在赤峰做医师。

孙永勤部在宽城的几次战斗

讲 述 者：杜青怀（71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老促会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杜青怀（71虚岁，原中共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党史办公室主任，现宽城满族自治县老区建设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九虎岭战斗：1934年5月10日上午，日军从平泉、宽城过来，一共600多人，孙部打了半天，老百姓为之挖战壕，送水送饭。孙永勤打完宽城，从九虎岭路过，没恋战，没伤亡。日军死了七八个人。

1934年5月15日，孙永勤因很多士兵徒手，派李志芳，下板城岔沟人，清西县副议长，支援武器。共给大枪10支，子弹200发，让韩广和带走了。孙永勤后来专门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感谢。

赵四川，原来是燕子峪大庄的。一庄都姓赵。后搬到承德县路通沟赵家庄。年景不长，落户到孙杖子。

瀑河口老任家，富户，里面一个人是特务，叫任长会，伪满特务。半职业特务，送情报，根据情况重要与否，得奖赏。另外老任家欺压、打活人。

老任家，孙永勤打了两次。第一次是1934年阴历六七月份，第二次正收秋，中间相隔三个月左右。



老任家有一个姑奶子与孙永勤有关系，远房的。

老任家直系后代现在上孟子岭，就他们一户。

孙永勤打车河口经过（二）

讲 述 者：徐敬礼（87虚岁）、罗凤刚（74虚岁）、辛连海（7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徐敬礼（87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村民）：

孙永勤只打过一回车河口。

孙永勤一早晨从南山压下来，总共十来个人。从南山西边坟茔沟下来，白天压下来，黑夜打几枪，把警察署的警察打跑，第二天发现赵来尸体。同一宿打了大昌兴。

赵老子，30多岁，个子不算矮，长四方脸，不瘦。

王老瑞，大掌柜的。

大昌兴在车河口大街东南。

罗凤刚（74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村民）：

车河口到孙杖子得顺河道走。“判官肚子”，得搂着肚子过来，底下是滦河，上边是崖壁，没道。得半蹲着，抄着山走，下面是滦河，不那么走就没命。

要走，年轻人得三个小时，上岁数的得四个小时。

辛连海（78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村民）：

陈敢干，当时在柳河口警察署，中国人，30来岁，人长得相貌不恶，对老百姓不好。

车河口警察分驻所在原来马文华那院，就三间房，就五六个警察，黑衣裳，大盖帽。

第一次打车河口时，黑夜从孙杖子过来，白天在山上待着，人不少，枪打得厉害。没给老

百姓分过东西。听说是杀富济贫。

永合堂在东化鱼沟进沟，离这儿十里地，是个山沟子村。

那时车河口总共百十上户，就一条主街道。有“大昌兴”、“平升号”，口里人老板，收木炭、杂柴，开香磨，做香，主要这两家。大昌兴在车河口南街，离河沿不远。王老瑞是大老板，人不恶。大昌兴平时十多个人，净些个年轻的管账的。大老板群众平时反映挺好，夏天滦河经常涨水，群众上山搭窝棚，给一些苫席，冬天给穷的一些木炭。

炭，山似的，往口里头发，都是杂柴。大昌兴只卖炭，不卖杂货，没炮楼。

平升号有酒。

现在的车河口离原来地方，南山根那儿，也就一里地。现在1330口人，1972年搬迁。现在主要靠农业，百分之七八十都出外干活，有的上潘家口水库打鱼。

那时的繁华是有数几家繁华，百分之八十是穷人。车河口离柳河口一公里。柳河口警察署设在柳河口庄西头。过柳河，一个院，有炮楼子，正房六间，厢房各四间。头里是门房，两个炮楼，一东一西，有四五米高。孙永勤那时，这儿没日本人呢，有事从下板城往这儿调。讨伐队，名字随头儿名字起，姓啥就叫啥。

打之前，警察对老百姓也不好，主要是维护地主老财的。

从车河口到彭杖子，先过柳河。到柳河口大东头摆渡，离现在的庄二里地。走四里左右地，再过滦河，再走二里地到老岳家。

车河口现在搬到东北山了，原来在南山根。

辛增祺，家是富农，怎么死的不清楚。



关于烧板子沟的一些情况

讲 述 者：刘祝金（60虚岁）、姜君林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邢杖子村烧板子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刘祝金（60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邢杖子村村民）：

从杨树沟进沟，走六七里，进烧板子沟，沟长八里。

北砬筒子山。

原来就一户人家，赵文贵家，后来搬到杨树沟，20多年了。

九楼子山。

那沟凶着呢，邢国海上山砍柴禾，瞅着头边有亮，就进沟了。趴坟上了，没气了。沟门老赵家狗咬，赵文贵的哥哥赵文忠胆大，让狗带进去。一个劲儿走，走到坟根下，见邢国海脖子上给掐紫了。把他从坟根下扛回来了，到大杖子医院治好了。邢国海大前年死了，早晨去买肉，掉沟下死了，61岁。

我过去常到那里放牲口，好天敢去，阴天下雨不敢去，瘆得慌。

过去这一带山中有狼、土豹子、狐狸、灵狗子、山猫子（即兔子）。北灵公路修路时，动物都吓跑了。

山耗子爱吃树皮、玉米，没家耗子大，比家耗子快。猫吃山耗子。

姜君林（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邢杖子村党支部书记）：

邢杖子现在12个村民组，300多户，1200口人。村部离大杖子乡政府十里地。

石洞子沟在靠近承德县后八卦岭的地方，接白家梁与村相接，走山路四十多里，属柳河。分前石洞、后石洞，都属兴隆县大杖子乡。

孟家沟战斗经过（二）

讲 述 者：孟繁林（64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孟家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孟繁林（64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孟家沟自然村村民）：

从孟家沟到三岔口五里地。

孟家沟到八卦岭张家锅伙，进龙王庙北沟，过八卦岭梁，过去要走十五公里。

车河梁到罗圈沟五华里。

孟家沟到罗圈沟十华里，过去抄小罗圈沟梁，不绕远，孙永勤过去经常走这条路。

孙朝阳从鹰手营子调的日本兵，从三岔口过来，走石戳子沟，到孟家沟后梁支的迫击炮，把房子轰好几个窟窿。孙永勤正抽大烟呢，一看不行，把棉被包住头，躲沟里去了。三太爷跟他们在一块，知道抽大烟。日本兵已到后梁了，孙永勤还没走呢，最后走的。

大舅张连玉是稽查处长，管军纪的。打散了以后回家了，上世纪80年代去世。去世时雪白胡子老头，70多岁。

孙永勤总共不超过100人，多了也住不开，住没超过十来天。

那时就老孟家一大户，30多口人，不到20间房子，一个大院，四面斗（即四合院）。三太爷孟朝贵是总当家的，有两个长工、伙计，院外没人家。统共将近300亩土地，3000来亩山场。

一家分两大家，另一支在车河堡。土地在车河堡有100亩，车河梁100多亩。孟家沟，那时叫王胖沟，土地100多亩，山林都在这儿。

车河堡那支比这边多，两支一共60多口，跟这儿是一体。那时这儿烧炭，炭归这儿管，吃粮归车河堡管。

奶奶孟刘氏跟我说的。

大解放后改的孟家沟。

现在还有8户，不到30人，搬出两户了，还都姓孟。

五凤楼都是杂树：杨树、椴树、柞树，松树很少，没什么值钱的树，都归寿王坟国有林场，归兴隆县林业局管。



最高峰差23米不到1500米。从孟家沟到五凤楼主峰得五公里，年轻人走一个小时。二三十岁的时候到主峰那边下套，套过山羊、狍子。这山最大的动物是狍子、菊花豹、野山羊。山猫儿、野猫儿、獾等有的是。站在主峰山顶，能看到遵化。老年人说，原来这里有梧桐树，落过凤凰，所以叫五凤楼。山顶超不过两米宽，前半坡（即南面）都是悬崖峭壁，过去经常去，现在属成功村管。在林场干20多年。五凤楼最低占地30平方公里，光五凤楼国有林场就3000多亩。白理岩、花岗岩、黄铁矿，黄铁矿即硫铁矿，产硫酸的。主要是花岗岩和黄铁矿，从横河、白马川、半壁山到这边全是黄铁矿，长30公里，宽30公里左右。

孙永勤把孙永香绑来要了5000大洋。

孙永勤从西大山拔梁上黑河了，成功村那一带。那时候不到一拨人。

孟庆山忆父亲受伤经过

讲 述 者：孟庆山（53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孟家沟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孟庆山（53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孟家沟自然村村民）：

围攻孙永勤时，我父亲孟宪义被日本子打了一枪，打后脑子，挺长一个大口子，差点揭盖。就在老房子那儿，那时还是草房呢。孙永勤那时都没枪，躲到这儿。日本人从罗石沟过来，到小罗石沟梁顶，围攻，用机枪打。老爷子是孙永勤的办事员，当时20多岁。我奶奶在别的屋住，父亲出去拽我奶奶。

父亲受伤后，忍着呗。

父亲后来还为八路军做过事。他这一辈子，头上弄了两条大沟。一个是枪子打的，一个是要信，不给，日本军拿挡牛圈门子的杆子给打了一个大槽，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当时口袋里装着八路军的信，吃了。日本人抓“孟宪义”，老爷子改了个死人名“孟宪明”，怎么打他，一口咬定叫孟宪明。后来爬着回来的，可糟践惨了。

那时这儿一个劲招匪，老爷子说是鞍将那边来的。土匪来，把三奶子吊起来，拿烙铁烙，用香头烫胳肢窝。三奶子说，给你们找点吃的，这才把她放下来。得机会跑了。

黑夜正睡觉，土匪上房了。土匪先把男的绑起来，要钱、东西，不给就打。当时院墙一丈五尺多高，都能上去。扒着木头就上房，上房就叫号。大骡子在门口拴着，土匪来，拉上就跑，不敢找。过年想杀点儿肥猪吃，全让土匪吃了，吃不上一口。种地时，听见土匪来，撂下家伙就跑。这会儿能睡点安稳觉，那会儿可胡瞎了。

可能是土匪走了之后才来的孙永勤。

罗石沟在村子的西南方向，后山在房的东南方向，房子坐向西北，朝东南。

五凤楼主峰上，在梁豁子上有两个小庙，一个朝黑河，一个朝车河。

搁几块石头就是一个庙。

陈文儒忆郝敬义

讲 述 者：陈文儒（66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孙杖子——兴隆镇长途汽车上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陈文儒（66虚岁，家住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化鱼沟村。郝家庄中学创始人。70年代曾在郝家庄教书四年）：

化鱼沟，原来有两条鱼，叫化鱼。

叫郝静义（准确名字为“郝敬义”，下同），不叫郝士祥。郝士祥是郝连玉的父亲。

70年代见到郝静义时，还盘着小辫，高个，瘦了巴唧的，子丑寅卯说得熟熟的。

大儿子郝士财当过兵，争过大队干部，没选上，后来得病死了，一九七几年死的。二儿子在大杖子敬老院，傻点儿。

孙子郝连坤在代销点卖货。



回忆爷爷孙永香（二）

讲 述 者：孙守礼（79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6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郑家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守礼（79虚岁，家住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郑家庄，孙永香之孙）：

爷爷负责遵化长城外，盘道梁以南，兴隆县城往东，直到车河堡、下板城。

当时一个保比一个镇还大。

北七保总保长，下边有七个保长。

孙永勤不抗日，就打砸抢，也不杀富济贫。

当总保长之前，就一个地主身份。以前有钱就有势力，就当总保长了。跟横河吕凤池一样，几面都维持，不维持站不住脚。我们村一个叫郑月秋的，只给日本人办事，不给八路军办事，让八路军绑到上面一个偏记沟，砸死了，连枪子都吃不着。吕凤池比我爷爷还好呢，我爷爷不如吕凤池。吕凤池被枪毙的时候，连知事儿的孩子都哭。那咋说呀，有地位，有势力，就算坏人不是，1947年土地复查时枪毙的。黑河时，日本军“扫荡”，一拨羊让日军杀吃了。羊是八路军县政府一个干部的，这拨羊没给圆活去，就把吕凤池弄死了。“文革”时，郭显宗把这个干部要回来，也给弄死了。郭显宗后来病死了，死了七八年了。郭显宗原来是中医大夫，起农会时，他是法官。

李勤，我亲表兄，大舅的儿子，头道沟万人求，离吕凤池不远。

我爷爷没达到吕凤池这种程度，岁数大点，慢慢慢慢就死了。

派人给八路军送信，支援粮食、猪、羊。在这儿活动的是老包，爷爷支援的应是老包。

父亲病死的，痨病，喘，六几年死的。

四叔叫孙朝举，来日本了，往山上跑，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的。

五叔给小队驮垫脚土，垫牲口圈，驴驮。挖一个土坎，塌方，胯骨砸坏，肉烂得都露骨头了。1958年左右，大炼钢铁时。

老叔也是有病死的，去世三十来年了。

大南沟门，不是大杖沟门。

孙守学父亲的名字叫孙国安。孙国安管爷爷应叫叔叔，不叫老爷。

我1947年参军。有一天，家里都被农会搜罗干净了，几只鸭子、一口猪、被褥、炕席都被揭走了。我母亲生下我老妹妹三天就被斗了，把母亲推到光炕上了，炕席都被卷走了。父亲那会儿被圈起来，圈了四五天，挨打。四五天后，没事了。那时候，农会打人不用往区政府批，谁也不用。就剩点筷子、碗，大缸都抬走了，就剩一瓷缸桶，也就盛一挑水。过十来多天，农会来叫我当兵去，我说："去不了。"那时家里什么人都没有，父亲去滦河弄吃的去了。我说："母亲病了，父亲没在家，走不了，再说地主当兵也不让。"农会说："给你弄错了。"农会商量，我要不去，就把我父亲弄死。一个叫禹明生的，区政府一个助理，透露了。第二天，父亲回来，我把农会、禹明生的话告诉他，父亲说："那你去吧，我要死了，更没法过。"

过了两天，农会来问："去不去？"我说："去。"过四五天，在郑家庄一个学校开会，从那儿走的。共当兵六年，林彪部队，机枪手。打锦州、天津，南下，先去湖南，从广东回来。四十六军，老师名叫二十六师，新名叫一三七师。

复员军人证只用过一次。

我1930年生人。

1952年，在寿王坟河北铜矿当炊事员。

1953年起，烧锅炉、澡塘、食堂十来年。

1966年被调山西源曲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三门峡附近，当毛工，后来送饭。九口人，两地分居，生活不了，父亲还病着。

1970年9月9日回来，下坑当毛工，一直到退休。

由山西回来，被批斗，胳膊上搁五个大窝瓜，窝瓜掉下来，被打掉俩槽牙。

1986年退休。

毛主席好是好，可是紧箍咒我受不了。一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把我吓得骨酥肉麻的。毛主席要活着，我连孙子都没有。儿子说不上媳妇，哪有孙子去。党的政策是好政策，王八蛋执行坏了。

父亲被打时，大嘴巴子没少挨，皮鞭蘸凉水，肉都抽没了，露骨头，我兄弟我们哥俩把他架回来了。寿王坟银行李主任说："孙朝访人缘不赖。"准备给他摘帽。一个人说了句："人死心还在，别说还活着。"帽一直戴到死。

我四个儿子，盖房，哪儿都不批。后选现在地方，1985年建房。

家谱在孙守合家。

爷爷辈——永

父亲辈——朝

自己辈——守

儿子辈——玉

孙子辈——志

爷爷哥儿四个，爷爷最小。

马杖子在辽宁北部，那边说，这边姓啥那边姓啥。

家谱是白布，上边刷上蜡，折叠的，挺厚。孙守合父亲孙朝祥组织掏钱续家谱，我看见了，1952年。

爷爷死时，好几十岁的都没掉眼泪。吕凤池死时，没参加公判大会的在家里都跪着。我亲眼看见的，住在大舅家。一枪毙，大舅就跪下了，哇哇地哭哇！救了很多人命。田野队“扫荡”过来，把横河老百姓赶过来200人，赶到郑家庄河套，要枪毙。郭显宗，田野队让他背着四方的装酒的铁桶，桶里生上炭火。疼得他地下乱滚。一滚，火炭着得更欢。至死身上都是大疤瘌。后来有人去告诉吕凤池，他骑马过来，跟田野说了不到两个小时，把人都放了。表兄李勤被鞭子、棍棒打得肉皮黑紫，父亲他们找人抬到我家养了半年，1943年。

爷爷死时70多岁，不到80。这么大事（指日伪袭击王胖子沟孙永勤驻地之事）一直没人算计他，老死的。要不得有人算计不是？

孙永勤与孙永香

讲 述 者：孙守印（8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7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鹰手营子镇洞庙河河北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守印（88虚岁，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罗圈沟村村民）：

孙永勤来罗圈沟是正月初四，来了六个。想让我老爷孙永香当二头，孙永勤作为大头，好言好语，想认家了，老爷一想，不想去，没见，藏了。孙永勤一股火，初七又来，一早来，孙永勤没来，关元有来。这回不是六个了，很多人，村头全站上岗了，许进不许出。做饭，早上吃完饭，吹哨集合，把过去风灯的绳给剐开，把全庄的人，四十多口，两人拴一链。又找孙永香，他家人知道藏在梁家沟。二头子说："你们要找到孙永香，都把你们放了。你们要找不到，都让你们当民众去。"村里人有的乐意，有的不乐意。不乐意的就让孙永香五儿子孙朝聘去找孙永香。孙朝聘找着了，二头子把人都放了。二头子乐着拍着孙永香，就把人都放了。孙永香就跟着去了王胖子沟，在孙永勤那儿一块待着。孙朝聘去看过孙永香。待到二月底，也知不道谁勾兵，咱们小人儿也不知道啊，二月底就来兵了。黑夜就来了，罗圈沟来一拨住下了，第二天早上从罗圈沟东山进的王胖子沟。罗圈沟东山过去就是王胖子沟，也叫三岔口南沟。日本子是从车河梁去的。我们小孩儿就看热闹。二拨没进罗圈沟，直接开进三岔口南沟。是从营子来的，直接进去了。兵打一阵子，就跑回来了，一会又回去。兵在大东山梁上，中国人多，那时叫保卫团，都是便衣。住罗圈沟的没有日本人，二三十人，全是便衣，但不是伙会。第二拨据说有日本人，据说有炮。我们村那一拨子一早上开始打，晌午太阳歪了，就说孙永勤已走了，又回营子了。孙永勤武器不好，顶不住，有人回来念叨，孙永勤奔横河了。

孙永香没去，知不道咋回事，就煞下了。没当上头，也许就害怕了，不敢在家里待，就搬兴隆了。三月初四，孙永勤部队来，直接进罗圈沟，把孙永香房子、孙朝恩（孙朝恩是孙永香侄儿）房子，俩院，一人一个院，都站上岗了。头儿说大道东不让烧，大道西烧，要是跑东边，给救下。我们家没烧，当时道东都是穷人，我们家就住在道东。当时我自己不超过十一二岁，反正记事了。

正月初四见到孙永勤，大个子，骑着个马，领着六个勤务兵，没见着孙永香面。又来一大拨，把孙永香弄走了。

孙永勤也是为了革命，穷的他救，富的他可不怕。那时没细粮，富的，让送小米、猪，就得给送去。穷人没有，不难为。

孙永香有点看不起，没去。

不是为五千大洋的事。

是孙朝聘找的孙永香，他亲老爹不是。说这回你得去，你要不去，我们还四十多人呢。孙国安也跟村人一块绑着呢。

孙永香搁现在是村书记似的，那时叫董事。不小看人，穷不怕，富的你想怎么着不行。越穷，痴茶呆傻，他成年养着。我们见有个瞎子在那儿养了几年，死了给发送的。还有一个哑巴，瞎子的闺女，瞎子和哑巴要饭要到罗圈沟，孙永香看着可怜，留下了。那时归遵化县管，北七保好比寿王坟一个镇。

车河口那阵儿有匪，兴隆县这边五兴里伙会都去。是六七月份打的，当时反正是连阴天。那时伙会拿的都是一个子的枪，叫套皮子。还有抬杆，一个人举不动，扛着，另外一个人在后面拍那个火。

孙永香小个儿，比较胖，眉心有个瘊子。老辈子不说，有瘊子有福嘛。孙永香房那时叫四方斗，一个院，前面正房，后面正房，两边是东西厢，有过道屋、碾棚、羊圈，共二十来间房子。当时位于村子正中间，道西。当时村庄有五六户，大户分小户，也就四十来口人。那时都姓孙，没外姓。

从山东移过来，是一个寡妇，管叫祖母。要饭过来，丈夫在山东没过来就走了（即去世了）。在这儿生育，一辈一个小子。生到四辈上，小子就多了。

听老辈子说过，罗圈沟跟孙杖子是家了。

孙永香上冻时死的，挖坑挖不动，第二年春天才埋的，死在寿王坟郑家庄。当时罗圈沟已经“集家”到郑家庄了。死时日本人还没投降呢。

孙永香要是人不好，怎么没摊上这些运动呢，人家自个得病死了。

说孙永勤是匪我不爱听，人家也是为了杀富济贫，革命嘛！

我自己在八路军刚来时，做组长、代理保管员，负责保管公鞋、公袜子、小米。白天不敢做，黑夜做。晚上开会，布置工作。兵抓我，没抓住，跑了。我是保管员，兵追到山上，打了我三枪。头一枪打到脑袋边的树上了，二一枪打腰边的树上了。说你下来不下来？我高低不下去。第三枪从屁股蛋子旋过去了。部队一个人说过，中花了，要跑二里地，就活了。要停住，就完了。

八路军队长化名姓郭，实际姓刘。

在秋花峪的采访经历

讲 述 者：刘玉兰（51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7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刘玉兰（5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2004年春天，我们到遵化毛山东面的秋花峪采访，遇到一位老人。他说，当时毛山顶上有好几具被割去头颅的尸体，日军将这些头带到澈河桥，让一个认识孙永勤的道士辨认。之后，将认为是孙永勤的头带往承德二仙居示众去了。

黄天霸与孙杖子平顶山

讲 述 者：田玉仓（51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9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小学旧址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田玉仓（5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村民）：

山叫平顶山，左近很出名，出蟊寇的地方。蟊寇站在山顶朝下射箭。过去捡过各式各样箭头。四十年前，在下面的山沟里发现一只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现在上面还有马粪呢。

过去使马朝上运水。

黄天霸朝上射箭，射到土匪的窗棂子里去了，把土匪给吓跑了。

听老辈子人说，过去土匪把好看的大姑娘掠上去，玩够了，劈了，从一个大缝子那儿扔下

来。现在砬缝子里还有骨头呢。下雨阴天，听见有小孩哭，就是看不见人。田玉林大集体时放羊，就亲身经历过。现在要一个人去也发瘆，要是阴天下雨也不敢去。

孙中彦讲述孙杖子地理

讲 述 者：孙中彦（60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19日、21日、2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饮马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中彦（60虚岁，原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办公室主任、乡土地站站长）：

（2008年7月19日采访）

孙氏家族祖居山东省登州府杏花村柳树底下人氏。

第一世祖先：孙广召

第二世：孙红、孙秀、孙祥、孙利

第三世：孙良青、孙良武、孙良玉、孙良书、孙良毕

第四世：孙宗尧、孙宗起、孙宗富、孙宗贵

第五世：孙福广、孙福来、孙福贵

第六世：孙进富

第七世：孙永明、孙永彩、孙永瑞

（2008年7月21日采访）

饮马坑，传说穆桂英或毛寇在那儿饮马，距孙杖子六里。北边山沟叫饮马坑北沟。

大杖子东化鱼沟老毛家也被孙永勤收拾过。

现在孙杖子村11个组，近900口人。孙杖子庄六七十户，两个组，360口人。

（2008年7月22日采访）

孙杖子现在孙姓占90%，四几年土地平分时，一户姓齐的落户在这儿，姓李的是四九年。

孙永勤在大杖子收拾过老毛家。

孙永勤第一个抄的是孙永彦，他家有枪。

孙杖子到蘑菇峪12公里。

蘑菇峪到关门岭8公里。

过去到喜峰口：孙杖子——大东峪——梓木林——潵河桥——喜峰口，其中孙杖子到大东峪10华里，大东峪到梓木林15华里。

孙永勤家遗址上长的是刺槐、柳树、栗子树。

孙杖子地形：

北面（从西到东）：大五道梁、小五道梁、西台子、西北沟子、后山。

东面：平顶山。

南面（从东到西）：石渣子梁、大洼、南沟、南锅头、南峪沟子、牛百叶、前山、鹰嘴、小冰沟。

西面：马架山。

回忆爷爷郝敬义

讲 述 者：郝连坤（4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政府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郝连坤（48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村民）：

10年前，由郝家庄改名郝家营，离乡政府3公里，离邢杖子1.5公里。

爷爷郝敬义大概1970年秋去世，71或72岁。我当时10岁（周岁）。

爷爷个头一米七五左右，长方脸，挺瘦的，留头，跟《神秘的大佛》中的葛存壮一样，前边没有，后边说背头不像背头。爷爷说过，过去有小辫也不长，“文革”中都让铰了。爷爷皮肤黑中带黄，走路挺快，跟孙永勤跑山练出来的。

说话很随和，尤其对小孩。困难时，割个柴禾，拿个镰刀，怕出危险，亲自告诉怎么拿，摔跟头怎么撇出去。

那会儿岁数大了，体格弱，不太参加集体干活。挎个粪筐，拾点粪，交到队上，挣工分。一天最多两毛钱。去世前，有点咳嗽。擅长八卦，拿手指头掐算，算出行啊，很少看见看风水，那时属封建迷信，不允许。孙永勤因为听说郝家庄有一个懂八卦、懂出行什么的，孙永勤慕名找的他。

爷爷说过在老梁上跟日本人打过仗。

说过在烧板子沟待过。

从烧板子沟到石洞子沟8里地。

老祖宗从山东搬过来，定居在郝家庄，到我是第九辈了，爷爷是第七代。

毛山，他不同意去，说榛柴忒小。

爷爷跟我说过，不同意上毛山。他知道一个是犯地名，一个是毛山只有点榛棵子。孙永勤不知听了谁的主意，就要上。后来爷爷几个藏在榛棵里出来了。他说，打起来后，打散了，他猫在榛柴棵子底下，大概猫了一天时间才出来。跟他一块出来的，最多没超过三人。回来躲了，估计也就躲在石洞子沟，那儿有表亲。石洞子沟分成沟里沟外两组，总共十多户，一般年轻的都搬出来了。

爷爷说，孙永勤为人豪爽，枪法挺准。他说，孙永勤上毛山，是遵化方面有人找去的。问我爷爷去遵化好不好，爷爷说不好，孙永勤还是硬去了。爷爷说还是在老梁一带打游击。

奶奶个子不高，一米六左右，孙杖子关家的，小脚，抽烟。

父亲叫郝士财，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东北。某战役中腿负伤，民政给定三等甲级残废。1978年春去世。

叔叔郝士亮，耳朵聋，住在大杖子乡敬老院。

郝连玉是郝士祥的儿子，也懂阴阳宅，书都给他孙子了。

抗日救国军在河口中伏经过

讲 述 者：陈永付（53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城墙峪村河口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陈永付（53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城墙峪村河口自然村村民）：

山叫黄石砬子，后山也属黄石砬子。原来河口村在后山山脚下，1979年左右搬到山坡上，现在100多口人。现在的梁岗原来与后山相连，1991年修建承栗公路时被切断。

我爷爷陈桂占活着时净念叨，还给孙永勤他们抬过担架，用门板。

日本人从清河口、八家过来，坐船过来。听老人念叨，好像是两船。过去没桥，孙永勤等想从岸上到孙杖子。

抗日救国军在山根白石头那儿被打，有的到石头跟前了。

日军在东山岭带河东砬头上埋伏着，用小钢炮在东山岭带梁头上，有两棵松树，当地叫平顶松，开炮打抗日救国军。河口村后山还埋伏着两挺机枪。

陈永会忆杨佩之、张如增

讲 述 者：陈永会（83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1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委会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陈永会（83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村民）：

张如增，非“儒”字。

杨佩之儿子，叫杨什么业，中间的字记不清了。

杨佩之是张如增请来的，原来在清河，从那儿过来。我跟他念了四年小学。三十多岁，大中个，面貌精神，寸头，庄稼衣裳，夏天穿白的，冬天穿青色（即黑色）、蓝色。教学有办法。一个老师教四五十个学生，叫复式班，全靠学长。学长叫孟广书，他从清河带过来。杨佩之做总指挥，长篇大论他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孟广书，《大学》、《中庸》，老师就靠他。上《论语》、下《论语》、《诗经》，那么厚一摞，能一背到底。

前面有一黑板，就在他跟前，记分。出去溜达，他也不说，记分。一星期一统计。我念四年书没挨过打。论分，有错误记上。有一花椒树板子，在炕上一坐，打手一百板，手都打出泡来。打屁股打十板。学生见他，跟耗子见猫似的。

在这儿教完了，回王宝石，全家都搬过去了。1943年来日本军，一烧房子，去王宝石还见到他。

张如增，我念书时是白胡子老头。张如增家是四面斗房子，前后是正房，两边厢房，西边是门洞子，外边是大道。门口用锁链子拴着俩大狗，看家狗，一般人不敢进院。

张如增出名是靠吃地租，好几个掌柜的收粮食。柳河口有地，三台山地也是他的。澈河桥有俩烧锅，俩门市。

张如增就死在家里，1945年前后，病死的。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挨斗时就死了。

大儿子叫张文弟，老二叫张文辉，老三死的早，媳妇生下一个儿子后他就死了，他媳妇被人叫做“三寡妇”。张如增活着时，三儿媳妇就已经是寡妇了。老大的孩子当了国民党。八路军来了，跑了以后就当了国民党，《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后就跑台湾了。老大大儿子叫张奎元。老二几个儿子都当八路军。大儿子叫张奎武，前几年来过张杖子，在保定。张春来是张如增干儿子。

张如兰死在北京。他媳妇在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时还挨过斗。他早就去北京了，始终没回来。

那时候趁买卖，有钱了，就置地，租给老百姓，吃租子。张如增就靠地租、买卖发财，越来越多。不享福，弄俩钱都让土匪给抢去了，是土财主。

张杖子13个自然村，1700口人，分布在15华里的山沟里，面积22.5平方公里。

南方南大梁，也叫黄土梁；西南马架山；正西是广东山；西北是月儿鞍；北山叫骆驼脖子。

过去黄花川是小河沟子，水少，不断，因为水土保持好。

从双山梁到河口得30里地。

双山梁上以菜树居多。

由公路至村部约二里地，村部至柏碴子十三四里。

马架沟是张杖子一个小组。

需笼：荆条编的，肚子大，口小，口上还编了一个漏斗似的东西。

下密：大坑和河边堆上石头，搁上树枝子，鱼往里钻。用渔网围住，把石头、树拣出去，把鱼拣上来。下密一次得十天半拉月。

孙中训忆孙永宗与孙永勤

讲 述 者：孙中训（80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1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中训（80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自然村村民）：

冬天真冷啊。

孙永宗比孙永勤大十来岁，孙永勤管他叫二哥。孙永宗多少富裕一点，说话有号召力。黑胡子，挂点恶相。脸上虽然挂恶相，但是心不恶。没听说孙永宗把会长给了孙永勤。

孙永宗的儿子16岁跟着孙永勤去了，他爹追了一回。孙永宗去前面找，他跑后面，孙永宗

去后面，他跑前面。那小伙子棒，有的兵犯错误，上级要是命令枪毙，他嘁吒咔嚓就把那个兵绑上。

没人敢姓孙啊，那时。

孙杖子庄被烧两回，孙永勤时被烧一回，“集家”时被烧一回。

当时来过匪，叫“大拨匪”，我们都跑宽甸去了。上宽甸一次，石湖沟一次。

小时候，黄花川也是干河套，发水时有水。过去河套整片整片长着黄花，叫“驴鸡巴花”。还不是现在吃的黄花菜，那花吃不得。

在过去，后山这树多着呢，杨树、杉树，杉树多。

小时候玩藏猫，几里地几里地的玩藏猫。抢殿，在粪堆上抢殿，谁给抻下去，就不是英雄。晚上吃完饭玩，一般十来个小孩。吃鹰，一个人抓着前面人的裤腰带，一个人要把鹰头摔倒了，就败了。夏天发水，也洗澡、捉鱼。

孙永勤在孙杖子念私塾，不是在张杖子或蘑菇峪。没做过买卖，那时就种地。

孙永勤不会武术，能闯，双手使枪。大男子主义，谁说不听，邪门不信。大嗓门，有勇无谋。跟媳妇感情好。

起伙会时都是火枪。

孙永勤母亲，孩子得风，嗓子长疙瘩，都会治。

灵狗子、土豹子、狼羔子那时都有。那时候冬天打猎，三四个人一拨。去人多，打着了，一劈就没了。孙永勤的枪法就是打猎练出来的。

那时去河口是走，有时骑毛驴。那时河沟子没水。

去喜峰口，那时是去河口坐船走。陆路可从南沟、大东沟到梓木林子，以后就是大路了。另外一条道是滦河沿，水路了。走水路100多里。

孙永勤一辈儿就是哥儿四个。“傻四”说不出话，是哑巴，也驴脸大挂的。老大孩子哥儿六个。老大孩子淘气玩，拿穷人取乐玩。老三孙文怀抗日抗到底，解放后让穷人活打死。

孙中贵介绍孙永勤的一些情况

讲 述 者：孙中贵（71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1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中贵（7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自然村村民，孙永勤二哥孙永连之孙）：

老大叫孙永彬，老二叫孙永连，老三孙永勤，老四叫“傻四”，没大名，下巴长一大瘤。

太爷也是傻子，腿有毛病，着凉，风湿病。太奶奶用五挑水熬草药。半缸水，用石头缸盖，给他治病。为他好，结果闷死了。

王宝石河北一干哥们在下板城被人圈在屋子里，杀了。被“满洲国”兵杀的。

那时山上不是羊（指野山羊）就是狍子。收完秋，没事上山打猎，可打到种地前。三月以后种地。我们北山有几个猎手，举手枪就响。使的是单子儿。

孙杖子庄那时也就30上户。

当时起伙会得三四年。

孙中亮介绍张如增的一些情况

讲 述 者：孙中亮（49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中亮（49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自然村村民）：

现在张杖子中学那地方是下瓦房，牛圈。家为上瓦房，在上面山根下。孙永勤灭后，传说后来日本人从张如增家牛圈里挖出32骡驮子钱来。后来学校拆围墙时，在石板上还看见一幅图，建筑图，实际上暗藏埋东西的标记。

孙永明是张如增的大当家的。孙永勤去，吃喝拉撒睡全由孙永明负责。

李昆峰忆宽甸、关门岭战斗（二）

讲 述 者：李昆峰（79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宽甸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昆峰（79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宽甸村村民）：

伪满追孙永勤是春天，那时草还没发芽，应是清明前。不是日本兵，是满洲兵。伪满从后道上打机枪，朝柏砬子打，孙永勤顺关门岭下去了。我父母跑外面去了，在炕沿上挡一炕桌子，自己猫炕根底下。父亲叫李友成。满洲兵进来说："小孩，别害怕，没事。"得打了十来分钟。没放炮，在关门岭也没放炮。

满洲兵穿黄衣裳，跟日本兵差不多，帽子没后边两块布片。

关门岭长城是明朝斩边修的，这边是一岔子。

五楼沟，在关门岭西边。

从宽甸到关门岭三里地。

从蘑菇峪到宽甸十六华里。

从蘑菇峪到关门岭十九华里。

王成国、王占富忆关门岭之战

讲 述 者：王成国（57虚岁）、王占富（85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关门岭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成国（57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关门岭村党支部书记）：

关门岭，三个自然村，118户，430口人。

关门岭长城从喜峰口、西城峪、漆棵岭、四楼沟过来，到五楼沟梁上就停了，戚继光修的。一架山上一个楼子，从东北往西南，数到五楼沟。楼都是六七十年代毁的，现在还有几块大条石，也杂草丛生了。

父亲王占久说，日本马队追到五楼沟前山道边，孙永勤他们上了五楼沟后山。他干儿子在山上叫阵："杂种操的，你们上哪儿追？"那边就说："杂种操的，你敢抬起头？"孙永勤干儿子原来趴着来的，立起来，一枪就给打死了。

王占富（85虚岁，蘑菇峪乡关门岭村村民）：

我当时十来岁，满洲队从上边下来，孙永勤在宽甸也有，关门岭也有，宽甸那边的就朝下跑。满洲队从二道河进去了，骑马，不是日本人，就是左近的人。孙永勤在头道楼。满洲队先进的二道河南沟，后面又从小西峪进去，上西大高尖。那狗操的，真出力啊，上西大高尖，你说得费啥样劲儿啊！后来他们跑到这里，关门岭这儿不有一个楼子吗，孙永勤他们顺五楼沟前山道的白石岔那儿上五楼沟。孙永勤他们把五楼沟后山点着，就烟走了。从四楼沟顺水峪那儿走了。

王玉良给带的道。

当时是春天，差不多到清明了，可能是旧历二月。

打了不大小会儿。那时没炮，没打炮，就打了几枪。一点多钟打的，当时都吃完中午饭了。

瞅着孙永勤他们就从宽甸下来了，到了岭头（指五楼沟前山道），就进五楼沟了。在四楼沟时，孙永勤一个跟班的死了。他必是望来着，被打死了。

当时村里人都跑张郎沟坝台下，山坡上有一棵杏树。

满洲队当时就在小西峪住了。



孙永勤部在李杖子南沟遇袭经过

讲 述 者：徐久强（84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3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李杖子村小十二岭自然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徐久强（84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李杖子村小十二岭自然村村民）：

当年九岁，在大石岭放羊。旧历二月儿，敌军，有日本官，从沟外进来。孙永勤他们在雪山住着，那天到这儿来，想住这儿，正好日军上来。村里有一徐成，怕在庄里打上，一拍大腿，一扬手，让他们往回卷。孙永勤兵开了三枪，打的信号，往回卷。日本人追上，孙永勤兵牺牲十来个。三个人在南沟打死，庄里人抬回来埋在柏砬沟。以后徐进林把坟起出来，在那儿盖的房，把坟埋在后面不远的砬根子了。

孙永勤从雪山过南沟想到李杖子。日本人从这儿上的西梁往南沟里打，孙永勤的兵都死在南沟里了。南沟是西高尖下的一个山沟，从沟口到山尖不过二里。打了半天，约不到九点到晌午。那天没下雪。

西高尖海拔比五指山矮一点。

孙永勤部尸首，村民抬回来一部分。后来在石灰窑上边有一棵大松树，发现一具骨头架子，因为是战场，猜测是孙部的人。

孙永勤来小十二岭次数可多了，一个劲儿在这儿住，这儿是老根据地。那时也就十多户，六七十人。号房子，住老百姓家。到哪儿都是号饭，不给饭钱。

大小十二岭住得一样多，山尖上住着比较安全。

大十二岭在小十二岭西边，相距三里。

雪山，原来叫西大洞，八路军开辟地区时改名雪山。

孙永勤在广东山

讲 述 者： 李秀花（82虚岁）

讲述时间： 2008年7月23日

采 访 者： 翟丽芳

采访地点： 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二道岭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 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李秀花（82虚岁，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二道岭子村村民）：

我19岁嫁到广东山。当时30来户，60多口人。现在30来户，120口人。

老爷子张坤友是孙永勤的二姑爷，没结婚，姑娘就没了。

听老爷子说，因为孙永勤在这儿驻防，日本人来这儿把房、粮食烧个精光。我来，连个被服都没见到过。

孙永勤来好儿回。日本人来，把30多口拿机枪都突突了。当时60多口人，突突一半，才剩一半，在庄后面杀的。张坤枝一家15口人，就剩3口。

孙永勤在广东、广西山交界地方一个石砬子跟日本人打过仗，把孙永勤手下的撂下不少人。现在坟都冲平了。

人家那是一个好革命，对老百姓不离儿。

孙永勤在透骨山击毙伪满军炮手经过

讲 述 者：郝文山（88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中兴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郝文山（88虚岁，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中兴村村民）：

孙永勤在鲶鱼坑北山窟窿后面往头里打，打的是满洲军。满洲军炮手正装炮，孙永勤一枪就打炮手胸膛上了。满洲军叫好："好的！好的！"把死的抬澈河桥了。鲶鱼坑北山当地一般叫透骨山。四十多年前，当时三四十岁，去山上割柴禾，还捡到一棵枪。枪托子都糟了，就剩枪筒子了，还有一粒子弹。上上油，子弹打响了。前些年，半壁山来收枪，把枪交了。

孙永勤在这儿就打过一次仗，就走了。

二月初三后晌到咱们这儿，二月初四满洲兵知道了，追上就开火。前末晌打的，兵是从澈河桥来的，日本子带队，就几个，满洲军多。

孙永勤在东山站着（方言，指住着）。

满洲军开炮，孙永勤就退了，向北去了。满洲军一炮，落到大十二岭去了。两地隔着十来里地。迫击炮。

孙永勤一个兵在砬洞子猫着，兵退了，爬到老莫家。老百姓给抬到雪山。枪插在站的地方。

那阵也就100多口，老莫家、老高家、郝家庄三个庄。这庄（指郝家庄）就几家子。

1956年入高级社，1957年中兴、雪山、长沟就分开了。

雪山，老辈子叫南天门，我们中兴过去叫大洞，八路军给改的名字。八路军轧生地区，到哪儿都改名。

中兴现16个组，287户，1030口人。

中兴距三道河约十三里。中兴十二组距透骨山二里。

吴从信、马林讲述孙部抓获日本俘虏地点

讲 述 者：吴从信（86虚岁）、马林（59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乡孤山子村、大厂村小石门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吴从信（86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乡孤山子村村民）：

记得是春天，在大厂村乱石沟抓的。离长城铁矿不远，紧挨着长城铁矿。

马林（59虚岁，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乡大厂村村民）：

听父亲说，在乱石沟门。张林把大靴子穿了。



马志谈马保德

讲 述 者：马志（82虚岁）

讲述时间：2008年7月25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马志（82虚岁，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村民）：

马保德打完毛山才回来，在城西被枪毙，具体地方不清。

马保德行三，大哥马保祥，二哥马保林。马保林也参加民众了。

马德禄是财主，横着呢。他和马保德两个人还好得了？一个富的，一个穷的，他恨不得消灭马保德呢。

东双城子距县城18华里。

程水星先生回复关于孔县长问题

回 复 人：程水星（57虚岁）

回复时间：2008年秋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程水星（57虚岁，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为孔县长一事，我问了原县检察院文书客彩章（客，音qiè），他查过所有伪档，说未见孔县长名字。

张福荣忆毛山战斗

讲 述 者：张福荣（83虚岁）

讲述时间：2009年11月27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高家峪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张福荣老人　2009年11月

张福荣（83虚岁，原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高家峪村党支部书记）：

天刚一亮，日本兵从高家峪过。步行，过一个多钟头。

日本兵从九区，有山，矬，从那边上来。打炮打半个多小时。

民众从毛山想往北走，在九虎岭一卡，没走了，人死多了。东边也上来日本兵了，把整个民众都围毛山上了。北边一卡，动不了了。

日军打炮和步兵步行同时。

打完炮，出松棚营，往杏峪、庄客追去了。

那时候民众都是大刀，有枪也是单子儿，甚至火枪。

民众在北边柴庄子站过。看见烙饼，没盐。还吃过，我小，也喜欢小孩呗。给我一块来着。饼里不搁盐，说是挂花后伤口容易好。

日军从遵化那边过来，民众在柴庄子，当时地图上没有，把柴庄子给漏下了，在那儿烙饼，给我吃。离五里地（指柴庄子距高家峪五里，张福荣老人在柴庄子出生），那时在哪儿生人，在哪儿住。民众子是从毛山上跑下来的。先跑下来的，跑一部分。民众子往西北跑了，不知打死没有。在柴庄子的，有四五十人，都是大刀，跟大西瓜刀似的，有70公分长，在腰下斜挎着。死人死多了，把毛山都给打着了。

柴庄子那时13户人家，40来口人。

闹治安军时搬到高家峪。高家峪村包括高家峪、穆家峪、柴庄子、黄花峪四个自然村。

民众子不害巴老百姓，打土匪。有一部分土匪，在洪山口那边。

日军炮阵地：一个是九泉山，一个是松棚营东山。



有年轻的去看，说人死成堆。

民众在柴庄子吃烙饼，一说走，把烙饼都扔了，不顾得吃，往西跑了。大概往片石峪方向跑了，十一点左右。从毛山上跑下来的一拨十点左右到柴庄子，烙饼很快。把面都扔了，没命似的跑。当时九泉山上还有日本兵，炮不打了。

九泉山：围绕这山有九个泉眼。冬天咋冷也不冻冰。下大雪，落上，化了。

九泉山上的都是小炮，大炮上不去。

打毛山时，上岁数的谁也不敢出去，都在屋里猫着。

父亲他们哥们多，一分家，没房子，地又很少，到柴庄子地主家租地。当时高家峪还租着三亩地。柴庄子租着四亩多地。在柴庄子住，高家峪干活。

二道九泉山山顶打炮，听大大爷张宝义说的，他当时在高家峪住。

头道、二道、三道九泉山。

从二道九泉山顶至高家峪三里。

从高家峪到松棚营四里。

从高家峪到小厂乡六里。

孙中印谈三爷孙永勤

讲 述 者：孙中印（56虚岁）

讲述时间：2009年11月29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遵化市新店子镇康各庄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中印（56虚岁，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康各庄村村民，孙永勤大哥孙永彬之孙）：

爷爷是孙永彬，有六个儿子。

老大：傻子，没名字。

老二：孙文志。

老三：孙文怀，参加过孙永勤队伍。抗日时化名季三，在澈河一带工作。1947年实行《中

国土地法大纲》时，被民众打死。

老四：孙文博。

老五：孙文贺。

老六：孙文广。

我父亲是孙文贺，排行老五，是孙永勤的勤务兵。

打毛山时，爷爷没让父亲去。父亲在三爷（指孙永勤）覆灭后，被抓到蘑菇峪。第二天要被枪毙，听说是宋哲元换防，才活了。1948年，父亲担着挑儿，要饭要到康各庄。

推倒大清时，三爷大概是革命派那边。一家出一个人去，谁不去，就把房子烧了。父亲那时还小，拽着驴尾巴去。

孙永勤家，要我说没有100亩地，连50亩都没有。那时候都说种几天地，没亩数。都是山坡子地，没法丈量亩数。

孙永勤就是矬子里拔将军，别人吃两顿，他能吃三顿。

父亲说，日军围孙永勤，进屋，发现炕上一个大狗。

听说三爷是被韦庄一个大财主勾结遵化汉奸给骗到遵化的，说给换季。

父亲经常跑澈河桥做买卖。那时候，就澈河桥有集。澈河桥离孙杖子80里左右。

我小学三年级就给父亲写检查。父亲挨欺负，太受气了，太寒心了，一想起都要掉泪。

父亲1915年生人，1987年去世，73岁。在孙杖子老家时，总共两层草房，打豁子种两天地，有一拨子羊，找人放。1947年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被划为富农。我们搬到遵化后，和这边富农一比，觉得太冤枉了。



孙永勤部在大寨被攻击经过

讲 述 者：徐绍庆（84虚岁）

讲述时间：2009年11月30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遵化市东旧寨镇大寨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徐绍庆（84虚岁，河北省遵化市东旧寨镇大寨村村民）：

孙永勤从平山铺过来，在南山有个人家[1]，在那儿歇着。日本兵从西边追过来，孙永勤他们从南山跑下来，跑毛山去了。

中午过来，让村民做饭送上去。送饭的没到，日本兵就开枪打上了。没吃饭就跑了。过去之后，听说是孙永勤的队伍。

孙永勤他们也不能上华山去，华山是个孤山，就那么一小片，跑都没处跑。

孙永勤队伍那时也是不中，连岗都没有。起民众时，你也去我也去，军事上还是不中。

郭叔文介绍康永贵情况

讲 述 者：郭叔文（51虚岁）

讲述时间：2009年12月2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郭叔文（51虚岁，河北省兴隆县挂兰峪镇文化站站长）：

康永贵，1896年生人，出生于遵化城北乔家洼，1930年搬到挂兰峪大鹿圈村的白石峪。

[1] 据大寨村一位妇女介绍，南山人家即现在的李青家，当时约四五口人。

1933年3月长城抗战时，在二十九军服役，撤退时离开，回到白石峪。在挂兰峪一带拉出100多人，1934年种地时，投奔孙永勤，任第九大队长。主要活动于半壁山、三道河、孤山子一带，屡建战功。1935年5月，毛山战斗突围，又回到白石峪。不久，听说杨二是条好汉，立即投奔了杨二，任三团团长。1935年7月1日，攻打日伪汤泉据点。1938年7月，康永贵、杨二救过八路军游击大队长李维廉，战术是用稻草人将敌人子弹消耗光，然后冲上去。共歼灭日伪2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多支、子弹10箱、战马24匹。1938年8月27日，攻打倒流水金矿（今属挂兰峪镇）时牺牲。

孙中印关于门子哨战斗的E-mail

发 件 人：孙中印（56虚岁）

发送时间：2009年12月2日

收 件 人：翟丽芳

我的父亲孙文贺，1917年生人，可是已不在人世了，早在73岁那年去世了。在“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摧残，也受到当时社会的歧视和不合理的对待，很是令人心酸。在上世纪30年代时，父亲曾为民族请愿到承德聚会，为推倒旧社会体制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父亲当年同孙永勤将军打过日军。也就是在现在的孙杖子滦河沿去大杖子中间的叫门子哨二道石湖的地方，那个景点至今还在。我的父亲和孙永勤将军曾在那里打击过日军。据我父亲说，那时孙永勤队伍中人数还不多，未曾壮大呢。因当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容得一两人过来，我的父亲孙文贺和孙永勤将军曾在那里用枪扣死日军18人，使得日军不敢再上来，孙永勤将军和我的父亲才罢休。这是真实情况，希望我提供的事情对你们会有一点帮助。

孙中印写



孙中彦再谈孙杖子地理及孙永勤情况

讲 述 者：孙中彦（61虚岁）

讲述时间：2009年12月4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孙中彦（61虚岁，原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办公室主任、乡土地站站长）：

孙杖子有9个自然村，11个生产队，900多人。

9个自然村分别是：

孙杖子庄（1、2队）、南沟（3队）、坝尺沟（4队）、大盘道沟（5队）、关家沟（6队）、田家庄（7队）、王家庄（过去叫老王家，8队）、小五道梁（也叫小梁后，9队）、大五道梁（也叫大北梁，10队、11队）。

小五道梁、大五道梁，也被称作北山。

孙永勤家遗址属2队地。

孙杖子现在总共不超过1500亩地。整个孙杖子庄不超过200亩地。

那时候孙杖子大部分地都是张如增的。孙永勤家要是连山林算上，就是不长庄稼只长树的地方都算上，可能有100多亩。孙永勤家只能说够吃，有余粮，有余钱，比别人稍微富点。

孙永勤爷爷叫孙福巨。孙永勤父亲辈哥儿仨：孙进坤、孙进山、孙进川，孙永勤父亲是孙进山，排老二。这是2008年冬，跟南沟孙中亚问的。孙中亚父亲叫孙文香，有文化。关于孙永勤爷爷、父亲的情况，以去年向孙中亚核实的为准。

听爷爷孙永采说，孙永勤在下板城起义。起义得有枪，孙永勤在当时磕头的兄弟里排老大，说先从自己开始。他把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了，然后把孙永彦家的枪压了出来，又去大杖子把老毛家的枪收了。

孙文阁是我二大爷。我父亲叫孙文云，是杨佩之的学生。

杨佩之会日语。从毛山回来后，对我父亲说，他让日军找去认孙永勤。找了一个像孙永勤的，说这就是孙永勤。把他放了。

孙永宗可能和孙永勤一个太爷。孙永宗之子叫孙文光，跟着孙永勤干过。

听王善文说，张如增家祖坟是勒马横弓，坟在上瓦房上面的台上，阴宅好，所以才发的家。

王善文是老私塾先生，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人。16岁蹬凳子教书，会看阴阳宅、相面、袖口褪（tùn）金，能使算盘开立方。

王善文父亲中过秀才，教不了自己孩子。后来是承德县柳树底下赵秀才教的。

前山尖：王善文说，孙杖子没水，前山尖像状元旗，出孙永勤和这山有关。

孙杖子北面最高的山叫五梁西岔后堵。

平顶山：铁锤发现于40年代，不是四十年前。

判官肚子、关老爷脸、小狗腿子，这三个地方最险，只能在河套沿走。

判官肚子：山鼓出来一块。幸好上边长着点荆树条子，只能上边把着荆树条子，一大步迈过去。迈不好，就掉滦河里。判官肚子就在河口北边一里地。

关老爷脸：砬子直上直下，形状像关公的脸。地方在小牤牛哨。

小狗腿子：砬子上大下小，样子像狗腿。在小牤牛哨北边。

1947年土改时，孙永勤家被划为富农。“文革”复议时，雷永兰、孙文伶被定为“地主分子”。孙文孝因年龄不到，被定为“坏分子”。

老梁孙部突围处地理

讲 述 者：许振刚（65虚岁）

讲述时间：2009年12月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许振刚（65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村民）：

民众搭木头突围的地方叫大旱石湖。原来上面是平的，水大时有水，底下深着呢，得有15米深，人下不去。想要下去怎么办？旁边原来有三棵柏树，把木头搭在柏树根上，脚踩着木头，人贴着砬子，扒着崖壁从旁边下去。

承德县南甲山林场1974年、1975年修林场运木材的路，把大旱石湖给崩了。



大旱石湖离小南沟五里，在小南沟的南方，离大彭杖子十里左右。

孙永勤走的那条路叫空山沟，离小南沟大洞三里多，离小南沟四里。

王贺林介绍老梁概况

讲 述 者：王贺林（52虚岁）

讲述时间：2009年12月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王贺林（52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党支部书记）：

老梁共有四个自然村，三个村民组，每个组相距二里。

梁西、梁东为1组，梁西老吴家居多，梁东王姓多。

东沟为2组，主要是老王家、老李家。

南头，也叫小南沟，为3组，老王家少，老许家多。

老梁有人家93户，人口288口，现在常住人口三分之一不到。山林6500多亩，耕地300亩。

从老梁经路通沟到下板城的行走路线是：老梁——老梁沟门——北鄌——鹿通沟——下板城。

棺材沟：本来叫关家沟，早先住着老关家。在老梁村东北，离2组十里。

榆树沟：在2组正东三里地。

“鹿通沟”名字的由来

讲 述 者：赵文忠（63虚岁）、刘胜新（42虚岁）

讲述时间：2009年12月8日

采 访 者：翟丽芳

采访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

原件保存地点：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处

赵文忠（63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自然村村民，赵林之孙）：

从赵家庄到老梁小南沟30多华里，到下板城15华里，到杨树洼2里地。

杨树洼在赵家庄西南。

刘胜新（42虚岁，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副村长）：

路通沟过去叫鹿通沟，说康熙打猎时，在这儿发现一只鹿，过去了，叫鹿通沟。还有一种说法叫鹿虎通沟，意思和鹿通沟的来历基本相同。

路通沟现包括8个自然村，14个村民组。8个自然村分别是：赵家庄、崔家庄、任家庄、杨树洼、柏柴沟、尖山沟、彭家沟、沟门。

赵家庄在路通沟东南方向，是路通沟村第八村民组，有30多户，133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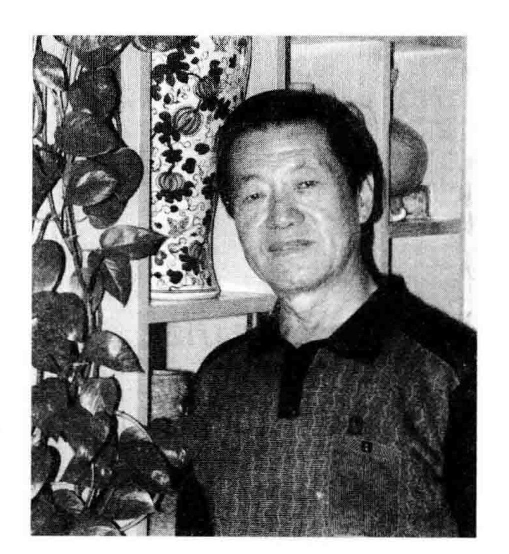
杨树洼为路通沟第五村民组，共十四五户，70余口。现在仅剩一户，老两口。



关于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孙永勤烈士塑像的情况回忆

作　　者：张书德（73虚岁）
写作时间：2010年2月

孙永勤烈士塑像的情况是这样的：时间大约在1978年，这一年我馆正在筹办“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展览——“部分烈士事迹资料陈列”。在一次筹备会上，我提出要为孙永勤烈士造像的问题。一经提出，立刻引起馆领导的兴趣。因为历次展览内容都比较单调，有了塑像，不但增加了内容，肯定也会增加参谒人员的兴趣，提高展览效果。但是，在当时，承德市没有一个人能搞出雕塑。找谁去呢？与会者都有些为难。当时我提出这事由我来办，我说我是天津美术学院毕业的，教我素描的老师是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的高才生，我去求他不会有问题。此事很快得到市民政局的支持，让我主办这件事。



张书德先生近照　（摄影：张鸿元）

我到天津后，直接找到了我老师吴纯斌（吴纯斌，原天津美院师范系美术教师，已退休，现住在天津美院家属院。前年我回学校参加母校百年校庆时，还见过面）。经和他说明情况后，他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下来。他说：“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一定帮你这个忙。”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教学刚步入正规，老师没有更多的事情，搞这样的雕塑机会也不多，搞出来后可以长期展出，不像教学雕塑，完成后就砸了，所以他也很愿意去做。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时间不长，吴老师派他的学生李军来承，研究制作的问题（李军也已经在该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为了熟悉情况，我和他一起去兴隆县，找到了孙永勤的老伴雷永兰女士。她说，在唐山工作的三儿子长得最像他爸爸。我们两个就直接到了唐山建筑陶瓷厂，通过组织，找到了他。为了方便工作，我们就住在该厂的招待所，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做创作前的准备工作。李军做了一个泥塑头部的速写，我画了一张素描头像。三天后，我和李军在唐山分手，各回单位。三个月后，吴老师来信说，塑像已经做好。我便带车去天津，将其运回。

在这过程中，馆里的布展工作也已完成。在开馆前，我馆将孙永勤烈士的老伴雷永兰女士及其子女请到馆内，对整个展览，特别是孙永勤的塑像征求她的意见。当老太太看过以后，说："很好，很像，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这座塑像从此定稿，直到现在。

回忆人：张书德，现年72岁，副研究馆员。1964年在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1996年退休。其中，自1982年至1996年曾任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书记等职。

平反简介

作　者：孙翠芝

写作时间：2010年4月2日

孙翠芝（40虚岁，孙永勤次子孙文孝的三女儿）：

当时我父母在"文革"期间每天都被批斗，说是反动派。在孙杖子已经无法生活了，1978年从孙杖子搬到挂兰峪公社西安大队。我父亲为了讨个说法，就是平反吧，当时政府必须要有力的证据，可去了很多的地方。当时都没人理我父亲。北京、承德来回地跑，大概找了一年多。就在我父亲心灰意冷的时候，在承德市遇到了陆专员，现在叫市长，那时我的父亲就像遇到了救星一样。陆专员叫陆生，是陆专员告诉的我父亲，去找李运昌，可以由他来作证。最后我父亲多方打听，才找到了知道我爷爷情况的李运昌。那会儿，李运昌好像是哪里的司令员。由他作证，我父亲才得以昭雪平反。平反之后，还为我们转了非农业。那时陆专员可帮了我父亲的大忙了。



为孙永勤落实政策的一点感受

作　　者：陆生（74虚岁）
写作时间：2010年5月10日


20世纪80年代初，陆生先生任承德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时工作照

中共中央把孙永勤列为中国的抗日民族英雄，可以说其抗日事迹非同一般，在中国抗战史上功不可没，功劳不小。

孙永勤是兴隆县孙杖子人，那里是兴隆、迁西、宽城三个县交界之处，山高林密，川地十分狭窄，非常适宜游击战。孙杖子距我家兴隆半壁山只有不足百里路程，我家潵河与孙永勤家黄花川一同汇入滦河。可以想象，一个小山沟出了孙永勤这么一个大英雄，就不用提我有多么高兴了。按旧时说法，那里分明是出了一个大“状元”。

小时候，我常听父辈讲孙永勤杀富济贫的故事。孙永勤专要富人的粮食及钱财，除了自己队伍吃用外，全部分给穷苦百姓，大得民心。对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来说，对孙永勤从心眼里敬佩、敬重和敬仰。在劳苦大众对他的仰慕之中，我也长大成人了，而且踏着他开拓的道路，走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当时，中共承德地委和承德地区行署对孙永勤落实政策工作十分重视。地委、行署分工让我做好这件事，我欣然同意。理由一，孙永勤是我们的先辈，不能坐视其蒙受那么长时间的羞辱——什么“土匪”、“强盗”、“抢劫”等一大堆罪名。说实话，孙永勤出身一个大户人家，是个有钱的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为了安全，家里养着护院人员。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愁吃，不愁喝，他犯得着去打砸抢吗？犯不着。只是他有觉悟，他是先知先觉者，他是为了抗击日寇，他完全是为了民族利益，在民族危亡之际，才冒着生命危险，拉起了杆子。理由二，我是兴隆人，是兴隆的山沟人，兴隆的山沟里出了这么一个顶天立地、视死如归的英雄，而我能有幸参与为其正名，将其由一个反革命者正名为一个革命者，我感到自豪。理由三，落实政策，是我的分内工作，为孙永勤及其家属澄清历史上的不白之冤，是我应做的事情。对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蜚语，如“一夜之间，一个反革命及其家属变成一个革命者及革命烈士家属，而且上了毛泽东选集”等，要顶住，而且讲清楚，解释明白：正因为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从民族兴旺发达的全局出发，才对其平反。理由四是，在落实政策中，我只做

了我应做的工作，征求其家属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对其有限的不出框外的要求，一一抓落实。他老伴要求将其失散多年的儿子找到，并为其农转非，安排工作；她希望把家搬到县城，在县城给盖几间房子。这一切，经过和兴隆县领导同志研究，大家一致表示，这是我们应该办的，很快得到了落实。为此，他一家人始终不忘党和政府。

我们总觉得对孙永勤同志的革命精神总结得不够，宣传的高度也不够，范围不广，力度不大，所以，发扬孙永勤同志革命精神也就无法到位了。

陆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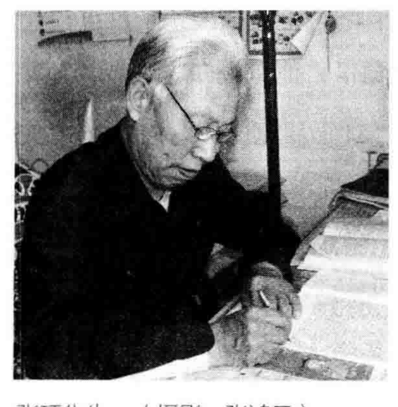
2010年5月10日

（作者介绍：陆生，1937年出生，1954年参加工作，1983年任中共承德地委委员、承德地区行政公署常务副专员。1991年任河北省审计厅厅长。1998年任河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2003年退休。）

关于为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烈士遗属落实烈属待遇问题的情况说明

作　者：张环（74虚岁）

写作时间：2010年5月20日



张环先生　（摄影：张鸿元）

孙永勤烈士是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的主要烈士。一方面他是1935年《八一宣言》点名的几位民族英雄之一；另一方面他又是承德人，为家乡而战，为家乡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1974年《雷锋事迹展览》闭馆之后，纪念馆准备举办烈士事迹展览。关于孙永勤烈士的英雄事迹馆里知之甚少，只是在兴隆县县志上有几百字的文字介绍。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烈士的英雄业绩，以褒扬先烈，激励后人，大约在1974~1975年间，我和当时馆里的美工张书德同志前往孙永勤的家乡——兴隆县孙杖子进行采访。一直到我们去的时候，那里由于交通不便，



显得十分闭塞。去孙杖子，有一段十分险峻的山路——判官肚子。这段路的一侧是滔滔的滦河水，另一侧是陡立的峭壁。由于脚下只有不足半米宽的羊肠小道，途经这里的人双手只好小心翼翼地扳扶在石壁上，腹部紧贴石壁，横向挪动脚步，慢慢走过。这里真是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重地，难怪当年日本鬼子几次欲图进山消灭抗日救国军，均无功而返。

当我们到孙永勤烈士家的时候，烈士的夫人还健在。家里只有她和大儿子相依为命，二儿子逃荒去了黑龙江，三儿子在唐山一家陶瓷厂当工人。当我见到这个家的时候，令我感到愕然，家徒四壁、灰暗无光的的房屋，让我目不忍睹。通过和烈士的家人座谈，更让我意想不到，孙永勤的遗孀按“富农分子”对待，其大儿子带着“富农分子”的帽子。据家人介绍，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原是抗日救国军的一名战士，因逃跑，被抓回后，孙永勤要枪毙他，所以现在有意报复他们一家。对于此种说法，当时我们无从辨其真伪，但有点不难识别，那就是《土地法大纲》规定，计算剥削量的界定时间是1944到1946年。而据家人和当地村民介绍，孙永勤于1935年牺牲后，他的夫人为躲避日寇的追杀，带领几个孩子四处躲藏，以乞讨为生，直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因此，给其一家划定富农成分显然是错误的。

回到单位，在征得领导的同意后，我们直接向承德地区民政局写一报告，全面真实地反映孙永勤烈士一家的境况，并提出我们的意见。地区民政局十分重视，责成兴隆县负责落实。至此，民族英雄孙永勤烈士的家属，迟来30余年的烈属待遇终于得以落实。

张环（当时烈士纪念馆资料员）

2010年5月20日

（作者介绍：张环，1955年参加工作，1960年到承德市民政局，1972年到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其中1980至1982年在北京编撰冀热辽革命斗争史。1984年回承德市民政局，任优抚科科长，1997年退休。）

革命烈士证明书

抄 录 者：孙翠芝

抄录时间：2010年5月31日

原件保存于孙永勤次子家中

孙翠芝（40虚岁，孙永勤次子孙文孝的三女儿）：

（正文）

革命烈士证明书

孙永勤同志民族英雄在遵化县茅山〔毛山〕与日作战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左侧文字）

字第00566号

姓　名　孙永勤

性　别　男

出生时间　一八九五年

籍　贯　兴隆孙杖子公社孙杖子大队

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　抗日救国军军长

参加革命时间　一九三三年入党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于一九四四年，在遵化县茅山〔毛山〕与日作战牺牲

批准机关时间　承德地区民政局于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七日批准

填发机关盖章时间　兴隆县民政局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签发

持证人姓名称谓及住址　雷永兰居于孙杖子公社孙杖子大队

抚恤金额　应发抚恤金

备　注　民1981年3月17日

二、图书、报刊文章



天津《大公报》关于"剿灭"抗日救国军的报道

中华民国24年5月19日　（第十版）

义勇军一千余人开抵迁安

曾与日军一度接触

【唐山通信】　据迁安县政府电：十六日，迁安县属撒河桥〔澈河桥〕北喜峰口外，突由热河开到义勇军一千三百人，号称抗×第一军，首领为孙有琴〔孙永勤〕、孙黄桂（四川人）。所部非常整齐，枪支齐全，且有具双枪者。现驻于深山中，夜出昼伏，并出布告安民，且有宣传队向人民演说，称决不骚扰乡民，所有粮食向由自备。二日来确未向民间索食，只于十六日夜将富户李之桂等请往，借款二千元。十六日晚曾与日军接触，战约四小时，义军即避往山中。日军未敢穷追，用机侦视，亦无结果。闻日军死十八人、伤二十六人云。（十七日）

中华民国24年5月21日　（第四版）

遵化匪首王彦如彼〔被〕擒解津

【平讯】　窜扰遵化之匪首王彦如，经张庆余、周毓英两部兜剿，率残部窜往小寨，复被两部包围。王匪卒于前日被擒，当即解往遵化县府，旋由县府派员解往天津五十一军部讯办。遵化从此除一巨患云。

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　（第三版）

蒋昨由昆明飞贵阳

滇黔肃清军事集中川省

蒋特奖会理守城之刘旅

【昆明二十一日中央社电】　蒋委员长二十一日晨十一时由行辕起节，龙主席陪同，乘车赴龙宅午餐，一时同赴乌家壩机场。各省委厅长、省指委高级军事长官、各机关长官、新闻记者等，上午十时即赴机场伫候。各校男女学生，九时即往沿路两旁列队恭送。一时许，蒋委员长及龙主席车到，各官员即恭迎入彩亭休息。各国领事亦相继赶到，谒蒋，甚为欢洽。三时半，往贵阳之容克机始返，万众欢送声中，蒋偕各随来人员遂乘此容克机渐渐离开昆明，向贵阳飞去。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中委吴稚晖、陈布雷，二十一日下午一时乘滇越铁路电轮车赴个旧，参观锡矿山。

【中央社昆明二十一日电】 滇黔两省赤匪完全肃清，两省境内已无匪踪，残匪向会理以北川西方面逃窜。蒋委员长二十一日由昆明飞四川督剿残匪，昆明民众与龙主席以下党政军各界人员夹道欢送，甚为热烈。

【重庆二十一日下午八时发专电】 杨森二十日由宜宾赴嘉定，所部分两路西进。

【重庆二十一日下午九时发专电】 六路军进攻睢水关前方之祈福山，由小道进至下横梁。

【中央社重庆二十一日电】 军息：（一）我六路军进攻祈福山，路甚歧远，且无路可通。近询得一小道可达观音梁左后方，遂于申刻占领上横梁。上横梁及观音梁形势最险，刻正乘势猛攻中。（二）我张于两旅进攻千佛山墩上之匪，经过鱼洞口横梁子。该地有匪约三百余，与我遭遇。激战一小时许，将该地确实占领，该匪肃清。是役计毙匪六名，指导员一名，伤者甚重，并获得米包、草鞋、军毯等件。

【中央社汉口二十一日电】 朱毛残匪窜围会理，我二十四军刘元璋旅长督队固守，受伤不退，卒将残匪击溃。蒋委员长特电令嘉奖犒赏，并电各军事机关知照。原电如下：（衔略）朱毛股匪自九日以来窜围会理，我二十四军刘元璋旅据城固守，部署周密。匪果不逞，乃昼伏夜攻，挖掘地道。十四、十五两日夜，以火药轰炸城垣，毁坏多处。我刘旅长督队激战，与匪短兵相接，伤亡枕藉。我官兵奋勇冲杀，前仆后继，刘旅长头部受伤，不稍却顾，卒将悍匪击退，抢筑城墙，转危为安，保全城池。刘旅长元璋指挥有方，受伤不退，尤堪矜式，着记大功一次，晋级中将。全旅官兵忠勇奋发，拼命苦战，誓死固守，将匪击退，予匪以重大之损伤，诚足为我剿匪军之模范，着即传令嘉奖，并发该旅团长疗伤费、抚恤费共一万元。着刘总指挥自乾将此次特别出力官兵查报，由行营查核条例，从优叙奖。特电知照，即希通令所属，一体知照。中正。十八日亥。侍参滇。印。

何应钦昨在太原

举行阅兵式

阎锡山徐永昌参加

【太原二十一日下午九时发专电】 何应钦二十一日晨在大校场举行阅兵式，参加官兵五六千人，颇严肃整齐，阎锡山、徐永昌等均着戎装参加。何乘马阅兵毕，即登台宣读蒋委员长之训词，本人并有训话，勉励士兵。并市各界定二十二日晨假中山公园举行迎何大会，何俟与阎将清剿陕北共匪办法商妥后，即离并返平。主持陕北剿匪之平军分会参谋团主任毛侃二十一日抵并谒何，报告前方情形。



日军入遵化

扬言追剿孙永勤

【东京二十一日电】　据关东军司令部本日报告，为平定孙永勤部计，被迫派日军一支队入华北非武装地带。该日军一俟孙部平定，即撤回热河。

【北平二十一日新联电】　据当地情报，在遵化附近被剿逃走之孙永勤义勇军，二十日晨已由热河警备队八木原旅团追击，进入关内，其一部已入遵化。

【电闻社遵化二十日电话】　日军用汽车二十余辆，载兵二百余名，携有钢炮机枪多架，于二十日由撒河桥〔澈河桥〕开抵遵化。下午二时半由城内出发，与盘踞城东十五里小寨、般若院一带之孙永勤匪部发生接触，炮火极烈。迄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双方仍在相持中。遵化城门，二十起竟日关闭。

【平讯】　日方以遵化股匪前曾窜扰口外，势甚猖獗，即派队截剿，匪复窜入口内。日关东军方面前曾电日使馆武官高桥访平市军事当局，表示拟派队追剿。高桥即于前日访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商谈此事。我方以遵化方面已有张庆余、周毓英两部警队及民团并力堵剿，匪患当可肃清，表示毋庸日军代劳，以免引起人心不安。蓟密区行署督察专员殷汝耕前晚返平后，当晚即谒鲍文樾，有所商谈。殷氏复于昨晨十时赴日使馆访晤高桥，商谈一切。闻高桥已将平方之意电关东军报告，此项问题即可解决。闻鲍氏亦已致电太原，向何委员长应钦报告。

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　（第三版）

蒋委员长昨飞抵重庆

江油解围中壩克复

朱毛一部自礼州北窜

（内容略）

太原各界昨开迎何大会

何讲“青年与国家”

【太原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发专电】　各界二十二日晨假中山公园大自省堂召开欢迎何应钦大会，赵戴文、徐永昌等各军政长官均出席，参加团体学校机关等代表二千五百余人，情况异常热烈。大会由徐永昌主席。徐讲欢迎意义后，何先述“新生活真谛”，次讲“青年与国家”。谓吾国危难已达极点，多数民族因智识甚低，对国事似乎无关痛痒，而有智识之一部分，不流入盲目的悲观论，即流入盲目的乐观论。乐观论者，觉中国不会亡国而不努力。悲观论者，认中国毫无办法而不努力。此种现象为使国家日益危弱之一大原因，必须自己反省，始

能改正。至青年为社会中坚，负有复兴民族国家之责，应格外兴奋，特别努力，并须：①应具有强度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铲除自私自利、苟且偷安心理。②应当在公共组织中去锻炼自己，使全国国民从一盘散沙旧情况恶情况下变为一个有机体的组织。③应该努力学习卫护国家学术的技能，始克有济。④应该有竞争心及名誉心，国家始能发达强盛。如全国之人，皆能注意此数点，而切实力行，国家民族前途有莫大希望。散会后，何赴绥署，应各界公宴。

【太原二十二日下午九时发专电】 何应钦二十二日午应各界公宴后，下午三时至五时与阎锡山长谈，对清剿陕北共匪，已商有具体办法。五时何赴兰村游览。

【北平通信】 平方接太原电讯称，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在晋事毕，定今日（二十三日）启程返平云。

孙永勤窜迁安

我警队民团追剿中

【北平通信】 关系方面消息：盘踞遵化小寨子、般若院之孙永勤部，经我警队、民团追剿，前晚已窜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皇阁村、马甸子地方，仍由警团围剿中。据殷汝耕氏语记者，遵化县东十五里大小寨地方之会匪孙永勤股，经特警队长张庆余派两个中队驰往迎堵，于前日下午二时开始接触，激战甚烈。至下午六时许，该股不支，向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地方皇阁村、马甸等地溃窜。该方面团队早有戒备，业已形成夹攻局势云。

（第四版）

日积极移民满州［洲］

陆军拓务两省定十五年计划

拟移民十万户五十万人

将在满州［洲］设大移民公司

（内容略）

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　（第四版）

何应钦返平

昨晨离太原沿途未停

【北平电话】 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于昨晨专车离并于中午至石家庄，即转平汉路北上。晚八时过保定，夜十二时抵平。商震、王树常、鲍文樾、关麟徵、邵文凯等及军分会组长以上职员百余人均至车站欢迎，何下车后与欢迎人员略事寒暄，即返居仁堂休息。



【太原二十三日下午八时发专电】　何应钦连日与阎锡山对清剿陕北共匪已商有完密办法。何二十三日晨偕刘冀飞并全体随员离并返平，阎与徐永昌亲赴站欢送，各军政要人、各界代表赴站欢送者达千人。

中日负责人员

昨商战区问题

殷陶昨日到津谒于请示

魏鉴谈特警到遵化接防

仪我称将协助取缔浪人

【本市消息】　滦榆、冀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殷汝耕及日使馆武官高桥、榆关日特务机关长仪我现已先后抵津，与此间省府及华北日驻军司令部协商。昨晨陶、殷赴省府谒于主席，报告特警换防经过，并对遵化事件有所请示。下午仪我特赴省府谒于，陶亦在座，对战区一般问题交换意见，并无具体结果。据省府秘书长魏鉴对记者宣称，孙永勤部自抵遵化后，我方特警已抵遵化南部追剿，该孙部已窜往迁安。我方特警已全部抵达遵化接防，事态即告段落云。又日特务机关长仪我抵津，昨与高桥及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会谈。记者昨于仪我谒于主席后晤之于旅次，据谈，余此次来津，系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及贵国省政府对战区一般事项取得联络，并非仅讨论遵化事件。今日会商时，对于东陵交还贵国问题未曾谈及，尚有若干波折待决也。关于滦东昌黎一带浪人贩运毒品及一切非法事件，日方自当协助取缔，顷已由贵国当局与驻津日总领馆商定随时查缉。已有一批犯人于日前解津，由领馆惩办。贵国限制白银出口事，余等愿予赞助。在榆关实行协同查缉后，情势已好转，现私运者颇少，余定明日（即今日）返榆云。又热河日军参议小田昨由平来津公干云。

【北平电话】赴津出席中日会议之日武官高桥，昨晚十一时由津乘车返平。

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　（第四版）

于学忠昨谈

特警换防即蒇事

周毓英部昨由玉田开出

省府迁保后即合署办公

今日省政决整顿县教育

【本市消息】　中日负责人员日前在津会商战区各事，结果尚称圆满。仪我于昨晚离津返榆关，行前曾赴省府谒于主席商谈一切。蓟密区专员殷汝耕昨已由津返平。滦榆区专员陶尚铭

在津公毕，亦于昨日上午搭北宁车返唐山，拟于本月底召集辖区各县长开会，讨论行政兴革事宜。另据冀主席于学忠谈，特警第一、二总队开入蓟密、滦榆两区换防，即将全部交替蒇事。旧保安队范景华、杨玉成两部刻已分在通县、军粮城集中，最近可归还建制。周毓英部自本日（即昨日）起亦开始由玉田一带退出战区，决易由留驻蔡村之特警张庆余部之一部警士接防。关于省府迁保事，决定与合署办公同时，自七月一日实行，现正在积极筹备中，已由各厅派员赴保勘查房舍。迁保后，对行政经费预算无多变更。今后省政拟进行彻底整顿各县教育。盖各县教育发展迟缓，率因少数土劣从中把持。每致虽有相当学产，而不能供兴学之用。此种不良局面，殊应打开。将来决自天津、大兴等县次第着手兴革。

（后略）

中华民国24年5月26日　（第三版）

西昌境内战事激烈

朱毛残匪企图窜扰西康

川军组三纵队总攻徐匪

（内容略）

协剿孙永勤匪部

我团警与日军夹击

匪部扑灭之期已不在远

于学忠赴平谒何报告日内返津

【北平通信】　冀省府主席于学忠于前夜由津到平。昨晨十时许赴居仁堂晋谒何委员长，报告战区剿匪近况，并有所请示，至午始出。于氏定今明日离平返津云。

【北平电话】　关系方面对协剿孙永勤部，昨发表消息如下：查本月初旬以来，遵化县东北沿长城边区，匪患甚炽，枪杀焚烧，地方损失颇巨。先是口外著匪王彦如与热河土匪孙永勤两部约数百人，受日军压迫，窜至长城附近。我方团警闻讯，正欲前往长城附近堵击，以本月五日午后三时，我驻遵化之保安大队王大队长接到日军通知，谓日军对孙永勤部残匪决定铲除，惟恐发生误会，请该队暂移驻〈距〉长城二十五里处，罗文峪方面防务交日军担任等语。我保安队于五日晚间撤回遵化城，日军即设司令部于罗文峪内。未几日军司令部迁设于撒河桥〔潵河桥〕北三道河，并未通知我方派警接防。我方正派员与日军接洽填防中，而孙匪遂乘虚于十五日窜入关内，到大屯、侯家寨等地纵火焚烧，奸淫掳掠。我地方当局因恐匪势坐大，遗害地方，已与日军商妥协剿办法。连日以来，我团警分布于各要隘，搜索兜



剿，匪部即形不支，扑灭之期，当在不远。至于外报所载遵化县长有庇护孙永勤之说，与事实不符，且完全不确。至关于协剿孙匪事，我当地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我团警连日正与匪接触中云。

中华民国24年5月27日　（第三版）

蒋委员长昨飞成都

参谋团大部仍留驻重庆

匪图合股官军已有准备

（内容略）

孙匪肃清日军撤退

孙永勤有已被击毙讯

地方善后正由县长办理中

【北平通信】　关系方面消息：孙永勤匪经我团警连日围剿结果，大部溃散，一部则窜往茅山〔毛山〕一带。现仍继续搜剿，即可完全肃清。迁安等地已无日军，大部仍退长城沿线。据遵化县政府电平报告称，孙永勤有已被击毙说。冀省府主席于学忠氏前来平谒何，报告战区剿匪近况。兹已事毕，定于今日返津。据于氏昨对往访记者谈，冀省府迁保正筹备中。期于七月一日实行合署办公时，同时实现。华北禁烟进行，闻中央方面已派员调查。至华北将设立禁烟机关说，本人尚未有所闻云。

【本市消息】　孙永勤部二三百人窜扰遵化、迁安后，由我方特警及日军会同夹击，顷已完全肃清。据省府秘书长魏鉴昨对记者谈称，关于遵化、迁安剿匪情形，自日前与日方决定会同夹击后，进行异常顺利。顷据报称，孙部顷已全被解决，孙本人并已阵亡。盖窜扰遵迁者不过二三百人，且一部属于地方土著，本无实力可言，当不足一击也。目下会同夹击之日军已开回撒河桥〔潵河桥〕及马兰峪一带，我方特警亦即撤退，地方善后问题由县长何孝怡办理云。

中华民国24年5月28日　（第三版）

朱毛残部窜西康

会理激战匪损失甚重

杨森抵雅安与刘文辉商军事

（内容略）

（第四版）

蓟密区行政会议

今日在通县开幕

殷汝耕谈遵化土匪解决

【平讯】　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昨晨零时十分由津返平。记者昨午访殷，询以蓟密行政会议等事。据谈，蓟密区行政会议定二十八日在通县开幕。会期定为三日至五日。在三日内如能将全部议案讨论完毕，即行闭幕，否则即延长二日。此次会议议案颇多，计各县提案共七十余件，专员公署交议案件十余件。出席人员为蓟密区内各县长，滦榆区专员公署并派丰润县长张仁蠡代表列席。本人今日下午即赴通县，主持开会事宜。遵化土匪，已全部解决。日军剿匪部队亦已退出遵化境内。此次该县经土匪蹂躏，地方损失颇大。俟调查详情后，当再设法救济云。

中华民国24年5月29日　（第四版）

蓟密区各县

行政会议开幕

今晨开大会下午审查提案

因提案过多会期延长两日

孙永勤残部窜匿茅山〔毛山〕

【平讯】　蓟密区第二次行政会议于昨日上午十时在通州专员公署开幕。出席者有通县长曹桢，三河县长苏士俊，顺义县长张其军，平谷县长李兴焯，密云县长章维燮，兴隆县长刘家勋，怀柔县长何璜先，遵化县长何孝怡，蓟县县长王兴公，玉田县长赵从懿，马兰峪主任殷体新，古北口主任霍实，特警总队长张庆余，保安补充队长李允声，公署秘书长王厦材、池宗皇。列席者前保安总队长范景华，滦榆区丰润县张仁蠡等，及各界来宾数十人。由专员殷汝耕主席，领导行礼如仪。殷即席训话，大意谓，希望此次会议所决议各案大家能努力完成，不尚空谈。继由各县长分别报告各该县近况。至十一时半礼成，殷氏即午在公署欢宴。下午二时起开分组审查提案会议，至六时始散会。各县长、各队长所提议案及公署交议之案共有八十余件，分治安、交通、教育、财政四组审查。定今日上午开第一次大会，下午继续开审查会。会期原定三日，因提案审查需时，决定改为五日云。



遵化事变

损失惨重

【平讯】　某方据遵化电话报称，遵化县此次遭孙永勤匪部及会匪扰骚，损失甚重，全县入于混乱状态。现经团队会剿，孙部溃散，仅余残部二三百人，亦已退遵迁交界之茅山〔毛山〕内匿藏，团队仍追剿中。但遵属各村损失过重，为历年所未有。河北省政府及平政整会等机关于二十六日先后令该县调查具报，县长何孝怡已派员出发调查。县属各机关亦联名呈国府、中央、省府及北平军政当局，报告被灾详细经过，并请求赈济。又讯，孙永勤部被剿溃散后，复有王彦如匪部在遵化县东北之大块地庄（村名）一带滋扰，该地农民均纷纷外逃。现地方当局已调集张砚田、张庆余部各二中队及民团二百余人，驰往会剿，日内可望肃清云。

旧保安队

归还建制

【本市消息】　新编特警第一、二两总队开入战区接防，现已大致告一段落。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二氏连日至辖区各防地视察，将于下月初来津谒于主席，报告一切。原驻蓟密区之旧保安队范景华部及滦榆区之杨玉成部，现已全数分别集中通县、军粮城两地。又周毓英部刻亦自玉田一带调出，陆续至蔡村集中。上述各部保安队即将全数归还建制，闻杨玉成部决编入李振唐师，周毓英部则编入杜继武师云。

中华民国24年5月30日　（第三版）

川康军收复德昌

围西昌之匪大部北窜

杨森刘文辉分赴前线指挥

（内容略）

（第四版）

蓟密区行政会议

昨在平开审查会

定今日在通县举行大会

殷汝耕谒何报告遵化事

（前略）

【又讯】　蓟密区专员殷汝耕前晚由通县来平。昨午赴居仁堂谒何，报告遵化剿匪业已告

一段落，并有所请示。下午一时许始退出云。

【本市消息】 遵化、迁安各县经此次孙永勤匪部窜扰，损失颇重。遵化善后救济事项均亟待办理，已由省府责成蓟密区专员公署转饬遵化县长何孝怡负责办理。惟匪灾之后，县府无此巨款救灾，何氏特电省府拨款赈济，以苏民困云。

中华民国24年5月31日 （第三版）

川北残匪窜回理番

官军集大渡河阻朱毛北窜

（内容略）

中央已指示方针

关于酒井高桥之要求

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及日使馆武官高桥，向我华北当局有所要求，中央已指示应付方针。据中央社北平三十日电云，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及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二十九日在平先后访问驻平政整会秘书长俞家骥及军分会何代委员长。关系对俞何两氏口头申述，谓孙永勤匪部在遵化附近扰乱时，中国官宪有援助之嫌，日方认为我方破坏《塘沽协定》。又谓天津日租界两报社长被暗杀事件，与中国官宪不无关系，日方认为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己行动等语。此事据熟悉内情者云，中国任何官厅在此中日关系好转之际，绝无援助义勇军之事。至天津胡白暗杀事件，系发生在租界，其当日真相如何，当地中国官厅亦不知其详云。

【北平通信】 日使馆昨晨举行重要会议，武官高桥坦、参赞清水、通译官渡边等十余人均参加，内容不详。又战区清理委员会朱式勤昨晨十时许赴日使馆访武官高桥，有所商谈。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前来平有所接洽，昨日下午三时零五分搭平沪通车返津云。

平津天空

发现飞机

飞行甚高并未停落

【北平通信】 昨晨九时许，有灰色飞机一架，飞行甚高，由东北方向经平市上空转向东南飞去。据调查，此机由承德飞来，过平时并未停，直飞天津云。



天津《益世报》关于“剿灭”抗日救国军的报道

中华民国24年5月20日 （第三版）

遵化附近

股匪猖獗

大部系由口外窜入

一经追剿隐蔽深山

【平讯】 遵化附近，流匪窜扰。该县县长何孝怡昨有电话到平报告，该项窜匪系由流星峪外窜入，现在十里铺集结。缘口外日伪军现正剿匪，该股不堪压迫，遂向口内窜扰。顷已由张庆余部调派一中队，携带机枪驰往围剿，可望聚歼云。另据遵化来人谈，口外著匪王彦如部，自窜入遵化城东北县属第一区后，十三日夜，该匪徒在片石峪、尾成峪、吴家沟、庄客、小厂、鸡鸣村一带纵火焚烧，延长四十里，居民皆纷纷避难入城，损失颇重。及团队赶到往剿，则匪徒已遁入附近深山隐避。

中华民国24年5月21日 （第二版）

会理匪北窜被围

蒋电申斥邓锡侯失职

刘湘昨飞蓉策划军事

（内容略）

何昨午后抵并

各界定明日开欢迎大会

何谈此来系商剿陕北匪

（内容略）

（第三版）

蓟密区行政会议

定廿八日举行

殷汝耕昨返平转通主持

特警第二队已开拔竣事

【北平通讯】（略）

【本市消息】（略）

【本市消息】新编特警第二总队张砚田部，自奉命与滦榆区保安队杨玉成部换防后，历时九日，顷已全数开拔蒇事。最末一批，已于前（十九）晚由沧县开胥各庄，转往三屯营一带接防。又该总队第三、四两区队部已分在抚宁、卢龙开始办公。杨玉成部现正陆续自唐山西开，二十五日前可全数集中军粮城。

【平讯】蓟密专署昨午接遵化县长何孝怡电告，窜扰遵化四十里堡〔四十里铺〕、般若台〔般若院〕、小寨一带之股匪王彦如部，经新编特警张庆余部派队往剿，二十日晨已将该匪在流星峪方面包围。双方接触，匪有溃散舍身台，仍有图出口势。步哨获匪数名，传其中一名为匪首王彦如，但尚未证实。

【平讯】蓟密区撤回之特警范景华部已在通县集中完毕，定本月二十八日由通县开拔，运往湖北孝感，归还一零五师建制。

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第二版）

蒋昨由昆明飞黔

刘旅长固守会理受嘉奖

滇黔两省境内已无匪踪

（内容略）

（第三版）

遵化匪氛甚炽

日军协剿城门关闭

殷汝耕昨晨访高桥

【遵化二十一日电话】日军用汽车二十余辆，载官兵二百余名，携有钢炮机枪多架，于二十日由撒河桥〔激河桥〕开抵遵化。下午二时半由城内出发，与磐据〔盘踞〕城东十五里小寨、般若院一带之孙永勤匪部接触。迄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双方仍在相持中。遵化城门，二十日起竟日关闭。

【平讯】殷汝耕昨晨十时往访北平日使馆武官高桥坦，商谈遵化剿匪问题。

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 （第二版）

蒋委员长在渝

今日接见考察团

李家钰部集中灌县

湘省残匪窜向桑植

（内容略）

何昨晚抵平

过石保略有勾留

剿陕匪办法拟定实施

（内容略）

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 （第二版）

参谋团日内迁蓉

川将发公债二千四百万

蒋昨延见美经济考察团

【重庆二十四日下午十时本报专电】 刘湘到成都后，曾赴广汉与邓孙李唐王各路总指挥会议，对剿灭残匪已有整个办法。匪方重要机关仍在北川城内。胡宗南部已进至松潘城南，杨晒轩部二十三日晨向绵阳开拔，威州一线防务已布置就绪。

【重庆二十四日中央社电】 雎水关二十四日电：连日获匪探甚多，供称，匪粮食困难，急寻出路。观音梁子正面之匪系伪三十一军，其军长孙至帜，军政委詹四方，师长陈友寿，师政委叶戟范。匪大部似在竹川土长间，大垭口千佛山系匪三十一军一部。

（略）

【重庆二十四日中央社电】 美经济考察团二十四日下午五时由吴泽湘道赴范庄谒蒋委员长，由刘瑞恒招待。旋由蒋夫妇亲出延见，互道寒喧〔暄〕，宾主极为款洽。至五时四十分始行辞出。蒋定二十五日午欢宴该团，以示欢迎。（后略）

（第三版）

会商战区问题经过良好

追剿孙永勤部决定办法

仪我及殷陶昨先后离津

【本市消息】 近日中日负责人员在津会商战区各项问题，经过良好。仪我昨（廿四日）晨又赴省府谒于，当晚离津赴榆。陶尚铭、殷汝耕昨亦分别离津赴平。关于追剿窜抵迁安一带之孙永勤部，据省主席于学忠谈，已决定办法云。

【又讯】 关于特警换防事宜，顷已大致完竣。现张砚田部已全部到滦榆区接防，其杨玉成、范景华部已分别调至军粮城、通县两地训练归队。周毓瑛〔周毓英〕部亦于日前离玉田开出，张庆余之一部即日开到接防云。

【本市消息】 另据冀主席于学忠谈，特警第一、二总队开入冀密、滦榆两区换防，即将全部交替蒇事。旧保安队范景华、杨玉成两部刻已分在通县、军粮城集中，最近可归还建制。周毓英〔周毓英〕部自本日（二十四）起亦开始由玉田一带退出战区，决易由留驻蔡村之特警张庆余部之一部警士接防云。

中华民国24年5月26日 （第二版）

朱毛企图窜西康

西昌境内连日战事激烈

萧贺残匪迭被国军痛击

蒋昨宴美考察团张发奎即飞渝

（内容略）

遵化东北匪事猖獗

我方已与日军

商妥协剿办法

【平讯】 据某方消息，本月初旬以来，遵化县东北沿长城边区，匪患甚炽，枪杀焚烧，地方损失颇巨。先是口外著匪王彦如与热河土匪孙永勤两部约数百人，受日军压迫，窜至长城附近。我方团警闻信，正欲前往长城附近堵击，以本月五日午后三时，我驻遵化之保安大队王大队长接到日军通知，谓日军对孙永勤部残匪决定铲除，惟恐发生误会，请该队暂移驻〈距〉长城二十五里处，罗文峪方面防务交日军担任等语。我保安队于五日晚间撤回遵化城，日军即设司令部于罗文峪内。未几日军司令部迁设于沙河桥〔撒河桥〕北三道河，并未通知我方派警接防。我方正派员与日军接洽填防中，而孙匪遂乘虚于十五日窜入关内，到大圩〔大屯〕、侯家寨等地纵火焚烧，奸淫掳掠。我地方当局因恐匪势坐大，遗害地方，已与日军商妥协剿办法。连日以来，我团警分布于各要隘，搜索兜剿，匪部即形不支，扑灭之期，当在不远。至于外报所载遵化县长有庇护孙永勤之说，与事实不符，且完全不确。至关于协剿孙匪事，我当地



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我团警连日与匪接触中等等。此种传说，不从知何而起也。

中华民国24年5月28日 （第二版）

朱毛匪分股乱窜

西昌围可解徐匪逃茂县

蒋坐镇成都刘邓赴广汉

（内容略）

蓟密区行政会议

今晨在通开幕

殷汝耕昨赶往主持

各县提案七十余件

【北平通讯】 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前晚由津抵平。昨午晋谒冀主席于学忠，当日下午乘汽车赴通州。昨晨殷在寓所接见记者，据谈，（一）孙永勤匪股业经协剿完毕，茅山沟〔毛山沟〕一带，尸体遍野，传孙本人亦在其内。出动口内之日军，为数不多，即可〔刻〕分别开始向撒河桥〔澈河桥〕、马兰峪、古北口各原防地撤退。该一县善后，业责成何（孝怡）县长积极处理。（二）蓟密区行政会议准明（即今）晨在通开幕。所属十县，除遵化系派代表参加外，通县、三河、顺义、怀柔、平谷、密云、蓟县、兴隆、玉田十〔九〕县长，及驻古北口马兰峪两办事处主任，先后到通，保安队长亦有数人出席。会期虽预定三日，但必要时得延长两日。各县县长提案共有七十余件，公署交议之案亦有十数件。该会议并有丰润县长张仁蠡奉派列席，以为借镜云。

中华民国24年5月29日 （第三版）

遵化已无匪踪

善后设施在请示中

孙永勤毙命说证实

【平讯】 关系方面昨（二十八日）接遵化电话称，该县境内已无匪踪。刘桂堂残部现在洪山口外盘踞，日军兀〔允〕由彼负责剿办。茅山沟〔毛山沟〕一带所遗匪尸，现正从事掩埋工作。证明孙永勤确不在人世，系与其参谋长宫有元〔关有元〕同时死于飞机扫射之下。孙与宫〔关〕均套有臂章，注有姓名，其尸体同葬乱岗中。剿匪区内之地方善后，遵化县政府呈上级机关核示云。

《申　报》
关于"剿灭"抗日救国军的报道

中华民国24年3月7日　（第三版）

驻热日军调防
承德日参事官会议

北平　古北口讯：驻热日第七师团奉调回国，现已陆续集中平泉，白〔自〕锦州开拔，经大连回日。热省另由关奉军组临时独立混成旅团驻防，旅团长为川岸文三郎少将。古北口接防部队，为该旅团两个中队。马兰峪另由古〈北〉口石井大队派人接防。（六日专电）

北平　（略）

中华民国24年3月18日　（第三版）

玉田又有纷扰
马兰峪附近无匪踪

天津　十五日，玉田四区窝洛沽镇民团常廷波、张荫廷部与王继宗部发生冲突。双方激战两小时，常张部众为王部缴械，王部民团即开入该镇驻防。县长赵从义〔赵从懿〕恐乱事扩大，特派员往劝慰息事，听候解决。冯寿彭部叛兵三百余，枪械整齐，十五日过界岭口外，向兴隆县境大小倒流水金矿逃窜。（十七日专电）

北平　（略）

中华民国24年3月20日　（第三版）

日石井大佐
赴古北口劳军

北平　（略）

北平　古北口讯：古北口驻防日军换防后，接防之独立混成旅团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石井信部步炮机枪各一中队，计六百余名，现已陆续由承德开到潮河西。旧将衙门西侧有民地二十五亩，近经日军租用，建筑简单之营房，为保存山炮及军马之用。（十九日专电）



玉田团队

当局着手整顿

先缴械再改编

北平 保安队换防后，周毓英部调玉驻防。当局对玉田民团，决彻底整顿。先缴械再改编，俟改编竣，发给枪械。现已着手进行。窝洛沽一带之民团三百余人已缴械。当时因民团反抗，曾发生激战。所有各村民团缴械后，即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俟缴械毕，再集该县东关点编。（后略）

中华民国24年3月21日 （第三版）

玉田民团不服解散

经周毓英部包围缴械

冯寿彭溃兵窜扰密怀

天津 驻玉田保安队周毓英部，十五始缴除王继宗部民团枪械。十八日该部据鸦虹桥〔鸦鸿桥〕反抗，与保安队发生八小时激战，卒以被包围，屈服缴械。该部共千二百名，为非法民团，势力最大者。尚有贴近刘桂堂方面民团二百，保安队正计划缴械遣散。（二十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3月26日 （第三版）

承德义军活跃

北平 喜峰口来人谈，在热河承德活跃之孙卫勤〔孙永勤〕部义军，现已开至平泉下板城地方，高揭青天白日国旗，并击毙日守卫队慰〔尉〕官小野真、吉河口正等十余，名声大振。（二十五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3月27日 （第三版）

玉田抗命民团

经保安队击溃

王承祖部已被迫退出

周毓英增调大队协防

殷汝耕仪我前往处理

天津 玉田保安队与民团冲突。二十五早开始，周毓英部以一大队六百名兵力，二十四夜分三路进攻王继宗部非法民团。（原文如此，后略）

中华民国24年3月28日 （第三版）

玉田非法民团团总

王继宗在丰润就捕

鸦虹桥〔鸦鸿桥〕一带已告肃清

周毓英部开入检查户口

殷汝耕等自玉田到夏甸〔夏垫〕

天津 二十六早周毓英部向钱家沟王继宗民团猛攻，民团恃有迫击炮威力，顽抗不退。迄午前九时许，激战已达六小时，民团死伤多数，余众不支，分向赵家铺、李家桥溃散，保安队乘胜追击。赵家桥一带刘桂堂匪众亦不得守，由匪首贾文阁诸人分率向燕山口、界山口逃去。蓟遵民团保安队截击，已在包围，解决在即。（后略）

天津 玉田非法民团总王继宗，二十六战败，部队溃散。王支〔只〕身化装向丰润逸去，拟入唐山，托庇外人。过丰润县新军屯镇，为该县团警捕获。二十七早解至周毓英军，经派兵一队，送至玉田县暂押，军事结束后，送平军分会。王抵玉田时，绑捆甚紧，竟毫无惧色。王为玉田三区人，年三十七，字承祖，丰润中学毕业，津法政校肄业，曾充昌黎学校教员。被擒后，所部分数支窜逃，丰蓟遵迁四县已在截堵。（二十七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3月29日 （第三版）

清委会开会

讨论战区各事项

彻底整顿非法民团

维护战区治安办法

殷陶等分别提报告

（前略）

北平 遵化电：玉田鸦虹桥〔鸦鸿桥〕王承组〔王承祖〕部叛团三百余人，昨窜至遵化境大寨村时，经保安队及民团合力包剿后，已被击溃，向东流窜。今晨四十里铺地方发现该项叛团，人数约百余名，业与当地民团接触，保安队亦跟踪追击。该项叛团有窜迁安形势。陶尚铭昨晚与殷汝耕等由唐山经玉田、三河、通县抵平。据谈，玉田前因地方秩序紊乱，居民十之八均已逃亡。自保安队移防后，秩序已复，商铺相继复业，已逃商民十之三四返里。（廿八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3月30日 （第三版）

玉田边境

防守团队复员

王继宗部完全解决

天津 遵化民团、保安队由县长何孝怡督率，二十八日在鲁家峪截堵玉田窜散民团王继宗部。接触后，溃众折向丰润、遵化两县境何家场窜逸。当晚为民团追及，包围激战，阵毙数十名，缴械者百余，打下被掳各地男女票五十余〈人〉。余众沿遵丰县边境窜去，已无战斗能力。二十八日午后起，遵化、蓟县、宝坻、丰润开抵玉田边境防守团队皆复员，玉田交通恢复。县长赵从义〔赵从懿〕饬鸦虹树〔鸦鸿桥〕士绅，赶办善后，并调查受损害民众，便资救济。下周内将以玉田县长为中心，召集丰遵蓟玉田县善后会议。（二十九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3月31日 （第九版）

整理战区

议定具体办法

殷陶兼任保安司令

殷陶等到津晤日方人员

（内容略）

玉田筹办善后

鸦虹桥〔鸦鸿桥〕秩序已恢复

王继宗等将处死刑

天津 王继宗二十四晚自鸦虹桥〔鸦鸿桥〕河西街内逃出后，中途身中四弹，忍痛涉水逃走。至东轩胡店马占福家小住，旋转赴代庄子亲家匿居，不断被人告发。经丰润民团二十五晚将王捕获，当晚押解该县府。二十六午乘汽车将王解至玉田，因弹伤疼痛，已不能行动。另有五匪随同押来，均戴镯镣。闻王及五匪不日将执行死刑。（三十日专电）

北平 遵化电：长城各小口近日发现股匪甚多。窜抵潘家口一带之口外胡匪，已被当地保安队解决，惟当地民间损失颇巨。喜峰口等地股匪，亦于二十九日被迁安、遵化两县保安队及民团包围痛剿，是日晚窜出喜峰口外。玉田王继宗叛变民团其窜抵迁安新集镇附近之一股，亦被民团驱散。现长城各口，情势仍极安靖。（三十日专电）

天津 二十八早，长城潘家口突窜入土匪二百余，由匪首孙永勤统率，烧掠全镇，火毁民房百余间，并缴去警所枪械，架去巡官赵长顺及肉票十一名，回窜喜峰口。迁安民团、警队往

击，二十九日匪众退出口外，沿孩儿岭北窜。赵巡官得间逃回。（三十日专电）

天津 （略）

天津 （略）

中华民国24年4月5日 （第三版）

遵迁两县乡村

股匪大肆焚掠

二十余村惨遭浩劫

两县团队联合围剿

匪突围窜喜峰口外

天津 二日午后，王继宗、孙永勤等匪股窜抵迁安，县长计慎行率民团应战于新镇。匪绕道窜破城子、马店子、权家壩、何家营，仍到处纵火，以乱追军。民团在刘家河与匪激战，匪不支，三日晨拂晓，突围窜往长城喜峰口外。破城子、马店子等二十三村皆被掠一空，各村房屋火焰迄三日晚犹多未熄。（四日专电）

天津 一日，王继宗残部与孙永勤股匪由界山口内窥遵化。县长何孝怡率民团数百协保安队王泽民部往剿，激战三时，竟因匪势悍猛退却。匪股二日早攻平小堡，杀伤农民二十余，勒索富户供现款五万。因未措定，遂纵火焚毁全镇，不许扑救。嗣窜小头庄、泉水头、新庄子，遇屋放火，遇人即杀。经保安大队长王占元率部包剿，在新庄子发生激战，匪遂不支遁去。民团、保安队伤亡甚重，小头庄、平小堡以被焚皆成瓦砾，两村民居各三百余户，余屋仅数栋。（四日专电）

天津 王继宗残部与喜峰口外匪股孙永勤部会合，集合数百余，窜扰遵化、迁安县。后逃喜峰口外，受日伪军堵阻，有回窜口内势。遵迁两县民团由县长何孝怡、计慎行督率，分防潘家、喜峰各口。迁安县民为匪绑去者六十余名。被害二十三村，县府已派员慰问，并调查灾情。（四日专电）

北平 玉田鸦洪桥〔鸦鸿桥〕叛团王承祖部窜入遵化县境后，经保安队、民团合力围剿，图南窜迁安未得逞。今晨据报，王之余孽约有二百余人，枪二百余支，盒子枪五十支，现在舍身台附近流星峪山上，恃险顽抗，不久可聚歼。（四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4月6日 （第三版）

前玉田民团首领

王继宗昨枪决

天津 玉田鸦虹桥〔鸦鸿桥〕非法民团首领王继宗，五日午前十时，由周毓英派员自监狱提出，绑赴西门外枪决示众。周午刻有电到省府报告。王继宗被捕后，其亲友四出奔走，并联络士绅四十三名，乡公所十三具状，恳从轻发落。省方以王聚众构乱，抗据〔拒〕解散，不准，令周毓英执行枪决。（五日专电）

北平 玉田鸦虹桥〔鸦鸿桥〕镇民团首领王承祖因抗命不服改编，率部叛变，逃丰润，被保安队擒获后，即解送玉田县府，已供认前情属实。玉田县府顷接冀省府电令，将王就地依法处理。（五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4月10日 （第三版）

孙永勤股匪

窜扰迁安边境

天津 前窜扰迁安、遵化两县境焚掠数十村孙永勤股匪，顷在龙井关外半壁山、二道河子庄补充械弹，并会合各小股土匪，已集有五百余名，复进逼迁安边境，欲突入民团防线，窜扰口内，致附近人民大恐慌，迁安民团多复出动堵御。（九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4月15日 （第三版）

王继宗残部西窜

沿途大肆焚掠

天津 九日早，遵化红山口〔洪山口〕外发现之股匪三百余名，为王继宗残部，由刘桂堂部王庆芳统率，经迁安县境西窜，沿途抢掠七十余村。迁安红崖岭被焚民房三百五十余间，架去人票十余名，村民死者七。（十四日专电）

北平 （略）

北平 遵化境片石峪之匪已判明，系刘桂堂残部，连日在该方抢掠骚扰，居民备受蹂躏。经保安队周毓英部包围后，昨夜曾有激战。截至今晨，双方仍在相持中。（十四日专电）

天津 （略）

中华民国24年4月17日 （第三版）

冀新保安队

改编手续完竣

定名特种警察队

殷汝耕抵夏甸〔夏垫〕检阅李允生部

北平　冀省新编保安队已改编竣，定名为冀省特种警察队。驻防武清南北蔡村，张庆余部为第一总队。驻防沧县，张砚田部为第二总队。各编特警二千五百名，总队部直辖两区队，每区队分三大队，每大队四中队，每中队三小队。张庆余、张砚田昨晚由津抵平谒殷汝耕，请示特警开拔一切手续。（十六日专电）

北平　（略）

天津　战区清委会派定陶尚铭、朱式勤监视滦县刘佐周，唐山赵雷、冯寿彭三部缩编。刘赵两部各照省方规定，编成步兵四大队，每队五百名，溢额须裁汰。朱式勤定十八日东去，协陶尚铭办理。（十六日专电）

北平　（略）

北平　唐山讯：陶尚铭谈，新编保安队已检阅竣，开入战区问题，亦已与日方商妥，本周内即可实行开拔。冯寿彭部决先期改编，刘佐周、赵雷两部亦将检阅。新保安队开入后，驻昌黎之杨玉成部即开往蔡村填防，驻玉田之周毓英部将开沧州编遣，刘佐周、赵雷、冯寿彭等三部决暂留原防驻守。（十六日专电）

天津　（略）

中华民国24年4月19日　（第三版）

片石峪

股匪溃窜口外

北平　前窜至遵化片石峪股匪，被当地保安队、民团积极进击，现已溃窜口外。为防其回窜，已严密防范。（十八日专电）

北平　玉田非法民团王继宗部解决后，有残匪流窜各处。该部残匪均刘桂堂旧部，刘本人在津遥为指挥。据某外籍医生谈，近病痛甚剧，已卧床不能起。（十八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4月12日　（第三版）

匪股窜扰声中

遵化城内戒严

天津　王继宗残部仍由刘桂堂部匪首王庆芳统率，盘踞遵化城北三十里设神台〔舍身台〕方面，每于夜间窜扰附近各村镇，烧杀淫掠，居民受害者数百户。顷周毓英、王占元两部保安



队遥取包围势，匪据山险顽抗不退。遵化四乡民团均抽调至县城增防。城内检查行人，宣布戒严。（十九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4月21日 （第三版）

匪股王继宗

啸聚益多

天津 遵化北片石峪、设神台〔舍身台〕、驻马寨一带，王继宗匪股啸聚益多，与官兵对抗不退。周毓英部保安队第三总队派出一中队，携机关枪六挺，往协剿。遵化民团亦增调一部往援。（二十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4月26日 （第三版）

遵化安谧如常

北平 遵化县长何孝怡二十四日晚因病来平调治。二十五日据语记者，刘桂堂部股匪前窜扰遵化数次，均经击溃。现各口由民团严密防堵，匪势难回窜，地方亦安谧如常。（二十五日中央社电）

中华民国24年4月27日 （第三版）

暴热之后

平津忽起狂风

温度骤降交通受阻

电杆树木多被吹拔

房屋倒塌伤毙人命

北平 昨气候暴热，达华氏九十度。今晨二时，狂风大作，温度骤减。今晨七时，华氏卅二度，今午四一度，下午三时四六度，较昨温度差一倍。市内建筑及交通方面受风侵袭，损害甚多。郊外农作物被摧残，秋收可虑。南苑欧亚航空存机厂铅板顶被风吹离原位，中航南下机停止起飞。由平至南苑电线杆树木等多被吹拔。平津、平保、平通及由平至香山、汤山等处长途电话今晨完全断绝。因风势过大，电话局无法修理。市内电话线吹折甚多，不通话用户达二千余家。电灯线亦吹折千三百余处。因路上行人稀少，电车出厂数量较平时减少一半。树木拔毁，房屋倒塌甚多。中山公园走廊及过厅五间吹塌，倾入河内，损失甚大。宣武门洞今晨行人穿行时，洞门吹阖，撞伤数名。和平门洞门亦被风吹阖，适撞车夫李凤山头部，立即毙命。据测候所称，今晨风速度每秒钟竟达二十六公尺，风向西北。（二十六日专电）

天津 二十五夜十二时后，津市狂风大作。迄二十六晨益烈，飞沙扬尘，天气昏晦。平津长途电话线为吹折，电话局难派员工修理。因断折处甚多，一时难通话。大风二十六晚始息。唐山大风二十五日未息，津唐长途电话线断折已一日，未修复。二十五日，市内小广东街及沿铁路线树木、电杆、房舍吹倒折者极多。因风沙过大，市内行人甚稀。大名、兴济、安次、香河、德县均报风灾。旱风已一周不息，天气燥热，麦苗多枯死。大名西北乡一带数十村发生虫灾，禾稼多为蚀食。（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平沪北上车，因途中遇风，速度减缓，抵平时误四十分钟。（廿六日专电）

北平 唐山讯：唐山及滦东各地，连日狂风大作，树木被拔者极多，唐山至战区各县间电话全被吹断。（二十六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4月29日 （第三版）

滦河风大

货船中途覆没

（内容略）

丰润发生地震

（内容略）

中华民国24年5月1日 （第三版）

关外民众

组自救同盟军

北平 喜峰口来人谈，热河朝阳、凌南、凌源等地民众最近组织中华民族自救总同盟军，集聚七八百人，前救国军旧部刘振东、范九占等部均加入。现朝阳一带，纵横三百余里，均悬青白国旗。该各县除城市行政权外，余均非日人所有。四月二十日左右，锦西亦发现该项同盟军，由孙云田、李树珍等率领。热西之新台门已收复，该军即以该地为根据地。（三十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7日 （第三版）

古北口盛传

义军攻承德讯

北平 古北口盛传，热河义军孙永勤部率众千二百余人于本月四日占领下梨城［疑为“下板城”之误］，大军已逼近承德。日伪军极慌，已分调古北口及其他承德附近各县日伪军前往援



救，并檄察东伪军李守信部东进防堵。古北口日军奉令后，已全部移动。承德难民四处逃奔，状极狼狈。（六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8日 （第三版）

王继宗残部

复图窜入口内

北平 前由遵化、迁安等地逃出长城线外之刘桂堂、王继宗两部残匪，现又由热河窜抵长城罗文峪口附近，企图窜入口内。地方当局据报后，已饬保安队及民团严守长城各口。罗文峪方面，除王占元部保安队外，遵化县政府复增调民团五百余名前往。（七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11日 （第三版）

瞿秋白等就捕

福州 伪福建军区司令龙腾云、政委黄永诚击毙后，伪中委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亦就获，于七日、九日先后解送龙岩二区绥靖部，闽西匪党首要已扑除殆尽。四区专员孟平电告，尤溪残匪千余，刻窜至永泰、仙游界之黄溪，我军已星夜驰往凤顶堵击。水警第一大队昨在魁岐拘获共匪叶凯，已送宪兵团讯办。查叶原系鞋工，曾任伪福建省委福州市委各职。（十日专电）

厦门 闽西社讯：信安十四团长钟绍葵在上杭、长汀交界之路潭地方，俘获匪首瞿秋白及项英之妻张亮、梁伯台妻周月林三人。张周供承，解龙岩。瞿伪名“林祺祥”，不承，解长汀，由俘匪指认。嗣张周在岩供出，同俘之“林祺祥”确系瞿秋白，又同行何叔衡击毙，邓子恢逃脱等语。瞿将由汀解岩。（十日专电）

殷汝耕赴通

办理换防事宜

日参谋大木等同照料

特警队昨已开始移动

北平 殷汝耕今日赴通，办理战区新旧保安队换防及改编李允生部事。冀省特种警察队共分五总队：第一总队为张庆余部，第二为张砚田部，第三为刘佐周部，第四为赵雷部，第五为李允生部。开入战区以内者为第一第二两总队，其余均驻战区附近。第一第二队可携带机关枪，计每队二十五挺，共计五十挺。张庆余部今日已开始由蔡村开动，明日完全集中通县。殷对该队训话毕，即分别向各县开拔。李允生部已编遣之人，遣费已分别发下，将由蔡村运平，分别遣散回籍。时夏垫、燕郊之李允生部保安队缩编就绪，明日给资遣散。被淘汰者共

三百二十八名，中有官佐十四名，官长每名五十元，警长二十元，队警十元。编完即分三批押解到通州，登车返原籍。（十日专电）

天津　特警第一总队十一日可完全换防毕。第二总队以车辆关系，须四五日输送完竣。两总队马夫、差役除外，每一总队连官长共二千五百名，大枪如数；机关枪每总队二十五挺，与约定数相符。津日驻军参谋大木、石井十日早赴唐山，参谋堂胁、部附江头赴通县，分由陶尚铭、殷汝耕伴同照料特警队开入战区。杨玉成部保安第二总队集中昌黎留守营，即搭运送特警队五车辆开出战区。十二日晚第一批可到军粮城。（十日专电）

天津　新编特警队十日开始移动。张庆余部第一总队晨七时先开出，由蔡村徒步向通县进发，十日夜在通县宿营，十一晨开入战区，再集结玉田，分向各地接防。辎重等物由大车输送。省令各市镇对该队伍过境，除茶水外，弗须他项供应。张砚田部特警第二总队十日午后三时由沧县登车，五时开出，分由津浦两路拨车四十节，先后作两路运送。该队十一晨过唐山入战区，直驶指定各防地下车。（十日专电）

天津　新特警第二总队张砚田部，十日午后六时半，第一批队伍由沧县登车，共装运二十车，附挂四零二次津浦慢车后北开，须十一晨零时半抵津。第二批队伍九时登车，共挂车十七节，须十一晨八时过津。此两批运入战区后，空车运杨玉成部旧保安队出战区，方能再开沧县，接运其余队伍，预计需运七次方毕。由津迄留守营一带大小站，均有警所为该队预备茶水，备过境领用。（十日专电）

天津　周毓英部保安第三总队大部开遵化剿匪，两月后调出战区。特警换防后，战区内除周毓英二千外，计张庆余部、张砚田部各二千五百名，刘佐周、赵雷部各二千名，李允生部千名，统计一万，分别维持治安。刘佐周部编制溢额骑兵三百余，特警换防后，省方计着手整理该部。昌黎、乐亭防地，中日双方约定暂不驻何队伍，俟刘佐周部加以整理，再开去一部填防。赵雷部编制不合省制，亦同时纠正。（十日专电）

天津　李允生部保安队缩编，十日已将孙宇臣、刘本志二大队编竣。罗子臣一中队，俟与冯寿彭部同时改编，编余三百二十八名，十一日发遣散费遣散。（十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12日　（第三版）

长城以北

匪势愈益猖獗

团队纷纷开往堵剿

天津　长城附近罗文峪、红山口〔洪山口〕刘桂堂残匪，会合孙永勤等支，已有六百余名，并与遵化西部潜伏匪股一支二百名联络，九日早进抵距遵化县城东北三十里黑鱼沟、大地



〔疑为“大块地”之误〕一带，声势浩大。民团保安队纷纷开往堵御。城内避难者拥挤，下午五时即关城门。（十一日专电）

天津　长城北半壁山、红山口〔洪山台〕各处红枪会、大刀会匪、土匪、变匪，啸聚日多，声势殊大。马兰峪日军宫间部队百余名，协伪军一队往剿，并有伪热河凌南驻军一队，驰抵长城外防堵。日军在马兰关长城口设防，城头遍插旗帜，八日禁绝行人出关。长城北大刀会匪，八日与伪军发生激战，匪被击溃北窜。当夜卷土重来，攻兴隆山北鹰守营〔鹰手营子〕。双方发生巷战，枪声彻夜不绝，民房为流弹著处，起火多所。马兰峪日军对会匪取大包围式，仅留西南一路，欲将匪驱入我遵化、迁安境内。（十一日专电）

天津　八日，长城北大刀会匪一部，受日伪压迫，向南窜逃。经我遵化驻屯保安队王占元部迎击，匪复退往口外。擒获会匪十四名，就地正法。遵化七日起全县境戒严。县长何孝怡檄调各区民团，集结红山口〔洪山口〕、罗文峪一带扼防。长城线各潜伏匪股均蠢动，人心惶惶，马兰峪迄遵化间难民，向内地逃避者极多。（十一日专电）

天津　遵化县长何孝怡十日晚电省，请饬周毓英部保安队速开往协防。刘桂堂匪股沿遵化北境烧掠甚惨，各村悉成瓦砾场，妇女被奸杀者无数。匪每到一村，先举火开枪，村民窜逃则迎头击毙，遵化迤北随处皆有尸体。（十一日专电）

新特警队开往各县接防

陶尚铭向八县长训话

李允生部已缩编竣事

北平　（略）

天津　（略）

北平　殷汝耕今在通州，料理新旧保安队换防事。张庆余部第一总队今下午完全集中通县，由殷检阅训话，明日即向密云、顺义、三河三县出发。李允生部被改编之二百三十八人，今午由通押运来平，分别遣散回籍。第二总队张砚田部今在唐山集中，由陶尚铭检阅训话，明日分向卢龙、临榆等县开拔。（十一日专电）

北平　（略）

北平　（略）

天津　（略）

天津　特警第二总队兵车第一列，十一日午后七时五十分过唐山，停三十分东开。第二列十一夜九时五分抵唐山，亦停三十分东开。十三张砚田部队东开者，将为第三区队邹得胜大队，直接去卢龙接防。十一日下午五时，张庆余部第一区队全部三大队开蓟县、密云，第二区

队之一部由通州开玉田，内一大队十二日转顺义。新特警第一、二两总队部组织，为总务、督察、执法、医务、会计五大处，另设外交处，办理对外各事。（十一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13日 （第三版）

新编特警队

陆续到达防地

仪我协陶尚铭照料

关东军派参谋查视

杨玉成部开出战区

天津 （略）

天津 （略）

天津 东开特警第一总队部晨在玉田县城组设，由总队部督察长沈定波协总务处长孟润生布置一切。该队第一区队由区队长张含明统率开抵蓟县，即在当地设区队部。第二区队由区队长苏连章统率开至顺义，组设区队部。特警第二总队部十二日在留守营组设总队部。十二午后，第二保安总队杨玉成部由昌黎登车，开出战区。十三早四时可达军粮城。（十二日专电）

北平 （略）

北平 （略）

天津 （略）

天津 （略）

日机八架

轰炸大刀会匪

天津 日驻承德飞行联队飞机八架，十日午前飞马兰峪兴隆山，向当地盘踞大刀会匪投弹轰炸，约半时许飞返。大刀会匪死伤甚重，已向长城南败却。遵化县我民团挖战壕防窜入。（十二日专电）

天津 驻热河日军飞行队第二联队飞机八架，九日飞马兰峪视察。先飞兴隆、迁安等县上空巡视后，继飞马兰峪，在东陵山下机场降落。该机等在马留一日，十日即飞回原处。又日机一架，前日曾飞滦县视察。（十二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14日 （第三版）

特警到达防地后

即开始剿匪工作

殷汝耕访高桥商换防

陶尚铭仪我参观特警

（内容略）

中华民国24年5月15日 （第三版）

关外义军活跃

北平 关外讯：揭帜国民决死队首领阎处文，在阜新崛起，于上月二十八日占领阜新北部二百余村，热河各县民众纷纷响应。朝阳民团首领蓝英杰率部万五千余人，建平民团曲瑞峰所部八千余人，绥东蒙军博经万人及其他义军民团，共二十余部，均加入抗战，总数约十万余人。现据有面积，东自阜新吐呼鲁，北至建平下洼子，南至读南山嘴子，西至赤峰黑水镇，共八百余方里，所有各县民众，全部响应，声势浩大。日伪军曾两次进攻，均惨败。热河日本驻军现正乞师于关东军，准备三次进击。现各县民众均在包围中，出入检查极严，防止消息外泄。（十四日专电）

天津 吉林宁安县南六十里地方，伪国道局包工藤田组庚遭三百名义军围攻，击毙日国道局员五名，架去日人一名。伪间岛省靖安军特驰往援应。（十四日专电）

北平 古北口讯：孙永勤部包围承德后，因日伪军压迫甚剧，本月九日沿承凌铁路线撤至下址城［疑为“下板城”之误］以南约三里地方。该部现聚众千余名，本月十日与驻平泉、喜峰口日伪军开始接触。大板驿日本自卫队闻讯往援，大板空虚，竟被孙部五百余人占据。现双方激战甚剧，长城各口日伪军均积极调动中。伪承德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王静修认孙部为热河心腹大患，连日电长春日方报告，请饬锦州省驻军派兵往援。（十四日专电）

特警分区驻防外

并拟组骑警队

蓟密二区队已接防

范杨两部先后调回

北平 （略）

北平 （略）

天津 （略）

天津 （略）

北平 殷汝耕谈，冀省特种警察队张庆余总部队共分第一第二两区队，另有一骑警队。每一区队分三大队，现第二区队已开入密云、顺义、遵化。总队部设蓟县，区队部设遵化。第一区队现尚在蔡村。原驻玉田之周毓英部，其驻滦榆区内之一部队伍今日起已向玉田集中，本月底可完全开出战区。第一区队俟周毓英部开拔后，即开入玉田接防。所有已开入之总队部及区队部均于今日起正式开始办公。（十四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16日 （第三版）

中日使节升格

双方今日公布

南京 中日使节升格，王正廷长〔掌〕外交时曾一度商及，旋即搁置。最近日本广田外相倡仪中日亲善，拟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迨有吉明返国，复经商榷，乃行决定。正式向吾征求同意，吾已答复同意。确闻中日双方使馆升格事，十五日下午五时，日总领事须磨代表使馆赴外部访唐有壬，述日政府确定将驻华使馆升格经过，及约定双方公布时期。谈约半小时。关于两国使节升格，双方约定十六日上午十时同时公布。我方公布文件内容，系叙述升格经过。至于日本驻华首任大使，有吉明已定六月初旬来华，呈递国书。我国驻日首任大使，亦定蒋作宾升任，一切手续亦已竣事。我国驻日大使馆组织，闻仍照驻苏联及驻义大利〔意大利〕大使馆办法，所有经费预算等，稍事增加，亦经议定，足资办公。（十五日专电）

东京 （略）

东京 （略）

战区两特警队

队部实行办公

殷汝耕谒于学忠报告

北平 （略）

天津 （略）

北平 （略）

天津 （略）

天津 （略）

天津　飞往马兰峪轰炸大刀会匪之日飞机八架，因会匪溃散，十四日沿撒河桥〔潵河桥〕、建昌营内飞，抵滦河桥上空，盘旋一周，即飞出境。马兰峪兴隆山一带会匪向小流水窜逃，残部余百余名。（十五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17日　（第三版）

英美均将提高

驻华使署地位

中日使节升格

改定今日公布

（内容略）

殷陶等在津

会商整顿战区治安

张砚田部陆续过津东开

北平　（略）

天津　（略）

天津　十五夜十二时，日使馆驻平武官高桥坦搭平沈车过津，赴承德晤第七师团长杉原，有所接洽。（十六日专电）

北平　（略）

天津　（略）

天津　（略）

天津　（略）

中华民国24年5月18日　（第三版）

外部发表公告

中日互换大使

即以现任公使充任

国府命令昨日已下

外部发言人谈增进中日邦交原则

（内容略）

殷汝耕　陶尚铭
即将出巡各县
特警换防进行顺利
旧警范部集中南苑

（前略）

天津　冀省府以遵蓟毗邻长城各口，匪氛甚炽，令张庆余特警第一总队部移设该县。玉田设第一区队部，由区队长张含明负责。（十七日专电）

遵化境内
股匪大肆滋扰

北平　遵化电：遵化境内日来又发现匪徒数股，在各区滋扰甚剧。保安队王占元部于本月十四日派队赴县城东北十五里之鸡鸣村、片石峪、苇塘峪等处巡查，突与口外股匪王房如〔王彦如〕部三百余人相遇，发生激战。新编特警张庆余部闻讯亦拨队警百余人，驰往该处协剿。匪不支，逃至遵化、迁安交界之剑山、三十二岭等地，保安队及特警现正跟踪追剿中。被击之片石等七村，损失奇重，地方当局已准备救济。（十七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20日　（第三版）

接管东陵手续问题
中日约期在津会商
陶尚铭谈战区未了问题逐步解决
特警换防完毕即进行接收马兰峪
滦榆蓟密两区均将召开行政会议

（前略）

北平　蓟密区特警第一总队张庆余部业已全部开入各县，换防即将竣事。该队计分六大队，防地分配如下：顺义、密云、遵化、三河、玉田、蓟县。总队部设蓟县城内，俟第一区队开到后，即成立。（十九日专电）

遵化北境
惨遭刘匪焚掠
男女老幼死亡无算
经堵击后图窜口外

天津　刘桂堂匪股四百余，十五日由龙景山窜入遵化北境，经民团保安队迎头痛击，匪弃尸



五十余具逃遁。十六日早复回窜，将毛家沟、偏直峪、羊户沟、大块地村、白猫谷、曲谷、葫芦峪等村镇纵火焚毁，屠杀村民无数，民房烧毁千余幢，二十里外可见火光。经民团竭力痛击，匪始却，退万家峪固守。遵化县长何孝怡电省，毛家沟、偏直峪等七属遭刘桂堂匪股焚掠，男女老幼死亡无算，牲畜器具什物皆烧毁，损失奇重，各村民万余均露居野处，惨不忍睹，请拨款急赈。（十九日专电）

天津 周毓英部保安队两大队，十七日驰往遵化北剿击刘桂堂匪股。已将该股包围于万家峪，正激战中。（十九日专电）

天津 周毓英部驻抚宁两大队，十八日开抵遵化，即北上至长城附近，剿击刘桂堂匪股。（十九日专电）

北平 遵化电：刘桂堂残匪现在般若院方面盘踞，另一股在小寨。新特警张庆余部一中队奉令驰往，会同旧队周毓英部协力围剿。据探报，踞小寨地方之股匪，人数不多，粮弹缺乏，有退窜口外形势。（十九日专电）

酒井在津召集

在乡军人会议

天津 津日军参谋长酒井前归国，出席参谋本部会议。十九日搭轮归津，对最近津日租界某暗杀案及丰润中岛事件，定二十日召在乡军人义勇队等开会商对策。（十九日专电）

天津 （略）

中华民国24年5月21日 （第三版）

遵化匪首

王彦如被生擒

团队严密堵剿残匪

北平 窜扰遵化之刘桂堂残部王彦如股匪，经特种警察张庆余部连日在小寨方面围剿结果，昨已将王彦如生擒，当即由遵化县政府派员，将王押赴津五十一军讯办。（二十一日专电）

天津 刘桂堂匪股窜入金山寺后，遵化各村民团奉令均驰边境增援。县城十七日午后，施行紧急戒严，四门紧闭，禁止出入。各村逃难男女不得入城，均露处城垣下。丰润、蓟县民团及新开到特警队一部，防刘匪窜入，十九各驰至边界防范。十八驻蓟县特警第一总队部派第一区队两中队开遵化，协同周毓英部堵剿刘匪。长城线喜峰口、兴隆山一带日军密布，协伪军王静修、彭金山旅堵刘桂堂股匪北窜。（十日专电）

天津 日军飞机二架，十七午会在喜峰口上空盘旋，侦察匪踪，多时方去。（二十日专电）

天津　被周毓英部包围于万家峪之刘桂堂股，十七晨二时许，得口外红枪会、大刀会援应，突围窜进遵化境东双城子村，午后侵入金山寺、鸡鸣村、杨庄子、西双城子等五村，缴去民团枪械，焚毁房舍，割断遵化四乡长途电话线。迄十八晨，仍在该处盘踞。周毓英部两中队携轻机关枪四挺，由玉田驰往，增援金山寺。遵化县公安分局十九撤退城内，该局枪械悉为匪缴去。（二十日专电）

北平　遵化电：在流星峪地方盘踞之匪已由团队严密包围。小寨一带之匪人数不多，遵化县政府已派遣大批团队痛剿，该股匪有仍窜出口外势。（二十日）

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 （第三版）

蒋委员长

飞黔转川督剿

龙云与各界人员热烈欢送

刘旅固守会理获奖

滇黔两省已无匪踪

（内容略）

何应钦

检阅晋省军队

主持陕北剿匪事宜

⊙太阳　何应钦今晨八时，在并霸陵桥大教场举行阅兵式，阎锡山、徐永昌、赵戴文、贾景德、朱绶光、孙楚、李服膺、周玳、荣鸿胪暨各将领、各省委等均参加。马延寿任总指挥，各团营连长任分指挥。阎于八时许武装莅场，指挥一切。旋何及刘翼飞等乘汽车至，阎、徐等亲迎至阅兵台上，全体士兵均致最敬礼。继何等下台步行校阅，并致训辞。要点：（一）须明瞭〔了〕保国卫民之天职。（二）遵守纪律，以岳飞为军人模范。（三）要积极研究新学术。（四）要实行新生活。末由刘翼飞致训辞，阎致答辞。十一时许校毕。前往参观者甚众，为并垣近年未有盛况。徐永昌午假新运会集会堂宴何刘及各随从等，邀各将领二十余人作陪。何下午由孙楚等导引，参观西北各工厂。并市各界定明晨九时在海子边自省堂举行欢迎大会。平军分会前派赴陕北参谋团主任毛来，今午由陕北来并谒何应钦，报告陕北匪情，下午赴绥署谒阎。毛定明日偕何返平，俟决定剿匪方针，再度赴陕。（二十一日专电）



殷汝耕访高桥

商谈战区问题

日军开入战区剿匪

遵迁两县团警联防

北平　殷汝耕昨夜抵平后，今晨赴日使馆访晤武官高桥，商谈遵化县剿匪问题。（二十一日专电）

北平　长城沿线之喜峰口、冷口等地，近日有会匪及口外胡匪等滋扰甚剧，计有大刀会、红枪会、抗□军及王继宗、刘桂堂等部之天下第一军等名色，各部合共三千余人。遵化城东近又发现大刀会一队，约百五十余名。各地方当局已纷向冀省府报告，一面飞调地方保卫团及民团等赴长城各口防堵。长城口内各县，连日麇集口外难民极多。（二十一日专电）

北平　唐山电：驻北宁沿线昌黎、留守营等地旧保安队杨毓成〔杨玉成〕部已继续开赴军粮城，于本月二十五前即可全部开拔竣事。至第三总队周毓英部，除大部驻玉田县城外，其驻抚宁、海阳镇等地者，共有两大队，已定本月二十六起，经开平、丰润等地开赴玉田，俾便集中训练。（二十一日专电）

北平　唐山电：新编战区特警张砚田部末批八百人，昨晚由津开抵胥各庄。该部将在胥各庄留二日，二十二即开赴喜峰口及卢龙等处。冀省保安处科长杨景园、陶尚铭及日参谋大木等二十一已离唐赴昌黎。定二十二再赴留守营，开始检阅张砚田部。约勾留四五日，即返津谒于学忠报告。张砚田第二总队队部已于本月十九开始办公。（二十一日专电）

北平　殷汝耕二十日晚由津返平。二十一日晨访日武官高桥，商旧警罗紫宸、冯寿彭两部缩编问题，及接收东陵事宜。关于前者，因手续尚未商定，日期不能确定。后者日前经殷在津与津日军部参〈谋〉长酒井晤谈，接收仅为时间问题。（二十一日中央社电）

天津　长城线各口潜伏小股匪极多，均蠢动。迁安、遵化两县十九日实行联防，团警防线相接，杜匪内窜。（二十一日专电）

天津　喜峰口外魏家河村，十九夜发现郭新生匪股三百余，攻入村内，焚掠一夜，民房数百所，十九化灰烬，男女伤亡者百余，火光照彻遐迩。附近伪军惧匪势盛，不敢剿，任匪饱掠后，二十早退出。（二十一日专电）

天津　冀省府电饬张庆余、周毓英两部，对长城线附近孙永勤、刘桂堂各股匪，务须赶紧搜剿，勿使窜扰。（二十一日专电）

天津　日兵二百余名十九日由撒河桥〔潵河桥〕乘汽车开抵遵化。二十日午后二时，携钢炮机枪，由城内向城东十五里小寨一带进剿孙永勤部，一时炮声震天。遵化县城竟日关闭，戒备极严。（二十一日中央社电）

天津　闻日兵二百已穿越长城而入遵化之停战区域，追击孙永勤部。此间闻此消息，甚以日军又侵入华北为虑。查孙部现驻于距遵化城北约十五里之十里铺。闻日飞机若干架已抵马兰峪之飞机场。又闻今晨有日本军用飞机一架飞过天津，向东飞去。（二十一日路透电）

北平　殷汝耕今晨往访日武官高桥，拟阻止日兵之侵入华北。闻殷向高桥担保，中国当道必竭力剿匪，关东军无需派兵入关。（二十一日路透电）

北平　此间谣言甚炽，但各方面并未接到停战区域发生战事之消息。日兵昨由热河出发，明日可抵遵化。如孙部不降，则战事难免发生。闻日当道曾请中国当局会同驱逐孙氏，但中当局答称，停战区域内之警力足以处理此事，日兵无越入中国区域之必要云。（二十一日路透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　（第三版）

何应钦

出席并欢迎会

（内容略）

遵迁居民

纷向玉丰迁移

日军在停战区内

与孙永勤部冲突

天津　遵化、迁安旁近长城线民户，因剿匪纷向玉丰迁移，难民络绎于途。周毓英部四百名，二十日由玉田开抵遵化城内协防。（二十二日专电）

北平　窜据流星峪刘桂堂部余匪，现藏匿□山中。正举行围剿，即可解决。玉田旧保安队周毓英部定二十三日开回滦榆区昌黎、卢龙、抚宁原防。周部调出玉田，即由蓟县调一区队一大队前往接防。周部今日在玉田举行追悼因清剿玉承组〔王承祖〕部叛兵而阵亡之官兵。（二十二日专电）

天津　驻平日使馆武官高桥二十二午由平来津，晤仪我大木，午后二时半偕到冀省府访于学忠。（二十二日专电）

天津　二十一午十二时二十分，日机一架，自山海关飞抵秦皇岛海阳镇，盘旋半时许折返。（二十二日专电）

长春　今日南关东军司令官电命驻□□之山田部队，对于在停战协定区域内扰乱和平之孙永勤军，彻底讨伐，采取适宜处置。（二十二日电通电）

长春　关东军发表，热河警备队之一部已出动，侦察在停战区域内掠胁之孙永勤军动静。

二十日午后在遵化东八基罗[1]之线山屯〔尖山屯〕附近，遇孙部集团，即取敌对行为，加以攻击，孙部已蒙相当损害。又孙部主力部队似已开始逃往遵化县与蓟县之中间方面。（二十二日电通电）

北平 遵化电话：团队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与大小寨之匪开始接触，相持数小时，匪即不支，纷向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皇开〔皇阁村〕、马甸子等地散窜。流星峪、般岩院〔般若院〕之匪，现仍匿于茅山〔毛山〕内，凭险抵抗。（二十二日中央社电）

北平 此间日武官办事处今日承认，日兵一小队昨日午后在停战区域内与孙部冲突。中日双方当道现准备在天津开会讨论滦东问题，日武官高桥与殷汝耕已因此赴津。（二十二日路透电）

北平 中国保安队与孙永勤部昨夜在遵化城东北四里许开战，孙部向南溃走。中国官场消息：日兵并未加入昨日战争。（二十二日路透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 （第三版）

中日交涉人员

续商剿匪问题

会商毕偕谒于学忠

特警追剿遵化残匪

天津 陶尚铭二十三日早六时半搭平沈通车抵津。午前十时，偕殷汝耕同到省府谒于学忠，报告特警第二总队张砚田部及保安队第二总队杨玉成部换防情形，并讨论遵化刘桂堂匪股剿击各事。二十三午后二时，殷汝耕、陶尚铭偕到日租界常磐旅馆访仪我、高桥、酒井、大木，谈长城线附近匪股孙永勤部清剿事，迄四时方散。（二十三日专电）

天津 遵化吴家沟、毛家峪、王家峪、三里店、松棚营、高家峪、小杨村、孤山子等二十三村，十九为刘桂堂股匪联络大刀会匪攻击，绑去人票二百余名。松棚营全村二百户被焚，仅余平房二间，其他各村悉成瓦砾场。二十匪退据毛山，负隅抗拒保安队。遵化县东北四十里外，遭刘桂堂匪股骚扰，村舍为墟，各村难民哭声载途，均露处野外，竟日不得一餐。（二十三日专电）

天津 仪我、高桥今访于学忠，伪热河日军参议小烟二十三来津晤梅津。（二十三日专电）

天津 二十三午后，中日双方负责交涉人员在常磐旅馆会商后，由殷陶二专员，伴仪我、高桥、大木到省府访于学忠，交换战区内各事意见，谈洽甚圆满。高桥晚车离津回平。仪我谈，马兰峪交还，因有问题未决，暂缓实行。战区内非法日韩人取缔，已由领馆助华方办理。近有一批被捕，即其明证。禁白银出口事，榆特务机关已表示诚意协助。（二十三日专电）

[1] “kilometer”之音译，即“公里”。

北平　遵化电：大寨方面之匪，经保安队击溃后，已窜入迁安县境。特警第一总队区队长张耀明〔张含明〕亲率第三大队尾随追击，滦榆方面亦调派一大队迎头堵击，不难聚歼。在茅山〔毛山〕盘踞之刘桂堂残匪，经团队追剿后，现已逃至洪山口左近，人数只数十名。（二十三日专电）

北平　陶尚铭、殷汝耕今晨在津同赴省府谒于学忠，就剿匪问题及新旧保安队换防经过，有详尽报告，并请示一切。下午赴日租界常磐旅馆，访日关东军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暨平日使馆武官高桥，作重要会谈。津日驻屯军参谋大木等亦将列席。（二十三日专电）

北平　高桥二十三返平，将再赴津。（二十三日专电）

北平　此间消息灵通之华人对于不设军备区域之局势颇抱悲观，恐巨数日兵一入该区，将作长驻计。据平时可靠方面消息，日当道近曾照会中国当道，谓将派兵千名开入该区，虽迄今仅有小队开入，众意日当道似不致更变遣派大兵之决议。但中国当道现正竭力商劝日方勿多派兵，以免引起居民之恐慌。（二十三日路透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第三版）

遵化剿匪问题

在津会商已毕

殷陶仪我分别离津

于学忠亦赴平报告

新特警与保安队换防告一段落

天津　仪我二十四午前十一时到冀省府访于学忠，仍谈长城线剿匪事，希望省府转饬特警及保安队在迁安三头营〔三屯营〕以南防堵，务使孙永勤不南窜。于学忠表示决力剿击，以维持战区治安。仪我满意而去。（二十四日专电）

北平　日使馆武官高桥前赴津与陶尚铭等会商遵化剿匪问题，事毕，昨夜来平。日关东军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由榆赴津谒于学忠，对遵化剿匪事有所表示，并与殷陶高桥梅津会商剿匪问题。因已商有办法，定即离津返榆。（二十四日专电）

天津　陶尚铭二十四午离津返唐山。殷汝耕二十四早车返平。仪我定二十四夜返山海关。于学忠为谒何报告特警换防经过，兼祝王树棠母寿，二十四晚车赴平。（二十四日专电）

北平　殷汝耕今午返平。据谈，此次在津，系会同陶尚铭与日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今〔津〕日驻屯军司令部会商战区剿匪问题。我方曾对日方表示，现在战区内我方保安队人数甚多，少数土匪之剿灭绝对不成问题。孙永勤部现已逃迁安，张庆余部七中队正追击中，张砚田部六中队亦正迎头截击，不难歼灭。余定二十七日赴通，主持蓟密区行政会议开会事宜。定今



日下午谒何，报告此次在津会谈经过。（二十四日专电）

天津　战区内驻玉田保安第三总队周毓英部，二十四日已开始移出战区。玉田一部集通州换防，南开丰润、遵化一部俟下周完毕剿匪工作时开出。（二十四日专电）

天津　于学忠谈，特警与保安队换防事终了，范景华部全数集通州换服装，下周南下复员。杨玉成业完全开抵军粮城。周毓英部现正移动中，旬日内开毕。（二十四日专电）

北平　蓟密、滦榆两区新警接防后，原驻抚宁、卢龙、昌黎及临时开入玉田剿匪之周毓英部一总队今日起陆续撤退，向杨柳青集中，归还建制。（二十四日专电）

大连　据关东军息：协助日军攻入长城之"满"军日人军官原口骑兵中尉，于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在遵化东南郊与孙部对阵时，被击大腿，后即殒命云。（二十四日华联社电）

长春　协同日本军讨伐蟠居〔盘踞〕敦化〔遵化〕附近义军之"满国"骑兵，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在敦化〔遵化〕东南二十三基罗地点遭遇有力义军。经激战后，虽将义军击退，但骑兵中尉原口松雄因站前线奋战，致中弹阵亡。（二十四日电通社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26日 （第三版）

遵化秩序已恢复

日军向撒河桥〔澈河桥〕撤退

孙永勤部窜喜峰口

孙有被特警捕获说

天津　二十四晨日军自遵化、迁安向撒河桥〔澈河桥〕撤退，遵化一带秩序已恢复，城门开启解严。孙永勤部廿三夜经日军围击，死伤甚重，残部二百窜入迁安山中，日军仍在搜索。传孙永勤已经我特警捕获，解遵化县府。（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孙永勤部与保安队、特警及民团等接触，仅余二百余人，逃往喜峰口附近之深山中。孙永勤本人率队百余人逃至喜峰口，二十四被围，并传孙被捕。（二十五日专电）

天津　蓟密区长途电话杆线二十四晚被风吹断甚多，二十四晚七时许电话不通，现正派员修理。（二十五日专电）

天津　官息：长城线遵迁一带剿匪计划，自商定办法后，日军积极行动，在遵化北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将孙永勤部包围，战甚激烈。孙部受创颇巨，有向东窜模样。（二十五日专电）

天津　战区保安第一总队刘佐周，定下月一日召开前线夏防会议，不分畛域，剿匪联防。（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蓟密区署由平、通至马兰峪、遵化长途电话昨夜发生障碍，北平仅能与三河通

话。据调查系电杆被折，今日尚未恢复原状。（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于学忠今晨谒何应钦，报告冀省最近军政情况及战区剿匪经过。（二十五日专电）

天津 遵化股匪孙永勤部，经连日保安队及民团等围剿，刻大部已溃散，残余窜入深山中。会剿各队仍跟踪追击，日内可告肃清。至遵化日军，以孙匪零散无力，已开始向撒河桥〔潵河桥〕方面撤退。（二十五日中央社电）

北平 孙永勤匪部逃窜迁安三屯营各地后，现仅剩百余人，拟向东北续窜。蓟密、滦榆两区特警在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一带堵剿，日内即可完全消灭。（二十五日中央社电）

北平 近来，遵化县东北沿长城边区，匪患甚炽，枪杀焚烧，地方损失颇巨。惟匪军等情况，各方多不明瞭〔了〕，故多所揣测。连日从关系方面调查，得其实情。先是口外著匪王彦如及热匪孙永勤两部约数百人，受日军压迫，窜至长城附近。我方团警闻讯，正欲前往长城附近堵击，乃〔以〕五月五日午后三时，我驻遵化之保安王大队长接到日军通知，谓日军对孙部残匪决定铲除，惟恐发生误会，请该队暂移距长城二十五里处，罗文峪方面防务由日军担任等语。我保安队于五日晚间撤回遵城，日军即设司令部于罗文峪内。未几日司令部迁设撒河桥〔潵河桥〕北三道河，并未通知我方派警接防。我方派员与日军接洽填防中，而孙匪遂乘虚于十五日窜入关内，到大屯、侯家寨等地纵火焚烧，奸淫掳掠。我地方当局因恐匪势坐大，贻害地方，已与日军商妥协剿办法。连日以来，我团警分布于各要地，搜索兜剿，匪军已渐形不支，扑灭之期，当在不远。至外报所载遵化县长有庇护孙匪部之说，殊与事实完全不符。关于协剿孙匪事，我当地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我团警连日均与匪在接触中。（廿五日中央社电）

长春 川岸部队二十四日晨在毛山沟包围孙军四百余人，日军以步兵炮扫射。据关东军发表，孙军在此战斗阵亡三百人，孙永勤本人及参谋长官亦同时战死。日军方面死三人，重伤二人，轻伤一人。（二十五日日联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27日 （第三版）

周毓英部

向杨柳青集中

孙永勤传已击毙

天津 战区保安第三队周毓英部一批队伍已由玉田开抵通县，正征车辆，准备向沧县开去。民众因该队纪律佳，特举行盛大欢送会。（二十六日专电）

天津 官息：孙永勤部二十四日在迁安三头营〔三屯营〕遭日军围击，孙本人及其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确已阵亡。（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孙永勤匪部在大茅山〔毛山〕被夹击，伤亡甚重，孙本人亦负伤，余匪均逃散，

刻正由团队搜索中。（二十六日中央社电）

北平　日方于孙永勤部窜扰遵化时，曾派遣以下各部开入战区协剿。计一、热河警备队秋原旅团。二、驻热河关东军松井部队。三、驻喜峰口日军侦察队。四、驻凌源日本守备队。五、驻马兰峪山田部队等。该日军等以孙部已全部溃散，决即撤出长城线外。岳开先今晨由察来平，料理事务。察省日军事联络员松井今晨由张垣来平，与该国使馆接洽事务，日内即返察。（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于学忠谈，孙永勤匪部经夹击后，伤亡颇重，据报告孙本人有已被杀说。冀省府迁保定，正在开始筹备，预定七月一日合署办公同时实现。战区内旧保安队周毓英部业令调出，现已徒步开动，向杨柳青集中。本人定明日返津。（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日本热河警备队秋原旅团一部因孙永勤部队扰乱战区，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开出动，并有一部越入长城线追击。松井部队亦联合当地之中国警察队向茅山〔毛山〕及三屯营等地包围孙部，同时驻马兰峪之日本侦察队百余名亦于二十四日在尖山屯与孙部发出接触。以上日军出动事件，平日使馆武官屋曾向中国官宪声明，谓关东军为彻底地歼灭该部故，而一时进入长城线以南地区，是乃出于不得已等语，故中日双方均极谅解。（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古北口办事处主任霍实，二十六日来平，谒殷汝耕报告地方情形。定二十七日赴通县，出席蓟密区行政会议。据谈，古北口日军自四日由石井大队长率领大部分部队出关，现尚未返防，由该队隈部山炮队长留守。地方治安，因我警察维持得力，甚为安谧。又古北口日军连日戒严，对于往来行人，检查甚严。（二十六日中央社电）

北平　旧警周敏英〔周毓英〕部，自玉田开拔后，现正在途中，今明可抵杨柳青。蓟县特〈警〉一大队二十五日开玉田接防。冯寿彭、罗紫宸两部缩编日期仍未决定。（二十六日中央社电）

长春　关东军发表，川岸部队，五月初旬以来，讨伐高邑县之匪。乃忽有自称救国团之孙永勤部约一千余，出入长城内外。山田队长乃分散配置各部队，开始讨伐。二周间来，孙匪受大损失，遗弃尸体数百而逃。孙永勤逃长城外，其部下数百于十八日集中遵化附近。川岸队长始决意讨伐，即命山田队长开始行动。二十四日夜冒雨行军，在屯山沟〔毛山沟〕高地开始炮击。二十五日上午零时十五分歼灭孙部，遗弃尸体二百余具，孙永勤及其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之尸体亦已发见。日军田边少尉及下士官一名战死，负重轻伤者九名。（二十六日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28日　（第三版）

冀省府令

遵迁妥筹善后

日内日军开始撤退

于学忠谒何后返津

殷汝耕赴通主持

蓟密区行政会议

天津　遵化、迁安两县受刘桂堂、孙永勤两部蹂躏，民逃财散，各村被焚掠，多为焦土。冀省府特电两县长，妥为安抚，并协助地方士绅，办理恢复并救济工作。受害灾情，速查明详报。（二十七日专电）

天津　蓟密区行政会议定二十八晨召开。会场在通县蓟密行政专员公署，会期三日至五日。各种提案约七十余件，侧重夏防联络、民团整理、清剿土匪、绥靖地方。殷汝耕二十七午后已自平前往主持。（二十七日专电）

天津　进抵迁安三屯营一带剿匪日军，二十六日开始向马兰峪、撒河桥〔潵河桥〕、建昌营、喜峰口撤退。孙永勤溃部，由我特警第一总队第一区队张含明负责清剿。各口日军仍严密防堵，惧其外窜。（二十七日专电）

北平　遵化电：日军在口内协剿孙永勤之各部，因孙股已被击溃，昨日起分别撤退，同时请求我队长张庆余分代为搜索残匪。（二十七日专电）

北平　殷汝耕谈，孙永勤股已击溃，出动协剿之日军已分别向撒河桥〔潵河桥〕、马兰峪、古北口撤退。地方损害情况，尚未接到报告。蓟密区行政区会议，准明日开幕。本人今赴通县主持，各县县长均亲出席。除提案七十余件外，由公署交议者十余件。会期定三日，但必要时得延长两天。（二十七日电）

北平　于学忠今晨谒何，将孙永勤股匪击溃情形有所报告，下午返津。（二十七日专电）

北平　昨晨平市发现怪飞机，比经日使馆某武官向关系方面声称，该机系飞战区内侦察孙匪，并无其他用意。（二十七日专电）

北平　日热河守备队两联队，前因追击孙永勤部入关，现尚留驻战区。日使馆秘书渡边今日通知我方，尚未撤退。（二十七日专电）

北平　遵化电：越长城线在口内剿匪之日军，今日起开始撤退。除在各口外扼守者不计外，出动剿匪之日军，只有撒河桥〔潵河桥〕、马兰峪、古北口三处之驻屯军，人数约有四五百名，预定二十八日可完全撤尽。我方特警张庆余部，业在搜索余匪。地方破坏情形，正调查中。城内逃难农民，二十八日起分别归乡。（二十七日专电）

天津　津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二十六夜十二时赴山海关，即去长春晤林陆相。（二十七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29日 （第三版）

蓟密区

行政会议开幕

日军完全退出口外

孙永勤击毙已证实

遵化人民请求救济

天津 （略）

天津 遵化于家沟、三屯营，此次因剿匪，村舍遭炮火击毁过半，村民均逃散。县属各机关法团联衔呈县府，转请军分会、政整会、冀省府速拨款救济。刘桂堂残匪现据遵化北毛山峪山险，凭藉旧二十九军抗日时遗留阵地，对官军顽抗。张庆余部特警第一总队因缺乏山炮重火器，进剿困难，已电省，请转向日方交涉，准许运重火器前往。长城洪山口以外，现有日驻马兰峪步兵一部，防刘桂堂匪部北窜，对我方表示协助剿击。（二十八日专电）

北平 遵化兵燹后，损失奇重，县长何孝怡派员调查灾况。孙永勤部被剿溃散后，复有王彦如匪部在遵化县东北之大夹地〔大块地〕一带滋扰甚剧，该地农民纷纷外逃。地方当局已调集张砚田、张庆余部各二中队及民团二百人，驰往会剿。（二十八日专电）

北平 （略）

天津 （略）

天津 遵化电省：孙永勤与其参谋宫有元〔关元有〕确已死，尸体在遵迁交界鸡鸣村野地内寻得，已经土人掩埋，孙衣襟绣有姓名，并经人指认无讹。遵迁境内业无孙部。截至二十七晚，越境剿匪日军已完全退出长城外。迁安电省：孙永勤残部二百余，二十四日向长城外窜逃。遭各口日伪军截堵，二十七潜回，窜至长城南茅山〔毛山〕。我特警第二总队第三区队李秉钧部已派出两中队前往搜索。（二十八日专电）

北平 （略）

北平 遵化电话：孙永勤战死说已证实，缘孙套有臂章，上书“孙永勤”字样，系于机枪扫射中殒命。追随孙左右之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同时战死。该两尸体均埋于乱岗中。遵化、迁安县境内已无匪踪。刘桂堂残匪现在洪山口外，日方允负责剿办。（二十八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5月30日 （第三版）

长城各口

日军仍未撤退

北平 马兰峪电话：前开遵化追击孙永勤部日军，现因孙部已全被击溃，今起分别向长

城撤退。长城各口马兰峪、罗文峪等处，仍驻有日军。（二十九日专电）

天津 （略）

天津 （略）

日军游行津市

天津 津日军步兵百余，全武装，二十九日午后二时沿河北各街游行，并携有钢炮三门。午后四时，复有装甲汽车二部，载重汽车一部，有士兵数十搭乘，开到河北各街游行。在金钢桥停一时，始驶回海光寺兵营。（二十九日专电）

天津 津日军参谋长酒井，二十九午前九时一刻赴平访谒我当局，及晤平使馆武官高桥。（二十九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6月2日 （第三版）

遵化县长

电告匪灾损失

天津 遵化县长何孝怡电省：此次受刘桂堂、孙永勤两匪股骚扰，县北松棚营一带二十余村悉毁于炮火，民逃财散，盖藏皆空。现匪犹未去远，后患堪虞。三十、三十一两日，各有日机两架，沿山海关低飞至长城线遵化、迁安边境，侦察孙永勤残部。三十日并有一架飞抵唐山，盘旋多时。（一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6月3日 （第三版）

日关东军部发表

剿灭孙匪经过

北平 日关东军司令发表，热境孙永勤匪残部及长城线三屯营西北方十二里之柴伏厂〔柴户场〕及毛山沟等地之孙刘合股残匪，依照中日战时所构筑之堑壕顽抗，与日本军作战。当时由川岸部队开始攻击，将匪包围，集中炮火，越过险艰之山地，逐次压迫匪众，遂完全占领该高地。日军虽有相当损害，孙部已完全被剿灭。孙匪残部共约二百余人，由孙之参谋长朝治源〔关元有〕率领。韩〔关〕亦被毙。日兵死少佐一名、下士三名、兵十名，伤者颇不少。（二日专电）



中华民国24年6月4日 （第三版）

殷汝耕谒于

商承遵迁善后

于令殷传达中日意见

酒井奉命再赴平晤何

天津 （略）

北平 （略）

北平 （略）

北平 古北口驻守日军石井部队，前开赴兴隆协助剿匪，定本月十五日前撤回古北口原防。古北口地方治安，仍由密云佐治局警察维持。（三日专电）

北平 日军两联队前追剿孙永勤部，入战区后，散驻遵化、迁安各地，现均集中罗文峪、撒河桥〔漖河桥〕迤东一带。榆关日军近增厚，但均无何动作。（三日专电）

天津 （略）

《新闻报》关于“剿灭”抗日救国军的报道

中华民国24年5月4日 （第三版）

战区特警定十日换防

两总队长已离津回防准备开拔

队部驻地确定换防期规定一周

▲天津　特警换防定十日实行，省府已令两张总队长准备开拔。陶尚铭谈，特警换防指挥权归省保安处，两专员署负调督之责，每月代为转发饷项。顷专员公署内将调各队官佐办理各事，省府并派一人管军需。各队番号将改易，统称为河北省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周毓英、赵雷、刘佐周分称一二三四五总队长。

▲天津　张庆余部总队部设蓟县，第一区队部亦设该处，第二区队部设顺义。张砚田部总队部设留守营，第一区队部设迁安，第二区队部设卢龙。换防期缩短为一周。

▲天津　三日早，特警第一、二两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离津回防，办特警东开各事，俟令下后移动。

中华民国24年5月6日 （第三版）

日军入古北口

开石匣镇

为堵剿兴隆县教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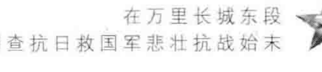
▲北平　古北口五日晚电话：日军队长石井，晨率步马炮兵五百余名，由〈古北〉口开口内三十里石匣镇，分驻各商店，当午一部东开墙子路口。传因兴隆县双洞子发现教匪千余，故日军开来堵剿。

中华民国24年5月7日 （第四版）

热义军攻承德

已占下板城

▲北平　古北口讯：热绅孙永勤近组义军千二百余人，进攻承德，四日已占承德附近之下板城。经〈驻〉承第七师团长杉原急调古北〈口〉日军及察东伪军李守信部向承增援，古北口日军已出动。



中华民国24年5月8日　（第四版）

中日会商决定

战区换防十日实行

滦榆区特警驻防问题解决

仪我高桥等谒于学忠商谈

昨夜再作最后会商

（内容略）

中华民国24年5月9日　（第三版）

战区换防命令已下

十一日两纵队分别开入战区

范景华杨玉成两部调出战区

▲天津　八日晨殷汝耕返平，陶尚铭定夜车回唐山。战区队伍换防事，在津会商，一切圆满解决。特警队东开换防令，八日早由省府正式颁下，同时并下令战区内保安第一总队范景和〔范景华〕部、第二总队杨玉成部，于新队伍开入接防三日内，随车开出战区。周毓英部除驻玉田两大队外，驻抚宁、东亭两大队十一日开向遵化、迁安填防，担任剿匪工作，暂缓开出战区。

▲天津　冀新编保安队已定名为河北省特别警察，定十一日开入战区换防。战区保安队杨玉成、范景华两部同时调出。

▲天津　冯寿彭部保安队将于十五日前缩编为一大队，开夏甸〔夏垫〕驻防，受李允生节制。八日夏甸〔夏垫〕、燕部〔燕郊〕驻屯保安队实行缩编。

▲天津　新特警队东开暂仍用河北省特种警察第一、二总队名义。张砚田以北宁车辆未备妥，须十三日动员。张厅余〔张庆余〕部征用大车困难，延至十一日东开。

▲北平　战区保安队改称河北特种警察，共分五大队，由滦蓟两专署统辖，最高指挥权则属冀省府保安处。新队定十一日开拔。

▲中央社八日北平电：关于新旧保安队交替程序及日期，经中日人员在津商洽后，现已完全确定。仪我高桥七日分返榆平。殷汝耕八日晨亦返平，下车后即赴政整会谒王克敏，报告一切。据探悉，冀省府六日下两令，新旧保安队定十一日换防。第一总队张庆余部，十一日由蔡村徒步开赴蓟县集中，然后再出发密云、顺义、怀柔、三河各县接防，总队部设蓟县。第二总队张砚田部，同日由沧州乘车开赴唐山集中后，再分往滦县、昌黎、抚宁、迁安、丰润各县接防，总队部设留守营。蓟密区旧保安队，除李允生部缩编后仍驻燕郊、夏垫，周毓英部暂驻玉

田，办理清乡外，其驻在顺义、怀柔、三河一带之范景华部，先调至南苑整理后，开拔南下。滦榆区除赵雷、刘佐周两部仅加以整理，暂不调防，冯寿彭部日内缩编外，其驻在滦县之杨玉成部，则调回军粮城整理后，再开赴他处训练。旧队均于新队到达，将防务交替竣事，始离开原防。新队番号一律改为河北省特种警察队，人数枪械均按原议，并无增减，出发前亦不再点验。所有出发时应需之车辆粮秣暨驻防房舍，连日均在积极准备中。滦榆区因手续较繁，或须稍迟一二日出动，亦未可知。陶尚铭、殷汝耕定明后日亲赴唐山、通县调度。至赵雷、刘佐周此后驻地，津会已商妥，不成问题。

中华民国24年5月10日（第四版）

殷汝耕谈

河北特警五大队

今日开入战区换防

接收杨范周等三部防地

李允生部十一日可编竣

殷定今日赴通调度

▲北平　殷汝耕谈，河北特警共分五大队。第一队张砚田部，二千五百名；二队张庆余部，二千五百名；三队刘佐周部，二千名；四队赵雷部，二千名；五队李允生部，一千名。共一万名。一二两队定十日开拔，接收旧保安队杨玉成、范景华、周毓英三部之防地。杨范两部先开出战区，周部月终开出。张砚田部分两区队，十日先开一区队至通县、三河、蓟县、顺义、密云等接防，余一区队暂留蔡村，准备接玉田周毓英防地。余（殷汝耕自称）定十日赴通，调度一切。李允生部十一日可编竣，防地尚未定。

▲天津　新编特警队张庆余部，准十一日徒步开玉田，再分向蓟县、顺义、密云接防，限五日内接防毕。殷汝耕十日去通州，布置过境各事。

▲天津　九日午后三时十分，津浦路备敞篷车一列廿节，开沧州接运张砚田部特警总队，开战区换防。九日夜复有北宁车一列，续开沧州，亦为运输张部。

中华民国24年5月20日（第四版）

热河义军兵团奋起

日伪军应战损失奇重

▲日调空军往轰炸义军大受打击

▲一面在长城线布防阻义军入口



▲北平　某方情报：热省义军孙永勤部及热东凌源一带民团数万人近与日伪军激战，日伪军死亡达四五千人。日方愤极，调空军轰炸。孙部颇受损失，拟逃口内。日军已在古北口、喜峰口一带严密布防，以便围击。高桥日前由平飞承德，与此事有关。闻日方拟请我方注意长城线内防务，阻止孙部入口。

中华民国24年5月21日（第四版）

特警换防告竣

蓟密区定期开行政会议

讨论建设交通等事宜

▲北平　殷汝耕二十日晚由津返平，谈蓟密区特警接防大致已竣，专署定二十八日在通召开行政会议，所属十县长均参加，分建设、交通、教育、治安四组讨论。会议三日至五日。

▲天津　华北经济科长杨鲁园，二十日偕陶尚铭检阅丰润开平赵雷部毕，转玉、蓟校阅张庆余部，又赴卢龙点验张砚田部。

▲天津 殷汝耕十九日由平来津，午谒于，报告新编保安队开入战区情形。

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第五版）

日军藉口剿匪

实行开入停战区域

我方极力阻止担保匪由我剿

日机数架已开抵马兰峪机场

▲路透社二十一日天津电：闻日兵二百已穿越长城而入遵化之停战区域，追击孙永勤部。此间闻此消息，甚以日军又侵入华北为虑。查孙部现驻于距遵化城北约十五里之十里铺。闻日飞机若干架已抵马兰峪之飞机场。又闻今晨有日本军用飞机一架飞过天津，向东飞去。

▲路透社二十一日北平电：殷汝耕今晨往访日武官高桥，拟阻止日兵之侵入华北。闻殷向高桥担保，中国当道必竭力剿匪，关东军无需派兵入关。

▲路透社二十一日北平电：此间谣言甚炽，但各方面并未接到停战区域发生战事之消息。日兵昨由热河出发，明日可抵遵化。如孙部不降，则战事难免发生。闻日当道曾请中国当局会同驱逐孙氏，但中国当局不允，答称，停战区域内之警力，足以处理此事，日兵无越入中国区域之必要云。

协剿遵化残匪

特警第一大队已开往

匪股准备回窜口外

▲中央社二十一日北平电：据蓟密专署息，遵化流星峪之匪，仍在包围中，情形甚佳。特警第一大队二十日已开往遵化协剿，二十一日可到达。外传匪首王彦如已被擒解津，此间尚未得确报。般若院之匪正设法扑灭，匪因官方堵剿甚急，准备回窜口外，不致影响地方治安。

特警接防竣事

▲中央社二十一日天津电：新编特警第二总队全部，已开拔竣事。除总队队部设留守营，第三区队部设抚宁，第四区队部设迁安，区队下之各大队分驻海阳镇、三屯营、卢龙各地。陶尚铭以特警接防竣事，定日内来津向省府报告。

喜峰口外匪警

▲天津　十九日夜，喜峰口外魏家河村为匪股郭新生众攻入，焚房屋数百幢，伤亡村民百余，火光烛天，无人扑救。廿日早匪方退。

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　（第三版）

蒋委员长飞抵重庆

杨贺等晋谒报告军政近况

日内将飞蓉坐镇督剿残匪

（内容略）

江油围解中壩收复

剿匪军正向光雾山追击中

蒋电嘉奖刘元璋晋级中将

（内容略）

日兵追击孙永勤部

▲遵化县城关闭戒备极严

▲中央社二十二日天津电：日兵二百余名十九日由撒河桥〔澈河桥〕乘汽车开抵遵化。二十日午后二时，携钢炮机枪，由城内向城东十五里小寨一带进剿孙永勤部，一时炮声震天。



遵化县城竟日关闭，戒备极严。

▲中央社廿二日北平电：遵化电话，团队廿一日下午二时与大小寨之匪开始接触，相持数小时，匪即不支，纷向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皇开〔皇阁村〕、马甸子等地散窜。又流星峪、般岩院〔般若院〕之匪，现仍匿于茅山〔毛山〕内，凭险抵抗。

▲日联社廿二日天津电：据驻屯军接到报告，马兰峪守备队山田部队之斥候兵，廿一日下午由遵化出动尖山屯方面，发见匪贼一千余人，即时全体出动讨伐该匪。

▲路透社二十二日北平电：中国保安队与孙永勤部昨夜在遵化城东北四里许开战，孙部向南溃走。中国官场消息：日兵并未加入昨日战争。

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 （第四版）

蓟滦两区特警

夹击孙永勤匪部

现正向迁安追击残余决难漏网

殷陶昨抵津访高桥商战区问题

传日军将有千名开入战区

▲中央社廿三日北平电：蓟密专署息，窜扰遵化大小寨之孙永勤匪部，窜散迁安三屯营一带后，即由特警第一总队派第一区队长张翰明〔张含明〕，率第三大队向迁安追击，滦榆区特警亦派一大队夹攻，余匪决难漏网。又逃匿茅山〔毛山〕之王彦如匪部，经团队包剿，仅剩数十名，于廿二日窜洪山口。

▲天津　滦榆专员陶尚铭、蓟密专员殷汝耕，廿三日午分别由唐山、北平来津，谒于主席报告新保安队换防情形，下午与日武官高桥、仪我、酒井、大木等谈战区问题。

▲路透社二十三日北平电：此间消息灵通之华人，对于不设军备区域之局势颇抱悲观，恐巨数日兵一入该区，将作长驻计。据平时可靠方面消息，日当道近曾照会中国当道，谓将派兵千名，开入该区。虽迄今仅有小队开入，众意日当道似不致更变派遣大兵之决议。但中国当道现正竭力商劝日方勿多派兵，以免引起居民之恐慌。

▲中央社二十三日天津电：仪我二十三日午后，由殷汝耕、陶尚铭陪赴省府，谒于学忠，对战区一般问题有所协议。据魏鉴谈，孙永勤部自抵遵化后，日军开遵化，我方特警即抵遵化南部追剿。刻孙部已窜迁安，遵化由特警接防。

刘匪即可肃清

已逃窜遵化县北

▲北平　遵化电话：刘桂堂部残匪，经围剿后，廿二日已逃窜县北洪山口。仅余数十名，即可肃清。

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第四版）

殷汝耕谈

孙匪日内可平

日军调动系寻常事

并无外传特殊意味

▲北平　殷汝耕午由津返平谈，会匪孙永勤股现窜迁安境，特警正追剿，日内可平，不至扩大。日军平时在长城线常有调动往来，此次喜峰口、马兰峪一带日军调动亦系普通性质，无外传之特殊意味。

▲日联社廿四日北平电：遵化、迁安两县保安队，由东、西、南方夹击孙永勤部，关东军川岸部队现由北方向三屯营前进。

中华民国24年5月26日（第四版）

军分会公布

孙部窜扰口内经过

孙部被夹击狼狈不堪歼灭在即

遵城解严出力特警传令嘉奖

孙永勤有已被捕获说

▲北平　军分会廿五日晚公布遵化剿匪实情云，口外著匪王彦如及热匪孙永勤两部约数百人，前受日军压迫，窜长城附近。我团警正欲堵击，日军忽于五日通知我驻遵保安队王大队长，谓日军对孙匪决派员入口剿除，为免发生误会，请该队暂撤退至距长城廿五里处，将罗文峪方面防务让日军担任等语。该队五日晚乃撤回遵城，日军即进驻罗〈文〉峪，并设司令部。旋又移设撒河桥〔潵河桥〕北三道河，并未通知我方接防罗〈文〉峪。我乃派员与日军接洽接防，孙匪遂乘虚于十五日窜入口内大屯、侯家寨等地，纵火奸淫。我地方当局恐匪势坐大，贻害地方，已与日军商妥协剿办法。连日我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现正分布各要隘，与匪接触中。匪已渐不支，不远当可扑灭。连日报载种种，多系揣测。

▲天津　孙永勤匪部廿三日在遵化北鸡鸣村、三家店〔三里店〕被包围，与日军战甚烈，



损失颇重，廿四日向撒河桥〔潵河桥〕窜逃。孙本人已有被我保安队捕获说。遵迁一带，秩序已复。日军向建昌营、撒河桥〔潵河桥〕开拔。遵化城解严。

▲北平　关系方面息：遵化匪已平，传孙二十四日被捕，将解津讯办，但难证实。闻剿匪出力特警，冀省府已传令嘉奖，伤亡者从优抚恤。

▲中央社廿五日北平电：孙永勤匪部逃窜迁安三屯营各地后，现仅剩百余人，拟向东北续窜。蓟密、滦榆两区特警，在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一带堵剿，日内即可完全消灭。

▲华联社廿五日长春电：据关东军息，驻热日军昨日拂晓开始攻击孙部，在马兰峪关与之剧战。孙部溃退，弃尸三百。日军殒命军官兵卒各一名，重伤十二名云。

▲北平　北平至遵化电话廿四日晚六时起不通，传在三河附近发生障碍。

▲北平　蓟密区驻平办事处息：遵化股匪东南三家店〔三里店〕、鸡鸣山一带，由我特警负责该处，二十四日已无匪踪。匪现窜遵北茅山〔毛山〕附近，有出口企图。

▲中央社廿五日天津电：遵化股匪孙永勤部，经连日保安队及民团等围剿，刻大部已溃散，残余窜入深山中。会剿各队仍跟踪追击，日内可告肃清。至遵化日军，以孙匪零散无力，已开始向撒河桥〔潵河桥〕方面撤退。

中华民国24年5月27日　（第四版）

于学忠谈

日军溃退三屯营以北

孙永勤确已阵亡部队溃散

蓟密区特警撤回遵化安谧

日田边少尉下士官一战死

▲北平　于学忠谈，余二十六日晨接遵化电话，谓孙永勤确已阵亡，部队已溃散。日军刻退三屯营以北。遵化安谧。

▲北平　蓟密区署息：日军二百余名，廿四日在罗文峪将孙永勤部击散后，当日即撤回长城线外。蓟密区特警七中队，因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一带已无匪踪，廿四日亦撤回遵化城内。

▲电通廿六日电：长春电，关东军发表，川岸部队，五月初旬以来，讨伐高邑县之匪。乃忽有自称救国团之孙永勤部约一千余，出入长城内外。山田队长乃分散配置各部队，开始讨伐。二周间来，孙匪受大损失，遗弃尸体数百而逃。孙永勤逃长城外，其部下数百于十八日集中遵化附近。山田队长廿四日夜冒雨行军，在屯山沟〔毛山沟〕高地开始炮击。廿五日上午零时十五分歼灭孙部，遗弃尸体二百余具，孙永勤及其参谋长有元〔关元有〕之尸亦已发见。日军田边少尉及下士官一名战死，负重轻伤者九名。

▲中央社廿六日北平电：于学忠二十六日晨在寓接见记者，谈冀省近况，定二十七日返津。西班牙公使嘎利德晚宴于，联欢。

▲中央社廿六日北平电：孙永勤匪部在大茅山〔毛山〕被夹击，伤亡甚众，孙本人亦负伤，余匪均逃散，刻正由团队搜索中。

古北口地方安谧

▲中央社廿六日北平电：古北口办事处主任霍实，廿六日来平谒殷汝耕，报告地方情形。定廿七日赴通县，出席蓟密区行政会议。据谈古北口日军，自四日由石井大队长率领大部分部队出关，现尚未返防，由该队隈部山炮队长留守。地方治安，因我特警维持得力，甚为安谧。又古北口日军连日戒严，对于往来行人检查甚严。

特警接防玉田

周毓英部开抵通县

▲中央社廿六日北平电：旧警周毓英部，自玉田开拔后，现正在途中，今明可抵杨柳青、蓟县。特一大队二十五日开玉田接防，冯寿彭、罗紫宸两部缩编日期仍未决定。

▲天津　周毓英部二十四日晨离玉田开抵通县，将徒步开往沧县填防。

中华民国24年5月28日（第四版）

张庆余奉令

清剿孙匪残余部队

日军全数向长城线撤退

省府令查遵迁两县损失

▲天津　省令特警第一总队长张庆余部第一区队张含明，负责搜剿遵迁境内孙永勤溃部。廿六日起，迁安三屯营一带越境剿击孙永勤部日军，已开始向古北口、马兰峪、撒河桥〔潵河桥〕、建昌营撤退，惟喜峰〈口〉、罗文峪日军仍未退，防堵孙残部窜入伪境。省政府令遵化、迁安两县调查此次受匪灾情形，速为详报，并饬令县长妥慎安抚流亡，恢复秩序。

▲北平　遵化电话：孙永勤、王彦如等已剿平，仅茅山〔毛山〕口有残匪数十名，我特警已往前搜索。入口日军已全部撤向长城线。遵化无日军。

▲中央社廿七日北平电：殷汝耕谈，孙永勤匪部已解决，告一段落。日军大部开回各口原防，尚有一小部会同特警搜剿余匪。遵化、迁安两县地方损失，俟派员调查后再谋补救。

中华民国24年5月29日（第五版）

孙匪确已击毙

尸体在遵迁交界发现

残部由特警继续追剿

▲天津　省府接遵化县长电，孙永勤与其参谋宫有元〔关元有〕尸体，在遵迁交界旷野寻获，乡人已掩埋。孙著衣留有姓名，证明确已阵亡。残部二百余，二十七日受长城各口日军截堵，复回窜遵迁北边交界处。茅山〔毛山〕特警已开往搜索。

▲中央社廿十日北平电：遵化来人谈，孙永勤股匪现已肃清。孙击毙后，首级为日方割去。现该县安谧如恒。前由外乡逃往县之难民，已由县府设收容所收容，约三百余人。县境仅有刘桂堂股匪百余人，枪弹无多，仍啸聚于茅山〔毛山〕一带，近日尚无四出抢掠情事。但因该山形势险峭，我方无重炮大炮，故扑灭颇感不易。

刘桂堂残部

盘踞毛山峪

日军屯洪山口外监视

▲天津　遵化县东北大块地及毛山峪为刘桂堂残匪盘踞，日方声言堵击，留马兰峪步兵一队，屯洪山口外监视。特警张庆余部，因无重火器，进攻困难，电省请向日方交涉，准运入山炮数门。刘桂堂残匪所据毛山峪，利用廿九军抗日遗留战壕，顽抗不退。

中华民国24年5月30日（第四版）

玉田开到日军

据称系参观特警

▲北平　玉田讯：日军卅五名，廿八日乘军用车由口外抵玉，住各旅店。据称系来参观驻玉田特警，无他用意，定日内离玉。

孙匪解决后

日军撤回原防

▲中央社廿九日北平电：孙永勤匪部解决后，残匪已告肃清。开入遵化、迁安协剿之日军，已分别撤回马兰峪、撒河桥〔澈河桥〕原防。各该县现平静无事。

▲中央社廿九日北平电：马兰峪电话，遵化茅山〔毛山〕一带日军廿八日已撤，马兰峪日军亦后退中。

▲天津　在遵化任剿匪工作之周毓英三四大队，廿七日开回抵玉田，廿八日晚到通县，即开往沧县。

《大同报》关于“剿灭”抗日救国军的报道

康德元年10月25日 （第七版）

国内各地跳梁之匪贼

为数约近四万

中国共产党之暗跃显著

满洲国内现有匪数约四万，其中比较的活动显著者约三万，较去年度之总数约十万，其中活动显著四万，大见减少。按活动匪减少率之较少者，盖因最近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伸其魔手故也。然因现在之秋季大讨伐及治安工作进展，彼等中抛弃抵抗念头而题归顺者续出，谅平静之期，或在不远。各省匪贼之动势如左：

△奉天省　匪贼总数一万五千。东边道中国共产党南满特委及朝鲜独立革命军等之思想匪甚多，高唱反满抗日，活动亦颇敏捷，集团坚固，有乘隙对讨伐队加以反击之气势。三角地带辽河地带，近时匪贼之活动尚无显著。

△吉林省　匪贼总数二万。东部方面与我方有关系之匪贼较多，均受思想的训练。北铁东部线地方，八月中铁道被害达二十数件，后因有关系之从业员受检举，九月内之被害仅四件。间岛地方从来共产党系匪贼最多，因属次讨伐及检举，目下亦无大的活动。拉宾线沿线虽有若干归顺者，但尚有二、三大集团存在，随时活动，每一大集团约有二三百名。东北国境方面目下平静。

△黑龙江省　总数二千五百。九月上旬讨伐后，目下亦无匪贼活动。

△热河省　总数一千五百。东部朝阳县、南部凌源县一带有多数匪贼蠢动，一般尚平静。

△兴安省　总数一千。时有蒙匪活动，一般尚平稳。

照以上所述，除奉天省一部外，全满一带已逐次平稳。然最近之匪贼，有合流政治化之倾向，受中国共产党及苏联直接间接之支援，匪贼之赤化益渐增加。日满当局，今次实行秋季大讨伐，并努力治安工作之普及彻底，将来之成功大可期待云。

康德元年10月27日 （第三版）

为利剿匪

组设电信网

【热河】 省境自入秋以来，匪患迭兴。因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对于匪情传达均用人力，军警虽星月奔驰，至则匪已远逃无踪，故于剿除诚属不利。当局为决心剿匪，以救民生计，特先在承德全境积极组设电话网，现已动工，故于灭匪上获益良非浅鲜矣。

康德元年12月2日 （第十一版）

军政当局发表

全国匪贼状况

据我国军政当局发表之现在全国匪贼状况，泰半已失活动能力，虽有三五成群乌合之众，亦不足虑。兹将发表之状况记之列下：

自九月上旬始，四个月来之全满秋季大讨伐，获得豫期以上之效果，兹已告终结，今秋最盛期之匪团总数四万，终被灭之三万矣。跳梁于各地之匪团，因日满各兵团之秋季大讨伐，四散逃走，战死、归顺、俘虏等续出，大半已失去活动力。约半数脱网，蛰居山中，然寒气日增，穷困于衣食日甚一日，集团行动亦失去统制。仅少数鼠贼从事掠夺，汲汲于各营准备。各省之匪贼状况如左：

奉天省 （略）

吉林省 （略）

黑龙江 （略）

热河省 小匪团出现于东部国境附近，有越南部长城线而侵入省内之匪团，但忽被日满军击退，其他一般平稳。

兴安省 （略）

康德元年12月14日 （第十一版）

国军剿匪工作益趋进步

弹指之间匪群溃灭

△……九、十两间〔月〕间之效果

自本年夏季高粱繁茂时期，满日两国军共同开始大剿匪，为期彻底的歼灭计，目下尚在继续征讨。自帝制实施以来，国军意识顿为觉悟之国军，士气大振，得日本军之战友，渐收效果。尤其在近来天气严寒，捣毁匪贼之根据地，匪之衣食绝途，结果陷于自灭之运命，已无抵

抗之余力，竟至陆续请求归降之状态。盖不出数月内，全满治安工作或将界划期的进步也。而今观全满匪贼分布状态，匪势比较活泼者，要以第一、第二、第四各军管区为最，因而该军管之国军对于讨伐之工作几不遑宁日。今探索其嗾使系统，大抵有三根源潜在：即系对第一军管区之东边道，有蒋介石政权伸其阴谋；对第二军管区之东边境，有朝鲜革命党之嗾使；北铁东部线及第四军管区内之匪贼，受俄国之煽动，自不待言。然此等亦遭日满两军之断行平伐，而匪之无立足余地，盖亦为期不远矣。（后略）

康德2年5月24日 （第一版）

在停战地区域之内

孙匪继续不法行为

在华日军出膺惩之手段

【天津廿二日电】 遵化方面遁走之孙永勤匪，被驻马兰峪之山田部队一支队在尖山屯击退，孙永勤似有脚部负伤之状。孙匪出热河省时已受大打击，带领百余名入遵化，纠合附近之匪军，按现在势力有一千六百名之数，武器弹药由遵化县厅支给，在停战地域内依然继续不法行为。以上军队宜讲膺惩手段。仪我大佐、高桥驻平武官，于廿一日欢迎天津之川岸○团长，协议剿匪事宜。

关东军通告中国

讨伐孙永勤匪

热河国境之军事行动

【北平廿二日电】 北平武官室发表，关东军数月来屡次讨伐热河南部出没之孙永勤匪，该匪因此遁走长城以南，中国官宪似有庇护态度，不易解决以致今日矣。关此，高桥武官廿日午后一时越军事分会，对何应钦代理鲍文越，责问中国官宪之不信行为，且事态如果渐大，关东军只得进出于长城以南，独立将该匪遵化根据荡平，如此处置亦通告完毕矣。

荻原部队

扫荡孙匪进发

【北平电】 据该地传来情报，扫荡遁走遵化附近之孙永勤之热河警备队荻原部队兵○○○名，于廿日晨起动，一部已越长城线，在进击中云。



康德2年5月26日 （第一版）

暗杀两报社长事业经判明

彻底扫荡扰治安者

孙匪与北平义勇军系有关

—高桥日本驻平武官谈—

【北平二十四日电】 廿一日，在天津，酒井参谋长、仪我特务机关长，对天津暗杀事件，就孙永勤讨伐问题，有重要协议。高桥驻平武官于廿三日回平，廿四日所谈如左：

今回之会合，关于暗杀事件，正体确已明了，无论〈如何〉应断乎处置，其具体之事究竟如何处置，尚不能言。孙永勤匪确与其他匪贼不同。中国侧曾任孙匪组织热河自卫军，与北平义勇办事处系相连系，纯然为抗日军，故中国侧官宪与以援助，即各取缔之事，更难做到。前者因我方之抗议，于是派张砚田及张庆余等保安队之大队出动，有阻止该匪南下之样。然在我方之地位，宜独自将治安搅乱者彻底扫荡，至何地步，总以肃清为终止云。

康德2年5月27日 （第一版）

扫荡国境孙永勤匪

毛山沟已发生战斗

—关东军司令部之发表—

关东军司令部发表，〇〇本部队，自五月初旬以来，即以山田部队实行讨伐兴隆县方面猖獗之匪贼。该方面山岳重叠，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故讨伐殊难进展。缘此方面，有自称救国义勇军之孙永勤一派，受国外援助，时出入于长城内外。前此虽有驻屯之杉原本部队之讨伐，而该匪巧避锐锋，势力得渐次增大，现在号称一千。山田部队长鉴于此处之地形与匪贼之特性，乃以小部队分散于广大地域，以包围匪团，而逐次缩小包围圈。匪贼以此随地受大打击，两周间匪死二百余。而孙永勤则突围逃往长城线外，其部下亦相互联络越长城，十八九集会于遵化附近者约四百名。查孙匪之惯用手段，每被穷追，则逃往华北，势盛，则再逃回热河，以故讨伐热河，最为困难。孙匪之讨伐，现已为第三次。〇〇部队长以为，苟实于热河治安，不拘所在地如何，亦不许其存于天壤间。故根据望〔皇〕军大方针，而决心进兵于华北。于是令山田部队集合于奇望峰南方撒河桥〔潵河桥〕并罗文峪南方下营附近，准备讨匪。

遵化附近，按停战协定，日本军原可自由行动，惟究系中国领土，故作战行动极为慎重。且曾以由中国侧讨伐之要求于遵化县长，而该县长不但左右支吾，不行讨伐，且据诸情报，皆谓有援助孙匪之说，乃成为即匪团之位置亦难确证之状态。山田部队长乃对县长宣言，谓在廿四时间以内不讨伐，则日本军即取自由行动。县长谅悉而退。〇〇部队长于廿四日午后五时，

随参谋赴撒河沟〔潵河桥〕战斗司令部。山田部队长谓县长拥有保安队、民团等三倍孙匪以上之兵力，包围占领遵化东北方三里〔三里店〕、毛小沟〔毛山沟〕一带地域之孙匪已有二日，并未讨伐云。○○部队长乃决以日本军歼灭之，命山田部队长实行讨伐。山田部队长在一战可灭孙匪之信念下，于廿三日夜冒雨行动，配备包围。战斗系于廿四日拂晓。有孙匪一部李连贵匪百五十名，谋脱逃，而现出于石井部队之正面。距离五十米，铳火齐开，一举而溃灭之。次即炮击毛山沟高地。川岸部队长乘联络用之莫斯机，午前七时由撒河桥〔潵河桥〕出发，低飞行于战场上空。认清孙匪据有河北策〔作〕战时中国军所构筑之战壕，我飞行机扬日章旗以示位置。及见我部队之位置，确认吾已完全包围匪团，乃投下通信筒，通知山田部队长，曰“可安心，吾已确实包围敌人”。兵团长自行侦察敌情，与第一线以情报，实战史上未闻之从容光景也。第一线部队以本部队长之激励，勇跃前进，缩小包围圈，午后零时十五分将敌歼灭，日章旗得飞扬于毛山沟高地最高部。扫除战场结果，匪贼遗弃尸体三百余，卤获步枪、手枪二百余。匪团四百余，以半日战斗歼灭之。孙永勤并其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之尸体，亦于最后複阁阵地收容之。完全被包围之匪贼困斗，亦甚凄凉。我方战死者将校一、下士一、兵四名，下士官以下重轻伤者九名，诚属遗憾，是盖为热河治安之基础而牺牲者。

孙匪尸体发现

毛山沟日军有死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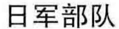
名誉战死将校一名

毛山沟附近战斗，敌匪参加约四百名，遗弃尸体三百有余，其中有匪首孙永勤及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尸体在内。其卤获品，大枪及手枪二百五十支。日军名誉战殁者，将校一员、下士一，重伤者二，轻伤者一名。

神鬼共泣

田边少尉之战

毛山沟附近高地战斗，其悲壮战死田边少尉状态，神鬼为之共泣。田边少尉，乃第四十六期青年将校。此次讨伐，由开始勇敢活泼，颇著功绩。于廿四日在遵化东北方约三〈十〉里之吴家沟，攻击中，午前六时廿分受致命一弹，当即倒卧。中队长跑到，将伊抱起，即云我难以报国，请勿为念，请饬中队前进。言后露悲壮之声，大呼天皇陛下万岁，呈请队长代唱陛下万岁之声，后气息已绝矣。



日军部队

全面猛击孙匪

【北平廿五日电】　据本地日本机关所得情报，向孙永勤匪讨伐中之某部队，于廿三日夜，向其正面开始行动。廿四日拂晓，向蟠踞于柴火厂〔柴户场〕之孙匪加以猛击。该匪放火焚烧附近民家，向迁安县境方面败走。又某团司令部于廿三日夜移于撒河桥〔潵河桥〕，某团团长亲自督战云。

康德2年5月31日　（第一版）

中国破坏战区协定

官宪援助长城附近之义勇军

以天津为中心指导对日恐怖

日侧警告何应钦

【北平廿九日电】　北平武官室发表，中国侧对满洲国内部之阴谋，长城附近义勇军之中国官宪之援助，以天津为中心，中国官宪之指导对日恐怖等，均属破坏停战协定，而为蒋介石对日反抗工作之一端。其活动基点之在北平、天津，事情极关重大。

状势既如此，日本军殊有越长城而侵出之必要。北平、天津既为此等阴谋之根据地，则北平、天津殊有包含于停战地区内之必要。胡、白两社长之暗杀，不但系蹂躏团匪事件之辛丑条约，毅然出以排日行为，抑且系对日本军之挑战的行为，且此等行为今后必尚行之不已。以此等行动之预想，日本军根据条约之权限，有出于自卫行动之必要。惟因此所生事态之责任，当然由中国侧负之，非日本所问知也。

酒井天津军参谋长，本日即根据此旨趣，与高桥驻平武官，会见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当事者并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氏，阐明日本军之态度，而与以严重警告云。

《盛京时报》
关于“剿灭”抗日救国军的报道

康德元年5月15日 （第九版）

哈游动警察队

选拔赴热

【哈尔滨】 满洲新国家所属之热河省，与中华民国之察哈尔省相接壤。前以汤玉麟之反覆，满洲国协同友军以武力将其收复。但国境防务异常重要，除驻守相当军队以固边陲外，对于国境之治安，非有得力之警察不足以资维持。哈尔滨游动警察队，乃系由前特区警备队改编而成，所有官长警兵均系教练有素，成绩极佳。前者皇帝登极，该队出发新京，警备国都，与警察厅所属之警察队一同载得令誉而归，故中央政府对于该队之官兵甚为嘉许。现在中央政府以热河边防既关重要，而国境警察队之编设实为当务之急，故决定于热河省内编制国境警察队二千名，以保国境之治安。惟以此项警察队责任重大，非以训练有素之官兵充之，不足以胜任。若于编制之初，招募新兵，加以训练，则未免缓不济急，难资得力。因此决定就各处之游动警察队官兵内，各选拔若干，开拨前往，以资补充。以哈尔滨游动警察队成绩夙著，故已由民政部警务司命行该队选拔精明干练之官兵若干名，以备开往热河，编充国境警察队。该队奉令后，现对于各队官兵正加以考验。将来以考验成绩优良者，选拔若干以备开往。闻该处待遇较在哈为优，故各官兵多希望能被选前往云。

康德元年8月21日 （第九版）

热河省地区治安维持会

讨论之各项要政

【承德】 热河省地区治安维持会，于十六日午前八时三十分，在师团司令部纪念堂召集各县委员长，日本军方面有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于原中将以下参谋，省公署方面有中野总务厅长、庭川行政科长、小林警务厅长、恩民政厅长，外有各县参事官、警务指导官等六十余名，出席之下，开治安维持会，讨论左列各事项。在会议完后即开恳谈会，至午后五时散会。

一、整备警察机关及整理治卫团之情况。

二、武器调查之现状及武器改修计划。

三、调查户口保甲制度之情况。

四、通信施设整顿之状态。



五、蒙旗之情势。

六、匪贼之情势。

七、水灾之状况。

八、治安维持会经费使用之现状。

康德2年5月11日（第七版）

热河省内各县之

集合匪贼二千余

现以种种计划又谋不轨

据讯，热河省内承德县第三区下板城附近，素为匪贼盘踞，且为孙永勤匪根据地。近来孙匪又行活动，而联络左计各匪首，以种种计划，而谋为不轨，扰乱地方治安。□将合流匪首名如次：△张玉书、△野狼、△东洋、△西山、△九省、△四川等。在各匪部上，每匪之匪数均在二三百人之间。今再合入，孙匪之部内，统共现下所有之匪数为二千余人。现热河省之警备当局正计划尽力捕剿，务期肃清云。

康德2年5月12日（第十一版）

匪首孙永勤率众

千余盘踞大杖驿

警备员严重警戒中

【锦州】 据凌源通讯，六日午后一时三十分，凌承线上谷、大杖驿中间、附近线路南方约米千四〔四千米〕地点，下板城，有匪首孙永勤，率众约千余名，拟向大林驿袭击。该驿警备员增派，严重警戒中。平泉自卫队于是日午后四时，亦奉令驰抵该驿，协同警戒，以防贼众据〔踞〕。据探，贼众持小枪者，大居多数〔绝大多数〕臂章署有“护国义友军”〔“护国义勇军”〕各伪美名号。该匪众为数改〔甚〕伙，野心勃勃。负有肃清匪类、维持治安为〔之〕当局，乃遣重兵往剿，以期歼灭，而免匪情扩大云。

康德2年5月22日 （第二版）

热省治安之癌

孙匪逃入战区

日军决追剿歼灭

达到目的后速撤回原防

【东京廿一日电】 扰乱热河省治安之孙永勤匪贼团，受松井〇队长扫荡，其残党遁入停战协定地区。孙与遵化县长有关系，继续活动之事已判明。若长此放任，则热河治安又将被扰乱。因之关东军〈将〉决定出兵于停战协定地区内，彻底讨伐孙匪之旨，于廿日报告于陆军省。然对此，陆军当局云，此次关东军之行动，完全为讨伐扰乱热河省治安之匪残党，并非为将军队入停战协定地区为目的。在剿灭孙匪后，当即退出，无惹起其他各种军事行动之意志。

【北平廿一日电】 在非武装地区遵化营巢之匪孙永勤部，屡次侵扰热河省南部。关东军为彻底的歼灭计，故而一时进入长城线迤南地区，亦所不得已，业向华方官宪通达斯旨。

康德2年5月22日 （第十二版）

热河省境匪患

友军剿讨成绩

【锦州】 热河全境，山险路僻，素为匪贼渊薮。虽经满日军队，一再痛剿，迄未肃绝根株。日前孙永勤匪首，率众千余，在平泉中心扰乱，已经友军出动，与以重大打击，几乎全灭。然该匪首仍存困兽犹斗之心，再出蹂躏闾阎。驻平泉友军有田部队主力，十五日午前六时出动三岔河地方，与孙永勤匪众二百余名遭遇。施以猛烈之攻击，结果将匪击溃，四散奔逃。当场遗弃尸体四十，负伤四十。残匪大股向三岔沟方面窜去。有田部队尾追其后，又在该地包围痛击。残匪狼狈窜去，遗弃尸体四，捕虏二，弹丸九十〔掳〕获。又驻平广川部队一支队，于同日十二时，〈在〉下板城南方四里半〈之〉西大凹，〈与〉从滦河渡涉，向西逃亡中之匪贼冲遇。彻底奋战，贼遁。遗弃尸体七，捕虏一，弹丸一六四卤获。又驻承德村上部队，于十四日夜由奉出发，十五日午前十时抵大营子，与盘踞该地之匪首张福伊〔张福义〕率众一百九十余名遭遇。双方混战，结果匪势不支，向东南方面逃窜。匪首张福伊〔张福义〕当场击毙，并击死匪众二名。孙永勤悍匪经此一番大打击，死亡数十，负伤无算，贼胆已丧，率领残余拟向黄花川、瀑河口方面逃亡。捣穴擒□，肃清匪类，当在不远云。

康德2年5月23日 （第四版）

驻防热河友军



击退孙永勤匪

关东军司令部二十二日午后零时三十分发表，热河警备部队之一部队，为侦察出动中。二十日午后，在遵化东南八基鲁之尖山屯附近，发见孙永勤匪。当即开炮轰击，与以相当损害。孙匪仍向遵化、迁安方面退云。

康德2年5月24日　（第四版）

孙永勤匪暗幕

由于学忠提线

遵化县长实在间相操纵

驻防热河日军毅然进入遵化县境，痛击孙永勤匪，已详昨报。兹据续讯，孙匪逃入遵化县城以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于二十一日饬令遵化县长何孝怡，在外交工作未有利进展以前，应将孙永勤部暂行解散。经何县长拨款，每一匪二十元，临时解散，待令再度集合。

又天津电：向遵化方面逃走之孙永勤匪，受在马兰峪之山田部队一支队于尖山屯击退，孙永勤脚部受伤。当孙匪由热河退出时，已受大打击，仅有百余名。而自入遵化以来，纠合附近匪军，现势力号称千六百名，如武器子弹，由遵化县长供给。在停战地区内仍然有如斯不法行为，军部当然有讲求膺惩手段之必要。待仪我大佐、高桥驻平武官及二十三日到天津之〇〇团小幡参谋〈会合〉，即行协议重要对策。

康德2年5月26日　（第二版）

孙匪遁窜三屯营

日军决仍追击

华方民团警队亦出力协助

【天津廿四日电】　在遵化东南方面山峪击破孙永勤匪之日军山田部队，日下在撒河桥〔潵河桥〕待机。一方孙匪蟠居三屯营附近，仍然扰乱治安不已。日军为期其歼灭，〇〇部队长决将自承德出动，以指挥剿讨事宜。

【北平廿四日电】　廿一日，在天津，酒井参谋长、仪我大佐，关于天津暗杀事件与孙永勤匪等，举行重要协议。高植〔高桥〕驻平武官，于廿三日午后十一时归平，于廿四日有如左谈。

此次之会合，对暗杀事件之正体，更加明确，当然采取断乎之处置，但现在尚非说具体办法之时。孙永勤匪，与仅为匪贼则不同，在中国侧，称孙为热河自卫军总指挥，□受北平义勇军□[1]事处指系，纯为反满抗日军也。受中国侧关系者之援助，毫无所为禁止。前者由我方之抗议，张庆余之保安队出动三大队，阻止孙匪南下。但我方仍坚持立于独自立场，对扰乱治安

[1]　此字印刷不清，应为“办”。

者，彻底地扫荡之。

北平讯云，中国关系方面消息，盘踞遵化小寨子般若院之孙永勤部，经中国警队、民团追剿，前晚已窜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皇阁村、马甸子地方，仍由警团围剿中。据殷汝耕氏语记者，遵化县东十五里大小寨地方之会匪孙永勤股，经特警队长张庆余派两个中队驰往迎堵，于前日下午二时开始接触，激战甚烈。至下午六时许，该股不支，向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地方皇阁村、马甸子等地溃窜。该方面，团队早有戒备，业已形成夹攻局势云。

康德2年5月27日 （第二版）

孙匪全部

被击溃灭

关东军司令部发表

【新京电】 据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川岸部队所属之孙匪讨伐队，探知孙匪之集团在三屯营西北方十二满里之柴伏厂〔柴户场〕（遵化东方二十四满里）附近，且悉其阵地在毛山沟（三屯营西北十二满里）北方五十米远之高地，并依靠河北作战当时沿棱线所构筑之堑壕，故由五月廿三日夜开始行动，由廿四日拂晓开始攻击，将匪完全包围。集中炮火，越过险艰之山地，沿着棱线，逐次压迫厂〔该〕匪，午后零时十分完全占领该高地，对孙之主力予以歼灭的打击。将尔后之行动准备中。日军虽有相当之损害，但目下正调查中云云。

又电：另据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毛山沟附近之战斗，参加敌匪约四百名，遗弃死体三百余，内中匪首孙永勤同参谋长韩有源〔关元有〕亦在内。卤〔掳〕获品有小〔大〕枪、手枪二百五十支。我军战死将校一、下士一、兵一，重伤者二，轻伤者十人。



战斗的将千百万武装抗日部队争取到党的领导之下来[1]

——义勇军孙永勤部半年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的血战经过

（《火线》第四十二期）

《京东通讯》

1935.7.31

冀热边的劳苦群众身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汉奸走狗豪绅地主和“满洲国”的非人压迫和吃人的层层剥削，狂风暴雨般的群众的反抗是在不断地爆发坚持扩大着，英勇的广大群众的反帝怒潮布满在这一区域里。已经和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血战了半年以上的孙永勤部义勇军，更是兴奋了全京东的劳苦群众，整批整批的反日战士涌入这一战争中，而造成冀热边区的一个有力的抗日支流。

一、抗日的开始和经过

1934年的冬天，有十七个不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在外密结了巩固的抗日生死弟兄，武装了自己，开始向日满官厅袭击，得到了初步胜利，加强了他们的战斗勇气，奠定了这一部队成长发展的前途。这十七人中有一个便是现在的孙永勤。

十七个抗日生死弟兄宣誓抗日后，首将上下板城的税局捣毁，影响一百多个抗日群众来参加这一战争。这时候他们的枪支，已增至七十余支。他们大家集议进攻半壁山（口外的一大市镇），日军措手不及，十余名当场被打死，并获得该处日满赃洋一万元。当即转向舍身台方面出动。就在这天，追击该部队的“满洲国”军队，三百人立即哗变，杀死日本长官，要求大家一致抗日。由此广大群众如像潮水似的参加这一抗日行动，全军总数立增至一千余名。而从今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亦再不敢要满军追击了。于是分三路进兵，东路三百余人，北路四百余人，南路□百人。当时抗日空气到处沸腾，极大地激动着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劳苦群众，这一支抗日部队便在这一基础之上蓬蓬勃勃地猛烈生长中。随着这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战斗的开展，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围剿”。但是“围剿”的结果，不但没有消灭这一支抗日部队，且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连续不断的打击。在黄花川击毙日军一百多人，转用游击战

[1] 文载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四十二期《京东通讯》中，写作时间是1935年7月31日。此为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的抄件。

术，向转山子、恒河〔横河〕、半比山〔半壁山〕、二道河西××各地猛攻，每次毙日军七八人不等。南山子一战役更是痛快淋漓，二百余名日军立被打死，得大枪四十支。在这次胜利后，更加鼓舞了这些抗日战士的勇气，又继续游击小山岭〔小十二岭〕、王杖子、汤山口、瀑河口、车河口等地，统计击毙日军二十二名，俘虏三名，缴获大枪三十支。在五道楼，遇大批日军，激战猛烈，实行肉搏，击毙日军二百余名，得大枪二十余支。更在庆禾山打死日追击军三十八名，而英勇的抗日战士七名亦于此次牺牲了。阴历三月初，又与日军遇于烧饼铺，由晨激战到次日晚，双方退却。经过不断的血战，日军死亡极重。烧饼铺血战以后，日军尸体十二大汽车运走了，因此可见情形之一斑。接着烧饼铺的血战，当晚进攻于×子西大山，共解决日军五十五名，其余四逃。接着便有当地民众报告在十里外发现日军，英勇的抗日勇士们立即布置埋伏，仅在一沟内竟毙日军一百八十名。日军经此次打击，急速向原路退回。此后遂分三队袭击下板城、车河、半壁山。第一队至下板城解决日军四十名，得大枪二十余支。第二队至车河毙日军四名，伤一名，得大枪十一支，胜利品二十三驮。第三队收降一百余民团，所以很容易的得大枪百余支，胜利品二十三驮。在三队总汇合之下进攻宽城，当地商民以一万元捐助为抗日军费，并请勿打宽城。回头一路游击潘家口、邦子沟、车河，各毙日军四五名。至宽店子〔宽甸〕遇到多数日军，对方相距不过四十步，遂做肉搏战，日军八十名立被打死，六十匹马亦被打死。在这次血战中，英勇的青年抗日战士年仅十三岁的小队员竟做了伟大的牺牲。当他临死最后的一分钟，尚为了一支枪打死日军二人。当时日军还不住按住他的身体，说："这样小孩也来抗日。"我们英勇的青年抗日战士沸腾着的血，甚至感动了日本士兵！

斗争经过越多，战士们的勇气越鼓舞的壮大着，于是第二次计划袭击宽城。殆与日军接触，该处商民仍要求停战，送给慰劳金一万元。接着便去流河〔柳河〕。途中遇日军掳掠八十余名妇女，哭声震天。大家愤火中烧，立刻招呼敢死队一百五十名追击夺回，八十余名女同胞得庋（？）更生［抄件如此］，并毙日军十数名，活捉日军高级军官一名。该无耻的日本狗军官，为了保存他的狗命，无耻地向抗日英雄们磕头求饶，并愿供给抗日战士们军饷一万元、面粉五千袋、大枪一千支、子弹二十万发，以保全他的狗命。但结果在得到他现洋一万元与面粉五千袋后（大枪与子弹未能送来），仍然把他枪毙了。在这次大胜利后，周围广大群众更加兴奋与欢迎抗日战士！

统计自起事以来至四月为止，大小共二百余战，英勇的抗日战士们不顾一切的奋斗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极大的威胁和打击，使日军一提起这一部队来大有"谈虎色变"之概〔慨〕。贪夺无耻视中国人民如无物的日本国，不得不在英勇的抗日战士面前来示其可耻的奴才鬼态！铁的事实粉碎了国民党法西斯蒂及一切卖国贼们的"中国无力抗日"的胡说，从这些事实上越发看透他们的帝国主义的走狗面目与言论。



二、残酷的战斗中的经验与教训

这一部队虽是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下，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壮大了自己，巩固了自己，推动了口里口外千百万劳苦群众的反抗斗争，但是不可否认的还存在着很多的弱点，是值得我们和每个抗日战士所深刻的领悟的。首先是缺少一种广泛的群众工作，而形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未能组织与领导成千成万的反日群众来参加这一神圣的光荣的民族革命战争，一般的只是听其自然发展。同时缺少鲜明的斗争纲领与对广大群众缺少具体的帮助方法，甚至认为，定名为“抗日义勇军”恐引起中国各军阀的多方进攻，而更名为“抗日仁义军”等等机会主义的办法。第二，没有坚决的采取进攻的策略。如一些完全可操胜利的战争都没有去作战（如在几次进口的日军长途奔跋情形下，没有急起直追的驱前解决之，而白白等着日军前来追攻我们），特别是在二次进攻宽城中，没有贯彻自己进攻的主张，中了日军假求和之计，而让它逃跑了。第三，关门主义的倾向还是存在的。每到一地不能尽量的武装群众，组织群众，造成新的军事根据地，尤其是对于几次哗变出来的满洲军的共同抗日请求，加以无理由的拒绝。

有了以上这些弱点，所以使得全京东以及国外各地的千万劳苦群众，虽然望眼欲穿地盼着民众快来（口里口外的人都叫这一部队为民众），虽然在千百万劳苦群众积极要求共同抗日中，广大民众络绎不绝的远自数百里外来送信，报告日军消息中，日满军队不断地哗变，曾与民团相率不愿去打抗日民众的情形下，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与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在部队中缺乏无产阶级的骨干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我们为了开展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与争取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与自由，只有更加加紧一切抗日部队中的工作与领导，争取上百万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游击队到党的领导之下来。

打字：常慧生

校对：何占奎　刘志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

[1] 又名《八一宣言》，1935年10月1日发表于法国巴黎《救国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收录了此文，但将其题目改作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在题目、落款日期下增加了“王明等执笔”字样。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28~33页。

《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已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觍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

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党、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华北事件经过[1]
（1935年6月）

A. 事件的前奏

一、军部的对华态度

要了解新闻社长被暗杀这一刑事事件，即所谓河北事件发生为止的发展过程，首先考虑一下日本军部的对华态度是必要的。军部的对华态度自满洲事变以来已再三公之于世，现仅就如何拒绝大使馆升格这种外务省积极友好工作所得到的印象发表一下看法，作为此次事件前奏摘录二三件事。今年3月经上海到西南地区旅行、4月16日回到东京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少将对军中央部建议："蒋介石政权并非像外务省所认为的那样稳定政权，另方面西南政权却有着不可轻视的实力，因此想要依靠蒋政权统一中国是毫无意义的。日本应对中国的分裂现状置之不理，加强对各局部地方的亲日工作，经济提携等也全部交给民间自由进行。政府的对华政策应是消极的，像广田外相所做的那种积极友好工作不见得会得到好处。"（10.4.23总局报）要求对大使馆升格等外交方面的过分做法作某些修正。接着，为出席参谋长会议于5月上旬回国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大佐，在5月6日的外交协会例会上发表讲演时称："总之，日中关系是日本民族同汉族间的蹂躏或被蹂躏的殊死民族斗争。因此，要明确认识此点，分不清敌我，涂上亲善色调是不行的。明白地说，就日本来讲，他们拥有英明的领导者是冲突的原因，所以是绝对不可以的，但如果是个混蛋倒是无妨的。"（10.6支社报）从而表明了极端反对外务省及一般实业界的态度，陈述了对中国应始终采取蹂躏政策的主张。还有，新任大使馆武官矶谷少将，4月24日在南京向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作到任拜访时称："日中真正友好的前提是，中国方面毅然觉悟，表示出承认满洲国的勇气和诚意。与此相伴随，如蒋政权的兴亡日本并不关心，我们的愿望是给中国国民大众带来幸福。"（10.4.30南驻报）对此汪无以为答。他们代表了军部对华态度的最有力部分，同时也对由大使馆升格等所展现出来的所谓广田外交，表露了现地军部的态度（10.5.16北事报）。

二、华北的抗日反满

中国方面对日本的不信任态度，今春以来，在全中国特别是华北更加猖獗。4月初旬在玉田保安队改编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于学忠无信不诚，诸如使玉田保安队私造武器等事不胜枚举。

[1]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1版，第337~348页。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也向华北各机关、团体频发抗日反满的指令。从中日佛教会、东亚协和会、人类爱善会、红十字会等宗教团体，直到像大迫机关那种与军部当局保持密切关系的机关，悉数成了警戒侦察的对象。这些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蒋介石的对日双重政策，成为刺激日本神经的材料和引起此次河北事件的起因。再进一步，对于今后，也左右着日中关系的最重要或唯一的因素。本文准备详细论述，但是其每个事例，只好由在每期政治月刊、10年5月14日关东军参谋部、10年5月1日及2日北事、10年4月4日及19日承驻及其他情报记述了。

三、等待惩治机会

外务省完全无视今春军部方面的意向，事前没有取得充分谅解，就断然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招致军部特别是所谓青年军官的极大不满，结果使军部的“抨击蒋介石对日二重政策”之声更加高涨。外务省通过大使馆升格是想向国民表明“增进日中友好关系”，事与愿违，呈现在国民面前的却是奇怪现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部分军部当局的意志表示并揭发了华北抗日反满的事实。形势既已导至如此地步，便不能仅止于表示意志而已，他们开始等待机会惩治对日二重政策，于是注意起造成河北事件的前奏了（10.5.16北事报）。

B. 天津暗杀事件

一、暗杀亲日满报社社长

在这种形势下，5月2日和3日凌晨，在天津日本租界须磨街相继发生了绝好的暗杀事件，即亲日满的中国报社社长胡恩溥（国权社长，浙江人，52岁）、白逾桓（振报社长，湖北人，63岁）二人，前者在北洋饭店于2日夜11点，后者在自家于3日午前5点，被不明凶手暗杀。两人最近均从满洲国得到相当的财务援助，专门从事亲日满和反蒋宣传。有鉴于此，本案是有蒋介石谋士之称的蓝衣社所为，几乎是常识性地被人们直接所认为。但据报，日本方面调查结果，有确据表明，此事是受蒋之命调转保定的于学忠作为保持现有位置的手段，体会蒋介石及张学良的意图，通过张天津市长，利用宪兵第三团人员等以5千元的成功报酬进行的（10.6.3总资10.5.3及11北事报）。

二、孙匪讨伐事件

去年秋天以来，在热河省内逞其强暴，经日满军队数次讨伐逃入关内，曾暂时四处逃窜的热河下板城出身的孙永勤匪，在非武装区的遵化县集结，重新纠合部队，势力逐步增大，并在附近一带大肆掠夺，继而又进入热河拟行骚扰。为此，关东军要求于学忠进行讨伐处理，但于左右推脱不予理睬，不仅如此，还在背后支持孙匪。于是关东军4月20日通过高桥驻平武官向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代理鲍文樾发出自行讨伐的通告，并于24日拂晓采取行动，当日正午匪首

孙永勤等匪团全部被歼（10.5.22北事报及5.25承驻报）。

三、事件扩大的因素

孙永勤匪帮事件之后未发生任何纠纷，自然地得到了解决。但是，新闻社长暗杀事件，中国当局没有及早采取措施，未能朝着解决方面前进一步，以致成为此次事件扩大的主要原因，被保留到日后。

C. 从扩大到结束

一、29日前的经过

5月2日夜的暗杀事件是在被看成绝好的时期发生的，但是11日高桥驻平武官对何应钦提出抗议，23日仪我机关长对于学忠提出抗议，对此，中国当局的回答也很特别，经过非常平淡。中国当局有意使事件平淡化，以期尽量糊里糊涂地掩盖过去，结果由于他们的无诚意遭到日本的指责，以致引发出29日的重大通告。这就是，22日高桥驻平武官前往天津，向出席参谋长会议归来的酒井驻屯军参谋长询问了今后的方针，而看到中国无诚意的驻屯军，抛弃了单纯将事件作为局部问题解决的态度，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在本案及支援孙匪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蒋的对日二重政策。酒井参谋长征求高桥驻平武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刘嗣荣等意见后，进而用29日的通告提出要求（10.5.11及16北事报）。

二、29日的酒井通告

5月29日，酒井驻屯军参谋长同高桥驻平武官一起，在居仁堂访问了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严正要求蒋介石清算对日二重政策，并亲手提交了内容如下的通告（10.5.31及6.1北事报）：

1. 于学忠须辞职并退出华北。
2. 于学忠军及中央军须撤至黄河以南。
3. 须撤换天津市长张廷谔及公安局长李俊襄。
4. 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及军事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须免职。
5. 须实质上封锁省市各党部。
6. 须逮捕、严惩天津暗杀犯人。
7. 须赔偿天津暗杀被害者损失。
8. 须解散各种排日团体。
9. 须取缔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废弃排日书籍。
10. 河北省政府须迁移到保定。

11. 如不实行以上各项，则将停战地域扩大至平津线，同时撤销军事分会、平津卫戍司令部及其他机关。

另一方面，北平武官室以中国驻屯军名义发表如下重要声明：

最近接连出现的中国当局对满洲国内部的阴谋、中国官宪对长城附近义勇军的支援、中国官宪领导的以天津为中心进行的对日恐怖活动等，都是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可谓蒋介石反日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发动的地点在北平、天津，事关重大。在这种现状下，关东军有必要越过长城重新进入，并迫切需要将此种阴谋的根据地——北平、天津包含在停战地区内。对白、胡两人的暗杀，是践踏了对团匪事件的天津换文，不仅是明显的排外行为，而且也是对日军的挑战行为。今后再发生这种行为，或预想到将采取这种行动时，日军根据条约的权力有必要采取自卫行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当然由中国当局负责，勿谓日本言之不预也。

以胡、白二人被暗杀和孙匪为直接发端的河北事件至此果然严重起来，成了动摇蒋介石政权基础的事件。

三、通告后的回答过程

酒井参谋长、高桥驻平武官的上项通告发出后，平津两地自不待言，而且东京、新京、上海的中央、地方各军部当局都呈现非常的紧张。首先，东京的中央军部翌日即30日立即对通告表态，表示为完全达成通告目的不惜扩大军事行动；在上海，矶谷大使馆武官于29日深夜召见驻南京辅佐官雨宫，令其向南京政府当局发出同样内容的严重通告，同时发表了内容为："此次通告的意图，非单对华北的排日反满态度提出抗议，而是彻底地要求蒋介石从根本上撤销对日二重政策"；关东军也非正式地公然表示支持驻屯军的态度。11日雨宫少佐严厉对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对驻屯军的通告赶快妥善处理。另一方面，中国当局接到29日通告后，对现今事态如此严重感到惊讶。30日晨何应钦经酒井参谋长同意，数次派遣使者请求缓和通告内容，却被拒绝。同时，中国方面对暗杀胡白二人的直接责任者、专门指挥抗日反满恐怖活动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逃往北平躲藏起来，丑态毕露等情况还不了解，但是如此拖延时间，感到有使日军采取自卫行动之虞，遂于6月1日在南京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经协商结果对日本方面的通告决定采取大致如下处理方针，3日南京由唐有壬外交副部长向雨宫武官，4日在北平由何应钦向酒井参谋长，分别作了回答：

1. 天津作为特别市列入南京政府直辖之下，如这次对事件不取缔之事不再发生。

2. 天津市长张廷谔是事件责任者，免职，任命王克敏为继任市长。

3. 在天津新设警备司令，任命商震为司令。

4. 河北省政府7月1日以前将迁至保定。

5. 支援孙匪问题正在调查。

6. 天津暗杀犯人正在严密搜索中。

7. 暗杀事件的责任者，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北平军事分会政训处主任曾扩情已于1日给予免职处分。

8. 北平撤除驻屯宪兵。

9. 于学忠的免职问题，何应钦在呈报中。

10. 今后停止中央军第二十五师的学生训练。

11. 撤销党部及其机构，应由何应钦向中央申请。

然而，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方面通过桥本陆军次官与有吉大使、桥本陆军次官与冈田首相、桑岛外务省东亚局长与冈村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等的会见已确定方针，即：

关于这次华北问题，当然应迫使其承认并实行军部要求事项，同时一举解决成为将来发生纠纷根源的过去一切悬案。

再加上如上的回答只解决了我方要求的枝节问题，距离蒋介石彻底改变抗日态度的要求还很远，故有必要继续进行坚定的追究。5日，将这一意旨电致各现地当局。6日又训令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要求中国限期回答。于是，驻屯军迎请北上的大使馆武官矶谷、关东军代表仪我大佐、驻平武官高桥等，于7日在天津召开驻华武官会议。结果翌日（8日），酒井参谋长向何应钦提出最后通谍：

在确保日满华三国国境持久和平上，将整个河北省置于与非武装地区几乎同一状态并非不是理想。日本军从此见地出发，要求：

1. 撤回北平军事分会。

2. 中央军、旧东北军及一切杂牌军撤离河北省。

3. 对以上各项要求须在6月10日以前回答。

同时，为了日中两国的利益，要求在全国解散蓝衣社及其他各种排日团体，请诚意予以考虑。

接着，同日矶谷少将还会见了何应钦，给以很大的鞭挞（10.6.1及4北事报，6.1总资及上事报）。

四、中国全部同意我方要求

酒井参谋长向何应钦提出最后通谍前后，关东军向现地各部队即发出了向长城线一带出动和待机的命令，8日午后即已连续向山海关、锦州、古北口等华北方向输送先遣队，使华北已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下。这必将使于学忠诚意地同意，何应钦还没有处理日方要求的实力。事态发展到发出最后通谍时，反而有可能更加胶着和恶化起来。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南京政府8日晚在接到何应钦关于最后通牒报告时召开了紧急中央会议，遂决定全部接受日方要求，



使事态得以和平解决。同时，汪精卫奉蒋介石的指令，于9日汪向何应钦发出指示电："全部同意日方要求。"9日夜，指示电一到，何应钦立即召集鲍文樾、王树常、关麟徵、黄杰等到居仁堂，至10日拂晓达成重大协议，结果认为需要立即采取中央各军撤退的具体步骤。当日午后访问驻平武官高桥，正式回答同意全部要求。据此，北平武官室将这一回答报告给了中国驻屯军、关东军等有关方面，并发表以下公告：

今日午后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前来回答：中国方面同意我方要求，此次问题和平解决。

于是，10日晚中国方面的中央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由北平出发向汉口转移。9日深夜军事分会政治训练处人员约200人全部前往汉口。极度紧张的华北局势顿时缓和下来。日本方面的第一次工作谅已大体结束。接着国民政府于10日自动地发出如下面的禁止排日命令，尽力表示诚意。

我国今后施政要点，国内方面，整肃政治并促进文化运动，专心致力于国力的伸张；对外方面则注重国际信义，为维持国际和平，与邻国（日本）继续进行亲密交往，此乃目前必要之事。因此，国民不得有排斥外人及排他的乃至对外国人抱有敌意的言论和行为，同时也禁止组织任何妨碍邦交之团体。特此发布命令。国民须切实遵守本命令，万一违反必将严重处罚（10.6.1上事、10.6.8承驻、京地10.6.9上事、郑事、承驻10.6.11北事、京地、奉地各报）。

五、今后的工作

根据10日的正式回答，实现了日本军部所期待的中央势力撤出华北的要求。但中国能否诚意履行尚需充分监视，并且随着中央势力的撤退而继续发生的各种形态的华北新政权建立运动，及在全国废除蒋介石的对日二重政策问题等日后处理问题也很重要。有鉴于此，军部当局在中国当局回答的第二天，即11日午后2时，在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官邸，梅津司令官召集酒井参谋长等各官僚、陆军省满蒙班长大城户、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喜多、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驻平大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等，进行种种协商，结果决定：

1. 中国已全部接受我方要求并已部分实行，但其大部分将在以后实施。鉴于中国向来不守信义，应严密监视其诚意实行。

2. 何应钦有意辞职，黄郛亦未北上，华北的中国军政两当局能否负起责任收拾时局，值得忧虑，应密切监视南京政府的态度。

3. 关于华北的自治运动，希望设立继续保持同相邻的满洲国的圆满关系，忠实遵守停战协定及其他条约、协定，负起责任维持华北治安的有力政治机关（10.5.3及6.13天驻、6.18天驻及北事报）。

此外，11日驻南京武官雨宫还就停止全国性的排日问题向行政院发出通告：

国民政府已于10日发布了排日取缔令。但重要的是，在全中国尚未完全停止排日以前，日本须严密监视。不管任何地方，如果发现排日行为，将时刻准备采取断然手段。

D. 今后的动向

一、军部的坚定指导精神

这样，日本军部派出机关如所期望的在未引起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总算得到中国当局具有某些诚意的回答，关于日后的处理也做好了准备。但是，接着在察哈尔省又接连发生宋哲元军第二张北事件、不法越境射击等抗日侮日事件。以坚决根除全中国排日运动为目的的日本军部认为，有必要与现地当局进一步密切统一，乃于6月17日午后9时半至18日午前2时召开了新京会议。

该会议可以说是研究关东军、中国驻屯军的对华方针的会议，在关东军参谋副长板垣官邸召开，参加者有：关东军方面板垣副长等幕僚、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驻张家口武官松井等；中国驻屯军方面有参谋长酒井出席。据传，会议结果，根据上记坚定精神，决定了如下的今后根本方针。还决定，今后根据需要，还将召开此类会议，以加强关东军同中国驻屯军的联系（10.6.13北事报）。

1. 今后军的行动，以促使南京政府放弃对日二重政策为唯一坚定目标，各项问题的处理均准据这一指导精神。

2. 军方企图彻底解决宋哲元的数次违犯行为，它也是全中国排日行为的一种表现，趁此机会进一步努力抨击成为此等运动根源的中央政权，并加以监视。

3. 使之周知，为期在全中国调整日中关系，日本不以中国民众为敌。

二、今后的动向

河北事件，由于中国以诚意在10日作了回答并付诸实行，结果现在除新政治机构问题外，大部分均获解决。

第二张北事件和不法越境射击事件等宋哲元所挑起的抗日事件，经土肥原少将与宋哲元代表秦德纯会见结果，宋哲元全部同意日方要求。同时国民政府也在6月18日的行政会议上免去了宋哲元的省政府主席职务。估计大体上可以在不至于发生扩大事态的情况下解决。所以今后的问题是，根据军部的坚定精神，离开河北、张北等局部问题，而抨击和追究蒋介石的对日二重政策，即国民政府的排日行动。关于此点，18日的新京会议结束后，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曾发表谈话如下（10.6.5及7北事报、6.18天驻及北事报、6.13北事报）：

宋哲元问题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排日这一根本问题表现之一，河北事件是其发端，一个个地



解决派生事件，不能从正面铲除国民党排日政策之根本。军方的陆海军在与外务当局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充分注意监视，打倒排日政策，即使使之全面平息需要十年、二十年，也要始终一贯坚持这一方针。

如果将局部解决河北、宋哲元两事件看作此次行动的第一次工作，那么基于如上更加确认的指导精神，可以将今后的对蒋全面行动称之为第二次工作。

E. 外国的反响

一、英美两国态度

此次河北事件的特点，可以说是：国民政府当局严格训令全中国言论机关，禁止有关事件的一切自由报导和评论，各报也严格遵守了这一训令。未料到，此种现象竟也反映在英美等列国的态度上。直到现在，英国政府才表明了以很大关心注视的态度。美国政府则仅止于关心中国采取什么态度，才能带来重大变化，以满足其强者形象的心理。过去的那种喧嚣非难和是非议论没有听到，这是同以前稍有不同的。这是因为，英美和中国都知道，对日本的行动，用口头非难和阻止是全然无效的。这不能看成是他们对日本行动的首肯，或认为是当然的。不！勿宁说是他是在进行沉默的非难。下面所摘录的若干报纸论调，不妨看作是他们继续保持沉默的代言。

二、外国新闻论调之一斑

1. （伦敦6月1日发ルーターー电）对日中两国在华北的纠纷，第三国不能调停而放任的事态，应采取比最初所表现的更加缓和的手段解决。然而，可以认为对中国并无野心的广田外相的努力已化为泡影。这对与其他列强外交关系上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在加强，不容无视。

2. （华盛顿6月6日发ェービー电）国务院对华北事态表示忧虑，注视其发展。平津地区如被占领，将提出强硬外交抗议。在这种场合，英国亦应参加。由于平津地区被划入非武装区，可以预想，在天津的美国驻屯军和在北平的公使馆警备队均将陷入危险境地。

［以下原件缺］

编者注：原件为满铁总务部资料课《华北事件经过（极密）》，综合情报10之号外，1935年6月21日。封面载有“注意保存”字样。

行政院致外交部笺函稿[1]
（1936年10月3日）

奉院长谕：“据福开森博士函送日本驻平特务机关松室孝良上关东军之密报一件，应检送外交部参考”等因。相应检同原件，函达查照。此致

外交部。

行政院秘书长翁××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三日

日本驻平特务机关松室孝良上关东军之秘报

一、走私问题。帝国货物之向华北走私为帝国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势力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而实践解决。

1．原料与市场。帝国工业之生产量逐渐膨大，近年正向世界的市场迈进，因而欧美列强之嫉视纷纷，于本土及其领属，高筑关税堡垒，极力抵制我帝国商品之推销。帝国虽一本报复主义对对方之商品图谋抵制，奈此项输出品，均为帝国所必需之原料品，无一自产而代替，于是痛感原料之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痛感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种地域之获得，又非与帝国基干势力打成一片、连成一气亦难以确保，故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满洲事变而后占据之，帝国市场与原料问题一时已和缓其原因。

①尚有若干原料问题不能解决于满洲。

②有于满洲解决可能性的原料问题短期不能满意，尚须相当岁月之经营与培养。

③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期间非再行扩大不能与帝国之生产率相调和。

④帝国为确保满洲，并万全，不能不努力满洲边外地域之缓冲设施。

解决扩大工业，必须确保相当范围之原料与市场，是以对于新原料市场之觅求乃帝国荣瘁攸关之重大事业。依帝国之大陆政策的满洲主义占据满洲之后，应再继续图谋蒙古在军事上为极重要之地区。势在必得，帝国亦不断地努力实施。惟蒙古为一片原野，其资源尚须长时间之调查与开发，实属缓不济急。市场因蒙古人生活落后，短期间之希望亦微乎其微。加之帝国对蒙古工作之人材，现急在训练生活。又适合普通日人之活动地方，则苏俄之注力监视，亦增帝国

[1]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1版，第720~728页。



慎重之戒心。故除以种种手段掩护用实力威胁操纵王公等方式外，不愿作任何刺激神经之占领。然则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易于进攻之华北。今试考华北之原料与市场如下：

2. 消费市场主体——人口，冀鲁察绥晋陕豫（半数）约一亿，为满洲之三倍，其人口消费力当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转入则多由天津、青岛。

3. 生产原料，华北为全华原料中心地，物产丰富之煤矿、小麦、棉花、石油，就调查统计，煤次于美国占第二位，山西之埋藏量即占半数，相等抚顺之二十倍，铁埋藏约二亿吨，小麦晋豫鲁冀四省合计年产一亿一万石，棉花三百三十万担，高粱七千五百万石，大豆五千万石。将来在我国之有计划之指导与经营（下），则原料产量尚能增加二三倍，民众之消费能力尚能在三倍以上。

4. 商品之输出必自能增大，故华北诚我国之最好殖民地也。

二、政治问题。根据帝国前次发动民意自决自治运动失败与冀东独立之收获，帝国惟有抚情顺势，积极采用走私方法，作用为适切之威胁。其功用：

1. 可输入帝国大批商品，救济国内生产过剩之恐慌。

2. 侵袭英美列国市场而代替之。

3. 促成全华物价下落，既可抵制欧美列国货品，又可博得民众之欢心，增进其消费力与购买力。

4. 培养为帝国先锋之浪人，深入华北内地作特殊之活动；吸收各处亲日分子，为帝国消灭华北势力派之羽翼。

5. 鞭策华北，使其官民对帝国怀着普遍的恐惧心理，并以走私诱惑手段，作当地官吏性格的试金石。现在中国所谓之缉私，乃为一人洒珠万人拾之之拙法，可怜亦复可笑。假使彼即发动断然之处置，帝国惟有听其自然耳。然睹今日情势，可基于普遍畏我之心理，绝不敢稍行阻碍，我乃仍宜用威胁政策，以使其永久就范。故此次增兵于华北，除军事上之意义外，尚有不战而胜之威胁力量也。因可测华北政权之独立乃形式之问题，帝国乃达到目的，亦不必太予以难堪也。同时，华北之输入，只须稍用威胁即可得特予最惠之待遇，对于促进帝国今后商品之输入实有莫大之效力也。对关税之收入，因走私愈多，中国之关系〔税〕愈受影响，故可用走私政策强迫中国对我订最惠之关税待遇。睹中国当局，现在已有就范之可能。

三、中国官民。1. 势力派之聪明。帝国最感愉快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约十分之七均非常聪明，不愿发动势力违抗帝国意旨而自取咎戾，更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多采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不违帝国主义之原则。2. 苟延苟存。此等个别势力，其所关系〔心〕者亦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耳，当然难抵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与帝国以非常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倘能仍似张作

霖氏之说打就打，不管任何外交或国际；马占山氏明知势力悬殊，而竟硬干与强干，则我帝国未免相当损失，亦非慎重行事不可，而不能威迫太甚也。今日宋〔宋哲元〕氏部下颇有此种倾向，帝国政策更宜慎重而迂回。须知，中国军旅正式作战反多失败，然为变兵或为散匪竟成皇军之劲敌，此诚不可不注意也。

中国势力派之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就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的状况。国家之存在，民众之痛苦，彼等从不负责。彼等政治欲望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多都〈是〉顾己而不顾国之辈。其势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重，故意气多而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吾等由满洲事变已成效果，及以后华北各地之再退让之事实即可证明。故以后帝国对华工作，应以破大的对象，寻获小的对象，以分散其势力之集中，增加彼此之疑嫉。

四、一般民众。中国人之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顾家忌国，甚且甘心祸国，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家一小集团之欲望解决，他若国事民生一概不顾。虽一小部分尚能顾全大体而谋向上，均属居近下层，无米对炊，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以后帝国应采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节气的忠干分子。以华北民众而论，其意志均属奸滑而薄弱，易于利诱而威胁。民众间缺乏团结组织与训练，完全为散沙的状态。故长时间以来，迄无抗日事件之反动与势力之结成。非若满洲方面“九·一八”迄今四年余，反满抗日势力仍是再厉的与我们搏斗，虽迭绪〔经〕又〔优〕抚讨伐，军事政治，仍为帝国心腹之隐患［此句原文如此］。华北之现在抗日分子及学生，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的意志，然大部为客籍分子，难深入华北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部瓦解，故不足为患。但彼等深刻的怀抱反满抗日的思想，将来返回乡里，势必故吹抗日，组织训练民众示威，为帝国之大患。因此，帝国为免激发其反感，对于彼等行动应在督促华北政权自行取缔主义，尽量避免直接交涉。

五、浪人行动。帝国之盛武皇军威力已深入中国官吏之□□，故我帝国军民之在华北活动者殊少遇到辱害之情事，大部分浪人非法活动非常有力，愈益显示中国官府之苟安无能。增加民众对官府之怨恨与失望，对帝国之神威皇军反而由嫉视而转为畏惧与仰羡。满洲全部已在帝国统治之下，浪人活动已不需要，故全部取缔。华北则不然，浪人活动之自由实较在满洲为顺利，因此内地浪人在满洲浪人大多均趋向华北，其与帝国功劳，殊难漠视。

正当日人洞悉中日间纠纷，顾虑其生命财产不愿对华北进出，以冒危险，即或进出，亦限于都市，而不敢作不正当之事业。浪人则不然，无家无室之累，有敢干精神，充分利用汉奸通力合作。此种浪人既受帝国之庇护，当然对帝国誓忠，故能倘有所命，虽死勿辞。帝国既放纵其行为，中国亦无敢取缔之勇气。假如浪人活动不正太甚，则帝国以侨民名义监送回国，亦



可于无碍帝国威信下不了了之。中国官吏之恐日，由走私一事可证明。素日以较有骨气之关税论，虽外人官员亦均软化，华员及地方官吏均已软化，更无论矣。故浪人之活动，由少数军警之掩护，即行任意反动，不必反动大的力量也［原文如此］。将来中国官府有以实力取缔的决心，则我帝国亦不必过分庇护。

六、共产军与共产党。共产军之主力虽现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之趋向。满洲苏联抗日之危虞为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势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产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而趋华北，转战万里，备极艰辛，物质上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获得相当之物质，势力又行加强。彼等尚能利用时势，抓住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努力，亦不容忽视。中国大部青年鉴于内政之腐化，军事经济乏更生希望，政府无抗日决心，退让且无止境之主义，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产，甘为共党军之前驱，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且与红军取得联络，将来扩大充实亦为帝国之大敌（帝国工商业发展，早形成劳资对立状态，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发生减缩生活或生产过剩，定有大批失业之恐慌，极易受共产党之煽惑。此外，小农阶级工兵分子之向上，满鲜民族之穷困，均为共产可乘之机）。以共产军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需要大批军饷大批物资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饷即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简单的生活，窳败之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的战术，适切的宣传，和〔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拥护，实施大众团结苦干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在满洲，红军轻锐适宜穷乏地方，及时散时整的耐久游击战、强行战，则适于将来不能速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此段恐有错落字，不通，原文如此］。故皇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发动防共思想之宣传、不时之游击与出没无常扰攘后方之行军。

七、找口实。帝国如欲对华北发动，口实可随意而得。故现在中国之官民诚恐诚惶对日抱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知帝国之威力。帝国安不乘机进攻，夺取特殊之利益。目下先决人材问题，已借专家技术者的名义，加入华北政权下之政经交军各部内，以后更进一层的知己知彼，其于帝国国策之贡献，当必有非常的效果。

八、对华工作。帝国对华工作，此后采取华人治华主义，其方式亦如满洲国，绝对不应以军力占据，自找烦恼。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势力派，造成若干独立之自治之政权。第一阶段必须确保华北及西北，其意义如下：

1. 华北各地民众无组织，多奸滑性，抗日力量较少，且为帝国解决原料与市场之地区。

2. 西北指蒙绥而言，多为原野，蒙古官民易受皇军之怀柔与统治。

3. 华北、西北为满洲国之外围，可作相当之缓冲，在军事上有重要之意义。

①使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对日观念扮演［原文如此］，以使收复失地之企望逐渐消沉。

②断绝中苏之联络，切断共同抗日之阵线。

4. 断绝非常时之任何势力之侵入华北。

5. 华北、西北确保后，则华东、华中、华南可逐步完成威胁而服之，逐渐使中国政府消灭，而各个独立之政权均受制帝国。

6. 故帝国对华北工作有极大之希冀，采不战而胜之方式。倘如中国官吏毅然抗日，帝国为顾虑大敌苏联背后之威胁，皇军发动之国际刺激战论［原文如此］，开始各地动荡，中国遍地则成功不足败乱有余之扰攘，则帝国在华官民军旅生命财产之相当损害，一切破坏后建设亦难以期望。华北共军在满红军联合抗日，满华官民反对我方情绪之激昂，帝国之胜利殊有大量之危险。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采取依赖国联而非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殆后疑神疑鬼，变成普遍的恐日病［原文如此］。帝国向前愈烈，中国之恐日病愈深，则各当局之恐日病亦愈加重。倘中国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沦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时至今日，若环境有所改变，但全华各地潜在抗日力量，以此作号召者在在皆是。故我帝国今后对华工作之方法，决定随时促进下列数事实现：

①以威力并胁迫镇压各势力派之力量，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

②慎勿采以实力粉碎各势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损失。

③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势力之精诚团结，自力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

④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英美而进行抗日。

⑤务宜防冯某势力（宋韩）与张阎及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抗日。

⑥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势力分子，以实力之援助，使之镇压抗日分子。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1]

何基沣

1933年的春天，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抗击日寇。这是从“九·一八”开始，日寇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唾手而吞并东北，进占热河以后，意外地在中国北部所遇到的有力的还击。我参与了这一战役，担任二十九军前方指挥所的工作，亲历其事。现在把此役经过情况，概述如下。

一

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反蒋战争失败后，冯所率领的西北军完全解体，只有一小部分退入山西南部，通过张学良的允准，被改编为第二十九军，由宋哲元任军长，驻防山西阳泉、辽县、沁县一带。二十九军初编时辖三十七、三十八两个师。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下辖三个旅，两个旅长为赵登禹、王治邦，另外一个旅，由刘汝明所率的残部编成，旅长为李金田。刘本人则担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名义，事实上刘只指挥李金田一旅。过了一些时候，刘汝明被调任为暂编第二师师长，即以李金田旅扩编为师，仍隶属于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下辖三个旅，旅长为黄维纲、佟泽光、张人杰。张人杰旅只是每月由三十八师转发饷项，实际上该旅驻在晋南翼城，一切由张人杰自己主持。当三十八师开出山西时，该旅并未随同开拔，后来就脱离三十八师了。此外，二十九军军部还有一些直属部队。在离开山西开赴平东一带接防的时候，全军约有二万二千余人，除留守阳泉一部分外，开到前方的约一万五千人。二十九军在器械方面是极为窳劣的。全军约有三分之一的枪械是西北军在反蒋战役溃败后遗留下来的，多数是汉阳造和三八式。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枪械是由甘肃调出来参加反蒋战役的地方部队所携用的，大都是老毛瑟枪。再有约三分之一的枪械，其中一部分是二十九军在编军以后，由自己的修械所陆续制造的，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枪械陈旧而复杂，弹药补充困难，有些也无法补充，如老毛瑟枪的弹药，各兵工厂早就不制造了。全军只有野炮、山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后来从北平领到一些轻机枪，每连配备了两挺。步枪上没有刺刀，自己制造不了，就利用西北军原有的特点，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用。枪弹奇缺，则多造手榴弹，以资补救。至于饷项方面，因为领不到全饷，每年能领到10个月的饷就算不错，所以官兵们一般只能拿到六七成饷。以上就是喜峰口战役前二十九军的情况。尽管如此困难，由于西北军有着刻苦练兵的传统精神，在军长宋哲元“枪口不对内”的口号下，在阳泉驻防不到二年的时间里，居然把一支残破的军队练得很有规模。同时，西北军练兵，一向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当二十九

[1]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1版，第123~130页。

军奉命开赴平东防御日寇的时候，全军士气异常旺盛。在这以前，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时，宋哲元曾派我率领一个参观团到淞沪一带参观作战情况，并将参观所得的材料印发全军研讨，着重说明日寇可以打败和能够打败的经验，这对于官兵们在战斗精神方面起着一定的鼓舞作用。

二

1933年1月3日，日寇占领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震动，华北当局急调二十九军移防平东。于是宋哲元以华北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名义，指挥所部由山西开驻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带。总指挥部初设通州，继移蓟县，后来设在遵化。由于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华北当局对抵御日寇的整个部署丝毫没有准备，而只是千方百计向日寇谋求妥协，因此二十九军在1月20日部队陆续到达平东的时候，竟没有继续奉到准备作战的指示。2月25日日寇开始进攻热河，守军不战而退，不到一个星期，日寇就以百余轻骑占领了承德。这时华北当局手忙脚乱，命令二十九军以一部分兵力出冷口御敌。宋哲元奉令后，命我率骑兵两营，到冷口执行警戒掩护任务，另命王长海团开到建昌营，以为策应。

3月4日，我们到了建昌营，即遇沈克所率领的一〇六师，遭到日机追击轰炸，从冷口向南溃退，枪炮辎重遗弃遍地，凌乱不堪。我们就在冷口布防，扼守要隘，并帮助沈克收容溃兵。到了6日，二十九军奉令防守冷口迤西至马兰峪止长达三百余里的长城各口，其中包括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诸要隘，而将冷口交由商震的部队接防，于是我们就离开建昌营。7日我到了三屯营（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设有前方指挥所，师长张自忠、冯治安也已经到了这里。第二天下午，奉令接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在遵化东北一百一十里，距离热河的平泉一百九十里。这里原由万福麟部驻扎。万部在热河的凌源、平泉遭到溃败，乃退保宽城、喜峰口一带阵地，士气沮丧，不堪再战，遂商由二十九军接防。我在9日下午和副师长刘自珍到达喜峰口，口里口外驻有万部一个旅，我们和他们约好，我们的队伍在天黑以前，一定可以到达一部分，等我们的部队到了阵地，他们就撤至口内休整。我和刘自珍视察了阵地，决定把先头部队一个团放在口外约二十里的孟子岭，来确保喜峰口的安全。4点钟左右，我们刚从山上下来，前方炮声大作，从望远镜里看到万部纷纷由孟子岭方面退下。旋接报告，敌人服部、铃木两个旅团的步骑炮联合部队，中杂伪军一部，跟踪南下，铁甲车十余辆开到孟子岭附近，万部抵挡不住，望风而逃。傍晚，敌人占领口上阵地，居高临下，控制了口门。这时我三十七师特务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敌人炮火猛烈，该营又在洼地，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中弹阵亡。王长海团随即到达，天已昏黑，双方在山上山下混战。夜间，我军由喜峰口的两侧夺取高地，才把敌人压住，稳定了口上的战局。我将战况反映给在三屯营的冯治安，冯叫我立即到喜峰口南约二十里的滦阳城指挥。我到滦阳城，已过午夜，宋哲元由蓟县总指挥部来电话，



询悉前方战况后，指示说："一定要坚守喜峰口。我已经调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去增援，他们离你处约有百里左右，跑步前往，预计天明以前，可以赶到"等语。

10日一早，赵、王、佟三旅先后到达滦阳城。此时，喜峰口我军一部分部队向后退下，赵登禹立即带队上去，将敌人堵住，赵的腿部受了弹伤。王、佟两旅分向左右两翼增援，战至上午11时，东面王旅告急，西面刘景山团告急，陆续派队援应，转危为安。10日一整天，在喜峰口附近激战，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杀声震天。我军士兵多数都不愿携带步枪，因为背着步枪上下山地，行动不便。他们只愿多带手榴弹，提着大刀，便于杀敌。由于两军的士兵白刃相接，距离很近，因而日寇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11日拂晓，敌人发动进攻，企图抢夺我军占领的山头。我军沉着应战，潜伏不动，待敌进至相距百米以内，突然出击，以手榴弹、大刀冲杀。敌不得逞，遂以飞机、大炮更番轰击。这两天多的战斗，双方的死伤都很重。晚间，我与三屯营张、冯两师长通电话，大家都感到如此拼杀下去，敌人器械精良，对我甚为不利，应当运用我军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予以袭击。遂请得宋哲元的批准，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抽下赵、佟两旅，分两路包抄敌人。一路由赵登禹（赵在10日攻击敌人时，腿上被炮弹片擦伤，这时自告奋勇，裹伤出发）率领董升堂团及王长海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一路由佟泽光率领李九思团及仝瑾莹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王治邦旅俟赵、佟两路袭击得手，即行出击。部署既定，夜半，两路分头出发。赵旅出潘家口，距目的地较近，拂晓前即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地区。这一带地方和喜峰口内外，在8日这一天都下过雪，到处还结着冰。官兵深夜在冰雪中急行军，情绪非常高涨。董团到达三家子、小喜峰口，王团到达狼洞子及白台子敌炮兵阵地。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他们正在高卧，不及还击，多数被我军砍杀。夺获敌人的大炮、坦克车，无法携回，都予以炸毁（只携回炮镜和轻武器等），辎重粮秣悉予焚毁。此时，驻在老婆山的敌人看见火光冲天，知道有变，驰来应援。敌我两军，遂相混战。适佟部已到达，将敌击退，仍由原路而回。此役毙敌甚重，击死敌指挥官一人。我军也伤亡很重，官长阵亡者计团附胡重鲁，营长苏东元，连长二人；受伤者团附一人，营长二人，连长七人。敌既受创，12日喜峰口沉寂了一个上午。下午敌机四架到喜峰口、潵河桥等处轰炸，投弹二十余枚，我军略有伤亡。董家口方面在12日晨，有敌来犯，经我军击退。这一带的战事，从9日下午开始，经过七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坚守阵地，未被突破。此后，两军对峙，不时有些接触，战事重心，由喜峰口移到罗文峪方面去了。

罗文峪在遵化北十八里，东北距喜峰口一百一十里。其地适当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长城凹入处，倘被敌占，则喜峰口的左后方受到威胁，势必无法站脚，不战自退。因此我方在这方面驻有刘汝明师担任防务，并与原驻口外的东北军李福和的骑兵第五旅一部取得联系，互为策

应。不料当日军由热河向罗文峪挺进的时候，李部骑兵望风而逃，擅自向西撤退，也不通报我军。幸而当地民众激于爱国热忱，连夜向罗文峪我军报告日军南犯的消息。与此同时，我军在罗文峪口外，抓获一名佐官阶级的敌探，在他身上搜出文件，知道敌人从朝阳、平泉、滦平一带，抽调第三十一联队、第八联队，协同一部分伪军，经由兴隆县东北六十里的莺手营〔鹰手营子〕进犯罗文峪。我军得悉情况，严阵以待。16日拂晓，敌人先头部队沿半壁山向罗文峪进攻，企图夺取三岔口高地。我军祁光远团跑步绕出黄崖口，予以截击。经激战后，敌始退去。第二天，敌大举向罗文峪、山渣口、沙宝峪进攻，炮火猛烈，并有飞机助战。我军诱敌迫近，突出阵地，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冲杀。战斗竟日，阵地得失数次。我方复调李金田旅增援。傍晚，敌向莺手营〔鹰手营子〕方向退去。此役敌伤亡甚重，有少佐指挥官一员被我军击毙。18日晨，敌步骑炮混合部队约一个联队之众，猛攻罗文峪、山渣口、沙波岗。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督战，以机枪、手榴弹抵御，待敌接近，挥刀砍杀，活捉其骑兵大尉一人，余众仓惶退去。至午刻，敌复向山渣口进攻，步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两侧挺进。我军李金田旅长率李曾志团，祁光远团长率王合春营，先后驰至增援。战至天黑，将敌击退。敌损失甚巨，我李曾志团长受伤，王合春营长阵亡。是夜，我军派李金田旅长率兵一团，由沙宝峪口绕攻敌侧背。连越七个山头，摸至敌的机枪阵地，相距约四五十米远时，被敌觉察，向我军猛烈射击。适祁光远团由左翼绕攻敌后，亦已到达，合力攻入敌阵。此时，正面我军见敌后业已打响，急令全线出击，前后夹攻。战至天明，敌全部撤退，罗文峪北十里以内已无敌踪。

罗文峪战后，敌人又从喜峰口西边进攻了几次，均未得逞。4月初，敌从喜峰口东面绕过滦河，经由南北团汀，到达潵河桥以东距三屯营约十里之处。经我军迎击，敌始退去。此后，二十九军在防区里筑成坚固的阵地带，敌从任何地点进攻，都须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而二十九军自作战以来也有很大伤亡，计全军官兵伤亡共达五千余人，因而战事逐渐形成胶着状态。4月11日，敌人从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入，接着迁安又告失陷，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腹背受敌，不得不转移阵地，随即奉令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在撤退的一个夜间，蒋介石驻北平的代理人何应钦以电话向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询问前方情况，张答："我军已经按照命令，到达指定地点，严阵待敌。惟右翼防地的商震部队联络不上。现在我军右翼距通州约二十余里的地方发现敌人。"何闻讯大惊，以为敌兵迫近，北平危急，立命备车南逃。旋悉战争形势没有继续更恶化下去，始罢。不久，蒋介石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就此结束。

编者注：此文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四辑，第79～86页。本文有几处经过张维藩、戈定远两先生的补充，他们都曾参加喜峰口战役。



孙永勤烈士传[1]

（附关元有李连贵及孙部七百余人殉国事略）[2]

闵时夫

自东北四省之失陷也，各地义士民众不分阶级，不分派别，奋其〔起〕为抗日救国之战争。参加此神圣救国事业者，以阶级职业言，有军政各界，有农民，有工人，有兵士，有学生，有商人，有地主；以地域言，不仅有关外之民众，亦有内地各省之爱国志士；以国籍言，又不仅有中华民族，且有韩国志士。此外无论生活信仰如何不同，无论国民党，无论共产党，无论回教徒，无论大刀会及各种原始农民组织如所谓红胡子者，均能毁家纾难，舍身报国，为民族而流血。此种统一救国战线之建立与扩大，实我民族独立最坚强之保证。愿我东北健儿更能团结，吾尤愿关内同胞之能以东北志士为模范也。在出身豪富，而戮力杀贼，力尽殉难之烈士中，孙永勤（又作云青、允庆）尤为轰轰烈烈之一焉。

孙永勤者，热河兴隆县附近某村之富户，而孙姓亦该地之巨族也。烈士性豪爽，颇知书史，虽家道殷实，未尝欺凌弱寡，且常周恤贫寒，故乡民亦甚敬爱之。东北四省各村镇，因地方不靖之故，素多藏枪自卫。日贼占东北后，首即从事收缴民枪，盖欲我同胞之束手待戮也。稍有延误，即指为“匪”或“马贼”。虎狼四出，雷厉风行，惨杀株连而死者，盖不知凡几也。热河继三省失陷后，日伪即分途赴各地收缴民枪。至孙村，烈士愤然曰：“吾闻朝鲜被日灭后，三家共菜刀一把，日本鬼子之凶毒，今已身受之。政府既不能保百姓，然匹夫亦有国家兴亡之责也。”遂提议抗缴民枪，全村响应。日军大怒，当枪毙烈士家属一人，以相威吓。烈士即指挥村民，将日伪军枪毙大半，并生擒凶手，杀之。旋烈士召父老兄弟及附近村民，泣曰：“亡国之民，不如猪狗，吾人即欲忍痛偷生，亦不可得。吾不忍祖国为倭奴蹂躏，故乡为倭奴荼毒，兄弟为倭奴残杀也，今决杀戮我全家老幼，舍身救国。明知此处已在倭奴大军包围之中，寡不敌众，然为祖国，为祖宗，为人格，吾决与倭贼拼命。父老兄弟有愿相从者听，老弱妇孺须速离此。”即欲杀其家属，以示决心。村民咸奋呼，决与一致杀贼，但全体婉劝勿杀家人，遂与全村妇孺老弱，统运半壁山中。烈士则召集壮丁，成立军队，附近民众亦均踊跃相从，共得健儿五百余，成立抗日救国军，并立举义之誓约曰：“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

[1]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大众书店印行，1935年12月，第29~34页。

[2] 原文为“（附宫有元李运贵及孙部七百余人殉国事略）”，其中“宫有元”为“关元有”之误传，“李运贵”为“李连贵”之排版错误，今予以更正。

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时民国23年冬也。日贼始二百人进攻。然抗日军人人如猛狮，烈士亦身先士卒，第一次大破日军，夺机关枪二架及枪弹甚多，声势益浩大，抗日军亦渐由千而万矣。至是日贼大惊，认为系伪国一大障碍，迭派大军自热进攻。烈士据险设防，日夜督战，贼不得逞，而烈士则时派小队四出，袭击日伪军，日贼深以为苦。烈士并时攻承德，虽因无攻城器械，无效，然亦使日伪心惊胆战矣。先日贼拟利诱烈士，派日人前往说降，烈士逐之，谓如敢再来，当割其耳。后日贼又遣汉奸数辈前往劝诱，烈士笑曰：“汝辈无脸，以我亦无耻之徒，能在日贼暴力下，作走狗之走狗乎？”汉奸复强聒，烈士叱曰：“如敢再饶舌，当割汝舌，为卖国奴之鉴戒。”日贼乃益恨之刺骨。自河北北部划为“非武装区”后，保安队长均逐渐换为日本忠实走狗，日贼遂命其夹攻孙部，并参入日军作战。然烈士转战长城一带，时予日寇以重创。语云：哀者必胜。烈士杀贼之时，抱必死之心，故得必然之胜利也。至民国24年4月，日贼见烈士军容日振，乃采用最惨无人道之手段，四面包围，上用飞机轰炸，下用机关枪、烟幕弹、达姆达姆毒弹并毒气进攻。然烈士仍率万人，竭力抵御，虽用陈旧之军械抵抗日贼之毒弹机枪，前仆后继，仍杀日满军队五千人，然烈士部队亦损失甚重矣。最后烈士四面受敌，乃突围入长城，以至关内可得同胞之应援也。日贼拟加堵截，然烈士所部大队斩关退入河北，毙扼守长城关隘之日贼百名，卒退至遵化一带。时日贼一面调杉原部队进击，烈士亦率众在长城内外抗战，血战三周，虽牺牲二百人，然日贼势亦不支。至民国24年5月初，大洼一带农民均起响应，即大刀会及各地其他会党，亦闻风兴起，自热河以至遵化，相从者一时数逾四万。日贼亦开始作总攻击，一面迫令兴隆县全体人民退出，以便飞机乱炸，同时并集中日军千名，伪军千名，由松井等贼，出撤河桥〔滦河桥〕进攻遵化；一面调动古北口石井部五百人经石匣镇出长城小口墙子，以攻其背；一面调川岸部由罗文峪方面进攻，同时又由所谓“非武装区”保安队由张砚田张庆余等部，作严密之总包围。日贼并请遵化县长“协剿”。县长派警队迫孙军，烈士亲至其前曰：“君中国人耶？日本人耶？如为中国人，请告余果犯何罪，余可自杀。如君为日本人，则余将杀汝也。”警官即率队逃回县城，闭门不出。然保安队及特警仍奉日贼旨意，猛烈进攻，同时日贼军大队亦于5月20日进长城，21日抵我遵化矣。至是孙部于沿途转战之余，当有原举义之志士千人，枪亦近千支，22日在遵化十里铺、茅山沟〔毛山沟〕一带与贼开始激烈战争。时孙部将李连贵率一五〇人与日贼石井部队激战，已迫日军后退。但自南面进攻者，除保安队外，尚有河北省政府派遣之军队两营加入，与日贼协同进攻。日贼又用大炮、飞机、毒弹、机枪，向茅山沟〔毛山沟〕孙军总部作残酷之轰击，附近村镇全被日军毁灭，皆成灰烬，农民惨死者亦不可胜数，受伤者群集道旁。烈士在战线中指挥，见无辜农民惨状，大恸，顾其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曰：“今弹尽援绝，又被日伪及河北省政府严密包围，吾决在此为最后之一战，君可率一部冲向热河。因如向南退，日贼又将藉口追击，进扰华北矣。”宫〔关〕烈士曰：



“吾当与君报国于此，回热之军由他人领率可也。”于是孙下总攻击令。孙在中央，手执机关枪，向日贼密处射击。宫担右翼，李任左翼，向前冲锋。而另一部则乘时突围出热河。当此时也，弹如雨下，血肉横飞，激战至25日，日伪虽亦损失甚大，然我烈士孙永勤及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队长李运贵〔李连贵〕并全体士兵均血战而死。据日贼报称，检点遗尸，凡七百余具。呜呼！血战至最后一人，无一屈服者，惨矣，烈矣！在殉国英灵之尸体中，发现孙烈士及宫〔关〕烈士，衣上均绣有姓名，全身均为机关枪所伤，遍体血肉模糊。当地居民乃含泪掩埋，而此诸抗日英雄遂与世长辞矣。呜呼，此累累之骨肉，实我民族最勇敢优秀之菁英也！

民史氏曰：当孙烈士纵横热河之际，全国报纸犹不敢不称之为义勇军。及民国24年5月初中日交换大使之后，亦日贼与烈士血战之时，乃各昧良称之为“变民”。然蒋作宾及广田之香槟酒未干，日本贼军已藉口“刺杀二亲日社长事件”及进攻孙永勤部，违约开入“非战区”，杀我同胞矣。时汉奸殷汝耕首随日贼称烈士为“匪”，而全国之报纸竟一致称烈士为“匪”，而南北当局亦加入“围剿”以媚日贼。蒋介石、宋哲元卖国政府之丧心病狂，自不足论，然我舆论界竟有少数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未有如此之甚者。而全国知识界正气为卖国政府所抑压，以至有少数甘于认贼作父，丧尽天良，贻中国文人万世之羞者，亦莫以此为甚。哀莫大于心死，吾痛莫可言矣。当日伪在国境内进攻孙军之时，所谓当局不惟不抗议，反向日贼谢罪，谓“麻烦”日本，殊为“抱歉”。不惟不援助孙军，反派兵合击，以为日贼即可满意。孰知自毁长城之后，日本不断“抗议”，压迫河北省政府移保，强迫撤退驻军及取消国民党与蓝衣社。此何事也，然蒋介石、宋哲元等卖国政府均一一为之。但日贼野心并不以为满足，仍节节进攻，五省河山，名存实亡，今无耻下流汉奸殷汝耕且立所谓自治政府并迫五省脱离中国，而河北及察哈尔又将实行所谓“特别区”矣。彼拥兵百万者，何以对烈士于地下乎？孙烈士最后以一千之兵，战日伪汉奸逾万之众，力尽殉国，无一偷生，应在人类解放史中国革命史上占一最光荣壮烈之地位。昔田横自杀，五百随之，今孙宫〔关〕烈士等七百之众，一时饮弹沙场，实尤壮烈万倍。彼等为国家争万世之光，死可无悔，然我国民能忘日贼杀我七百烈士之血海深仇乎？我中国民族仅有一孙永勤一宫有元〔关元有〕存天之正气乎？我中国舆论界中的少数分子，犹能丧心病狂，冷血无耻，称民族英雄为“匪”乎？我国民除听令日贼日日占我领土，杀我英雄，听卖国当局日日卖祖国杀忠良以外，竟能忍辱含垢不求自处之道乎？

宋哲元与七七抗战（节选）[1]

（前略）

遵化县长何孝怡庇护并接济孙永勤部问题：盖热河沦陷后，由于民众不堪日满苛政压迫，遂相率组织地方武力，对日军进行游击战。其中亦有接受我华北军政当局之委任而以义勇军名义号召者，亦有不接受我方委任者，日人则概称之为匪。孙永勤者，即热河此等军队之一部，计众三千余人，在热南地区与日军从事游击。5月上旬，日军对孙部发动攻击，孙受日人压迫，遂越过长城之线进入遵化、迁安。据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报告孙部进入遵化前后的情形："5月5日，驻马兰峪日本警备队长岩永大尉通知我方称，日军在长城一带剿匪，因避免误会起见，我团警应退至长城南二十五里。惟退二十五里，须在遵化城以南。经再三商定，退至十五里。其时日军设司令部于罗文峪内大河局，彼此联络。后日军东进，设司令部于撒河桥〔潵河桥〕北三道河，未曾通知我方。15日，正派员与该司令部接洽填防，而孙匪已乘虚入关到大屯、侯家寨等地，此当日孙永勤窜入之实在情形也。当孙匪窜入关内时，我方新旧保安队正在换防，一部分尚在开拔。遵化方面，14日仅到李宝如部三个中队，人数稀少。而匪人数据闻约一千以上，枪械颇多。故当时因兵力不敷，未能及时进剿。"

由于遵化、迁安均在停战区以内，中国军队不能自由进入镇压，保安队之微弱力量又不足以饬乱，故孙部得在遵化征收粮秣，并向遵化县长何孝怡要求供给子弹。事虽为遵化县长拒绝，但日方却坚称遵化县长接济孙部，认为违反《塘沽协定》，防害停战区内治安。5月20日高桥武官遂以一项书面通知递交何应钦，转达关东军之两项决定：追问责任并派兵进入停战区作战。通知原文曰："今晨关东军来电数次，嘱将要点转达于贵方。（一）此次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匪之事实，从来国境附近贵国方面之官吏有庇护扰乱热河之匪徒之事，此为不可容许者也，故该军问其责任。（二）关东军数月来虽实行扫除扰乱热河孙永勤股匪，然因贵国官方之庇护，辄向贵国领土内逃遁，因而不得消灭之，故不得自动将所需兵力进入遵化一带，以彻底消灭之。

日军随即进入遵化地区攻击孙部。26日，其战地指挥官提出警告说："关东军绝不能容忍任何破坏《塘沽协定》的行动。"同时，日本驻平武官处公开宣称："日军已获得证据，显于学忠曾密令各县县长与保安队援助孙部，因之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以期消灭所有的非法分子。"其欲借剿匪之名而占领停战区域，以对华北军政当局实行威胁的阴谋，昭然若揭。

---

[1] 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第69~70页。此为保存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的抄件。



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1]

从言己[2] 整理

孙永勤是兴隆县孙杖子人。1933年日寇占领热河后，同年12月，他发动了黄花川抗日暴动，发出“敌不灭，怒不息，头可断，志不屈”的呼号，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举起了“抗日救国军”的大旗，他任军长，在长城沿线给敌寇以沉重的打击。

1935年2月，在茅山〔毛山〕吴家沟被日伪四面包围，全军覆没，血染茅山〔毛山〕。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1935年8月1日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说“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高度评价了他的不可磨灭的功迹。

下边发的是他妻子和长子的回忆录。

回忆丈夫孙永勤

雷永兰 口述

我的丈夫孙永勤烈士，从牺牲到现在，掐指一算，已经有四十五年的光景了。在这四十五年的有苦有甜、有哭有笑的日子里，我的心没有一天安定过。有时候，思念苦了，白天我一个人坐在大门口，两眼望着山上的树，天上的云，好像听见了永勤带领战士冲向敌阵的喊杀声，看见了“抗日救国军”的大旗在空中使劲儿地飘摆。晚上躺在炕上，经常似睡非睡地和他在一块唠家常，要不就是他动员我，咬咬牙，带好三个孩子，说什么他也得去打鬼子；要不就是他把我带领到抗日救国军军部，一群战士把我包围起来，这个敬礼，那个问好，说我开通、明白，支持丈夫打鬼子。就这样，日思夜念，熬白了头发，哭干了眼泪，总算盼到了解放，盼来了社会主义。想想过去的苦年月，看着现在的好日子，永勤的血没有白流，他不枉是一个钢打铁铸的汉子，抗日救国的英雄。

[1] 承德地区文联编：《燕山》，1981年第2期。

[2] “从言己”为高中印、司瑞昌先生发表此文时使用的笔名，高中印先生是记录者，司瑞昌先生为整理者。

先治国　后安家

永勤从小就喜文爱武。他个子高，胳膊长，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一有空儿，就玩枪练棒。人们夸他是神枪手。他要是看到天上飞着一只老鹰，胳膊一抬，随着枪响，老鹰就掉下来。有时间还好看个书。军阀在什么地方争夺地盘啦，土匪在什么地方动手打仗啦，好像他什么都知道。1933年日本鬼子打热河的时候，听说驻扎热河的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却一枪没打，就向南逃跑了。留下的地主土匪武装更可恶，还和鬼子勾结起来，烧房子，抢东西，奸淫妇女，欺压百姓。永勤看到这个世道，愁眉不展，茶饭不进，整天整宿地猫在屋里打主意。实在憋不住了，他就耐心地劝我婆婆，动员我，他要带着老百姓打鬼子去。我不愿意："你打鬼子去，这三个孩子怎么办？"他就说："你看，这年月哪有老百姓的活路？咱们得先治国后安家呀！"

打鬼子　保中华

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卖水鞋的人。这个卖水鞋的人在西屋和永勤唠了一宿。我和孩子在东屋，恍惚听见他们说共产党怎么样啦，红军怎么样啦，日本鬼子怎么样啦，还有好多我听不懂的词儿和事儿。第二天，永勤送走客人以后，那个乐哈劲儿就甭说了。他吃完早饭就带上自己那棵大盖枪，到下板城鹿洞沟〔路通沟〕赵家庄去了。他联络赵林、赵来、赵友〔赵有〕、马宝德〔马保德〕等五个人，趁黑夜砸了大地主高程的家，每人弄了一棵大枪，连夜赶回我们的家乡黄花川。记得已经过了八月十五了，有一天，早上挺凉，我们家后台子上集合了不少人。永勤站在一个大石头上讲话："乡亲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东三省，现在又占领了我们热河，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早已经不能指望了。咱们老百姓正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等死，不能当亡国奴！愿意打日本鬼子的跟我来！"话音刚落地，忽啦一下子人们把他围起来，都喊着愿意干。永勤扫了一下乡亲们，举起拳头领着大家喊："敌不灭，怒不息，头可断，志不屈！"接着就竖起"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大旗，举行抗日大暴动，建立了"民众军"。在那个大会上，大家推举永勤做民众军的军长，以后又接着推选关元友〔关元有〕、王福合、赵四川、赵林等人做副军长、大队长、参谋长和军师。民众军成立以后，先收拾了张杖子大地主、大汉奸张如增。第一仗就给民众军壮了胆，给老百姓除了害。

日本鬼子和中国汉奸看到永勤拉起了民众军，又急又气，又骂又跳，想方设法要想消灭民众军这支抗日力量。有一天，土匪头子刘宗臣、大王龙和小白龙他们带领不少队伍围攻黄花川，永勤得到情报，就立即拉着队伍，到半路上截击这些土匪武装。经过一场恶战，打退了土



匪，保卫了家乡。

起事的这年冬天，永勤听说滦河半壁山警察署给鬼子提供情报，敛款收税，打骂群众，奸污妇女，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把他们恨透了。他就带着民众军从黄花川出发，一宿急行军，天没亮就包围了半壁山警察署，决心要替滦河百姓出出气，拔掉滦河百姓的这个眼中钉。可是打它还不容易，警察署院子里有八间草房，院墙又宽又高，敌人就凭着墙高院深死守。永勤心里想：要是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警察署，邻近几个据点的敌人知道情况后，就一定来增援，到那时候我们就不好办了。他急中生智，命令战士加强火力，牵制敌人，自己冲到离房子很近的院墙底下，把秫秸捆点着，扔到房上头。转眼之间，伪警察署就烧落架了，敌人也全部举枪投降了。随后又在关门岭和潘家口打了两个漂亮仗，春节前后队伍就已发展到一千多人。

敌人对民众军的发展和胜利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半壁山警察署的署长李海山，他的老窝被端时，他正在兴隆镇，因此才留下了他这条狗命。他一方面请求伪警备队和上板城的警察署长马扒皮增援，另一方面勾结车河口的岳老亮，收罗马拐子、大王龙和小白龙等汉奸土匪武装，准备卷土重来，消灭民众军这支队伍。他们还派一连兵，送了三封信给永勤，信中胡说什么：“早投降有官做，晚投降没脑袋。”永勤把信撕得粉碎，告诉送信的兵：“告诉你们的主子，有种的就来较量较量。”后来日子不多，汉奸和土匪的队伍分三路进攻民众军。永勤探明这个情况后，采取“诱敌深入”、“瓮中捉鳖”的战术，把队伍化整为零，埋伏在黄花川的周围。李海山和马扒皮带着队伍像恶狼一样扑进黄花川，没想到全川一片空。马扒皮知道中了计，连声说：“不好！不好！这是空城计！”正要撤兵，枪声突然四起，永勤带着队伍包围了敌人。马扒皮见死了一百多人，情况不妙，慌忙逃窜。他们刚跑到北山的一个沟口，又遇上了民众军的伏兵。经过一阵短兵相接，民众军打死了马扒皮和五十多名匪兵，还俘虏三十多人。同时，民众军的伏兵还消灭了李海山和大王龙、小白龙率领的五百多名汉奸和土匪的队伍。接着，永勤马不停蹄地率领全体战士乘胜北上，越过猴山梁，赶到车河口，抄了伪警察署，包围了汉奸岳老亮的武装据点“大成兴”。原来岳老亮在承德县大庙梁开着煤矿，有钱有势还有兵，打他可不容易呀。民众军用刚缴获的大炮，摧毁了墙角的炮楼以后，就是冲不进去。民众军刚冲到大墙的下边，敌人的火力又把他们压回来。这时，只见永勤冲到大门口，拎起油桶，把油泼在大门上，点着大门，喊道：“冲啊！”战士们一拥而上，趁着滚滚的浓烟杀了进去。冲进去一看，打死的全是家丁。鬼子和伪军到哪里去了呢？原因是这样的：打起来以后，敌人知道是孙永勤的队伍，都吓得骨软筋麻。鬼子和伪军都想逃跑，岳老亮舍不得家产，坚持死守。他们正争执不下，忽见大门起火，杀声震天，鬼子和伪军就从北面暗门逃跑了。这个暗门是岳老亮为自己准备逃命的门，外边只有半面墙，里面用秫秸挡好，用时，从里面一推就倒。战斗结束后，民众军打开粮仓，把粮食都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民众军铲除了盘踞在车河口

多年的这个地头蛇以后，又接连干掉了承德、兴隆、宽城和迁安等县的警察署。民众军不只打击了敌人，还发展了自己。在热河南部一带，民众军不论走到哪儿，老百姓都争着给送水送饭，说他们是为民除害的好队伍。

党领导　虎添翼

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根据我党中央关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派特委委员王平陆同志来到民众军的军部，向永勤耐心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王平陆同志还建议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永勤看到这支队伍有了党的领导，心明眼亮，好像老虎身上长了一对翅膀，立即按照王平陆同志的意见，整编队伍，改名为“抗日救国军”。

抗日救国军有了党的领导，士气越打越旺，队伍越战越强。柳河的张福义，蓝旗营的年焕兴，苇子峪的李连贵等人，这时也拉来队伍和永勤会师。很快抗日救国军的队伍就发展到四千多人。永勤这个抗日救国军的军长，在党的培养下，也很快地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永勤在战斗中，总是一马当先，冲杀在最前边。有一次，他带着几十名抗日救国军战士住在瀫河二堂的高作忠家。突然，伪军和土匪把高作忠的大院团团围住了，想活捉永勤。永勤认为敌众我寡，硬打不行，还是以智取胜为好。于是他命令战士把行李捆好，从后墙一个一个地扔出去。敌人听到后墙有“扑咚”、“扑咚”的声音，以为永勤要从后墙突围，便一窝蜂似地向后墙扑去。哪知道，这是永勤使用的一条调虎离山计。永勤看到敌人向后扑去，打开大门，一步跨出门外，高声喊道：“怕死的闪开，不要脑袋的过来！”还没等伪军和土匪醒过梦来，永勤已领着战士冲向南山了。

敌人看到抗日救国军在长城内外点燃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鬼子站不稳，伪军坐不牢，处处挨打受挫，恨得咬牙切齿。日军热河司令部为了制服抗日救国军，又打了鬼主意，想用软的办法拉拢永勤。1934年8月，连续派人给永勤送了两封信，又是给地盘，又是给官做，还真的送来了一张委任状。当时我正好在场，永勤看过信后，气得额上青筋直跳，一边骂一边把信和委任状撕碎，摔到送信人的脸上。

鬼子的阴谋失败以后，从各地调来了一千五百多人的队伍，向瀑河川的九虎山抗日救国军围攻。抗日救国军占据有力地形，和敌人打了一仗。敌人死伤五百多人，其他剩下的全都逃跑了。

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永勤带着战士在长城内外打鬼子，除汉奸，先后拔掉了一百多个敌人据点，消灭日伪军一万五千多人，缴获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不计其数。真是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鬼子的威风。



洒热血 献身躯

1935年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早上，永勤把抗日救国军的全体将士五千多人集合到我们家的后台子上。他还是站在起事讲话的那块大石头上，对大家说："全体将士们！今天我们要向遵化进发，到那儿改善武器装备，然后到蓟州的盘山找红军去。"立即队伍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听说找红军去，心里很高兴。永勤接着说："我们这支队伍从起事的第一天起，就是打鬼子、除汉奸。这次行军还和以前一样，不许动老百姓的一根草刺儿，违者以军法处置。"永勤从带兵那天起，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要爱护老百姓，不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有一次，一个战士拿了老百姓的东西，永勤把他关了十五天。部队临出发的时候，永勤几次叮嘱我，让我放心，不要惦着他。我看着他那礼帽上的十几处枪眼，扶着他那患重病的身子，实在叫人心疼。可他是硬汉子，骑上那匹和他出生入死的枣红马，就带着队伍出发了。

我站在村头望啊，望啊，队伍已经走远了，我还在望个不停。

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下午，我听到西南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想那一定是遵化一带，抗日救国军和敌人打上了。抗日救国军过去没打过败仗，现在又兵强马壮，不会出什么意外事吧？我坐卧不安，一天不知道有多少回到后台子上望着西南方。听着炮声，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一直到二十四日晌午，炮声才不响了。我在家里一直没有听到永勤的音信。突然在三十日那天，几个抗日救国军的战士抬着两个伤员来到了我们家。这时他们才告诉我：

二十二日那天，抗日救国军就进入了遵化境内。国民党遵化县长"白脸狼"，一方面在鬼子的指使下，用"帮助"、"合作"等甜言蜜语来欺骗抗日救国军，另一方面又和鬼子加紧勾结，设下了一条毒计，想把抗日救国军一网打尽。抗日救国军开到茅山〔毛山〕时，鬼子就从喜峰口、潘家口、迁安、兴隆、承德等地调来了五千多人，还有国民党于学忠的部队一万多人，把永勤他们抗日救国军围个水泄不通。地下有大炮轰，天上有飞机炸。永勤身带重病，还是沉着指挥战斗，用"抗战到底"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鼓动战士勇敢杀敌。在永勤的指挥下，经过两天两宿的战斗，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鬼哭狼嚎，抗日救国军有一千四百多人最后突出了重围。可是永勤和关元友〔关元有〕、赵四川、王福合、赵林等人，还有大部分战士，因为弹尽粮绝，先后牺牲在战场上，为中国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永勤牺牲的消息，像晴天的炸雷一样，把我打蒙过去了。好半天我才醒过来，放声痛哭。永勤死了，抗日救国军被打散了，三个孩子还小，这日子该怎么过呀！哭完了想，想完了哭。最后我把心一横，还得咬着牙闯，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这是永勤的根哪！后来敌人到处抓我，我就带着孩子躲进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四处流浪。那个时候的苦日子，是不敢回想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我们才像一家子人家啊！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还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说：“孙永勤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我听说以后很受感动。

1978年，原热河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把永勤的塑像亲自送到承德烈士纪念馆，让人们瞻仰永勤的遗容，记住民族英雄孙永勤的名字，我更受感动！

永勤，你的血没有白流，你生前盼的那个好日子，现在咱们已经过上啦！

忆爸爸几件事

孙文邻〔孙文伶〕 口述

日本进关以前，我们家乡一带，土匪到处绑票，搅得人民不得安生。为了打土匪，各地都成立了伙会和自卫团一类的组织。我父亲孙永勤是黄花川一带的自卫团团长。有一次，土匪集结了二百多人，想进攻黄花川，我父亲就带着人到罗降梁去迎战。因为人少，武器差，打不过土匪，我父亲就写信联络喜峰口、潘家口、车河口、寿王坟一带的伙会，让他们来支援。那次他们来了不少人，才打退了土匪的进攻。打那儿以后，土匪恨透了我父亲，经常派人抓我父亲。

日本进关以后，我们家来了一个卖水鞋的人，我父亲留他住下了。晚上，我跟着我父亲和那个卖水鞋的人在西屋睡觉。他们俩山南海北地拉了一宿，又是“革命”又是“共产党”，又是“红军”，因为我年龄小，也听不懂，也记不住。吃完早饭，我父亲买了一双，给他十块现大洋。我父亲自从听了卖水鞋那个人的介绍，心里油煎火燎，坐卧不安。在这之前，他跟我奶奶商量过几次：“妈，你看日本鬼子已经打进了咱们中国，我不能再待在家里了。不赶走鬼子，国也不宁，家也不安呀！”我奶奶怕得不着儿子的济，就是不吐口。现在我父亲又劝奶奶，还是要打鬼子去。我奶奶没办法，就在屋里和我妈她们娘儿俩哭了一场。这天我父亲就趁黑夜离开了家乡，到承德县鹿洞沟〔路通沟〕赵家庄去了。那是阴历九月前后，在鹿洞沟〔路通沟〕待了七八天，联络了赵林、赵来、马宝德〔马保德〕，还有一个姓柴的，他们一共五个人，拜了把兄弟。在那儿砸了一户恶霸地主，每人弄了一棵大枪，就回到黄花川干起来了。

我父亲为了打鬼子，把我们的家产都搭进去了。他们哥儿们分家时，我父亲不但没分到家产，还背了一身的账。为这个，我母亲还想不通呢。

我父亲为了发展队伍，壮大抗日力量，单就为武器一样，就操碎了心。有一次，我父亲听说黑河套的一个客店常有大烟贩子来往。大烟贩子从北边下来的时候，总要带着大枪和手枪。到这个店以后，就把大枪留下，只带着手枪，赶着大烟驮子，到关里去倒卖。等回来时，再把



大枪带走。前几天，正有十八个大烟贩子在这儿住过，现在到关里去了。我父亲就带着人跟店主要枪。店主不给，我父亲就治他一顿，他才被迫交出了十八支大枪。接着又到寿王坟，向孙永香要枪。他不给，就把他家抄了，带走了二十支大枪。从那儿回到车河口，又从老姜家要了几支枪。队伍从转角楼过来到澈河，从井连芳家要了七八棵枪。瀑河口的老任家，尖宝山的老周家，都给了一些枪。这时队伍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立即出师宽城，攻打土匪杨秀山。那次他们打了一天两宿，缴获了三十支大枪和很多子弹。然后又抄了车河口大恶霸大汉奸岳老亮的家。这次他们得到了很多的钱和粮食，除留一部分作军用外，其余都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我记得还用好几条大船由滦河送到河口不少呢。

队伍发展起来以后，组织也健全了，我父亲当军长，关元友〔关元有〕当副军长，赵四川当参谋长。全军分三十八个中队，下边分排班。军部下边还设了军法处，是专管队伍纪律的。

我父亲要求战士在打仗时不但勇敢，而且还要遵守队伍的纪律。有一次，我父亲驻在清河塘，站岗的向他报告说，鬼子坐着四五条大船从滦河上面下来了。我父亲立即组织队伍，趴在房子上拦截鬼子。鬼子仗着人多，就冲上岸来，把我父亲他们的队伍给打散了。最后，我父亲他们二十多人被包围在北山头，情况非常危急。军法处的赵林连写了两封信去瀑河口，调两个中队来解围。可那两个中队都没来。后来，我父亲突围出来以后，就转到瀑河口，对这两个不服从命令的中队队长，给予了降职等严厉的处分。

有一次，我父亲得到侦察报告，说一个中队队长陈志在外面又抢了老百姓的两驮子东西，准备偷偷送回家去。那天晚上正好有月亮，我父亲骑着马，带了四个人，去堵陈志。我父亲看到陈志过来了，就大喊一声："陈志！""有！"陈志的话音刚落，我父亲的手枪就响了，正打在陈志的腿上。警卫员把陈志拽下马来，摘下帽子绑上了。经过详细了解以后，知道他屡教不改，最后处决了他。

还有一次，有一个姓陈的班长到车河口去抢，在路上把一个姑娘的包袱给抢了，还强奸了她。这个十八岁的姑娘是个孤儿，靠表哥支撑着过日子。表哥领着这个姑娘来到黄花川下面的车河沟找军长。站岗的赵文义不让他们进，这姑娘就说："军长要不管这事，我就死在这儿！"赵文义没法，只得进来报告我父亲。当时我母亲也在军部，就把这个姑娘请进来了。这个姑娘进屋就给我父亲跪下了。父亲让他起来，问清来由，说："你认得这个人吗？军法不留情，杀错了可不行啊！"姑娘说："认得！"我父亲下命令立即集合。队伍集合以后，我父亲的警卫员孙文深拔出手枪，领着那个姑娘一个一个地认。等认到五六排的时候，姑娘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姓陈的。警卫员上前把他从队伍里拽出来，问我父亲："怎么办？"我父亲命令把他绑上。警卫员上前一脚，就把那个姓陈的给踹倒，用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带到屋里，问清了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以后，就开了大会，枪毙了这个班长。姑娘感动地给我父亲跪下了，还大声哭

起来。我父亲忙扶起她，指着关元友〔关元有〕和赵四川说："这都是你的叔叔。"最后，我父亲送给这位姑娘五块现大洋，关元友〔关元有〕和赵四川也都给了她三四块现大洋。因为天要黑了，我父亲还派了一个班，护送她们哥儿俩到车河的桦榆沟〔化渔沟〕。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也跟父亲在队伍上干过几个月。有一次，我父亲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打仗，我也死皮赖脸地要跟着。我父亲不让去，我说："给我一匹马，我就不去！"我父亲和关元友〔关元有〕、赵四川两个叔叔一商量，都说行。我看上了赵四川的马，他着急地说："大侄子，你真地要我的马吗？我还得打仗啊。"我没法，只得要了别人的一匹东洋白脸大红马。临走时，我父亲嘱咐我说："我们先走，过几天，你和这位叔叔（一位参谋）再走。"我很高兴，背着小马枪，就和留下的一位参谋放马。有一天，马惊了，把那位参谋给拽倒了。那位参谋没办法，只好撒开手。大洋马就像一阵风似地跑没影了。后来，听说在莫古峪〔蘑菇峪〕正遇上一队伪军，把马给抓住，带走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难过：我不但没给抗日救国军立过什么功，还招来这么一个损失，真是不应该啊！

冀东的开辟与反复[1]

聂荣臻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就已经开始注意冀东地区了。

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就把魔爪伸向了冀东。它的如意算盘是，占领了冀东，不仅可以控制从东北到华北的大陆交通线，而且可以把它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七·七事变"前后，日军进攻我国内地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几乎都是经过冀东运送的。

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了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指示说，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来电报，指示说：以雾龙山（即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

[1]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同志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

我向邓华同志交代任务的时候，把冀东的情况全面地向他作了介绍。我说，现在冀西、冀中、平西革命的游击战争发展很快，对冀东人民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冀中，因为紧靠冀东，影响更大。就冀东的群众基础而言，也并不比冀中和冀西差，这个地区早就有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遵化、玉田一带农村，也有我们党长期的工作基础。日本帝国主义进占华北以来，冀东地区是最早受害的，那里的群众受压迫最深，对亡国的苦难尝够了。目前，地方党的同志在群众中进行了深入的发动工作，基本群众已被我们掌握起来了。因此，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是很有条件的。同时，中央也要求我们做好冀东的开辟工作。你们的责任是很重的，要足够地估计到日本侵略军在冀东搞了那么久，是决不会轻易让你们在那里立足的。因此，你们到冀东以后，要紧紧地依靠地方党，发动群众，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

邓华同志问我，开创根据地，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我告诉他，就冀东来讲，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地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的局面来。不能到了那里，扩充一些部队，抓一把就走。“抓一把”，是抓不到东西的，同时，那是同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相违背的。

邓华同志领受任务之后，按照军区的部署，第一步先是开辟平西地区，为挺进冀东取得前进的基地。邓华支队在一分区部队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向平汉、平绥铁路沿线和察南地区发展。邓华同志在写给军区的报告中说，一路所见，群众抗日情绪很高，所到之处，纷纷自动募捐慰劳我军，有的地方连商会、税务局也给八路军捐款送物资，支持抗日。在群众的支持下，他们打击敌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发动群众，逐步开辟了房山、涿县、涞水、良乡（今属房山）、昌平、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等地，在一部分县份建立了抗日政权和抗日救国会，扩充了部队，组织了自卫队武装。挺进冀东的第一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前进基地。

这个期间，中共冀热边特委两次派人来联系。一次是到平西找邓华同志，一次是来阜平找我。他们介绍了冀东地区群众发动的情况，谈到那里的工农基本群众已经被吸引到党的周围，开展起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唐山的煤矿工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罢工，群众的抗战热情很高，形势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程度。经过商量，我们约定，在邓华支队进军冀东的时候，在整个冀东地区发动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来一个里应外合。邓华支队进军的时间，定在这年6月。

1938年5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将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的建立，

为开辟冀东提供了有利条件。进军之前，第四纵队还进行了整训。

冀东人民的武装抗日大起义和我军挺进冀东的准备工作，至此已经基本就绪。这个时候，正值日本侵略军准备进攻武汉的前夕，敌后兵力空虚，是开辟冀东的大好时机。我们要求宋邓纵队首先袭取兴隆，然后，宋时轮同志率一部向密云、平谷、三河、蓟县方向进击，邓华同志率一部向兴隆东南、遵化、迁安等地进击，以推动冀东武装起义的爆发。冀东武装起义和我军挺进的计划上报中央和总部后，中央和总部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

第四纵队6月份向冀东进军，连战皆捷。冀东的老百姓在家乡沦亡了几年之后，看到八路军大部队开来，真是喜出望外，欢欣若狂，对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的爆发，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38年7月上旬，在冀东地方党的领导下，冀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冀东起义声势很大，发展迅猛，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后来经过中外通讯社的广播，冀东起义曾风闻于世界。那次起义，有丰润、滦县、迁安、蓟县、遵化、昌黎、乐亭等几个县。冀东人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李运昌同志曾对我讲过，各地武装起义相继爆发，规模和气势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料。原定成立六个总队，结果，呼啦一下子搞起三十九个总队。报名参加起义的总人数突破二十万，除去老弱，光编进部队的武装战士就有十万人。

8月份，第四纵队和冀东起义的队伍会师于遵化，并且已经攻克了六座县城，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宁铁路。至此，冀东根据地开始显出了端倪。

冀东起义爆发后不久，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的马辉之和姚依林同志先后到达冀东，以加强领导。

对于冀东军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党中央和北方局曾发电祝贺，并对建立冀东根据地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正当冀东军民落实中央指示的时候，9月中旬，传来日本侵略军要大举“围剿”冀东的消息。在那里开辟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在平原不好坚持，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因此，作出了把部队带到平西整训的决定。党中央和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以及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都曾去电拦阻，指出：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是很不妥当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进行整理，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也要全力建立基干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这些指示无疑是及时、正确的。但是，有的同志仍然认为冀东的形势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决定部队大规模西撤。结果，正如中央在电报中所预言的，部队西撤遭受了挫折。除了作战伤亡以外，由起义群众为主新组建起来的部队，士气低落，发生了严重的离队现象。撤到平西的时候，



十万之众的起义军只剩下很少的人数。第四纵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也受到了很大损失。

部队西撤遭受挫折之后，11月25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来电指示说，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这一电报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认为冀热察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决定成立第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

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1939年2月初，在平西正式组成了冀热察挺进军，由萧克同志任司令员，并由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同志组成了冀热察军政委员会。随后，成立了由马辉之、姚依林、萧克同志领导的冀热察区党委，由马辉之同志任区党委书记。不久又成立了冀东军分区，由李运昌同志任司令员，成立了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由李楚离同志任书记。在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的领导下，由李运昌、李楚离等同志在冀东具体组织，逐步进行恢复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

冀东根据地在抗战前期始终是不很巩固的，曾几起几落。对于这个问题，北方分局曾于1940年3月在北岳区召集了挺进军和冀东部分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对冀东起义和第四纵队撤离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检查和总结，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提高了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信心。

我在那次会上曾作过一个比较长的发言。我讲的大致意思是：冀东的位置很重要，中央高度重视冀东的开辟工作，群众基础也很好，地方党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建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冀东人民的大起义和第四纵队的挺进，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代价。冀东党组织对坚持那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而且许多同志为此英勇牺牲，这应该肯定。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还是那个“抓一把”的思想。想扩充些部队拉起来就走，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群众好容易把我们盼去了，才搞了一个眉目，又要把部队拉走，当然会使他们感到失望。同时，刚刚参军的群众，没有经过很好的整训，又没有根据中央和军区的指示，认真地将八路军主力分散到起义武装中，去领导和巩固这些部队，而是不顾他们的实际可能和切身愿望，让他们远离家乡长途行军，怎么会不发生群众大批离队的现象呢！加上一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就很难把部队带出来。结果是，想“抓一把”，抓到的东西不多，反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当然，冀东党组织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武装起义，事前缺乏足够的准备，事后组织工作也没有跟上，这也是起义成果未能得以巩固的原因之一。所以，开辟一个地区，一定首先要着眼于广大群众，经过艰苦的斗争，把工夫下在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这样一个

基础上。

这次会后，冀东的斗争形势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尔后的事实证明，尽管冀东的斗争相当残酷和困难，但是创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是可能的。经过冀东军民长期顽强的战斗，我们终于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期望的目标，创立了拥有五百六十万人口的冀热辽根据地，建起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不仅成为敌人咽喉地带的心腹之患，而且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

冀东抗日大暴动[1]

李运昌

发生在1938年7月到10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是我党在敌后组织的一次有二十万工农群众参加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在日伪军政的残酷统治和严密控制下，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发动起有这样多人参加的遍及整个冀东的武装起义，是党中央毛主席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冀东游击战争方针的胜利；是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使工人和农民相结合，争取同盟者，实行统一战线的胜利。

冀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北据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津，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战场。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物产可资军需，而且有深山密林可供迂回。所以，自古以来，凡有战略眼光的将帅无不想踞而有之。

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后，为吞并整个中国，必须要先行夺取冀东。所以，早在1933年初，他们就兴兵攻占长城各口。当时，驻守在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带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奋起反击，后因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而告失败。5月26日，冯玉祥将军率“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了“察北抗战”。就在“察北抗战”的捷报不断传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意迎合日寇，卖国求和，于1933年5月31日，同日寇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即把冀东划为

[1]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53页。



所谓“非军事区”，实际上是把冀东主权拱手让给了日寇。到“何梅协定”达成以后，冀东就完全沦陷了，成为日寇扩大侵华战争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

冀东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人民，他们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1933年冬，冀东北部的迁西就曾发生过人民的武装暴动。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迁西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党和群众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兴隆县的孙永勤扯起抗日的义旗。这支队伍在我党的帮助下，曾在长城内外辗转抗日，战绩累累。国民党反动派竟同日寇暗中勾结，将起义军诱骗到遵化县境内，然后四面围攻，致使起义军伤亡一千多人，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壮烈牺牲，剩下的一千多人突围星散，长城内外一片恐怖。

1937年5月，我赴延安出席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听了刘少奇同志作的《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讲话，心里亮堂多了。在白区工作会议上，我汇报了冀东的情况和冀东党的想法，同时，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的文章，反映冀东人民迫切盼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心情。

当时，毛泽东同志以他的雄才大略和对整个战局的了解，已经注意到冀东了，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出奇制胜的计划。“七·七事变”后不久，我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国内形势，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的具体计划。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在孤悬敌后的冀东开辟根据地，无疑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当时，只有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才具有这样的胆略和气魄。

一

洛川会议后，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西，首战平型关，然后分兵进驻五台山区，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准备按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开辟冀东。为了配合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刘少奇同志指示河北省委，立即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组织抗日游击战争。这是去临汾向北方局汇报工作的李大章同志回天津传达的。具体内容是：我八路军已渡过黄河，正向太行山及北岳区进发，河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城市工作要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活动，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动员一批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等去农村，并尽量去平津周围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准备发动冀东和平西的游击战，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少奇同志还强调指出：冀东和华北的其他地区不同，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敌人有多年的统治基础，所以发动游

击战争的任务将是很艰巨的；同时它又有很有利的条件，冀东有我党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党组织有一定的基础，群众不堪忍受敌伪的长期残酷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抗日要求，加之华北敌后我党我军已广泛行动起来，全面抗战的形势正在展开，这对冀东群众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动。因此，要不失时机抓紧准备冀东武装暴动。因为我是冀东人，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少奇同志决定要我速回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立即着手组织发动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

我接到少奇同志的指令后，当即向马辉之等同志交代了工作，于1937年10月秘密回到冀东。我走后由马辉之继任省委书记，姚依林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李大章调北方局工作。

我到冀东后，很快就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王平陆等特委负责同志接上了关系，并开始工作。当年11月，党又派胡锡奎同志赶来冀东，到北宁铁路南组织京东特委，以便发动群众，同冀热边互相配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此，北方局还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二同志来冀东，协助我们开办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暴动骨干。李润民、孔庆同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来后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来电报，指示说：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根据这一指示，晋察冀军区从八路军中抽调了一支队伍与一部游击队，先行开辟平西（今北京西部），取得前进基地，作为挺进冀东的第一个步骤。

河北省委也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专门就冀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省委认为，冀东的党组织成立较早，在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特别是自1936年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工作以来，纠正了“左”倾错误，使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在八路军的直接配合下，发动冀东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于是陆续向冀东增派干部和平津的革命学生，为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做准备。同时，在天津成立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由军委书记林铁同志负责，培训干部。

当时，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确实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这里有坚强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党组织，有经过斗争锻炼的干部、群众。由于日寇侵占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尔后又在冀东成立了汉奸政权，冀东人民深受蹂躏之苦，所以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冀东不仅地势有利，而且“人和”——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同盟者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是团结的。团结抗日，是起义成功的先决条件。

冀东南有平原，北有群山，物产极其丰富。起义军不仅可以在这里纵横驰骋，而且可以在这里得到物资供应和人力的补充。特别是这里的民间有大批枪支弹药。据当时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计，冀东二十二个县就有民枪二十三万支。这样多的枪支对于武装起义军是非常



有利的条件。

在冀东发动暴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这里的工业发达，有一支觉悟高、战斗力强的工人队伍，特别是开滦矿工队伍。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早在1922年就在这里建立并开始工作了。工人运动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执委的领导下，在王尽美、邓中夏的具体指导下，日益高涨。开滦同盟大罢工，北宁铁路罢工……而每次罢工都影响到农村。因为工人大都来自农村，他们同农民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工人的斗争不仅得到农民的同情，而且影响了农民，使农民的斗争觉悟逐渐提高。

为了把工农及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河北省委还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专职负责人有李楚离、王仲华等同志。参加该会的还有许多教授和社会名流，如杨秀峰、张申府、杨十三、洪麟阁等。其中杨秀峰、杨十三、洪麟阁均是冀东人。不久，又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我任主任委员，洪麟阁、杨十三、高志远等都参加了这个分会。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分会。分会大力争取地方士绅、乡保长和民团，共同抗日。仅丰润、玉田、迁安、遵化、昌黎、乐亭等县“自卫会”的会员即达一万五千余人。党还通过各种群众团体——救国会、齐心会、工会、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等，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为达此目的，必须依靠党的组织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因此，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宣传，秘密印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写有“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等内容的标语和传单，传播我八路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揭露日寇在冀东各地的侵略暴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借以激发全体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必胜信心。正苦于没有出路的广大群众，经过党的宣传教育，看到了前途和出路，纷纷加入我党领导的各种抗日团体。这样，工农基本群众就被团结到党的周围。

“七・七事变”前，根据《塘沽协定》，冀东被划为“缓冲区”，冀东的地主、商人及其上层人物尚存苟安心理。但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有了变化。日寇进一步强化他们在冀东的殖民统治，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步步紧逼，这就直接威胁到上层人物的切身利益。过重的军需摊派，加上特务的敲诈勒索和土匪的趁火打劫，闹得他们几无宁日。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开始倾向抗日，参加了“自卫会”。

1937年12月，冀热边特委与京东特委在滦县的多余屯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开得很热烈，除讨论了继续加强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外，还通过了立即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决议，并决定由特委军事部长王平陆同志负责组织一支队伍，立即开始游击活动。

会后，王平陆同志调集了一批党员和原有的游击小组，编成“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由他任司令员。在这支游击队夜袭伪“满洲国”的清河沿“国境”警防所时，王平陆同志不幸中弹负重伤，于1938年1月8日光荣牺牲。王平陆同志牺牲后，由彭夫、孔庆同、高存等同志重整旗鼓，扩大队伍，继续斗争。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昼伏夜出，潜到长城外去打兴隆县药王庙等伪满据点。这些小规模的远距离奔袭虽未取得重大成果，却为尔后的大暴动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准备了武器。特别是经过真刀真枪的游击活动，攻下敌之据点，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其本身就是很好的抗日宣传。

1938年春，根据北方局刘少奇同志电示，河北省委派李楚离同志去阜平，向聂荣臻同志汇报工作。聂荣臻同志听完汇报后，请楚离同志转告河北省委：晋察冀军区已遵照中央指示，命一分区政治委员邓华同志率部抵平西活动，准备挺进冀东，配合冀东抗日武装起义，河北省委要派人直接和邓华同志联系。根据这一意见，河北省委又派楚离同志到平西，与邓华商定八路军东进计划和武装起义的有关事项。

当时，省委还根据邓华同志的要求，派人随部队行动，在省委和邓华部队间建立了直接联系。接着，河北省委通过“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会议。李楚离、王仲华、朱其文和我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国民党人士王若僖、赵显斋以及洪麟阁、高志远等人。这次会议，对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作了具体安排。至此，河北省委认为，冀东武装起义的条件业已成熟，并把各方面情况及发动起义的想法及时向北方局作了汇报。

1938年4月，刘少奇同志急电河北省委，命省委负责同志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起义准备情况。4月20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在给彭真、聂荣臻同志的电报中指示：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邓华部队向冀热边发展。5月下旬，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同志抵延安向中央汇报，少奇同志听完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马辉之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主要精神是：冀东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好的，但一定要看到，冀东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敌人决不会轻易放弃它；冀东不同于冀中、冀西、冀南等地区，它孤悬敌后，所以在那里发动起义，不但要有充分的准备，还要有八路军的策应和其他根据地的配合，否则，即便发动起来，也难以巩固和坚持；中央已派邓华、宋时轮率部挺进冀东，起义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的时间为准；冀东起义后，在天津的河北省委即派马辉之、姚依林到冀东去，接受晋察冀军区和北方分局的领导，负责地方党政工作；起义后，要以八路军为主，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

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团结友党友军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在根据地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可请有影响又靠近我们的有威望的民主人士作冀察热宁边区政府主席；另外，冀东的民团、保安队、警察等，其基层成分多为破产农民，其上层人物中有的人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对他们要注意争取、教育和改造，以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在极其紧张的状态下进行了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这时，冀东又发生了两件对起义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一件是开滦煤矿三万五千工人为时五十多天的大罢工；一件是乐亭、滦南三千雇工要求长活价（工钱）的斗争。

开滦大罢工发生在1938年的3月16日。那时，开滦工人在日、英帝国主义压迫下，生活日益恶化，加上伪政府大量发行伪钞，物价飞涨。工人们挣来的那点工资，连自己一个人的最低生活也不能维持。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英国资本家还借口战争，煤的销路减少，决定取消工人的抚恤金，并减薪、减年终“花红”等，还以解雇工人、关闭厂矿相威胁，企图把工人多年争得的福利一笔勾销。为了生存，许多工人不得不打连班，挣钱养家。可是，矿上又实行了“井下记工制”，设立了“牌子房”，不准工人打连班。而工人们为了排队领工牌，还得搭上一两个小时。工人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3月15日，赵各庄矿务局强行设立井下“牌子房”。工人们不干了，他们扔掉工牌，捣毁“牌子房”，开始怠工，并于3月16日夜间宣布罢工，提出取消“井下记工制”，每日增加工资一角二分，不准开除一个工人等三项条件，还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组织了武装纠察队。第二天早上，罢工工人包围了公事房，同“矿司”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矿务局保安队蛮横镇压，公然开枪射击。工人们忍无可忍，呐喊着扑向矿警保安队，与他们展开激烈的肉搏。最后夺来步枪数十支，打散了保安队。工人们也为此付出了鲜血，有几十名工人负伤或献出生命。

3月24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林西、马家沟矿相继罢工。唐家庄矿资方为了防止本矿罢工，收买了一批工贼，成立了“护矿队”，对工人进行控制和镇压。赵各庄矿工人积极援助唐家庄矿工人，在节振国领导下，数千名工人手持斧头、大镐直奔唐家庄矿。经里应外合，共同战斗，击溃了“护矿队”。于是，唐家庄矿宣布罢工。唐山矿是敌人统治最严的一个矿，但经过斗争，终于也宣布罢工。这样，开滦五矿三万五千多矿工，就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步伐，统一口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经过五十多天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当年6月，乐亭、滦南爆发了雇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那正是麦收时节，三千多名农业雇工在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罢工，要求长活价。雇工们还喊出了“青纱帐起来抗日去”的口号。

开滦罢工和雇工斗争先后呼应，此起彼伏，打乱了敌人的统治秩序，取得了胜利，鼓舞了冀东人民的斗志，同时也使许多上层人物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增强了信心。至于共产党员，热

情更高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惜粜粮、出地、卖牲口，筹措资金购买武器。有的同志实在无钱无物，就走亲串友去借，甚至拼着性命同敌人抢枪。打进保卫团、警察所的同志，经过前一段的工作，也争取了相当多的人。

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共河北省委为了便于对暴动实行统一领导，决定将冀热边特委同京东特委合并为冀热边特委，胡锡奎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专负责军事工作，任抗日联军司令员，并将暴动计划上报中央。时值日寇进攻武汉前夕，敌后兵力空虚，正是暴动的最好时机。中央北方局很快就批准了暴动计划。

由于没有无线电等通讯联络设备，又处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之下，我们不知道八路军挺进冀东的确切情况，所以在6月下旬召开田家湾子军事会议时，未能将八路军到达靠山集一带的情况考虑进去。田家湾子军事会议是大暴动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党的负责同志外，还有同盟者洪麟阁、杨十三及高志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起义行动纲领，决定了起义队伍的名称是“冀东抗日联军”（下称抗联），番号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总队。抗联共分三路：一路司令是洪麟阁，主任杨十三，辖第一、第二总队；二路司令李运昌，主任是胡锡奎，辖第三（蓟县）、第四（丰、滦、迁）、第五（滦县）三个总队；高志远辖第六总队。为了加强党对同盟军的指导，河北省委还派党员干部王仲华、李楚离二同志以“华北自卫会”委员的身份，分别指导高志远和洪麟阁部，这样，大暴动就完全置于我党的领导之下了。会议决定在7月16日起义。

三

1938年5月，中央将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调来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下称四纵）。宋时轮、邓华同志分任司令员和政委。6月8日，四纵兵分两路向冀热边挺进。邓华同志率领的一路，连克敌人的许多据点，沙峪一战，全歼日军一百余人，使沿途敌军大为惊恐。宋时轮同志率领的一路，东渡潮白河，大踏步进入冀热边境，打州破府，不断告捷。6月20日，蓟县民团队长夏德元、赵合，打死马伸桥警察分局局长王树森后，率民团三百余人宣布起义，迎接八路军东进。6月下旬，四纵主力到达蓟县的靠山集、将军关、下营一线。26日，徐志、王维昕提前于丰润起义，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九支队（后改称第五支队），先后打下三女河、牛郎山警察局和王官营民团团部。

四纵的快速东进，引起日军司令部的注意，他们慌忙调集冀东各地的日伪军，赶到长城线去拦截阻击。伪军、民团的士气本来就不高，从四面八方赶来时，还没有看到八路军的影子就自相惊忧起来，纷纷逃散。在逃跑途中，他们传出了“八路军来了”的消息。久盼天晴的群



众，听到这个消息，欢喜若狂，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冀东全境。冀东的人心大为振奋，敌伪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动摇，革命的人民再也等不下去了。

这时，我们又从打入伪“冀东道”内部担任警务科长的朱欣陶同志处得到情报：（一）我八路军部队已到达蓟县靠山集一带；（二）为防止暴动，日军马上就要收缴散在冀东民间的二十三万支枪。

形势紧逼，情况危急，暴动不得不提前举行。

7月6日，滦县的高培之和李润民、张鹤鸣、张振宇等同志发动当地农民起义。那天夜里，三百名经过秘密组织的骨干队员齐集港北村，宣布起义，成立了抗联第五总队，下设三个大队，李润民任总队长，高培之任政治主任，张鹤鸣任参谋长。天亮后，部队按原定计划四处活动，进行宣传、收集民间枪支、摧毁伪政权等工作。这些举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纷纷起来响应，有的带枪入伍，有的为起义队伍烧水做饭，呈现出一派胜利景象。

当时，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二路司令部都设在迁西的西庄村。这个村子是个山庄，又是地下党负责人魏春波同志的家乡，群众条件非常好。在魏春波等同志的努力下，仅在西庄一带就组织了一个暴动大队。暴动时，我和胡锡奎、苏林燕、孔庆同等同志就住在这里。在“七·七事变”一周年那天，我们发出立即集合的命令，西庄、铁厂、王官营、新集等地的四百多名基本队员一齐拥向岩口村，在腰带山下打出起义的大旗。这支起义军编为第四总队，由孔庆同任总队长，阎锡九任副总队长，丁振军任政治主任（当时未到职）。

在起义那紧张而兴奋的日子里，胡锡奎、苏林燕、张志超、魏春波等同志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记得胡锡奎同志亲自写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还坚持一笔一画地写，尽管他眼睛熬得通红，情绪却非常乐观。群众的情绪就更不用说了，起义前，他们赶做红旗、袖标，起义后，又为我们烧水、做饭、送信、贴标语和布告，连小孩子都跟在我们后头跑来跑去。

港北、岩口起义后，各地抗日健儿群起响应，遍地是红旗，遍地是赶来参军的群众，歌声、笑声、口号声夹杂着零星的枪声，真令人激动啊！

起义开始后，敌人还妄想扑灭这熊熊烈火。7月10日，遵化县伪保安队步兵和骑兵一百三十多人扑向我铁厂镇。四总队闻讯后，在孔庆同带领下赶到铁厂北玉皇庙迎击敌人。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俘敌八十余名，缴马十一匹，余敌溃散。此役吓得遵化县敌人紧闭城门，再也不敢出城。接着，起义军又攻克兴城镇。兴城镇西北面的重镇三屯营伪警察巡官宣布起义，并派代表欢迎抗联进城。迁安、遵化、丰润边境的起义群众，一齐向这里集中。在几天的时间里，四总队就扩大到一千四百多人，遂扩编出三个总队：十一总队，总队长阎锡九，政治主任徐振铎；十二总队（迁西澈河桥起义部队），总队长张秉东，副总队长程铁军，政治主任叶田（宋启兴）；十四总队（迁西新集、迁安杨店子起义部队），总队长陈汉民（后为苏

然），政治主任韩东征。

四总队从三屯开到丰润的王官营，平息了那里的民团叛乱，又掀起一个入伍抗日的高潮。仅王官营一带就参加了二千多人，许多人都是带着枪支入伍。许多地主上层人物也主动捐款献枪，民团团丁、伪警察自动来投的很多，队伍很快就增加到四千多人。后来，一个总队实在容纳不下了，便将在丰润刘家营一带起义的刘锡彤、谷云亭同志所部扩编成第十三总队。这时，丰、滦、迁、遵各地党领导的起义，有如山洪爆发，一齐奔涌而出。在遵化西部，李子华、马子敬成立了新五总队；在遵化南部，石林、甄凤阁成立特务一总队；在唐山北，刘锡纯、蒋林斋、岳武部一千五百余人成立了第十五总队……

在昌、滦、乐方面，李润民、高培之率领的第五总队于7月8日过北宁路，安各庄警察局长周维斌率全体警察和民团百余人起义响应，起义后与于振忠领导的昌黎起义军合编为第九总队。随后又有铁局寨、商家林一带起义队伍赶来集合，几天内就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

7月15日，五总队和九总队（驻甄庄）转向北宁路南，驻扎在糯米庄、邹家洼、杨家院一带。滦县伪保安队三百多人赶来镇压，李润民、张鹤鸣等决定打伏击，歼灭这股来敌。这天上午八时许，敌人排成一字长蛇阵，耀武扬威地直奔杨家院而来。当他们刚刚进入半拉山口时，我事先埋伏好的部队突然开火射击。敌人除骑兵外全部被歼，伪保安队长刘韬被活捉，两个中队长被击毙。这一仗消灭伪军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二百多支。

在五总队南下到茨榆坨时，部队扩大到三千余人。这时高小安同志率领一千多人的起义队伍赶来会合，遂编成第十三总队。队伍开到司各庄与吴绍舟部队会合，编成第十四总队，在倴城与高志远的第六总队会合后，共同东进，进攻乐亭县城。攻克县城后，阎达开、李振华、黎巨峰、田自修、张其予等乐亭县起义负责同志立即在城东、城西率千余人起义，并配合五总队攻下胡家坨镇。这支队伍编成第十总队。在我党的策动下，乐亭沿海的盐警队起义，成立第三十九总队，打下汤家河据点后，部队发展到三千多人。此外，在滦县，李永玺、石占山的队伍和乐亭县的王静安等部也发展到二千多人，于是又扩编了特务第一、第二总队和一个独立大队。

在蓟、玉、遵方面，由于四纵已进入蓟县边界，夏德元、赵合等已经起义，所以，蓟县党组织也提前发动了起义。在王崇实、李子光、王少奇、商香阁等同志领导下，以蓟县为中心开始大暴动。7月14日，他们突然袭击了邦均伪警察局，活捉伪警三十多名，成立了三区队，王建国为区队长，这就是“邦均暴动”。7月15日，抗联第五总队成立，商香阁为总队长，王崇实为政治主任。这时白砥中、郝希武率众在下仓宣布起义，组建了五个大队。李子光、徐智甫、陈富轩、刘卓群在二区领导起义，成立第十六总队。石门镇警察也在胡光、朱绍清率领下起义，队伍扩大到数百人，编为第十七总队。在遵化平安城子一带，王济川、廖益之、张筱蓬（张源）率领七百多人起义，编为第十八总队。在三河、平谷一带，刘向道同志也组织二千人的抗日

队伍。到七月底，西部的起义部队共成立五个总队、两个区队，总数已达五千余人。他们还配合八路军攻克蓟县县城，建立了以王巍（原名朴一禹，朝鲜人）同志为县长的抗日政府。

7月16日夜间，我抗联第二路部队为策应开滦矿工起义，派出五个总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约万人，由榛子镇出发，怒潮般涌向北宁铁路，占领洼里、古冶两个车站，把唐山至昌黎间二百多里铁路截成数段，破坏了交通，使北宁铁路停车半月之久。当我第四总队接近矿区时，赵各庄矿工在周文彬、胡志发等同志的领导下，于7月18日先后起义，首先攻进赵各庄警察局。伪警闻风丧胆，四散奔逃。

矿工起义的第三天，一部日军从天津赶来。他们配合当地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工人起义军进攻。工人队伍被迫撤出矿区。日寇走后，工人起义部队又回到赵各庄，袭击唐家庄包工大柜和当地民团。攻下唐家庄矿以后，成批工人入伍。林西矿工一千余人在陈德礼率领下起义。开滦矿工部队很快就扩大到七千多人，编成四个总队。后来，这支工人武装转向农村准备同我抗联会合时，受到日本侵略军的截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刚刚组织起来的工人大部分被打散了。周文彬同志带着几百名骨干转入农村。那时，节振国也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他在榛子镇加入抗联，任特务第一大队的队长。后来，节振国的工人大队与第四总队并肩作战，活动在丰滦迁和开滦矿区，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勇敢顽强的模范部队。

起义中还出现了很多奇迹。如卢龙简易师范学校校长高敬之，由于不满伪政府的统治，不愿当亡国奴，也组织几百农民在沈官营举行了起义。他们起义后，打联庄会，剿土匪，后来高敬之带队攻打卢龙城。在关闭着的城门前，他大骂伪县长，历数伪县长的罪行，命令伪军打开城门。他凭着自己的威望和抗日的义愤，加上武装暴动的浩大声势，迫使城里的伪军乖乖地打开了城门。卢龙县城解放以后，高敬之的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二千多人，编成第二十三总队，高敬之任总队长，共产党员阮务德任政治主任。

在党的统一部署下，同盟者也发动了起义。滦县民团头目高志远和联庄会头目陈宇寰，在多余屯、小陈庄一带成立了十来个总队，约万余人。在王仲华同志的指导下，他们活动在滦县南部、乐亭一带。

高志远是多余屯的地主、马城镇民团头目，因为和滦县伪保安队第三总队长、汉奸刘佐周不和，受到排挤，他就联合陈宇寰等反对刘佐周。1935年8月，高在滦县车站把刘刺死。他在地主上层人物和民团中有影响，动员他起义是有利的。陈宇寰是滦县南部小陈庄人，家中贫困，他为人公正，打仗勇敢，也有些威信。我党派到高、陈部队中去工作的王仲华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曾同姚依林、黄敬、蒋南翔、陆平、李昌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是一个热情高、魄力大、非常干练的好同志。他在高志远、陈宇寰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威望很高。他帮助高、陈整饬纪律，维系军心，并争取了陈宇寰等许多干部真心靠拢共产党。

洪麟阁在遵化县地北头村起义，协助他的有杨十三。他们在我党派去的李楚离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两个总队，约四千人，活动在玉田、丰润西北一带，曾同蓟县起义军配合，一度攻占玉田县城。

另外，在滦县南有曹致福等领导的起义队五千人，在丰润县南部有鲍子菁的起义队伍五千人。昌黎南部有丁万有部六千人，占着昌黎县的南部。绿林英雄杨二也拉起了一支二千人的部队，活动在兴隆、遵化一带。他打日本很坚决，曾打到平安城子，后来被日本鬼子包围，被俘后牺牲了。

在大起义的波澜中，国民党中的“CC”分子、“蓝衣社”分子也乘机而起，招兵买马，组织队伍。其中有原国民党蓟县党部负责人李维周搞的“蓟北抗日救国军”五百人左右。有陈维蕃搞的“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号称十个师，约一万人，活动在宝坻、宁河、武清一带。还有一个王文（王天魔），是“蓝衣社”分子，他组织了“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三千人左右，主要活动在玉田、宝坻一带。

至于杂牌军就更没数儿了。当时在冀东的一些散兵游勇，乘机在昌黎、滦县、玉田、唐山附近发展。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他们自立旗号，自封官衔，进行抗日活动，也起了扩大抗日声势的作用。

从7月6日港北起义开始，到7月18日开滦矿工起义，抗日队伍在昌黎、乐亭、滦县，丰润、遵化、迁安、卢龙和蓟县、玉田、三河、平谷建立了三个中心区域。那时，从农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西起潮白河，东至山海关，北起青龙、兴隆，南到渤海湾，到处红旗招展，到处是暴动的队伍，也数不清有多少人，多少番号。群众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司令赛牛毛，主任遍天下！”

抗联原计划成立六个总队，结果搞了三十九个总队，外加一些独立大队，仅抗联系统就有七万多人全副武装的部队。属于国民党和杂牌的有三万来人。当时，老百姓对抗日游击队统统叫“便衣队”或红军，因为那时这些队伍还没有军装。但我们抗联统一佩戴着红蓝两色袖标。红色代表共产党，蓝色代表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意思。起义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以农民和工人为主，有各阶层人士，还有少数流氓、土匪，良莠不齐。一般地说，我党领导的队伍纪律较好。洪麟阁领导的队伍纪律也不错。高志远的部队就差劲了，因为在他那里，党的骨干力量极少。至于七、九路军和杂牌军就更差了。

抗联成立不久，便破坏了北宁铁路，摧毁了铁路沿线以外的所有敌伪政权，配合四纵先后攻克冀东境内乐亭、宝坻、平谷、蓟县、迁安、卢龙、玉田等七座县城和几乎所有的重要集镇，使得日寇经营多年的伪组织、地方武装土崩瓦解。伪军全无斗志，他们有的摆脱日寇的控制，掉转枪口，起义抗日，有的一哄而散，弃枪回家。地主老财们也收起了昔日的威风，有的



参加了暴动，有的捐款献枪。广大人民群众欢喜若狂，支援部队，庆贺胜利。抗联所到之处，老百姓杀猪宰羊，箪食壶浆，慰劳部队，热闹非凡。

冀东暴动时，华北日军主力正在中原会战，冀东警防队也调到沧县、保定一带“围剿”冀中抗日游击队去了，一时都难以调回。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战略上配合中原作战和冀东暴动，晋察冀军区所属各地区八路军、游击队，广泛出击，从7月6日开始，在平绥线上分兵五路，平汉线上分兵三路，正太线上分兵两路向敌人发动进攻。先后攻下高碑店、定县、新乐、长寿等车站，打进平山、四河营、北水营等城堡，还突袭了石景山工业区，炸毁了电厂锅炉，使北平一度断电。这就大大牵制了敌人的兵力，使其无法增援冀东。

四纵进入冀热边，吸引了大批敌人。他们于6月下旬进入冀热边后，沿长城线艰苦转战在兴隆等县。7月初，中央电示，要他们速向迁安、遵化、卢龙挺进，冲破敌人的包围，同抗联会合。由于四纵尚未与冀东党取得联系，对冀东实际情况不明，直到7月中旬，三十一大队和三十三大队才向东挺进。他们历尽艰辛，于7月底8月初进入迁安县境，一举攻克迁安县城。其中第三十三大队开进遵化、丰润、玉田边境，在芦各寨建立了丰玉遵联合县政府，刘慎之同志任县长。8月中旬，四纵领导机关到达遵化铁厂镇，与我抗联胜利会师。当时，我军已摧毁遍布冀东农村的敌伪政权，并切断北宁铁路半月之久。这样一来，震动了平津，影响到全国，使侵华日军陷入困境。而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冀东接连打下几座县城后，威名大震。他们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给起义军树立了榜样。因此，各路起义军纷纷要求八路军派干部加强起义部队的领导。

8月27日，四纵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以及八路军和抗联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开会。会议由邓华同志主持。我和胡锡奎、王仲华、李楚离都参加了。洪麟阁派杨十三为代表，鲍子菁和高志远也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会议对冀东暴动后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大起义的胜利。指出队伍多、秩序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整顿部队。同时，提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张，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由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任副司令员。会议还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以便统一政权领导，普遍建立各县抗日政权，负责筹粮筹款，支援部队，建立抗日秩序，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救国会等。

铁厂会议以后，我们信心百倍地准备着手建设冀察热宁抗日根据地。当时大家曾议论说，按铁厂会议的方针建设根据地，冀察热宁边区将变成坚强的抗日前哨，变成埋葬日寇的汪洋大海。

9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发来贺电。电文说：“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汇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上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进、生长、壮大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

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侵略以更严重的打击，收复冀东。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与巩固部队，武装与组织民众，建立冀东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与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四

1938年9月初，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二路指挥部在霍庄召开干部会议，贯彻铁厂会议精神，布置建立丰滦迁遵根据地和整训部队、肃清土匪的任务。在会议进行期间，宋时轮同志从铁厂赶来，决定去热河都山建立根据地，命令抗联第二路全部随四纵东渡滦河，向都山进发。9月12日，我带十几个总队约两万多人开到桃林口、界岭口一带。部队驻包各庄、台头营、双望镇等地。我带司令部到了申罗寨。当时，宋时轮正带部队同伪满军作战，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只好撤出战斗。伪满军不知我军已驻进包各庄一带，盲目走进我们部队的驻地，自投罗网。同志们见伪满军送上门来，就摆开阵势打上了。五总队从前面一压，节振国的工人大队从后面一堵，十二总队、十三总队也冲了上去，一下子吃掉敌人两个连，剩下的一个连退到山上顽抗。五总队继续进攻，用新缴来的迫击炮轰击敌人。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节振国同志带一个突击队闪电般冲上山顶。他大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把那些军官和伪军吓坏了，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跪倒在地。

战斗胜利结束，节振国同志亲自把伪营长以下七名军官带到司令部，交我处理。这一仗我们生俘二百多伪满军，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四挺和其他许多军用物资。进军都山，首战告捷，部队士气高涨，对建立根据地充满了信心。

但进军都山的八路军在抚宁、青龙边境连续遭敌阻击，遂改变原来的计划，退回滦河以西。

后来有消息说，敌人要大举“围剿”冀东。那时，对于在孤悬敌后的冀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都没有经验，有的领导人信心不足，已有撤回平西之议。10月，在邓华同志主持下召开了九间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四纵及抗联的主要负责同志，决定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全部西撤，只留包森、陈群、单德贵等三个小支队坚持冀东。这三个支队各有二百人，分散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地方上只留周文彬一个主要干部任地委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10月中旬，西撤开始了。原计划分两路走，一路经遵化、蓟县、密云，一路经丰润、玉田、三河到平西。当时鲍子菁的队伍没有动，国民党七、九路军和其他杂牌军不听调遣。抗联队伍总计西撤五万人左右。

因为没有经验，五万人的大部队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前面的队伍已到潮白河，后面的部队还没有动呢。这样走法，不仅走得缓慢（有时一天一夜才走十几里路），老



百姓也受不了。因为部队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群众哪支应得起呀！前面的部队勉强维持，后面的就没吃的了，只好自行觅食，把沿途的柿子、核桃等都吃光了。加上正值深秋，天气渐冷，战士们仍穿着单衣，真是风餐露宿，又饿又冷。刚刚丢下锄头扛起枪杆的农民，在未经训练，没有严密组织的情况下，别妻抛子，远离故土，思想上本来就有了波动，加上环境一艰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逃跑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部队走进狭长的山路后，不断遇到敌人的截击，就更无法控制了。

在蓟县，敌人截击了陈宇寰部。陈宇寰是随邓华一路走的，随部队转移的还有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当敌人攻上来时，王仲华同志命令曹致福带队阻击，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在转移时，陈宇寰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不幸阵亡。曹致福带的阻击部队打得很顽强，牺牲了一百一十多人，完成了阻击任务。

中路洪麟阁部在马伸桥北也遭截击。洪麟阁被炮弹炸死，部队一下子跑散了。我带领的部队走在最后面，到了密云，部队怎么也走不动了。拉得太长了！结果与敌人在瓦罐头打了一次恶仗。队伍上山后，敌人用炮轰。炮一响，新兵们就慌了，往一堆扎，打了一天，炸死炸伤了六百人。

前面过潮白河的高志远部队，连遭阻击，“哗哗”地往后退。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再也稳不住了，成批成批地散去。路南的三十九总队三千多人，原来挺有战斗力，但只一宿就都跑散了。陈宇寰的三个总队也溃散了。当时，我们没有军用地图，没有电台等通信设备，只有被动挨打。记得当时高敬之的部队一夜跑了一个大队，他问我：“怎么办？不能前进了！”我也意识到继续西进是十分危险的，部队可能全跑光，所以，在平谷县北樊各庄召开了干部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停止西进，返回冀东，坚持敌后游击战。会后，我带有组织的部队六千多人，经三河、宝坻、玉田、丰润回到滦县的杨柳庄一带。

在西撤前和西撤途中，党中央和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以及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都曾去电拦阻，指出西撤是很不妥的计划，危险极大，因此，不同意总退却。但收到这些电报时，暴动部队已经大部分被打散了，只有一小部分到了平西，仅剩下我们冀热边特委所率领的部分军队回到丰滦迁地区。

在我们东返时，日寇对武汉的进攻已告结束。他们乘我军西撤，重新加强了冀东的“防务”。于是，汉奸横行，伙会猖獗，土匪蜂起。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七、第九路军，除逃散的以外，余部投敌，被编为伪军、伪警或变成地主联庄会武装。他们为虎作伥，杀害起义人员及其家属。我军回来后，又碰上敌人的秋后大“扫荡”。从武汉调回来的日军小林部队一个旅团，在当地日伪军的配合下，对我军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我军本来已经很疲惫了，又经过连日苦战，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万人的队伍除到达平西的一千多人外，冀东保存

下来的只有千余人。反“扫荡”结束撤到迁西柳沟峪村时，又有许多人自动离去或回家潜伏。到最后，我一清点司令部直属部队，仅有一百三十人了。

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个叫梁天柱的战士，正雄赳赳地在那里站岗。我问他：“你怎么没走呀？”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句普通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是啊，“我是党员！”党员就要坚持革命，而且要坚持到底！我召开了军人大会，号召大家坚定信心，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把抗战进行到底。会后我们重新布置了工作，把谷云亭、张志超、王化一、杨文汉等同志派出去，恢复地方工作，并收容干部和部队。

11月25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再次来电，命令我们一定要坚持冀东，指出：这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更加坚定了我们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的信心。不久，我们便集合了一千四百多人，重新建立了总队，与八路军留下的三个支队配合活动，坚持下来了。原来敌人说共产党、八路军被“斩尽杀绝”了，我们呢，抗日的旗子又打起来了！我们的游击队四处活动，神出鬼没，打炮楼、除汉奸、炸军车……群众看到我们，高兴得很。他们说：“八路军还在呀！抗日联军还在呀！司令员还在呀！”于是又鼓起了劲头，全力支持我们，使部队稳步发展壮大。我们想了许多办法，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实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所瞩望的目标——1938年铁厂会议所确定的目标，创造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创造了相当大的军队。到1944年冬，冀东根据地已有二十五个联合县，十万党员，两万多人的正规部队，二十万民兵，二十五个县支队，五百六十多万人口。这就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当然，为此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前后共有二十二万五千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许多是优秀共产党员。正如朱总司令所说：“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上，我们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曾流洒了最多的热血。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愧为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孙，因为我们做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事业，而且我们将继续不屈不挠地做下去。”

五

回忆冀东大暴动这样一段不平常的往事，我感到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记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革命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冀东抗日大暴动的成功和受挫，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我们党中央确定了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总方针，正确地分析了在冀东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可能性、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作出了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配合



当地人民武装暴动的英明决定。同时，详尽具体地为冀东的工作指明了方针和政策，就是动员千百万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下，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就是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如建立“冀东自卫会”和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争取了许多地方士绅、民团头目，并利用他们的社会联系及影响，最大限度地把冀东的抗日爱国力量团结、吸引到党的周围，同时充分发挥工农群众的骨干作用，带动了全民暴动，这是暴动成功的关键所在。其次是党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上级机关的正确领导和指挥：第一，派出大批干部加强党对冀东的领导，加强抗日的宣传等等。第二，派出八路军部队策应暴动。四纵挺进冀东，不仅牵制了敌人的兵力，而且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抗日人民精神振奋，敌人则极度恐慌。第三，暴动时机选择在中原会战，华北日军主力开赴前线，敌后兵力空虚之际，这就给冀东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空隙，加上华北各解放区、游击区的部队全线出击，拖住了敌人，使他们无力后顾。以上三点是暴动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主要的还是冀东自身党和群众的基础，但没有上述几方面的因素，冀东要发动起那样大规模的暴动是很困难的。

暴动成功后，很快就受到严重的挫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当时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没有坚决地、正确地执行党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四纵负责人，河北省委负责人和冀热边特委及抗联负责人最后都同意了西撤。这个教训是很惨痛的。

对于冀东暴动和西撤，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都作过极其精当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1月25日的一封电报里说：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和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均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刘少奇同志在1943年3月所作的《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1938年春天，我们冀东的同志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当八路军宋时轮支队进入冀东行动时，英勇地发动了冀东人民的大起义。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我们的同志在起义前做了很好的工作，那里的国民党组织及伪政权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队（七八个旅）、县政府的武装、开滦矿山的工人、农民及许多地主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参加了起义。这是真正的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并在起义后立即组织了联合的领导起义的政权与军事指挥机关。然而这一次起义在不久以后即遭遇到敌人很严重的进攻，受到严重的挫折。只是到后来又用了很多的办法，方把冀东游击战争组织起来 。”

抛开敌人进攻和错误西撤不说，单就我们冀热边地方党来讲，一开始就对暴动的诸方面有利因素估计不足，结果暴动的规模大大出乎原来的预料，起义人数比预想的多出十几倍。当

时，冀东的几百名共产党员几乎全部参加了暴动，但是以几百名党员掌握七万余人的成分复杂的庞大队伍，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队伍拉起来以后，我们无力把他们完全掌握起来，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依赖八路军主力的心理。冀东党又对根据地建设没有经验，未及时分散部队建设根据地政权，对部队的组织整顿抓得也很不够。加上刚刚放下锄杆的农民不愿离开家乡，以致在敌人突袭来时，部队大部被打散，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

虽然轰轰烈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受到严重挫折，其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姚依林同志在1939年写的《一年来冀东人民的游击战争》中指出，1938年冀东抗日暴动是“抗战以来全国各地所仅有的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冀东人民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之下的这种坚决的斗争，与八路军孤军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的英勇的行动，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将永远是光辉的一页”。

星城整理



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1]

张庆余

一

1933年5月，蒋介石政权与日寇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之后，划冀东为不驻军区。接着，蒋政权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用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另成立五个特警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警卫地方。因此于学忠抽调我和张砚田分任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长（我和张砚田原系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团长，我驻防杨村，张驻防山海关），其营长和连长亦由五十一军抽调，排长和班长准由我和张砚田在本团内选拔。特警总队每队五千余人，系由河北省各县新征来的士兵组成。我和张砚田各率所部新兵，分驻武清县和沧县，开始训练工作。

1935年5月，我们奉于学忠命令由原驻地开入冀东，分驻通县、香河、宝坻、玉田、丰润、顺义、怀柔、密云、三河、蓟县、石门、遵化、抚宁一带。我的总队部先驻蓟县，旋又移驻通县。张砚田的总队部驻防抚宁县之留守营。

当五十一军调往甘肃时，我们这两个总队因系地方特警，不算正规军队，所以没有随同开走。于学忠离河北前，曾密召我们，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1935年7月，商震继于学忠主持河北省政后，改河北特警队为河北保安队，仍令各总队长安心供职，驻守原防。

同年11月，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二十二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后，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归伪政权统辖。不过名称虽然更换，内部人事却无任何改变。

这时，我曾密派亲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应如何应付，商震嘱孟润生密告我："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

我的大儿子张玉珩听说我在伪冀东政权任职，认为我附逆叛国，有辱先人，登报与我脱离父子关系。我妻于德三也劝我迅速设法反正，以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我因以密告我妻说："我的意思现在虽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玉珩儿，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第71~76页。

同年，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我和张砚田密请张树生[1]介绍往见宋哲元，表明愿随宋抗日。张树生慨允所请，旋即向宋先容。宋甚愿与我们相见，为躲避日寇和汉奸的耳目起见，约定在天津旧英租界十七号路宋宅与我们会晤。张树生与宋约定时间后，即通知我们在家等候，宋当派人前往邀请。届时，宋派副官陈继先到我家相邀，我们遂一同前往宋宅见宋。宋对我们说："素悉二位热爱祖国，近又听俊杰（张树生字）兄说，二位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应先向二位声明，请二位注意，即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坚定立场，不再动摇。"宋还嘱咐我们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以防日寇侵略。说罢，即命萧振瀛送给我们每人各一万元。我们向宋致谢，说："我俩今后愿一心一德追随委员长为国效力！"宋连称"好，好"。我们遂与宋握手告别。后来保安队在通县起义，与我们这次和宋哲元晤谈是有关系的。

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因宋哲元不在北平，我派心腹刘春台（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对刘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并嘱刘密告我："可委派心腹人员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刘春台辞别冯治安即往见张樾亭，取得联系。张樾亭当将我和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

这时，日寇驻通县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为预防二十九军进攻通县，特召集我和张砚田在通县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守事宜，并出示五千分之一［疑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要我们根据地图做出防守计划。我起立发言："我俩都是行伍出身，没有学问，不懂得军用地图。但我俩确具信心，保证能守住通县，并可配合皇军打垮二十九军。不过目前兵分力薄，战守均无把握。我的意见，莫如先抽调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通县待命，然后再徐议攻守，如何？"细木深以为然，当即照准，并认为我们忠实可靠，遂令散住各处的日侨亦集中通县，以便保护。

我随即与张砚田分别下令，调动所辖散驻各处的部队集中通县待命，并对调回的部队分别讲话，暗事部署。这时，冀东伪保安处处长刘宗纪见我神色异常，料知有变，因窃与我耳语说："你预备反正，如何瞒得过我。但我也是中国人，岂肯甘作异族鹰犬。望你小心布置，大胆发动，我当追随左右，尽力协助，以襄义举。"

---

[1] 张树生字俊杰，河北省沧县人，国民军宿将，同我的二哥庆云系换帖兄弟。张树生为河北省哥老会首领之一，既系"大"字班，又是"双龙头"。我和张砚田都是张树生指挥下的哥老会会员。

我见日寇大举进犯南苑，并派飞机轰炸北平，知战机已迫，不容坐视，遂与张砚田密议，决定于7月27日夜12时在通县起义。到时，我派兵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派兵包围冀东伪政府（在通县文庙内），把汉奸殷汝耕禁闭起来。我同时又派兵前往西仓，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细木闻枪声四起，料知有变，率领特务数十人抗拒。细木一手持枪，一手指斥我军官兵，大声叫嚷说："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奸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细木的话还没有说完，即被我军乱枪击毙。其余特务见势不妙，急反身窜回特务机关内，闭门死守。旋被我军攻入，占领了特务机关。

我部营长沙子云奉我命督队进攻西仓日兵营。日寇驻通县的部队约有三百余人，连同宪兵、特警及日侨大约有六七百人。闻我保安队起义，知众寡悬殊，难以力敌，遂集合宪警和日侨于兵营内，负隅顽抗，以待外援。由于日寇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激战达六小时以上，我忠勇官兵牺牲于日寇炮火之下约二百多人，迄未得手。我见此形势，若再不能突破，日寇开来大部援兵，内外夹击，更对我军不利，于是决定改用火攻，下令全军："有能从汽油库（亦在西仓，距日兵营很近）搬汽油一桶到日兵营四周的，即赏现洋二十元！"士兵激于爱国义愤，闻命踊跃争先。顷刻间，汽油桶已堆满日兵营四周。我见汽油已运到，下令前线士兵，纵火焚烧。刹那间黑烟弥漫，火光冲天，喊杀声沸腾起来。我军复用大炮和机枪猛烈轰击，集中扫射。接着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乘势从四面冲入。远的枪击，近的刀砍，激战至28日上午9时许，日寇除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

又日寇驻顺义一队约二百人，亦被我驻顺义的苏连章团奉我命于同日乘日寇不备，实行夜袭，迅速予以歼灭。苏连章团完成任务后，于28日上午10时整队开回通县。苏团开抵通县为正午12时，适日寇派来轰炸机二十四架，对我通县起义军滥施轰炸，苏团官兵躲避不及，伤亡颇众。日机从正午12时起至黄昏时始止，轮番轰炸，达七小时之久。苏连章见日机轰炸猛烈，防空无备，实在难以支持，于是脱去军服，弃械逃走。

张砚田因见日寇势力强大，恐难与敌，乃乘日机轰炸、我忙于防空之际，不辞而别，潜回天津寓所隐匿。该队官兵亦因此相继结伴逃跑。

三

张砚田、苏连章等相继逃亡，这对通县起义军影响极坏。我获悉后，深感局势危急，像这样混战下去，我军愈战愈少，日寇越来越多，势难坚持，遂决定趁当夜日寇尚未合围，放弃通县，开往北平与二十九军合兵一处，再作后图。于是我将全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由我亲自督队，平行转进。及开抵北平城下，始悉二十九军已〈先〉行撤出，退至保定、长辛店一带。正在这时，日寇

派兵从城内杀出，适押解殷汝耕的汽车开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被日寇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将殷汝耕劫走。敌复从城内开出装甲车二十多辆，集中火力向我起义军猛烈轰击。我团长沈维干和张含明因在火线上督队奋战，致中敌弹相继阵亡。我英勇的官兵，因冲锋肉搏，伤亡亦众。

我见二十九军已去，本队形成孤立，加以前被阻截，后有追兵，若聚兵一处，待至天明，敌机必来轰炸，这么一来伤亡必多，实无异束手待毙。于是决计趁天色尚暗，化整为零，分全军为一百二十个小队，每队五六十人不等，由连排长率领，分批开往保定集合。孰意行至中途，竟被孙殿英部分别截击缴械。及我到保定后，我部官兵闻讯，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请求我向孙殿英交涉，索还武器，仍愿开赴前线为国杀敌。我当即用好言安慰，嘱令静待后命。嗣后，我见宋哲元，宋握我手太〔叹〕息地说："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卒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这时孙殿英适来保定，闻我在保定，自知理亏，遂拨转马头，避回防地。

不久，我被蒋介石电召前往南京，报告起义经过。蒋安慰我说："你这次在通县起义，虽败犹荣，不必懊丧。所有损失，由余饬军政部立即予以补充，以便休整后再投入战斗。"接着又问："你既捉住殷汝耕，却为什么不杀？"我回答说："当时本拟将殷逆枭首示众，以平民愤，而昭炯戒。因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刘春台劝阻，说殷逆系何应钦代委员长和黄郛委员长的亲信，派他到冀东担任蓟密专员，一定衔有中央密旨，我们似不宜擅杀，最好押送北平交宋哲元委员长，转解中央法办较为妥当。因此未及时执行枪决。孰意解至北平城下，竟被日寇劫走，殊属憾事。"蒋听罢，未置可否，要我先回旅馆休息，明日可往见何部长，再详商补充办法。次日我往见何应钦，何既置补充事不提，又不许我仍回本队，任我为军政部开封第六补充兵训练处中将处长。1938年，复改派我为九十一军副军长。我因病恳辞，终未到职。

写于1961年



冀东保安队琐闻[1]

张炳如[2]

1933年夏季，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依照《塘沽停战协定》的规定，从他的第五十一军中抽调一部官兵，编练武装警察，用来维持冀东治安。当时共编了五个特种警察总队。总队长相当于少将师长，辖相当于团的两个区队，每一区队辖相当于营的三个大队。

第一总队是在武清县蔡村编练的，总队长张庆余原任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第六二五团团长，督察长（参谋长）沈维干原任第六二五团中校团附，第一区队长张含明、第二区队长苏连章都是第一一八师营长。第二总队编制与第一总队相同，是在沧县编练的，总队长为张砚田，其余不详。河北省政府因接收冀东各县，急需配备武力，两总队编训完成，即全部开往冀东。

在滦东中日战役中，汉奸李际春曾由伪满带来一部伪军，进扰冀东各县。《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李由伪满带来的刘佐周、赵雷两部伪军即盘踞在滦县一带。这时河北省政府也把他们收编，将刘佐周部编为特种警察第三总队，队部设在滦县河北省立师范学校；将赵雷部编为第四总队，队部设在唐山交通大学；同时把冀东土匪胡协五（绰号老耗子）收编为第五总队，驻地可能是在玉田。第三、第四、第五各总队都无区队，由总队长直辖大队。第三、第四两总队各有六个大队，第五总队只有两个大队。

刘佐周的野心很大，积极地在政治上、军事上扩充自己势力，把滦县地方保卫团编成十个大队，归他自己节制。连同他原有的部队共计十六个大队，分驻昌黎、滦县、乐亭三县，并把那些最富、陋规最多、最容易捞钱的地方，如开平、古冶等处的公安分局长委派他自己的私人，或者由他委派等于顾问的副官驻局办事。这些人通过包庇烟赌暗娼以及敲诈勒索为刘搜刮军饷。1936年春季，刘佐周在滦县车站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刺死，他的参谋长李海天升任总队长。10月间，日本派上西园操为该总队顾问，率领李海天和他的部队窜扰房山，被宋哲元部队击溃，大部分缴了械。上西园操又率残部去高丽营整编，到达后被日军包围，缴械遣散。

殷汝耕在通县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张庆余曾向于学忠请示，于嘱以驻留原地，待机而动。殷即以第一、第二两总队为冀东的军事主干。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以沈维干为总队长，归殷直接领导。“七·七事变”发生，日本派张庆余为冀东保安司令，仍兼第一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组编：《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第77~78页。

[2] 作者当时系伪滦县公安局分所雇员。

总队总队长，希望张作他们的侵华工具。在起事之先，日本曾发给三八式机枪若干挺和大量弹药、服装、现款（两总队在编练时的武器只有步枪，是河北省新购入的捷克式马步枪）。张把部队部署完成后，于1937年7月29日［张庆余回忆为7月27日夜12时］在通县反正，杀了很多的日本人。日军调来飞机轰炸，张部颇有伤亡。

1938年春，日本当局曾向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提出，要对张庆余在通县杀死的日本人的“英魂”举行慰灵祭，并抚恤死者的家属。王克敏曾发给一批款项（我在伪组织工作时，曾听财政部对我说过约为六十万元）。

我脱离殷汝耕的经过[1]

霍实子遗稿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有所谓“上海淞沪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之设，韩德勤任主任委员，我的父执辈殷汝耕任副主任委员，我任该会特派员，办理接收闸北、宝山等地区。

1933年1月长城之役，又有《塘沽协定》之签订，设有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任委员长。又在冀东成立“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殷派我为视察委员，叫我代他出去巡视管辖下的各县。殷以我初出茅庐，对于官场上的那一套一无所知，遂叫主任秘书钱宗起（号履周）为我拟好了一份出巡视察任务表，叫我到各县视察时把视察的情况填在表上，以便回来时凭表向殷汇报。殷又派了他多年雇用过的汽车司机叫春根的青年做我的听差，以便在途中照料我的生活。

我自从到华北办理对日外交事宜后，遂将“霍实子”之名改为“霍实”，主要是“子”字在日本人均属女性，为了怕日本方面误会我是日本籍女性，遂改名。

当我巡视到河北省密云县古北口时，见古北口长城外边万山重叠，荒山秃岭，没有房子，所有日本侵略军和日侨都住在古北口长城里边的民房中，同我国的老百姓杂处，情况极为复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67~179页。



杂。当我巡视完毕，回来向殷汇报时，殷认为要在古北口设一个办事处，处理古北口和附近各县的涉外事宜。殷遂呈请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派我为蓟密区驻古北口办事处主任。当我接到委任状后，殷带了我去天津向于主席谢委之后，我即去古北口上任。殷以我不大懂中文，又不会批公事，特在专员公署调了一位姓徐的做我的秘书。殷又以我过惯城市生活，一旦派驻边陲，当会感到生活枯燥，遂又派了他的妻舅井上乔之（殷妻是日本人，原叫井上惠民，嫁殷后改殷惠民）做我的顾问来陪我。记得早年我在日本读书时，我父委托殷做我的监护人，殷对我照料是十分周到的。今番对我如此妥善安排，可算是无微不至。所以当1945年日本投降后，殷虽以叛国罪被关押在南京候审，我仍托他的"忠仆"春根送些零用钱给他，藉以报答他昔日对我的恩情。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塘沽协定》把河北省长城南边，在长城之役曾被日军占领过的二十二县，划为"非武装区域"，亦称"战区"［"战区"是当时中国方面的习惯叫法］，分为蓟密和滦榆两区，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要另外组织所谓战区保安队，由张学良的旧东北军的魏永和任蓟密区的保安总队长，徐士英任大队长，驻密云、怀柔等各县。后来魏永和因病去世，由张庆余（也是旧东北军）继任。徐士英也因事调离"战区"。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逼迫我国政府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驻热河省承德的日军川岸旅团进驻古北口。川岸和该旅团的参谋长酒井隆（抗战期间，酒井已调任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参谋长，日本投降后在南京雨花台被处决）到了古北口，旅团部设在日本人所开设的古北口饭店，距我办事处不远。酒井经常到我办事处借阅天津《大公报》，我也常去拜访川岸和酒井。

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撤换后，由商震继任。川岸旅团自古北口撤回承德的前一天晚上，川岸请我到他的旅团部吃晚饭，算是"告别宴"。席上只有川岸、酒井和我三人。

席上吃的是日本菜，饮的是日本酒，食具当然也是日本的。坐，也是照日本人的习惯，盘腿坐在土炕上（古北口饭店是由北方式的民房改建的，故有土炕）。我在日本十多年，自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是在日本读书，日本的上、中、下各阶层人士我都交往过。尤其是我在东京读书时，曾在久松子爵邸住过三年多，所以日本的风俗习惯以及贵族家庭的一般礼仪、词令我都懂得。这次川岸请我吃的是日本饭，因此我对一饮、一食、一坐都按照日本人的那一套礼仪、词令行事。酒过数巡，川岸首先赞扬殷汝耕和日本方面的关系搞得"甚好"，托我回北平带个口信给殷汝耕说："今后仍请按照处理马永德〔马保德〕的事那样办理。"我当时不知道马永德〔马保德〕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只好唯唯诺诺答应。

川岸接着就说："霍主任（指我）的风度像是满洲国的外务大臣张燕卿，张是名门之子呀！"（按：张燕卿是满清王朝的大官僚张之洞的后裔，也在日本读过书。）

川岸说这番话，大概是想捧我，而我对川岸的这番恭维话却非常恼火。真是岂有此理，竟

把我比作大汉奸，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当时我已是满肚子不高兴了，哪晓得川岸又说：“日本要扶植一个华北国，要以关内的四省三市脱离中央，以黄河为界成立一个华北国。所谓四省就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三市就是北平、天津、青岛。在内蒙已有李守信正在待命，关内有宋哲元、石友三、刘桂棠〔刘桂堂〕，还有山东的韩复榘，都已和日本有了默契。将来华北国成立时，要请霍主任担任华北国的外交部长。”我当即体会到川岸说出这个大阴谋来，是想拉我下水当汉奸。

那时我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年少气盛，是胆敢在老虎头上捉虱子的。听了川岸这番话，就压不住心头怒火，忍无可忍，马上回答川岸说：“旅团长阁下，我是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派到古北口来是和贵方办理交涉事宜的。将来如果华北国成立时以黄河为界，那么我的办事处也可以迁到黄河南岸，仍然和贵方折冲樽俎。我自问不敏，也不能接受贵方一手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外交部长。”

川岸顿感愕然。酒井见我冲撞了川岸，急忙插嘴说：“旅团长醉了，酒后失言，请霍主任不要介意。旅团长刚才说的这番话不过是闲谈罢了，请不要向外间讲出去呀！”酒井接着说：“呵！霍主任是广东人，十九路军也是广东人，广东人是抗日的。”我说：“不管是不是广东人，我们中国人是有气节的，是爱国的。压力愈大，抵抗力也愈大，这是物理学的定律。”

于是这顿饭就吃得不欢而散。

我以为川岸暴露了日本的一个大阴谋，是个极重要的情报，我准备俟明天川岸离开古北口后，立即返回北平向殷汝耕报告。当我回到办事处时已是深夜，我即刻写了一张条子给古北口的大昌长途汽车公司，上面写道：“明天早上开往北平的班车，要等我上了车，才好开出。”同时我又打了个长途电话到北平给殷汝耕，告之川岸旅团定于明日撤回承德，等他们走后我即返平述职。

第二天一早，我仍然按照我一向在古北口办理对日方交涉的方针即“无事以礼相待，有事据理力争”来办事。所以当川岸和酒井乘飞机离开古北口时，我仍是到古北口潮河的沙滩上送行。他的部队是乘卡车撤退的。

川岸离开古北口后，我即乘了长途汽车直返北平。抵北平时已是万家灯火。当我到了殷公馆（殷公馆是租的东城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严复的旧宅）时，殷已派了他的汽车在等我，把我接到八大胡同美雯家（妓院）。

我是用日语向殷报告的，因怕被美雯听见。我先把昨晚川岸在席上托我带给他的口信转告殷后，随又把我和川岸、酒井的对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番。我满以为殷会夸奖我一两句，如“应对有方”之类。岂料殷听了我的报告后，竟以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川岸所说的，我还要比他知道得多些。你年纪轻不会应对，以后要学乖些。”又说：“古北口是个重要的地方，你快回去坐镇吧。”殷对于马永德〔马保德〕事件一字不提。



真是一盆冷水泼得我凉了半截。我说："我每次回来都要在北平住上几天的，我要休息几天才走。"

我就在殷公馆住了下来。那时主任秘书钱宗起早已应陈仪（陈公侠）之邀去了南方，做了陈的幕僚长。殷的主任秘书已由原苏州某纱厂经理池宗墨继任，池是毕业于日本某师范学校的。当时我见到殷家多了两个食客，一个叫王筱霞，原是苏州图书馆馆长，是由池宗墨介绍来的，另一个叫张仁蠡，是张之洞的后裔。

马永德〔马保德〕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一定要打听清楚。好在有一位公署的署员告诉我说："马永德〔马保德〕是河北省遵化县人，原是关外义勇军孙永勤的参谋长。孙部曾一度转移到了遵化县境，日方以遵化县长何孝怡协助孙部运军火，要逮捕何县长，何逃到南方，投靠了陈仪，做了陈的幕僚。而孙永勤和所属义勇军的大部却被日军围歼于遵化县的茅山〔毛山〕山顶上，马永德〔马保德〕则逃回遵化乡间暂避。结果被'战区'保安队一伙人抓住，殷遂命令引渡给驻马兰峪的日本宪兵队，马永德〔马保德〕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于长城之下。"

后来，我才知道"围剿"孙部的日军轰炸机是由承德起飞的，地面部队是驻古北口的日军三十五联队永见后德的部队。当他的部队出发前，日军扬言是他们照例每年一次的秋季行军，以掩我方耳目。

蓟密区专员公署虽然设在通县，但殷和池宗墨经常是待在北平办公的，与通县公署的联系就用电话，公文是派人专送的。

自从那天在美雯家殷对我"教训"了一顿后，殷和池当我面前对话时就用起他们家乡的温州方言来，但当他们讲到"土肥原"的名字，虽然也用温州话，而我仍是听得出来的。（按：土肥原贤二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为了加强侵略我华北，特意把他从东北调到平津两地，收买地方军队、失意政客、流窜股匪，搞各种阴谋活动。）

就在我住在北平的那几天，某日我的老友潘仲鲁（潘是中央通讯社驻北平分社社长，早就经由我介绍与殷汝耕相识）来访殷，先由我在外客厅接待。潘问我："外间传说殷去过关外，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潘就直接去问殷，殷矢口否认。我心里就想，殷可能已和日本人勾搭上了。

从此我对殷就有了警惕，而殷对我也多方掩饰、隐瞒。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古北口任所。此后不久，殷叫我回北平，遂带了我和殷体新（殷的侄子，是蓟密区驻马兰峪办事处主任）、张庆余以及井上乔之等到了天津（池宗墨留守北平），住在日本租界的熙来饭店。

一日，殷宴请日本的细川特务机关长于某酒家。细川带有从关外来的一大批日本浪人（流氓），说是来当蓟密区各县政府及保安队的"顾问"云云。

酒席共有两桌，一桌是由殷本人做主人，细川做主客，陪客是殷体新、张庆余和几个所谓“日本顾问”。另一桌是殷要我做主人，所谓“日本顾问”的日本浪人头头做主客，陪客是井上乔之和几个“日本顾问”。这些日本浪人大都是另有一种特殊打扮的，通常都是满脸胡子，手拿粗粗的手杖，据说必要时作为武器的，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神气十足。我当时看到他们的那副怪模样是很不舒服的。席间，那个所谓“日本顾问”的头头，竟敢大言不惭地对我说：“我是来拯救你们中国人的。”我听了这句话，以他欺人太甚，不禁激起了心头怒火。我当即激昂地说：“我是要拯救全人类的。”那个浪人头头也大声喝道：“蠢材！你说什么？”我说：“怎么啦，你听不见吗？我再说一遍。”我遂大声地说：“我是要拯救全人类的。”（当然，包括日本人在内）那个浪人头头一向在关外欺侮惯了我们中国人，满以为中国人都是些顺民，是俯首贴耳的。他一定从没有受到过中国人的冲撞，于是暴跳如雷，离开了座位，气势汹汹地想要走过来打我。细川见势不妙，忙过来制止、调解。我当时气愤极了，细川说了些什么，我都不予理睬。但经过调解，总算平静了下来。我即过去向殷汝耕说：“看来所谓日本顾问，就是伪满的参事官呀！”（按：在伪满的各机关都设有日本的参事官，机关的实权都掌握在参事官手里，架空机关首长，这是众所周知的。）

殷体新插嘴说：“那就要看我们怎么做法。”张庆余在旁默不作声。当时殷汝耕即和细川交头接耳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随即由细川向全体“日本顾问”讲了话，说：“各位顾问到差后，不准干预机关的行政事务。”

这顿饭也是吃得不欢而散。可是这次我和“日本顾问”争吵，殷并没有责备我。当殷带了我们乘火车由天津返北平途中，张庆余在车上私下对我说：“老霍，我同意你的看法，所谓日本顾问，就是伪满的参事官呀！”

在返回古北口后不久，张庆余首先打长途电话对我说：“日本顾问到差后，干涉保安队的队务。”之后，密云、怀柔、平谷、玉田、顺义、蓟县等各县县长也先后打电话来诉苦说：“日本顾问不仅要调阅档案，而且要干预县政。”我只好照样向殷转告，殷说：“叫各县长和保安队长不要管他（指的是‘日本顾问’）。”

实际上此时殷汝耕和日本人已暗中勾结，酝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了。

1935年11月23日，我在古北口接到殷汝耕电话，叫我一定要在25日一早赶到通县。我遂于24日早上带了随身行李，乘了平、古长途汽车返回北平去。在北平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到了通县。当我乘人力车抵达公署门前时，殷汝耕、池宗墨等人正好在大门口站立着，摆好架势在拍照。我尚未把行李由车上卸下，池宗墨即拉了我过去一同拍照。我看苗头不对，正要躲开时，已被摄入镜头了。原来是日本记者在拍照，那张照片后来在上海的《良友画报》上转登了出来。照片里的我，正是要躲开的一刹那，所以我和池宗墨是有一段距离的。

大约是在当天上午9时，殷汝耕粉墨登场了，“日本顾问”坐在殷的周围。

会议一开始，殷讲了一大套汉奸理论，主要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几度亡于外族，亡国的时间最长的从没有超过二三百年，例如元朝、清朝。但今天科学发达，武器变了，一发炮弹就能杀伤几百个人，一旦亡国，将永世不能翻身，而且依靠外力以夺取政权的也有先例（殷没有举出例子）。鉴于局势的发展，我们把蓟密、滦榆两区合并，共二十二个县，即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宋哲元、韩复榘也将不日相继脱离中央，我们共同成立一个华北政权，我冀东只是先走一步罢了。”

接着殷就宣读委员会的名单：

委员长兼行政长官：殷汝耕

委员兼秘书长：池宗墨

委员兼民政厅长：张仁蠡

委员兼教育厅长：王筱霞

委员兼财政厅长：殷体新

委员兼保安第一处处长：张庆余

委员兼保安第二处处长：张砚田（原是滦榆保安总队长，也是旧东北军）

委员兼外交处长：霍实

殷汝耕讲话和宣读名单后，我说：“五叔（殷排行第五，是我的父执辈，我一向叫他为五叔），日本人的压力这么大，我们应该请示中央，不要自作主张。”

殷说：“你是从古北口来的，难道没有在古北口看到大军压境吗？蒋介石远在南京，还能管得了这里吗？”我和殷的对话，引起了“日本顾问”的注意，但是他不懂中国语，就在会上问殷：“刚才霍讲了些什么？”殷答：“霍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不要管他。”当时我很气愤地对殷说：“五叔，我不是很年轻、不懂事吗？你的名单上要我做委员兼外交处长，我不能干。”池宗墨坐在我的右边，用左脚踢踢我的右脚，向我耳语说：“不要再讲话了，我们都是汽车阶级呀！”池对我说出这样无耻的话来，真使我痛心。当时我的思想是：不能跟他们去当卖国贼、做汉奸，只有逃出虎穴的一途，遂不再发言了。会上也无人发言，一片静寂，殷遂宣布散会。当时我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感。散会后，殷将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在他对面坐下，郑重地嘱咐我说：“你马上去北平，通知北平各国大使馆。”殷随即拿起笔来，在纸上写道：

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即日成立，将蓟密、滦榆两区共二十二县合并，宣布脱离中央政府。

二、本委员会对于外侨的生命财产绝对保护。

三、本委员会在不久的将来进驻北平，那时当与各使馆进一步联络。

殷说：“凡是新政府成立，都要对外国人声明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这一套的，你不懂英、

法语言，可在北平就地聘请外交秘书。”

殷最后说：“我已派定汽车给你专用。”说着，随手在桌上取了一张硬纸卡交给我，上面写有汽车号数及外交处长专用车字样，接着又说：“你到了北平，去日本大使馆时，要和五婶（殷妻）一齐去。”

当我接过殷给我的那张声明和硬纸卡时，正巧门房的传达持了一张名片进来，说：“有位宋哲元将军的代表来访，据说是来向长官道喜的。”

当时我已走到房门口，我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名片上印有“宋抱一”三字，什么官衔我尚未看清楚时，殷已把名片接了过去，忙于接待客人了。

“阿弥陀佛！”我有逃出虎穴的机会了。我即去取了随身行李，登上汽车，直奔北平。我在车上一摸，身边只有七块钱，但我已打定了主意，到北平找老友潘仲鲁帮我逃走。

汽车抵西城潘家，经传达通报后，潘出来接我。我们边走边谈，我说：“殷汝耕造反了，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要我当委员兼外交处长，这是当汉奸卖国贼呀！我不能跟他们干，我要逃走。”潘说：“殷扛大旗，你跟尾，有什么要紧呢。”我知道潘说出这句话来是进行试探，我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呜咽地说：“老友，你不相信我吗？我的随身行李已带来了，放在门口的汽车里。”潘即叫听差出去提取行李，那时我们已走过了前院进入客堂。我继续说：“我不能跟殷汝耕去做汉奸，我一定要逃走，但是我身边只有七块钱。没有旅费，怎能走得？”潘妻查荷生在内室听见，出来说：“要旅费，我有！要多少？”我说：“够买张车票到南京便可。”说到这里，传达进来报告：“张剑秋先生来访。”我即住口，潘说：“不要紧，张是自己人。”张走进客堂时，潘为张介绍说：“这位就是霍实，殷汝耕要他当汉奸，他不肯做，反正了，要逃走。”张说：“好极了，今天下午两点钟有班火车到南京，可乘这班车走。我去代买车票。”随后又说：“不要坐头等、二等，恐怕遇到熟人不好办，要坐三等。”张又打量打量我的穿着说：“要扮成像个三等客的样子。”说到这里潘忽有所思，问我说：“阿实，你是坐什么汽车出来的？”我说：“是殷派给我专用的。”潘说：“糟糕！你走了，殷会找到我这里来的。”我说：“不要紧，我还要出去打长途电话到古北口。阮是我的妹夫，我走后殷会迫害他的。当我再来时，换坐人力车来就是。”潘说：“就这样办吧。”我遂乘了汽车到前门，打长途电话到古北口给阮文英，告诉他：“五叔造反了，我马上逃走。你也要离开古北口，即日南下。我存在古北口的行李不要了。”这番话我当然是用广东话讲的，避免人听懂。阮文英接到电话后，也立即弃职逃走，即日南下了。当我打了电话后，即乘原汽车到大阮府胡同殷公馆，见了殷妻，我对她说：“五婶，当我由通县临行时，五叔交代我去日本大使馆时要同五婶一齐去。”五婶说：“我刚才也接到你五叔由通县来电话，叫我和你一同去日本大使馆。可是这是国家大事，我是个女流之辈，怎能同你去得？你自己去吧。”这正中我下怀。我说：“好



吧，既然五婶不便去，就由我自己去吧。”我遂乘了汽车直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日本大使馆是我经常为办理对日交涉常来的地方。门房认得我，不用通报就昂首直入。那时正值11月，气候寒冷，使馆里网球场杳无一人，我就在球场转了几个圈子，我的用意是使汽车司机知道我是到过日本大使馆的。

当我乘汽车到了西单商场时，我对司机说：“我要吃顿饭、洗个澡。你也去吃个饭，然后把车开到殷公馆去等着。我要用车时，会打电话叫你来接我的。”我当即给他一些零钱让他去吃饭。

汽车开走后，我即乘了人力车到潘家。那时，潘已为我备好午饭，车票也由张剑秋买来了。饭后，潘对我说：“一个人来去要光明。殷是你的世交，现在他干出这种事来，只有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路。你要写份启事，登报声明一下为好。”我遂写了“霍实启事”一式数份交潘。潘说：“我估计你所乘的火车过了天津后，再把启事投交报馆及通讯社。因为要提防天津的日本驻屯军把你截获。”又说：“你到了南京后，即到中央通讯社找社长萧同兹，他会交代你怎样行事，我会打电（话）告诉他你的一切的。”我说：“老友为我布置得这样周到，真使我感激难忘呀！"

现在根据我的回忆，记得“霍实启事”是这样写的：

“实幼承庭训，长受教育，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在古北口办事三年，办理对日交涉事宜，竭尽心力，委曲求全，有负国人。此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余拒绝任职，即日洁身南下，以谢国人。所有该会之一切措施，与余无涉，特此郑重声明。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霍实启”

后来我在南京时，曾看到天津《大公报》于该月26日的报上登有我这则启事。

当我由北平逃走后，殷以我失踪，追到潘仲鲁家，说是潘挟持我走的，要迫害潘。潘氏夫妇被逼得也逃到南京来暂避。

我上了火车的三等车厢，心情十分紧张，及至过了天津，才得宁静下来。翌晨我去餐车吃饭，当我经过卧铺车厢时，遇见殷的侄子殷体扬夫妇（体扬是前北平市长袁良的女婿，当时是北平市政府的秘书），体扬见了我愕然。我说：“你五叔干出这样的事来，我不能跟他走，所以我逃了。”体扬也说：“五叔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在北平市政府里没有面孔见人，所以离开到上海去。你本是五叔的亲信，一向忠于五叔的。五叔这次蛮干，你要离开他，是公私分明啊！”我说：“我到了南京，不知道会不会得到谅解。”体扬说：“如果有了事情，可通知我的岳丈代你讲清楚。”当即把他的岳丈袁良的上海地址写给我。体扬又问：“你在火车上见到舅老爷（指井上乔之）吗？他是坐二等车在天津下车的。”我说：“我没有看见井上，我坐的是三等车，否则遇见了井上，会被日军截获。”

我到南京后，住在安乐饭店，当即遵照潘嘱，去中央通讯社访萧同兹。萧说：“昨天已接

到仲鲁来的电报，知道你反正了。你要去行政院报到，汪院长（汪精卫）因病进了医院，你可见政务处长彭学沛。我即打电话告诉他，你马上就到。”我说：“我要立即去上海乘船返香港，省视父母。”“那么你要把上海、香港的通讯地址留给行政院，才好离开南京。”我都遵照做了。

当我由行政院回到安乐饭店时，新闻记者云集，单等我回来采访新闻，我当时真是应接不暇。

之后，我即打了一封急电给广州的西南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沛泉伯伯，告诉我已脱难抵京，请在该公司任营业部主任的我哥哥霍实郎即电汇旅费来接济我。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我哥哥的电汇款三百元，我便乘火车到了上海，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候船准备返港省亲。

有一天，我在东亚旅馆的电梯里遇见了闸北五区公安分局的老友梁君。他见了我吃了一惊，对我耳语说：“你这样大胆呀！住在这个热闹地方。日本领事馆已派出了大批便衣警察，到处搜捕你，你要马上躲起来。”我遂迁到外国人所开的旅馆里。

那时，沪宁各报（包括全国和港澳各报）早已登载了“霍实反正脱难南归”的报道。

当我在上海候船时，蒋介石派人赶来上海，叫我先回南京，要我去见他。到了南京，见到蒋，蒋问：“你和殷汝耕是什么关系？”我答：“殷是我的世交。”蒋说：“你公私分明，反正归来，国家不会辜负你的。”又问我的学历，我答：“我自幼就在日本，所以自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在日本读书。”蒋说：“那么，你是个日本通呀！”又问：“你父母都好吗？”我答：“父母都好，住在香港。”蒋随即详细询问华北情况，我都尽我所知一一作了回答。

蒋当即赠我旅费，我接过支票一看是一千元。我说：“委员长馈赠太多了。”蒋说：“你可寄些给你父母。”蒋最后问我：“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答：“安乐饭店。”蒋说：“那个地方不够安全，你要住进励志社，等候我的命令。”

1936 年春，蒋要我研究日本密码电报，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我都是一直从事研究和破译日本的密码电报。

1982年9月3日于上海



试谈当年日军逼签“何梅协定”的两个借口[1]

马秀山

1935年5月至7月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平武官高桥（坦）寻找了两个借口，并配合以军事威胁，对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接二连三地进行强硬蛮横的交涉，提出种种侵略中国主权的要求。何应钦卑躬屈膝，每每一一承诺。6月9日，酒井（隆）晤见何应钦，不单追问既诺之事，且又提出属于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国际公法的非分要求。何应钦经请示汪精卫后，也一一照办了。7月6日，何应钦又在由日方事先拟就的一纸承诺通知文稿上签了字，转交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文称：“敬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复旦大学编）此后，便称这一文稿为“何梅协定”，从此作为继《塘沽协定》之后再次侵犯中国华北主权，驱逐国民党军政团体离开华北等等一系列非法行径的案头依据，实现其蓄谋既定的分离华北，把华北满洲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因而，了解逼签“何梅协定”的两个借口，对于研究当时日蒋之间的关系，研究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抗日义勇军的态度，很有必要。

当时，日方的第一个借口，是天津日租界的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事件。1935年5月1日夜，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暗杀，日方硬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国民党党部和宪兵第三团所为。日本驻平武官高桥（坦）叫嚷：“在一夜之间，有两个人被暗杀，必有极其周密的计划，乃系国家组织或有力团体所为，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当知其情况，为什么不加取缔？”（见《华北事变资料选编》）5月21日起，日本出动武装，骚扰河北省政府，索要凶手，省主席于学忠说：“当帮忙。”日军官池上操汉语大骂：“混蛋！你干的事！”池上还给天津市长张廷谔留书，判定张市长、李公安局长（役襄）、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团长）为元凶，于学忠为操纵者。日军官影佐等竟叫嚷要直接逮捕于学忠、张廷谔，以换凶手。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第二个借口，是孙永勤抗日义勇军进关事件。日方硬说国民党军政当局支持、接济孙永勤，指示逃跑路线，要追问责任。日方还发表公报，说孙永勤事件可使日军武力进入长城，并把平津两城并入停战区内。

[1] 据马先生生前回忆，此文最早发表于1988年3月《党史博采》上。

日本侵略者将这两个借口罗织在一起，以此证明蒋介石对日明表亲善，暗作抗日准备，容许张学良暗操河北省政，以平津为根据地扰乱日满，违反《塘沽协定》精神。因此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军政组织和所有外围组织、团体及日方认为对日持抵触态度的军事、地方官员，必须离开华北，才能改善日中关系，否则要采取“断然措施”。5月16日，日本驻平武官高桥坦在日文出版的《北京新闻》上公开谈话：“天津的暗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对日采取二重政策的铁证，亦为蹂躏日本租界中的警察行政权之重大事件。”（见《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5月29日，高桥坦和酒井隆以关东军代表和天津驻屯军代表的身份访晤何应钦说：“扰乱日满行为如仍以平津为根据地继续发生，日本认为是破坏停战协定（指《塘沽协定》）及《辛丑条约》，可能会把停战区域扩大到北平、天津两市。”（见《华北事变资料选编》）当即以逼诱兼施的一系列手段，窃探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的心理反应。酒井隆竟以个人意见（酒井隆是何应钦的同学）向何应钦抛石问底，他说，于学忠是扰乱日满行为的执行人，张汉卿（即张学良）的爪牙，中国政府应该自动撤调，中国宪兵第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和蓝衣社最好撤走，最好将中央军调到别处去，如上述诸点能办到，日中关系或能好转。何应钦对酒井隆的这种侵犯中国主权、干涉内政的非分之谈，不但没作任何驳斥，反而表示：“凡在北平军分会权限以内的事皆当努力处理，其余的事须请示中央。”次日，果然给国民党中央去电建议：“日方提出的各点势在必行，我方若不在可能范围内决然自动办理数件，则时日迁延，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事程。”

日方发现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软弱的退让心理，觉得尚有可欺。为进而逼使国民党中央允准何应钦承诺日方全部事项，于第二天（即5月30日），日本天津驻屯军便开始了武装恫吓，将装甲车、机关枪和轻炮排列在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日本官兵任意在中国官厅前拍照，甚而做出羞辱中国人的行为。日军军用飞机这天也在北平、天津及附近地区上空低飞侦察，酒井隆又公开宣称：“日军已一切准备完毕，随时皆可动作。”5月31日，关东军发表支持天津驻屯军的主张，天津的驻屯军出动坦克、轻炮和机枪队又在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日军一百余人全副武装闯入了天津市公安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也向于学忠提出了最侮谩性的强硬通牒（事后日方不承认给过川越茂如此训令）。6月3日，在国民党政府依何应钦的建议，本着日方意图照办的情况下，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又进一步利用同盟社发表声明说：“我们最后认为蒋介石必须离职。蒋搜刮民力，在统一口号伪装之下，沦华北为殖民地。我们是中国的朋友，不能坐视，所以国民党部、救国团、蓝衣社和宪兵队均须逐出华北，我们的要求是决不会让步的。”6月4日何应钦告知酒井隆：于学忠已他调；蒋孝先、曾扩情（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所所长、蓝衣社总头目）已被免职；宪兵三团特务处已撤销；天津市党部将停止工作，如有妨害中日国交的其他团体也会取缔；胡、白被暗杀事件发生在日

本租界，那是临时发生的地方事件，中国政府如何能知情？但因租界毗连天津市，我们已严令天津市政府缉凶；孙永勤部窜遵化和迁安附近地区，中国政府当即令警团协同围剿，已将该部击溃，所谓遵化县曾接济孙部一事，已令河北省政府严查，如果查有实据，自当照律惩处（以上皆见《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日方凭据两个借口，在不曾证实的情况下，何应钦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就已屈从地承诺，并无条件地满足日方的无理要求。

这两个借口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至今未见准确的结论，但胡、白被暗杀事件，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秦郁彦所著《日中战争史》中记载：据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石井嘉穗的回忆，谓白逾桓之被暗杀，实出酒井之嗾使，由日本租界里的青帮分子暗杀。胡恩溥被暗杀手段和白逾桓被暗杀手段大体相同。倘此说确实，那就从日本方面得到反证。这两起暗杀案件，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及近年台湾史家都曾有过详细记述，本文不再具体陈述。

关于孙永勤抗日义勇军进关事件。

1933年12月11日，孙永勤于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拉出一支义勇军进行抗日活动。这支队伍是由农民自发组成的，起初称“民众军”，以杀富济贫、反对日满苛政、收缴民枪起事，队伍迅速扩大，于1934年夏曾发展到五千余人，经中共北方局和冀东党领导人的帮助，进行整军再编，由“民众军”改称“抗日救国军”。进关前，中共河北省委与遵化县委曾派员与之联系。进关后，孙永勤欣然接受我党委任为华北抗日第一军军长，队伍改称为“华北抗日第一军”。这支队伍在整军再编时，曾有四个总队，后来又编成九个大队，分别活动在兴隆、遵化北部长城沿线、平泉、宽城、青龙及承德等地。其所到之处，英勇地抗击着日本侵略军，打击伪满汉奸势力，守纪律，不扰民，还时常将胜利所得粮食、什物赈济当地贫民百姓，被群众称为“及时雨”、“仁义之师”。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与日伪军作战数以百计，克敌伪据点，消灭日伪军，缴获枪支武器及军用物资不计其数。孙永勤在长城以北的存在，成为日满巩固统治的一大障碍。日满称其为“满州西南‘国境’之大患”，视为眼中钉，拟决计“进剿”。而孙永勤部军需给养无源，官兵训练无素，与日军主力正面作战多凭勇猛取胜，战斗付出代价颇大。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遂调集大批兵力，对其实行“围剿”。孙部在日军的多方压迫下，实难支撑，于5月15日寻机开入关里，意欲取得关里爱国力量的支援，解决军需，以期抗日到底。不意入关后事与愿违，历时不足十日，竟遭日蒋（蒋军指当时的战区保安队）“协剿”，惨败于遵化毛山沟，孙永勤及其身边一些抗日救国军领导人壮烈牺牲。孙部义勇抗战的壮举，显示了我中华不容欺侮的伟大民族精神，表明在人民群众中潜存着无比强大的救国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将孙永勤与瞿秋白、方志敏等诸多烈士齐名赞誉为“民族英雄”，“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

孙永勤义勇军于遵化毛山沟被“剿”之后，日满和国内当局的新闻社报道有明显不同的

倾向性。关于入关的责任，日本驻平武官5月20日递交给何应钦的书面通知中称“……因为贵国官方庇护，孙部常向贵国领土内逃遁”。5月26日，天津《大公报》称“……受日军压迫窜至长城附近……日司令部迁设洒河桥〔澈河桥〕北三道河，并来通知我方派警接防……”而孙匪“遂乘虚于15日窜入关内”。关于国民党官方对待孙部的态度，日满一方在康德2年（1935年）5月27日的《大同报》，头版题为“扫荡国境孙永勤匪，毛山沟已发生战斗”，文称：“……遵化附近，按停战协定，日本军原可自由行动，唯究系中国领土，故作战行动极为慎重。且曾以中国侧讨伐之要求于遵化县长，而该县长不但左右支吾，不行讨伐，且据诸情报，皆谓有援助孙匪之说，乃成为即匪团之位置亦难确证之状态。山田部队长乃对县长宣言，谓在二十四时以内不讨伐，则日本军即取自由行动。县长谅悉而退。”5月26日，天津《大公报》第三版题为“协剿孙永勤匪部，我团警与日军夹击，匪部扑灭之期已在不远”，文称：“……连日以来，我团警分布于各要隘，搜索兜剿，匪部即形不支，扑灭之期，当在不远。至于外报所载遵化县长有庇护孙永勤之说，与事实不符，且完全不确。至于协剿孙匪事，我当地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关于国民党战区保安队不主动讨伐，日满在同一时期的《大同报》上载关东军发表的文章中称“……山田部队长谓县长拥有保安队、民团等三倍于孙匪以上之兵力，包围占领遵化东北方三里（店）、毛山沟一带地域之孙匪已有二日，并未讨伐之。”5月26日，《新闻报》北平蓟密驻平办事处消息中称：“遵化股匪东南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一带由我特警负责该处，24日已无匪踪。匪现窜遵化毛山附近，有出口企图。”又北平蓟密署息称：“蓟密特警某中队，因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一带已无匪踪，24日亦撤回遵化城内。”国内外报道上的不同倾向，显然是给当时中日各自一方的交涉提供口实。实际情形究竟如何？

史实告诉我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官方的真实态度是对孙永勤部实意“剿”灭，绝不会支援。

首先，5月5日，国民党战区保安队接到驻马兰峪日军警备队转达日本关东军的通知，提出日军将在长城一带“剿匪”，要中国战区保安队退到长城以南二十五华里。国民党政府对日方的这一要求，本来是有权拒绝的，但却没有拒绝，只是交涉改退十五华里。这一行动本身就支持了日本对孙部的“追剿”。其次，5月中旬，战区保安队正在换防，在换防刚刚就绪四天后，便立即派出张庆余一中队“驰剿”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后又增兵，由5月19日至24日，保安队分布各要隘，搜索“兜剿”，从未停息。再者，在毛山这场战斗，日本军发起总攻之前，保安队负责三里店、鸡鸣村一带防区，他们将孙部逐出这一防区之外，逼至毛山沟，与日军配合，对孙部形成一个包围圈，堵住孙部南向突围的去路。还有，北平军分会直接过问“兜剿”进程，除于学忠要将战情亲自向何应钦汇报外，迁安、遵化两县还要随时直接将孙部动态汇报北平，足见国民党军政当局“剿灭”孙部之实意。最后，当日方提出遵化县有接济孙部之

嫌，何应钦马上命令河北省政府严查，尤可表明国民党政府官方立场。

从历史上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向来实行退让妥协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执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镇压、阻止中国人民的爱国抗日行动是一贯的。如干涉上海《生活周刊》给东北义勇军收集救援费；通电加罪冯玉祥、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宣传“赤化”，对冯等说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时日本军也曾叫喊，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有违《塘沽协定》，何应钦默契不驳。日方曾提出“觉书”，要冯玉祥交出多伦。冯却要求日方让出热河，还我河山。何应钦曾采取种种手段，压迫冯玉祥所部，后又与日军配合夹击，逼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瓦解。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是继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瓦解之后再起的又一支抗日义勇军，正是国民党政府扑灭爱国自发武装，面临此伏彼起的一例。国民党政府是绝然不会援助和接济这支抗日队伍的。

同时，也有许多史实显示出，于学忠、保安队官兵、遵化县长对“围剿”抗日救国军及其与日军的配合是违心的例行公事，并有其可供理解的历史背景。

一、尚健在的原保安队人员提供证明，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进关时，保安队内部有口头密令，任何人不准开枪射击，违者杀头。

二、实地走访现尚〈健〉在的当年抗日救国军中的小队长、班长、战士及其活动地区的高龄老人，他们都能证明保安队始终没和救国军正面作战。在保安队尾追孙部过程中，虽然时有密集的枪声，而孙永勤从没下令还击，实际孙部并无一伤亡。

三、孙部驻遵化城东西小寨期间，曾派出十八名勇士化装樵夫荷柴入城，意欲找县长逼索粮秣军需。入东门后被警宪人员察觉，立即转出〔往〕南门，又遇保警人员截阻盘问。不得已，十八名救国军勇士亮明身份。经与警方严正交涉后，开门放出。警宪人员向空中鸣枪，十八人安全撤回。

四、隔日，自遵化城内向西小寨孙部营地两次送去军需什物。一次送大米约2000斤，猪肉少许，尚有子弹两箱、枪两支。又一次，送革制皮鞋数麻袋。救国军从来人中获悉日军即来“抄剿”的确实情报，孙部当即转移，使日军扑空。

五、孙部于毛山被围，在日军总攻前一天下午，在包围圈内迂回行军途中，于三里店北山根接到保安队驻遵化三大队长吕世江派员送来口信，大意是“日军将要发起总攻，你们快走。”孙部继续进军，少时西面山头遇有民团岗哨。孙部派人联系借道，民团战士表示不敢答应。孙不愿与民团发生冲突，又返回原驻地，天黑又雨权宜在原地宿营，未能脱开包围圈，致使次日遭袭。

六、毛山战斗总攻开始前夕，李连贵（孙部四总队长）突围走散的小股抗日救国军战士在总攻开始后，由包围圈西部突围时遇保安队，竟安然得到放行，并提示他们事后要将枪支隐藏好。

七、保安队虽陈兵于鸡鸣村、三里店一带，面向北部毛山包围孙部营地，但实未主动出击。

八、事后，有人亲自听到保安队第二总队第四区队第一大队长贾勋臣谈论孙永勤说：“孙永勤太不聪明了，当时西边为他们留出一面，示意让他们从西边冲出去，他看不出；保安队的机枪往空中打的，他也不听听枪声儿，还不往外冲！”

九、5月24日晨，日军对毛山孙部发起总攻时，山田队乘汽车冒雨从包围圈南侧穿过保安队防区，向抗日救国军做突然袭击，保安队防区有人借故鸣枪。枪声为抗日救国军传递了信号，孙部及时离开营地进入毛山沟，准备迎击（此时仍在包围圈内）。

十、遵化毛山沟附近秋花峪的一位高龄老人，亲眼目睹当时保安队数名战士给一名抗日救国军伤员食物，伤员吃不下，一个保安队战士动员说：“吃吧，养好伤，还打他日本王八蛋！”

以上这些情况，虽不见有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一时也难把每一具体情节本末都取出多方证据，但时过五十余年的历史事件，群众和当事人尚留有如此深刻记忆，当不属于偶然。历史事件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留影，应是我们研究史实真相所不容忽视的一面。联系下述背景，尤觉以上的史实迹象顺理成章：

1. 当时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战区保安队领导人于学忠，对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顺服日寇、丧权辱国的行径内心不服，认为他们在涉日关系上有许多问题，不但不支持地方，反而给地方为难。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文章中说：“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曾在河北省政府任主席三年，其时日本正谋控制华北，……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当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黄郛等人压在人民头上，只求维持其反动统治，不惜仰承日寇的鼻息，对于对日外交问题和中国高级官员任免问题，均唯日寇之旨意是从。……而当时的环境的确是外受日寇的欺凌，内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双方相煎，苦痛难言。”

2. 于学忠到河北就任以来，与日军关系格格不入，日军欲驱其离开华北存心已久，当时又在天津日租界的暗杀事件上被日方涉嫌。于学忠原系东北军张学良的亲信，长城抗战期间，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下野，临行时将原二十六万人的东北军分出十七万交给于学忠。于学忠颇有些实力，遂为日军所嫉视。曾对其实行拉拢、威胁（包括暗杀手段）兼施，于学忠软硬不吃，被日方视为与其势不两立的人物。

3. 战区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两总队原系东北军，是《塘沽协定》〈签订〉后，由于学忠指令改换军装编成的。其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多系东北人，东北家乡沦陷，怨蒋仇日情绪颇深，隐愤难言。

4. 《塘沽协定》〈签订〉后，战区各县县长的人选都是由于学忠做主指派的。遵化县县长何孝怡受到于学忠的信任，与于学忠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于学忠调离华北后，何孝怡托病辞职，并得到当局照准（还有人说何孝怡与孙永勤早有交往，但一时难于考证本末）。



从以上这些史实和背景，足可断定战区保安队“追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配合日军包围孙部，不可能是由衷的，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而所谓支持援助孙永勤抗日救国军，那是由于于学忠、保安队官兵、遵化县长何孝怡等人不同程度地存有爱国、怨蒋、仇日的民族意识，这既不是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官方指令，也不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公开化行事，而是带有某些暗示、同情的味道，与真正意义上的支援相差甚远。

日军当年逼签“何梅协定”拿出的两个借口，都是不能证实其性质的现象。不但根本不能用来构成日方证明蒋介石暗做抗日准备的逻辑前提，也更不能依此直接说明中国一方违反《塘沽协定》。开始于这两个借口的中日之间对河北事件交涉的结果，在正式文字上，只有一纸在日军逼迫下，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单方对日承诺的通知书。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庭上没有承认这纸通知书具有“协定”效力。性质模糊的两个借口，导出一纸性质模糊的“协定”，侵略者的霸道，当权者的软弱屈服，使中国一度丧失华北主权，确〔却〕是历史的真实。

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
被日蒋“协剿”的基本经过[1]

马秀山

孙永勤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在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与方志敏等诸多抗日英雄一齐得到提名赞誉。他带的一支抗日救国军，在热南一带抗击日满武装，被日满称为西南“国境”之大患。日本侵略军把他视为眼中钉。入关后于遵化毛山沟遭日蒋（战区保安队）“协剿”。事后，日军认为国民党军政当局对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给予接济、庇护，违反《塘沽协定》，将此事与当时正在交涉中的“河北事件”（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一并作为逼签“何梅协定”的借口，实现了日军侵华预定的战略。搞清这段史实经过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1933年12月11日，孙永勤不满日满苛政压迫，在其家乡兴隆县孙杖子揭竿起事，拉出一支“民众军”，整编后改名为“抗日救国军”。队伍发展迅速，曾达五千人，编过四个总队，

[1] 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遵化党史资料（1927~1937）（第一辑）》，1987年12月印行，第94~102页。

十二个大队，主要活动在兴隆、平泉、青龙等地，往北到承德上下板城，往南到迁安、遵化县境，活跃于长城内外。一年半多的时间内，在热南惩罚土豪劣绅、汉奸走狗，救济贫民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威震热南。因而1935年4月，日军下决心集中兵力，扑灭这支抗日队伍。抗日救国军多次与日军周旋，弹药不足，军需供给无源，实在难于支撑，队伍人数锐减。进关前曾有中共河北省委、遵化县委派员与他联系，邀他进关接受我党领导，组编抗日游击队。孙永勤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时提出一要有个委任，二要解决军需武器等，但未及解决，即于5月15日开进关里。当时以中共河北省委名义，委任孙永勤为华北抗日第一军军长。这支抗日救国军只在关内活动九天，就在遵化县毛山沟遭日军及战区保安队“围剿”，孙永勤于24日午后壮烈捐躯，抗日救国军惨遭失败。兹将已掌握的事实经过以时间表的形式记叙如下。

1935年5月初

孙永勤在救国军第四总队李连贵活动地区——兴隆东部青杏子沟一带就医（4月份老梁山一仗腿部挂彩），第一总队长张福义活动在承德县境，第八大队长何广永、第九大队长康永贵八百余人正在攻打承德附近据点，二、三总队在长城沿线、澈河一带活动。日军驻承德第七师团长杉原急调古北口日军及察东伪军李守信部到承德附近上下板城驰救。张福义调动队伍撤出承德，到兴隆东部青杏子沟一带集结。日军调集各路兵力进行“包剿”，松井部出澈河桥西进，奔遵化东北部；石井部五百多人自古北口经石匣出长城墙子路口东进；川岸部两个联队进占罗文峪澈河北山一带，先设司令部于罗文峪。总计有日军五千人、伪军一千人，从西、北、东三面包围救国军，已形成逼救国军入关的势态。

5月5日

驻清东陵日军警备队长岩永，于是日下午三时通知国民党驻遵化保安队王大队长谓：日军对孙永勤部残匪决定铲除之，唯恐发生误会，请该队转移长城以南二十五华里处。罗文峪方面防务交日军担任。因二十五华里已超越遵化〈城〉以南，经交涉改为撤离长城以南十五华里。保安队于当日晚撤回遵化城。日军设司令部于罗文峪（于数日后日军将司令部移设澈河桥北三道河，并未通知国民党战区保安队接防）。

5月11日

日军川岸部之山田队，从北部向救国军进攻。张福义、何广永、康永贵于兴隆青杏子沟集结时，曾共同议定全军进关，寻求支援，解决军需。因此，张福义、何广永、康永贵等在日军川岸（文三郎）部之山田队进攻之下，迂回南撤，意在寻机入关。

5月14日

保安队李宝如三个中队换防到遵。

5月15日

孙永勤乘日军司令部由罗文峪移往澈河三道河，乘罗文峪并无保安队接防之虚，令张福



义、何广永、康永贵等自马蹄峪入关，直抵遵化境大屯、侯家寨一带。

孙永勤亲率一支主力自洪山口入关，经驻尤山口三道沟，迂回迁安境后，复入遵化小于家沟〔小于沟〕、柴伏厂〔柴户场〕、王家沟一带。

5月16日

孙永勤主力尚在迁安境。同年5月19日《大公报》第三版报道的消息，文称：据迁安政府17日电，16日迁安县属漖河桥北喜峰口外，突由热河开到义勇军系一千三百人，号称抗日第一军。首为孙永勤（琴）、孙营桂（四川人），所部非常整齐，枪支齐全，竟有持双枪者。现入深山中，夜出昼伏，并出布告安民，且有宣传队向人民宣传，称决不骚扰乡民，所用粮食自备。二日来确未向民间索食，只于16日夜将富户李之桂等请往，借款二千元。16日晚曾与日军接触，战约四小时，义军即避往山中。日军未敢穷追，用飞机侦察亦无结果。闻日军死十八人，伤二十六人。

5月17日

除李连贵所部四总队外，救国军各总队都已相继入关。下午，孙永勤主力驻于遵化城东十五里之西小寨及临近各村。孙永勤本人住于西小寨的一家逃亡富户崔子珍的空宅，且于此宅设火立灶，由本村群众李玉增给救国军担任炊事，多数战士在所住各户休息。孙永勤、马保德（副军长）、何广永等到村外巡视地形，康永贵检查岗哨。

5月18日

李连贵所部第四总队五百余人亦自马蹄峪入关，午前直抵西小寨（一部驻于大寨）。于该村另一户逃亡富户李桐的空宅起火立灶，由该村李玉增为其任炊事。

中午，孙永勤授意李连贵挑选十七名精悍战士，由总队稽查长徐连芳带队，化装成卖柴人进城，想抓出县长何孝怡，逼其供给军需粮秣。下午出发从城东门入，走到东街陈家饭店门前，忽然城门关闭。稽查长徐连芳警觉到形迹引起了保安人员的怀疑，带人快速转向南门。南门也被关闭，且有保警人员巡守。这十八名勇士欲出遭阻，不得已说明身份，出示枪支，严厉交涉后，开门放出。出门后，保警队于城上朝这十八人鸣枪，但无一伤亡，迅速返回西小寨。

晚，一个戴大草帽的人来到西小寨，见了孙永勤。

5月19日

早饭后，孙永勤又派两人进城送信给县长何孝怡，保警人员拒绝入城。此二人将信交与保警，返回西小寨。是日，县长何孝怡有电话报北平称：有匪自流星峪窜入，于十里铺集结，派调张庆余一中队“驰剿”。

20日前的某日上午（有可能是19日），由城内来三驴一骡驮运物资到村（西小寨），有西小寨村民见康永贵等从驮运来之麻袋中取出皮鞋（革制鞋）分穿（笔者认为是县长何孝怡所送，尚待确考）。

5月20日

上午，县长何孝怡派人送大米约两千斤，肉少量，子弹两箱，步枪数支，给驻西小寨孙永勤。且在这时获悉日军将到此“围剿”，救国军午饭后立即集合朝大寨进发。是日上午有李连贵所部原留驻车河的八、九中队，自车河出发，经马蹄峪入关直抵大寨。途中有日军尾追莫及。救国军于大寨召开中层以上军事干部紧急会议，议决行军意向——南进投奔国民军，并立即行动。一路行至七户，一路行至尖山屯，遭日军截击。

是日，日军用汽车二十余辆，载兵二百余名，携有钢炮、机枪多架，自潵河桥开抵遵化城。下午二时由遵化出发，去西小寨包围救国军扑空。复开车南行，由七户、尖山屯一带将救国军截击折返，接触中炮火激烈。救国军复经大寨、双庙子奔西铺东山，有的入迁安境景忠山、三屯营等地。救国军开始由西小寨向大寨进发途中，一度于华山附近遇有民团，小有枪声，民团退。在日军截击返回之后，后边有保安队张庆余部尾追。

是日，日驻平武官高桥坦给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何应钦递交照会。文中要点：一是此次遵化县长确有庇护孙永勤的事实，追问责任；二是孙永勤股匪受官方庇护，才向贵国领土逃遁，日军不得已，自动将所需兵力，进入遵化一带，以期彻底消灭之。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接见高桥访晤，谈及日军“追剿”孙永勤事，向日军驻平武官高桥坦说：“遵化已有张庆余、周毓英两部警队及民团并力堵剿，匪患当可肃清，毋用日军代劳，以免引起人心不安。”谈后高桥坦将此意电致关东军，鲍文樾亦将此意电致正在太原的何应钦。

5月21日

李连贵所部救国军，自四十里铺东山转移到秋花峪、小厂、黄花峪宿营。孙永勤带主力自迁安境皇阁村、马甸子、三屯营等地朝遵化境秋花峪方向转移。后边有张庆余所部之保安队追迫。当到秋花峪时，东山梁上有保安队朝救国军猛烈射击，救国军不予理睬，奔小于沟、王家沟等地隐蔽宿营。孙永勤住小于沟吴凤忠家。

5月22日

孙永勤率队由于家沟〔小于沟〕转移到吴家沟，住于张志岳〔张志跃〕家，其队伍分别隐蔽毛山沟、桃树沟一带驻守。

是日，日军川岸部之山田队长紧逼县长何孝怡说：“二十四小时内不讨伐，则日军即取自由行动！”县长惊〔谅〕悉而退。

5月23日

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总体上集中在柴伏厂〔柴户场〕、秋花峪以西，毛山沟的东北之一带山地。其北面九虎岭一带有大量日军封锁，其东面有日军逐次逼近，其东南面及南面有保安队特警队长张庆余、周毓英及民团数千人。毛山西北长城南侧有小股日军。这时国民党保安队一方以为自己应负责的防区为长城以南十五华里之外，抗日救国军已不处在自己的防区，不肯

再向北推进。而日军山田队长又碍于“毋用日军代劳，匪患当可肃清”一说，对救国军虎视眈眈，急想亲自行动，而等待警告县长“二十四小时之内”过后，于是日下午采取了自由行动。在马台子、官台子、九泉山三处做出向毛山一带抗日救国军阵地炮击的准备，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孙永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围方略。会后分两路行军。孙永勤率直属队，关元有、赵四川、王殿臣、马宝德〔马保德〕等率队相随，沿毛山南麓进发，意欲奔片石峪，出马蹄峪。行至三里店北山根，接到驻遵化保安队大队长吕振江捎来口信说“日军将要发起总攻，你们得快走”。但前面山梁上有数名民团正在换岗，派人去联系借道，他们说“负不起责任，不敢答应”。孙永勤不愿与民团发生正面冲突，于是率救国军返回吴家沟。晚饭毕，天下大雨，权宜就地住了下来。另一路李连贵、年焕兴等傍晚从小于沟西边王家沟出发，沿山脚奔秋花峪，经毛山沟、小厂绕过松棚营西沟，夜宿黄花峪。次日拂晓，率主力三百余人奔房山沟突围出关，曾与日军石井队（前部）几战几旋，有小量牺牲，小股队伍失散。

5月24日

凌晨四时，日军开始攻击。先是山田队二百多人乘车冒雨越过国民党保安队特警防区，从南面驶向吴家沟村西口。在日军通过保安队特警防区时，有的特警鸣枪。抗日救国军一闻枪声，迅速撤出村外，进入毛山沟。日军见状后，以机枪、钢炮向毛山沟轰击。随即马台子、官台子、九泉山三处，同时朝救国军阵地毛山沟开炮。炮声停止后，日军石井队从西北向毛山沟穿插，川岸联队主力从北面向毛山包围，松井队从东面向毛山兜进。此刻孙永勤伤势未愈，在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等保护下，人们用椅子抬着登上山顶，指挥部队，占据了头道毛山、二道毛山、三道毛山。凭借1933年国民党二十九军长城抗战时的壕堑固守阵地。战斗中日军利用飞机空中盘旋，指示目标，战火异常猛烈。孙永勤一度让关元有单独率部突围，关元有不肯，他决心与孙永勤一同报国。遂将队伍两路分开迎敌。救国军在处境艰难情况下，仍多次击退日军。曾击毙日军田边少尉及一下士，打伤日军士兵十余人。战到中午12时15分，孙永勤、关元有等壮烈殉国。赵四川、王殿臣等领导者亦随之先后英勇献身。战斗中由于日军的炮击与空扫救国军，阵亡者约三百余人，少数幸存者独自为战，最后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是日下午，日军分别撤回马蹄峪及潵河桥。保安队留少数清理战场，大部撤回遵化城。

5月25日以后

日军、伪满报纸和国内报纸报道孙永勤进关被剿的文章中，在如下几个观点上出现分歧：

一、孙永勤进关原因。民国24年5月26日天津《大公报》称：“……受日军压迫，窜至长城附近……日军司令部迁设潵河桥北三道河，并未通知我方派警接防。……而孙匪遂乘虚于十五日窜入关内。……”而日驻平武官5月20日递交何应钦的书面通知（未查见何报载）中称：“……因为贵国官方庇护，孙部常向贵国领土内逃……”

二、国民党官方对孙永勤的态度。日方驻平武官递交何应钦书面通知中称：“此次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事实……”康德2年5月27日《大同报》头版头条载文题为“扫荡国境孙永勤匪，毛山沟已发生战斗”，文中称：“……遵化附近，按停战协定，日本军原可自由行动，惟究系中国领土，故作战行动极为慎重，且曾以中国侧讨伐之要求遵化县长，而该县长不但左右支吾不行，且据诸情报，皆谓有援助孙匪之说，乃成为即匪团之位置亦难确证之状态。山田部队长乃对县长宣言，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不讨伐，则日本军即取自由行动。县长谅悉而退。”

国内天津《大公报》5月26日第三版载文题为“协剿孙永勤匪部，我团警与日军夹击，匪部扑灭之期已不在远”，文中称：“……连日以来，我团警分布于各要隘，搜索兜剿，匪部即形不支，扑灭之期当在不远。至于外报所载遵化县长有庇护孙永勤之说，与事实不符，且完全不确。至于协剿孙匪事，我当地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

三、防区责任方面。伪满康德2年5月27日《大同报》载：关东军司令部发表的文章中称：“……山田部队长谓县长拥有保安队民团等三倍于孙匪以上兵力，包围占领遵化东北方三里（店）、毛山沟一带地域之孙匪已有二日，并未讨伐之。”

国内中华民国《新闻报》24年5月26日载北平蓟密驻平办事处消息，文称：“遵化股匪东南三家店（即三里店——笔者）、鸡鸣山一带由我特警负责。该处24日已无匪踪，匪现窜遵化毛山附近，有出口企图。”北平蓟密区署息称：“蓟密特警某中队，因三家（里）店、鸡鸣村一带已无匪踪，24日亦撤回遵化城内。”很显然意在披露防区责任。

以上为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在长城以南遭日军与国民党战区保安队“协剿”的基本经过，及国内外报道上出现的分歧。



黄花川农民暴动[1]

黄花川，是多么优美的名字啊，它是兴隆县滦河西岸孙杖子村的一个小自然屯，这村户数不多，四方环山，英雄地站在峭壁峡谷之上。山上松柏成荫，炎暑时劳动过后，农民就蹲在树下纳凉，听着小溪潺潺流水，百鸟翔空争鸣，可排除一天的疲劳。山雨欲来风满楼。1933年，日本强盗在我国到处寻衅生非，蒋介石死抱“天皇”臭脚讨好，地方秩序成了乱线头子，各起一伙，东抢西夺。黄花川位在三角地带，又有滦河、黑河两条大河千绕万绕，当地缙绅大成兴商号两个股东张岳两家尽力拉拢，股匪马拐子、大五龙、小白龙（直系军阀团长任福庆）、坐山雕等摇身一变，成了土豪劣绅的御林军。匪焰十分嚣张，到处绑票劫财，奸淫妇女，农民苦不堪言。

1933年3月3日，日本强盗侵占热河，同年同月10日兽兵开进兴隆，并在长城各口陈以重兵，寻衅华北。

强盗来了，灾难来了，在痛苦中煎熬的人民起来，起来抗战。

蒋介石哪把民族存亡放在心上！拯救国难的千斤重担中国共产党担起来了。1933年9月，中共冀东〔京东〕特委经常派地下工作人员到兴隆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抗拒敌人。

孙永勤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富农家庭，但为人正直，素有声望，华国时期担任黄花川自卫团团总。1933年，股匪马拐子、大五龙、小白龙、坐山雕作乱，孙永勤欲起事勤民，因势孤力穷忍下，土匪几次胁迫收枪，抗拒未缴。

日寇进兴隆县不久，于5月建立伪热河省兴隆办事处，编村编甲，下令缴械民众枪支。

车河口缙绅大成兴商号张岳两家所领导的四股土匪与上板城伪警察署、车河堡伪警察队密议决定在11月里接收黄花川孙永勤所领导的民众枪支。消息传来之后，孙永勤随即找来老团员十七人在家开会，宣传日寇在冀东、兴隆的罪恶兽行。孙永勤宣誓：“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次日民众大军起事了，肩上扛着大旗，哗啦啦迎风飘展，旗上写着十个鲜明大字：“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记住吧，这天是1933年12月11日（旧历十月二十四日）。

孙永勤率领民众军扑奔黑河川，把张杖子村地主张禄增〔张如增〕财物分给农民，受到沿途农民夹道欢迎，二百多贫苦农民参加民众军，缴获地主、伪甲、伪警枪支炸药无数。

车河口张岳两家地主一听孙永勤在黑河掀起暴动，吓得魂不附体，奔忙喘喘，连着酒肉伪上板城警察署马署长、伪车河堡警察队东队长，急电向日寇求兵，集中兵力，力求速歼。伪官和缙绅遂成一家，全部动用接收的千余土匪，由鬼子供给弹药，妄想一鼓消灭抗日力量。

孙永勤的队伍纪律严明，同农民甘苦与共。两个月活动在孙杖子、梓木林、王宝石、宽

[1] 《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编写时间：1959年11月~1960年7月1日，第48~54页。

甸、三道〈河〉诸地，宣传抗日救国，严办汉奸。农民持枪持刀参军者如同集市，军队迅速壮大，弹药稍渐充盈。

1934年2月上旬，孙永勤率军五百北上。越过山岭直扑车河，围住车河口商号大成兴，战斗半小时，缴械护警。农民和贫苦市民随军涌入，打开仓房，一搬而空。当地人民见大军为穷人办事，称部队是“及时雨宋江化身”。老人、儿童、妇女争着给军队送饭送茶。

大成兴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山倒了，大快人心。人民的心像水似的，可见到了阳光，美吧！

柳河川八挂岭〔八卦岭〕村农民闻讯，心花开放。农民张福义支援战捷，发动了八挂岭〔八卦岭〕农民暴动，缴获地主富农枪支，率众百人赶到车河口，与孙永勤部会师。

民众军队伍迅速发展，常转战在兴隆柳河口、承德县乌龙矶一带，沿途缴枪千余支，军队扩展到两千人。在柳河、乌龙矶转战数日，迂回黑河。此时领导干部增加到四人，孙永勤任团长，张福义、关源有〔关元有〕任副团长，赵四川任参谋长。

大成兴商号股东张岳两家丢了财产，气焰更凶。今天跑上板城警察署，明天跑兴隆警察署，软瘫瘫地请求在车河口驻兵，“扫荡”孙永勤部队。伪官只是哼哼唧唧，哪个不想保住脑袋？但狗肚狼心的汉奸们仰仗他洋爸爸，揖求洋人动兵□[1]乱孙永勤。

山乡春来迟。3月了，冷风嗖嗖地袭人，雾灵山麓溪泉推来冰雪，山上冰路溜滑。孙永勤大队又出发了。天一霎黑，军队到车河口。这次兵力一千多人，袭击大成兴商号，打开大成兴，把财物全部赈济贫苦群众，大成兴储物一扫而空。孙永勤部队继续进军，随将乌龙矶处敌据点打下，歼灭数十人。

汪海征〔汪海澂〕，东北人，民国时代承德地痞。日寇居承德〔在承德居然〕就看中了这个“白脸”，汪海征〔汪海澂〕也就打起顺风旗，当上兴隆办事处处长，跟在鬼子屁后活像小八狗。汪海征〔汪海澂〕接到车河警察署3月的报告信，详陈孙永勤第二次攻陷大成兴，把脸气得像个紫茄子，不及向鬼子陈述，忙招兴隆地痞三十六友头行人汉奸卢仪卿（伪财务局局长）等，把汉奸队全部打扫上，又加红梅寺卢仪卿部下的一群疯狗，凑起五百多人，向寿王坟来，妄想围攻孙永勤。但这群熊兵都带双枪，一杆大枪、一杆烟枪，平时欺负老百姓犹如凶神，这次是真要打仗，一个个早准备抹油逃命，加上行军几十里，连累带瘾，还有心思打仗？只好半途停军，驻在寿王坟村老烧锅去。汪海征〔汪海澂〕怒火正燃，半夜又促进军，拂晓赶至王胖子沟，与人民抗日武装孙永勤部队接触。同时，大五龙匪团汉奸孙荣圃、上板城伪警察千余人赶到。敌人仗着人多胆壮，猛扑过来，战斗激烈。孙永勤沉着地指挥战斗，杀退敌人两次冲锋。伪警察署马署长督促大五龙部、孙荣圃上，大五龙、孙荣圃只是趴在山上不动。汪海

[1] 此字印刷模糊，无法辨认。



征〔汪海澂〕带的一伙人见弹不饶人，早已腿肚子朝后，哪个还敢舍命向前？眼看日转正午，孙永勤恐继续相持不利，随撤退转移。汉奸伪警夹起尾巴也逃回窝里去了。这次战斗三小时许，毙死伤敌百余人，我军在冲锋中约阵亡十人。

这一战斗，打破了敌人狗胆，为人民报了仇，出了气。这一支刚刚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经受了锻炼，鼓起了士气。

人民武装的胜利，打击了日寇在兴隆的基石，鼓舞了广大人民抗战热情。

1934年2月，兴隆苇子峪村李连贵发起暴动，缴了杨树林地富50支大枪，拉出18个人，奔蓝旗营一带活动。3月，蓝旗营北山年焕兴举行暴动，带20人同李连贵会师，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打倒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3月底，率兵攻击半壁山伪警察署，战斗失利，阵亡三人。撤到黑锅底〔黑锅顶〕、二堂村，又遭日军围袭，伤亡二十余人。迂回在黑锅底〔黑锅顶〕密林中，乘隙扑奔黑河孙永勤部，在五指山与孙永勤会师。

民众军越战越精，越战越壮，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1934年3月中旬，这支队伍已壮大到五千余人。此时，冀东〔京东〕特委委员王平陆同志与孙永勤会见，相谈数日，他建议孙部把民众军改名抗日救国军，孙接受了建议，将部队进行整编。孙永勤任军长，赵四川任军参谋长，张福义任第一总队长，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何子桥〔何广永〕、关源有〔关元有〕任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总队下设团、营、连、排、班编制。

军队建制焕然一新，军的名称更名副其实。“天下第一军”的大旗改为“抗日救国军”大红旗。

为了便于活动，杀伤敌人，抗日救国军以总队为单位进行活动，全军遍布承德县、兴隆县、遵化县，常出没在黑河、车河、澈河、横河、滦河各地。

1934年，正当蒋介石借兵日本，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举起屠刀的时候，这里抗日救国军却大杀敌人。

3月25日，孙永勤、张福义所领总队开到半壁山佛爷来，一举攻克佛爷来伪警察署，活捉警察一名，击毙数名，打开仓库（即所谓救济贫民的粮食），赈济农民。群众怒火不止，抱柴取火，烧毁伪警察署。年焕兴、李连贵总队活动在罗文峪，袭击了孤山子税关总局，活捉日本人总局长佐藤和士兵一名。撤后，在途中与日寇骑兵相遇。日寇兵力一连，闻风西逃。抗日军紧紧追击，击毙七十名敌军，尸体散去沿途约百里许。这仗缴获大枪三十支，子弹万发。

伪兴隆办事处处长汪海征〔汪海澂〕吓得蹲在窝里不敢出来，一味向皇军、满军报告说：“匪焰万丈，地方频频欲坠，求兵增援以镇。”沿长城各县，敌已视为“国境”，闻报心中惶乱。1934年6月，青龙、兴隆、承德、平泉、迁安、遵化等县增加日本数千，企图镇压、“围剿”抗日军，并虎视华北。

敌人频频“讨伐”，地方汉奸队更狐借虎威，东窜西扰，环境恶化。抗日救国军无奈，把队伍拉上迁安潘家口、青龙都山、遵化洪山口、承德乌龙矶。抗日救国军出没神速，出其不意，袭击敌人。日寇大伤脑筋，驻承德日寇总指挥电示冀东反动政府头子殷汝耕派兵“围剿”抗日军。

1935年1月，孙永勤勒令部队集合在黑河川的老岿〔老梁〕，突然被日寇、满军、冀东治安军包围，敌人之多犹如蚂蚁。孙永勤命令全军向三个方向突围（当时也没侦清），抗日军犹如猛虎扑食，山洪暴发，从山梁扑下来。无奈武器优劣悬殊，遭受损失极大。在突围中伤亡六百多人，队伍整个跑散，事后仅集中了千余人。不久跑散士兵又投奔队伍来了。到1月底全军集中不足三千人。

抗日军军中储备不多，都过春耕了，军队还没有换季，穿棉裤棉袄行军很困难。大军经过遵化县城，军队想在城中换季，就与伪县长白某协商。白某应允，但必须借兵一用，剿灭境内土匪，胜利后发放军衣。孙永勤未识破白某面貌，一时好勇就答应了。谁知汉奸白某已把孙永勤部抵县，电告日寇。3月25日拂晓，抗日救国军东行奔遵化县茅山〔毛山〕吴家沟。就在这时潘家口、喜峰口、遵化、兴隆的日寇出发了，就在这时张砚田带领国民党保安第二总队出发了，敌兵约万众。在吴家沟口，两军接火。抗日救国军见众寡悬殊，士兵奋勇抓住茅山〔毛山〕高峰。敌人“铁壁合拢”，围困茅山〔毛山〕，架起数百门大炮向茅山〔毛山〕轰击。茅山〔毛山〕石燃了，烟雾遮阴了天。炮声淹没了枪声，膏药旗遮住了太阳。

战斗一天，敌人增兵源源开来。26日，年焕兴整队突围未成，战士阎海彬跳出弹坑，端起刺刀猛向敌群扑去，刺刀上串起两个敌人后，他中弹了，他牺牲了。战士张生〔张申〕凭着一杆步枪，杀伤12名敌人，头部中弹阵亡。26日中午，马拐子土匪赶来增援。战斗两天一夜，山上中华儿女的热血染红了石头，它证明着中华民族的英勇和爱国精神，它证明着敌人的残忍无情，它将激起全国人民的怒涛，淹没民族罪人。

在战斗中，抗日救国军仅有一千四百人杀出重围。

在战斗中，民族英雄孙永勤殉国了。在战斗中，关源有〔关元有〕、赵四川等领导人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人民永远记住他们，他们的精神在激发着人民战斗。孙永勤、赵四川、关源有〔关元有〕，永垂不朽！

日寇胆敢扼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热爱祖国的英勇的人民誓将战斗到底！李连贵、张福义、何子桥〔何广永〕、年焕兴继续领导抗日救国军在兴隆山区同敌人斗争，痛歼敌人，为死难者报仇！



民族英雄孙永勤[1]

在古长城外的兴隆县，有一个赫赫有名的村庄，它的名字叫黄花川村。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到为抗日救国而光荣牺牲的民族英雄孙永勤，就出生在这个村庄。同时，也就在这个村庄，他领导农民掀起了1933年12月11日（即旧历十月二十四日）的抗日农民大暴动。

黄花川村位于兴隆县正东的滦河西岸，村子四周被燕山环抱，到处是深山峡谷、茂密山林，是一个纯石质深山村。这个村东隔滦河与青龙和承德市为邻；北走羊肠小道或乘滦河之船逆水行舟而上，可直达本县柳河川的车河口、大杖子等地；西隔五凤楼山与瀔河川的半壁山、兰旗营〔蓝旗营〕、倒流水为邻；南隔万里长城直通关内的遵化、迁安城，〈与这两个地方相距〉不足百十里路。但是，这里由于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对革命便于防守，加上农产品丰富，对发展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是极其有利的。

1933年的3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攻承德。国民党热河省督军汤二虎（真名汤玉麟）一枪未射，逃跑至北京去了，日寇以180人的兵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到了3月10日，日寇以承德为跳板，派日寇岛村为司令，攻进兴隆县城。当时国民党县长窦宗汉早就吓得屁滚尿流，向遵化县马兰峪逃命了，只有当时的士绅地主张全五、卢义清〔卢仪卿〕们点头哈腰地引狼入室，甘心要当亡国奴，诚心要当大汉奸了。鬼子占领了兴隆县城，派来了一个大汉奸名叫汪海征〔汪海瀓〕。这个汉奸说一口好日本话，委任为热河省兴隆办事处处长。这个汉奸一到兴隆县城，就把原来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都换上了红膏药旗和红蓝白黑黄的五色旗，街上喊的也都是“日满亲善”、“一德一心”，还有什么“八格野鹿”等语言了。老百姓暗中说：“中国亡国了。”

日子不多，汪海征〔汪海瀓〕这个大汉奸召集了各村土豪劣绅等大汉奸开会，说兴隆县不属于中华民国管辖，改为“满洲国”热河省西南“国境”了。并且出头露面大封官，委任当地汉奸卢仪清〔卢仪卿〕为财务局长，史焕章为实业局长，张全五为内务局长。并积极筹划没收全县在中华民国的所有自卫团、伙会的枪支，企图镇压人民的反抗，以便使日寇能进一步进攻华北。

兴隆县穷人穷骨头是硬的。当1933年4月，长城线上国民党二十九军兵士自动起来反抗日寇以后，穷人就提出“枪就是命，只要鬼子收枪，咱就和他干到底”的口号。

到了1933年8月，伪“满洲国”上板城警察署的马署长和车河堡警察队的东队长即公开勾

[1] 《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编写时间：1959年11月~1960年7月1日，第55~61页。另，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还保存着一份名为《长城抗日英雄孙永勤》的文件抄件，内容与本文几乎完全相同，略有删减。需要注意的是，《长城抗日英雄孙永勤》在文章尾注有“遵化县访年焕兴同志办公室整理　刘恩如　1961.5.30　12”字样。

结车河口村大地主兼大商户大成兴股东张岳两家财主，决定要在11月里派大兵讨伐黄花川，收缴孙永勤领导的伙会枪支。

孙永勤，当时四十来岁，富农成分，系黄花川村孙杖子庄人。在日寇进占兴隆县前，担任封建势力组织的自卫团团总。因为他年轻有为，办事公正，好打抱不平，在黄花川村是富有威望的一个人。由于日寇占领兴隆，组织了伪政府，又要没收枪支武器，他心里总是不痛快，加上他经常听到冀东各地共产党组织工人暴动、农民暴动攻打县衙的消息，也激起他要站起来反抗日寇、举行大暴动的念头。

到了11月，车河堡的伪“满洲国”警察队要集合一起，讨伐黄花川村孙永勤领导的伙会。这个消息传到孙永勤耳朵中以后，激起他年轻的勇气，加上他积极要求抗日的念头，再也忍无可忍，就于12月11日这天晚上，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伙会17人开会。他亲自宣传日寇侵略冀东和兴隆县以后镇压人民抗日的罪恶活动，表明他要立志坚决抗日，绝不当亡国奴，并喊出“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的决心。次日，就有二百多名农民随着孙永勤扯上写着“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红旗，掀起了闻名的黄花川村抗日农民大暴动。

孙永勤把暴动队伍唤名为“民众军”，自己担任团长，活动在黄花川、黑河一带。他领导农民分了张杖子村地主张禄增〔张如增〕的财物，烧了二堂村地主高作忠房屋，并缴获各村所有枪支弹药，准备反击日寇。

车河口大成兴商号股东张岳两家地主，听到孙永勤在黄花川暴动，吓得魂不附体，再不敢轻举妄动，连忙请示其主子马署长和东队长派兵求救：一是向日寇求援兵，二是收集马拐子、大五龙、小白龙（直系军阀团长任福庆）、坐山雕等土匪武装，借以消灭这支新生的革命军。

孙永勤听到车河口警察署勾结土匪来围攻自己，更增强他对日伪的仇恨。为了壮大武装队伍力量，就在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把黄花川、黑河川的孙杖子、梓木林、王宝石、莫古峪〔蘑菇峪〕、宽甸、三道河等地自卫团所有枪支〈收〉为民众军所有。因为民众军斗争方向明确，纪律严明，队伍由原来的二百多人增加到五百人。到了1934年2月上旬，中共冀东〔京东〕特委派王平陆同志与孙永勤部联系，鼓动他抗日救国。于是，孙永勤就在党的领导下，率领全军沿黄花川北上，越过山岭，乘车河口村大商户大成兴措手不及，将车河口村团团围住。战斗不到半小时，就把商户的看家狗警察队消灭掉，把商户仓库统统打开，把粮食、布匹、财物分给贫苦的农民。当地穷人见到孙永勤领导的农民军处处为穷人办事，都称赞孙永勤是“《水浒传》宋江化身”，争着向民众军送茶送水，进行慰问鼓励。

车河川、柳河川一带的贫苦农民听到民众军到达，更是格外欢喜。八挂岭〔八卦岭〕村张福义闻听孙永勤兵士们攻打车河口，也在本村领导农民举行了约一百人的抗日农民暴动，缴获了本村地主武装的枪支，赶到了车河口与孙永勤部会师。然后全军转到柳河口、承德县的乌龙矶，



收缴枪支上千支，队伍扩大到两千多人。活动十余日，全军撤退车河、柳河，仍然转移到黑河一带去了。

冀东〔京东〕特委为了使孙永勤积极抗日，乃派大批党员加入孙永勤部，这样一来，军队斗争方向更明确，战火烧得更旺了。

车河口村的大成兴商户被围攻，丢了钱财无数，张岳两家大汉奸就跑去上板城和兴隆警察署那里去诉苦，请求在车河一带长期驻兵，借机消灭抗日的民众军。

孙永勤二次听到日寇要派大军"剿"他，就在1934年3月，亲自率领官兵一千多人二次攻克车河口，将财产和一切财物全部分给农民，并袭击了乌龙矶等敌人据点。孙永勤部队撤退后，伪兴隆办事处处长汪海征〔汪海澂〕，汉奸卢仪清〔卢仪卿〕、大五龙土匪等一千多人，在王胖子沟赶到一起，〈与孙部〉相遇。双方战斗三个多小时，〈孙部〉击毙伪军一百余人，吓得汪海征〔汪海澂〕等胆战心寒，逃回兴隆县城去了。

到了1934年5月，蓝旗营村年焕兴、苇子峪村李连贵在本地领导农民暴动后，率抗日民众军约一百多人投奔孙永勤部队。他们在五指山会师后，全军达五千多人。此后，冀东〔京东〕特委王平陆同志在黑河与孙永勤会见，相谈数日，并建议孙部人数增多，要求部队改变名称。孙永勤接受党的指示，将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军旗改为抗日救国军大红旗。在军队编制上，全军分为四个总队，每队一千二百余人，孙永勤担任军长，赵四川任军参谋长，张福义任第一总队长，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何子桥〔何广永〕、关原有〔关元有〕任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各队分别挺进青龙县都山、承德、平泉、兴隆、迁安、遵化等县。到1934年底统计，抗日救国军共袭击佛爷来、洪山口等据点一百多座，毙俘日伪军约一万五千多人。并在兴隆县孤山子村，活擒日寇兴隆税关总长佐藤，从而给日寇一个致命的打击，到处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5年1月，孙永勤部队在黑河川老峎〔老梁〕开会时，突然被日军、满军和冀东治安军包围，死亡约六百多人，因此士兵士气有些低落。孙永勤此时未对部队进行整顿，加上抗日救国军皆系农民出身，战斗一年多了，有些留恋家土，逃走约一千余人。

2月间，孙永勤领导的部队约三千余人，均穿棉衣棉鞋，行军困难，即率全军南征，奔向关内，企图得到国民党在武器、钱财上的援助。当时，国民党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反对抗日，积极集中兵力，要消灭抗日军队，于是派伪县长白某伪装抗日积极人物，叫孙永勤全军去茅山〔毛山〕一带剿灭马拐子土匪，胜利后遵化县负责发放全军大部军装与物资。孙永勤等将领由于没有认清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和伪县长的伪君子丑恶面貌，存有严重的麻痹思想，在3月29日即旧历二月二十五日清晨，全军行至遵化县茅山〔毛山〕吴家沟一带时，潘家口、喜峰口、遵化、兴隆的日伪军和保安队约一万多人把抗日救国军团团围住。四周山炮齐发，枪声如

同爆豆，喊声如同雷鸣，集中火力消灭抗日军队。

3月30日，即旧历二月二十六日，全军经过两天的向外突围，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人困马乏。此时到处是日寇膏药旗，一齐向茅山［毛山］进攻，马拐子土匪也从山顶往下攻击孙永勤部队。经过两天激战，山上，中国人的血水染红了大地，证明中国人民的骨头是硬的。山下，敌人的虾兵蟹将尸体遍野，当了中国人民的罪人。结果抗日救国军在寡不敌众的包围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绝不甘心当亡国奴，而光荣牺牲在茅山〔毛山〕上约一千多人，被敌俘虏去约一千多人，化装逃走约一千多人。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的领导者赵四川、关原有〔关元有〕在敌人屠刀下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光荣殉国了。

这次抗日农民暴动，在孙永勤领导下，对日寇进行一年零三个月的武装斗争，转战兴隆、遵化、迁安、承德、平泉、青龙六县，击毙日伪军约二万人。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今后革命提供了血的教训，那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打游击战，要不断地整顿队伍，要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要提高革命警惕性。

民族英雄孙永勤等烈士虽然牺牲了，但英勇的兴隆县人民并没有被日寇斩尽杀绝。逃出的抗日救国军将领张福义、年焕兴、李连贵、何子桥〔何广永〕等，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继续组织抗日武装队伍，为父兄报仇，为穷人报仇，活动在全县广大土地上，对日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民族英雄孙永勤的丰功伟绩将万古流芳，永垂不朽！

为抗日而光荣牺牲的暴动英雄们将流芳万世，永远受人民群众的尊敬！



孙永勤与民众抗日救国军[1]

公孙訇

长城抗战失败后，有一支活跃在原热河省南部长城内外，包括今承德、平泉、宽城、青龙、迁西和遵化等县深山区的抗日武装，这就是热南广大人民群众所怀念的孙永勤创立和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国军。这支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和政策的积极影响下，同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及其“满洲国”军警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揭开了我党领导下的冀东、热南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一

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创立人孙永勤，1893年生于河北省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一户半自耕农家庭。祖父孙福聚〔孙福巨〕生有三男一女，全家近二十口人，耕种土地百余亩，除了本家男人下地劳动外，有时雇佣长工和短工。祖父去世后，叔伯分居，各立门户。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再加上连年水旱灾害的侵袭，农村经济急剧衰退，孙家的日子也随之败落下来。孙永勤的父亲孙进合〔孙进山〕是个老实厚道、不多说话的朴实农民，其母孙陈氏则是个善良和蔼、性格开朗、持家勤俭的女性，她生有四男一女，永勤行三，这样不缺吃穿的人家在燕山深处已属殷实之家了。

孙永勤的儿童时代是中国人民不断掀起反帝爱国斗争的时代。他七岁那年，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显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从此以后，各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扩大它们在中国的权益，进一步与清政府勾结起来，残酷野蛮地压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帝国主义的凌辱，1911年爆发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是因为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和各帝国主义对封建买办军阀袁世凯的支援，使他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又继续支持中国各派军阀混战和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孙永勤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度过的，这对孙永勤以后的立身处世有着鲜明的影响。

[1] 本文为公孙訇先生应中共承德地委宣传部、党史办之邀，实地调查孙永勤事迹后写的初稿全文，完成时间为1983年6月中旬。此文后被天津人民出版社收入《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一辑）》中，收录时作了删节。

孙永勤小学毕业后，因年纪尚小在家闲暇。稍大一些，便对练武发生了兴趣。在这方面他堪称天资颖悟，不论多难的拳脚，他一学便会，而且又练得那么认真，在拳术师的指教下，他终于练出了一身好武艺。

燕山里的农民除种庄稼外，不少农户在农闲季节还兼操狩猎的营生，他们把珍贵的皮毛卖给外地进山的皮货商，以此弥补生活之不足。因此山里的青年和壮年人差不多都有一手好枪法。“在黄花川一带的青年中，要比试枪法，还得数孙永勤哩！”因为孙永勤性格活泼，又有一身好武艺，所以他在当地青年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不仅黄花川的小伙子们甘心乐意听他的指挥，就连十几里以外的滦河沿一带的青年也都主动跟他结拜为兄弟。

随着岁月的流逝，孙永勤开始接触到中国农村的黑暗和人世间的不平，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青少年时期的孙永勤就有了报效祖国的心愿。孙永勤爱读《水浒传》，他憧憬着长大之后做个盖世英杰，为普天之下的受苦人解除痛苦。

孙永勤的青年时代正是军阀混战、土匪遍地的年月。那时他的家乡黄花川一带的农家遭土匪抢劫之事时有发生，孙家又是孙杖子的首户财主，正是土匪抢掠的对象，所以，在他大伯孙进昆时，就积极仿效外地办起了民团。民团是地主阶级护院保家的武装，同近代史上的“团练”有类似之处，其宗旨是：“有事则八面围剿，无事则各守其业。”参加的成员主要是本地的农民、猎户、手工业者、船户和乡村的知识分子。黄花川民团到孙永宗主办时已初见规模，团勇二百多，大枪八十余支，长矛大刀百余件。由于孙永勤为人耿直，不畏权势，是个助弱抑强、扶危济困的钢铁汉子，因此深受黄花川一带人民的拥护。民团总孙永宗鉴于永勤智勇双全，又是本家兄弟，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便将民团交给孙永勤主办。

1931年11月间，孙永勤率民团围剿土匪时，缴获了十几匹牲口驮子，打开后发现全是枪支弹药。经审问脚夫，才知道是车河口大成兴商行为土匪砸明火和扰乱民间购买的武器。孙永勤极为气愤，当机立断联络各地民团准备攻打大成兴商行，以解除这一带匪患之根源。大成兴是岳荫臣几家大地主在水陆码头车河口开的商行，又在庙梁开有煤矿，有钱有势又有兵。1932年春，孙永勤邀来了包括遵化在内的各地民团近千人，在一个晚上便把大成兴收拾了。从此大成兴与黄花川民团结下了冤仇。

孙永勤任团总期间尚能尽心竭力、忠于职守，他对那些勾结贪官、土匪，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视为仇敌，并多次加以抑制和打击，因此得罪了几股土匪头子。于是，他们纠集起来企图抢劫黄花川，给孙永勤一个报复。孙永勤闻讯后，火速“写信联络喜峰口、潘家口、车河口、寿王坟一带的伙会，让他们来支援。那次他们来了不少人，才打退了土匪的进攻。”[1]

[1] 从言己整理：《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后，孙永勤更加关心国家民族大事。当他获悉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把东北三省拱手献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决心效命疆场。他对团勇们大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并且情不自禁地表示要奋起抗日救国。

自从蒋介石命令东北军撤出东北后，东北各地诞生了抗日义勇军，掀起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又是蒋介石的破坏和日本军队的疯狂进犯，使孤军奋战的义勇军不得不在1932年下半年退出东北，不少义勇军退入热河省境内。在热河省东部和南部的冯占海和唐聚五部，在北平“救援会”的援助下，一度联合当地抗日民团力量继续抗击侵略热河的日寇。当时孙永勤曾与这部义勇军联络，并企望参加抗日的光荣行列，只因义勇军在短期间失利溃散而未能实现抗日的愿望。

1932年一二月间，日本侵略者在进一步部署侵热军事的同时，竭力为侵热进行辩护。日陆相荒木贞夫、外相内田、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连续发表谈话、演说和声明，声称“热河省与东北其他省有不可分之关系”，“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乃属俨然之事实”，“万里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满洲国对于该省内扰乱治安，或侵入该省之内不逞分子，自得视为侵略者而讲求自卫手段。”日军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决定与“满洲国”军合作，肃清热河军，“确保满洲国安全之基础”。[1]伪满傀儡政权按照旨意，声明采取步骤，“剿除热河土匪与其他不良分子”，恢复和平秩序。2月17日，日伪决定进犯热河。21日，关东军命令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师团共十万人分三路进犯热河。当时，驻守在热河一带的中国军队约有二十万人，倍于敌寇，本可以抵抗日寇的进犯，但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各路守军均无斗志。3月1日，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闻赤峰、凌源等地失守的消息后，便急忙把几年以来搜刮热河人民的财富装上了一百多辆军用卡车，运往天津租界，然后弃承德逃走。前敌总指挥张作相，也匆匆逃回古北口，承德顿成空城。由于汤玉麟、万福麟十几万大军的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为向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3月4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4日午后一时以一百二十八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2]

热河失陷，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热潮。平津和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奔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号召各界人民起来参加抗战，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政策；燕京大学几十名学生毅然离校参加热河抗战；爱国妇女纷纷发起慰劳会，征集大批捐赠物品和现金；各地商界展开了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人民抗战洪流的鼓舞下，爱国的、原属冯玉祥将军的二十九军开赴长城一线抗战。3月

[1] 《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五、六期。

[2] 王卓然：《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9日日军攻占喜峰口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也正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双方激战，伤亡甚重。11日二十九军利用夜战、近战，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乘敌不备偷袭了日军阵地。爱国官兵用大刀砍杀日寇，敌伤亡惨重，终于把喜峰口夺了回来。接着又在罗文峪击退了日寇的进犯。这是长城抗战的唯一胜利。捷报传来，振奋人心，孙永勤听到百里之外的抵抗炮声时，由衷地兴奋，他信心十足地告诉人们说："只有抵抗，才有出路，二十九军弟兄们的大刀也能把鬼子打败。"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义勇军的艰苦抗战，二十九军喜峰口抗战的胜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迁西抗日暴动，这一切使血气方刚、忧国忧民的孙永勤看得清楚，这一切激励着他要走坚决抗日的道路。在一次民团议事时，他指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山河破碎，狼烟遍地，中华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应当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野蛮屠杀，激发了他那民族正气；民族危亡的形势，催促着他迅速拉起抗日的队伍，以实现他那救国救民的夙愿。

二

"1932年春季，伪满政权——热河省公署及热河省各县旗公署先后建立完毕。首任热河省长张海鹏、承德县长赵养愚等对地方执行统治政策，令主要乡镇成立警察署，各村成立警察分驻所及警察派出所，对地方农民积极统治与镇压。于是引起了孙永勤为首的承德、兴隆、青龙三县农民武装起义，打起反满抗日旗帜，与日满军警讨伐队相持半年之久，大小战斗数十次，给以日伪军警讨伐队很大的打击。"[1]

日本占领热河后，为了确保"满洲国"西南"国境"的安全，由赫慕侠率"满洲国"军第五军驻承德，并成立了以张海鹏之子张俊哲为头子的防卫司令部，统率三万余军警驻防在各县城、重镇，武装镇压农民抗日组织团体。1933年春对各地实行"铳器回收"政策，以此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日寇占领车河口后，大成兴商行老板岳荫臣及其股东任凤阁一伙认贼作父的汉奸地主和和土匪大肆屠杀爱国同胞，并主动向日军报告孙永勤民团"居心叵测，图谋不轨，煽动抗日"，乞求日军早日出兵讨伐黄花川，收缴武器，严惩孙永勤，以报前年抄家之仇。

同年六七月间，黄花川人民得知日伪当局要派兵前来"讨伐"并收缴枪支的消息时，富有民族气节的人民皆怒发冲冠，急欲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纷纷要求孙永勤率领群众抗日杀敌。群众高涨的抗日情绪使孙永勤很受鼓舞，经过他认真仔细分析，决定奋起抗日。要毁家抗战，

[1] 《郝席庵供词》。

先得争取家属的同意和支持，于是他反复地对亲属讲："国将不国，大男子要仗义救国保家。咱们得先治国后安家啊！"[1]通情达理的母亲同意了儿子奋起抗战的主张。孙永勤便跑到王宝石、大东峪去找挚友关元友〔关元有〕和王福合等人商议抗日事宜。第二天清晨又跑到下板城鹿洞沟〔路通沟〕去找拜把兄弟赵林、赵来和马宝德〔马保德〕等人共谋抗日大计。因为孙永勤办民团在这一带享有盛名，如今他又牵头组织抗日武装，更是信孚于民。在鹿洞沟〔路通沟〕的大庙里，孙永勤慷慨陈词："如今的形势很清楚，靠国民党军队是不行了，咱们得自己武装起来打日本保家乡。今天是时候了，绝不能坐以待毙！害怕死是不行的，不怕死，也许能免掉死。"赵林等人完全同意孙永勤的抗日主张。随后，他们就征集枪支和动员身强力壮的会打枪的青壮年踊跃参加抗日队伍的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一致同意队伍不再叫民团，要叫"农民军"。

鹿洞沟〔路通沟〕集会后，孙永勤、战四川〔赵四川〕、赵林、马宝德〔马保德〕和赵来等人便分头奔赴各村征集枪支和开展动员活动。他们先后在武厂、寿王坟、瀑河口等地征集枪支五十余支，在民团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彼此串连，使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进展十分迅速。旧中国时代，农村里大都设民团、联庄会之类的民间自卫组织，另外财主大户也都购买枪支保家护院，所以农村是不缺乏枪支弹药来源的。

正当孙永勤计划征集枪支和准备组建抗日队伍的时候，承德县警察署也在竭力执行日伪当局颁发的《暂行枪炮取缔规则》。8月间，车河口警察队长九次派人去黄花川催缴孙永勤民团的枪支。一次张杖子大地主张如增主动协助日伪前往孙杖子，劝说孙永勤缴枪，说什么缴枪之事事关重大，千万不能任着性子顶着不办呀！得罪了日本人可受不了啊！重则枪毙，轻者坐牢，后悔就晚了。孙永勤义正词严地回答道："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缴枪当汉奸，那是痴心妄想！你为日本人办事，可倒要小心自己的脑袋了呀！"在组建队伍奋起抗日没有就绪之前，孙永勤对缴枪一事一拖再拖。实在催急了就不得不缴出几支不能用的老破杆子。"孙永勤家的枪支，多半被警察署收缴。后来警察仍然向孙永勤及黄花川农民索取枪支，农民们百般地维持警察，但警察仍是勒索敲诈，对农民打骂交加，并抓捕黄花川一带农民多人，在车河口警察署刑讯监押。这时孙永勤鉴于日满统治无法生存下去，乃同其胞弟子侄及黄花川一带被害的亲友十余人，携带武器，将车河口警察署及黄花川警察分驻所包围。将警察武器收缴，房屋、家具捣毁，救出了被关押的乡亲，公开打起了反满抗日的旗帜。"[2]

攻打车河口警察署后，孙永勤回到孙杖子加紧了抗日队伍的组建。终于在1933年12月11日（旧历十月二十一日），孙永勤、战四川〔赵四川〕、王福合、赵来、马宝德〔马保德〕、关元友〔关元有〕、赵林等人把队伍集合在孙杖子，宣布了以"反满抗日"为宗旨的民众军的

---

[1] 从言己整理：《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

[2] 《郝席奄供词》。

正式诞生。孙永勤任军长，战四川〔赵四川〕任副军长，关元友〔关元有〕任参谋长。孙永勤登上石台子高声讲话："乡亲们！同胞们！'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今年春天，又侵占了我们热河，最近打到了我们家门口。国民党军队投降卖国，不抵抗，早已不能指望了。如今，我们的国家和百姓们正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再不抵抗日本军的入侵，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不！不能当亡国奴！不能等死！今天，抗击日本侵略的民众军成立了，愿意打日本鬼子的乡亲们跟我来！我们誓死奋起抗战，打出一条生存的道路来！"孙军长讲话后便竖起了"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大旗。最后民众军全体宣誓："敌不死，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

民众军诞生不久，便与日伪军警和讨伐队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民众军的第一仗是突袭张杖子。自从日军占领承德后，便扶植各地汉奸、土匪成立维持会，把侵略魔爪伸向广大农村。张杖子大地主张如增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多次向下板城和车河口日伪军警献策"讨伐孙杖子，活捉孙永勤"，并请求讨伐队驻扎在自己庄院里。12月28日，日伪讨伐队二百人在其队长李海山的率领下进驻张杖子后，张如增狗仗人势，竟出狂言，要在一个月内消灭孙永勤的民众军。孙永勤鉴于张如增的嚣张气焰，便决定突袭李海山的讨伐队，严惩大汉奸张如增。孙永勤深知突袭张杖子是民众军的第一仗，其成败至为重要，因此战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对张杖子讨伐队驻扎情况作了全面侦察，掌握了敌人活动的规律。在1934年1月初的一天晚上，乘敌不备，孙永勤率民众军百余人，趁夜里摸近讨伐队住的院子。解决岗哨后，便冲进院子。顿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敌人纷纷举手投降。这次战斗歼敌近百名，缴获步枪百余支，子弹上万发，首战告捷，军威初振。

战斗结束后，孙永勤一声令下，开仓济贫，远近十几里的贫苦农民把张如增搜刮人民的粮食和其他财富分得净光。农民还开了控诉大会，控诉了大汉奸张如增压榨农民和勾结日本甘当汉奸的种种罪行。最后处以大汉奸张如增死刑，立即枪决，人民拍手称快。

歼灭张杖子讨伐队是长城抗战以来在热南地区对日满当局进行的一次武装反抗，给日满反动势力以严重打击。这次战斗极大地振奋了热南人民群众反满抗日的情绪，从此民众军和孙永勤的威名开始在热南和长城内外传播开来，民众军得到了发展，为以后的反满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三

张杖子战斗取得胜利以后，孙永勤率民众军在黑河川的梓木林和宽甸一带一边休整，一边打击汉奸势力和继续征集武器。几天以来，成群结队的青年纷纷前来参加民众军，队伍猛增至五百余人。孙永勤在短时期内整编了队伍，军部下设三个中队，每中队一百五十人，任命王



福合、赵友〔赵有〕、马宝德〔马保德〕任队长，充实中队工作。各中队在孙永勤的统一指挥下，时分时合，灵活机动地战斗在滦河两岸，痛歼日满军警。1934年年初，关元友〔关元有〕率一中队在大彭杖子与讨伐队接火。民众军抢占有利地形，控制了制高点，居高临下，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激战两小时，敌人不支，丢弃车辆物资仓皇溃逃。民众军乘胜追击，歼敌五十多人。

2月初的一天，孙永勤率二中队星夜兼程，次日拂晓进抵半壁山，立即发起攻击，除残敌数十人窜入兴隆外，其余均被歼灭。孙永勤下令把粮食、布匹等物资分给当地贫民。随后会同三中队乘余威北上，一举攻克潘家口、车河口，转战于乌龙矶一带。此时，不少船户、渔民子弟踊跃加入民众军。八卦岭的张福义率百余人与民众军会师，队伍扩至八百余人。

从车河口逃出来的大成兴商行老板岳荫臣，带着几千块大洋去下板城乞求日伪警察署和讨伐队"进剿"孙永勤的民众军，他声称，如若"剿"灭民众军、活捉孙永勤，我〔他〕就把庙梁煤矿及所有财产献给"满洲国"。

于是，日伪讨伐队遵照上司命令便纠集兴隆寿王坟、承德等地军警及土匪武装（大王龙和小王龙系直系军阀的溃兵）近千人，于3月中旬在下板城讨伐队马某的率领下，向黄花川进犯，扬言荡平黄花川。讨伐队和土匪武装炮击每个村庄，农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已经埋伏在山头林间的民众军指战员看到前来送死的敌人，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待等孙军长一声令下便向敌人冲去。敌人炮击后，凭着人多势广，猛向村里扑去。待全部敌人进入孙永勤设下的布袋里后，孙永勤大喊一声"打"，民众军枪声四起，手榴弹在敌军人群中开花爆炸，顿时敌军死伤遍地，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民众军战士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向敌人，敌人慌作一团，纷纷举枪投降。这次伏击战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歼灭二百余人，缴获武器二百余件，沉重地打击了日伪讨伐队和土匪的气焰。当天夜晚民众军出其不意，越过猴山梁，包围了车河口。全歼守敌一百多名，并活捉大汉奸大成兴老板岳荫臣、任凤阁，没收一切财产，再次开仓济贫。孙永勤下令处决了这两个甘心与民众军为敌的铁杆汉奸。

4月间，孙永勤率民众军兵临下板城，以声东击西的战术一连攻下武厂、黄杖子、上谷儿处据点。然后沿瀑河南下，先后突袭了宽城和迁西境内的日伪军据点多处，兵锋直达长城内外。"沿途群众亲切地称孙永勤是'及时雨宋江'，争着给部队送茶送饭，青壮年农民纷纷参加民众军。"[1]抗日斗争的烽火越烧越旺，在几次军事行动中，孙永勤已经显示出优秀的指挥才能。

1934年5月，中共京东特委成员王平路〔王平陆〕同志来到民众军驻地双塘子村，他向孙永勤等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政策，并建议把"民众军"改名为"民众抗日救国军"。孙永勤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诚恳地请求京东党组织早日派人来部队指导工作。他高

[1] 孙文炳等著：《民族英雄孙永勤》。

兴地称赞“民众抗日救国军”名字改得好，“方向明，旗帜新”。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孙永勤和民众抗日救国军的一次重要的指导，它对孙永勤和这支抗日武装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从打出“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旗帜，孙永勤又提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行动纲领。因此在短时间内，又有不少抗日武装力量前来投奔孙永勤，兴隆蓝旗营的年焕兴、苇子峪的李连贵等人先后率部与民众抗日救国军会师，队伍增至四千多人。孙永勤把队伍整编为四个总队，每总队一千多人，由张福义、赵来、年焕兴、李连贵任总队长，下设营、连、排、班。又设立专管部队纪律和惩办犯罪官兵的稽查处，任命赵林、张连玉为正副处长。从此，民众抗日救国军各总队转战在热南和长城内外的广阔地区，有力地痛击着日伪及一切汉奸反动势力。6月间，孙永勤、张福义率领的第一总队攻克兴隆县佛爷来据点，歼敌五十多人，把粮食布匹分给农民，用缴获来的武器武装自己。年焕兴、李连贵指挥的第二、四总队转战在长城一带，一举攻克罗文峪、孤山子等据点，活捉日本关税总长佐藤，击毙日寇多人，俘虏日伪军警百人。接着在安子岭设埋伏，截击日军骑兵中队。战斗打响后，日军骑兵混乱不堪，拼命突围。此次战斗共击毙日寇五十多人，打死军马五十多匹。关元友〔关元有〕、战四川〔赵四川〕、赵来的第三总队转战在迁西和遵化县境内的西城峪、洪山口一带，先后攻克二堂、龙井关、洪山口等据点，不仅给日伪军警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严惩了汉奸地主高佐忠〔高作忠〕等人，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大长了抗日人民的志气。随后，挥师北上，攻克宽城等处据点。据有关人士回忆说：“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在长城内外先后拔掉一百多个敌人据点，消灭日伪军警及土匪汉奸共一万五千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1]

民众抗日救国军起于艰苦环境，在同日伪军警和讨伐队的频繁战斗中，它之所以打过不少胜仗，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是与这支抗日武装的一些特点分不开的。

首先，这是一支来自热南山区的人民的军队。它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全军上下体恤民情，从不骚扰地方、为害群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频繁的战斗中，队伍走到哪里，除了打仗缴获一些粮食外，主要是靠山区人民养活这支队伍，因此它跟人民是鱼水之情。民众抗日救国军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是孙永勤、关元友〔关元有〕、战四川〔赵四川〕、张福义、李连贵、王福合、年焕兴、何子桥〔何广永〕等人却不断地向部队灌输抗日救国的道理，宣讲抗日军队的纪律。孙永勤总是在战前战后不厌其烦地告诫部队：“我们是保护人民利益的队伍，要做到：不投敌，不妥协，抗日到底不变心！不贪财，不好色，不扰民，冲锋杀敌争先锋！”这些纪律虽然没有成文，但民众抗日救国军官兵和热南地区人民群众尽人皆知，广为传颂，共为信守。如有违者，一经告发和查出，均以军法论处。还在民众军时，一个名叫陈志的排长，他抢了老百姓两驮东西，正在准备偷偷送回家里去时，有人报告了。孙永勤亲自过

[1] 孙文炳等：《民族英雄孙永勤》。

问此事，经过严格审查，发现陈志是个屡教不改的惯犯，为了挽回军队的名誉，便枪毙了他。还有一次，一个班长在执行任务回来的路上强奸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姑娘向孙军长诉说了冤仇，孙军长命令部队集合，让那位姑娘去辨认。姑娘终于认出了那个犯罪的班长，孙永勤一脚把他踢出了队伍，五花大绑起来，然后宣布了该犯的犯罪事实。最后孙永勤问全军上下该怎么惩处，全体官兵异口同声回答："枪毙！"孙永勤和其他领导者向那位姑娘赔理道歉，又给了十几块大洋，派了一个班把她送回家去了。

由于严格约束队伍，才使这支队伍有了立足之地，才得到了热南人民的无私支援。不仅保证了给养，也保证了兵源，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民众抗日救国军之所以耳目灵通，随时掌握敌情，很多是群众主动报告的。人民群众把民众抗日救国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支抗日武装。因此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每一个胜利，不仅反映了全体官兵坚决抗战的决心和英勇杀敌的行动，而且也表现了热南广大人民群众不甘忍受日伪反动统治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无畏地支援这支抗日武装的模范行动。

四

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这支抗日武装的茁壮成长，使日伪当局大为恐慌。他们不否认："抗日武装力量的抵抗活动之所以意外地坚强，原因之一不外是他们同民众的结合，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武力征伐，还必须辅之以反革命的政治工作 。"特别是在1934年春几次"讨伐"民众抗日救国军吃了败仗之后，当时日寇又正急于向平津用兵，于是热河日伪当局便效仿在东北招抚地主武装那样企图对孙永勤采取招抚政策，以宣扬所谓王道乐土的感化力。同年3月间，承德县公署遵照日寇的旨意，便通过大成兴商行老板岳荫臣、任凤阁对孙永勤进行招抚活动。他们开始不敢贸然前往黄花川与孙永勤见面，而是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写私信对孙永勤进行劝降，妄图削弱和动摇孙永勤抗战的立场和思想。孙永勤收到岳、任的劝降信，心明眼亮。他及时告诫民众抗日救国军官兵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从而揭穿了敌人的这一卑鄙伎俩，坚定了民众抗日救国军抗战的决心。在孙永勤的断然拒抚下，日伪当局的招降阴谋破产。

敌人在第一次招抚失败之后，便加紧了对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军事"围剿"。日寇"又见民众抗日救国军军势甚盛，心怀疑惧"，于是同年秋，便调动关东军驻承德和平泉的〇〇部队"进剿"民众抗日救国军。〇〇部队从平泉和承德两个方向向民众抗日救国军进攻，在平泉三岔沟和承德下板城南及大营子等地先后发生激烈战斗。日寇用大炮等重武器猛攻民众抗日救国军驻地和防线，使该地农民损失严重。由于敌强我弱，民众抗日救国军主动撤回黄花川。

同年10月间，日伪当局对孙永勤又进行了第二次招抚活动。此次招抚是以伪热河省公署的名义进行的，为此日伪当局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们精心挑选了两名办事精干和不怕死的汉奸，扮成进山的商人模样，行动诡谲地来到民众抗日救国军驻地，声称“有要事，要见孙军长”。警卫的官兵报告军部后，又对这两位“不速之客”进行严格搜查，发现其内衣口袋内装有一封密函。孙永勤打开一看，仍是一封劝降信，除劝孙永勤“弃暗投明，勿失良机”外，还讲了条件：“如你率部投降，皇军既往不咎”，并任命孙永勤为伪热河省警务厅警察大队长，战四川〔赵四川〕、关元友〔关元有〕为警察长。孙永勤看了信后，便召集主要领导人，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孙永勤在会上骂声不绝，他说：“鬼子汉奸瞎了眼，我孙永勤不吃这一套。只要我孙永勤还有一口气，就要跟日本鬼子干到底！打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抗战到底，绝不能当汉奸，当亡国奴！绝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骂名！”孙军长的慷慨之言在战四川〔赵四川〕、关元友〔关元有〕等人的心中产生了共鸣。他们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部署了迎敌作战的计划。为了表示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抗日决心和揭露敌人的招抚阴谋，孙永勤下令将那两个送信的汉奸就地正法。

通过这次反招抚的斗争，民众抗日救国军全体官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教育，更加坚定了每个官兵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这场反招抚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孙永勤及其民众抗日救国军官兵的大义凛然、坚决拒降、誓死抗战的英雄气概。

伪热河省公署在对孙永勤进行招抚的同时，便着手集结兵力，一旦招抚破产便“进剿”民众抗日救国军。10月招抚失败，日伪当局不惜代价，纠集日伪军警几千人，从四面八方向民众抗日救国军实行讨伐，妄图一举消灭之。孙永勤指挥民众抗日救国军在瀑河、滦河两岸和五指山下巧妙周旋，浴血奋战。尽管环境险恶，战斗频繁，但不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每个官兵都有明确的作战目的，他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他们都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抗击着敌寇的攻击，不少优秀的爱国官兵为民族的独立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孙永勤军长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殿后。他戴的那顶帽子有十几处枪眼，每当战斗结束后，孙永勤用手指弹着帽子上的浮土，十分诙谐地对身边的战士们说：“敌人的枪弹是没有长眼睛的，不要怕嘛！”战士们从军长的这顶帽子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伤亡损失，孙永勤将部队化整为零，以小部队活动在敌人中间，利用熟悉的地理环境进行游击战，灵活机动地打击进剿的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12月末，民众抗日救国军一部在三道梁伏击敌寇，歼敌六十多人。1935年初，孙永勤率部在清河口与日满讨伐队发生激烈战斗，民众抗日救国军利用优越地形作战，歼敌百余人，并活捉两名日本军官和一名翻译官。同年2月间，日寇继续增加兵力，并实行《暂行保甲法》，强迫人民大修警备路，建立监视哨，此外，还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妄图断绝民众抗日救国军和山区人民的联



系。这样一来使队伍的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有时部队一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减员十分严重。在困难面前，部队内部又有了分歧，有的人提出化零为整，集中队伍和敌人打阵地战，拼个你死我活；有的人提出撤出热南根据地，去蓟州盘山找红军去；还有的人主张向长城内“非战区”转移。几种不同的意见使孙永勤的思想极为混乱，拿不定主意。由于领导水平的限制，使这支三千多人的抗日队伍处在十分危险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侥幸的思想占了上风头。原来军部里有一位出身和尚的人，他会占卜、抽签、算卦。自从他参加抗日以来，时常为部队预卜作战结果和进军方向。当时孙永勤等人不大相信这一套。由于日伪军警的“进剿”和封锁，断绝了队伍和人民的联系，在这种内外不通声气的情况下，孙永勤等人便逐渐开始以占卜、抽签这种唯心主义的迷信货色代替了侦察和判断。孙永勤还把占卜者封为军师，这反映了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抗日武装是阻止不了封建主义和迷信思想泛滥的。2月下旬，孙永勤偏听偏信军师“军队应以聚之为吉”的胡说八道，把分散的各部集合在滦河老梁。结果正中敌人之计，遭到“围剿”，使民众抗日救国军伤亡六百余人，逃散一千多人。当时正确的战略仍然是以分散的小部队活动在深山老林之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或扰乱敌人后方，然而农民阶级出身的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领导者这时却被那些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打了败仗就灰心丧气或与敌人一拼为快的机会主义思想所左右，再加上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蚀，利用占卜指挥军事的错误行动，使队伍一筹莫展，处在与敌寇喋血苦战之中。

五

滦河老梁战斗失利，孙永勤被迫率部突围。敌寇围追堵截不止，妄图把这支抗日武装扼杀在热南山区。老梁战役孙永勤腿部受重伤，当时没有军医药品，腿腕肿得碗口粗。由于行动不便，突围后的军事指挥暂由关元友〔关元有〕和王殿臣代替。王殿臣自以为是，他极力说服孙永勤和关元友〔关元有〕放弃热南根据地，离开黄花川，开赴冀东平原，解决吃穿和装备问题。王殿臣的这种思想和主张不仅得到了孙永勤的赞同，而且也赢得了一部分官兵的支持。于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队伍的主要领导者不是想方设法利用热南的有利因素，坚持热南抗战，而是在外部情形十分不明的时候，轻率地决定向长城内“非战区”转移。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致使四千多人的民众抗日救国军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引下，走上了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三四月间，孙永勤向各部的民众抗日救国军下达了向长城内转移的命令。出发那天，孙永勤骑在马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民众抗日救国军要向长城内遵化方面进发，到那里去改善我们的武器装备，然后到蓟州盘山同红军会师。”接着他又重申了部队纪律：“我们这支队伍从起事的第一天起，就是打日本鬼子和汉奸的，这次行军作战还要跟以前一样，不许动老百姓的

一根草刺，违者以军法论处。”队伍出发了，身着各色服装、佩戴不整齐的民众抗日救国军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步履艰难地走上了南去的崎岖的路。山区的百姓把自己的子弟兵送得老远，一直望不见了，才回去。

孙永勤率部向南转移的举动，震动了日伪和国民党华北当局。国民党不但不接济一枪一弹，反而百般责难和阻挠，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与日寇狼狈为奸，共商“协剿”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对策。国民党华北当局首先命令驻遵化的保安大队前往长城附近截击民众抗日救国军。当时国民党的《国闻周报》毫不掩饰地说：“至于协剿孙永勤匪事，我当地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我团警连日与匪接触中云。”孙永勤率部于5月15日越过长城到达侯家寨时，突然遭到国民党保安大队和日寇的“协剿”，发生激烈战斗，双方互有伤亡。另一支民众抗日救国军在尖山屯地方也与日寇山田部队遭遇，然后向孙永勤主力靠拢。18、19日孙永勤率一部约千余人集中在遵化城东北约三十里的毛山沟和吴家沟一带。在此以前孙永勤曾派人向遵化县催促给养，该县长国民党汉奸何孝怡表示“支援”，以此骗取孙永勤的信任，等待时机完成与日寇“协剿”民众抗日救国军的使命。于是21日国民党保安大队和当地汉奸民团以三倍于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兵力包围了孙永勤所部的驻地。此时孙永勤等人仍处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麻痹状态中，一心等待遵化县长的“接济”，而没有任何警惕，没作任何防变措施。

日寇对孙永勤率部进入“非战区”更为重视。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主动与国民党华北当局制定了“协剿”民众抗日救国军的计划。日本关东军21日命令驻屯“天津之川岸○团长协议剿匪事宜”。[1]随后发出“关东军通告中国，讨伐孙永勤匪”的命令，命令关东军“进出于长城以南，独立将该匪遵化根据荡平”。[2]接着日军热河警备队荻原部队和承德○○部队开始由北而南“进剿”民众抗日救国军。“○○部队长以为苟实于热河治安，不拘所在地如何，亦不许其存在于天壤间。故根据望〔皇〕军大方针，而决心进兵华北。于是命令山田部队等集合于奇望峰南方撒河桥〔潵河桥〕并罗文峪南方下营附近，准备“讨匪”[3]。23日，山田部队长通告遵化县长：“在二十四时间以内不讨伐，则日本军即取自由行动。”[4]同日下午五时，“○○部队长乃决以日本军歼灭之，命山田部队长实行讨伐。山田部队长在一战可灭孙匪之信念下，于二十三日夜冒雨行动，配合包围。”[5]由于该山区山峰重叠，日军“进剿”极为困难，故川岸部队长亲自驾驶飞机在战场上空指挥。包围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日军以日旗示以

---

[1] 《大同报》康德2年5月24日。

[2] 《大同报》康德2年5月24日。

[3] 《大同报》康德2年5月27日。

[4] 《大同报》康德2年5月27日。

[5] 《大同报》康德2年5月27日。

位置，川岸确认日军完全包围，乃投下通信筒，通知山田部队长“可安心，吾已确实包围敌人”。[1]24日拂晓，日军全面猛击民众抗日救国军阵地。

战斗打响后，孙永勤命令各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坚决阻击，誓死杀敌。当孙永勤看到民众抗日救国军已陷于敌寇的重重包围之中，才恍然大悟，深感上当受骗之苦。他痛心疾首地说：“今天队伍落到这个地步，全是我一个人的错误，我孙永勤对不起兄弟们。我军早已处于包围之中，事不宜迟，只有突围才是活路。”孙永勤军长本来腿已受伤，此刻敌人的炮弹又击伤他的头部，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组织部队突围。李连贵率部向北突时，遭到敌寇的猛烈还击，又退了回来。最后孙军长让战士把他抬上山头，亲自指挥突围。上午七时，日寇缩小包围圈，炮火更加猛烈，一颗罪恶的炮弹飞来，击中了孙军长和身边关元友〔关元有〕等几个领导人，他们壮烈牺牲了。孙永勤战死时，年仅四十二岁。

民众抗日救国军在战四川〔赵四川〕等人的指挥下，誓死抵抗着日寇的进犯，但火力由强变弱，子弹打光了，枪支打坏了，几个山头展开了肉搏战。

根据伪《大同报》统计，越过长城的民众抗日救国军共一千六百人，被敌寇包围在毛山沟的只有四五百人，突围者近百人，为国捐躯者三百多人。日寇在此次战役中“战死将校一人、下士一、兵四，重轻伤者九名”[2]。显然日寇伤亡数字是保守的。

孙永勤和他创立的民众抗日救国军是一支坚强的抗日爱国武装。它不仅在热南卓著声名，而且在全国人民中间也有巨大的影响，中共中央1935年8〔10〕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列举的在“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中，就有孙永勤的光辉名字。在神圣的抗日战争年月里，孙永勤的名字鼓舞了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终于在世界人民支持下，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人民抗日武装从冀东开往热南，宣传和表彰了孙永勤和民众抗日救国军的丰功伟绩。1978年，原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把孙永勤军长的塑像亲自送到热河烈士纪念馆，供活着的人们和子孙万代永远瞻仰。

六

孙永勤创立和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国军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

[1] 《大同报》康德2年5月27日。

[2] 《大同报》康德2年5月27日。

民众抗日救国军是在长城抗战后，民族矛盾继续上升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各界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的影响下，深受日寇蹂躏的热南人民奋起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武装。在近二年的抗日反满战斗中，许多爱国志士为国捐躯，表达了热南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意志。民众抗日救国军曾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占着光辉的一页。因为它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其主客观上有着不可克服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在日寇和国民党保安队的“协剿”下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除了强大的敌人外，有以下几点：

1. 没有党的领导。民众抗日救国军奋起抗战时，我党正处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关门主义错误十分严重，使党没有认识到自己直接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致使中共京东特委没能以积极的态度关注孙永勤和他创立的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成长。尽管王平路〔王平陆〕和其他同志同孙永勤同志进行了接触，但由于受“左”倾路线影响，错误地认为“绿林抗日武装是不可靠的力量”，因此放弃了对孙永勤和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领导。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使民众抗日救国军的的领导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犯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错误。例如，没有明确的战斗方向，没有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行之有效的游击战争，而是错误地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给敌人造成了歼灭自己的条件。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使这支来源于农民阶级的抗日武装摆脱不了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由于迷信占卜者的“吉者则战，凶者则退”的荒谬之说，致使有的战斗应战而未战，有的战斗应退而未退，损失严重。如果中共京东特委积极关注并派得力骨干同志加强这支抗日武装，以先进思想给以指导，并抵制封建迷信及其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利用热南有利的地理条件，坚持山区游击战，是一定会迎来抗日的新局面的，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前途是会光明的。

2.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卖国政策的破坏。“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继续入侵之时，蒋介石不仅给请缨杀敌的爱国将领下令“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并且指使何应钦取消北方抗日义勇军和救国军等抗日组织，又派其侄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到北平，搜捕共产党和爱国青年，破坏华北人民抗日活动，致使民众抗日救国军得不到来自北平“救国会”和“抗日后援会”的任何援助。特别是当民众抗日救国军越过长城进入“非战区”时，遭到国民党保安大队的截击，最后国民党保安大队同日寇合作，“剿灭”了这支抗日武装。

3. 没有军需来源，没有军事素养。民众抗日救国军是在民团基础上诞生的，它的装备十分简陋，主要是靠原有的武器，或就地征集，或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因而枪支弹药奇缺，在战斗中消耗的部分更无从补充，致使民众抗日救国军常常处于弹尽无援的状态。

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成分主要是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没有军事素养，没有作战经验，他们主要是依靠爱国热情和血气之勇与敌寇搏斗。由于环境的艰难和战斗的频繁，又无法使队伍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整顿，致使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战斗力不能得到应有的提高。在作



战上，经常是采取攻坚战和阵地战，虽然在战斗中也学会了“声东击西”、“敌跑我追，敌驻我扰”和“夜间出击”以及“避实击虚”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但没能引起领导者的重视，没有上升为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致使民众抗日救国军经常是处在被动作战之中，最后招致失败。

总而言之，孙永勤和他创立的民众抗日救国军，在长城抗战后，面对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毅然决然，奋起抗战，并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这些事实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献身于祖国的独立解放事业的高尚品德，永远是一座铭刻在中国人民心里的丰碑，彪炳千古，传颂万世。

（作者附言：本文编写过程中，访问了孙永勤的亲属雷永兰、孙文孝、孙文阁、孙永明，以及熟悉孙永勤和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孙文炳、张振华、任凤保和郭春河等同志，并得到了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中共孙杖子公社党委的帮助，参阅了孙文伶、史耀华、田凤阁、刘青山、单忠英、张守礼、年焕兴等同志的回忆文章，查阅了有关档案和当时的报刊杂志。承蒙以上同志和单位热情帮助，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谢意。但是由于原始文献缺乏，个人回忆颇多不一，一些史实尚待核实。又由于时间仓促，加之作者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教正。）

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1]

一、日伪的殖民统治和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兴起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后，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

政治上，在省、县（旗）设行政公署，日本人虽任副职，但掌握实权，汉奸任正职，为虎作伥。县（旗）之下设村、甲、牌，组成伪政权的基层组织网络。在省、县（旗）公署内设警务所（科），大村镇设警察署，是个警特密布、岗哨林立的社会，热河人民完全陷于日伪殖民统治的恐怖之中。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战略物资和控制人民生活必需品，成立所谓“组合”，实行配给制，造成产棉区不能纺线织布，产豆区不能榨油，产粮区不能售粮的畸形经济。此外，日伪对农民除征收高额的地亩税外，还征收诸如生死嫁娶手续费、门牌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要负担“出荷”、劳工等无偿劳役，使人民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之中。思想上，日伪当局通过“协和会”、“道德会”和学校等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以加强思想统治。但是，热河人民毕竟是不屈服的人民，敌人压迫愈深，人民反抗愈烈。当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烈火燃遍热河各地，其中最著名的是民族英雄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

孙永勤（1893年~1935年），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人，生长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之家。少年读书，长大习武，为人正直，性格豪爽，“未尝欺凌弱寡，且常周恤贫寒”，在黄花川一带很有威望。汤玉麟统治热河后，横征暴敛，匪患丛生，为保护身家性命，黄花川成立一自卫团，孙永勤出任团总，有枪50多支。热河沦陷后，日伪委任汉奸汪海澂为兴隆办事处长，他笼络全县地主豪绅，充任大小官吏，加强殖民统治。日伪又通过伪警察机构推行“铳器回收”政策，强迫农民交出手里的枪支弹药，妄图以此扑灭热河人民反抗斗争的火焰。伪上板城警察署和车河堡警察队多次找孙永勤要枪，均遭拒绝。孙永勤严正地说：“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当汉奸，只能是妄想！”

正当日伪当局收缴农民枪支甚急、孙永勤徘徊忧虑之际，中共京东特委派人来黄花川一带活动，以卖水鞋为掩护到孙永勤家，向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当孙永勤听到迁安、遵化的农民暴动，开滦煤矿工人罢工的消息，犹如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光明，点燃了他胸中的抗日怒火。

此时，车河口大成兴商号股东、汉奸岳荫臣，为土匪窝藏的枪支被外地民团抄走，他借机向日本人告发孙永勤劫走枪支，煽动抗日，图谋不轨。警察几次前来抓捕，孙永勤虽得逃脱，

[1] 《热河革命史稿（1919~1955）》，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75~84页。

但家中已难存身。1933年12月上旬，伪兴隆办事处长汪海澂派伪军头目李海山率200余人再次到黄花川逼枪逼债，抓捕10多人，并限3日内交齐，否则就将杀头。官逼民反，孙永勤决心走武装反抗的道路。

1933年12月10日，孙永勤来到承德县路通沟村赵家庄，串联了赵林、赵来、赵友〔赵有〕和马保德、关元有、赵四川等7人，共议暴动大计。12月11日，孙永勤带领赵林等回到黄花川，同团丁等共17人聚集在自卫团部院子里，宣布暴动，并庄严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1]在村里树起"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拉起一支农民抗日武装，命名为"民众军"，推举孙永勤为军长，发动了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

二、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

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3年12月11日武装起义爆发，至1934年5月整编。

孙永勤率领农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以后，黄花川附近一带的农民200多人，拿着刀枪斧头，找到孙永勤，参加了抗日民众军。这时，民众军最缺的是枪支弹药。孙永勤率队来到邻村大地主张如增家，起出14支步枪，几支手枪。然后连夜袭击车河口伪警察分驻所，又得步枪7支。接着，关元有率百余人到大彭杖子攻打汉奸岳荫臣的煤矿城，在南山歼灭赶来增援的日伪军几十人。连夜登上海拔1383米的五指山，休整几天后，南奔50多里，袭击伪兴隆县半壁山警察分驻所，得步枪十几支，子弹甚多，并开仓济贫，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民众军连战皆捷，军威大振。当地农民纷纷赶来参加，"共得健儿500余"。1934年1月，民众军编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150余人，由关元有、王殿臣、赵四川分任各队队长。军部设立了军法处，专管部队纪律，提出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淫"的约法三章。

1933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乘即将过年之机，一支日军突然来袭。民众军撤到长峪沟〔常峪沟〕山梁，与赶来的日军展开激战，毙伤日军几十人。然后转移到邢杖子烧板子沟，又被日军包围，激战后突围，攀上海拔1475米的五凤楼山，甩掉了日军。民众军就地进行休整。

两个月来，民众军转战车河、黑河、洒河〔澂河〕、柳河四条大川，打击日伪，发动民众，影响遍及长城内外。热南地区又有四支抗日暴动队伍[2]先后与孙永勤部会师，民众军队伍

[1]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1935年印行，第31页。

[2] 四支暴动队伍是：①兴隆县苇子峪自卫团总李连贵，率团丁、农民18人暴动，收缴附近各村大枪50多支，袭击了白旗营敌伪据点。②蓝旗营村年焕兴，组织了30多名农民暴动，与李连贵会合，袭击半壁山警察所，于3月与孙永勤部会合。③承德县八挂岭〔八卦岭〕村张福义，组织百余农民暴动，转战到乌龙矶，与民众军会合。④下板城火车站工人单忠英（辽宁兴城县人），联络20多名劳工，打死两名日本人，夺得一支大枪，到老梁投奔孙永勤部。

迅速扩大到千余人。在五凤楼进行了第一次整编，孙永勤仍任军长，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张福义、李连贵、年焕兴、康永贵等任队长。整编后，民众军南下迁安一带作战。

3月中旬，民众军再次袭击半壁山伪警察分驻所，得枪9支。次日，在西大石洞〔西大洞〕附近设伏，打死赶来追击的日军20多人。后转移到小十二岭，遭伪军袭击，民众军战士30多人牺牲。3月20日，孙永勤率队东出50里，夜袭潘家口税关署，毙日军7人，得步枪十余支。然后挥兵北上，再次围攻大彭杖子岳荫臣的煤矿城，拔除了这个顽固据点。民众军在承德县的老梁休整七天后，兵分两路，流动游击。一路沿滦河南下，在贾家安附近，袭击日军3艘货船，打死日军20多人，获面粉、大米3000多斤，衣服350多件。一路威逼下板城，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连续攻克武厂、黄杖子等敌据点，并攻克正在修建中的承德县上谷火车站，歼灭伪军30余人。

民众军节节胜利，使敌伪大为震惊。伪热河省当局撤了汪海澂的兴隆办事处主任职务，调吕俊福继任。吕上任后，对民众采取反革命两手政策，一面派人向孙永勤“疏通”，约会地点，声称亲自与孙永勤“谈和”；一面密遣千余名伪军，从东西两路合击，妄想一举消灭民众军。孙永勤洞悉吕俊福险恶用心后，将计就计，诱敌进山。4月上旬的一天，吕俊福率500余伪军东犯，上板城警察署出兵500余西犯。王殿臣、李连贵、年焕兴率队在五凤楼西侧伏击，吕部伤亡过半，狼狈逃回。东路伪军也中伏溃败。这样，吕俊福合击民众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第二阶段，是从1934年5月民众军在五指山整编，至1935年2月中旬救国军南征。

1934年5月1日，民众军已猛增至5000余人，在五指山（兴隆县境内）休整。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遣军事干部徐英等到五指山下与民众军中的共产党员关元有接头，并会晤孙永勤，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和关内的抗战形势，建议他把“均富济贫，唤起民众”的口号，发展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救国，加强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孙永勤接受了这些主张，把他领导的“民众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并提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地主，严惩汉奸，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行动纲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孙永勤继续担任军长，赵四川、马保德任副军长，王殿臣、关元有（党员）任参谋长。全军设四个总队（大队），张福义任第一总队长，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关元有兼任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各总队1000人到1200人，下设中队、小队和班。军直设稽查处和直属队。在组织整编的同时，还进行了纪律整顿，处决了两名抢劫、奸淫罪犯，并晓谕全军，人人不得违反。

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在战略思想和战士士气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争取各方、坚决抗日的新气象。救国军以总队为作战单位，分散活动在兴隆、承德、青龙、平泉、迁安和遵化等长城一带，予日伪军以重创。

6月20日，孙永勤率第一总队攻克伪承德县乌龙矶警察分驻所，缴枪40多支。又攻克兴隆县佛爷来据点，击毙日军19人，毙伤警察50多人，并将仓库打开，把粮食、布匹等物品分给贫



苦农民。赵四川率领二、四总队攻克兴隆县孤山子、遵化县罗文峪两据点，毙俘伪军70余人。第八大队长何广永率20多名战士在大厂村活捉孤山子海关税总长佐藤等两名日本人。然后转战瀑河川。6月22日前后，又围困宽城。战斗三天三夜，因敌伪增援，遂撤出战斗。转移途中，在九虎岭与千余日军激战，救国军伤亡80多人。关元有率第三总队赶来增援，歼日军一部，使其载着许多尸体向平泉退去。

1934年8月，日本侵略者看到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在长城内外燃起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对救国军的“清剿”未能奏效，便转而采取拉拢引诱的手段。伪热河省当局先是派两名日本人来劝降，孙永勤拒而不见，命战士怒斥逐出。后来又命几个汉奸向孙永勤游说，并呈上任其为热河省警察讨伐大队长的委任状。孙永勤将委任状撕得粉碎，并厉声痛斥汉奸：“你们不要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吗？我是堂堂的中国人，岂能做日贼的狗下之狗！”几个汉奸羞得无地自容，抱头鼠窜。

抗日救国军威震热南，日本侵略者十分恐慌，惊呼“匪势强大”，“讨伐殊难进展”，于是不得不出动4000多日伪军进行讨伐，以图消除伪满“西南国境的最大障碍”。

1935年1月，抗日救国军一部正在承德县老梁一带集中，突然遭到500多日军和600多伪军的围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抗日救国领导人本应组织部队突围，但由于接连几次打了胜仗，自满情绪不断增长，错误地〈决定〉与敌人硬拼。结果激战一天，虽然打死打伤日伪军一部，抗日救国军也伤亡很重。傍晚突围转移到王宝石，又遇日军追击。激战多时，毙日军一部，孙永勤腿部受伤，且战且退，摆脱了敌人，转移到洒河〔澈河〕川的青杏沟与李连贵大队会合。这时抗日救国军仅存千余人。

老梁战斗失利后，敌人步步紧追，使部队大量减员，活动范围不断缩小，武器弹药奇缺，军需来源发生严重困难。这时，有人提出集中全军兵力与日军决战。孙永勤认为，在山地与日军作战，军需供应都有困难，如全军转移冀东，可争取到各方面在军火、财力和物力上的支援，待找到共产党和红军后再图下步。

1935年2月中旬，孙永勤率领全军放弃了热南山区，进行南征。

三、抗日救国军的失败及其教训

1935年4月间，抗日救国军南征途中在兴隆洒河〔澈河〕川一带转战，部队又发展到1700余人。日军第七师团一部、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三县警察讨伐队共五六千人，于半壁山地区又将孙部包围，日伪军还出动飞机助战，以毒气弹向救国军进攻。救国军战士以陈旧的武器与敌军血战，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救国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斗严重失利，孙永勤指挥部队撤往长城沿线。

这时，中共冀东地区党的组织委派中共遵化县委和孟家铺游击队与孙永勤取得联系，帮助抗日救国军开进长城，并运去一部分武器弹药。5月15日，孙永勤率军由洪山口、马蹄峪越过长城，开进遵化、迁西交界一带。孙永勤出布告安民，号召军民团结抗日。并派人与国民党遵化县政府联系。遵化县政府曾给救国军以方便，还送去部分粮食、药品。16日深夜，救国军与尾追入关之部分日军接战，毙伤日军40余人后，即避往深山。

5月20日，日驻华武官高桥致函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以“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的事实”为借口，悍然派遣关东军大举越过长城，“扫荡”孙军。日军松井部由洒河桥〔澈河桥〕西进，石井部出古北口南下，八本原旅团和山田部也相继越过长城，布成对抗日救国军三面包围之势。同日，救国军在尖山屯与日军激战，救国军且战且退。21日，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与高桥商定“协剿”抗日救国军计划。在日军的威迫下，国民党遵化县政府也一反前态，竟以给救国军换发春装（当时战士还穿棉衣）为条件，诱骗救国军集中茅山〔毛山〕地区剿匪。22日，殷汝耕指使国民党保安总队张庆余、张砚田等部，从南面向救国军进逼，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两营军队也加入合击救国军。此时，由5000多日军、1000多伪军和5000多国民党保安队，总计共一万多人的“协剿军”，形成对救国军的四面包围之势。23日，日伪蒋三方“协剿军”在总指挥日军少将旅团长川岸文秀〔川岸文三郎〕指挥下开始联合围攻。救国军在鸡鸣村、三家店〔三里店〕一带与日军激战，双方伤亡甚众。孙永勤部被压缩在茅山〔毛山〕、十里铺、吴家沟一带。24日拂晓，日军用飞机在空中指示目标，以大量炮火摧毁救国军阵地，接着敌军从四面发起总攻。孙永勤旧伤未愈，又挂新彩，但他仍镇定地指挥全军英勇反击。经浴血奋战，终于掩护张福义、年焕兴、李连贵、何广永等率领二三百名战士突出重围。孙永勤、赵四川、关元有、王殿臣等抗日救国军领导人，率余部500多人酣战至中午12时，全部壮烈殉国。[1]轰轰烈烈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抗日斗争又被镇压下去。

由孙永勤创建并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是在国民党长城抗战失败之后，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农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和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与日伪军作战200余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100余处，毙伤俘日伪军数千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支抗日武装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在长城内外撒下了抗日的火种，激励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决心，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1935年8月〔10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赞扬孙永勤是“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

[1] 1935年5月26日上海《大美晚报》。



这次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起义之所以遭到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深刻的。首先，没有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这是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这支起义军中有少数共产党员参加，有的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如参谋长关元有等，在起义过程中也得到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但在起义军中始终没能形成党的领导核心，也就是说没能使这支很好的农民起义军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正处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无暇北顾；另一方面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热河和冀东的党组织都受到严重破坏，力量很弱小，不足以担负起这样一支大的起义部队的领导责任。这样，就使这支起义队伍始终没能完全摆脱自发性和狭隘性，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在敌强我弱又无后方接济的情况下，集中部队与敌人打运动战，给敌人造成集中优势兵力围歼之机。其次，国民党执行不抵抗的反动政策是这支农民抗日武装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却反对一切抗日力量，致使国民党地方当局竟敢出卖民族利益，出卖抗日救国军，甚至与日伪互相勾结，日伪蒋合流，联合绞杀了这次农民起义。最后，敌强我弱，这是救国军失败的客观原因。当时热河日伪军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抗日救国军。这支农民抗日武装，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之它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抗日教国军虽然失败了，但孙永勤和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救国军将士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国军余部汇合于中国人民的抗日革命洪流，继续为民族解放而战。

日本帝国主义将孙永勤抗日救国军镇压下去后，进一步将它的势力扩大到平、津、冀、察，并以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进入所谓“非武装区”，受到遵化县政府“接济”，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6月初，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承认日本的要求，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为《何梅协定》〔“何梅协定”〕。6月27日，又签订《秦土协定》。[1]这两个协定的签订，使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华北形势愈加危急。

[1] 1935年5月，察哈尔驻军逮捕了在察哈尔省活动的日本特务，随即释放。日本以此为借口，提出蛮横的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代表特务头子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内容包括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国民党军队从察哈尔省撤退等。

孙永勤抗日起义[1]

一、日本在热河的殖民统治与孙永勤民众军的兴起

1933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同时侵占了位于长城北侧隶属于河北省的兴隆县和都山设治局，并将其纳入伪热河省辖。从此，上述地区被划入东北伪“满洲国”的“版图”。

值此国破家亡之时，热河各地人民纷纷发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其中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民族英雄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

孙永勤是长城北滦河畔黄花川孙杖子村（今属兴隆县）人，1893年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之家，为人正义，在黄花川一带颇有威望。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横征暴敛，土匪丛生，致使各地绅民纷纷成立民团以防匪自卫。孙永勤时任黄花川民团团总。热河沦陷后，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于1933年夏季成立了由伪承德县政府领导的兴隆办事处，秋季建立了由日本人任科长的兴隆县警务科，推行殖民统治。11月，又推行“铳器回收”，强迫农民交出枪支，妄图以此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时的孙永勤，被投靠日本势力的“大成兴”商号股东岳荫臣告发藏枪不交，几次被逼，处境困难，逐渐意识到不愿任日本人宰割的中国民众面前只有武装反抗一途。遂与朋友关元有（已由遵化县共产党员高存发展入党，孙不知其政治身份）、赵四川、马保德等计议发起抗日，得一致赞同。1933年12月11日夜，经孙等串联的骨干分子共17人在孙家秘密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次日天明，在孙杖子村树起一面“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抗捐抗税抗缴枪的“民众军”宣告成立，孙永勤被推为军长。几日内，百余名农民闻讯前来参军，民众军初具规模。

二、民众军改编抗日救国军及其战绩

民众军成立后，急需枪支弹药。当年12月下旬，孙永勤率队开至邻村大地主张如增家，收缴长短枪支各一部。接着，又连续奔袭车河口和半壁山两地的伪警察分驻所以及汉奸岳荫臣在大彭杖子的煤矿城等。这几仗，共消灭伪军警数十人，缴枪数十支，并将警察的粮仓打开，救济贫苦百姓。民众军频繁活动，声威渐大，附近农民前来入伍者日益增多，到1934年初，发展到500余人。

1934年2月，孙永勤率民众军摆脱奇袭而来的日军，转移到五凤楼及附近地区。此后即出没于这一带，不断打击日伪势力，收缴枪支，壮大自己。这期间，又有承德县八卦岭农民张福义领导的一支抗日暴动队伍加入孙部。民众军队伍的日益发展壮大，引起日伪势力的惊恐。

[1] 《冀东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59~165页。



1934年3月，日伪兴隆办事处处长率领500余名军警袭入五凤楼山。孙永勤闻讯，指挥民众军迅速抢占山头与伪军警对射，迫敌不支退去。战后，民众军在转移途中又遭日伪军围攻，经三小时奋战突出包围。来犯日军竟将所到村庄焚毁。

通过这个时期的几次战斗，孙永勤等民众军领导人已逐渐领悟到，要想在这几座大山及其周围地区站住脚，必须首先剪除附近地区的汉奸势力，清除伪警据点，使日伪军失去耳目。从1934年3月到5月初，孙永勤率领义军官兵隐伏深山，寻机歼敌。其间，民众军袭击了半壁山伪警察分驻所和伪潘家口税关署，再次围攻汉奸岳荫臣在大彭杖子的煤矿城并拔除了这个顽固据点。经过这些战斗，民众军又消灭日军和伪满军警各数十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并开仓济贫。这一时期，民众军为迅速扩大战果还曾分兵作战。其中一路沿滦河南下，在贾家安附近袭击日军运输船3艘，毙日军20余人，缴获军需品多件。另一路逼近下板城，以声东击西战术，连克武厂、黄杖子等日伪军据点，兵锋指处令汉奸闻风而逃。在各次军事行动中，孙永勤不仅处处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且充分显示出他优秀的指挥才能。

民众军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热南地区农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蓝旗营村的年焕兴、苇子峪的李连贵等相继在家乡发起农民抗日暴动，并各自率队投奔孙永勤部。民众军迅速壮大，到1934年5月上旬，发展到约5000人，集结于五指山（在今兴隆县境内）一带。这时，中共遵化县委派遣军事干部徐英等来到民众军驻地，与在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关元有秘密接头，并以爱国群众的公开身份同孙永勤会晤。他们向孙介绍了关内的抗日形势，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建议孙把“均富济贫”的口号发展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救国，并提醒他加强部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以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孙永勤愉快地接受了这些意见，随即将“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新改编的抗日救国军，由孙永勤任军长，赵四川、马保德任副军长，王殿臣、关元有任参谋长。下设四个总队，由张福义、年焕兴、关元有和李连贵分任（兼）各总队长。军直设稽查处和直属队。改编时进行了纪律整顿，处决了两名抢劫、奸淫罪犯，重申了“不贪财，不逃军，不扰民，不奸淫”的军纪。

改编后的抗日救国军面貌一新，所到之处颇得群众欢迎，被誉为“及时雨”、“仁义之师”。此后，抗日救国军便以总队为作战单位，分散活动在兴隆、承德、青龙、平泉、迁安和遵化等县靠近长城一带地区，打击与分散日伪兵力，抓紧壮大自己。1934年6月，抗日救国军一部攻打承德县乌龙矶伪警察分驻所，缴枪40多支。7月，又克伪兴隆县佛爷来据点，毙日伪军多人，缴枪50余支、子弹十几箱，同时开仓济贫，并将日伪军营垒焚毁。

抗日救国军在六个县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惊恐。1934年8月前后，日伪热河省当局改变策略，先后两次派日本人和汉奸到孙部驻地劝降，并呈上任孙为伪热河省警察讨伐大队长的委任状，皆为孙永勤凛然拒绝。日伪军“招抚”失败，便于当年秋季青纱帐倒后，纠集数千兵力

进逼抗日救国军，妄图将其一举歼灭。面对紧急情况，抗日救国军乃将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孙永勤、赵四川和关元有等率领军直属队与日伪军在黑河川一带周旋。几个月中，救国军各部队在当地群众支持下，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是，日伪军变更策略，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毒辣手段：一面大举“围剿”抗日救国军，一面加紧切断这支抗日队伍的兵源、武器和军需给养的补给来源。据统计，仅1934年11月15日至22日的八天时间内，日军与伪满当局即在兴隆北部地区强收民枪823 支，同时规定每家三丁抽二、两丁抽一，实行强制征兵。由于上述原因及长期连续作战的损耗，至1935年3月，抗日救国军在武器弹药和服装给养方面已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孙永勤听取各方意见，试图向长城以南的中国地方政府求援并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不久，孙永勤通过队伍内遵化人的关系，与遵化县长何孝怡沟通联络，何应允待孙秘密抵达遵化后给予物资支援。

这期间，中共冀东组织负责人王平陆正在遵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他曾亲自前往抗日救国军驻地与孙永勤会面，向孙介绍全国和冀东的政治形势，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中共遵化县委也在孟家铺开会，决定支援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并派人筹集了一部分枪支弹药送往孙部。中共冀东地方组织对抗日救国军的政治指导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加深了孙永勤对中国共产党的钦佩与信任。

三、抗日救国军的失败及其历史地位

1935年4月初，孙永勤率救国军一部东渡滦河，进入老梁山区，突遭千余名日伪军包围。激战一日，双方损失均较重。孙永勤在率队突围中腿部负重伤。他带伤指挥救国军且战且退，终于突出包围，撤至澈河川青杏沟与李连贵所部会合。几个月来，由于频繁作战，伤亡增加，部队严重减员。5月初，救国军各队奉令赶到青杏沟，全军集中后约计1700人。此时多数救国军战士还身着棉衣，亟待换季。加之弹药缺乏、活动范围日益狭窄，抗日救国军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孙永勤抱病召开干部会议，议决全军开赴冀东平原，寻求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解决吃穿与装备问题。尔后，抗日救国军断然放弃热南游击区，在不明外部政治军事形势的情况下，开始向长城以南转移。

同期，日伪军已集结数千人，在长城以北从西、北、东三面向抗日救国军进逼，并强行通知长城南侧的遵化县保安队后撤。显然，日军蓄意将决战战场推至长城南侧受国民党政府管辖的“非武装区”，借以制造谰言，挑起事端，进而向国民党政府施加政治压力。5月15日，孙永勤部在优势日伪军压迫下，于罗文峪等处南越长城，撤入遵化、迁安境内山区。日伪军尾随追进。孙部于所到之处布告安民，宣传抗日，并派人向遵化县长何孝怡提出供给弹药的要求，遭到拒绝。日军压迫抗日救国军进入关内后，即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5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



官高桥致函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以遵化县长庇护孙永勤“股匪”为借口，宣布关东军入关“彻底消灭孙部”。国民党当局不但不抵制日军擅入“战区”［即“非武装区”，中国方面习惯称之为“战区”］的非法行动，保护救国军，反而进行了积极配合。5月21日，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往访高桥，担保中国当局竭力“剿匪”。5月22日，由国民党当局指派的战区特种警察第一、二总队及地方民团，迎头切断孙部南下之路，配合日军和伪满军将抗日救国军围困于遵化县毛山沟一带。抗日救国军南投无望。

1935年5月24日拂晓，由大约5000名日军、1000名伪满军和数千名国民党当局派遣的特警、民团联合组成的“协剿军”，在日军将领的统一指挥下，借助飞机大炮，向救国军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孙永勤旧伤未愈，又负新伤，仍镇定指挥部队英勇抵抗。最后，因寡不敌众，除少数官兵突围成功外，孙永勤、关元有、赵四川、王殿臣等抗日救国军主要领导人和所余官兵全部为国捐躯。爱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他们脚下的土地。根据当时伪“满洲国”《大同报》统计：越过长城的抗日救国军1600人，被日伪军包围在毛山沟一带的有400人，突围者近百人，战死者300多人。可见战斗之惨烈。

国民党当局配合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救国军，本为媚日乞怜、苟且偷安，结果却适得其反。1935年六七月间，久欲攫取华北的日本侵略者，竟以遵化县政府接济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破坏了《塘沽协定》和天津两汉奸被暗杀等借口为由，逼迫何应钦与之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秘密协议（习惯上称之为“何梅协定”），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中国蒙受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国土上因外国的压力而自行撤退的奇耻大辱”。[1]

孙永勤领导的抗日起义，发生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众多的辽西义勇军严重受挫，长城抗战失败，热河沦陷，中华民族面临更大危难的历史关头。这是当时侵华日军最新占领区内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农民抗日武装起义。这支抗日武装，在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的恶劣环境中，浴血奋战一年半，袭击破坏日伪据点上百座次，毙伤俘日伪军警数千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各界群众抗日御侮的斗争勇气，在长城内外撒下了抗日的火种。孙永勤及其抗日救国军，在中国抗日战争这一特定时期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孙永勤及其领导的农民抗日起义给予高度评价。1935年8月〔10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其联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列举了11名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孙永勤这个光辉的名字。

[1] 《高桥坦回忆录》，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第29页。

在峥嵘岁月里工作的回忆[1]

骆凤庭

我是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此后，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峥嵘的岁月里，同许多革命同志一道，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有些同志直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由于时间较久，加之年迈体弱，有些已记不很清了。

一

我的青年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和玉田、遵化农民运动受挫的革命低潮时期。当时，我在富有革命意义的遵化县南岗高小读书。教国文的张老师是失意的贡生，教历史和数学的是共产党员王子丰和兰小川。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非常同情进步教师的“反帝爱国”的宣传，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再加上年轻，思想的纯真，血气方刚，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振兴华夏爱国热情，受到党员教师王子丰、兰小川的器重。他们经常找我谈话，还借给我《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书籍，让我阅读。一次，王子丰问我：“对中国濒临列强瓜分的危险有什么看法？”我说：“毕业后办报纸，唤醒广大民众。”他说：“办报纸得有高深的文化和社会地位。”我又说：“再就是当兵，赶走列强，雪除国耻。”他说：“北洋军伐和各省督军都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当兵仍是为帝国主义卖力。”当我不知所答，正在踌躇时，他又接着说：“中国是有希望的。宁汉分裂后，在革命党的领导下，开辟了苏区，创建了红军，指出了拯救国家危亡的方向。”我马上追问：“北方是否有革命党，有红军？”他说：“有，咱们找吧！现在先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从此，在我心里播下了革命种子。

1928年毕业离校，回家劳动。我兄弟骆凤鸣还在南岗高小读书。一天，他带领着王子丰、兰小川二位老师来到我家。我兄弟把我叫到外面，问我：“老师已找到了革命组织，问你参加不？”我惊喜若狂，飞快地走到屋里向二位老师发问。他们从产业革命谈到苏联苏维埃的建立，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谈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我大开眼界，十分向往。在我兄弟不在屋时，他们郑重地对我说：“经过考验，组织上已批准你为一名共产党员。今后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终身，矢志不渝。要严格保守秘密，单线和我们联系，将来有人找你，布置党的工作。”从此，我便加入了党组织。

[1] 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办公室编：《遵化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一）》，1985年8月1日第1次印刷，第18~29页。

二

1929年1月，在天津市“法租界”弗照〔佛照楼〕旅馆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1]池家屯村（原属遵化，现划为丰润）的张志全作为代表参加了，在会上聆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六大”决议、刘少奇同志作的顺直省委的工作报告。第二年春节过后，张志全向我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利用一切有利于工农大众的斗争，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党在工农大众中的威信，发动工农抗捐抗税，从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

共产党，在当时的北方，还没有被群众所认识。反动派又宣传什么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等，那时若有人谈论共产党，被官府发现，不是杀头就是入狱。在这种境地下，发展共产党员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按照“六大”精神，在发展党的组织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1929年冬天，老同学单富荣找我到东草场去，在那里见到了张金岩同志（即张明远，当时并不知他是冀东特委书记），又在夜里参加了在北岗庄北捣药口的山坡上举办的党员小型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党员约有20多人，悄悄地听张金岩同志讲解国际国内的形势，讲解党的性质、组织原则和纪律等党的知识。这次学习，时间虽然很短，但所受教育极深，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大飞跃，使我认识到当时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前途光明，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同时，对发展党员也有了理论资本和工作方法。可以说，这次党员训练使我在政治上的成长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几年中，我发展了51名党员（不包括在外县和热南地方发展的党员），建立了10个党支部。

1. 组织雇农工会，选拔其中骨干分子吸收入党。雇农工会的任务，就是把做长工为生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采取说理的办法向有钱的人进行斗争，要他们不准虐待长工，不要解雇长工，不能压低工价，使长工们的生活有最低的保障。为了开展工作，我先从自家做起。几年里，先后在我家当长工的三四个人，我借劳动和休息时给他们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讲解工人必须团结一致才有力量的道理，研究讲理斗争的方法。通过工作，在我家当长工的骆洪春、吕广增就联合起来跟我家的主事人说理，不能一到立冬就解散长工。叔父觉得我知书识字，就和我商量怎么办。借此机会，我一面给他讲解家里的财富是长工们靠劳动创造的，理应得到合理报酬，不能无故解雇，工钱是理所当然的，没错误就解雇是不合理的等道理。经过做工作，叔父同意了长工的要求，到立冬时不但没有解雇他们，还提高了工价。斗争胜利了，使长工们受到了教育，增强了信心。然后，他们又向本村和外村介绍经验，秘密组织雇农工会，

[1] 骆凤亭此处回忆有误。据了解情况的徐彬如介绍，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会址在天津英租界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上海地产公司新盖的两排平房里。在佛照楼旅馆召开的是中共顺直省委首次常委会，时间是扩大会议结束三四天后。参见徐彬如：《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天津主持顺直扩大会议》，文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顺直省委》，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45~46页。

由活动能力较强的骆洪春任主任。经过一段工作，长工们工人阶级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时候又由骆洪春召集了骨干分子会议，我向他们进一步讲解了一些革命道理：穷人之所以受穷并不是命里注定，主要根源是受压迫受剥削、租税重、利息高。有钱的人能够买通官府，设法逃避。只有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才是穷人的出路。经过一段考验后，在我村先后发展了以长工为主的骆洪春、吕广增、骆占存、阎龙、骆有春等几名共产党员。孟家铺、王家铺也采取以雇农工会的办法吸收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二道山南范家坞、黄庄子有许多织布工人，官府无故要增加织布税收，于是我和樊凌喜〔樊凌玺〕同志分头去发动织布工人反抗增加税收，在那里又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斗争取得胜利。

2. 加强亲友来往，从中发展党员。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时刻有被破坏的危险，党员常有叛变、妥协的可能，一旦发生问题，党的事业就受到很大损失。在亲友中发展党员，一是有方便的条件，不易暴露，二是有利安全，即使出了问题，告密出卖亲友的情况也较少。为此，我利用社会关系上的条件，扩大对亲友的接触，尤其是对有抱负的青壮年亲友的接触。在谈论时局变化、议论国家大事中激发他们爱国热情，同情劳苦大众，然后晓以大义，增强无产阶级感情，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团练屯有我一位姓周的姨父，串亲戚中认识了一位张麻子，通过多次谈话和启发，他很同情革命，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又经过他的工作，在团练屯发展了五六名党员，组成团练屯党支部。他还介绍南台的亲戚王绍福（又名王义）加入了党组织。这位贫苦出身的王绍福，后来给我们跑交通，抗日时期参加了八路军，为中国解放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宋各庄、疙塔坨、王家铺等村也是通过亲友关系发展起党的组织。

3. 通过同学关系发展党组织。我平时的工作是按着张金岩同志的布置，与单富荣、丁印林（即宋诚）、樊凌喜〔樊凌玺〕等人共同研究进行的。一次我们在总结工作时，感到知识界还是空白，应该从中学师生中打开缺口，发展组织。于是，我自报奋勇，决定第二次上学，于1932年秋后经人介绍进了汇文中学，在上学期间先发展了韩士昌为党员。韩士昌是遵化南街同仁医院院长、进步人士韩仰文的儿子，他父亲同情革命，家庭基础好，所以入学不久就发展了他。时间不长，韩士昌经过疏通，转学到省中学习，我又通过他的工作发展了省中学生麻连印、李加骥等人为中共党员，从而在知识界建立了党的组织。长城抗战爆发时，以他们为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伍，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捐献物资慰问二十九军。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成为革命骨干。

三

革命需要有革命的理论作指导，在斗争中我们非常注意学习。特别是对第三国际文献的



学习，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开展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才能够取得成功。于是，单富荣和我便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我首先通过表兄宋广文在遵化县城里做木工活的条件，组织起以木工于庆福、孟广清，石匠尹开瑞，瓦匠王万岗和李铁匠等人为骨干的工会。为掩盖反动派的耳目，名义是行会。我将工人积极分子于庆福、宋广文、尹开瑞、邢师傅等人吸收加入了共产党，组成党支部，领导工会活动。会址设在遵化城内鼓楼西鲁班庙里。工会经常举行会员会议，进行维护工人合法权利，保障工人合法收入等斗争，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后来，反动政府因惧怕工人团结起来闹事，开动宣传机器，污蔑四匠活动是宣传赤化，并勒令解散，工会未予理睬。1930年春天，反动政府和教育局相勾结，借口拆大庙修学堂，强占鲁班庙址，划给女子小学作为食堂和宿舍，企图以此限制工人的日常活动。鲁班庙是早年修建的工匠祖师庙，面积15亩，院内有三层大殿，第二层殿当中供奉的是木瓦匠祖师鲁班塑像。鲁班庙四季香烟缭绕，庄严肃穆，工匠们视鲁班庙为自己组织的象征，反动政府要予以拆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于是，党组织借工匠的自尊心组织发动了一场捍卫鲁班庙的斗争。集中全县五行八作一千多人，与政府展开激烈的护庙的斗争。为保卫神像，工人们把塑像抬到西门瓮城处供奉，组织工人昼夜巡察捍卫。县府怕把事态闹大，经教育局出面说合，把前层大殿留给工会，后北层大殿和大片空地划归学校使用。经过斗争，活动会址保存下来，工人们很高兴，举行了庆贺集会。会上，鸣放鞭炮，吹奏鼓乐，并把鲁班等塑像从西门瓮城抬回，安放在鲁班庙里，还集资唱大戏。这些活动，又引起反动官府的怀恨和不满。事态平息过后一个多月，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了邢师傅等四人，并解送到北京，查问党的组织。因党组织的活动比较隐蔽，没有暴露。后经花钱疏通和上告，三四个月后释放了被捕人员。

这次斗争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但因我们缺乏领导经验，工匠们又都是分散活动，不像大工厂那样团结协作，战斗力仍是比较弱的。因此，我们又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

四

1933年冬末春初的季节，张志全同志领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外乡人来找我，经介绍，知道是省委代表郭涤生。他宣布我任遵化县委书记，樊凌喜〔樊凌玺〕为副书记，委员有单福荣、丁印林等人。记得当时有三个区：一个是堡子店区，马子敬为书记；一个是新庄子区，张华锋为书记；一个是城关区，王绍福为书记。那时是开辟地区，没有属地观念和明显的界限，活动地盘越大越好。当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在发动民众抗租抗税、组织工会农会的同时，号召学

习“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精神，学习陕北谢子长的武装暴动，积蓄力量迎接武装暴动。为此，在夺取武器上我们付出了很大力量。这一年春天，王平陆、张志全和省委派来的军事干部徐英在孟家铺约见了我和马子敬。他们说：“罗屯警察局子松松垮垮，咱们前去砸局子夺枪。”随后我们七个人拿着七支枪（其中两支是独子儿枪），夜里绕小道潜伏在罗屯西边的乱石沟子里。后半夜时悄悄来到警察局，跳墙进去后就向屋里射击。警察从酣睡中惊醒，一边鸣枪还击，一边越墙逃跑，我们一名队员挂了花。这时，发现由于我们调查不准，围住的是空屋，所以让警察们乘机逃跑了。进屋后只搜得大枪一支、数百发子弹。此时，天将破晓，我们只得背着受伤的队员带着搜获的物品，沿山路退回。安放了伤员，然后分散回家。

1934年秋后的一天，侦察到马兰关关卡（税所）只有两个武装警察，有两支大枪，我们觉得可以黑夜夺枪。就和樊凌喜〔樊凌玺〕带着四名武装队员，扮成打柴的人，武器裹于柴草中，绕道到兴隆县的牛圈子。三更过后，我们来到关卡门前，伪称过路商人叫门。听无人应声，以为他们已经睡着了，就翻墙跳入院子。刚进去，就被明亮的手电光照着了。那人一边大喊“有胡子（土匪）”，一边鸣枪开门逃跑。我们进屋一看，桌子上摆着麻将牌。原来是动手早了，警察们正在耍钱。夺枪的目的没有达到，只得了一百多块现大洋和几十发子弹。不过后来用这些钱让人买了枪支。此后不久，我又布置李子华、马子敬等人砸了罗文峪税局子。

1935年春天，省代表老张宣布我改任冀热边宣传委员，协助冀热边党委书记王平陆和组委小李在蓟县、兴隆、迁安、热河等地方开辟地区，创建冀热边游击临时根据地，准备武装起义。为了积蓄力量，支援热南地区民众军孙永勤，我曾组织团瓢庄乡团哗变。团瓢庄有30多名团丁，其中有我发展的党员李景增。他原是李庄子人，是我婶子的干亲，后来被生活所迫当了乡团。我教育他要有爱国思想，不要当亡国奴，不能给资本家、有钱的人卖命，他在乡团中又发展了姓孙和姓尹的两名团丁入党。我叮嘱他们潜伏好，到时候拉出队伍抗日。但上级党组织却迟迟没有通知行动（后来才知道省委代表王子青因丰润教师罢课事泄，离开了冀东）。乡团哗变的事有些走露了消息，乡团头目沈团长要抓捕他们。李景增等四人带枪逃出乡团，藏了武器，流落他乡。

因几次武装夺枪都不理想，我们就采取了集资买枪的办法。当时，我卖掉15亩好地买了一些枪支武器。尔后派我兄弟骆凤鸣和阎龙给孙永勤送去了12支枪和一部药品，支援孙永勤的武装抗日活动。5月份孙永勤率队进关，我派阎龙找孙永勤进行联系。他从岳各庄找到大寨都没接上头，也没找到徐英同志。不料日本鬼子大举“围剿”，茅山〔毛山〕惨案发生了，孙永勤英勇牺牲，共产党员徐英也下落不明。为了汲取教训，我们在孟家铺召开了党委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的教训，决定重新开展工作。

1935年9月份，由于原来旧军人出身的军事干部孙彩投敌叛变，省代表、老张、小李、樊凌喜〔樊凌玺〕和我等人被捕，工作暂时中断。



孙永勤在遵化[1]

李永春

1935年5月24日，遵化县东北部四十里外的茅山〔毛山〕上，打过一场恶仗。民族英雄孙永勤率领的抗日救国军（群众称为“民众军”）遭到日寇、土匪和战区保安队一万五千人的围击，孙永勤、王殿臣、关元有、赵来子〔赵来〕等领导人和四百多名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突围和走散的只有一小部分。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里［《八一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上发表］，孙永勤等人被誉为民族英雄。

孙永勤出生于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的一户富裕农民家庭。为人仗义疏财，喜好交游，深受农民的爱戴。为防御土匪骚扰，当地民众成立起自卫团，孙永勤被推举为自卫团总。1933年12月初，汉奸地主张如增带着伪军到黄花川收缴民众的枪支，催交租税。孙永勤和他的好友王殿臣、马保贵〔马保德〕（遵化县东双城人）商议，绝不能当亡国奴。他们十六名要好的农民结为异姓兄弟，撑起“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大旗，杀死了汉奸张如增，宣布起义。以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遂改名为“忠义救国军”。

正义的行动和连续胜利的消息传到遵化县，贫苦农民何广永、单忠英等到热南一带投奔孙永勤，参加了救国军。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和其他领导人高存、张志全等几次商讨支援孙永勤的抗日行动，并派懂军事的共产党员徐英到救国军中秘密协助工作。不久徐英来信，说救国军缺乏武器和药品。骆凤庭等人筹款购买十二支枪和一些红伤药，派共产党员阎龙、骆凤鸣等人化装成卖席的商人送到热南，交给救国军的关元有。[2] 以后孟家铺村的一些共产党员也曾给忠义救国军送去枪支子弹。

日寇对孙永勤恨之入骨，曾多次集结兵力“围剿”忠义救国军，均未得逞。后来又采取软化收买手段，派汉奸带着热河警察讨伐大队长的委任状诱降。孙永勤当场把委任状撕得粉碎，厉声大骂：“你们没有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我是堂堂的中国人，能做日贼狗下之狗吗！”吓得说客抱头鼠窜。这时，京东特委派中共遵化县委副书记樊凌喜〔樊凌玺〕与孙永勤联系，更加坚定了孙永勤的抗日决心。

日寇见孙永勤态度坚决，软硬兼施均不能奏效，就抽集重兵疯狂“围剿”。1935年2月，

[1] 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办公室编：《遵化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一）》，1985年8月1日第1次印刷，第64~70页。

[2] 引用兴隆县党史办的《孙永勤将军传略》第6页，根据原冀东外交官霍实子提供的有关情况整理敲实。

孙永勤率部分队伍在地瘠人稀的热南山区活动，多次与日伪交战，严重打击了敌人。但是，在频繁的战斗中，由于军火得不到接济，给养得不到补充，部队得不到休整，境遇十分困难。4月中旬，遵化县东北部的松棚营、小厂一带遭受马拐子、滚地雷等土匪蹂躏，居民拖家带口逃难到县城，恳请县政府为民除害。当时遵化县县长何孝怡同情抗日，又忧于匪患，秘密邀请来遵化县剿匪，并答应给孙永勤部队一部分军火和给养。冀东区党委老陈（原名赵仲池）和刘玉林、李子华等人组织游击队，与孙永勤联系，使孙永勤和共产党倍加亲近。遂把千余人的队伍经罗文峪、洪山口开进长城内。在进军途中，打下孤山子、罗文峪、洪山口等伪据点，活捉日本人关税总长佐藤及其随从，挟其为人质，要日本用武器赎回。

进关后，部队住在遵化城东南部的西小寨、小于沟、大安乐庄、大寨、吕各庄等村，曾与土匪和前去"围剿"的日寇多次激战。马拐子等土匪惧怕孙永勤的威力，就北撤到茅山〔毛山〕后面的大块地（村）一带，匪患一度减弱。驻在马兰峪的日寇得知何孝怡私通"民众军"后，欲行逮捕，何被迫弃职南逃。原来县政府答应的消除匪患供应救国军军火的诺言成为泡影。救国军第四大队长李连贵挑选刘秀存、陆班长等十八名战士化装成卖柴草的进城，想抓住县长质问。不料，战士们刚进东门，就见城里戒备森严。伪军见他们十八副柴草担子又起疑心，增派队伍，加强戒备。战士们见有准备，不好下手，就迅速从南门撤出。

国民党县政府为了麻痹救国军，一面差人将小量的大米、猪肉送到救国军驻地西小寨，以图稳住孙永勤，一面与日寇密谋，调兵围歼救国军。当时，孙永勤腿上带有枪伤，再加上救国军远离山乡，情绪低沉，部队又得不到军需补给，孙永勤满腔忧愤，伤病交加。他已意识到：不该离开山区根据地，更不该幻想旧政府给予支持。于是，他与同志们议定：回师北上，到兴隆、承德山区坚持斗争。

5月23日，救国军向北转移到小厂、吴家沟、三里店等地。孙永勤住在吴家沟张志辉〔张志跃〕家里。随佐藤被俘的翻译王善礼由于向孙永勤表示同情而获得了行动自由，当天，他将救国军的行动情况密报给驻遵化的日伪机关。那时，遵化伪保安队刚由国民军改编，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还存有爱国思想，保安队某部队长吕振江于当天下午派人在三里店西山与孙永勤接头（孙永勤腿部伤势很重，被战士用椅子抬到山上），陈明日本已纠集了大量兵力，力劝连夜转移。当时孙永勤因怜惜部下连日行军作战，都很疲劳，决定次日凌晨北上。李连贵率四大队连夜从茅山〔毛山〕西侧庄客村转向房山沟迂回到口外。

5月24日凌晨，日寇从承德、喜峰口、潘家口、兴隆等据点调集约五千人，唐山伪战区保安队长张云楼、赵雷等部下近万人，还有马拐子残匪二百多人，于拂晓时分，从茅山〔毛山〕周围的小于沟、陡岭子、鸡鸣村、刁赵庄子等地，四面向茅山〔毛山〕进发。孙永勤由人抬着，率领五六百人由粳子峪村抢上光秃秃的茅山〔毛山〕。战斗开始，只是一些零散的枪声。

八点多钟，有两架飞机从东面飞到茅山〔毛山〕，低空盘旋扫射，发现救国军密集地点就向日寇示意。敌人按飞机示意的目标，逐步紧缩，用重炮轰击，致使很多战士牺牲。后来救国军战士用步枪击伤一架飞机，坠落在洒河桥〔澈河桥〕附近。救国军几次突围未成，已经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孙永勤躲在茅山〔毛山〕顶石崖下指挥战斗，见突围无望，令人将俘获的日寇佐藤及其亲随带到跟前，亲自枪毙。连长张生〔张申〕腹部中弹，在停止呼吸的一刹那，两眼圆瞪，枪口对着敌人。二大队的排长周海彬带领战士猛打猛冲，打死敌人五十多名，流尽最后一滴血。茅山〔毛山〕东坡一名战士一连击毙十二个鬼子，子弹打光后，头撞山石英勇殉国。

悲壮的战斗打到下午两点多钟，忠义救国军领导人孙永勤和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赵来子〔赵来〕等都先后光荣捐躯。日寇见救国军尸体遍布山岗，还击的枪声稀落，就在飞机掩护下搜山，打扫战场。岂知，零散隐蔽在山崖缝里、怪石深处、树棵子里的救国军战士，以拼搏到底的英雄气概，利用仅有的子弹、枪把子、石头打死搜山的日寇近百名。山后坡一名战士，用七颗子弹打死七名搜山的日寇，然后抡起枪把子与敌人搏斗，壮烈牺牲。在被他打死的日寇中，有一名是胸戴望远镜、腰挎指挥刀的军官。

战斗结束之后，日寇在茅山〔毛山〕东侧的王家沟李永发院外火化日军尸体二百多具，熏得附近焦臭难闻。日寇撤走后，附近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眼含热泪收殓和掩埋了救国军死难者的遗体，并特意在孙永勤的墓前栽上了松树，以示缅怀。

忠义救国军从暴动到茅山〔毛山〕殉难一年多时间内，先后转战承德、兴隆、遵化、平泉、宽城、迁安等地，攻克日伪据点一百多处，歼灭敌军五千多人，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并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

茅山〔毛山〕战役之后，救国军中的遵化县人马保德、张子勋等人埋藏了武器，准备一有时机，再战斗下去，但受到亲日政府指使下的伪警察的到处搜捕。二十里铺的张子勋被迫远逃，东双城的马保德则不幸被捕，后被亲日的殷汝耕政府引渡到马兰峪日本驻军那里，惨遭杀害。

孙永勤等四百多名忠义救国军指战员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火种，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节。救国军其他领导人张福义、何广永、李连贵、年焕兴，以及遵化县东下院寺的张守礼、西留村的刘存祥、三道沟的廖金柱等人，继续投入抗日救国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注：此文据访问东双城子马殿，西下院寺张守礼，骆各庄骆凤庭、阎龙，松棚营老党员高国玉等同志的笔录整理。

为抗日献身的康永贵团长[1]

李永春

康永贵，遵化县乔家洼村人，1896年生。大个子，四方脸，身体粗实，追求解放，勇于斗争。

康永贵年轻时，去北京投奔冯玉祥部当兵。1930年后，因家贫，搬到兴隆县大鹿圈村白石峪，以开荒种地谋生。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长城喜峰口、潘家口、罗文峪口，二十九军开赴遵化、迁安县境，与日本兵展开浴血奋战。康永贵当时正在二十九军中服役，他见到日军进犯我长城，烧杀抢掠，恨得顿足切齿，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由于蒋介石发出不抵抗命令，二十九军从长城各线撤走，康永贵不肯离开故土，悄悄回到白石峪家乡，秘密组织武装，坚持抗日。

康永贵秘密召集乡亲集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眼下中国进来一群畜牲，弄得人们有田不能种，有家不得宁，只有大家合力把鬼子赶回东洋去，才能得太平。"在1934年春天，他从挂兰峪一带拉出一百多人，投奔孙永勤领导的民众军，担任第九大队队长，在长城沿线抗击日寇。3月，率部转战半壁山一带，在孙永勤领导下，攻克半壁山警察分驻所，缴大枪5支。后又在三道河北山与日本守备队交战，打死日军20多人。1935年5月4日，康永贵同张福义、何广永率800多名抗日救国军指战员活动在承德县下板城附近，一度攻打临近承德的敌人据点，使得伪热河省军政大为震惊。5月中旬，康永贵随孙永勤进关，24日，在毛山与日伪决战中，遭到重大伤亡，他率队突围西去，回到兴隆白石峪村隐居。

不久，康永贵闻听绿林好汉杨二在兴隆县牛筋洞一带坚持抗日，即率队与杨二会合。1936年春天，康永贵同杨二一起驻在花市一带休整，突然遭到马兰峪据点的敌人包抄。他们利用这里两山夹一沟、地形险峻的有利条件，设下伏击圈。待敌人进入后，众弹齐发，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不到一个小时，一连伪军只活着两个人，其余全部被击毙。缴获重机枪一挺、长短枪200多支。

1938年7月，冀东发生抗日大暴动。杨二在遵化冷嘴头南的花椒园子宣布起义，成立民众抗日救国军，杨二担任司令。康永贵和遵化、兴隆许多贫苦百姓参加这支队伍。当时，这支队伍庞大，军饷困难。经了解，得知汤泉据点存有黄金白银，康永贵跟随杨二率队进行偷袭，打死十多名日军，砸开大铁柜，取出黄金白银，返回花椒园子，解决了军饷问题。接着部队向平安城移动，与李维廉的暴动队伍一起痛击了伪蒙古骑兵队。部队很快壮大到2000多人，并进行

[1]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59~61页。



了整编，康永贵被杨二任命为团长。

部队整编后，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康永贵率队回到长城沿线的遵化县龙须沟、冷嘴头，兴隆县白石峪山区一带抗日。7月下旬，伪蒙古骑兵队从鹰手营子、牛圈子窜来，到冷嘴头关外时，被康永贵率部截击，打死战马3匹，生获4匹，缴获枪3支、子弹200余发，蒙古队向北溃逃。之后，康永贵率部奇袭倒流水金矿据点，获枪11支、子弹500余发和其他物资。

屡次袭击敌人，引起敌人的惊惶。8月27日深夜，在伪金矿做工的亲戚捎信给康永贵：我方与伪警察署取得联系，可做第二次奇袭。康永贵没加沉思就率百余人，再次攻打倒流水金矿据点。哪知捎信人暗中与日伪勾串，伪警察署长武藤早有戒备，负隅顽抗，久攻不克。

翌日拂晓，即8月28日（农历后〔闰〕七月初八），天降蒙蒙细雨，马兰峪据点的敌人前来增援，形成了包围圈。在敌众我寡和地形不利的情况下，康永贵只得撤离阵地，退向西山坡谷子地里。康永贵部伤亡30多人，侯连长在战斗中牺牲。团长康永贵又遭敌机枪扫射，身中5弹，一生抗击日寇的英雄血染燕山，壮烈牺牲。

子敬可敬[1]

李永春

马子敬，原名马占全，字子敬，化名郑桐林。1900年生。原籍丰润县钱庄子村，幼时迫于生计，随父母逃荒到遵化县孟家铺定居。

1927年，奉系军阀政府强征“旗地变民”捐，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生活本来就很拮据的马子敬更加雪上加霜，于是积极加入了农民协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捐税斗争获得胜利，马子敬第一次感到世界上还有为贫苦农民解脱痛苦的事情。运动过后不久，官府迫害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少数骨干被关入监狱或被杀害，这对马子敬教育〔震动〕极大。人类的救星在哪里？他积极地寻找着。

1933年，孟兆泰（冀光）到孟家铺教书，他办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消息。马子敬从中受到教育，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在孟兆泰的培养教育下，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240~241页。

入党后不久，马子敬担任了村党支部书纪和堡子店片区委书记。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山河破碎，他积极唤醒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为了顺利通过长城关卡，到热南地区发展党组织，伪装加入普安协会（俗称“家礼”）。曾多次砸毁敌人据点或警察局，为了躲避通缉，先后携家到滦河东和西下营的禅林寺村避居。1936年，日伪统治者为防民变，下令收缴地方散枪。为了保存武器，马子敬组织党员和群众骨干黑夜里到处放枪大叫，第二天到处传说土匪抢枪，使日伪的收枪计划未能得逞。为了开辟地区，筹措武器和活动经费，他卖掉心爱的手表，动员家属卖掉赔嫁的首饰，秘密印刷党的传单，到集市口去散发。

11月，马子敬参加了冀热边特委在遵化兰村召开的会议，随后着手进行小型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1938年冀东革命大暴动中，马子敬和李子华组织了抗联新五总队，马子敬任政委。是年随四纵赴平西整训。1939年春返回遵化，担任县委书记，从事地方工作。1940年调任十五地委工会主席。1947年1月31日，在孟家铺，凌晨，突遭反动还乡团抓捕。在狱中，马子敬自忖不能脱险，遂告诫难友李广忠、赵昆冈等人，不要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争取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3月1日，马子敬高呼：“共产党万岁！”在遵化西关刑场从容就义。



王平陆和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1]

中共迁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王平陆，原名高永祥。是河北迁西县（1947年以前属迁安县）上梨树峪村人，1901年出生在该村一个小康家庭。小时候读过私塾。青年时期，他苦于军阀混战，曾去东北谋生多年，在哈尔滨中东铁路上先做伙夫，后当路警。因为中东铁路为中俄合资经营，所以王平陆在那里常与苏联人接触，并受到革命的影响，初步懂得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道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东北沦陷。这年冬天，王平陆怀着对日寇的满腔义愤返回家乡。1932年春，经张仲三、高存风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从此便全身心地投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并把全家引上了革命道路。

1933年冬迁安农民暴动前，王平陆是中共迁安县县委书记。为了组织暴动，他昼夜奔波，筹集经费，出地买枪，串联亲友，组建“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在此期间，他家是京东特委的工作地点之一，李葆华、李运昌等领导同志曾在这里召集会议，筹划暴动的准备工作。在王平陆的影响下，他们全家人争着为革命出力。他的弟弟入了党，妹妹入了团，父母和妻子都尽心尽力地支持革命，热情地招待同志，掩护党的干部。为了让外来同志住好吃好，他家腾出后排房子，供特委的同志们开会和住宿之用。在吃粮困难的情况下，全家人勒紧裤带，吃糠咽菜而毫无怨言。这种对革命的赤诚之心，使同志们深受感动。

迁西暴动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因而举事三天便告失败。三十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数队员家产被抄没一空。其中，王平陆家的房子被反动民团强占，财物被砸光、抢光，弟弟高永瑞被捕，后牺牲在天津第三监狱。全家九口人被迫离乡背井，逃到八处避难。革命遭到残酷镇压之后，王平陆同志没有悲观失望，没有消沉下去，他反而变得更加沉着冷静，更加顽强地坚持工作。

1934年冬，李葆华、李运昌二同志又来到王平陆的家。王平陆十分高兴，他把暴动失败以来自己所做的工作向特委作了汇报，并谈了暴动失败的教训和恢复迁安工作的意见。李葆华同志代表特委肯定了他的工作，指示他重建县委，尽快把迁安党的工作恢复起来。不久，成立了以王平陆为书记、张仲三等同志为委员的迁安县委。鉴于长河东区、长河沿区的党组织已经暴露，县委把活动中心转移，建立了以西庄魏春波家为中心的秘密活动基地。

[1]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95~400页。

魏春波同志是由王平陆介绍入党的党员。他老成持重，威望高，结交广，办法也多，所以在他的有力配合下，县委在西庄一带很快扎下根。不但逐步恢复了旧有的党组织，而且在滦河以南发展了许多党员，同时，与丰润北部、遵化西部联成一气，开创了新的局面。

1933年12月，王平陆同志参加了京东特委，为京东特委委员，1936年夏又担任了冀热边特委书记，直到1937年10月。在此期间，他与李运昌、阎达开、魏春波、韩东征等同志一道，秘密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他串联了高存、刘永丰、周治国、高永琛等骨干分子，建立了秘密游击小组，昼伏夜出，活动在长城内外。

为了沟通北宁路南和口外的联系，冀热边特委建立了以西庄为中心的秘密交通联络网，确定谷福负责古冶，周治国负责与迁安县太平寨，赵明海负责与遵化洪山口，才永昌负责与天津等地的通信联络工作。同时，在岩口镇，徐振铎以办“祥义成”杂货铺为名，建立秘密交通站，王平陆经常去那里活动。

1937年10月，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同志受北方局派遣，回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改任军事部长。在此前后，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冀热边特委遵照党中央白区代表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在各县成立了武装“自卫会”组织，广泛地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为后来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王平陆同志组织的游击小组，一边打击敌人，一边广泛宣传国共合作，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曾把印好的传单投进地方民团驻所，给民团训话，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其转向抗日。

同年11月，北方局派来了红军干部李润民（团政委）和孔庆同（营长），协助冀热边特委和京东特委（胡锡奎为书记）开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培训暴动骨干。从此，王平陆同志对开展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因而工作也更加积极了。

12月下旬，王平陆参加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在多余屯召开的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继续加强抗日的宣传、组织等工作，通过了立即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决议，并决定由王平陆负责组织一支队伍，立即开展游击活动。会后，王平陆同志调集了一批党员、“自卫会”骨干和游击队员近二十人（后发展到三十余人），在原有游击小组的基础上，扩建了“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王平陆任司令员，史贞任政委，李润民任副政委，孔庆同任支队长，刘永丰任副支队长，周治国任支队特派员（对外为联络员）。游击支队的武器大多是装火药的“腰别子”、“鸟子”，大枪只有四五支，还是“单子儿毛瑟”。队员大多使的是鬼头刀，是王平陆派人从遵化搞到手，把刀装在糠口袋里用驴驮出来的。黑洼村的党员万国来，在本地颇有声望，他靠着各种关系，为游击支队搞了一些枪支。队伍成立后，迅即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活动。他们曾在遵化县境内的毛山一带，夜袭了



一个团局，收缴了那里民团的枪支，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

此后，为了使游击支队继续发展壮大，摆脱装备不足、给养缺乏的困境，王平陆等决定夜袭伪满清河沿据点。清河沿在口外伪满青龙县境内，是沟通迁青口里口外的必经之路。日寇和“满洲国”在这里设立了“国境警防所”（另设有一个海关税局），派驻鬼子三人、伪满警察十来人。他们不仅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而且四处勒索民财，无恶不作，深为人民所痛恨。所以，如能打下这个据点，既可装备队伍，又可为民除害，其影响是相当大的。

事先，王平陆曾派出队员王立成扮成“叫花子”前往清河沿侦察探路。1938年1月7日夜，王平陆率队绕太平寨据点，出城子岭长城口，奔袭了清河沿伪满“国境警防所”。按照战前的布置，一部分队员翻墙进院，开了大门，王平陆便率队冲了进去，指挥队员向屋里的敌人发起进攻。不幸的是，在战斗中，王平陆胸部中弹，负了重伤，情况十分紧急。于是，游击队员们背起王平陆司令员，立即撤出了战斗。在返回口里的路上，王平陆意识到自己的伤势过重，凶多吉少，便忍着剧痛对背着他的队员王立成说：“我不行了。我死后，你一定要用石头把我的脑袋砸碎，以免敌人认出我来，抄咱们的家，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接着，王平陆司令员还对支队的下一步行动作了安排，让队员们尽快找到魏春波同志。

后半夜，游击支队撤回口里，把司令员先安置在马庄子他的一个亲戚家，然后准备与唐山联系，进行抢救。可是，党的优秀儿子王平陆同志于1月8日（腊月初七，正是太平寨的集日）上午就停止了呼吸，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王平陆同志牺牲之后，游击支队找到魏春波同志，在他的指导下，克服了动摇情绪，稳定了军心。队员们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把冀热边游击战争坚持下去。不久，上级党又从路南调来张鹤鸣、张振宇等十八名富有经验的游击队员，使这支游击队扩大到三十多人。

1938年上半年，华北抗联第一游击支队在彭夫、孔庆同、高存等同志带领下，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转战于长城沿线，袭击了兴隆药王庙等日满据点，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些战斗，惊动了长城内外，激发了冀东人民的抗战热情，为不久爆发的冀东抗日大暴动训练了干部，积累了经验。虽然在冀东人民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王平陆同志就牺牲了，但是，他打响了“冀东人民向日寇、汉奸开火的第一枪。这一枪，震醒了冀东千百万同胞，形成了当年7月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序幕，而王平陆同志是当时的揭幕人。”

书明、胡达整理

铁骨铮铮寸心丹[1]

——冀光革命生涯

王旭东　李永春

黑夜中苦斗的志士

冀光，原名孟兆泰，字寿田。1905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二村，其父孟子森是位清末秀才，靠教书度日，家境贫寒。后全家搬迁到遵化县城。

青年时代的冀光，在亲友的资助下，有了上学的机会。然而，学费苛重、学校灌输旧礼教引起他的不满。一次，他随学友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减轻学杂费和改变旧的教育思想，但得到的却是怒斥和白眼。冷酷的现实在冀光纯洁的心灵里投下阴影，激起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生活的艰难，思想中的压抑，使他更加发愤读书。他在业余时间又读了一些反映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思想受到启发，期待着中国也有一次“十月革命”。

1923年，冀光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遵化县乌龙泉师范讲习所。为了谋生，经人介绍，到国民党遵化县党部当缮写员。经过一段工作，认识到国民党只空谈三民主义，没有改革现状的决心，不能拯救劳苦大众，于是，他辞退了缮写员的职务，开始了教书的生涯。他先后在县城东北角火神庙、张各庄、孟家铺、袁果庄等村教书，并在孟家铺落户定居。

孟家铺是个土质贫瘠的村庄，居民多是从外地逃荒来的穷人。冀光生活在他们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7年春，遵化县广大劳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奉系军阀政府的“旗地变民”捐的斗争。冀光积极投身其中，写传单，搞讲演，组织农民协会，成为遵化县西部农民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在那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冀光深受教育，看到了方向。1927年夏，经中共玉田县委负责人杨春林的介绍，冀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冀光入党不久，爆发了我党领导的玉田暴动。当时，旧政府也在遵化县向农民运动骨干进行报复，遵化县的革命形势一度处于低潮，然而冀光仍秘密地为党工作着。1929年春，冀光、兰小川、黄瑞阁等共产党员教师在中共京东特委的领导下，组织起“遵化县小学教员联合会”。当时小学教员工作繁重，薪金菲薄，职业卑贱，常受督学和学董的欺凌。冀光就利用小学教联这一合法组织，启发教员们的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扩大我党的影响。1930年清明节这天，冀光、兰小川、黄瑞阁等在京东特委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发动150名小学教员

---

[1]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244~254页。



到县教育局去请愿，要求撤销张汉青教育局长职务；提高月薪20%~30%，变年发薪10个月为12个月；实行星期日休假制；为教员们订阅报纸杂志。教师们高唱战歌，群情激愤，将教育局当权者吓得不知所措。此日教育局长张汉青回家祭祖，教师们便揪住教育局文牍赵巨川进行质问。第二天，赵巨川唯恐事态闹大难以收拾，便同督学王家齐一起出面，答应了教师们的请愿条件。冀光等共产党员教师见这次教潮斗争已基本达到目的，便组织教师们返回了学校。

半月后，教育局长张汉青、文牍赵巨川竟向县政府起诉，诬蔑小学教员捣毁教育局，破坏办公秩序。县长王睿增立即下传票传讯冀光、张颂之、黄瑞阁、张荫庭、岳振环、王克新、徐连泉等七名斗争骨干。当时，冀光正在张各庄教书，他接到传票后，会同藏山庄小学教员张颂之，到南岗高小找兰小川等人商议对策。他们拟好状词后，冀光和张颂之率先赶到县政府。在森严的大堂上，冀光正气凛然，据理陈词，驳得原告张汉青、赵巨川瞠目结舌，理屈词穷。县长王睿增与原告张汉青、赵巨川沆瀣一气，无视事实，蛮横地以“非法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将冀光等七人一并拘留，押入监牢。由于冀光等七名教员在社会上素孚众望，冀光等七人被押后，社会上广为传颂他们高风亮节、蔑视权贵的品德和事迹，被誉为“教育界的七君子”。

冀光在监狱里度过了29个日日夜夜，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才被释放返校。他到学校不久，就被教育局开除了教籍。之后，为生活所迫，经李维廉介绍，转到兴隆县红梅寺去教书。冀光，这位在黑夜中苦斗的志士，尽管经受了种种打击和磨难，但他的心灵越来越充实，因为在茫茫黑夜中，他头前毕竟有了指引航向的灯塔。

为人拥戴的师表

1933年5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冀东22县拱手让给了日本。冀光目睹山河破碎，心如火焚。他乘遵化县敌伪组织初建，统治尚不严密的机会，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孟家铺村。冀光回遵后，首先和县委书记骆凤庭取得联系。他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仍以小学教员为公开身份，秘密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冀光首先在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给学生讲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给学生讲岳飞精忠报国和女侠秋瑾的故事。学生们在冀光的教育下，联想到国破家亡，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冀光博学多艺，既有私塾底子，又懂所谓的“洋学”。在课堂上，他经常传授一些实用知识，例如尺牍和珠算。课余时，他还教学生们唱歌和吹打弹拉。这所校园，越来越吸引青少年，学生很快由30人增到50多人。冬季，冀光办起了农民夜校，三十几名青年农民就是在这所夜校里学到了文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冀光关心群众疾苦，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联系群众。冀光不论乡绅妇孺，有求必应。老太太们要扎花，冀光就给她们描

花样。这位平易近人、为群众分忧解难的孟老师，博得全村人的敬佩和信赖。1933年孟家铺村尚未自治，受周围四个村的主宰。为给四个村拿“差事”，孟家铺村的乡绅和民众要跟那四个村打官司。他们来找冀光，冀光给他们出主意、写状词，终于争得孟家铺村独立。他那主持公道、见义勇为的精神鼓舞了乡绅和民众。

冀光就是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秘密开展抗日工作的。

马子敬、李子华、李锡儒、王品三等爱国青年，在学生们放学后，每天都来学校找冀光探讨革命道理。开始，冀光和他们一起看报纸，讨论国家大事，渗透我党的抗日主张，并借给他们洪秀全、李自成等故事书。后来，他们谈及1927年的农民运动。一天，李子华不解地问：“我们的农民协会为什么不能坚持?”冀光给他们讲：“因为我们的农协没武装。夺取政权，赶走日本，都得靠武装斗争。农民运动是失败了，但革命是发展的。”冀光还经常给他们讲毛主席、朱总司令带领红军英勇抗敌的故事。冀光就像严冬的一团火，吸引住了这群热血青年。当年10月，冀光发展了李子华、马子敬、李锡儒、王品三等青年党员，相继又发展了肖明义、赵玉昆、李瑞丰等15名共产党员，并建立了孟家铺村党支部。

1934年春，冀光出任遵化县委组织委员。孟家铺党支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遵化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

这个党支部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自筹经费，编印传单，宣传抗日救亡，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

这个党支部在日伪统治极严，长城沿线设立税卡之时，派支委李子华打入“普安协会”，为党组织侦探了大量情报，给到热南开辟工作的同志提供了方便。

这个党支部在民族英雄孙永勤抗日杀敌，处于孤军作战之际，主动与其联系，支援其枪支弹药。

……

在冀光的领导下，孟家铺村党支部抗日活动日益活跃，也由此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35年农历9月15日，由于孙彩叛变告密，冀东地区保安队第一总队倾巢出动，将孟家铺小学校包围得风雨不透。这天，全村人正在学校里吃秋后的谢客饭，敌人突然包围，群众有些慌乱。敌人从人群中拉出几名乡亲，逼他们指出谁是孟寿田，那几位乡亲摇摇头：“不知道。”敌人又拉出几名乡亲拷打审问，这几位乡亲回答也是“不知道”三个字。孟寿田是孟家铺全村人所拥戴的师表，人们宁可皮肉受苦，也决不供出贴心人。敌人丧心病狂，对群众要施行酷刑。这时，冀光拨开人群，挺身而出，正颜厉色地喝道：“不要打他们，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孟寿田！”冀光英勇无畏的气概，使敌人惊呆了……

冀光被捕后，孟家铺全村人都为他落了泪，冀光就凭密切联系群众赢得了全村人的心。



在监狱里，冀光虽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漏党的秘密，并在狱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6年春，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他才脱险出狱。

冀光两经炼狱，革命意志更为坚强。当时，遵化县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革命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他出狱后仍以小学教员职业为掩护，竭尽全力开展革命工作。他每月工资只有十六元，供养七口之家，生活极端困苦。但是，冀光每月拿出四元钱交给党组织，作为革命活动经费。一次，他为印发革命文件和宣传品，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手表。冀光这种毁家纾难、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驱逐了他周围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使革命工作有所恢复。

在暴动的风云里

1937年12月底，冀热边特委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滦县的多余屯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以迁安为中心，在遵化、兴隆等地立即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后，冀光积极协助县委组织了游击队。1938年1月和2月，他和马子敬、李子华等，率领二十几名游击队员，随冀热边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连续攻克了青龙县青河〔清河〕沿据点和兴隆县药王庙据点。这两次小型游击战斗，为以后的抗日武装大暴动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1938年夏，在党中央和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冀东地区掀起了全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在大暴动的风云里，冀光出任遵化县委直接领导下的新五总队政治委员。他从政治工作入手，来建设革命的武装队伍，使新五总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性强、受群众拥护的队伍。

7月上旬，冀光和总队长李子华指挥新五总队，以“攻威兼施”的战术，首袭了日本人开办的桃园金矿。此战共缴长短枪90余支，弹药若干。初战告捷，群情振奋，全县立即掀起了拥军热潮。新五总队很快由600人扩大到1000余人。

8月上旬，冀光调到丰玉遵联合县政府，负责组织救国会工作。他深入村镇，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活动，积极争取上层人士，使救国会成为我党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的强有力的统一战线组织。

10月间，暴动队伍仓促西撤。此时冀光正在遵化县毛庄村做群众工作，没接到西撤的命令，仍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活动。

暴动队伍在西撤途中遭敌截击，广大群众在暴动中迸发出的抗日热情受到挫伤，人民情绪低落，冀东游击战争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1939年春，冀光秘密组织了遵化县教员救国会，并担任了县教救会主任。他在教育界进行抗日宣传，秘密发展党员，扩大革命力量。这一秘密的群众团体，对恢复遵化县抗联队伍和扭

转当时的低潮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县教救会的革命活动后被伪教育科掌管教育工作的李裕生所察觉。8月间，敌人在遵化大肆搜捕进步教员，冀光第三次身陷囹圄。

敌人的监狱是冶炼革命者意志的熔炉。在狱中，冀光遭到敌人的百般刑讯，受电刑，遭狗咬，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英勇无畏，宁死不屈。冀光有丰富的狱中斗争经验，在敌人审讯中，他机智对敌，常搞得敌人狼狈不堪。敌人在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面前软弱了，后经孟家铺全村人花钱出保，不得不将其释放。

冀光三次被捕，经受住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并不为此消沉、动摇和观望，而是在革命处于最严重关头奋勇进击。

领导者的光辉典范

真正的革命者，不论职务地位发生多大变化，始终会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之情，生死与共。冀光就是一个光辉典范。他从1940年走上领导岗位，任遵化县西区区委书记，化名徐敬之，不久更名果瑞。1942年任迁遵兴联合县县委宣传部长，化名固本。1943年调冀东特委二地委为宣传干事。1944年任遵化县委书记，化名冀光。1945年调冀东十五地委任宣传部长，直至牺牲。冀光在领导岗位上，始终保持以往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他常用“为党能挑一百斤，不能挑九十九”这句话砥砺自己和同志。他担任冀东十五地委宣传部长时，体弱多病，背都有些驼了，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工作，使周围的同志深为感动。

他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既严肃认真，又能审时应变，实事求是。1942年，敌人强迫各村建立“反共自卫团”。冀光对此运用了他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既对党员群众进行气节教育，又允许一部分党员干部打进去，取得合法身份，进行隐蔽斗争，使“反共自卫团”这一敌伪组织，为我所用。

他工作认真，亲自动手，从不依赖秘书和其他同志。不论县委还是地委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他都亲自讲课。他阅历较深，知识渊博，说话又幽默风趣。讲课时他深入浅出，娓娓动听。不论在县委和地委，报告总结等材料，他都亲自动笔。十五地委主办的《支部生活》就是他写的发刊词。他事必躬亲的精神颇受同志们的敬佩。

他平易近人，对待同志和群众像火一样热情。他对下级体贴入微，作风民主。同志们有事都愿和他讲。在同志们心目中，他既是和蔼可亲的领导，又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对群众态度诚恳，每到一处很快就和老乡打成一片。他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受同志们的赞誉。

他舍己为人，富有革命的牺牲精神。1944年10月16日，在杨家铺战斗中，李春光同志在冲



敌人的封锁线时负了重伤。此时冀光已经冲出封锁线，他看李春光负伤尚未冲出，毅然返回，冒着弹雨，背起他就走出危险区。李春光对此事铭刻心怀，解放后曾撰文高度赞扬冀光这种为同志为革命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

他具有百折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岁月，敌人疯狂实行五次“强化治安”，在长城沿线以及其他区进行烧杀抢掠，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当时，冀光担任迁遵兴联合县宣传部长。在这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带领群众利用山地有利条件，广泛组织力量，巧妙与敌周旋，破坏敌人“集家并村”，保护群众不下山，不进“人圈”。冀光同干部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一起爬冰卧雪猫山洞，一起忍饥挨饿吃野菜。一次，敌人集结兵力，分五路对横流、潵河［疑为“横、柳、潵河”］一带进行围攻“扫荡”，冀光带领干部群众躲进山中与敌周旋。他们几天未吃到一粒米，只捡些破梨充饥。他常向同志们说：“山养人，人养山，吃烧不困难。”冀光就凭这种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点燃了“无人区”里的抗日烽火。“无人区”的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终于坚持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今天，“无人区”的人民深切怀念着冀光，因为他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位真正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

履行壮烈的决议

1947年，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在热河北部林西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议结束后，冀光随冀东代表团全体同志于5月19日自乌丹先行取道南返。他们身负重责，急于回到工作岗位，贯彻党代会精神。5月20日夜间，冀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苏林燕率全团夜宿于赤峰以西九十里的柴火栏子村，并将一个连的护送部队放置在柴火栏子村东五里远的彩凤营子村，警戒赤峰之敌。当时，西面已收复围场，估计可无问题，但竟发生了意外。

21日拂晓，从围场北向赤峰逃窜的蒋匪白金辉、于秀成部数百骑兵，突然窜到柴火栏子，同我代表团遭遇了。匪徒们立即把南北夹山的仅有30户人家的柴火栏子包围起来。我代表团只有三支步枪、七颗手榴弹、十多支短枪。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同志们分头扼守大门和围墙，面对几十倍于我的敌军，进行顽强的自卫还击战。

天亮后，匪徒们越过院北围墙，冲到院子当中。冀东十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同志中弹牺牲。

上午9点，七颗手榴弹用完，子弹也不多了。三间房子的东、西、北三面净是乱哄哄的敌人，他们狂呼乱叫，气势汹汹。此时，苏林燕同志命令立即烧毁文件，然后召集负责同志开了

个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坚决突围，出去几个算几个，实出在不去，也绝不当俘虏！"壮烈的决议形成了。

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冀光和冀东行署财政厅厅长王克如分别守着两个房间，用步枪狠狠地射击敌人。在敌人的弹雨里，苏林彦、王平民相继倒在血泊里。冀光见此心肺欲裂，满腔仇恨。他怀抱步枪，拼命地向敌射击。突然，他的枪戛然而止，子弹全部打完了。他和王克如每人只剩一支手枪、一粒子弹了。此时匪徒们更为嚣张，扒在窗口往里打枪，挖开屋顶向里放火，想逼迫冀光和王克如投降。冀光，这个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战士，是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最后，他和王克如，这两个冀东人民的忠诚赤子、我党的优秀干部，饮弹自尽了……

冀光牺牲后，冀察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发表文章介绍他遇难经过和表彰他的革命事迹，号召全党全军向他学习。李运昌司令员在1947年7月21日《群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多年共患难的战友，意外的遇难牺牲，对我们是个晴天霹雳，使人万分悲痛。他们的遇难牺牲，对于冀察热辽人民解放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使千百万军民深沉地哀悼与无比地愤怒。势将激励他们拿出更坚毅的决心与奋不顾身的作战，为死难者复仇，不消灭美蒋反动势力，势不甘休。"

冀光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生命，赢得人民的深切怀念。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人民向四个现代化奋勇进击！

旗卷狂飙　捍我长城[1]

——孙永勤传

佟靖功

孙永勤是一个从普通农民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他的一生，显示了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显示了背着几千年封建礼教重荷的农民毅然升华的过程；显示了一个中华儿女的无价的价值。

崇尚忠义　勇卫乡里

孙永勤，1893年生于长城北侧滦河畔黄花川孙杖子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今属河北省兴

[1]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21~46页。错讹之处用佟靖功先生《孙永勤将军》复印件作了校改，并增补了注释。

隆县孙杖子乡）。他的父母盼望他成为一个能治家的财主，七岁时便送他进私塾读书，数年后在家学农。这里是燕山主峰雾灵山余脉的深山区，正值军阀混战，常有土匪出没，故农民们为了防匪护财兼营狩猎，多置枪练武。孙氏族中的首户孙进昆（孙永勤的族中伯父）首先操办成立了民团（主要是保护地主富农的武装），组织青年习武练枪。孙永勤就是生长在这样动乱的年代里。他身高力大，手脚快，枪法准，还常夜读《说岳全传》、《水浒传》等历史小说。逐渐淡薄发财，敬仰岳飞，崇尚忠义。虽然还满身稚气，开始爱为贫弱排忧解难。贫苦农民孙永江说媳妇，给了彩礼，丈人家加码又要一头猪。孙永江愁眉不展，给不起。十八岁的孙永勤从家里抱出一头猪崽，送到那姑娘家。人家说："我们要的是大肥猪！"孙永勤说："养着吧，这头猪越养越大，不等你老抱外孙子，就变成大肥猪啦！"娘家人都乐了，只好把姑娘送到孙永江家。

孙永勤因办事公正，不畏强暴，三十多岁时，民团团总孙永宗让他当了副团总。一次，二百多名土匪来扰，孙永勤带队激战，把顽匪打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外地的多股土匪聚集在这一带深山。滦河沿岸民心浮动，防匪战事日益增多，孙永宗将团总职务让给孙永勤。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3月、4月，激烈的长城抗战失败，日军侵占了热南，东北转移过来的义勇军被击散。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拱手让给日本，而却用全力在南方"围剿"共产党。这年春夏季，承德、兴隆等县沦陷后，趁日军急于南侵之机，十几股土匪勾结来柳河、车河、黄花川一带抢劫。孙永勤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与各方许多民团联合起来，奋战半年之久，终于将一股股土匪击退。正在追击残匪的时候，一路民团卡住许多驮有枪弹的驮子，是车河口大成兴商号给土匪运的。原来大成兴与土匪有勾结。外地的民团团总们非常愤怒，闯进去把大成兴窝藏土匪的东西给分了。孙永勤率队回来赶上个尾巴，分给孙杖子民团八匹马。通过这次大规模剿匪，孙永勤增强了农民武装联合起来的信念。

国破家亡 揭竿而起

1933年夏季，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伪承德县政府和伪兴隆县办事处成立。日伪当局刚一成立，10月，推行"土地登记政策"，抓财税征收。11月，通过建立警察机构推行"铳器回收"政策，强令农民将所有枪支无偿缴出，如有延误即按匪论处。江山易帜，风云突变。大成兴商号投靠日伪，先手反告了孙永勤。

大成兴是岳荫臣等几家大地主开的，既经商，又开煤矿，财势很大。股东岳荫臣、掌柜赵老子贿赂下板城伪警察署及车河口警察分驻所，诬告孙永勤率众抢劫商号，接着又告发孙永勤

领头藏枪不缴。车河口的警察来逮捕，孙永勤持枪出走。后来，警察逼讯家人，孙永勤只得悄悄杀了两口猪，托人请岳荫臣、赵老子来家吃饭，商量和解条件。岳、赵把酒宴吃了，回去又告发，又抓人。孙永勤二番出走，又二番请客说和。岳、赵回去又三番告状、抓人。[1]孙永勤在外藏了一秋一冬。

日伪逼枪的气焰越来越甚，逾期就抓人。乡亲们找深孚众望的孙永勤商量。孙永勤思谋再三，说："听说朝鲜被日本灭亡以后，三家一把菜刀。亡国的人不如猪狗，怎么忍气吞声也没有活路。不如趁手里有枪，与鬼子拼了！"正在这时，从关里来了一个卖水鞋的人[2]，暗中向孙永勤谈到抗战，谈到共产党，谈到红军，谈到关里农民暴动，谈到开滦工人罢工。孙永勤激动得一宿没合眼，茫茫黑夜，眼前豁然开了一条路。他急速来到王宝石村找到好友关元有（地下共产党员）商量，关元有也正想起来抗日。他们又立即去鹿同沟〔路通沟〕，与患难相扶的亲朋赵四川、赵林、赵来、赵有、马保德（遵化东双城人，皮货商）在庙里议事。庙里的道人（人称小老道）也赞同抗日。这天夜里，他们一同回到孙杖子村，又串联一些骨干，计十七人，于1933年12月11日夜，在孙永勤家歃血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3]次日天明，在村中揭竿树起一面大旗，上写"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宣布抗捐抗税抗缴枪的"民众军"建立，军长是孙永勤，小老道是军师。孙永勤站在大旗下的碾盘上向群众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活下去，只有甩老子，抛妻子，扔儿子，打鬼子，先救国，后治家！"这天，村里悄悄地出现一种传说，说暴动的人们在鹿同沟〔路通沟〕拜神的时候，突然庙里钟鼓齐鸣，主吉人天相，其中必有大命之人。又有人说昨夜里碾盘上趴着一条豹子大的金狗，闪闪发光，一眨眼就不见了，只见孙永勤穿着羊皮在碾盘上酣睡。怪不得他身高六尺，穿一尺长的鞋，原来是二十八宿的天狗星下界！[4]几日内，便有一百五十多农民纷纷参加民众军。并将老弱病残送到他处。

抢先收枪　唤起民众

民众军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缺乏枪弹，有些人还拿着扎枪大刀。12月下旬，孙永勤率队来到邻村张杖子大地主张如增家，要出十四支大枪，几支手枪。当夜立即外出几十里，突然袭击了车河口伪警察分驻所，九名警察逃散，得大枪七支。打开大成兴，击毙赵老子。天亮，去

[1] 见救国军老战士孙文阁、史耀华、张凤林回忆录。

[2] 从言己整理：《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见承德地区文联编：《燕山》，1981年第2期，第119页、122页。

[3]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1935年印行，第31页。

[4] 救国军老战士刘俊岳、孙文阁回忆录。



大彭杖子攻打岳荫臣的煤矿城。岳家的煤矿筑起高高的围墙，四面都有炮楼，里面有二十多名保镖持枪射击。一队伪军、警察也赶来解围。双方激战一天一夜，关元有分兵前后夹击，伪军从前山溃退村里。这一仗歼灭伪军几十人，得枪几十支，民众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天亮时，突然来了一股日军进了大彭杖子。孙永勤率队包围向日军开火，打死几名日军。民众军也有伤亡，负责人赵来牺牲。一股日军又从高杖子奔来。民众军的子弹已经不多，只得悻悻地插上广东山，甩开敌人，连夜登上海拔1383米的五指山。休整几天，安排伤亡后事。利用一个月夜，孙永勤又带队突然南奔五十多里，袭击伪半壁山警察分驻所。俘虏十几名警察，得大枪十几支，子弹十几箱，还得了许多伪币，将警察的粮仓打开，让百姓全部分去。兴隆的伪军追过来，民众军撤到长城脚下山间古刹舍身台。第二天几百伪军包围。寺庙错落纵深，伪军未肯深入。民众军以逸待劳战斗一天，待月上东山，孙永勤带二十多名战士靠手枪开路，引全队突围，沿着长城南侧，由遵化边界转到迁安边界。在日伪军连续追击的情况下，孙永勤与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等头领决策：来得及买粮就自己做饭，来不及就在大财主家吃饭，一定不惊扰贫苦百姓。枪弹来源从日伪手里夺取，也要向财主家“募枪”或“压枪”。“募枪”是劝说财主赞助抗日，把枪交给民众军。如果财主怕枪支失落，可由财主家出人拿着自己的枪参加民众军。当劝说无效，财主坚持不给的时候，那就“压枪”。就是向财主施加压力，先是一百多人吃住在财主家等着，再不给，就将财主家的人带走，以枪赎人。几天后，民众军转到龙井关外二道河村，从财主高佐忠〔高作忠〕家压出五支枪。夜间，伪军又包围，一阵巷战，民众军一百多人转到深山老峪黑河川。农历腊月二十几，孙永勤率二百多人转到滦河沿城墙峪的张财主家。张财主是孙永勤的亲妹夫，农商兼营，开着杂货铺、裁缝铺。

一天，孙永勤单独问他胞妹：“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吃六七天，知道干啥来了？”

“住妹子家来了呗，管得起饭。”

“你管得起，我们住不起了，快把枪拿出来吧！”

“一奶同胞，哥哥还不抬抬手？妹子家哪来的枪啊，真的没有。”

孙永勤的脸呱哒一拉拉，喝令亲兵将他外甥绑起来就打。外甥还说没枪，孙永勤嚷：“非亲非故的还给我枪打日本呢！越是亲戚倒越拆墙，不给我们，留着给鬼子？”他突然朝着外甥举起枪。他妹妹扑过来给他跪下，他说：“再抱我的腿，我踢碎你的下巴！你懂不？事到如今，我若没枪就是自消自灭！”结果，他妹妹还是交出六支大枪、一支二号匣枪，跟出七个人来。[1]接着又到王宝石村，和孙永勤他姨家又要出几支枪。再转到臭水湖、瀑河口一带，宣传抗日，募集枪支。

农历腊月二十九日，乘中国人民过春节的机会，一支日军来偷袭。民众军撤走。已经过了长峪沟〔常峪沟〕山梁，侦察兵来报：“后边跟来的确是日军！”孙永勤说：“不退啦！咱们是

[1] 救国军老战士史耀华回忆录。

抗日的，鬼子真来了哪能跑呢！”他下令全队返回山梁上，当日军追到山腰时，民众军开枪。激战一天，毙伤几十名日军。日军继续增援，天黑了，民众军转移。年三十夜里，民众军转到邢杖子烧板子沟，被日军包围。突围时，一部分战士阵亡。陈子兴（遵化县下港人）操着一把菜刀砍伤两名日军。一群日军扑来把他绑上带走，陈子兴又挣断绑绳，举起大石头砸伤一名日军，砸坏一支三八枪，最后被杀害。[1]

孙永勤率队突围，午夜攀上海拔1475米的高山五凤楼。日军被甩掉了，民众军在五凤楼上休整。两个月来，民众军转战车河、黑河、洒河〔澈河〕、柳河四条大川，到处发动抗日，对群众影响很大。1934年2月中旬（农历正月初），孙永勤接纳了承德县八卦岭农民张福义的十几人和枪。接着兴隆县苇子峪农民李连贵率十八人，蓝旗营村农民年焕兴率二十多人来五凤楼，加入民众军。相继活动在兴隆县挂兰峪一带的康永贵率一百多人也与孙永勤会师。这时民众军已达千人[2]，进行第一次整编，孙永勤任军长，下设分队，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张福义、李连贵、年焕兴、康永贵等任队长。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解决给养问题，以队为单位分散活动。张福义向承德县内发展；李连贵、年焕兴队去洒河〔澈河〕川活动；康永贵队在长城沿线活动；孙永勤率四百多人仍在五凤楼一带回旋。

清除近患　游击突袭

五凤楼方圆数十里，民众军在深山里驻扎十余日。西面数十里处的寿王坟是兴隆方面日伪军来袭的必经之路，住在那里的前民团团总孙义香〔孙永香〕现在已经当了汉奸，他了解孙永勤的情况。因而，孙永勤派人将孙义香〔孙永香〕押上五凤楼，一方面劝说他不要继续当汉奸，一方面向他要枪。孙义香〔孙永香〕的儿子孙某在兴隆伪军钻营。1934年3月上旬，伪兴隆县办事处处长吕俊福、伪兴隆县办事处财政局长卢仪卿以及孙义香〔孙永香〕儿子带着五百多伪军、警察进五凤楼，从王胖子沟上山，深夜将民众军哨兵俘去，拂晓向民众军驻地村庄开炮。民众军伤亡十余人，孙永勤指挥队伍迅速上了南山向北山还击。两山对峙，两军对阵，民众军中多精良猎手，从黎明战到上午九时，伪军警已死伤数十人。待孙义香〔孙永香〕儿子寻回孙义香〔孙永香〕，伪军撤退。这一仗很使伪县吏吃惊，始知孙永勤的武力已非五百伪军所能“剿灭”。十余天以后，民众军从车河转到广东山。日伪军又来包围。战斗三小时，民众军转移。日军竟将山上的两个村庄烧毁。通过五凤楼、广东山两次战斗，孙永勤与众头领磋商，认识到要想在老梁、风楼、五指山、广东山等几座大山周围站住脚，必须清除四周的汉奸与伪警据点，使日军变成瞎子、聋子，民众军才能获取地势人和之利。然而要清除方圆百里内的近

[1] 救国军老战士史耀华回忆录。

[2] 救国军老战士史耀华、孙文炳等回忆录。

患，就必须游动突袭，乘其不意，攻其不备。[1]3月中旬的一天夜间，孙永勤率领五百多人奔走几十里，又袭击了伪半壁山警察分驻所，得枪几支，再次开仓济贫。白天，隐蔽在西大石洞。夜间，三道河的老乡送信：三道河的日本守备队来了。孙永勤将民众军埋伏在山上，等日军摸黑来到山下，突然开火，打死日军二十多人。日军速退，民众军也立即转移。拂晓时匆匆来了一支日军，将昨夜失落的一挺轻机枪拿回去。民众军撤到小十二岭，大雪纷纷，天蒙蒙亮时，又遭受伪军袭击，小老道正在算卦，刚出门就被抓住。在西高尖山上交战，刘义春、马占忠等三十多名战士牺牲。孙永勤率队昼伏夜行东去五十里，夜袭潘家口日伪税关署，缴枪四支。接着反转回车河，派一支尖兵去寿王坟梆子沟，烧了汉奸孙义香〔孙永香〕的房子，迷惑敌人包围梆子沟。孙永勤乘机率千人包围了大彭杖子，攻开岳荫臣的煤矿城。此时，岳荫臣已经病死，其家属已经远迁，十几名伪军逃窜，分掉他的遗产，铲除一个敌据点后，民众军转移到老梁。休整七天，又两路出兵：一路沿滦河南下，在滦河沿、贾家安附近，袭击日军货船三艘，打死日军二十多人，获面粉、大米三千多斤，衣服三百五十多件；一路由孙永勤率五百多人，举着大旗，临近下板城一带，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克武厂、黄杖子、上谷等敌据点，搜寻伪下板城警察署长陈某、武厂伪村长王岐山等汉奸的家。这些汉奸早已闻风而逃，不敢再在附近居住。

4月上旬，孙永勤率队沿瀑河南下，攻克瀑河口，毙伪军十七人，四十多群众持枪加入民众军。下旬，民众军进驻塌山，捉拿岳荫臣的同伙杨老文。杨老文逃去宽城。几百伪军来袭，抗衡半日，双方撤退。5月初，民众军分袭烧饼铺、潘家口两个敌据点。潘家口迅速攻克。烧饼铺激战半夜，歼灭日伪军四十多人。南部敌人调集兵力，民众军隐蔽返回黄花川。趁北部敌人麻痹之际，夜袭车河口，毙伪军警五人，俘八十多人，缴枪八十多支。从此，小股伪军警再不敢轻易接近几座大山了。

接受建议　改编整军

1934年5月上旬，孙永勤召集各路民众军集中于五指山双塘子一带。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军事干部徐英和地下党员张志全（遵化人）持高存（遵化人，关元有的入党介绍人）的介绍信来到五指山与关元有接头，并以遵化爱国群众的身份与孙永勤会晤。[2]他们向孙永勤介绍了关内遵化、迁安、丰润等地的抗日形势，很策略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进而建议孙永勤应从“均富济贫”发展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加强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以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使孙永勤的眼界跨越了百里河山，政治思想急剧升华。他高兴地接受

[1] 救国军老战士史耀华、孙文炳回忆录以及档案资料《卢仪卿卷》。

[2] 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回忆录及救国军老战士单忠英、张守礼回忆录。

了这些意见，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更新旗帜，将已经发展到五千人的军队进行改编。孙永勤继续任军长，赵四川、马保德任副军长，王殿臣、关元有任参谋长。下设四个总队，张福义任第一总队长，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关元有兼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总队下设中队、小队和班。军直设稽查处和直属队，请张志全负责稽查处工作，赵有任稽查队长。孙永勤身边还有一名军师，是新来的阴阳先生郝世祥〔郝敬义〕（大杖子郝家庄人）。改编时还进行了整顿，除加强抗日到底的思想整顿外，还注意进行纪律整顿。重申并强调“不贪财、不逃军、不扰民、不奸淫”的军纪。孙永勤讲话：“我们是中国人，胸窝里要装着中国人的良心，不能藏着贼心。谁要贪财，就是想逃跑。我们吃着老百姓，靠着老百姓，要是苦害老百姓，就没法在山里待！”并将多次抢劫、屡教不改的中队长陈志和另一奸淫妇女的人处决，晓谕全军。这时，在救国军内任下级军官的地下共产党员刘玉堂和班长刘俊岳与前中共迁安县委负责人韩东征已取得联系。韩东征就保守党的秘密问题、战前的准备问题以及部队的纪律等问题作了建议。[3]徐英给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去信，部队急需枪支医药。骆凤庭筹备十支大枪和一箱子外伤药，派共产党员骆凤鸣、阎龙赶着毛驴，驮着藏枪的席卷，走了三天，送到孙永勤的军部。孙永勤对共产党人更加钦佩。

五指山改编整军之后，有两点明显进步：一是军官平等对待士兵，身先士卒，大家都在潜移默化地学习孙永勤。起义以后，凡是军长参加的每一次战斗，孙永勤总是冲锋在前，担任主攻。他的礼帽被子弹穿了十几个洞，马褂上露着一片“筛子眼”。一些人说：“这是百灵相助，皇天有眼哪！”孙永勤这种敢死精神对全军将士有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一是在负责人的带动下，救国军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一次，孙永勤带领着几十人来到峪儿湾，正赶上当地老乡陆拥的弟弟娶媳妇。群众喜气洋洋地刚要入席，突然来了一大群带枪的，人们惊慌四散。孙永勤急忙劝阻：“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抗日救国军，是打日本、救中国的。我们在家也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孙永勤拿出二十块银元随了份礼。主人为难地说：“你老给了这么大的份礼，我们家没预备这么多酒肉，这怎么办呢？要不，请大军们吃头席，我们乡亲们以后再说吧！”孙永勤谢绝，他请乡亲们照常坐席，然后，他只让主人家用剩下的羊头、羊骨头熬一大锅汤，让战士们以汤当酒，以骨头为菜，入席吃饭。老乡们深受感动。[4]又一次，李连贵率队从五指山过路。见深山里的一些农家非常贫困，大人露着肉，儿童赤条条，一些孩子为了烤火御寒，胸前都被烤成吉吉花样的大疤瘌。李连贵让每个战士都脱下一件衣服，霎时，脱下一百多件送给了这些农民。[5]群众感动得说抗日救国军是“及时雨”、“仁义之师”。

[3] 韩东征、刘俊岳回忆录。

[4] 陆拥回忆录。

[5] 救国军老战士刘秀存回忆录。



转战六县　扩展游击

由于孙永勤与共产党有了联系，得知日军正急于向平津用兵，附近一带只驻日军千人左右，而伪警察组织既分散又无实力，因而抗日救国军以总队为单位活动，尽量扩大游击范围，分散日伪兵力，抓紧装备自己。6月20日，孙永勤、张福义率一总队一部攻打伪承德县乌龙矶警察分驻所，缴枪四十多支。7月10日，孙永勤率赵邦海中队三百多人，攻打伪兴隆县佛爷来据点，击毙日军十六人，毙伤警察五十多人，缴大枪五十多支、手枪三支、子弹十二箱，将大批粮食分给百姓，焚毁敌营垒。伪兴隆县办事处长吕俊福向上告急，伪热河省当局向兴隆东部调兵。救国军两千多人转战迁安、青龙等地。6月22日前后，救国军包围宽城，战斗三天。因当地民团增援伪商团，又考虑镇内百姓均未疏散，救国军主动解围而去。接着分兵去潘家口、洪山口、平泉三岔沟、下板城南大营子等地袭击日伪军。赵邦海中队在瀑河九虎岭被日军袭击，伤亡八十多人。关元有率第三总队赶来与日军激战，日军用掷弹筒和炮击，三总队在山上周旋伏击。日军几中埋伏，载着许多尸体向平泉县退去。[1]

凛然拒抚　机智回旋

抗日救国军游击六县，群众注望，影响深远。日方恐惧，认为“匪势强大”，已成为“最大的障碍”，一时又难以集中更多的日军“围剿”，于是又拾起故伎，企图运用在东北对付地主武装的办法招抚孙永勤。8月的一天，伪热河省当局派两名日本伪君子深入救国军驻地来劝降。孙永勤不见，命战士怒斥逐出，警告他们：“如果再敢来胡说，一定割掉你们的耳朵！”[2]接着伪热河省公署派几名汉奸扮成商人追逐救国军足迹，面见了孙永勤，呈上伪热河省公署的委任状，委任孙永勤为热河省警察讨伐大队队长，委任赵四川、关元有、张福义等为警察讨伐队队长。孙永勤鄙夷地将委任状一掷，说：“你们不要脸，还以为别人也不知耻？我们是堂堂的中国人，能做日本人的狗下之狗吗？”几个汉奸还想啰嗦，孙永勤勃然大怒，将委任状撕个粉碎，大骂：“没有血性的洋奴，再敢在这饶舌，我割下你们的舌头！”几个汉奸畏缩而去。[3]

日伪当局招抚失败，秋收后，利用青纱帐已倒的时机，纠集日伪军数千人包围抗日救国军，妄图一举歼灭。孙永勤召开军事会议，将四个总队改编为九个大队[4]，各大队又化整为零地回到各自群众基础最好、地势最熟的深山区活动。孙永勤、赵四川、关元有率军直属队和一

[1] 救国军老战士刘俊岳回忆录及《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1页。

[2]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1935年印行，第31页。

[3]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1页及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第31页。

[4] 何子桥、刘秀存回忆录。

个大队在黑河川隐蔽。一天，伪军一个团从柳河追过来，救国军撤到转山子。战事紧迫，孙永勤还找到地主王殿荣，劝说他："今年收成不好，向穷人少要地租。"[1]救国军又从宽甸村登上关门岭，扼守长城。地势险要，伪军不肯临近，只用炮击。除赵四川胳臂受轻伤以外，并无伤亡。入夜，孙永勤率队转至洒河〔澈河〕。伪军在宽甸按兵不动，伪苏团长在佛像前烧香磕头祈祷。入冬以后，孙永勤转到长城南侧。日伪畏惧抗日救国军的影响，"在兴隆北部地区强迫收缴民枪，从11月15日至22日已收缴八百二十三支。同时强制征兵，规定每家三丁抽二、两丁抽一。群众不堪其害，纷纷逃往迁安、遵化等地躲避"[2]。为阻扰敌人，孙永勤率队突然插回黑河川，12月末在三道梁伏击，歼敌六十余人。1935年初，在清河与日伪军激战，歼敌一百多人。2月4日，救国军转至柳河口，过了春节以后，转回黄花川。这时，孙永勤已经感觉到学习现代文化、辨认国内国外形势的重要，于是他亲自到张杖子小学，将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教师杨佩之请出随军，给他当了文化教师。[3]

3月初，在洒河〔澈河〕北山回旋的第四大队长李连贵率队攻打佛爷来药王庙敌据点，运用从长城上得来的"牛腿子炮"，把敌炮楼揭开。一百多日军和警察冲出来，向北山进攻。救国军在缺少子弹的情况下，不打消耗仗，便退到山北横河的白云寺。这天夜里，糜子地的老乡送信，明天将有一百多伪军马队来糜子地。后半夜，李连贵率五百多人埋伏在糜子地东山。天亮以后，果见一百多骑兵前来。临近山湾，一声令下，百枪齐发，两个小时结束战斗，歼灭伪军八十多人，俘虏二十多人，只逃走了数人，缴枪九十多支，得马八十多匹，获很多子弹。四大队撤到五指山。[4]

寄望国府　联系中共

抗日救国军虽然突破了日伪几个月的"围剿"，但是到1935年3月间，军需给养已经面临严重困难，枪支子弹很缺，几千人换季服装难以解决。同时，在青纱帐未起的春季，日伪还有大肆讨伐的迹象。孙永勤通过对时势的学习认识，考虑到许多问题，便与其他负责人商讨。他身边的负责人和参谋人员中，除当地人外，遵化县籍的较多，其中既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副官的"大老杨"等。[5]多数人认为关里就是中国，应该通过亲朋关系，向中国政府求援，还应该和已经给过支援的中国共产党联系，取得祖国民众的帮助。于是，孙永

[1] 李志清回忆录。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二十辑）》，第238页。

[3] 张如山回忆录。

[4] 刘秀存回忆录。

[5] 单忠英回忆录。

勤带领几名熟悉遵化情况的负责人和一支精干的尖兵隐蔽地来到黑锅顶、舍身台一带，进一步了解关内情况。通过遵化人的关系与遵化县县长何孝怡进行了联系。何孝怡给孙永勤回了一封信，叫孙永勤秘密地到遵化来，可以支援一些物资，协助抗战。[1]孙永勤考虑何孝怡的态度是真还是假，左右的人们认为是真的更好，如果其中有诈也不怕，“用先把东西拿过来再说的办法对付他”。[2]正在这时，中共遵化县孟家铺区委负责人李子华、马子敬派人给孙永勤送来一些枪支子弹。[3]虽然东西不多，但是通过先后两次的实际支援，孙永勤深深感到共产党人的赤诚之心，便与孟家铺区委进一步联系。原来这时，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正在遵化活动。王平陆来遵化向中共遵化县委负责人骆凤庭、樊凌玺等传达：现在民族矛盾已经高于阶级矛盾，党中央号召全民族抗战。王平陆、骆凤庭、樊凌玺来到长城南侧孟家铺一带，开辟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县委在孟家铺开会，决定支援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让孟家铺区委先给孙永勤送去这部分枪支子弹。[4]接着中共冀东地委派陈玉峰、刘玉林等来孟家铺组织游击队，也要游击队首先联络孙永勤。这时，王平陆赶到遵化的茅山〔毛山〕与孙永勤会面[5]，介绍了全国和冀东的抗日形势，进一步解释了共产党的“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以及政策和策略。孙永勤对共产党一向钦佩，这次又看到王平陆这样有才干、有远见而又平易近人的党的领导干部，更加深了他对党的感情和信任。[6]于是提出两个要求：一要委任，二要枪支和弹药。陈玉峰、刘玉林等立即回地委请示孙永勤提出的这些问题，临走时告诉孟家铺游击队负责人：“你们能把他们调进长城以内，再发给他们东西。”[7]

俘虏栩藤　血战突围

3月末，孙永勤正在长城北侧等待关内消息和侦察敌情。一天晚上，第八大队队长何广永（遵化下港人）带着二十多名战士来到大厂村小石门的农民马永家，了解罗文峪、孤山子一带日伪军情况。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一个留着胡须的日本人骑着一匹白马，后边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从马道沟向小石门这边奔来。他们都带着手枪，见到老百姓就问里边有“胡子”没有。大家都说没看见。老乡马永侦察回来，报告了情况。何广永马上分兵两

[1] 何子桥回忆录。

[2] 何子桥回忆录。

[3] 骆凤庭回忆录。

[4] 骆凤庭回忆录。

[5] 李子华回忆录及《李运昌同志关于热河党史资料的两次谈话》第2页。

[6] 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革命回忆录（第二辑）》，第79页。

[7] 李子华回忆录。

路去包围。他们三人慌乱退到乱石沟口，白马中弹，老日本藏在马后射击。在老日本给手枪压子弹的时候，何广永扑过去把他按住，其他战士也把那两人生擒。[1]何广永回到开庄，把俘虏交给孙永勤。孙永勤立即率队转移到西赵杖子，弄清这三个人的身份：老日本叫栩藤，是这一带各税关署的税关总长，是来罗文峪税关署视察的。那个日本人叫佐佐木，是罗文峪税关署署长。另一个是翻译，叫郑宏彬，东北人。[2]

栩藤通过郑宏彬翻译，央求说："孙军长，请你把我们放回，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你们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全中国！"孙永勤说。

栩藤说："这个，是我办不到的。大军长，我能给你大大的东西！"

孙永勤说："别的用不着朝你要，你给我枪支和子弹吧！"

最后，栩藤答应给一千支三八枪、二十万发子弹。[3]

孙永勤对日本人的许诺虽然疑多信少，但是在自己非常困难的时刻，也抱有一线期望，以栩藤作人质，迫日人就范。他令栩藤写了信寄给罗文峪税关署。因为附近佛爷来村驻着日军，孙永勤嘱咐继续在洒河〔澈河〕一带活动的李连贵赶快再与遵化县长何孝怡联系，便率队押着俘虏转移到柳河寿王坟、梆子沟。几天后，洒河〔澈河〕的日军果然向北搜寻而来。孙永勤又令栩藤给尾追的日军去信，日军撤退。这时，孙永勤通知其他各大队注意防备日军突袭。4月初，孙永勤率主力八百多人东渡滦河，隐蔽地上了老梁。翻译郑宏彬伪装同情抗日，提出救国军这样游动隐蔽，税关署就是给枪给弹到哪来找呢？中间没人联系。他要求让他去操办，保证栩藤许诺的东西尽快送来。孙永勤一时想不出其他办法，便将郑宏彬放走。[4]不料郑宏彬向就近的承德县日伪当局邀功告急。日军第七师团长杉原从承德派出一支日军，调来伪军两个团，又集中伪承德县、兴隆县、青龙县的警察，计三千余人，包围了老梁和五指山一带。

4月中旬的一天夜间，郑宏彬引着五百多日军和六百多伪军包围了老梁。老梁上下只有两条路。一亮天，日军顺着两条路盘山而上，三架日机在空中助战。上山的日军用机枪、烟幕弹、达姆达姆毒弹和毒气疯狂攻击。[5]救国军利用重峰狭谷、密林窿石隐蔽，顽强还击，战斗一天，牺牲九十多人。天黑了，孙永勤带领二十多名攀山能手，悄悄地从东南攀上崖顶，突然猛烈开火，将崖上的三十多日军击毙。用一株长长的大柳树在双峰对峙的峡谷间搭上一座独木

---

[1] 何子桥回忆录及马祥、齐林、齐云等回忆录。

[2] 马祥、齐林、齐云、吴从山、田贵珍、吴从信、徐开士等回忆录。

[3] 史耀华回忆录。

[4] 史耀华、赵廷山、赵廷宏、孙文炳回忆录。

[5]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第31页。

桥，使七百多名战士一个一个地暗渡下山，把两名俘虏也带下来。一天的急行军，撤到王厂沟。已经饿了两天，刚端起饭碗，日军又摸过来。救国军连夜撤到椴树洼，又牺牲了一部分战士。绕路奔平顶山、河口。老乡们说那里驻了几百日军，救国军从驻有日军的臭水湖旁绕过去，插到王宝石，翻到关家沟后堵时天已拂晓。又是刚端饭碗，老乡送信，日军从王宝石上来了。孙永勤愤怒了，说："不能让鬼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样猖狂，打！"他命令一支队伍埋伏在东梁上，日军刚一上山，救国军发扬"还我河山"、"勇者必胜"的正义士气，一片枪声把先头的日军打下去。这边，孙永勤率队来到饮马坑，把住河口南山。一支日军从河口冲上来，救国军迎头痛击。激战一个多小时，毙日军几十人，救国军也倒下一片。身边战友不备，孙永勤突然跃起，扑到阵前连发猛击，头排日军纷纷仰倒。忽然他的腿一热，腿肚子被穿个透眼。军长负伤了！参谋长关元有利用连山回谷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战士们抬着孙永勤，天黑以后撤到张杖子马架沟，打退一支伪军的阻截，连夜上广东山。从撂荒地下去，到黑河的华鱼沟〔化鱼沟〕又突破伪军的一道防线，拐进森林区南大台，这才甩掉敌人。为了迷惑对方，于是横跨一脉大山脊，通过几十里没有人烟的大分水梁，绕到大山村老窝铺宿营吃饭。休息一天，隐蔽地插到洒河〔潵河〕畔的青杏沟，与李连贵的第四大队会合。[1]抗日救国军这样"铁流"般的艰难突围，表现了孙永勤、关元有、赵四川、王殿臣等领导人的军事才能。既使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不能不承认驻热河日军杉原师团的失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这样表露："该方面山岳重叠，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故讨伐殊难进展。缘此方面，有自称救国义勇军之孙永勤一派，受国外援助，时出入于长城内外。前此虽有驻屯之杉原本部队之讨伐，而该匪巧避锋锐，势力得渐次增大，现在号称一千。……"[2]

被迫进关　寻求支援

1935年5月初，孙永勤在青杏沟一带就医。孙永勤一上火就肿嗓子，头痛，说不出话，就得请人用铜钱把身上刮紫才好些。在这里，孙永勤等与李连贵商量进关的问题。李连贵见军长伤病好转，便详细汇报情况。自上次孙永勤走后，李连贵又派小队长单忠英等去遵化与何孝怡联系。当时（4月中旬），遵化县东北部松棚营、小厂一带正遭受马拐子、滚地雷等土匪骚扰，居民们拖家带口逃难到县城，恳请县长为民除害。何孝怡同情抗日，又忧于匪患。[3]因为土匪出没在离县城较远的一带深山，就在闭塞的长城南侧，于是何孝怡与单忠英等秘密协商，邀请救国军秘密来遵化东北部剿匪。单忠英等提出枪支子弹太缺，何孝怡说明："河北省已经

[1] 史耀华、刘秀存回忆录。

[2] 1935年5月27日《大同报》：《关东军司令部之发表》。

[3] 遵化县委党史办编：《遵化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一）》，第66页。

答应拨给剿匪用的枪支子弹，马上就运来，两三天就发给你们。”几日后，何孝怡还是解释很快就会运来。又等了几日仍然没有运来。[1]李连贵实在等不起了，于4月末的一天，先通知何孝怡，第二天他派出两个小队二百多人进了马蹄峪，计划去粳子峪西山打马拐子土匪。当队伍奔到松棚营西梁上，迎面来了几个人，拿着何孝怡的名片，说何县长传话："情况有变化，不要再打马拐子了。”二百多战士又撤回青杏沟。谈了上述情况，李连贵提出不知遵化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大同意全军进关，只好说等等别的大队长来了再说。[2]这时（5月4日），张福义、康永贵、何广永率八百多人进占承德县下板城附近，一度攻打临近承德的敌据点。杉原急调古北口日军及察东伪军李守信部向承德增援。[3]赵四川、王殿臣派人星夜给张福义等送信，速来青杏沟集中。

此时，日军已作更大规模的部署。5月初，日军松井部出洒河桥〔潵河桥〕西进，奔遵化东北部；古北口石井部五百多人经石匣出长城墙子路口东进，先从北面攻击救国军，再奔遵化西北部；〈日方〉并调日军川岸部的两个联队进占罗文峪，在洒河〔潵河〕北山一带设司令部。计五千日军，一千伪军，布成西、北、东三面包围救国军之势。唯南面长城北侧一带不驻日军、可见日军已设下逼孙永勤进关的圈套。5月5日，救国军仍在青杏沟一带的时候（这里在长城以北，离长城还有二十五至三十华里之遥），驻清东陵马兰峪日军警备队长岩永为追击救国军，奉命通知遵化县保安队撤退至长城南二十五华里处。保安队以二十五华里处已在遵化县城以南为由，经交涉，撤十五华里。日军蓄意把决战战场推进关内，其故意牵涉遵化县府的祸心已昭然若揭！

孙永勤在青杏沟一带集结救国军，准备进关的军机，被他的亲兵吴恒山得知。吴恒山的亲兄弟吴恒泰（小寺沟人）在下板城伪警察署当警察，他秘密通知吴恒山，日军正用重兵包围孙永勤，让吴恒山赶快拉一部分人反水回来，只要把枪交给他就既往不咎，还说明这是警察局长给他的任务，他可以担保。吴恒山见大事不妙，便暗中活动，蒙蔽许多人，一天夜里他拉着二百多名救国军战士逃回车河西华鱼沟〔化鱼沟〕。在义德堂粉房大院里，将带来的六十多支大枪交给了吴恒泰。交枪之后，吴恒泰突然带着警察绑人。大家一看，才明白是中了奸计，一哄而散。[4]

孙永勤发觉这个问题，正恼火间，逃跑的一部分战士又返回来报告了经过。众领导人抓住这个事例向全军进行只有抗战到底才有出路，逃军回家是自取灭亡的思想教育。这时，又有洒

---

[1] 单忠英回忆录。

[2] 刘秀存回忆录。

[3] 1935年5月7日《新闻报》。

[4] 史耀华回忆录。

河〔澈河〕川的民团四十多人和许多贫苦农民加入抗日救国军，从而稳定了军心。几天后，张福义率第一大队、何广永率第八大队、康永贵率第九大队赶来会师，全军仍然集中一千七百多人。孙永勤的伤病渐好，便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已是栽红薯的时候，可是救国军战士还多穿着棉衣，境遇非常困难，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会议上决定还是全军进关，寻求支援。[1]

5月11日，日军山田队从北部向救国军进攻。救国军且战且移，15日，分两路南越长城。一路进洪山口，驻尤山口、三道沟一带；一路进马蹄峪，驻大屯、侯家寨一带。一二日后，一小部继续进关。16日，救国军一部翻过九虎岭进驻小于家沟〔小于沟〕、柴禾厂〔柴户场〕、王家沟一带。这时，《大公报》报道："16日，喜峰口外突由热河开到义勇军一千三百人，号称抗日第一军，首为孙有琴（永勤）。所部非常整齐，枪支齐全，且有具双枪者。现驻于深山中，夜出昼伏，并出布告安民，时有宣传队向人民演说，称决不骚扰乡民，所有粮食由自备。二日来确未向民间索食。只于16日夜将富户李之桂等请往，借款二千元。16日晚曾与日军接触，战约四小时，义勇军即避往山中。日军未敢穷追，用机侦察，亦无结果。闻日军死十八人，伤二十六人。"

17日，孙永勤带伤乘马率十几骑驰至遵化城下。城上保警见状，急速关闭城门，架上机枪。孙永勤搭话："弟兄们，我是抗日救国军的孙永勤，何孝怡县长有信让我们来……"城上有人回话："这里没有枪支，你们快快回去。"这天夜里，中共孟家铺区委负责人李子华、孟寿田（冀光）与孙永勤会面，带来很多宣传品，通报了马兰峪日军蠢蠢欲动的消息，建议孙永勤再不要白天骑马进城，警戒敌情，注意隐蔽。说明陈玉峰、刘玉林去地委汇报尚未回来，部队的供给问题，我们再向地委、特委火速汇报，尽快解决。同时，把一张委任孙永勤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军长、委任王平陆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政治委员的委任状递予孙永勤。孙永勤很高兴地接受了委任状。[2]李、孟急于回去先筹集一部分枪支子弹，当夜告辞。

孙永勤对何孝怡态度的突变很气愤，已知日军大举来围，军需追急，18日上午将李连贵的五百多人调到城东十五里西小寨一带，其他大队调至般若院一带，并派马保德、何广永等急去东双城、下港等村再次购买子弹（已经在东双城买了一部分子弹）。[3]

18日中午，孙永勤让李连贵挑出十七名精干战士，由四大队稽查长徐连芳带队，每人都背着一背藏着大枪的干草，后腰掖着手枪，去遵化城里卖草，目的是去县政府把何孝怡抓出来，以质问、逼迫他供给军需。午后歇头晌时，这十八人进了遵化城东门。门前站岗的保安队发觉

[1] 单忠英回忆录。

[2] 李子华回忆录及《孟家铺村史》。

[3] 何子桥回忆录。

这些卖草人来的蹊跷（平时农民都是一早进城卖柴草），而且都是气宇轩昂的壮汉，引起怀疑。当十八人走到东街陈家饭铺门前，东城门关闭。徐连芳警觉是暴露了，便带队快速转移到南门。南门也正在关闭，徐连芳打倒一名保警，率十八人夺门而去。随后城门上响起一片机枪声，但一人未伤，返回西小寨。傍晚，一个戴着大草帽的人来西小寨，面见了孙永勤。19日早饭后，孙永勤又派两个人进城给何孝怡投了一封信。傍午，从县城方向来了一辆花轱辘大车，两个面色白皙的人给孙永勤送来两千斤大米、两箱子弹、几支枪，还有猪肉。[1]午饭后，李连贵大队奉命向大寨转移。

20日晨，遵化县警队来般若院一带，摆开攻击救国军的阵势。孙永勤亲至阵前质问该警官："请问您是中国人还是日贼？真是中华民族，请讲明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可以自杀。如果你是日本人，我要杀掉你们！"该警官良心未泯，率队回城，闭门不出。[2]是日上午，有汽车二十余辆，载日军二百多人，携钢炮、机枪多架由洒河桥〔潵河桥〕抵遵化城。日军队长山田再二大佐蛮横逼问何孝怡："已通知你们由中国侧讨伐之，为什么不行动？如24小时再不讨伐，日军即取自由行动！"何孝怡对答婉转，左右逢源，谅悉而退。[3]下午2时，山田队由城内出发至般若院一带，用钢炮、机枪攻击救国军。救国军锐气不减，寸土不让。双方接触，战火激烈。到21日上午9时，仍在相持中。遵化城门竟日关闭。[4]是日午间，救国军全部转移至大寨北华山一带。日队长山田驰回洒河桥〔潵河桥〕，向日军战地司令官川岸报告。[5]

茅山〔毛山〕被围　宁死不屈

21日下午，在大寨后华山，孙永勤抱病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在内无供给，外无援军，主帅病重的困境下，许多人主张部队继续南去，投奔中国政府的国民军。这时，中共遵化县委之前派来的军事干部徐英早已不在军内。地下共产党员张志全已任军稽查长，部队进关后他协助关元有做了大量挽救危机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关元有、张志全反复说明对国民党的国民军不能抱这样的期望，尽力主张乘日军尚未缩小包围圈的时机，突破其薄弱环节，迅速插回五指山区。但是多数负责人对冀东自《塘沽协定》后划为"非战区"的内幕不明，仍然认为冀东的政府是中国的政府，总不能不收留抗日的救国军。因而，会议还是决定南去投奔国民

[1] 刘秀存回忆录。

[2]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第32页。

[3] 1935年5月27日《大同报》。

[4] 1935年5月22日《大同报》。

[5] 1935年5月27日《大同报》。



军。会议后，张志全暂时离开，急去向上级党委汇报。[1]

22日下午2时，救国军南下至尖山屯、七户东山一带，首先遇到当地民团阻截。救国军不肯与民团动武，放些空枪，已迫民团后退。但随后有日军山田部队一支队与河北省特警第一总队张庆余部的两个中队堵击过来。救国军愤怒迎战。在愈战愈烈的情况下，救国军俘虏了无民族情肠、助敌阻击的民团十余人。战至下午六时，救国军为节省子弹，向东转移至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皇阁村、马甸子一带。[2]在上述尖山屯一带激战的时候，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风庭派共产党员阎龙前来与孙永勤联系。遵化县委拟将南北堂村的枪支动员出来支援救国军。阎龙来到岳各庄，北边正在战斗，无法接近，未能联系上。[3]

22日晚，侦察员和当地群众报告：皇阁村、马甸子的东面、南面都有大量的河北省特警队和民团堵截。孙永勤已知南投无望，便指挥全军连夜从景忠山侧、白马峪两路向北转移到茅山〔毛山〕东麓的深山区小于家沟〔小于沟〕、柴禾厂〔柴户场〕、王家沟。军部驻在小于家沟〔小于沟〕老乡吴凤忠家。孙永勤伤病严重，已不能行动，出入由亲兵们用椅子抬着。夜间，派出一个大队翻过九虎岭至头道城子侦察。[4]

23日，孙永勤在小于家沟〔小于沟〕召开紧急会议。[5]经侦察，九虎岭以北有大量日军封锁；东面的日军已逼近东山；南面河北省的张庆余、张砚田、周毓英三个特警队的六个中队及保安队、民团计四千余人堵截了三屯营、鸡鸣村、三里店、般若院一带；只有茅山〔毛山〕西北方面的日军尚在长城南侧一带。众负责人在会议上揣测，日军和国民党的军队紧缩包围圈的意图是压迫我们上大茅山〔毛山〕。有人主张从东南特警队防线突破，去迁安悬呼山。关元有认为必须赶快绕茅山〔毛山〕南麓，再暗暗绕向西北，从日军石井队疏散的围拢中间，钻空子穿插到口外，回五指山区。[6]军师郝世祥〔郝敬义〕说：”我推了几次八门，往南往东是生门，往西往北是死门！可不能往西往北走哇！”[7]孙永勤说：“事到如今，不能再信什么生门、死门了！”[8]他沉了一会儿，最后决断：“我们不能再向南突围，如果南去，日本又要借口进

[1] 单忠英回忆录。

[2] 1935年5月24日《大同报》及《大公报》。

[3] 阎龙回忆录。

[4] 吴凤忠回忆录。

[5] 吴凤忠回忆录。

[6] 孙文炳回忆录。

[7] 李志清回忆录。

[8] 李志清回忆录。

占华北了。今天夜里，分两路冲回热河！”[1]有人提：“现在就把栩藤、佐佐木枪毙。”孙永勤说：“留着，他答应的东西还没给呢！”[2]

午后，关元有、赵四川、王殿臣、马保德等围护着孙永勤，率军部直属队及几个大队的现有人员四百余人，沿茅山〔毛山〕东麓向南出发。经陡岭子西转，至吴家沟村南，邀请在地里薅梗子的老乡陈安良带路，说明走小道，奔傅家城、驸马寨出甘楂峪〔甘查峪〕、片石峪口。下午5时以后，队伍到三里店北部山根，发现山梁上有十几个人持枪正在换岗，是民团。孙永勤派人上山联系，要求借道通过。民团不敢答应，要向连长请示。连长在三里外的松棚营。赵四川等众负责人考虑：这一带已经封锁，民团后边必有特警队或日军。如强行通过，一鸣枪，敌人就要来围。这里离长城口还有几十里路，不能一冲而去，这样不仅这一支受阻，那一支也要受阻，不能再冒险。况且，时下军长伤痛正剧，先到村里商量一下。于是救国军返回吴家沟吃晚饭，天黑后又下起雨，临时决定先在这里宿营，夜里侦察下情况再说。[3]

另一支救国军是第四大队和八、九大队少数战士计五百多人，由李连贵、年焕兴等带队，于23日傍晚从小于家沟〔小于沟〕西的王家沟出发，沿山脚奔楸花峪〔秋花峪〕——茅山沟〔毛山沟〕——小厂，绕过松棚营——西沟，入夜到黄花峪宿营。军直队的路线是绕大茅山〔毛山〕的外圈，离特警队较近，因而受阻。李连贵部绕大茅山〔毛山〕的里圈，没有受阻，向西北插进较远。

后半夜，日军山田队二百多人乘多辆汽车突然冒雨从南驶来，越过特警队防线直奔吴家沟村西。此刻，特警队内有人先鸣了一枪，起了给救国军报信的作用。接着日军立刻从西头向村里攻击。救国军仓猝应战，迅速撤进村东的茅山沟〔毛山沟〕。日军追击时，先头的几名日军被打倒。日军便用机枪、钢炮向沟里轰击。救国军被迫上了茅山〔毛山〕。

24日拂晓，李连贵、年焕兴率领的一支救国军从黄花峪奔房山沟，发现房山外边山上有日军（是石井队前部）。救国军拐进小山沟。日军发现开枪，李连贵率先头部队抢上山头，猛烈反击，已迫北山日军后退，从南山又袭来一股日军。李连贵素有“神机”之称，不与日军恋战，指挥部队分几路快速西插。再遇日军，只距五十米，李连贵率一百五十人集中火力攻击、掩护，令其他数路再绕进。几战几旋，速战速转，前锋与殿后部牺牲、散失几十人，李连贵率主力突围出关。[4]散失的战士，以后有二十多名于侯家寨西小河被日军集体屠杀。

相继，石井队从西北向茅山〔毛山〕穿插，川岸联队主力从北面向茅山〔毛山〕包围，

[1]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第32页。

[2] 吴凤忠回忆录。

[3] 陈安良、孙文炳回忆录。

[4] 刘秀存回忆录。1935年5月27日《大同报》。



松井队从东面向茅山〔毛山〕兜进，山田队从南面向茅山〔毛山〕轰击。此刻，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等保护被人用椅子抬着的孙永勤已登上山顶，并指挥部队占据了头道茅山〔毛山〕、二道茅山〔毛山〕、三道茅山〔毛山〕，凭着二十九军长城抗战时在此修的战壕固守。孙永勤毫无惧色，只是长叹一声，深情地对关元有说："我们已经弹尽援绝，我在这里吸引敌人，与日贼作最后一战。参谋长可率领一部快从西面突围。"关元有一时热泪盈眶，慨然回答："中国人理应为中国死，只是我没能给您当好参谋长！我与军长在此一同报国，请派他人率队突围。"[5]于是孙永勤命令赵四川、王殿臣率队西突，枪声震山，火光乱窜，救国军两路分开。上午七时，飞来两架日机，绕山低旋，不时地从机仓里出现日旗。这是日军战地司令官少将川岸文三郎在向地面日军指示救国军分布位置，并投下通信筒，通知山田："可安心，吾已确实包围敌人。"[6]随即日军从马台子、关台子〔官台子〕、九泉山等地向大茅山〔毛山〕长时间地炮击，掩护日军抢占制高点第三道茅山〔毛山〕山头。日军在制高点上用多挺机枪向下扫射。这时，孙永勤在头道茅山〔毛山〕尖东北侧的坝墙洼亲手枪毙了栩藤、佐佐木，接着扑在战壕上，用他那百发不碍的大号匣子枪向日军猛烈射击，与关元有并肩指挥誓死不离开他的二百多名战士，多次击退山田队、松井队的逼近夹击，击毙日军官田边少尉以下多人。日军只得再用炮火向大垴沟轰击，仅这一条沟里，救国军战士牺牲二百多名！然而，日军仍不能接近，飞来一架日机助战。酣战到中午12时15分，孙永勤、关元有等同时被飞机扫射射中，壮烈殉国。[7]全身均被机枪所伤，遍体血肉模糊，硬以血肉之躯与飞机钢炮拼搏到最后一口气，真是"惨矣！烈矣！"

赵四川、王殿臣等领导人均已前仆后继英勇献身。至下午2时，除少数突围，三百多勇士全部阵亡。[8]然而，在日军搜山时，仍然遭到一处处的伏击。茅山〔毛山〕东坡隐蔽着一名战士，一连击毙几个日军，子弹打光后，撞山石自尽。一名战士突围来到东麓楸花峪〔秋花峪〕农民李福尊院里，看到门外有三个日军过路，连续开枪将三个日军击毙。后边的日军来这里报复，把李家的七人惨杀六口。[9]日军又到曾经几次驻过救国军军部的小于家沟〔小于沟〕的柴禾厂〔柴户厂〕自然村大屠杀，惨杀男人三十多口，烧毁房屋数十间，该村成了寡妇村。（马宝德〔马保德〕突围，于东双城子被捕，在马兰峪日军队部被惨杀。）

日军撤走后，附近乡亲们上山掩埋救国军尸体。许多殉难者仍然咬牙切齿，圆睁怒目，紧

[5]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第32页。

[6] 1935年5月27日《大同报》。

[7] 1935年5月29日《益世报》。

[8] 1935年5月27日《大同报》。

[9] 王俊成、王俊山回忆录。

握木石。人们在东坝墙洼发现了抬过孙永勤的椅子，发现了衣内绣有姓名的孙永勤、关元有的无头遗体。乡亲们痛泪掩埋，凭吊忠魂，特意在孙永勤墓前栽上松树，永久缅怀。

民族英雄　永垂千古

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会见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以刺杀天津二亲日社长事件为口实，以孙永勤部进入“停战区”，受到遵化县接济，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提出各种无理要求。7月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1935年8月〔10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树名〔提名〕赞扬的十一位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之中，孙永勤的名字赫然在列。宣言指出：这些民族英雄表现了“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证明了“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这年秋季，中共遵化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在口外兴隆县冷嘴头大青山召开会议，沉痛地总结了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在遵化被“围剿”的经验教训。[1]

孙永勤部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是，他在国民党中央当局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情况下，毅然挺身而出，创建抗日救国军，与凶恶的日军血战一年半之久，攻克日伪据点一百多次，毙伤俘虏日伪军五千多人[2]，在兴隆、承德、遵化、迁安、青龙、平泉等县点燃了弥漫的抗日烽火，激发了人民大众抗日救国的决心，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能泯灭的。

他的许多战友在茅山〔毛山〕突围以后继承了他的遗志，百折不挠地继续与日军血战。第一大队长张福义回到承德县、兴隆县又组织百余人的“抗日保国军”，抗战到1937年7月殉国。第四大队长李连贵回到长城北侧洒河〔澈河〕川，率领五十多名救国军战士继续游击，1936年2月就义。第八大队长何广永突围后被捕，在通州监狱逃跑出来，1937年继续抗战，1938年参加冀东大暴动，委任地方除奸大队长，被坏人暗害。第九大队长康永贵突围后去杨二部，1938年参加冀东大暴动，攻打伪倒流水警察署时牺牲。前第二总队长、后任中队长的年焕兴，茅山〔毛山〕突围后隐蔽活动，1938年参加宋邓纵队，编入包森领导的第二支队。1939年他与战友配合，在遵化活捉日军赤本大佐。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战斗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说明孙永勤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冀热边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孙永勤的事迹，永远镌刻在冀热边人民的心里。

---

[1] 骆凤庭回忆录。

[2] 朱呈云：《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



燕山滦水系英魂[1]

——记高存烈士

张书明　陆占山

遵化县铁厂镇东北有个小山村，跟迁西县搭边，叫北店，1893年，高存就出生此地。他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工作认真，执行任务毫不含糊。他在弟兄辈里排行老四，人们都爱称呼他“四老严”。律己特严，确实是他的性子。在他经常活动的迁西、遵化、兴隆一带，提起“四老严”，差不多家喻户晓。

高存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为求活命度日，他年轻时，曾在赵各庄煤矿下过窑。不堪资本家、工头儿的欺凌压榨，后来返回老家北店村。那几年，高存老是没明没夜地往外头跑跶，做秘密串连。北店距离迁西县的陈庄子、西庄仅有10里左右，他很快便和西庄的魏春波交上朋友。随着又结识了上梨树峪的王平陆（高永祥）及孙才等同志。在他影响下，他的亲兄弟高升（外号“大老严”）也在1933年加入党组织。

魏春波、王平陆都有文化，能写会算，高存比不上他们，但彼此禀性相投，志向一致，在一起有说有唠的，再亲不过了。正因有这种关系，王平陆他俩发展了魏春波入党。魏春波患痔疮，整在高存家里养了一冬，都是高存给他洗烫，给他搽药。王平陆、苏林彦也常到高家来，只要一进屋，高存就叫妻子王秀荣找出吃的，然后立时到院外放哨，以防走漏风声。

1927年春天，高存、高升哥儿俩参加铁厂农民暴动，因事前失密，未能成。伪县政府将高升等百余名农民抓捕入狱，高存外出幸免。在狱中，高升结识了因盗窃案误入监狱的驴儿叫村（当时属遵化县管辖）的贫苦农民窦永旺。1928年7月一同获释。

1929年冬，高存接受京东特委的派遣，由高升当向导，以皮货商人身份来到驴儿叫村，找到窦永旺，向他继续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窦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从此，经常向高存汇报情况。1932年2月27日，高存再次来到驴儿叫村。在窦家，根据窦永旺的志愿，宣布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遵化北部山区最早的共产党员。

1933年1月，经窦永旺介绍，驴儿叫村的贫苦农民周凤鸣、葛永等人入党。1936年，驴儿叫村已有七名党员，成为遵化城北党支部的一个党小组，到遵化城南的龙湾、梁屯、团练屯等地过组织生活。1937年1月，高存以冀热边特委工作人员的身份在遵化城南河套召开的城北支

[1]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123~128页。

部大会上宣布："驴儿叫村的党员今后不再来遵化城南过组织生活，单独建支，归冀热边特委直接领导。"这就是经过高存的努力，为后来的兴隆县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高存不畏艰险，不惧牺牲，广泛活动在迁西、遵化北部和兴隆东南部地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武装，壮大党的基层组织。1933年，他曾深入滦河川王宝石村，发展抗日青年关元有入党。

1933年9月下旬，由李葆华、李运昌、王平陆等冀热边领导同志在迁西上梨树峪成立"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高存和高进忠为游击队在遵化方面的领导人。这年冬季，高存、高升哥俩和李运昌、高进忠等同志发动了莫家屯、北店、高拔岭一带的各村党员和积极分子，准备搞一次农民暴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夜里，他们把人聚集到莫家屯北大岭上开会，事先贴了布告。这天，正赶上铁厂的巡警到北店征款，发现墙上的公告，结果连同那块墙皮都给揭走了。夜晚，各地巡警和当地民团包围了会议地点，把开会的人追得五零十散。在那天夜里，高存跑回家来，家人催他躲避起来，才得脱险。

莫家屯会议被冲散以后，高存等人并没被敌人吓住，而是再接再厉干下去。这次他们接受教训，行动更加秘密了。家里遭搜查几次，风声很紧。有时他从外边回来，也不直接进家。离他家不远处有座坟堆，凡是遇有情况，家里人便在坟头上压块石头，作为信号，高存见了，绝对不进村。转来转去，高存跑到滦河北上梨树峪，参加了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领导的游击小组。白天隐蔽，夜间活动，经常出没在迁、遵、兴三县交界的深山密林里。镇压汉奸特务，偷袭日寇营地，捉拿关署税官，组织发动群众。这年10月，高存同高升一起到驴儿叫村，以党员为主体组织农民武装，建立游击小组，并在獐帽山一带打游击。他们活动和工作过的地方，后来形成我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那时环境险恶，生活非常艰苦。有一年夏天，高存和游击小组的同志一连五六天没吃上饭，也没住着房子，为避开团警追捕，到处落脚。幸亏山区有点青瓜绿枣，山坡上趴着大窝瓜，他们就靠野果瓜菜充饥。赶上一户人家，住下了，可这家也没粮食。房东看他们饿得可怜，就扒了白薯炕，把出了秧的白薯吊子蒸蒸给他们吃。十冬腊月，他们穿不上棉衣，睡不着热炕，风行野宿，手脚冻坏了，脸冻烂了，耳朵冻瘪了，都落下残疾。

妻子王秀荣看丈夫熬煎成这个样子，家里老婆孩子顾不了，连脑袋都快保不住了，又心疼又埋怨，劝他别再往外瞎跑了。哪知这句话竟惹出火来了："你四奶奶（当地习惯语，似尊实贬）要反对我怎么的？今天我非劈死你不可！"说着，高存抄起斧子就冲着妻子砍去。妻子一躲闪，没挨着，结果他更气顶了天。一边骂一边追，非要弄死她才算完，幸亏有人拉着拽着，才得救。他还骂了大半天，也不开晴。妻子知道高存最喜欢孩子，把四五岁的小闺女菊子当成"眼前花"。妻子就叫闺女去劝他。菊子年龄虽小，却很伶俐，贴到高存怀里，说："爸爸，你



砍死我妈，谁养活我呀？要是没妈了，谁可怜我呀？”菊子这么一劝，反倒把当爹的眼泪给劝出来了。孩子搂住他的脖子，爷俩都哭了。打这之后，妻子算是锤子剃头去了根，再也不敢拉后腿。

1937年上半年，高存又到赵各庄活动一个时期，组织工人长工资的斗争。这年冬季12月，冀东区党委多余屯会议召开，王平陆组建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高存率领兴隆地区李洪山等六七人参加了这个支队。首袭遵化城东北茂陵山麓的极乐寺警团局子，缴获长短枪30多支。1938年1月8日又攻打宽城青河〔清河〕沿日本警防所，收缴长枪十支，短枪三支。战斗中王平陆同志牺牲。随后，支队40多名指战员在迁西三十二岭村集合，李润民（原四方面军团政委，受北方局委派来冀东训练军事骨干）根据上级指示，宣布高存任政委，带领支队继续在长城一线活动。这期间，滦县路南的张鹤鸣、张振宇等18名同志也参加了支队。决定攻打药王庙（今佛爷来）警察署。一天傍晚，队伍在孔庆同（原红军营长）、彭夫、高存和周治国率领下，从迁西县西庄村出发，路过黑洼出龙井关，在兴隆县一个小山村隐蔽一夜。后到李洪山处住了两天，队伍进一步扩大。待侦察的同志回来，掌握了日伪据点内部实况，支队便连夜直奔药王庙，一举包围庄东头的警察署，内里有30左右个警察。打了一阵，敌无动静，就索性把九间草房付之一炬。此役毙敌三人，打伤三人，生俘一人，缴大枪七支，我仅一战士（魏春波的侄儿）负伤。撤出战斗后，兴隆有几百敌军包抄过来，一直尾追了三四天，最终全队突围奔上遵化茅山〔毛山〕。

目标需缩小，实力要蓄积。支队开始分散活动，化整为零到各县境内打游击。高存同李润民、孔庆同去丰润、遵化交界地带执行战斗任务。各个游击小组，按照支队统一部署，在冀东腹地组织地方武装，抓汉奸，掏特务，除恶霸，袭击日寇据点，收拾效忠日军的朝鲜浪人，砸白面（毒品）馆，收缴敌伪武器，历尽艰难困苦，不断扩充战果。培养了抗日骨干，装备得到改善，为参与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积累了斗争经验。

1938年7月，冀东掀起抗日武装大暴动，二十万工农齐踊跃，在日寇统治较为薄弱的抗战深后方，遍地义旗高举，以摧枯拉朽之势，四面出击。高存等人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分散各地的游击小组都成为大暴动的中坚。李润民、张鹤鸣、张振宇在滦县，魏春波在迁西西庄，孔庆同在迁西新集、遵化铁厂，高存、高升在兴隆大洼、宝地、厂沟一带，都拉出几百以至上千人的队伍，并给八路军第四纵队当向导，带路入关。7月8日，高存与高进忠率500多人投入暴动洪流，编为特务第二大队，高存同志任大队政委。高进忠在丰润下水路村作战阵亡，他带上队伍继续转战。10月过后，暴动队伍随四纵西撤，日军在中途围追堵截，暴动队伍失散严重。高存同志率部转入地下，长期秘密活动在迁西、遵化境内。

大暴动兴起的那段时间，革命形势红红火火，当地日伪势力一下子打了蔫儿，龟缩在据点、县城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回，高存骑着高头大马拉着队伍开到北店村。他把同志们让进家

来，大伙都称呼高存“高司令”，彼此笑脸相迎，扬眉吐气，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这时妻子王秀荣才明白：丈夫对她那么严厉，劝也劝不了，拦也拦不住，宁愿跑东奔西，找苦吃，讨罪受，原来就是为了抗日救国呀！

然而，高存并没有看到抗日的最后胜利。1941年7月，高存担任迁遵兴联合县的区委书记，在澈河桥、三屯营一带开展抗日工作，夜宿龙湾村，因坏人报密，突遭日军和治安军包围。突围中，高存身负重伤，不幸被捕。敌人妄图由他嘴里得到我方机密，用尽各种酷刑。扒光他的上衣，不让穿鞋，拿他当牛马，打着骂着，用绳子拉着在山沟里跑。身子刮破了，脚扎烂了，一连饿了几天！任凭敌军这么折磨他，拷问他，高存心不回，志不改，仍然铁嘴钢牙，最后朝魔鬼们说：“只要我活着，就要搞革命工作，决不向你们投降！反正我年岁也大了，要死就死，死也不说！”鬼子汉奸无计可施，于是下了毒手，把高存同志残酷杀害。随后，于1942年，遵化夏各庄、板城、高拔岭、北店等村的反共自卫团联合行动，其兄高升也被抓捕，他以弟弟为榜样，至死不招供，同样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

高存生前为迁遵兴地区发展党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往无前、舍身拼搏的精神有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鼓舞后人接力奋斗。他的英魂长留家乡的燕山滦水间……



樊凌玺[1]

陈　述

樊凌玺，化名樊作一。1910年生，遵化县东草场人。1932年，经单福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在洪山口、洒河桥〔潵河桥〕一带发展党组织。1938年，投身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同年10月，与丰玉遵联合县政府机关人员随八路军第四纵队西撤。平西受训后，调任挺进军师教导员。1940年，奉命去平北开辟地区，任滦（滦平）昌（昌平）怀（怀柔）办事处工委书记。1942年3月，在驻地遭日满军包围，力战突围中壮烈牺牲。

人民公仆　抗日先锋[2]

——记张志全烈士

白振国

一

张志全，曾用名张重禧，化名吴有思，1884年生，遵化县东下院寺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村党支部书记，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区委书记，中共遵化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和冀东区农会主任等职。1947年农历三月，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时不幸被捕，备受敌人摧残后，于同年农历五月牺牲，时年62岁。

张志全出身于一个贫寒家庭，从小就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27年10月，和丰润县西部的农民一起参加了玉田暴动。同年，经张润之（又名张洪恩，原为天津第一师范学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曾以遵化县的党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共顺直省委在唐山召开的京东各县“活动同志会”，会议作出了加强党的工作和农运工作的

[1]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135页。

[2]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255~260页。

决议案。2月后，张志全任中共县委书记［原文如此］。1931年5月，他又参加了京东特委在马兰峪召开的迁、遵、蓟三县党代会。会议作出了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农民觉悟、发展党组织、建立人民武装的决议。会后，张志全以走亲访友为名进行串联，在池家屯、葛家屯、石佛林、杨官林一带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发展新党员。通过他的反复宣传，多次工作，使更多的人们懂得了革命道理，接受了共产党主张。经张志全介绍，赵光、谢元里、高尽中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这些人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张志全在党的领导下，以买狗皮、卖药、卖袜子等职业为掩护，经常到杨官林学校附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张志全在家乡一带，积极讲抗日救亡的道理。1933年农历九月中旬，国民革命军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队经过杨官林时，张志全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他和小学校长、共产党员张荣轩带领人们亲去驻地慰问，大大鼓舞了军队的抗日热情。

1934年5月上旬，揭竿而起的民众救国军〔民众军〕军长孙永勤召集各路民众军集中于兴隆县五指山双塘子一带。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军事干部徐英和地下党员张志全到五指山与关元有接头，并以遵化县爱国群众的身份与孙永勤会晤。向孙永勤介绍了关内遵化、迁安、丰润等地的抗日形势，很策略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进而建议孙永勤应从"均富济贫"发展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加强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以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孙永勤的眼界跨越了百里关山，政治思想急剧升华，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张志全、徐英的意见，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更新旗帜，改编部队。请张志全负责军直稽查处工作。

1935年，张志全为了谋生，曾给杨官林村大地主杨峨如护院。张志全对地主剥削农民记恨心中，总想找机会给穷人出气。于是，他秘密组织雇员，开展向地主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地主为了拔掉这个"祸根"，把他开除了。不得已，迁到池家屯村。

到池家屯村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在村中秘密发展党员，从事革命工作。1936年，他担任池家屯村党支部书记。为了工作方便，他在村东坡坎盖了两间厢房，定居下来。从此，他的家成了我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丰润、玉田、遵化三县革命干部常在他家召开会议或住宿。他全家六口人，本来生活就困难，尽管这样，他还千方百计让干部们吃饱，而他家人只好用野菜充饥。

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50多岁的张志全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常常几个月要连夜召开会议，布置抗日工作。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先后参加了抗日工作，并有一个



儿子、一个女儿在战斗中牺牲。大儿子张守成在遵化城内为日本满铁公司当伕役，张志全经常指派他为我党采购医药，搜集敌伪情报。张志全经常带冀东党政军的领导在那里居住或召开会议，张明远、李运昌、李楚离、包森、伍仁、彭来等人曾在这里隐蔽过。

张志全为党和人民事业什么都豁得出，而他自己穿蓝布大褂，补丁摞补丁，满身油腻。正是如此，而不被敌人注意。他来去匆匆，就连家里人也很难找到他。1938年冀东革命大暴动开始后，张志全和管长青、合群等人在遵化狼山关村组织了暴动队伍，他任大队长。7月，与地北头洪麟阁部会合。暴动队伍西撤受挫后，张志全回到遵化县城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一次，他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他"发疯"似的用炉钩子痛打审讯官，敌人误以为他患了精神病，就把他放了。释放后，他并没回家，而是去找党组织，继续为党工作。

1940年1月后，他任中共丰玉遵联合县工委二区区委书记，和区长余尚三（郑旭）在家乡一带秘密建立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那时，县区没有妇女干部，张志全就负责组织妇女工作。

1940年秋，他在本村建立了妇女报国会，又在邻村杨官林建立了妇女抗日组织。他召集赵青、泽生、茹林、吴庆林、孟毅然、张兆生等人开会，揭露当时社会黑暗和不平等，号召妇女必须组织起来，反对剥削，反抗压迫，要放足剪发，争取妇女解放。

张志全宣传抗日救国，方法多种多样。他借去沙流河赶集的路上，把事先印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传单压在土块底下，让来往行人传看。他还利用村中操办红白喜事人们集中的场合进行宣传。

从1941年起，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对华北根据地实行"强化治安"。同年3月，敌人调重兵对冀东进行大"扫荡"，斗争空前残酷。当时，在阎家铺道北和杨官林村南有两个炮楼，各有一个排的"治安军"把守，一个炮楼的排长叫唐之权，另一个排长姓柳。这两个炮楼，对我方活动非常不利。张志全与区长余尚三研究决定，拿下这两个炮楼。他通过关系先与唐之权取得了联系，做通了工作。一天夜里，由张志全、余尚三带领吉祥、范如、银杰等五人将唐排长接应出来，接着由唐带路，顺利地攻下了扬官林村南的炮楼，缴获两挺机枪、48支大枪和手榴弹与其他军用物资。此次胜利，人人欢欣鼓舞，体现了统战工作的巨大威力。

1945年日军投降时，驻遵化的伪讨伐队拒不投降共产党。8月下旬，我军围攻遵化城。张志全奉命负责外线，他指派其子偷偷画出城内军火装备部署图，为我们攻打遵化县城提供情况。伪讨伐队逃跑后，我军进城后的第三天，召开全县群众大会，张志全以冀东抗联会主席的身份讲了话，喜庆抗战的胜利。

三

八年的抗战，迎来了胜利的喜悦，饱经风霜的张志全和全国人民一样，享受着这幸福的甘

甜，此情此景，张志全思绪万千。

人们越高兴越加怀念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为追念先烈，教育子孙，他积极倡导人民自愿捐资，在自家的几亩耕地上亲手盘窑烧砖，为抗日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当时他二儿媳有些想不通，认为公爹的做法太吃亏了，不满意地说："在咱家的耕地建这个，对咱们有多大好处呢？"张志全耐心而又坚定地说："先烈们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不怕流血牺牲，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难道咱们这点地都舍不得吗？我决心已下，一定要给先烈立碑。"他终于说服了儿媳。1946年5月21日，为冀东22个县的抗日先烈建立了纪念碑，并在纪念碑题写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这一统碑是牺牲烈士一桶血"、"夺回来中国"26个大字。充分体现了这位共产党员、革命老干部对共产党、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以及对牺牲的先烈的深切怀念。

四

1946年5月，中共丰润县委按照中央精神开始了土地改革工作。

池家屯村建碑以后，张志全在纪念碑西侧的楼上继续组织人撰写、刻印《农民问答》一书，宣传中央的指示，宣传土地革命，颇受群众欢迎。而敌人却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搜寻他的下落。于1947年农历五月二日，在《唐山日报》上恶毒地诬蔑张志全"以其脑筋新颖，著《农民问答》一书，颇得上级信任，因而得以无法无天"。

1947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张志全回到池家屯家中，让通信员通知各村干部，准备第二天早晨在狼山关召开会议。不料，第二天清早，枪声四起，沙流河据点的敌人像野兽一样包围了池家屯。张志全预感到形势不妙，立即将党的秘密文件埋在邻居管双房子东面的小沟里。他和乔顺友等人因隐蔽不及而被捕，家里的财产、楼房均被烧毁，张志全被敌人押到沙流河据点。

张志全在敌人据点和丰润县监狱关押期间，狠毒的敌人对其施以种种酷刑，但是他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强不屈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与同时被捕的共产党员乔顺友互相配合，以报假名、送假信等手法与敌人周旋，巧妙地骗过敌人，使乔顺友获释。张志全得了糖尿病，小便频繁，敌人几次威逼他，让他把尿喝了，而他毫不畏惧地奚落敌人说："我这尿里有糖，是甜的，不信你喝点。"敌人恼羞成怒，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吊在房梁上，但他始终没有屈服。他借儿媳给他送东西之机，告诉同志们要给他报仇。

张志全被捕后，敌人声言要把他押解北平。党组织得到消息后，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当我军在五里屯设伏准备营救时，而狡猾的敌人却将张志全偷偷地提前转送到伪丰润县监狱。在县押了七八天，受尽了百般折磨，使其病情加剧。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被本村张洪玉保释出来。1947年5月22日，张志全在被接回家的途中不幸牺牲。



张志全是一位受人拥护和爱戴的好同志，人们亲切称呼他为“张老头”。他的动人事迹受到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当时任冀东区行署主任的张明远为他题词：“努力抗战堪成模范，带领人民能做先锋。”冀东区党委秘书主任彭来题词：“满院和风推家及国，一身豪气舍己为人。”张志全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

大山歌[1]

——记优秀的抗日游击大队长年焕兴

王泽　张福庭

年焕兴，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二月初一）生于兴隆县蓝旗营子村（原属遵化县）一个贫苦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正义，喜交朋友，好打不平，富有民族气节。

年焕兴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从1934年3月到1945年8月，先后担任农民起义军游击队长，孙永勤民众军的队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第二总队长，冀东八路军包森二支队的二大队副队长和五大队队长，迁遵兴联合游击大队队长，曹致福的六区队二连连长等职。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遵照党和上级的指示，团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长城沿线的山区游击战争，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党扩建了抗日队伍。他对日军、伪军、治安军无数次战斗中，斗争坚决，作战勇猛，不怕苦，不怕死，战功卓著。他是兴隆、遵化、迁安、迁西等县人民心目中优秀的抗日游击队长。

一、举行抗日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3年3月10日，日寇又侵占了兴隆县。在国民党对日不抵抗的政策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冀东拱手让给日军。这就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各地纷纷举行抗日救国农民暴动。1933年12月11日，黄花川孙永勤率十七人举行起义，次日就有150多名农民参加民众军。接着，八卦岭村张福义率百余农民起义，收缴了本村地主的枪支。苇子峪村自卫团总李连贵率农民十八人起义，缴获杨树林村五十支大枪。1934年3月，蓝旗营村年焕兴率领二十多名贫苦农民起义，与李连贵在蓝旗营子村会师。年焕兴、李连贵二人任抗日游击队长，并提出“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打倒日本鬼，不当亡

[1]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323~337页。

国奴”的口号。从1934年4月到1935年4月，一年左右时间，在洒河〔澈河〕川南北山和横河川山区一带，参加抗日救国军的农民500多人。1934年3月中旬，年焕兴、李连贵的抗日游击队攻打半壁山警察所，因起义农民缺乏战斗经验，加上武器残坏，战斗失利，起义军牺牲三人。后撤至二堂村，又遭日寇围攻。突围后，转移到黑锅顶深山密林。敌人撤退后，年焕兴和李连贵率队奔向黑河五凤楼活动。

二、五指山与孙永勤会师

1934年3月，年焕兴、李连贵与孙永勤民众军在五凤楼会师。这时战士发展到5000多人，孙永勤任军长，下设分队，年焕兴、李连贵任分队长。1934年夏，孙永勤接受中共京东特委委员王平陆提出的抗日主张，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继任军长，下设四个总队，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队长。3月下旬，在洒河〔澈河〕北山活动的第二大队长年焕兴和第四大队长李连贵率队攻打佛爷来药王庙敌据点，年焕兴亲手用从长城得来的“牛腿子”炮，把敌人炮楼揭开，造成敌人伤亡。可是敌人不甘受损，命令100多日伪军冲出来，向北山进攻。救国军不打消耗仗，年焕兴、李连贵主动撤到横河川的白云寺隐蔽。这天夜里，我内线人员送来情报说，明天将有100多敌骑兵来糜子地。年焕兴、李连贵二人一致认为是歼敌好机会，率500多人埋伏在糜子地东山。天亮后，果然100多敌骑兵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救国军指战员以居高临下、深山峡谷的天险优势，枪炮齐发，激战两小时结束战斗，击毙敌80多人，俘敌20多人，缴枪90多支，得战马80多匹，获子弹万发，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仗。1934年6月，年焕兴、李连贵率第二、第四总队攻克敌罗文峪、孤山子两个据点，毙俘伪军70多人，缴获大枪30多支，子弹一部。

三、茅山〔毛山〕突围

1935年5月23日，是孙永勤部在茅山〔毛山〕被日伪军（5000多人）包围第三天，年焕兴、李连贵奉军长孙永勤的命令，率救国军第四大队和八、九大队500多人往北突围。于23日傍晚从小于家沟〔小于沟〕的王家沟出发，沿山脚奔秋花峪——茅山沟〔毛山沟〕——小厂，绕过松棚营——西沟，入夜到黄花峪宿营。后半夜，日军山田队200多人乘汽车突然冒雨从南驶来，越过特警队防线直至吴家沟村西。接着日军立刻从西头向村里攻击。救国军仓猝应战，迅速撤进村东的茅山沟〔毛山沟〕。日军追击时，先头的几名日军被击毙，日军便用机枪、钢炮向沟里乱轰，救国军被追上了茅山〔毛山〕。24日拂晓，年焕兴、李连贵率领的一支救国军从黄花峪奔房山沟。日军发现开枪，李连贵率先头部队抢上山头，猛烈反击，迫使日军后退，指挥部队分几路快速西插。再遇日军，只距50米，年焕兴、李连贵率150多人集中火力攻击、掩护，令其他数路再进。几战几旋，速战速移，年焕兴、李连贵率主力突围出去，为继续抗战



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四、隐蔽斗争

茅山〔毛山〕突围后，年焕兴、李连贵率救国军50多人在黑鱼沟、苇子峪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936年2月，被半壁山、蓝旗营子伪警察300多人包围在苇子峪村。经过浴血奋战，救国军伤亡40多人，李连贵中弹牺牲，年焕兴带十几名战士突围。

苇子峪战斗失败后，年焕兴在古冶（唐山）进行隐蔽抗日活动。因保安队在古冶查户口过严，于1937年6月到马兰峪隐蔽活动（遵化与兴隆交界处），改名温秀和，去保兴堂做工，进行隐蔽抗日活动。在当长工中，他与密云县人、地下党员老洪联系上，两人商议攻打驻扎东陵的伪兵。9月的一天夜里，两人从庄稼地里摸到伪军岗楼，捉到站岗的警察一人，在庄稼地里处死，缴获大枪一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年焕兴、老洪二人就积极宣传说："共产党八路军要来了。"到了8月，年焕兴和长工老洪在伙房秘密地向工人说："陕北红军已到河北省了，是专门打鬼子的。"从此，一部分长工们专门探听红军到来的消息，决心反抗日寇。到了1938年6月， 老洪从遵化县石门村前来，同年焕兴一起直奔平谷县将军关，找到了共产党军队——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第四纵队。上级决定老洪去密云县做地方抗日工作， 年焕兴参加八路军，同四纵部队挺进兴隆，参加了攻打兴隆县城日伪军的战斗。当八路军进攻兴隆县城时，沿途农民看到有蓝旗营子的抗日头领年焕兴参加军队，原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散失的士兵们，有200多人参加了八路军第四纵队。

五、在包森的第二支队

1938年秋，第四纵队西撤后，留下第二支队在兴隆县的东部洒河〔潵河〕、南北山和长城沿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支队长是包森同志，下设两个大队，赖邦（赖雨霖）任第一大队长，王正军任第二大队长，年焕兴任第二大队副队长。这支小队伍，在1938年六七月间，只有40多人。他们人少，枪少，子弹少，人地两生，还要保护20多名伤病员，处境极其艰难。但包森同志不怕困难，依靠群众，团结地方同志一起开辟地区，创建口外抗日根据地。年焕兴是当地人，他人熟地熟，社会情况清楚，对敌斗争坚决，作战勇猛，不怕苦，不怕死，成了包森同志的得力助手。

1. 袭击野鸡峪伪金矿

1938年8月24日夜（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包森支队长和第二大队副队长年焕兴带队，由兴隆县八仙沟出发，绕山路到白旗营子天就亮了。白天就地休息，到午后太阳没落就又出发了，到遵化县洪山口天就黑了。8月25日晚上，包森同志得知附近有一个野鸡峪伪金矿，有20

多名矿警，还有两个日本人，无堡垒。洪山口离野鸡峪有六七里路。包森同志决定先把金矿拿下来再进口，派年焕兴带两个战士，换上便衣，先把岗哨摸了，随后部队紧跟上。年焕兴等三人飞奔岗楼。伪哨兵要口令，年焕兴说，我们是上夜班的工人。话音刚落，就把哨兵的枪给掳过来了。这时我们的部队也到了。没等矿警拿起枪，就被年焕兴等三人的手枪给顶上了胸膛。矿警一打愣，我部队就冲进屋里了。一枪没响，俘虏了20多名矿警，缴获大枪20多支、手枪5支，顺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2. 药王庙南沟伏击战

对于佛爷来村药王庙敌据点，年焕兴、李连贵、孙永勤、京东支队第四纵队包森的第二支队，从1934年3月到1938年10月，先后打过五次。因此，佛爷来警察署之敌已成惊弓之鸟，署长以下数十人纷纷化装携眷四处躲藏。警尉张翰卿乔装携眷逃往遵化，警长刘仿周、刘青山化装与妻子藏在高杖子。包森通过年焕兴等当地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迅速开仓放粮。包森在一日晚上亲去高杖子村杨甲长家，找原佛爷来伪村公所事务员杨福忠取走佛爷来仓库的钥匙，并通知八品叶以东洒河〔澈河〕川、横河川的群众来取粮。一夜之间就把八百石谷子放完，包森部军威大振。兴隆的日伪军得知，急从遵化调日军增援。遵化县日伪军守备队五六十人，由保安团近百人护送到佛爷来。包森立即作出伏击敌人的作战计划。派年焕兴、杨福忠去孤山子村一带，发动群众割断通往遵化的电话线，随后在沟垴截击敌人。派赖邦带队连夜在佛爷来药王庙南沟口山上设伏，沈万荣率队在山神庙南山崖头埋伏，专等敌人进“口袋”。包森在东阎杖子村设指挥所。这股保安团、区团在佛爷来只住一宿，次日天刚亮，就整队过洒河〔澈河〕，奔向药王庙南沟，想急返遵化，没想到乖乖地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圈。沈万荣部战士率先向敌人先头队伍扔出四颗手榴弹，当即炸死两个敌人。敌人发觉已中了理伏，进退两难，想打又看不到我军。这时完成割电话线任务的年焕兴、杨福忠从高杖子下来，立即率当地群众参加战斗。山上山下齐声呐喊“缴枪不杀”，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投降，俘虏100来人。包森在下坡子村给俘虏开会，部分区团士兵愿意留下参加八路军，其余领路费回家。这一仗，震慑了敌人，大大振奋了民心，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3. 奇袭洒河桥〔澈河桥〕据点

1938年10月，某日夜晚，包森同志把第一、二两个大队集合一起，下达战斗命令：洒河桥〔澈河桥〕据点伪军只有70多人，离我们这里有18里路，正在建设炮楼子。等炮楼建成就不好打了，我们要在今夜坚决攻克这个据点。开完会队伍就出发了。因夜黑，道路不熟，走到半路上，把一大队走丢了，又联络不着关系。包森同志有点生气地说：“第一大队走失了，天快亮了，年焕兴你说怎么办？”年焕兴马上回答说：“我一个大队打，保证完成任务。”包森同志又说：“你不怕死吗？”年焕兴加重语气说：“怕死不抗日，抗日就不怕死。”说完就带着第五

班（是经过长征、有战斗经验的老同志）冲在前头，一气跑了七八里路。伪军哨兵和年焕兴要口令，才知道到据点。首先缴了哨兵的枪，到院子里打几枪，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此时，我五班战士把伪军墙上挂的枪全部收缴了。正在酣睡的70多伪军当了俘虏。打扫战场时，支队部也赶到了，包森同志满意地说："年焕兴，你们这仗打得真好哇！"

4. 在横河、洒河〔澈河〕川扩军

1938年10月下旬，四纵留下的前三十三大队的赖邦、陶永忠、王占军、姚铁民等28名伤病员，连〈保护他们的〉干部、战士，也只有40人的一个连。连长赖邦，副连长〈是〉王正军。〈连设〉两个排，一排长姚铁民，二排长陶永忠。在兴隆县半壁山北山靳杖子、双炉台、鞍子岭、羊羔峪、马架沟、天桥峪、杨树台、蛇皮、厂沟、高板河、糜子地、乌头牛、驴儿叫、宝地、大洼一带，一边养伤，一边进行抗日活动。打完佛爷来村药王庙这个伏击胜仗之后，就在半壁山、蓝旗营子一带扩军，群众纷纷参军参战。由于年焕兴在包森的二支队二大队当队长的影响，所以，蓝旗营、古儿石、苇子峪、大厂、大佐、开庄、大碌洞、小碌洞、八仙沟、小子庄、车道峪、佛爷来、田杖子和半壁山北山横河一带的群众投奔年焕兴参军的颇多。如吴凤岐、张贺生、张义德、陆某等很多人，有些长粗脖的老乡也来参军，被我军热情地劝回去了。年焕兴的家人、亲戚、朋友有许多人和年焕兴出来当了八路军，如年焕章（年焕兴的哥哥）、赵刚田（原名赵安，是年的朋友）、李德功（北京人）、广玉文（马圈子人）、揣仁（马架沟人）、刘秀存（粳子峪）等，都是磕头弟兄。

因为年焕兴在二支队里，这一带有很多人参加二支队。当地人多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更密切了。年焕章是年焕兴的哥哥，是倒流水警察所的所长，他就给八路军送情报、办事（后来也参加了八路军）。佛爷来的陆某，他哥哥参加了第二支队，他也给八路军办事。佛爷来村公所事务员杨福忠的父亲是甲长，杨与五名警察是磕头弟兄，包森命年焕兴与之联系，使杨在三年里为我方送来手枪一支、战刀一把、作战地图一份、子弹700粒。当时老连长赖邦、二排长陶永忠都说："包森的二支队是在洒河〔澈河〕起家的。"这话说得准确实在。从1938年7月到11月，仅五个月的时间，二支队由原来40人扩大到200多人。

1938年11月，这时队伍扩大了，人也多了，枪也多了，需要进一步开辟地区。经过包森、赖邦、王正军、年焕兴等同志研究后，二支队以下组建两个大队，包森继任支队长，赖邦任第一大队长，率100多人，在长城以北活动，并向五指山、五凤楼等深山区一带开辟。王正军任第二大队长，年焕兴任第二大队副大队长。二大队下设三个排：一排长是洒河〔澈河〕人（曾在杨二部干过），二排长陶永忠，三排长姓陆，佛爷来村人。姚铁民在支队部任副官。包森同志带着第二大队进了长城，向遵化山区的洪山口、茅山〔毛山〕、山楂峪一带开辟，第二大队到了口里就叫第五大队了。

5. 设巧计斗顽敌

1938年冬天，包森同志在洪山口得知，佛爷来又来一股伪军驻扎，欺压百姓，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并企图袭击我军。包森同志便与王正军、年焕兴、姚铁民、陶永忠同志研究对策。包森同志通过年焕兴把他哥哥年焕章找来，商量的结果是：请洪山口金矿办事很认真的杨经理帮忙从药店给买来十斤巴豆。某夜晚，年焕兴、杨福忠、郝学文三人化装成老百姓，在佛爷来村群众协助下，将巴豆放到日伪军的吃水井里，并在据点里撒传单，贴标语。这时，我军指挥所设在西铺。次日夜，从北面接近据点围墙，发生战斗。赖邦和另两名同志负伤。这股日伪军多数腹泻，被我军打死打伤60多人，其余敌人在等援无望的情况下，连夜逃回遵化。

6. 奇袭毛峪税关总署

毛峪地处兴隆县孤山子以南、遵化县大河局子以北的罗文峪口，是兴隆通往遵化县的必经之路。兴隆县东部横河、洒河〔撒河〕一带的群众历来都赶遵化集，遵化县的群众也习惯由此到口外买些必需的农副土特产品。日本人在此设一个税关总署，税关总长是日本人，有翻译，有警察，设关卡，昼夜堵截。凡是群众到集市铺店买卖粮、柴草、木炭、水果、畜禽、皮毛、肉蛋等等都要上税。就连要猴的、演杂技魔术的手艺人，不上税也休想通过。因此，群众强烈要求八路军除掉这个税关。

早在1935年3月末，一天晚上，孙永勤部下第八大队队长何广永带着20多名战士在大厂村的小石门，亲手将罗文峪税关署的税关总长栩藤、税关署长佐佐木和翻译郑宏彬（东北人）捉住，并令撤销税关。两个日本人被孙永勤处死在遵化县茅山〔毛山〕。1939年春，毛峪这个税关还没撤销，当地群众还是强烈要求八路军拔这个钉子。在包森命令下，年焕兴、吴从理等在大厂、大佐组织动员上百名青壮年农民，夜袭孤山毛峪大地税关署和警察分驻所，迫使敌人很快撤销了这两个机构，为民除了一害。1940年秋，年焕兴、吴从理等三人，于一天上午，在遵化县的大河局子沟口山头设伏，截击从遵化县城出发去关外“扫荡”的日军汽车队。仅用三颗手榴弹，炸伤一个日本军官和数十名士兵，打乱了日军的行动计划。

7. 伏击武装特务

1939年春某日，年焕兴在遵化县城北大河局子一带活动，得知兴隆县半壁山警察署几名武装特务要来这一带刺探我方情报和抢夺老百姓过年的东西，路过罗文峪。年焕兴带领四个战士，换上便衣，早早埋伏在罗文峪关口路旁。上午10点钟左右，七个武装特务骑着自行车由北往南驶来。到临近时，年焕兴等四人一齐开枪，当即从自行车上倒下三人毙命，其余四人弃车拼命往回跑。年焕兴等四人边追边打，没跑出一里地，将七名特务全部击毙。缴获手枪七支，自行车七辆，为民除了一大害。



六、活捉宪兵司令赤本大佐

1938年10月，八路军宋邓纵队西撤后，日寇乘机对冀东加强了防务。频繁向各地及长城沿线山区“扫荡”，疯狂屠杀我抗日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又从唐山调来日本裕仁天皇表弟、宪兵司令赤本大佐驻在遵化县城，妄图扑灭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包森同志为了保存实力，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将部队化整为零。第二支队分成若干个小游击队，利用熟悉的地理环境和群众积极支持等有利条件，活动在长城内外，选择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1939年4月25日晚上，支队部的贾振远、第五大队队长年焕兴、侦察员马兰田、警卫员王志民（真名夏永江，兴隆县古儿石村人），还有三个战士等七人的小游击队，奉包森同志的命令，到遵化县城北张家坟（属孟子院村）执行侦察任务，当夜就隐蔽在村里。

26日上午，我游击队都化装成老百姓，在村南路边帮老乡干活，有的挑水，有的和泥，有的脱坯，有的铡草。时近中午，从村南边来了三个人。走在前边的那个人穿粗布便衣，在后边走的两个人穿大褂，像是做买卖的商人，前后相距百米左右。临近了，马兰田同志发现前边走的那个人是包森二支队手枪班的战士王振西，有两三个月没有见着他了，听说他被捕了。马兰田对年焕兴、贾振远使了个眼色，装没看见，继续给老乡干活。

那三个人越走越近。王振西看出化装成老百姓的是年焕兴、贾振远、马兰田，就快步走到年焕兴跟前，用胳膊肘子（他右手受伤）碰了年焕兴一下，冲着马兰田用嘴一拱，小声说：“后边是敌人。”王振西刚刚走过去，两个“商人”随后赶到，年焕兴、贾振远、马兰田同时拔出手枪，一个箭步冲过去，大吼一声“不许动”，用枪顶住敌人的腰眼。敌人要伸手掏枪，未掏出来，一个战士上去一把拽住他的手，撕开他们的大褂缴了他们的枪。这时王振西说：“捉住的这两个，一个是日本宪兵司令，一个是翻译。日本宪兵大队就在大刘庄，咱们要赶快转移。”大刘庄离这儿不过四五华里，再待一会，鬼子大队就会追上来。大家押着鬼子和翻译往北走，这个鬼子司令叽哩哇啦地嚷，就是不走。年焕兴由老乡家找来一条猪毛绳，捆住他的双手，连拉带拽地往侯家寨村撤。

一路上，贾振远边走边盘问那个翻译。翻译说，他是遵化平安城子人，姓孙，是在“家礼”（即青红帮）的，后来给日本当了翻译。正巧贾振远也在兴隆县厂沟（上庄）吴老抠家入的“家礼”，贾振远便和那个翻译说起了行话，了解到这个日本宪兵司令名叫赤本，在日本人眼里，来头不小。翻译表示以后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并赞扬王振西是机智多谋。

走出有十几里地，快到侯家寨了，后面响起了枪声，日军大队人马追了上来。赤本听到枪声可来劲了，像条死狗一样死活也不走了。王振西将绳子套在赤本的脖子上，连拉再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赤本拖上侯家寨北边的边关楼子里。赤本还是叽哩哇啦地嚷，翻译说：“他要面见包森。”这时，枪声越来越近，就赶快往北撤。幸亏山上有兴隆县开庄村一带的民兵阻

击，敌人才没很快追上来。天黑时，已经把那个翻译放了。年焕兴押着赤本到马蹄峪北边的柳树沟子。这时，大家又渴又饿，到老乡家找点饭吃。也给赤本盛了一碗，这家伙怎么也不吃。赤本跪在地上，撕开大褂，露出脖子上的小铜佛，嘴里叨叨咕咕，像是祷告。一个小个子战士往起拽他，赤本腾地站起来，用力一踹，把那战士踹出老远。这可把大家气坏了。南边又响起了枪声，敌人追来了。这时，年焕兴和贾振远商量几句，对大家说："鬼子肯定紧追不放，赤本不肯走，干脆就地处决了。"王振西跑到老乡屋里拿来一把斧子，照着赤本脑袋连砍三下，边砍边说："叫你不走，叫你不走！"赤本像头死猪似地瘫在地上，腿蹬了两下，没气了。战士们把他拉到房子北边的河沟里，七手八脚刨个坑，把他埋了，还在上面插个柳树枝子作记号。

埋完了赤本，年焕兴和贾振远商量，为了缩小目标，便于活动，决定分头转移。贾振远、王振西、马兰田往东，年焕兴和其他几位往北分别活动了。

从处死赤本以后，鬼子"扫荡"更疯狂了。贾振远、马兰田、王振西等转移到马蹄峪北边深山里，王振西把骗鬼子赤本的经过讲给贾马二人听。

原来，春季大"扫荡"，赤本搞了几次"围剿"，一直没有把包森围住。把刚刚捉到的王振西找来，问他："你知道包森在哪里吗？"王振西回答说："我是包森的侦察员，还能不知道他在哪里？"赤本又说："你们的司令，我很佩服，很了不起。你带我去，我要和他面谈。"王振西说："好，那还不行。但是带着这么多人去，就得把老包吓跑了。"赤本问："你想怎么办？"王振西说："依我看，你穿便衣，我带着你在前走，让大部队在我们二三里地后边跟随。"赤本觉得有道理，就套上大褂，带上翻译，跟着王振西走在前面。大队与他拉开三里地距离。这回，赤本满以为以谈判为名，把包森稳住，等大队人马一到捉活的。王振西呢，早已拿定主意，非把赤本带到游击队那里，叫他自取灭亡。

四天后，贾振远、马兰田、王振西在遵化禅林寺见到了包森同志，将骗赤本、活捉赤本、处死赤本、释放翻译的经过向包森同志详细汇报了，包森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给人民除了一大害，立了一次大功。"

赤本是日军驻唐山的特务机关长、宪兵司令，是天皇裕仁的表弟。他的被俘，在日本国内震动很大。开始，日伪军两个师团的兵力全部出动，到处"扫荡"，企图夺回赤本。后来强迫遵化商人给包森送信，每个信封上都写着"面呈包司令长官"。他们提出，愿以50挺机枪、数十箱子弹换回赤本。后来说，如果赤本已死，愿以同样条件换回赤本尸体。据说赤本的老婆是日本著名女特务川岛芳子，四处游说，让交出赤本，〈托人问〉："请问包司令要啥条件？"包森同志识破是缓兵之计，干脆答复："只要一个条件，就是你们投降，滚出中国去。"

二支队指战员活捉赤本大佐的传奇性胜利，受到了广大抗日军民的赞扬，其事迹曾登载于八路军总部编印的《八一》杂志上。这年冬天，晋察冀军区总结冀东工作时，认为二支队在冀东革



命形势低潮时还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队伍和游击区，是难能可贵的，表扬了第二支队。

七、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打治安军战役

1.强攻东双城子治安军据点

1941年12月26日，迁遵兴联合县游击总队长曹致福、年焕兴率总队配合我主力十三团三营强攻遵化县东双城子治安军五团一营据点。战斗于上午8时开始，由包森同志亲自指挥。我三营长率部分战士化装成老百姓从正面进入据点，年焕兴率队打退了满载日军的一辆汽车，连续阻击日军援兵。战斗至翌晨3时结束，毙俘治安军连长以下200多人，日本教官自杀。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160余支、电台一部。

2.强攻杨店子治安军据点

1942年1月20日，李运昌司令和十二团团长曾克林指挥第十二团第一、二营，第八总队和迁遵兴联合县游击总队，强攻迁安县杨店子治安军第二十团据点。战斗打响时，年焕兴带领游击总队率先冲上去，配合第十二团第一、二营，击退沙驿、迁安城伪军三次增援。激战17小时，毙伤俘伪官兵800余人，给该团以歼灭性打击。缴获机枪5挺、步枪200余支。我第十二团官兵亦伤亡100余人。二三日后，该团治安军被迫放弃杨店子据点，千余人的大团只残留300余人，溃逃迁安县城。

八、监狱里斗争

由于年焕兴经常带迁遵兴县大队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集家”部署，日寇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抓住他，或除掉他。下命令王杖子警防所不惜一切代价找年的关系。王杖子警防所长便找到大厂村两个叛变尚未公开的村干部李南国、王凤鸣，说：“想法找到年焕兴，马上给警尉职务。”这两个叛徒知道年好喝酒，原来都是老乡熟人，就多次带好酒、麻花进山，以跑敌情为名在山上活动。1945年7月（农历六月）的一天夜间，年焕兴在大厂村养伤，由于一时思想麻痹，被骗到兴隆县大厂村南杏沟一间小窝铺里。〈二人把他〉用酒灌醉，盗走手枪，年焕兴被王杖子伪警防所50多名警察抓捕，同时抓捕了年焕兴的警卫员张德发、小赵等几人。在抓捕时，年焕兴愤怒地对敌人大声说：“你们不就是要抓年焕兴吗？把别人都放了。不放别人，我宁死不进监狱。”迫使敌人放了别人，把年焕兴押进兴隆监狱。

开始，敌人用诱骗办法，好酒好菜招待，单独住好房间，让他在群众会上骂八路军。他对我军一句坏话未说。气得敌人无计可施，随后就以种种残忍手段进行非人的折磨，使他几次昏过去，可他咬紧牙关，未透露出半点我军的机密。在狱中经过一段准备，年焕兴与其难友们共同策划，打算组织越狱暴动，乘〈狱卒〉进狱查看的机会，夺枪逃出。一天，把两个狱卒打

倒后，正要逃出时，被其他查狱人发觉，鸣警笛包围抓住。发现年焕兴组织狱中暴动，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决定判处年焕兴死刑。第一次，敌人要枪决年焕兴，因手续不具备，未实现计划。第二次，敌人要枪决年焕兴，因天降大雨，开不了大会，又拖延下来。未等第三次行刑，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年焕兴和其他“政治犯”因而得救。

年焕兴从监狱出来，身体非常虚弱，回老家休养。因被捕入狱，党组织生活中断，1958年在蓝旗营村重新入党，一直任该村治保委员。“文革”期间，年焕兴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73年2月病逝。

1983年5月，中共兴隆县委员会遵照中央领导和承德地委的指示，在1979年党员大会恢复年焕兴的党籍的基础上，对“文革”妄加给年焕兴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召开群众大会，恢复名誉，予以平反。根据年焕兴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抗日救国出生入死，立下卓著战功〈这一事实〉，经呈报上级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终究是座大山，以其坚定、顽强，受到世人景仰。

［以下为作者原稿结尾］

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在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这两年，造反派组织诬蔑年焕兴是叛徒、坏分子、蜕化分子，“文革”一开始，就给年焕兴戴高帽、挂牌子，〈让他〉站板凳，低头猫腰，燕飞，关押在大队，由民兵看守，并进行多次批斗。一次在学校批斗时，年的脖子上用铁丝拴一个桌子面，站在一个板凳上。一个红卫兵用板凳腿把年焕兴打倒在地，当时昏了过去。批斗会就此结束，家人把年焕兴搀回家去。一九六八年旧历腊月三十日，把姚栅子村在日伪当特务的××等人带到蓝旗营大队“万人坑”（是日寇大批屠杀中国人民的地方），进行批斗时，年焕兴又陪同批斗一天。散会后，其他人都回家了，只剩年焕兴一人走不了路，待在那里。最后，由此路过的小学生张维福把年焕兴搀回家去，致使年焕兴同志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一九七三年二月，含冤病故。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共兴隆县委员会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和承德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要求，在一九七九年党员大会上恢复年焕兴同志的党籍的基础上，对在“文革”中年焕兴遭受无辜批斗进行第二次平反。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恢复名誉，予以平反。县委根据年焕兴同志战功卓著和“文革”中遭受极其严重迫害等情况，呈请上级“追认为革命烈士”，对年焕兴家庭生活困难给予经济补助。



烽火照征程[1]

——革命先辈李子华自述

程水星　整理

我原名尹福坤，1898年12月出生于遵化县王各庄村。13岁过继宫里村李瑞和家，改名李福坤，字子华，曾用化名叫李德盛。

我小时候上过冬学，稍大一点曾随生父尹继田学银匠手艺。处于官府横行、兵匪遍地的旧时代，在父亲教育影响下，我刻苦习武，练出一副好拳脚，连村霸“孟家五虎”也都惧我，不敢冒犯。为谋生计，21岁那年，我与同村人王子英到热河省林西，经人介绍入伍老毅军。军阀队伍里当官的克扣兵饷，残害士兵。以后又调动当了警察，结果是从虎口迈进火坑，自己救国救民的愿望根本实现不了，继续待下去只能算是为反动统治效劳。当时我管给养，借机会请了20天假，返回家乡参加了当地民团。

1926年2月，我家由宫里搬到城西孟家铺村落户。荒年苦春头上，奉系军阀政府责令推行“旗地变民地”，每亩限交8块大洋，交不上银子就捆走坐牢。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4月间，冀东党负责人张明远、杨春林来到遵化县塔寺村，发动组织联庄会（即农民协会），宣传“要组成我们自己的队伍，砸掉官府……”我还听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穷苦人当家作主的消息，觉得这回可有出路了。等张明远、杨春林同志到我村活动时，我入进农民协会。没多久，城西差不多村村都建立了农会。4月上旬，按预先的酝酿准备，在史家坨召开了大会。会后，四五千农会会员，由张明远、杨春林率队，急速往东出发，我提鞭持刀首当其冲。这次声势浩大的围城请愿，经过与伪县长面对面的据理抗争，迫使站在城墙上的县长不得不答复条件：“旗地变民地”暂缓执行。请愿胜利。我生平第一次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大，要翻身求解放，必须大伙握成拳，跟播撒火种的头行人走！从此，我坚持参加农民夜校，弄懂许多革命道理。1933年3月，在喜峰口开始了著名的长城抗战。我们渴望抗日，不愿当亡国奴，积极支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将士。当时我正担任二区民团教练和队长，主动同各处民团联系，密切配合前方军事行动。这年10月，通过本村孟寿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孟家铺的党支部成立后，我们分头活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发展党员，有如星火燎原，四

[1]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制，第366~368页。

外庄十几个村相继有了党的组织，并建立了区委、青年报国会、妇女救国会。在县委领导下，我更加明确了斗争目标，在发展组织的同时，夜里刻印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等宣传品，白天利用赶集或走亲戚的机会散发出去，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统治。当时的条件非常困难，党员每人每月一个大铜子的党费全部上缴，作更大的用途，所以经费全部由我们县委、区委委员们想方设法从家庭生活费用里抽，千方百计地买来纸张、油墨、铁笔等。后来，我开了个小油榨房，一方面掩护和接待党的领导和革命同志，一方面可以借谈生意为名传递情报，再就是解决经费开支。

1934年春天，骆凤庭担任遵（化）迁（安）丰（润）三县特委，遵化县的县委书记由马子敬担任，副书记是樊凌玺，孟寿田、我和兰小川是委员。上级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在长城内外以及热南地带开辟地区。但在伪"满洲国界"的长城沿线，日伪设关建卡，严禁南北通行，为了活动方便，经县委研究同意，我托人介绍加入了"普安协会"（即青红帮，本地俗称会员为"在家礼"）。会员们见我操持会务"热心"，挺能张罗个事儿啥的，没多长时间，就推选我当了普安协会遵化支部的参议员，还郑重其事地摆了"香堂"（帮会中宣布重大会务的仪式）。支部长（堂会头子）宣讲防共灭共、组建自卫武装等事之后，发给我一张烫印金龙的大委任状。得到了这个头衔儿，我赶紧把马子敬他们好几十个党员介绍入了会，每人花一块钱领到了个铜制会员章戴上。这样一来呀，就不用化装成皮货贩子出入关口啦！只要一亮会员章，比伪"满洲国"的《出国证》还管用，日本兵见了就敬礼放行。有了这种方便，到1934年底，我们遵化县委就发展党员一千多名，建党支部上百个，为冀东的党政建设、基本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到了1935年初，普安协会就解了体，不但进出关口困难，伪县政府还和进驻关里的日军狼狈为奸，搞起了保（几个村为一保）、甲（一个村为一甲）、闾（25家为一闾）、邻（5家为一邻）制度，一家出事一邻连坐，以此类推。乡亲们怕受牵连，互相防范，所以，我们工作很不好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冀东区党委派来了老陈、刘玉林等三位领导同志，指示我们联络孙永勤，组织游击队。我和王平陆同志好不容易和孙永勤接上了头，可他提出：一要委任，二要子弹。这给我们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没办法，我们研究一下，让孟寿田刻了个公章，任命他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军长。孙永勤接到委任状后，带着两千多人马进驻关里，但子弹就没法解决了。时间不长，敌人调集了平泉、迁安、兴隆等县的兵力大规模"围剿"，孙永勤寡不敌众，作战失利，在茅山〔毛山〕血战中壮烈殉国。

（后略）



从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被“剿”经过看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本质

李秀娥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及其片面抗战路线是失败的、不可取的，是被世人唾弃的。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回顾这场战争的任何一个画面、一个片段，都会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迪和深深的震撼。以孙永勤为首的抗日救国军，是一支活跃在长城内外的北方农民抗日武装。它发生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众多的辽西义勇军严重受挫，长城抗战失败，热河沦陷，中华民族面临更大危难的历史关头，这是当时侵华日军最新占领区内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农民抗日武装起义。日本侵略者曾惊呼“匪势强大”、“讨伐殊难进展”，称之为“西南国境的最大障碍”。

这支抗日武装，虽然仅活动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就遭到了日蒋的联合绞杀，断送在国民党当局所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但它却在长城内外播下了抗日的火种，激励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在1935年8月〔10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孙永勤与方志敏等十一位抗日英雄一齐得到提名赞誉，被称为“民族英雄”。本文拟就所掌握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被“剿”经过的史实，再看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实面目。

一、孙永勤奋起组织抗日救国军及被日蒋“围剿”的经过

1933年12月11日，孙永勤不满日满殖民强权苛政的压迫，在其家乡兴隆县孙杖子揭竿起事，拉出一支“民众军”，整编后改名为“抗日救国军”。抗日救国军队伍发展迅速，曾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到5000人，编过4个总队、12个大队，主要活动在兴隆、平泉、青龙等地，往北到承德、上下板城，往南到迁安、遵化县境内，活跃于长城内外，在著名的长城抗战中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年半多的时间，抗日救国军在热南惩罚土豪劣绅、汉奸走狗，救济贫民

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威震热南。1935年4月，日军下决心集中兵力扑灭这支抗日队伍。抗日救国军多次与日军周旋，终因弹药不足，军需供给无源，实在难以支撑，况队伍人数锐减，即于5月15日开进关里。当时中国共产党以中共河北省委名义，委任孙永勤为华北抗日第一军军长。这支抗日救国军只在关内活动9天，就在遵化县毛山沟遭日军及战区保安队“围剿”，孙永勤于1935年5月24日午后壮烈捐躯，抗日救国军惨遭失败。现将掌握的事实经过以时间表的形式记叙如下。

1935年5月初，孙永勤在抗日救国军第四总队李连贵活动地区——兴隆东部青杏子沟一带就医，第一总队长张福义活动在承德县境，第八大队队长何广永、第九大队队长康永贵八百余人正在攻打承德附近据点，二、三总队在长城沿线、撒河〔潵河〕一带活动。日军驻承德第七师团长杉原急调古北口日军及察哈尔东部伪军李守信部到承德附近上下板城驰救。松井部撤出撒河桥〔潵河桥〕西进，奔遵化东北部。石部500多人自古北口经石匣出长城墙子路口东进。日军川岸部两个联队进占罗文峪撒河〔潵河〕北山一带，先设司令部于罗文峪。总计有日军5000人、伪军1000人，从西、北、东三面包围救国军，已形成逼救国军入关的势态。5月5日，驻清东陵日军警备队长岩永，于当日下午三时通知国民党驻遵化保安队王大队长，日军对孙永勤部残匪决定铲除之，惟恐发生误会，请该队转移长城以南25华里处，罗文峪方面防务交日军担任。[1]因25华里已超越遵化〈城〉以南，经交涉改为撤离〔至〕长城以南15华里，保安队于当日晚撤回遵化城。日军团设司令部于罗文峪（于数日后日军将司令部移设撒河桥〔潵河桥〕北三道河，并未通知国民党战区保安队接防）。5月15日，孙永勤乘日军司令部由罗文峪移往撒河〔潵河〕三道河，罗文峪并无保安队接防之虚，令张福义、何广永、康永贵等自马蹄峪入关，直抵遵化境大屯、侯家寨一带。[2]孙永勤亲率一支主力，自洪山口入关，经驻尤山口三道沟，迂回迁安境后复入遵化小于家沟〔小于沟〕、柴伏厂〔柴户场〕、王家沟一带。5月16日，孙永勤主力尚在迁安境。同年5月19日《大公报》第三版报道的消息，文称：据迁安县政府17日电，16日迁安县属撒河桥〔潵河桥〕北喜峰口外，突由热河开到义勇军一千三百人，号称抗日第一军，首领为孙有琴（即孙永勤——作者注）、孙黄桂（四川人）。所部非常整齐，枪支齐全，且有具双枪者。现驻于深山中，夜出昼伏，并出布告安民，且有宣传队向人民演说，称决不骚扰乡民，所有粮食向由自备。二日来确未向民间索食，只于16日夜将富户李之桂等请往，借款二千元。16日晚曾与日军接触，战约四小时，义军即避往山中。日军未敢穷追，用机侦视，亦无结果。闻日军死十八人，伤二十六人。5月19日，孙永勤派两人进城送信给县长何孝怡，保警人员拒绝入城。此二人将信交与保警， 返回西小寨。这天，县长何孝怡有电话

[1] 民国24年5月26日天津《大公报》第三版。

[2] 同上。



报北平称：有匪自流星峪窜入，于十里铺集结，派调张庆余一中队“驰剿”[1]。5月20日，孙永勤获悉日军将到西小寨“围剿”，救国军午后立即集合，朝大寨进发。于大寨召开中层以上军事干部紧急会议，议决行军意向——南进投奔国民军，并立即行动。一路行至七户，一路行至尖山屯，遭日军截击。这天，日军军用汽车20余辆，载兵200余名，携有钢炮机枪多架，自撒河桥〔潵河桥〕开抵遵化城。下午二时由遵化出发，去西小寨包围救国军扑空。复开车南行，由七户、尖山屯一带将救国军截击折返，接触中炮火激烈。救国军复经大寨、双庙子奔西铺东山，有的入迁安境景忠山皇各庄、三屯营等地。救国军开始由西小寨向大寨进发途中，一度于华山附近遇有民团，小有枪声，民团退。在日军截击返回途之后，后边有保安队张庆余部尾追。[2]5月21日，孙永勤带主力自迁安皇阁村、马甸子、三屯营等地朝遵化境秋花峪方向转移，后边有张庆余所部之保安队追迫。当到秋花峪时，东山梁上有保安队朝救国军猛烈射击，救国军不予理睬，奔小于沟、王家沟等地隐蔽宿营。5月22日，孙永勤率队由于家沟〔小于沟〕转移到吴家沟。

是日，日军川岸之山田队长紧逼县长何孝怡说：“廿四时间以内不讨伐，则日军即取自由行动！”[3]县长惊〔谅悉〕而退。5 月23日，孙永勤救国军总体上集中在柴伏厂〔柴户场〕、秋花峪以西，毛山沟的东北一带山地。其北面九虎岭一带有大量日军封锁，东面有日军逐次逼近，东南面及南面有保安队特警队长张庆余、周毓英及民团数千人，毛山西北长城南侧有小股日军。这时，国民党保安队一方以为自己应负责的防区为长城以南15华里之外，抗日救国军已不处于自己的防区，不肯再向北推进，而日军山田队长在警告县长过后，在22日下午采取了自由行动。5月24日凌晨4时[4]，日军开始炮击。先是山田队200多人乘车冒雨越过国民党保安队特警防区，从南面驶向吴家沟村西口。抗日救国军迅速撤出村外，进入毛山沟。日军见状后，以机枪钢炮向毛山沟轰击。随即马台子、官台子、九泉山三处日军同时朝救国军阵地毛山沟开炮。炮声停止后，日军石井队从西北向毛山沟穿插，川岸联队主力从北面向毛山包圈，松井队从东面向毛山兜进。此刻，孙永勤伤势未愈，在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等保护下，人们用椅子抬着登上山顶，指挥部队，占据了头道毛山、二道毛山、三道毛山。战斗中，日军利用飞机空中盘旋，指示目标，战火异常猛烈。孙永勤一度让关元有单独率部突围，关元有不肯，他决心与孙永勤一同报国，遂将队伍两路分开迎敌。救国军在处境艰难情况下，仍多次击退日军。

[1] 民国24年5月20日天津《益世报》。

[2] 同上。

[3] 康德2年5月27日《大同报》头版。

[4] 民国24年5月26日上海《大美晚报》。

曾击毙日军田边少尉及一下士，打伤日军士兵十余人。[1]战到中午12时15分，孙永勤、关元有等壮烈殉国。赵四川、王殿臣等领导者也随之先后英勇献身。战斗中，由于日军的炮击与空扫，阵亡者约三百余人，少数幸存者独自为战，最后有的战死，有的被俘。这天下午，日军分别撤回马蹄峪及撒河桥〔潵河桥〕。保安队留少数清理战场，大部分撤回遵化。以上为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在长城以南遭日军与国民党战区保安队"协剿"的基本经过。

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奉行误国政策之真实面目昭然若揭

孙永勤抗日武装兴起之时，也正是国民党加紧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之时。这项政策真面目的核心，在日蒋"协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过程中得到了较充分的诠释，即"攘外"是假，"和外剿共"为真。"和外"的具体表现就是对日的容忍、妥协和积极配合。

1935年5月5日，日军提出将在长城一带"剿匪"，强行通知长城南侧的遵化县保安队后撤。显然，日军蓄意将决战战场推至长城南侧受国民党政府管辖的"非武装区"，借以制造谰言，挑起事端，进而向国民党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国民党政府对日方这一要求，本来是有权拒绝的，但采取了容忍和妥协的态度，只是考虑到25华里之外恐遵化失控才交涉到改退15华里。日军压迫抗日救国军进入关内后，即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5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给国民党北平分会何应钦递交照会。文中要点，一是此次遵化县县长确有庇护孙永勤的事实，追问责任；二是孙永勤股匪受官方庇护，才向贵国领土逃遁，日军不得已，自动将所需兵力进入遵化一带，以期彻底消灭之。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接见高桥访晤，谈及日军"追剿"孙永勤事，不但未遣责日军擅入"战区"的非法行为，保护救国军，反而向高桥说："遵化已有张庆余、周毓英两部警卫队及民团并力堵剿，匪患当可肃清，勿用日军代劳，以免引起人心不安。"[2]谈后高桥将此意电致关东军，鲍文樾亦将此意电致正在太原的何应钦。5月21日，河北省蓟密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往访高桥，担保中国当局竭力"剿匪"。5月22日，由国民党当局指派的战区特种警察第一、二总队及地方民团迎头切断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南下之路，配合日军、伪满军将抗日救国军围困于遵化县毛山沟一带，对孙部形成一个包围圈。国内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26日第三版载文题为"协剿孙永勤匪部，我团警与日军夹击，匪部扑灭之期已在不远"。文中称，"……连日以来，我团警分布于各要隘，搜索兜剿，匪部即形不支，扑灭之期当在不远。至于外报所载遵化县长有庇护孙永勤之说，与事实不符，且完全不确。至于协剿孙匪事，我当地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以上史实足见国民党军政当局

[1] 民国24年《华联社》5月20日长春电。

[2] 民国24年5月20日天津《大公报》。

在“安内攘外”政策中的对日态度，就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1]“忍辱”就是为了“顺受”，“顺受”就得“容忍”、妥协和积极配合。究其原因，是由其民族失败主义和阶段特性决定的。在他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无力打败日本，“中国一切不如人”。蒋介石一再表示，“不求急功于一时”，不“博一时之虚荣”。他在1934年7月《对庐山军官训练精神训话》中说：“我们中国没有现代化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冒然作战，那只有败之而已，不仅是十天之内，就是三天之内，它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的沿海地方都占领起来。”[2]这种民族失败主义“三日亡国论”，导致国民党当局不想抵抗，也不敢抵抗，只有“和外”。从其阶段性看，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民族斗争服从于阶段斗争的政策。1934年4月，蒋介石在“对高级将领训词”中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丢了，……都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及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丢掉了对革命是无所损失的。”[3]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他的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因此，他要求部下“专心来剿匪”，宣布“嗣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以革命人民为敌，正体现了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质。为此，以“和外”求苟安，集中力量镇压、阻止人民爱国抗日，是“安内攘外”政策的真谛和核心。这一点，在上述史实中已昭然若揭。

三、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仅断送了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而且其造成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

国民党当局配合日本侵略者镇压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本为媚日乞怜，苟且偷安，结果却适得其反。1935年6月至7月间，久欲攫取华北的侵略者，竟以遵化县政府接济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破坏了”《塘沽协定》和天津两汉奸被暗杀等为借口，对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种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何应钦卑躬屈膝，一一承诺。1935年6月9日，酒井晤何应钦，不单追问承诺之事，且又提出何应钦所辖权限之外的非分要求。何应钦经请示汪精卫后，实际上也一一照办了。7月6日，何应钦在由日方事先拟就的一纸承诺通知文稿上签了字，转交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文称，“敬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这就是丧权辱国、习惯上称之为“何梅协定”的秘密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

[1] 《暴日占据东北痛史》，第36页 。

[2] 参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2页。

[3]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下册）》第一分册，第349页。

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寇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冀察和平津，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中国蒙受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国土上因国外的压力而自行撤退的奇耻大辱”[1]。

总之，以孙永勤为首的抗日救国军是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农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和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它在中国抗日战争这一特定时期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而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打击和破坏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日力量，也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深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更大的灾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国共两党只有友好相处，合作才能共赢，这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又逢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回忆这段历史，无疑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单位为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1] 《高桥坦回忆录》，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11月29日。



为中华民族悼英雄[1]

——孙永勤将军牺牲70周年祭

翟丽芳

很多人都看过奥斯卡获奖影片《勇敢的心》，当人们沉浸于青山环抱的苏格兰高地上空那凄婉的风笛声，内心深处为梅尔·吉布森扮演的苏格兰民族英雄临刑前奋力的一喊（“自由！”）深深震撼时，可曾有人想过，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河北东北部地区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中，也曾产生过一位像威廉·华莱士那样英勇抵抗外民族侵略的英雄豪杰？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河南、东北各地都在隆重纪念杨靖宇将军、赵尚志将军等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中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做出重大贡献与牺牲的先烈们，可曾有人想过，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在河北蜿蜒跌宕的长城北侧，有一位与杨靖宇、赵尚志将军同时期举起抗日大旗，为中国的独立与自由做出了同样的贡献与牺牲，但却很少为人所知的燕赵英烈呢？

2005年1月6日，省会正是雪花飘飞的日子，我和朋友登上了开往承德的列车，开始了我们前往河北东北部山区的采访之旅。此行的目的是前去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和遵化毛山，寻访民族英雄孙永勤的出生地和牺牲地。

谁是孙永勤？为什么称他为民族英雄？

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刚范先生今年68岁，他和74岁的兴隆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原兴隆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佟靖功先生是国内两位最不遗余力研究、宣传孙永勤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初，刘刚范先生受中共承德地委宣传部、党史办的委托，对孙永勤英雄事迹进行调查，发表了《孙永勤与民众抗日救国军》一文。佟靖功先生花费七年时间（1983~1990年），走遍兴隆全县每一个自然村落，并远涉承德、平泉、宽城、青龙、迁西、迁安、遵化多个市县，深入调查孙永勤将军事迹中缺失的环节，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国内迄今为止最为详尽、深入的孙永勤调查报告《民族英雄孙永勤》。刘、佟两位先生多年来一直为宣传孙永勤事迹不懈奔走，多亏了他们的努力，我们在孙永勤将军牺牲70周年之际，才对他的事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孙永勤，1893年出生于河北承德县孙杖子（今属兴隆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

[1] 本文曾以《孙永勤将军牺牲70周年祭》之名发表于2005年3月6日《燕赵都市报·新闻周刊》第8版。由于版面限制，编辑在刊发时删去了部分内容。此为全文，略作了些修改。

学习，几年后回家务农。他从小好武术，喜读《岳飞传》、《水浒传》，景仰岳飞，崇尚忠义。据见过孙永勤的村民回忆，孙永勤肤色微黑，手长过膝，不到二十岁便身高近两米，力大无穷。由于行侠仗义，主持公道，在远近的青年人中极有影响。直奉战争以后，土匪啸聚长城以北地区的山林，危害百姓，热河地区的乡村纷纷成立伙会，抵御土匪袭扰。孙永勤因作战勇敢、富有指挥才能，加之能团结众人，很快被任命为孙杖子伙会副会长。

“九·一八事变”三个多月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3年2月下旬，日军又进攻热河。孙永勤对国民党军队不战自溃，非常愤怒。1933年3月，国民党爱国的二十九军官兵用大刀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进行正面血战，消息传来，孙永勤激动地说：“只有抵抗，才有出路。”传说孙永勤与王宝石村船民关元有曾星夜骑马百余华里，赶赴喜峰口阵地，将他们见到的日军侵入鹰手营子一带的情况报告给二十九军，受到二十九军将领的褒奖。此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几十年后，党史工作者偶然翻阅二十九军著名抗日将领何基沣的回忆录，才在那里找到对此事件真实性的印证。

日军占领热河后，先是推行“土地登记”政策，搜刮热河地区人民财税，1933年11月，又实行“铳器回收”政策，强迫农民将所有枪支无偿上缴，如有延误，即按匪论处。孙永勤亲眼目睹家人和乡亲们因逾期不交枪，被伪警察抓走，决定与其等死，不如反抗。他来到路通沟村赵家庄，找到赵林、赵来等人，几人一致同意孙永勤起义的想法，并在一座大庙中歃血结盟。1933年12月11日，在日军占领东北全境、热河省大部，国民党长城抗战失败，军队撤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南方艰难地反“围剿”之际，孙永勤率领十六名农民，共计十七人，勇敢地树起了“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大旗，正式宣告成立民众军。民众军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敌不死，志不屈”，在长城以北的深山大川里与日伪展开了殊死斗争。

民众军运用过去山中打猎和围剿土匪学会的游击战术，以老梁、五凤楼、五指山、广东山、都山等几座大山为根据地，铁流般地穿梭活动于兴隆、宽城、承德、平泉、青龙、遵化、迁安等县，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势力。1933年12月至1935年5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共攻克日伪据点一百多次，毙伤俘日军、伪“满洲国”军数千人，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的气焰，牵制了日军对平津的用兵，极大地激发了活动地域内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很多民众加入到孙永勤起义军中，部队人数最多时曾达五千人以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孙永勤和民众军采取了“招抚”、“围剿”两种办法，均无济于事，恼怒之下，称呼孙永勤为“山耗子”（山这头堵，山那头出来，怎么堵都堵不住之意），孙永勤则鄙视地称呼日本关东军为“黄豆皮子”（日军军服为黄豆颜色）。

孙永勤、民众军的抗日行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1934年2月，中共京东特委委员王平陆到达五凤楼民众军驻地，与孙永勤会晤。王平陆建议孙永勤将民众军的名字改为“抗日



救国军”，孙永勤高兴地接受了建议。抗日救国军整个抗战过程中，一直最感缺乏的是枪弹和医药。当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从变卖自家十五亩好地购置来的枪械中，拿出十二支大枪，另外还购买了一箱外伤药，派弟弟、共产党员骆凤鸣和阎龙赶着毛驴，驮着席卷（枪藏在里面），连走三天，将枪和药品送到孙永勤军部。孙永勤收到枪支和药品后，对共产党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日军在长城以北的山林地区消灭不了孙永勤，便想出了一条十分阴险的计谋：用重兵从东、西、北三面，强行逼迫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入关，将其在遵化毛山地区予以歼灭。日军此计甚为毒辣：一、毛山为一异常光秃荒凉的石山，没有树木，无险可守，便于日军集中炮击；二、日本关东军中的好战分子一直不满足于其势力范围仅停留于《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长城以北地区，毛山位于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故意将战场推进到这一地带，可以试探国民政府的反应，为扩大日军控制的范围寻找借口。

1935年5月初，在日本关东军的疯狂围堵下，腿部负伤的孙永勤为解决部队军需给养问题被迫带队入关。5月17日，孙永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华北抗日第一军军长”的委任。这期间，孙永勤已发觉了日军的意图，为不给侵略者造成进占华北的口实，他决定寻机突围，重返长城以北山区。不料，未来得及冲出，便被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快速调集多地驻军，联合国民党河北省特警队、遵化县保安队、民团，计约四倍于孙部的武装力量，将救国军层层围困，压迫上毛山。日军动用飞机、大炮对救国军阵地进行轰击。5月24日，孙永勤被日军机枪子弹射中，壮烈牺牲。据幸存救国军官兵回忆，孙永勤将军牺牲时刻，场面倍极悲壮和伤感：当孙永勤发现，国民政府不但派出遵化县保安队、当地民团协同日军对他进行“围剿”，还专门派出河北省特警总队的多个中队对救国军进行“围剿”时，他痛心疾首地说：“队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我孙永勤一个人的错，我对不起兄弟们。”他要青年时代的朋友、军参谋长关元有（牺牲50年后，党史工作者才发现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率队突围，自己坚守阵地，牵制敌人。据说关元有听了孙永勤的命令后，热泪盈眶，一时难以回答，稍后才感慨而坚决地答复：“中国人理应为中国死，只是我没能给您当好参谋长！我与军长在此一同报国，请派他人率队突围。”两人一起殉难。

救国军官兵除部分突围外，其余全部殉国。救国军覆灭后，日军将孙永勤、关元有头颅割下，带往承德二仙居示众，至今头颅下落不明。幸存官兵大部分回到原籍，他们无限怀念他们的老军长，或再次拉起队伍与日军血战，或在八路军宋邓纵队挺进冀东后参加了八路军，一些人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

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覆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

日军中的少壮派通过国民政府积极参与“协剿”孙永勤之事，进一步看穿了它软弱妥协的

本质，其得寸进尺、吞并全中国的野心被刺激得愈加膨胀。孙永勤牺牲后五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高桥坦便召见国民政府陆军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以天津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振报》社长白某被刺杀，孙永勤进入“非武装地带”，受到遵化县接济，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提出十多项无理要求。7月6日，日方逼迫何应钦在日本单方面拟就的一纸承诺文稿上签字，文称：“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日方将这一措辞十分含混的文稿称为“何梅协定”，并以此为依据，在东北三省、热河之外，又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部分主权。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法庭否认了由日方单方面起草的这份承诺文稿具有“协定”性质，但那已是后话。迟到的正义非正义，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蛮横狡猾，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软弱屈服，致使华北主权曾一度脱离中国，人民曾惨遭涂炭，此一悲惨历史已无法重新改写。

对孙永勤牺牲一事，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与惋惜。1935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救国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高度赞扬了吉鸿昌、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十一位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称他们表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抗日救国最终必然胜利。同年秋季，中共上级党委专门指示冀东地方党组织，在兴隆县冷嘴头大青山召开会议，沉痛总结了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在遵化被“剿灭”的教训。

解放后，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孙永勤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以李运昌将军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呼吁下，孙永勤被平反，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享受军长级待遇，事迹和塑像陈列承德市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宣传意识的欠缺，孙永勤的名字和事迹不光在国内，即使在河北省内，至今也少为人知。在《八一宣言》中与孙永勤将军齐名的吉鸿昌、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由于解放后各种媒体均予大力报道，部分事迹还选入中小学教材，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上过学，能读懂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他们是谁，能说出他们做过什么。与孙永勤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初期同时打响人民抗战第一枪的杨靖宇将军、赵尚志将军，不仅很多地方立有他们的塑像，建有他们的纪念馆，他们的英雄事迹被以各种文艺形式反复传颂，2005年2月杨靖宇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河南省甚至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筹备活动：2004年10月2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亲到杨靖宇故乡驻马店现场办公，要求驻马店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从弘扬英雄精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杨靖宇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筹备工作； 2月17日，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更率河南省党政领导和



各界人士在驻马店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前集会，隆重纪念杨靖宇诞辰100周年，徐光春并亲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杨靖宇将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谱写了一篇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英雄史诗。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河南人民要学习和弘扬杨靖宇将军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恪尽职守、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与河南全省隆重纪念河南籍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相比，河北籍民族英雄孙永勤将军在河北省却显得异常冷落。没有多少人知道2005年是杨靖宇将军诞辰100周年，但同时也是孙永勤将军牺牲70周年（5月24日）。他和关元有将军头颅的下落无人追踪，他的遗物无人搜集，除了刘刚范、佟靖功先生外，没有多少人去写作纪念孙永勤将军的文章，除承德市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有一尊根据孙将军儿子和见证者回忆制作的塑像外，不论在孙将军出生地和牺牲地，至今没有人为之立过一块碑。不仅如此，1月7日，当我们到达孙永勤将军家乡兴隆县孙杖子村时，我们发现孙将军故居遗址甚至有成为村中垃圾场的危险。孙永勤将军今天的境遇尚如此，跟随他起义的抗日救国军战士情况更不会好到哪里去。家住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茹峪村黄花峪自然村的史耀华今年92岁，从起义之初就追随孙永勤，曾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监察班班长，他是目前所知的唯一尚在人世的抗日救国军老战士。比他小九岁的弟弟因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现在每月均能从政府那里领到津贴，但史耀华因参加的是抗日救国军，不仅未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过任何经济方面的补助，连肯定的政治待遇都未能得到。如今已双目失明、卧病在炕的史耀华，每念及这些，浑浊的泪水便从深深陷落的眼窝中不绝而出。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生物之群；有了英雄而不去珍惜爱护的民族，则是可怜的奴隶之邦。"据说六十几年前，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惊闻鲁迅逝世的消息后，曾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重复一遍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山区农民，在日本法西斯侵略气焰正盛，国民政府军失败溃退，工农红军还在南方艰难地反"围剿"、长征之际，勇敢地组织起一支5000余人的农民队伍，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与日寇血战长达一年半之久，兵锋直达长城内外，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势力。在我们心中，孙永勤将军不仅是河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这样的英雄，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们都是不应当忘记的。不但不应当忘记，而且应该永远牢记，特别是对于河北人民来讲。

令人欣慰的是，文写及此，传来比较好的消息。据悉，兴隆县委县政府已决定筹建孙永勤及"千里无人区"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电视台影视剧频道、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也拟联合制作一部详尽介绍孙永勤将军生平的纪录片。衷心祝愿这两个计划能够圆满实

现，为河北人民保留下一份极其可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已经到来的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孙永勤将军和毛山被围抗日救国军官兵牺牲70周年。在沉重悼念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人民和英雄的同时，我写下了如上关于孙永勤将军的文字，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所有的人都记得：在中国的北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长城北面的深山密林里，曾有孙永勤将军这样一位英勇的反法西斯英雄，曾有孙永勤将军创立的一支名叫“抗日救国军”的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农民武装，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北方大地自古贯穿至今的慷慨悲歌之气。

作为河北人，我们为河北的大地上曾产生了那样的民族英雄而自豪。我们应学习他们的精神，把他们的精神化作我们河北迈入现代化社会的动力。

英雄血　亲人泪[1]

——孙永勤之孙采访记

翟丽芳

在英雄光环的背后，我看到更多的是亲人的泪水。——作者题记

一封出乎意料的网络来信

2005年3月6日，《孙永勤将军牺牲70周年祭》一文在《燕赵都市报·新闻周刊》发表。由于原文较长，刊载时不能全部登出，我便在长城小站——国内一家介绍和保护长城的网站上上传了全文。

3月22日，我打开长城小站，看到了一封回复。

全文如下：

红脸勇士[2]：

您好！

看到您的这篇文章我非常激动，并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我是孙永勤的亲孙子。

[1] 本文曾以《孙永勤之孙采访记》之名发表于《文史精华》2005年增刊1上。此次对文章开头不必要部分作了删改。

[2] 笔者在长城小站上注册的名字。



记得小时候回老家，常听奶奶说起爷爷。奶奶总是眼含泪水拉我到爷爷的灵位前，讲述着爷爷当年的英雄事迹……

我爷爷共有三儿两女，大伯孙文伶，二伯孙文孝，我父亲老三孙文顺，我是孙文顺长子孙团营。二十多年前，我父母带我和两个妹妹专程为我爷爷的事情去了老家孙杖子、兴隆县民政局和承德市政府，办理我爷爷的有关烈士证明，现在我们家中仍然保有当年的有关材料和来往书信。我很想与您取得联系。

此致

敬礼！

我的电话（略）

孙团营　于2005年3月17日

看了这个回复，我当时的反应是一下子愣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2005年1月7日，当我们在兴隆县城采访县里有关人士，以及在车道沟采访孙永勤二儿子孙文孝之子孙忠然时，均曾仔细问过孙永勤还有没有其他的直系亲属尚在人世，我们得到的回答都是：没听说过还有其他亲属存在。那么怎么又出来一个孙团营呢？而且信上所留电话区号还是唐山地区呢？

检查来信发出时间是3月17日晚23点57分，离我看到的时间已有四天多，我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自称是“孙永勤亲孙子”、名叫“孙团营”的人的电话号码。通报姓名后，一个激动的年轻男子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据他讲，他为能与我联系上已经花费很多力气了。先是他爱人和他均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3月6日的《燕赵都市报》，在这之前，从未有媒体用专版这么详细地介绍爷爷孙永勤，他们看了后异常激动。接着便是迫不及待地与燕赵都市报社联系，试图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因报社接听电话的人不清楚，又想到在互联网上搜索试试。直到凑巧在网上搜索到文章全文及我的网名，写下留言，希望我能看到，我又恰巧看到了。与孙团营的第一次通话时间很短，因了解到他现在是以开出租车为生，长时间通话不好，我们便约定晚上再通话。晚九点，我准时拨通了他家的号码，未想到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中，孙团营抑制不住地两次痛哭失声。也正是这一谈，揭开了让人的心灵备受震动的孙永勤牺牲后孙家几代人的心灵史。

关于爷爷的记忆

1964年，两岁的孙团营随调到唐山陶瓷厂工作的父亲离开兴隆鹰手营子矿区，来到唐山。此后由于亲爱的父亲备尝心灵煎熬之苦，过早离世，加之生活非常艰难，通信不便，再也没有与从孙杖子老家迁徙至兴隆县城的二伯家后代联系。这造成了孙永勤的二儿子、三儿子两支虽同在河北，并近在咫尺（兴隆、唐山两地相距并不遥远；大儿子一支已无人），却互相不了解

对方情况的遗憾局面。

孙团营的父亲是遗腹子[1]，没有见过孙永勤。孙团营对爷爷孙永勤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他亲爱的奶奶雷永兰。像在网络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小时候，奶奶雷永兰经常颤巍巍地一步一步地把年幼的孙团营领到孙永勤的灵牌前，然后就在那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把孙团营搂在怀中，一段段地给他讲起有关孙永勤的往事。孙团营的记忆中，奶奶最爱描述的是孙永勤的形象：白马、双枪、长袍、礼帽。爷爷的这个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孙团营的脑海里，以至成年后，当孙团营从唐山回孙杖子探望老家遗址，经过长城和滦河时，脑中总是幻化出高大威武的爷爷骑白马、提双枪、穿黑长袍、戴黑礼帽，挺立于雄峻高耸的长城之上和碧波荡漾的滦河岸边的情景。

据奶奶讲述，孙永勤当年起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听说了日本占领朝鲜后，不光要几家共用一把菜刀，而且要求朝鲜人趴在地上，给日本人当上马石。孙永勤忍受不了中国如果亡国，在中国人身上也肯定会出现的这种耻辱，于是不顾亲人的拼死反对，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启发下，决定起义。

对母亲的不赞同，由于孙永勤是个大孝子，他采取了自己的办法：每次作战结束回到家中，到吃饭时刻，必先亲到母亲屋里，问母亲是否吃过。如母亲赌气不吃，则自己也不吃。只有母亲吃了，才端起碗，在母亲面前故意扑噜扑噜吃出声来，让母亲转怒为笑。

对深爱的妻子和妹妹，孙永勤则没有那么客气了。此方面的事情，元月份我们在兴隆县蘑菇峪乡采访抗日救国军老战士史耀华时，他曾讲到：当雷永兰拼命抱住孙永勤臂膀，不让他再带队伍出去打击日军时，孙永勤气得一把将雷永兰抡倒在地，大喊道："再撕扯，我踢碎你的下巴。"孙永勤起义初期，为解决武器问题，曾采取"募枪"和"压枪"的办法。募枪，即劝财主赞助枪支，怕丢失，可以跟人。压枪，即财主无论如何不给枪，只能采取安排很多人在财主家吃住，以此向财主施压，或是将财主家人带走，以枪赎人的办法。据佟靖功先生调查，孙永勤对亲妹妹就曾采用了压枪的办法。妹妹嫁到了城墙峪有名的张财主家，却一口咬定家中没枪。孙永勤率二百余名官兵在她家连续吃住六七天，不起作用，一气之下命令亲兵将外甥绑起来就打。外甥还是坚持说没有，孙永勤大声斥责道："不亲不故的还给我枪打日本呢，越是亲戚越拆墙，不给我们，留着给鬼子？"他一下子举枪对准外甥，慌得妹妹扑通跪下，交出六支大枪、一把匣枪，跟出七个人来。

据孙团营讲述，奶奶说起过，孙永勤曾带队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吉鸿昌会晤，并得到过冯玉祥的支持，当时的讲法叫"挂对"。考冯玉祥、吉鸿昌抗日同盟军自1933年5月底成立，至

[1] 孙团营父亲孙文顺是否遗腹子，说法不一。包括孙永勤二儿媳贠玉萍、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在内，很多人都说孙文顺是"梦生"，即遗腹子，然根据雷永兰在1974年12月25日所作的一次回忆，他是在孙永勤牺牲前一两个月出生的。

10月中旬在日本、国民政府联合夹击下，即告彻底失败。如孙永勤确实与冯玉祥、吉鸿昌联系过，也当是孙永勤起义前，任伙会副会长时。此事还需文史工作者考证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它丰富了有关孙永勤的资料。

雷永兰曾多次对孙团营提及：孙永勤本可以不死，至少不至于死得那么早。1935年5月，当日军逼迫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进关的图谋已经非常明显时，曾有不少人提议不要入关，先将抗日救国军就地遣散，待避过锋头后，再东山再起。那时的孙永勤腿部已负伤，无法行走，只能由士兵用椅子抬着。他的嗓子也因上火至扁桃腺严重发炎，讲话很困难。孙团营的大伯孙文伶那时12岁，已跟随队伍学会打枪。他看到父亲痛苦的样子，也坚持不让父亲去关里。由于当时已是5月，但官兵还穿着厚重的棉衣，孙永勤不忍见此，加之需要解决枪弹问题，不顾众议，还是去了关里。结果很快就中了日军和国民政府的圈套，牺牲于长城以南不远处的遵化毛山之上。

奶奶与灵牌

奶奶雷永兰是今年44岁的孙团营极为敬重之人。据说1935年5月24日，孙永勤牺牲于毛山的消息传到雷永兰耳中之时，雷永兰表现得异常平静。孙团营曾为此事问过奶奶。奶奶回答说："那么多人围着打了三天，还能活得了吗？死是正常的。"

我们无法判断，当年雷永兰的镇静是真的，还是刻意压制的。因为，2004年12月24日，我们在毛山采访时，曾听毛山沟村民真切地给我们描述过这样一个情景：1935年5月底，即在孙永勤牺牲后几日，日军和国民政府特警队均已撤走，一个傍晚，有村民亲眼看到雷永兰偏坐在毛驴之上，来到毛山前。雷永兰下了毛驴，冲着毛山主峰方向，呜呜咽咽压抑着哭了一阵，在暮色中又偏骑着毛驴无限孤单地离去……

我们曾专就这个说法，问过孙永勤二儿媳贠玉萍，她说未听婆婆谈过此事。这次也追问了一下孙团营，他也说未听奶奶及别人说过此事。但孙团营却讲述了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事情：日军在毛山将孙永勤消灭后，为斩草除根，开始了疯狂追杀孙永勤亲属的行动。只要闻听是姓孙的，就不问青红皂白，格杀勿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保住孙永勤的骨血，雷永兰开始了历尽磨难的逃亡生涯。她先是逃到丰润县老庄子一个大户人家，认主人为干爹，躲了几年。但在一天夜里，却突然套上车，带着五个儿女，星夜仓皇远遁，详情不得而知。传说雷永兰后来还带着儿女到东北避难几年，大约是日本投降后，雷永兰重新回到兴隆县孙杖子老家。

雷永兰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这从她晚年的照片中就可以感受到。

据孙团营讲，奶奶和爷爷的感情非常好。奶奶虽曾在爷爷起义初期拦阻过他，爷爷为此还动过粗，但爷爷也知道，这是奶奶在为他担心。"你爷爷那么威风，他怕我"，奶奶曾不无自豪地对孙团营这样讲过。

孙永勤牺牲时，雷永兰才三十几岁，但坚持守寡，终生未改嫁。她把孙永勤当作了自己唯一的男人，请人专门为孙永勤做了一个灵牌，这个灵牌一直陪伴了她几十年。

需要补充的是，雷永兰并不是孙永勤的结发妻子。孙永勤的第一个妻子很早就因病而亡，雷永兰是孙永勤后娶的妻子。他们是经村民介绍认识、结婚的。“文革”时期，雷永兰曾被错误地当作“土匪家属”，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家属后，一直随大儿子孙文伶生活。孙文伶去世后，又随二儿子孙文孝生活。雷永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兴隆县车道沟去世。

雷永兰生前十分感念李运昌将军。全国解放后不久，李运昌将军曾专门到孙杖子寻找雷永兰。他把她尊称为老嫂子，希望接老嫂子进京。因雷永兰当时住在聚宝盆娘家，未能见面。尽管如此，雷永兰仍十分感动，她非常感激李运昌将军那样的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的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她、没有忘记孙永勤。她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父亲的泪

孙永勤与雷永兰育有三儿一女。雷永兰一生对谁都好，唯独对三儿子孙文顺即孙团营的父亲不好。追究原因，据说孙永勤是雷永兰怀孙文顺期间牺牲的，民间有孙文顺命硬、妨爸爸的说法。相信雷永兰是因为深爱孙永勤才不喜欢孙文顺这个孩子的，也相信雷永兰为避免让孩子伤心，内心深处也一定作过剧烈的斗争，但人世间很多事情是非理性所能完全控制的。孙团营的父亲一生未能从因为自己的出生而导致了父亲的死亡这个阴影中走出。你能想象一个14岁的男孩，眼馋地看着别的孩子温暖地依偎在父母的身上，自己却不得不在刚解放的混乱时刻，独自远走他乡谋生的情况吗？那就是孙文顺。无法准确知道孙文顺到底都经历了哪些难以言说的磨难，承受了哪些心理痛苦，因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孙团营听父亲讲过的：他长大后，在兴隆鹰手营子矿区当了兵，并在那里就地复员作了矿工。1964年，部分矿工被转到唐山陶瓷厂，孙文顺来到了唐山。

据孙团营讲，尽管奶奶雷永兰一直对父亲有一股无名的怨气，但父亲对奶奶却不敢有抱怨之心，只能更加恪尽为孝之道。孙团营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当父亲看到奶奶在家乡因受到不公正待遇，人住在露雨的房子里，还要受人欺负的情景。父亲难过地流下眼泪，当时父亲就下定决心，一定不让奶奶再受苦，一定要为奶奶讨回公道。孙团营回忆说，那是一幅至今想起令人心酸的图景：四十多岁的父亲背着七十多岁的奶奶，母亲抱着小妹妹，孙团营自己搀扶着年龄已很大的大伯，六口人艰难地行走在从孙杖子到兴隆县城、从兴隆县城到承德市漫长的上访之路上。当他们终于从当时的承德市长那里得到肯定的公正的答复时，孙团营注意到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知道，父亲感觉可以对得起母亲的养育之恩了。

孙文顺最终未能从郁郁寡欢的命运中摆脱。这里有他自己也认为罪孽深重，若不是自己的降生，不会导致自己深深敬爱的父亲死亡的原因，也有他因注定无由与亲爱的父亲谋面，而导致人生终极缺憾无法补足的原因。据孙团营回忆，父亲经常陷入思念爷爷孙永勤的苦痛之中而难以自拔，总哭着说："没见过你爷爷，是爸爸一生的悲哀。"过年时也经常跟孙团营兄妹说："你们都应该满足，你看我都没见过爹。"有一件事，孙团营印象非常深刻。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时期，当时孙永勤被冠以"土匪"的罪名，雷永兰遭牵连、受磨难，原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二总队长的年焕兴（与李连贵突围成功，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被"剿灭"后加入包森支队，与战友活捉了日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解到此情况后，托人捎话给孙文顺，告知他知道孙永勤遗体埋葬地点，若孙永勤不被平反，愿意与孙文顺一起挖出孙永勤遗体，抬着去中央申诉。孙文顺听到年焕兴知道孙永勤遗体下落的消息，高兴不已，那是他日思夜想的父亲，还有什么比能见到他，尽管是遗体，而且是残缺不全（头颅已被日军割走，下落不明），更能令人高兴的呢！孙文顺兴冲冲地按约定时间去见年焕兴，当他到达时，被告知：年焕兴已不幸因病去世了。孙文顺捶胸顿足，只能更加感叹上天对自己不公，命苦。

孙文顺1982年因患病毒性脑膜炎去世，年仅47岁。

孙文顺的过早去世，给家庭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由于丧失了重要的经济支柱，光靠作教师的母亲一人的工资绝难维持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的家庭，孙团营的母亲不得不夜里去菜市场捡菜帮，以尽量减少开支。

爷爷的血

孙永勤与第一个妻子生有一女，已早逝，此女遗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赵显刚，一个叫赵显朝，现生活在距孙杖子几华里远的一个山村，生活状况不明。孙永勤与雷永兰生的三子一女，大儿子孙文伶，1980年自缢身亡，原因不详；二儿子孙文孝，90年代中期去世；三儿子孙文顺，如前所述，1982年去世；女儿孙彩云，约80年代末去世。三子一女中，大儿子、女儿后代已绝。目前留有后代的只有分处兴隆和唐山的二儿子、三儿子两家。即使这两家，目前生活情况也都非常不好：孙永勤在兴隆的孙子孙忠然，今年32岁，已下岗几年，身患腰肌劳损症，靠学了一点电焊技术，给人干零活为生。孙永勤在唐山的孙子孙团营，今年44岁，大妹妹病退，小妹妹没工作。自己尽管在唐山陶瓷厂服务公司工作时因表现出色，一直是班组长，但因工矿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也于2002年下岗，身患腰椎、劲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目前除靠每月领取政府颁发的托管费218元外，依靠开出租车赚取生活费用和支付儿子高昂的大学费用。电话中，我曾问及孙团营是否找过政府。孙团营说，在很多朋友的劝说下，他试着给唐山市民政局打过一次电话。对方说，我们这儿还下岗呢，就没好意思再找。从内心里，孙团营很希望政府

能帮一帮与他同龄的这一批四十多岁的下岗职工，因为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纪，生活负担又很重，但理智又使他不想要政府帮助：他不愿意玷污爷爷孙永勤的英名，不愿意别人说他是靠在孙永勤的功劳簿上讨生活。“政府能帮助，肯定不会给政府丢脸，因为爷爷、父亲都不会允许自己胡作非为。政府不帮助，也会勇敢地面对来自生活的一切挑战，因为我是孙永勤的孙子，毕竟身体里流着爷爷的血！”孙团营这样坚定地说。

采访的最后，当问及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时，孙团营说，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媒体能更多地宣传爷爷和跟随爷爷一同抗战的抗日救国军官兵事迹。抗日救国军的很多官兵是为爷爷的精神所感染，抛家舍业参加抗日的。他们很惨，没活下多少，希望哪怕是只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待遇也好。他们是为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是民族英雄。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有爱国之心，中国需要有爱国之心的人！





ISBN 978-7-202-06213-5

9 787202 062135 >

定 价：280.00元（上下卷）